

版權信息

Atlantic Crossings： Social Politics in a Progressive Age by Daniel T. Rodgers  
 Copyright © 1998 by the President and Fellows of Harvard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權合同登記號　圖字：10-2007-134號

書  名　大西洋的跨越：進步時代的社會政治

作  者　【美國】羅杰斯

譯  者　吳萬偉

責任編輯　馬愛新　滕舒

出版發行　譯林出版社

ISBN 　　9787544717786

關注我們的微博： @譯林出版社

關注我們的微信：yilinpress

意見反饋：@你好小巴魚

目录

[中文版序言 3](#_Toc69137274)

[前言 4](#_Toc69137275)

[第一章 1900年的巴黎 7](#_Toc69137276)

[鋼鐵世界 7](#_Toc69137277)

[解釋社會政治 12](#_Toc69137278)

[第二章 大西洋世界 16](#_Toc69137279)

[風景 16](#_Toc69137280)

[進步政治 23](#_Toc69137281)

[第三章 自由放任經濟的黃昏 31](#_Toc69137282)

[自然行為和社會欲望 31](#_Toc69137283)

[講授經濟學 39](#_Toc69137284)

[第四章 自我支配的城市 44](#_Toc69137285)

[都市生活的集體主義 44](#_Toc69137286)

[山上之城 51](#_Toc69137287)

[第五章 公民的抱負 61](#_Toc69137288)

[私有財產，公共設計 61](#_Toc69137289)

[“對工人公平的城市規劃” 69](#_Toc69137290)

[第六章 工薪族的風險 79](#_Toc69137291)

[工人保險 79](#_Toc69137292)

[利益領域 88](#_Toc69137293)

[第七章 戰爭集體主義 99](#_Toc69137294)

[1914年的歐洲 99](#_Toc69137295)

[“幾乎熔化”的社會 107](#_Toc69137296)

[第八章 農村的重建 118](#_Toc69137297)

[合作農莊 118](#_Toc69137298)

[島嶼社區 127](#_Toc69137299)

[第九章 機器時代 135](#_Toc69137300)

[美國對歐洲的入侵 135](#_Toc69137301)

[現代主義政治 143](#_Toc69137302)

[第十章 新政 149](#_Toc69137303)

[災難時期的智慧經濟 149](#_Toc69137304)

[想象中的團結 161](#_Toc69137305)

[第十一章 1942年的倫敦 174](#_Toc69137306)

[消除貧困的計劃 174](#_Toc69137307)

[例外主義的重生 180](#_Toc69137308)

[致謝 183](#_Toc69137309)

[索引 184](#_Toc69137310)

[譯后記 230](#_Toc69137311)

[注釋 232](#_Toc69137312)

# 中文版序言

《大西洋的跨越》講述了美國歷史上樞紐時代的故事。在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期，農業和商業社會的美國幾乎一夜之間轉變成為世界領先的工業化國家。新消費品的生產以讓人震驚的速度迅速發展，與此同時勞動和日常生活的風險大幅度增加，新興大城市的規模和負擔不斷擴大，貧富懸殊日益明顯。工人和農民中醞釀著憤怒情緒及躍躍欲試的戰斗欲望。男男女女都感受到新經濟秩序的承諾和日常生活遭到沖擊的擠壓。中產階級中間彌漫著讓人不安的焦慮，他們擔心在幾乎沒有約束的工業資本主義壓力下，社會紐帶將分崩離析。

影響美國一百年前的歷史的因素如今在世界許多地區重現。美國進步人士的反應是要尋求和創建一系列多樣化的體制措施，來消解工業化對勞動、社會和人類生活的壓力。其中有些意味著政府需要承擔新的責任，其他措施比如農業合作社或者都市住房項目，是為了重新復興自愿的公民生活的活力。進步人士的想法并不系統，而且常常很天真，但是其實際改革活動和理想涵蓋的范圍使他們在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現在，那些用來平衡美國民眾需要和私有市場行為的保護和補償措施，大部分都源于進步人士的工作。

《大西洋的跨越》的特殊性在于向讀者表明進步時代的美國人如何充分地沉浸在改革工程和思想的世界里，這些思想傳播到美國之外很遠的地方。美國人是海外社會政策的借鑒者和修改者，他們在全世界尋找切實可行的措施來緩解經濟改革過程中的緊張關系。他們認為美國是經受同樣的社會和經濟危機磨難的更大國家群體的一部分。在這個意義上，《大西洋的跨越》是現在所謂的歷史學“國際轉向”的先鋒之作。我們也開始認識到就連政治史也超越了國家范圍。政治、觀點、社會運動在相互交往中同時具有地方性、全國性和國際性，即使美國這樣冷漠的、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國家也是如此。

如今，在21世紀初期，國際組織提出和推行形形色色的建議，社會改革者本能地在全球范圍內工作。社會政策網絡跨越國界已經成為日常生活中司空見慣的現象。在過去二十多年里，社會政策網絡發出的最強音一直就是要確保自由的市場行動，拆除管理壁壘成為最流行的主題。進步人士在自由市場的威力和維持社會連貫的機構之間找到平衡點這個希望，在很多情況下被市場萬能的幻覺所替代。大西洋世界進步人士零碎的、接連不斷的、富有創造性的改革想象力幸存了下來，但常常被教條的、受理論驅使的聲音所掩蓋。

在這個意義上，進步人士在全球工業資本主義第一個偉大時代中范圍廣泛的、常常讓人沮喪的努力和滿世界尋找社會改革措施的故事，不僅僅是過去的一章，或許它還能為當今的工業和市場革命提供經驗和教訓。

丹尼爾·羅杰斯  
 于普林斯頓

# 前言

喜歡揭發丑聞的記者雷·斯坦納德·貝克回憶1890年代在芝加哥實習新聞寫作時的心態說：“美國之外還有一個世界嗎？如果有，我對這個世界的現實幾乎一無所知……我知道一點兒歐洲的歷史，從前國王的暴政、貴族的荒謬、封建戰爭的徒勞無益等，讓人高興的是，美國擺脫了這一切，自豪地踏入《人權法案》和《獨立宣言》的啟蒙時代。我是一個真正的‘地球中心論’（geocentrism）的美國人。”[[1]](#_1_175)

在這樣深刻的地方主義面前，很難抗拒會意的微笑。任何一個了解歷史的嚴肅讀者都本能地知道貝克那時沒有認識到的東西：國家存在于相互的歷史網絡中。即使最孤立的民族國家也是半滲透性的容器，受到來自遠離國界的力量的沖刷。即使最強大的國家也只能在無法完全控制的世界體系中扮演自己的角色。

如果世界歷史的力量的復雜性給所有國家留下烙印，那么對于美國這樣一開始是作為其他國家帝國計劃前哨基地的國家，烙印就更深刻。從歐洲人在北美洲建立最早的定居點起，大西洋對于新移民與其說是天然屏障，倒不如說是保持聯系的生命線——是人員、貨物、思想和理想運輸的海上通道。作為歐洲人貿易的重要前哨基地和吸引歐洲資本的磁鐵，18世紀和19世紀的美國如果不是北大西洋經濟體的一部分，那是不可思議的。

把四個洲的命運連結在一起的世界體系是通過貿易和人員（無論是作為奴隸還是自由人）交流來完成的。工業品和農產品的世界市場促成了大型港口城市和內陸工廠城鎮的格局，也造就或者毀掉了種棉花的南部和種麥子的西部的命運。在造就了莎士比亞、司各特、狄更斯等文學巨匠的土地上，圖書和作家也在北大西洋經濟體內傳播，帶來的是時尚、口味和觀念，有時候還有強大社會運動的種子。美國革命本身就是從波哥大到柏林的更大政治變革的組成部分。反對奴隸制的運動、工會運動、女性運動等也都是跨越國界的事件。把20世紀后期美國的命運與全球市場和理想結合在一起的這個全球相互依賴的網絡，只不過在細節上顯得新鮮而已：從更廣泛的意義上說，它一直就是美國歷史永久的條件。

如果說這些是每個歷史學家都知道的事實，歷史寫作卻常常不能跟上歷史自身規律的要求。糾纏于公民教育的簡單化關系，各國的歷史描寫都吸收了揮之不去的民族主義。歷史學家專注于民族差異問題，傾向于具體描述各自國家的獨特文化、獨特歷史、“特殊道路”（Sonderweg）、例外主義等。因為每個國家的歷史（不論從事實上還是從定義上說）都是獨特的，這樣的工作不是沒有道理：但是從最壞處說，結果造成了歷史中能夠展現民族國家可滲透性的連接點被砍掉（而超越國界的力量恰恰在這些地方做了最重要的工作）。敘述部分也常常縮減到國家范圍內，民族國家的邊界成為歷史分析的囚籠。[[2]](#_2_170)

社會政治就是一個說明問題的例子。有關進步思想和新政政治的研究層出不窮。對激進的市場資本主義的社會成本進行限制——在當時這一社會沖動的根源方面，美國一些最好的歷史著作找到了研究焦點。為了與重大事件相稱，人們使用了大范圍解釋來理解它。因此美國干預主義國家的興起已經被追溯到異常迅速的工業化沖擊、19世紀中期美國國家和社會的薄弱和擴張的本質、衰落的中產階級的地位焦慮、專家和專門人才精英新群體的科學抱負、中產階級女性的社會母愛、下層農民和工人的要求、上層工業資本家需要一種比資本主義競爭所能創造的更加合理的社會秩序等。但是正如貝克指出的，沒有說出口的“地球中心論”是統轄一切內容的框架。

雖然這些解釋很熟悉，它們沒有指出當時每個熟悉這些問題的人所知道的情況：美國社會政治的重構是北大西洋世界的政治運動和思想的組成部分，貿易與資本主義已經把這個世界連結在一起。這不是休眠于意識最深處的抽象的現實。深入了解當時席卷美國和工業化的歐洲的大辯論（關于大城市生活的問題和苦難、工人工作安全感的缺乏、鄉村生活的落后或者市場本身的不穩定性等），人們不由得卷入改革思想、政策和立法手段等跨越國界的滾滾洪流中。曾經有一段時期，倫敦東區和紐約市下東區，匹茨堡、埃森（德國西部城市）和伯明翰這些“黑鄉”，以及巴黎、華盛頓、倫敦和柏林的大學辯論和法官討論，構成了一個共同指涉的世界。

從1870年首批美國學生趕上19世紀末期德國大學攻擊自由放任經濟的潮流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大動亂，那一時期標志著美國歷史的獨特階段，有待于歷史著作的充分挖掘。前半個世紀的政治踏著更加內在化的鼓點進行。民主國家的形成一直是19世紀早期和中期美國的核心政治規劃，從杰克遜時代到林肯時代，那些還有一只眼在關注著世界其他地方的美國人，都有理由相信自己是世界民主運動的先驅者。

1945年后，美國突然發現它橫跨在一個自身的全球體系之上，例外主義主題又全盤殺回來了。1990年代的美國，以大學為基地的研究世界社會政治方法的專家比從前更多了，但是在日常的美國政治辯論中，人們對其他國家政策的了解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計。國外的陌生人與我們無關，他們的經驗對我們來說沒有用。用馬克斯·韋伯在談到早期新教徒時的話來說，美國處于它領導的世界之內，但不屬于這個世界，它的經驗和命運從本質上說是個例外。比爾·克林頓追求歷史地位之舉——1993—1994年的國民健康保險辯論重新彈起戰后例外主義的老調。在對加拿大敷衍性地頷首后，民主黨人認為世界其他地方的經驗不適用美國獨特的政治本質，所以扔到一邊，要創造出和其他國家不同的健康保險體系。而共和黨人則嚴厲批評這些努力的“美國色彩”不夠充分。

相對而言，1870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這些年確實是不同的。在19世紀早期的民主信心和20世紀后期的狂妄自大之間，人們開始辨認出有一個特殊時刻，美國政治敞開胸懷熱情擁抱外國模式和外來思想。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北大西洋經濟體形成了（對許多有戰略思想的美國人來說）一個提供有用和有趣實驗的世界市場。這些年美國的城市政治家可以根據格拉斯哥的經驗評估城市公交車的利弊，歐洲社會保險體系的運行可供大肆宣傳的調查委員會研究，英國和德國的某些模范城市吸引了世界各地社會進步人士的目光，簡而言之，其他國家的社會政治都是新聞。

社會政治方面的大西洋時代的形成，取決于美國與正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的某些歐洲國家一整套機構上的新聯系。而建立這些聯系需要新型的中間人，最終要求思想上的轉變，一種共處于比美國更大的歷史力量之中的認識：暫時收起把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命運割裂開來的自信心。具有全球眼光的進步人士反對鼓吹美國獨特思想和政治的推銷員，他們在一百多個戰場作戰。在他們的勝利和失敗中，在試圖與其他地方的進步思想和運動建立聯系的努力中，以及那些努力引起的斗爭中，他們的事業影響了這個時代，其影響力之大是那些陶醉在美國進步政治獨特性的傳統觀點中的人未曾理解的。

在某種程度上，我試圖沿著這些中間人在大西洋兩岸之間織出的部分聯系線來講述他們的故事。就像這些故事一樣，描述也是在19世紀和20世紀初期工業資本主義的核心領域內來回移動。英國和德國是美國最初的海外模范和對手，但是他們的借鑒常常涉足更遠。我所稱的北大西洋經濟體大概是從柏林延伸到舊金山的更寬泛的地域。

結果并不是普遍理解的意義上的歐美比較史。比較史的關鍵是差異。通過掩蓋國家間的相互依賴性，把歷史偶然性的過程凍結成為理想類型，再列舉一系列的社會和政治特征，這種對比的方法能夠清楚地顯示兩者的差異。[[3]](#_3_165)在這個領域工作，沒有人不需要大量積累和使用這種對比工作的最好成果。但是最后，正是因為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期工業化國家間的聯系——在同樣的經濟力量面前的脆弱性、密切研究對方的經驗和政策實驗等，讓他們在政策選擇上的差別具有了歷史學上的意義。羅伯特·凱利的告誡仍然具有強大的力量：認真考慮“幾個國家內類似運動的出現，像相同地層裸露于地表的巖石，由共同的思想和社會影響生成”。[[4]](#_4_163)大西洋時代社會政治的根源不在民族國家的容器內，也不在假設的“歐洲”或者同樣是假設的“美國”內，而在于它們之間的世界。從相互聯系開始討論可以得到很多收益。

本書的第一個目標是重新塑造美國歷史上的一個獨特時代，其中美國社會政治通過競爭和交流的網絡與歐洲社會政治辯論和嘗試結合在一起。不過，試圖擺脫差別問題是愚蠢的。像所有政治體一樣，美國是不同的。它的國家結構和歐洲對手們的情況不同，它的意識形態有不同的傾向，它的利益結構不同，它的歷史是獨特的。在面對如此多重因素決定的一系列差別時，困難在于說明這些差別到底實際上造成了什么樣的不同。

對于這些目的來說，具有世界眼光的進步人士試圖在大西洋網絡間交流的建議和政策，形成了一個在歷史研究中很罕見的實驗室。每個進口措施都必須加以清理，從養老保險到獲得補貼的工人住房，從城市規劃到農村重建。有些措施在輸入美國的時候面臨的困難相對少些。有些在中途就夭折了。更多的情況是被修改，這種“美國化”留下了它們在被引進過程中遭遇的力量和環境的確切痕跡。跟隨從外國模式到國內結果的這些過程，我們往往可以證實某些預測，也可以發現令人吃驚的意外結果。

最后，簡要談一下政治中的思想觀點。[[5]](#_5_155)本書中的核心主人公很少是知識分子，但是他們都非常關心各種問題和思想。對于某一類政治歷史學家和政治科學家來說，在開始的時候，這就足以使其產生某種本能的不愉快。傳統的政治分析努力開辟所謂結果分析的道路，其勢力范圍是立法過程及其涉及的許多利益和政治優勢要求。這種強調不無充分理由，但是政治過程比結果寬廣得多。人們還必須要詢問議題是如何進入政治主流中的，問題是如何被確定下來的，議題被納入了什么樣的框架內等。

傳統觀點常常滿足于相對來說缺乏反思的功能主義。不管議題是難以忍受的貧窮、混亂的都市交通，還是讓人窒息的壟斷，議題本身最終被想象為驅動政治引擎前進。它轉變為危機后，會因其緊迫性而強行進入政治議程——有時候通過公共輿論的協商，有時候通過利益團體，有時候通過社會運動。從問題進入政治領域起到利益團體和政治的強大力量消除它為止，那些有“思想”的人可以發揮短暫的作用，提供替代方案或者解決辦法。但是，因為從本質上說，立法結果總是不同于最初的設計，而且常常比預期混亂得多，那些只是通過言論或者建議參與競爭的人幾乎總是歸結到失敗者的行列中。

然而這并非政治的真實世界。正如約翰·金頓敏銳地觀察到的，思想、問題、解決辦法和潛在危機以特別獨立的方式在政治河流中流淌。[[6]](#_6_149)由于來源眾多，這些要素的未來前景取決于相互發現。正如一個政治觀點只有在成功具備必要性和緊迫性的時候才能成為政治上可行的議題一樣，問題只有在具備了政治上可以想象到的解決辦法時才能具有政治意義。解決辦法的制訂者不是到最后一刻才進來采取行動的。這些人在創始時就在跟前，把悲劇性的而又無法克服的情形轉變為政治上可以解決的問題，正是通過這個過程，來確定立法者和執行者最終可以運作的領域。

正是思想觀點的這種確定議題的作用，給19世紀末期那個突然打開的新世界（各種可轉移的社會經驗和可借用的政策模式）帶來了政治后果。1890年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那個“進步時代”的美國人并非在問題的海洋中游泳，至少并不比生活在1870年代經濟崩潰和內戰后種族和解時代的美國人問題更多。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他們在突然增多的解決方案的海洋中游泳，其中大量是通過大西洋的聯系而帶來的。龐大數量的外來解決方案幫助人們剝去了經濟學“規律”的必然性。它幫助政策制訂者繞過很多的政治死胡同。用同樣的方式來回顧新政，把它放在跨國模式和多樣化影響的洪流中來考慮，我們就會發現意料不到的新特征。

這些構成了本書的中心問題：跨越大西洋的社會政治時代是怎么形成的：是如何維持下來的：越過國界的聯系網造成了什么變化：在多大程度上影響了政治選擇：回顧過去，美國與它最親密的經濟伙伴表現出了什么樣的相似性和差異？本書關注了北大西洋經濟體的事件和過程，包括近的和遠的背景，包括政治活動和思想觀念。這些章節組成了試圖改變經典美國歷史的框架和邊界的一個實驗。

像所有的重新設定框架一樣，它的目標是制造困難，使采用古老熟悉的方式觀看熟悉的圖畫更加困難。沿著進步時代和新政時代超越民族國家邊界的社會政治道路，人們開始重新發現一個基本上被人遺忘的世界，在這里國家之間相互借鑒、模仿、改變和適應。在跨越大西洋的進步時代中，人們開始重新發現美國歷史和政治的一個幾乎已經丟失了的階段。

# 第一章 1900年的巴黎

## 鋼鐵世界

每個時代都需要一個象征，即使是最善于算計和追求物質享受的時代。古斯塔夫·埃菲爾在敏銳發現促銷機會到來的時候，迫切渴望提供這樣一個象征。批評家稱他在1889年建造的鐵塔是“工廠煙囪”，“龐大、丑陋”。作為鐵路橋設計原則的倒置圖示，它公然挑戰腳下的城市規模。老巴黎街區的瓦屋頂、第二帝國的復折式屋頂和大街，甚至圣母院的高塔（埃菲爾的工程師們在草圖上特別表明），在這個龐然大物的工程旁邊都縮為小人國里的小不點。埃菲爾鐵塔成為工業技術打破傳統、帶來革命性變化的廣告。難怪巴黎的藝術家們馬上呼吁將其拆除。[[7]](#_7_147)

埃菲爾鐵塔還有另外一個目的。它是為1889年巴黎博覽會而建，被設計成19世紀工業資本主義商品的臨時大市場的巨大廣告牌。博覽會的官方目的是慶祝法國大革命一百周年，借回顧輝煌歷史的機會炫耀仍然脆弱的第三共和國的政治命運。實際上，自從1851年倫敦那個用鋼鐵和玻璃建成的水晶宮博覽會以來，歷次博覽會的主宰都是貿易而不是政治，巴黎世界博覽會也不例外。機器和機器制造的各種商品，蜂擁而來的參展商、購貨商、資本和企業市場成果的崇拜者，都潮水般擁擠到埃菲爾鐵塔鋼鐵架子下面的戰神廣場（Champ de Mars）。不管是稱它為交易會還是世界博覽會（Exposition universelle），以此名義搭建起來的就是一個市場：小販們的貨攤、賣家的吆喝、交易雙方的討價還價都達到了一個空前的高潮。

十一年后的1900年，法國人在同一個地方舉辦了更大的博覽會，這次是要盤點新世紀本身。埃菲爾鐵塔專門被重新刷成了鮮艷的黃色，緊跟飛速發展的技術革新的步伐，原先的煤氣噴燈被數百盞新興的電燈所取代。在博覽會場地本身，在更加緊湊、更加豐富的展廳里展示了更多的商品，規模之大為歷來博覽會之最，只是到了1930年代才被世界其他博覽會超過。出乎設計者最初的意料，1889年的博覽會基本上是法國人自家的活動。而這次，美國和曾經在1889年遭到排斥的德國都派代表參加，在爭奪工業優先地位的競賽中擠占英國在博覽會的空間和地位。1889年，看膩了機器的參觀者發現“開羅大街”上的肚皮舞女和狂野西部表演中男子氣概十足的“水牛比爾”更加吸引人：1900年，歐洲以外的世界更多展現的是市場而不是性。從法國殖民地琳瑯滿目的展品到戰神廣場上“環游世界”的西洋景，人們不可避免地認識到世紀之交的市場規模一往無前地擴張到了全球。浸透著遠方工人血汗的成批成批的貨物，從世界各地的工廠車間通過密集的蒸汽運輸網絡運到巴黎展銷。[[8]](#_8_147)

1900年夏天蜂擁而來的參觀者中并非所有人都很滿意地認為博覽會不過是巨大的商場，像一個梅西百貨公司（Macy's），展示西方文明。在他們自己的世紀總結中，不會有很多人認為頭等大事是市場滲透到不斷擴大的社會生活領域——即買賣雙方通過私人協議可以出售、可以商品化、可以交換的物品的范圍擴大。進步、優雅、文明要求得到應有的地位。正是出于對這些情感的認可，博覽會建筑的功能性鋼鐵框架被覆上了一層局促的彩色灰泥，外加寓言性的雕塑、過度的藝術裝飾。就是因為它們，博覽會入口的櫥窗建筑成了藝術的天下，就好像大理石和油彩能夠讓這個世紀的成就的物質核心顯得高貴一樣。

但是回顧歷史，我們發現埃菲爾鐵塔冰冷堅硬的鋼鐵框架是1900年巴黎那些力量的更真實的象征。拔地而起，對周圍一切冷漠無情，對于過去不屑一顧，這不正是商人、企業家、工程師和投資者那種精明、自私的激情的象征嗎？他們的生產模式在社會和技術上的革命已經給西歐和美國帶來深刻的影響。因為精力充沛、想象力豐富加上冷酷無情，他們已經顛覆了傳統的手工業和農業經濟，擊退曾經阻礙道路的政府和風俗習慣等對抗力量。他們服務于這個世紀的經濟學家所說的自然法則，市場的鋼鐵需要。他們為經濟生活的龐大新領域引入了自我奮斗的個人主義、不感情用事的精明算計、價格和利潤的優先地位（這曾經僅限于城鎮市場范圍內）。戰神廣場上大量展出的商品就是他們成功的證據。

如果1900年的巴黎博覽會是對這個世紀的總結，那么，其主要象征所代表的內容就肯定無疑了：機器技術和市場的社會倫理相結合，釋放出人際關系上的革命性變化——鋒利、旺盛、常常具有解放性和（愿我們不要忘記）讓人痛苦的破壞性。工業資本主義的領域就是鋼鐵世界。

對資本時代信心十足是博覽會的官方信息：新秩序展示自身并且宣布結果就是進步。但是人們不需要讀很多時人對于巴黎博覽會的印象記，就會發現表示懷疑和擔心的種種跡象。看似穩定牢靠的市場和貿易體系已經兩次在經濟危機中崩潰，對此人們記憶猶新。在1900年，北大西洋經濟體中的國家剛剛從1890年代中期的艱難歲月中緩慢走向復蘇。更加脆弱的是人們不無驚恐地稱之為“社會和平”的關系，即新近獲得巨大力量的勞工和資本之間的關系。19世紀80年代在大西洋兩岸發生了一系列勞資沖突，其最終結果沒有人能夠預料。主要事件包括法國1880年到1883年一連串的罷工、美國1885年和1886年勞工騎士團的迅速崛起、倫敦碼頭工人和德國魯爾煤礦工人1889年的大罷工等等。

亨利·亞當斯或許對自己的憂郁感到自豪，但是當看到博覽會上的發電機悄無聲息繞著軸運轉時，他不是唯一提出這個新世紀“到底”要走向何方的人。蘇格蘭博學者和城市規劃者帕特里克·格迪斯花費整整一個夏天在巴黎帶領一群群參觀者觀賞博覽會，試圖讓他們初步了解其中所揭示的巨大社會轉型。弗里德里克·瑙曼努力要從原來的德國自由主義的失敗中擺脫出來，創建新的社會進步黨。他從巴黎發回國內一系列公開信，在信中表達了對更多擁擠到城市里來的無根者的焦慮，認為在博覽會上展示出來的新“群體生活”把他們變得卑微。簡·亞當斯也發現很難忘掉剛剛過去的歷史。作為國際婦女大會的代表和博覽會“社會經濟”部分的審查委員來到巴黎，她不由自主地尋找博覽會上工人階級的住房展品，希望發現一種方法來擺脫1894年席卷普爾曼公司模范村莊并蔓延到整個芝加哥的狂暴情緒。為了闡明這些議題，1900年夏天在巴黎成立了社會主義者國際。但是人們不需要靠社會主義者提醒市場和生產的革命所帶來的弊端。舉辦博覽會本身就啟發人們思考這些問題，雖然它也可能同時隱瞞了些什么。[[9]](#_9_141)

在巴黎博覽會的一個展區，博覽會的經理們發泄了鋼鐵世界中資產階級信心十足的外表下面的焦慮。雖然社會經濟展區很容易迷失在格迪斯所說的“迷宮組成的巨大迷宮”，但還是有很多的思想和組織投入其中。像埃菲爾鐵塔一樣，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889年博覽會。當時在榮軍院廣場（Esplanade des Invalides），法國經濟學家和企業主曾組織了一個小型的“社會經濟部”，包括工人資助的一些成本低廉的餐廳、閱覽室和會議廳，法國有些大雇主開始為工人家庭建造的模范住房，一對展示分享利潤的展亭，一些專門介紹公共和私人為改善工人精神和物質境遇所作努力的展覽空間。社會經濟部只是略微觸及其余展覽內容的管理體系，被安排在離中心展區很遠的地方，除非要尋找法國軍事展區，很少有參觀者不辭辛苦到那些地方參觀。社會經濟部在博覽會的眾多參觀者心中不過是巴黎旅行指南末尾的一條線而已。[[10]](#_10_139)

在1889年博覽會閉幕的時候，社會展品被托付給新的巴黎機構“社會博物館”（Musée Social）。這個博物館剛開始是被設計為存放博覽會文件的倉庫，但是它很快就成為各種社會經濟信息的交流中心。由于它吸引了有影響的企業和政府贊助者，加上在歐洲主要工業國家和美洲廣泛的興趣和通信交流，很快成為討論“社會問題”的最重要國際機構之一。[[11]](#_11_135)

對1900年博覽會，該博物館的組織者決心更加詳細地展示社會經濟方面的成果，并且放在更中心的位置。他們在社會經濟展館的會議廳組織了關于社會問題（question sociale）方方面面的暑期國際會議。他們在館內的展覽室招攬了大西洋經濟體國家能夠收集到的實際社會改良的最好典范。如果在工業化國家中有旨在補償市場革命造成的貧困和痛苦的社會設計，你有望在此發現其綱要和藍圖。

乍一看，位于社會經濟大傘下面的議題之混亂簡直是沒辦法解決的。法國人試圖通過再分類從中理出頭緒來，比如學徒和童工保護、工資和利潤分享、工人和雇主協會、農場信貸、工作條件管理、工人住房、合作商店、工人思想和道德發展機構、儲蓄和保險機構、衛生設施（不僅指公共衛生，而且指反對酗酒、貧民窟、貧困的道德危害的公共戰斗）、貧窮救助以及其余類型，即為了公民的生活幸福而提出的任何其他公共或者私人倡議。[[12]](#_12_133)

就連社會博物館的發言人也意識到該清單的混亂。社會經濟學是個反射性的范疇。法國經濟學家查爾斯·紀德在總結展品的時候說，政治經濟學是關于財富增加的科學。與此相反，社會經濟學領域擁抱任何努力（在政治經濟學本身的限制內），來調和或以社會的、互惠的方式緩解資本主義轉型的痛苦。它是研究“實際的現實和可能的改善”的科學，是關于“社會和平”的科學。簡而言之，社會經濟是工業資本主義的救護車。它的范疇就是社會殘骸的范疇。1889年它一只腳還站在博覽會外面：在1900年的世紀大典上，則沒有人對它的出現表示異議，也沒有人懷疑、否定“社會經濟”或者“社會問題”等詞語喚起的眾多雜亂焦慮有一定的一致性。[[13]](#_13_129)

但是，在社會經濟展廳穿行，你會發現社會經濟專家在解決辦法上離達成一致意見還有多大差距。國家與國家之間在主題上的改變是非常突然和醒目的。俄國人帶來了戒酒的展品：意大利人展示了合作儲蓄銀行的作用：比利時人則強調低成本的工人住房。大英帝國，其政府由于在南非的軍事沖突加劇而分散了注意力，幾乎就沒有拿來什么展品。在英國展室的一面墻上掛了一個圖表顯示消費者合作運動的發展過程：另外一面墻上掛著為查爾斯·布思里程碑式的倫敦貧困調查所繪地圖中的一幅，概括了城市的階級關系，一條街道一條街道的對比，充分展示了財富的光亮燦爛和貧窮的黑暗凄慘。[[14]](#_14_125)

回顧起來，布思的貧困地圖好像是博覽會上最有先見之明的展品了。但是留在參觀者心中時間最長的是德國的展品。就連巴黎的非德國人也忍不住承認德國是這次爭奪影響力和地位的博覽會上的大贏家。德國館是博覽會中最高的建筑，僅次于埃菲爾鐵塔。給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工業品是德國造。考慮到法國人的感情，德國人沒有把他們龐大的克虜伯大炮和明顯進攻性的武器帶來，但是他們的帝國野心表現在每一件展品中。[[15]](#_15_125)

在社會經濟展館，德國人忽略了復雜的法國分類法。展室的中間他們搭建了一個巨大鎦金的方尖塔，代表帝國社會保險基金自從16年前成立以來為德國工人提供的利益。由國家管理的對付工業事故、疾病和養老的強制性社會保險是德國在1880年代偉大的社會政治發明。國家社會保險是俾斯麥打擊德國社會主義者運動的第二個武器，是俾斯麥通過國家先發制人的、自上而下的“社會主義”贏得德國都市居民的忠誠的工具。一個帝國規模和力量的象征，其周圍展出的是國家機構為德國工人的福利而設立的醫院、療養院的照片，國家不露任何競爭意味地主導了德國的展品。

德國人在1900年談到國家的時候總是有特別的自豪和熱情。從德國館里收集的帝國藝術品到社會經濟宮殿的鎦金方尖塔，德國展品散發出的信息表明政府的大手照料和保護著文化、藝術、勞工和經濟上遭受掠奪的不幸者。除了國家強大的、對抗性的、家長式的權力外，還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可以對付市場造成的掠奪和不安全感嗎？

但是從德國展區出來到法國展區，你就認識到國家只是市場動蕩的潛在抗衡力量之一。雖然法國人把建筑的一半據為自己使用，但是他們并沒有提供吸引眼球的清晰視覺標志物。剛一看，展品全部是圖表、傳單、報告和文件的大雜燴。大概三千個法國參展商對于要求表現他們社會福利的呼吁做出了反應，提供的展品包括：分享利潤的公司、模范雇主、大企業家、慈善住房公司、農業購銷合作社、工人的合作社以及各種兄弟會、互助會等。社會博物館本身也被類似的折中主義特征所籠罩，工業家長主義者、社會工程師、工人合作社倡導者、卓越的激進政治家、保守的社會天主教徒，以及一些獨立的社會主義者都廝混在一起。

法國展區最大的一個文件展室是說明保險和互助機構的：互助保險（prévoyance）。人們發現這里沒有德國那種中央集權的信息，雖然1900年法國政治中有些極端的聲音要求多少像德國那樣的國家社會保險體系。這個空間里充滿了數百個儲蓄互濟會和保險互助會的報告，在這些團體中，成員可以用每個星期的繳費來對付疾病、衰老等困難情況。雖然互助協會（sociétés de secours mutuels）在1898年得到官方承認和少量政府補貼，自愿的互助主義仍然是其組織原則。到了1900年，幾乎兩百萬法國人參加了這些團體，這個數字是法國工會組織成員總數的四倍。在一個三千八百萬人口的國家，互助會覆蓋的范圍畢竟有限，留下很大的漏洞。但是，在巴黎展出的社會政策模式的集市上，人們發現了一個不是國家自上而下而是社會從內向外延伸的公共福利形式。

“團結”是該體系的關鍵詞。法國社會政治自從1890年代中期就一直圍繞這個問題吵吵嚷嚷。當時的法國總理萊昂·布爾熱瓦已經向公眾推銷這個觀念。它與“個人主義”形成明顯的對比，因為它鼓吹相互義務和集體幫助的各種自愿表達。因此，法國展品中有看似莫名其妙、混亂不堪的工人協會、雇主協會、國家資助的和個人組織的協會、地方體育俱樂部，和強大的行業協會擁擠在一起：都是“辛迪加”（syndicats，作為法律范疇來說），真是亂七八糟、無可救藥。但是對于鼓吹社會連帶主義的人來說，協會形式的豐富恰恰是正確的。如果資本時代的主要社會代價是傳統協會形式的破滅，讓個人在市場的強力面前孤單、無助，那么所需要的抗衡力量不是國家而是協會本身。[[16]](#_16_125)為了清楚說明這個問題，展覽會的組織者繞過通常攫取利潤的中間人，直接把建造社會經濟館的合同給了技術工人合作社。難道這不是對于價格為王和無序競爭的最可靠校正措施的縮微模型嗎？即組織社會上自愿性協會的力量，在必要的時候國家給予少量資助，形成他們覺得合適的任何形式的互助性社會能量。

心里想著這些繼續往前走，參觀社會經濟館的觀眾要費一番周折才能找到美國展區。雖然在1900年美國經濟的影響力已經顯現，但美國在很多方面還是博覽會上的繼子。它通過頑強的努力才好不容易在民族展館的前排搶到一個位置。這里，美國夾在競爭者中間，美國代表們采用通常的希臘羅馬建筑風格造了一個石膏建筑。但里面裝飾的完全是美國報紙、打字機、速記機、電報、錢幣兌換處、電報紙條等——美國商人度假時需要攜帶的所有東西。美國人在1900年的巴黎是竭力要贏得別人尊重的暴發戶，比任何人都更迫切需要商業行話。德國館展現的是學識、藝術和帝國野心。法國人集中體現了政治和社會的團結。而美國館在其古典的虛假外表下面透露出來的是商業氣息。[[17]](#_17_119)

在社會經濟展館，同樣的國家主題再次出現。這里美國也竭力謀得一個位置。被擠在只有27平方英尺的狹小展室里，美國人往里面塞的展品比除了東道主法國外的任何國家都多。在鉸鏈起來的板子上和巧妙折疊的格子里，他們懸掛和放置了美國的社會產品。展室的中央，紐約廉價公寓委員會提供了該市最有名的貧民窟的模型，緊挨著它還有一個模型說明如果繼續按城市建筑標準允許的最大密度建樓的話，這個街區可能更加擁擠到什么程度。旁邊有漂亮的、裝訂成冊的州政府和聯邦勞工統計局的報告，用來證明國家意識還沒有徹底消失。在展室的一個角落里塞著美國黑人生活的展品，包括塔斯基吉學院（Tuskegee Institute）制作的手工藝品和杜波依斯展示佐治亞州自奴隸制時期以來非洲裔美國人進步歷程的統計數據。[[18]](#_18_117)

但是，美國展區最大規模的展品安排，交給了新出現的社會改良信息交換所“社會服務同盟”。該機構兩年前才成立，自稱是有關“傾向于人類社會改良的任何信息”的情報交流中心。其精神領袖威廉·托爾曼在很多方面都是典型人物，這些人曾經改變了美國社會政治的早期歷史，現在卻被遺忘。作為紐約改善窮人條件協會的總代理，托爾曼熱情投入到1890年代查爾斯·帕克赫斯特牧師的反罪惡運動。從那里他進入紐約市威廉·斯特朗市長的革新政府。他特別關注柏林和倫敦那種公共澡堂：一個街區兩千多人卻沒有浴室的便利，這對于擠在一起的城市人口來說決非小事。看到“社會博物館”的成功，“社會服務同盟”也和所有工業化國家都進行了聯系。它的顧問團成員包括倫敦世紀之交“城市社會主義”實驗的兩位最著名發言人錫德尼·韋伯和約翰·伯恩斯、愛爾蘭農村改革家霍勒斯·普倫基特、“社會博物館”精神領袖朱爾·西格弗里德、德國帝國保險辦公室的格奧爾格·察赫爾。在其收錄世界各地社會政策主張的《社會進步》年鑒里，托爾曼自己收集了關于歐洲市政和工業改良的大量幻燈片，是20世紀早期美國最大的此類收藏之一，內容包括英國的模范城鎮、利物浦城市住房、格拉斯哥城市公園和公交車、阿姆斯特丹的工廠安全博物館、倫敦的公共澡堂等。以兼收并蓄和世界眼光為特征的“社會服務同盟”，反映了美國世紀之交的社會改革的流動性、業余愛好式希望和國際觸覺。[[19]](#_19_118)

但是，為了社會經濟展覽，托爾曼掛在墻上的還有資本主義自我啟蒙工作的照片。那里展示了美國模范工業家們的努力：亨氏（Heinz）公司一塵不染的工廠車間、克利夫蘭五金公司的職工食堂、威斯汀豪斯氣閘公司建造的職工住房、位于俄亥俄州代頓的“國家收銀機公司”詳細的職工思想工作。在互助保險（prévoyance）方面，關注福利的資本家這一主題仍然在繼續，最大最引人注目的是保德信保險公司（Prudential）、大都會保險公司（Metropolitan）和衡平（Equitable）人壽保險公司的展品。通常采訪巴黎博覽會的敏銳記者只看到人壽保險公司廣告：查爾斯·紀德認為美國的展品雜亂無章。[[20]](#_20_116)但是美國展品表現出的信息比紀德所見更清晰：最有希望戰勝工業資本主義危害的抗衡力量是資本主義的良心發現。

社會經濟方面的這些競爭性的國家風格表達并夸大了有利害關系的競爭。任何地方的社會政治都是一個大的集合體，里面的因素仍然處在不斷變化中。即使德國這樣的家長制國家也表現出矛盾沖突的傾向。雖然他們強調帝國對福利社會的貢獻，但是1900年德國社會保險法律規定的總福利中來自帝國本身的不足10%，至于說到管理，德國人把它承包給錯綜復雜的雇主互助會、工會基金、自我管理的雇員雇主協會等，只不過比對手法國的復雜程度略低一些而已。[[21]](#_21_117)而法國雖然把互利主義原則提到最高點，但是正如“社會博物館”知道的主要數據所示，與“個人主義色彩”濃厚的英國相比，法國在合作社、互助協會、友好團體和工人協會的數目等方面遠遠落后。

福利資本主義的主張則總是出現在最顯眼的位置。盡管美國人吹得天花亂墜，但他們在這方面拿得出手的東西和歐洲對手相比仍然少得可憐。法國社會經濟展品中增添了法國鐵路和煤礦大企業的職工福利體系的報告。克虜伯公司送來了一個模型，顯示它在埃森精心建立的職工住房和社會福利設施。在博覽會位于凡仙森林（Bois de Vincennes）附屬區的工人住房模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利弗公司（Lever Company）為其技術工人在利物浦附近所建的漂亮半木制房屋的復制品，里面有很多自我吹噓的夸張宣傳。因而，在巴黎不容忽視的還有另外一個社會政治體制的綱要，即由社會責任感強烈的大雇主支配，一個私人的、家長制形式的福利國家。簡單地說，這些還不是體制而是傾向，是擁擠在每個立法機構大門前的跨越國界的競爭性思想群體。

最后，一個試圖掌握世紀之交社會政治藍圖的人還不可能忽視兩個競爭的思想和社會權力中心。第一個是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第二個是國際女性解放運動，二者都不固定于任何一個民族國家。在1900年的時候，人們仍然非常不清楚以工人階級為基礎的政黨在社會政治框架中到底能發揮什么作用。有的國家一直嚴格執行針對社會主義者參政的限制，如德國，在1890年前屬于非法組織的社會主義者仍然遭遇眾多的法律限制：如比利時，1900年男性工人獲得選舉權才只有七年時間。在這些國家，社會主義者經過了漫長的道路在國家軀殼內建立了自己內部的社會國度。社會主義者不斷擴展其工會組織、合作商店、報紙、體育和演唱團體、飯店、啤酒廠、面包廠、婦女同盟，以及各種互助團體等亞文化機構，用比利時社會主義者埃米爾·王德威爾得的大話就是：“在資產階級社會的邊緣，正在誕生對抗它的新世界。”正是這種“偉大的經濟合作社”確立了對于鋼鐵時代的另一種反應的綱要，一個通過工人自身的自治運動促成的，比法國社會連帶主義者能夠想象的更加平等、更加民主的互利主義形式。[[22]](#_22_117)

但是一旦談到立法問題，社會主義者的立場就非常勉強和自相矛盾了。世紀之交的社會黨的發展很多歸功于他們愿意攜帶即刻的社會政治改革項目進入地方和議會政治，其中有很多地方與中產階級社會改革者的項目重疊。正是為了進一步推動即刻改革項目，亞歷山大·米勒蘭同意在1899年加入溫和的改革派法國政府，這是現代歐洲內閣中第一個社會主義者占據的席位，也使他有資格主持本次博覽會的開幕式。即使像讓·饒勒斯一樣堅定的社會主義者在1903年也能想象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可能非常緩慢地進行，可能就像探險家“意識到越過了半球的界限，不是看見海洋上有一條線告訴他們過界了，而是航船不斷前進一點一點把他們帶入新的半球”。[[23]](#_23_117)

但是在有些地方中產階級社會經濟學家能接受政治經濟的局限性，社會主義存在的理由則是自下而上對權力和財產關系重新構建的必要性。如果沒有這些，世紀之交的社會主義者針對國家權威的立場就是一種深刻的內在沖突。在第二國際巴黎會議上，無政府主義者和可能主義者（possibilistes）、革命派和改良派社會主義者再次激烈辯論與資產階級政治機構結盟的合法性問題。

實際上，北大西洋經濟體所有勞工機構都存在對待國家的矛盾態度。讓博覽會社會經濟部組織者感到尷尬的是，歐洲大部分勞工組織拒絕了參會的邀請。最引人注目的例外是美國勞工聯合會（AFL）在社會經濟部贏得大獎，這一半因為其展品出色，一半因為它能來參加。由于在1890年代不斷增加的法院勞工禁制令的折磨，美國勞工聯合會并不比其歐洲同行更相信工人可以滿心指望通過立法獲得經濟拯救。在宣傳鋼鐵時代的不公正方面，工會和社會主義者組織確實遠比他們的改良派競爭者做得更多。但是，在社會政策辯論方面，他們扮演了一個復雜的角色，從來沒有十分肯定到底要求國家做什么，或者在緊要關頭，國家能夠采取什么樣的公正措施。[[24]](#_24_115)

如果說女性沒有形成自己的國度，她們也同樣帶著自己的興趣和機構進入社會政治辯論，與主導社會政治核心論壇的中產階級男人不同。與在遠離展區的地方開會的社會主義者不同，國際婦女大會是在巴黎博覽會的心臟地區進行的。從一開始，社會改革中的性別界限就比資產階級社會改革與社會主義改革之間的界限更靈活、更具有滲透性。但是女性組織帶給社會政治的聲音和觀點仍然有明顯的不同。

“女性的工作和機構”是巴黎婦女大會的主題。它并沒有排除平等權利和平等正義的討論，但是大會主導性的信息是女性的社會責任——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提升、保護和教育他人。[[25]](#_25_113)女性一直是英美國家對窮人慈善捐款中主要的提供者。在后來的15年里，歐洲和美國的女性改革者組織了成功爭取權利的運動，要求保護婦女和童工的合法權益、在女性為主的“血汗行業”實行最低工資標準、為工作的母親休產假提供補償、提供孕產和嬰兒護理中心、牛奶檢驗、學校改革、為單獨養家的貧窮婦女提供特別的國家幫助。

社會政治的主流把勞工關系作為起點，社會母性主義者的起點則是婦女、兒童和家庭的特別脆弱性。社會政策辯論的主流是討論社會和平和經濟公平，而婦女的社會政策辯論交織著需求和保護的話語。這兩條曲調的區別不像重新發現社會政策發展中母性沖動的歷史學家暗示的那么明顯。雖然如此，到了20世紀初期，觀察家們開始討論新母愛國家（état maternel）的出現了。社會母性主義者在社會政治問題上有意識地站到民族主義競爭者們的旁邊，在范圍和效率方面僅次于社會主義者的國際網絡，從而形成了主導社會政治潮流的另外一個組織中心。[[26]](#_26_113)

1900年，人們還沒有就如何建立起鋼鐵世界的有效抗衡力量形成一致意見。國家父愛主義、私人父愛主義、互助主義、社會主義、母性主義：這些簡短的詞匯導致權力和政策的不同組合。任何名副其實的社會政治都必須找到一些手段融合它們各自的主張：國家的公共權威、自愿協會的道德力量、工業資本家的經濟資源、工人民主自我管理、社會附屬團體的特殊需要等。人們在巴黎發現的不是答案，在社會經濟展館堆積起來的圖表、傳單和照片中，人們發現的是可以從中找到答案的核心領域和過程。

在巴黎世界博覽會的各個展館里，社會經濟部展出的是什么呢？說到底不過是自己的集市，一個包含眾多選擇的世界，一個交流大大小小社會政治方案的市場。如果說這里的交易對象是觀念和經驗而不是具體商品，它同樣也是一個交易所。圍繞著當代人稱為“社會問題”的共同的國際性焦慮和難題，它提供了爭奇斗艷、琳瑯滿目的解決方案。它生動地體現了一個人們事后很容易忽視的要點：社會政治的國際性范圍。北大西洋世界的任何一個地方都不是孤立制訂社會政策。通過競爭和交流，在巴黎展出的每一個社會政策組合得以成型，通過這些交流過程，每一個方案都會發生改變，對于巴黎的遲到者——美國人來說同樣如此。

## 解釋社會政治

1900年的巴黎，在人頭攢動的博覽會上參觀的資產階級穿著蓬松袖子的禮服、潔白筆挺的襯衫，氣宇軒昂、風度翩翩，用紐扣把社會恐懼關在驕傲和自信的外表之下。當然，這里不大可能作為歷史考察的起點，用來探討影響美國社會政治形成階段的某些選擇。人們或許認為更好的起點應該在世紀之交芝加哥的牲畜屠宰加工區。那里嗆人的惡臭、過分擁擠的居住區、用最低的工資從勞動力市場上招募來的移民工人等都是成本算計的結果，也正是這種算計（如食品生產廠吹噓的那樣）能把豬身上的每一個部分拿來賣錢，除了豬的尖叫聲外。或許更好的起點在芝加哥工會大廳，或每次周期性經濟危機時憤怒的示威抗議者人群中。或者更好的地點在著名福利資本家的董事會會議室，或是大資本家們為了從國家管理者那里索取獨特社會利益而成立的聯動機構的辦公室。更好的起點是國家機構本身，管理國家的那些政黨仆從和官僚階層。或許更好的起點是紐約市“地獄廚房”（Hell's Kitchen）的廉價公寓里貧困母親與慈善協會友好訪問者之間的對話，或者站在南方縣市救濟辦公室的種族隔離行列里。

實際上，在上面提到的任何一個地點，社會政治的通行解釋都有堅實的基礎。本書從跨國角度對美國社會政治歷史進行重新架構，融合了從前模式的某些框架，同時又挑戰了另外一些框架，因此有必要花點時間看看它們的主張和演變過程。[[27]](#_27_109)

社會政治的早期歷史學家，接近于社會改革重要人物檔案來寫作，對于他們來說最重要的背景并不遙遠，而是非常接近的。社會政治的主要領域就是個人良心遭遇現代生活的殘忍、痛苦、不公和低效。這是一種反映了改革者自己選擇的故事的敘述策略。啟蒙和宣傳是社會政治的中心工作。真正困難的任務就是讓需求和正義的緊迫性清楚明了，一方面改革者要在內心突破時代和階級限制的障礙，一方面還要克服外在的社會冷漠和否認的阻力。[[28]](#_28_109)

二戰后的頭十年里，率先從事社會政治對比研究的社會科學家很少使用這些本土的、傳記性的資料。他們沉溺于全球過程的理論，他們的框架是大膽的國際化的。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進化論式的——幾乎是自然如此。因為注意到保守派和進步派政治團體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都不斷增加社會開支，許多著名的社會科學家認為，剩余資本積聚的邏輯可能本身就有能力修補產業資本主義革命曾經造成的社會斷層和混亂。考慮到不斷增長的國民收入，他們的數據似乎顯示花在教育、福利和社會服務方面的社會開支也會增加。在這個趨同的、發展的法則框架內，不管是揭發社會丑聞的艱苦工作還是歷史和政治的偶發事件都似乎不再特別重要。[[29]](#_29_107)

認為社會投資會穩定增加的假設注定不能長久。因為在1970年代的艱苦歲月，歐洲和北美的戰后福利國家遭遇沉重打擊，政治突然成為社會政治分析的核心問題，其中一個結果是階級插進來成為社會政治分析的核心，而且產生了復雜的后果。

對于許多首先使用階級分析方法的人來說，社會政治的核心是自下而上的權力滲透。20世紀的福利國家通過歐洲大陸的社會民主黨、英國的工黨、美國的產聯（CIO）和新政左派，激發了來自下層民眾的希望和權力的大爆發。在工人階級沒有能力采取政治行動維護自身利益的地方，他們通過罷工、怠工、暴亂和示威游行、威脅顛覆政黨平衡等方式強迫當權階級讓步，從而達到自己的目的。[[30]](#_30_105)

但是這個宣言剛發布，社會政治的“社會民主解釋”的激烈批評家就把社會政策中的階級關系顛倒過來。他們反駁說，社會政治不是從群眾中發展而來的，更多的是上面的統治階層為克服危機而推行的一套措施，是統治精英為避免人們挑戰其統治而收買人心，轉移工人階級自主政治動員的注意力，預先阻止社會領域的真正民主化。在俾斯麥的德國，社會政策是以容克為主的“封建”精英的產物，他們迫切渴望在對抗大眾民主力量的行動中贏得新優勢。在現代國家，這個角色被交給大企業和大資本家。福利資本家常常是這方面的主要演員，他們會因進行更開明的工資和工作政策的實驗而處于不利競爭地位。但是最終定調子的是占主導地位的財產體制本身的安全。現代和“封建”精英采用社會政策的本質是一樣的，即由當權階級主導，政府從一種補救措施變到另外一種補救措施，或轉移、或抵消、或安撫、或預先制止，以維護現行的權力和財產的管理體制。[[31]](#_31_101)

表面上看，這些強調階級的新觀點把政治重新拉回社會政治的核心。實際上，正如懷疑論者指出的，在批評觀點和社會民主觀點對社會政治的解讀中，政治因素都弱小得多。把政府貶低為統治階級的工具，社會政治的階級解釋讓政治領域失去了其自身的歷史重要性。正是在這個關鍵點，社會政策政治的第三批研究者加入辯論隊伍，他們雖然同情左派強調階級結構，但并不贊同國家成為種種經濟利益集團的俘虜這種觀點。他們最初的觀點，即國家“獨立于”圍繞其周圍的階級利益，一開始就是錯誤的。“以國家為中心”的社會政策研究鼓吹者比較成功的論據是：階級利益和政治過程之間有充分的協商空間，讓后者本身就成為社會政策形成的重要領域。這又被概括為社會政治的“機構政治過程”研究法，現在可以從幾個不同維度密切關注政治的結構：國家的管理功能（或者無能）、政黨和選民的構成、過去政策決定的內在結構上的遺產。[[32]](#_32_99)

最后，對于那些從接受者角度密切看待社會政策的人來說，另外一個主題好像是至高無上的。仔細觀察就會發現，社會政策的代理人或許給人幫助和便利，或許做了些幫助實現正義的工作，但是他們也添加了一些規定。把公民劃分成清晰的社會類別：如靠福利生活的窮人、只能得到收入信貸和食物券的“有工作的”窮人、有資格享受贊助性措施的“少數民族”和不享受這些的“多數人”、有“家庭”的人和同居的人。這樣做是為了劃分和調查接受國家資助的不同群體。社會政治的規則也包圍著它觸及的一切。人們說，現代福利國家對于人們思想和身體的約束不僅穩定了國家主導性經濟利益群體的地位，還能復制主導性社會構成方式，不管是核心家庭、流行的同居模式，還是主流理想模式。傳統上的政治定義已經無關緊要，約束和控制已經成為社會政治的發動機。[[33]](#_33_99)

對所有這些主張，都可以舉出有說服力的證據。社會政治解釋的喧嘩與騷動不是由于宏大理論追逐著很少的證據，而是由于太多證據追逐著過于狹隘而無法容納它們的理論。從雅各布·里斯1890年代反對紐約貧民窟和放任自流的私人住房市場危機的運動，到弗洛倫斯·凱利發起的改善血汗工廠勞動條件的運動，啟蒙思想的話語發揮了難以磨滅的重要作用。在二戰后經濟快速發展的那些年，每個類別的議會同盟都對社會福利的需要表示同情，福利政治的許多老虎牙似乎都被拔掉了。當那個時代結束后，不容否認的事實是，福利政策得到最好維持的是那些在議會中工人階級力量最強大的國家。社會政策的歷史提供了同樣清楚的例子顯示，政策有自下而上強行進入立法部門的（1908年英國的養老金法案），也有自上而下的（1883年到1889年德國的工人社會保險制度）。政府不僅是利益團體開會的地方，它們執行政策的能力、做出決策的結構途徑、依賴先例的惰性等都在社會政策形成中發揮確定無疑的作用。至于說社會政策的日常約束，曾經在福利部門排過隊的人或者參觀過免費診所急救室的人都不應該懷疑其力量或者普遍性。

這些解釋中的任何一個都不無眾多事實證據來支撐，但是任何一個解釋都是不夠的。需要和揭露本身除了造成短暫的尷尬外，沒有任何效果。戰后福利國家發展的自動形成是社會科學家現代化理論的幻覺。社會政治機構的融合程度不是歷史的恩賜，而是經過中間人和協調者艱苦努力達成的結果。階級利益也不是社會政治的簡單決定因素。當二戰后英國和斯堪的納維亞社會民主的政治時刻最后到來時，工黨充分利用了機會，但是總的來看，他們不過是擴大了已經在實施的政策而已，那些政策是在工人階級只是短暫接近權力邊緣而且對行使這個權力惴惴不安的時代形成的。統治精英好像也不是很清楚自己的利益究竟在哪里。在1880年代只要有一個俾斯麥，在1930年代只要有一個拉爾德·斯沃普，就會同時有幾十個大地主或者資本家堅決反對在市場重新分配財富的任何一項措施。如果說面對面時社會政策會施加約束，仔細考察的人們會發現社會政策也遭到了抗拒、操縱和扭曲。

簡單來說，沒有哪個社會政治能夠宣稱具有清晰的傳承體系、單一存在理由，更不要說清晰的影響了。社會政治領域太龐大了，根本無法用一種解釋或者一組角色來覆蓋一切。社會政治的過程也是多元的，充滿著激情、憤慨、暴露、宣傳、爭論、動員、編造、游說、安撫、預先制止、算計、討價還價、妥協、強迫、管理、操縱等等。

正是由此，人們回到在巴黎的社會經濟館展示的工程和思想。在社會政治糾纏不清的一團亂麻中，社會經濟展品只抓住了其中一縷。但是這條線是不可缺少的，休·赫克洛曾經稱其為從問題到潛在的糾正措施之間“困惑的過程”。他寫到“政治不僅在權力中而且在不確定性中找到其根源”，不僅在指導而且在“困惑”。對那些擁有“權力”的人來說是運作、決定和管理的領域，對那些感到“困惑”的人來說則是形成議題和其他選擇的領域。[[34]](#_34_97)

是后一種人最渴望在1900年巴黎博覽會社會經濟大廳里尋求思想交流和展品，他們的關心也被最清晰地表現出來。北大西洋經濟體沒有哪個政策不依靠他們就能成功。發揮這些作用的有些人本身就是政策制訂者：如俾斯麥最初社會保險提案的設計者西奧多·洛曼、英國1945年后福利國家的主要思想設計師威廉·貝弗里奇、1930年代的斯德哥爾摩經濟學家、幫助把羅斯福總統的直覺變成新政措施的“智囊團”。但是在他們周圍存在的討論和辯論的領域更大：在大學校園與公共政治邊界出現的政策論壇、壓力集團、正式的國際會議和非正式的思想界聚會、輿論雜志和社會實踐雜志等。這就是產生推動社會政治前進的思想、替代方案、解決辦法的領域。

在這些方式上，社會政策修補匠和發明家、時事評論家、政策清道夫、政策專家、政策經紀人填補了社會經濟需要和社會經濟解決方案之間的空白，但他們沒有構成社會政治。他們沒有固定的機構基礎，不管是在國內還是在國外，從來沒有形成清晰的政治權力。其中多數人來自對工業資本主義的野蠻力量深感焦慮的那部分中產階級人士。但是對自身階級立場不確定，這是他們身份認同的共同特點，而事實多次證明，對于這些大多來自中產階級的人士所設計的社會政策，中產階級只是一個變幻莫測的支持者，非常不可靠。

在多數情況下，他們也不是國家工作人員。對這個階段的社會政治“以國家為中心”的分析沒有充分探測的是：歐洲大部和美國如何保持國家和社會之間界限的模糊性，政府管理機構是多么薄弱，在多大程度上依賴臨時的和借用的專家智慧。即使對于社會政治的主要設計師來說，為政府服務也更多地是一段經歷而不是一個職業。1935年《社會保障法》的主要起草者來參與新政是三到四個月的借用期，威廉·貝弗里奇是在被排擠出政府時寫他的《報告》的，他已經不是第一次遭受這樣的待遇了。大學給了這些人物中的某些人更穩固的地位，現代社會政治的核心思想和術語正是1870年代和1880年代在從柏林到巴爾的摩大學經濟系里面形成的。但是在這個階段，大學對于那些過分深刻地卷入爭議的人物來說常常是并不可靠的避難所。白手起家的班輪企業主查爾斯·布思因為倫敦調查一躍成為世界研究都市貧困生態學的權威，還有研究失業經濟學并居住在睦鄰服務中心湯因比館[[35]](#_35_95)的威廉·貝弗里奇、自學成材的完美伉儷錫德尼和貝特麗絲·韋伯，這個時代的主要人物中，多數都是在專業化很不完善的領域邊緣進行研究的自學成功人士。跨越大西洋的社會政治時代在很多方面都是業余愛好者的天下。

這種人不執行社會政策，更不可能控制議會討論的結果。他們的建議除了被那些沒有政策理念卻有相關利益的人攻擊和修改外，根本就不會被提及。但是如果沒有這些人提出的建議，沒有他們辯論中確定的術語和思想框架，社會政治就不可能產生。“社會博物館”的資產階級改革工程、德國君主的社會策略、改良派社會主義者的即刻項目、美國新政的議題、1940年代到1950年代社會民主黨的福利國家，都得益于他們的工作。不管把他們的思想送入立法機構的政治力量是來自上面還是來自下面，讓人吃驚的是，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期的社會政治的綱領性成分都是他們的杰作。

一開始他們缺乏對社會和政治的系統了解，關心的不過是零碎的解決辦法和實用的社會發明，他們的興趣簡直和“社會經濟”這個詞語本身一樣廣泛，無所不包。他們的詞匯充滿大而籠統、難以歸類的擔憂：“社會問題”、“勞工問題”、“城市問題”、“合作問題”、“社區問題”等。他們的項目派生眾多結果和方式，不服從于更加專業化的時代的分類標準。他們實踐的銜接性因素對后面的章節安排非常重要，值得挖掘一番。

如果被問到像“社會問題”這么籠統的說法如何定義，20世紀初期紐約市的居民可能只會指給你看第四大道和第23街交叉口的聯合慈善大樓大廳中的名牌。從這里往南走五個街區是該市激進政治和工人階級政治的場所聯合廣場，是大型的、爆炸性集會的中心。大型服裝工人工會是那里的常客，到了1930年代，城市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政黨也經常到那里活動。聯合廣場是紐約市一年一度的五一節游行時人們集結的地點，也是大蕭條時代失業者最大規模的示威游行的舞臺。相反，慈善大樓是城市中產階級社會政治的聚會場所。

一度在聯合慈善大樓辦公的機構有許多：弗洛倫斯·凱利的全國消費者聯盟、全國童工問題委員會、全國住房協會、紐約慈善學院、聯邦宗教協會（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教會社會服務委員會、城市最大的兩家私人慈善救助機構、《調查》（Survey）雜志社——社會政策新聞和辯論信息中心，還有一個“任何從事社會工作的人都使用”的圖書館（據羅斯福的勞工部長回憶）。當這些機構越來越大，里面容納不下時，也很少有機構搬到幾個街區以外的地方。聯合慈善大樓再往前走兩個大門就是1905年時威廉·托爾曼的“社會服務中心”。這里往北一個街區是美國勞工立法協會辦公室，往東不到一個街區就是拉塞爾·塞奇基金會的總部，它的基金和事務涉及眾多領域，包括公共衛生、肺結核預防、童工問題、城市操場建設、都市社會調查、低息當鋪、女性工資條件、廉價公寓管理、阿巴拉契亞山區民俗學校、大紐約區域計劃、長島森林山花園（Forest Hills Gardens）的典范郊區建設。紐約市的個人、資金、議題的關聯交叉點特別密切，但在芝加哥、麥迪遜、法蘭克福、柏林、倫敦、巴黎對應的圈子里基本情形也都差不多。[[36]](#_36_95)

面對這樣真誠的、兼收并蓄的努力，歷史學家們往往忍不住要簡化：把19世紀末20世紀初掙扎著要出生的社會政治當作后半世紀的福利國家體系。但是這個沖動是錯誤的，必須克制。這些參與者沒有一個把福利國家當作最終目標。我們看到的所謂福利國家的“中央集權制”（statism）根本不是預先設定的結論。像法國的社會連帶主義者（solidaristes）一樣，社會政治最積極的推動者中許多人想象著：國家能通過資助自愿成立的社會團體最好地實現其社會目標，如通過工會、合作社以及各種形式的互助團體。我們應該稱其為“資助論者”，這個體系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歐洲擔負起繁重的社會政治重擔。即使社會政治的規劃者相信直接的政府干預行為，他們也同樣可能把地方政府作為福利的主要代理人，而不只是把這角色留給民族國家。

正如“國家”（state）這個詞引起誤解一樣，“福利”（welfare）這個詞也引起更微妙的誤解。在這個階段的大部分時期，（雇主或者國家的）父權主義作為弦外之音嚴格限制著這個詞的使用。全國公民聯盟的福利部在這個世紀初期忙于爭取雇主提供的工廠餐廳、休息室、人事處、安全設施：當時的德國工人福利機構總部恰恰也是在同樣的領域發展。雖然人們發現時不時冒出這樣的說法，但“福利國家”這個詞直到1940年代才成為流行語，是共和黨攻擊新政殘余的一個新詞匯。從這里它流傳到英國反對工黨政府改革的人士那里，最后被英國工黨在1949—1950年的語言挑戰行為中所接受。即使到了現在，在德國，福利國家的同義詞不是Wohlfahrtsstaat而是Sozialstaat。福利國家不是其制訂者宣稱的目標，而是在已經發生的事實上加貼的一個標簽而已。[[37]](#_37_95)

這不僅僅是個語言問題。把當前福利國家政策的先入之見強加在過去，就是限制和歪曲歷史。按現在的用法，福利國家說到底是社會保險國家，為國民養老和醫療提供安全保障的措施。與此同時，它也是濟貧國家（尤其是美國人的用法），非常不情愿地為那些掉到福利國家安全保障之外而只能吃“福利”的人提供救助。但是其實，社會保險只是當時社會政治議題的一小部分而已，1900年巴黎博覽會上這方面議題有幾十個大類，包括數不清的選擇。德國社會政策協會（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1873年到1914年間進行的143卷社會調查形成了詳細的路線圖，為我們標明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所擁有的社會政治的范圍。該協會研究的內容包括罷工、工會組織、住房和城市管理、高利貸和信用、農業狀況、貿易和稅收等。[[38]](#_38_92)在美國，對社會政治議題的追求將帶領我們到公交車的所有權、城市規劃、雇傭工人的風險、戰時國家“社會主義”、勞工政治、鄉村社會重建、對“現代”住房的探求等。我們只有通過跟蹤那些參與其事者相互聯系和交叉的奮斗足跡，才會發現社會政治到底意味著什么。

不過，盡管這些清單好像不拘一格，但它們不是沒有任何規律可尋的。不管參加者的核心術語“社會經濟”（économie sociale）、“社會問題”、“社會政治”（Sozialpolitik）有多么籠統，它們仍然是有邊界和有意義的。在這些范圍內工作的人很少想極端地改變財產的根本體系，這就是紀德想清楚說明的觀點，所以他把社會經濟安頓在政治經濟領域本身的框架內。他們更愿意躲過殘酷激烈的經濟個人主義這堆巖石和完全強制性的中央集權這堆暗礁，探索被認為是中間道路的前進方向。他們生活在商品和市場組成的世界：清楚可見的市場攤點和沿街叫賣的小販、擁擠不堪的求職大廳、大街上站著等待出賣勞動力的農民工。社會政治的進步思想建筑師沒有想到有可能擺脫市場，也沒有認為如果這樣嘗試了就可以讓世界變得更好。

然而不是所有的東西都屬于市場，這就是最終把他們的努力編織在一起的線索。不管是保護童工的積極分子堅持認為兒童應該避免進入工業勞動市場，還是經濟學家鼓吹將某些“天然壟斷”行業收歸市政府所有，還是城市規劃者試圖減緩城市土地使用的高額價格訴求，還是住房改革者相信如果聽任城市房地產市場發揮作用的話工人階級貧民就不可能擁有足夠的住房，還是農業改革者努力將零星的農業交換社會化，還是社會保險專家試圖緩和商品化勞動力的風險等等，都在某個方面回歸到一個共同的主題。在這個不斷進入商品化的背景下，社會政治擁護者試圖保留某些東西免于市場過程的沖擊，實際上還試圖收回市場化中某些被證明社會代價太大的部分。格斯塔·艾斯平·安德森在另外一個場合創造的新詞“去商品化”（de-commodification）雖然不在他們的詞匯中，但是它比“福利國家”更接近他們關懷的核心。[[39]](#_39_88)圍繞這個線索，他們編織了自己方案中隱含的邏輯。

社會政治中的去商品化線索和另外一個群體的目標不同，這個群體認為國家本質上是推動企業發展的工具，他們像社會經濟鼓吹者一樣熱切渴望使用國家的經濟潛力。目光關注經濟發展的“推動論者”在大西洋兩岸都有很多。保護性關稅是他們在19世紀最重要的杰作，實際上只要在投資和貿易能使一點稅收收入、合法特權、經濟刺激有吸引力時，他們就會出現。把注意力集中在國家存在而不是國家目的上，當代分析家有時候就會混淆上述這兩派的工程。有時候兩者的野心確實是重合的，正如約瑟夫·張伯倫或者西奧多·羅斯福的高關稅、社會保護主義或者二戰后時代的“商業”凱恩斯主義，但是兩派工程的目標完全不同。推動論者的目標是深入和擴展市場，社會政治的目標是控制和限制市場的發展。

最后，沒有任何一種做法是在孤立的國家狀態中完成的。就像1900年巴黎博覽會展示的抱負那樣，19世紀末期20世紀初期的社會政治主張和建議超越了國家邊界。這個時代社會改革者尋求國際信息的強烈愿望是不可能被忽視的內容。巴黎博覽會的勞工局代表威廉·威洛比那一個夏天在博覽會的國際聚會場合尋找法國和德國同行，收集了數不清的豐富信息。其他人收集描寫國外社會福利項目的博士論文、雜志文章、大眾書籍，或者用圖表方式向公眾展示世界在解決社會問題方面取得的進步。人們可以在“社會博物館”、哈佛大學社會博物館（德國國家保險展覽的最終收藏地）、愛丁堡（格迪斯[[40]](#_40_86)正在完善城市展覽技術的地方）、法蘭克福（模仿巴黎形式的社會博物館和圖書館很快就在此建成）或者在德累斯頓（1903年舉行第一個關于現代城市問題的大型展覽）找到他們的工作成果。在威斯康星州的麥迪遜，約翰·康芒斯[[41]](#_41_86)的會議室很快就被世界各地眾多勞工立法的圖表所包圍，從視覺上反映了社會政治的跨越大西洋的改革網絡。[[42]](#_42_80)

由書籍、宣傳冊和旅行來維持，這個網絡在1870年代到1940年代的力量和密度變化很大，但整個過程中存在著大量的相互借鑒和辯論。潮流涌向四面八方，在歐洲國家之間流淌，同時也流傳到它們邊界外很遠的地方。有時候用社會政策的“傳播”來描述這一交流過程的特點，但這個詞局限于表示空間而不是個人和政治的比喻，太蒼白了，根本無法抓住實際現象。[[43]](#_43_80)通過這些國際性渠道，不僅傳來了可供模仿的成熟模式，而且可以產生論點、競爭、對立和辯論。

當然，任何東西從跨國辯論和交流聯系中出來肯定都會發生改變。像在這些紐帶中工作的其他人一樣，美國人每當借用什么東西就要進行修改，不可能有其他辦法。從睦鄰中心到分區條例，從勞工立法到農業合作社，從城市所有的交通體系到聯邦政府的養老保險，每個輸入的觀點或者方案都因為實際需要而進行多方面的改變：首先是由于美國進步人士不容易抓住隱藏在文化距離和誤解面紗背后的東西：其次，他們對借用的東西修修補補以適應美國的條件和特殊性：最后，借鑒的每個方案都要因為美國政治現實的特殊壓力集團而發生扭曲和改變。我們探索的不是特性而是過程，不是本質而是起源：也就是曾經對選擇和政治的形成起到核心作用的變化軌跡。

這是埃菲爾鐵塔陰影下積聚的眾多展品的重要性——它們品種繁多，從外表看混亂無序，來自不同國家。從這些和類似的項目書寶庫中，美國社會進步人士不僅可以吸收社會政治的獨特語言，而且大量提取出自己的社會政治議題。他們的政治充滿了借用的東西。輸入與修改、拒絕與改變，這些對大西洋兩岸國家看待商品新世界的觀點具有關鍵作用的過程，也深刻地改變了他們自身的實踐活動。美國人是巴黎博覽會的后來者，一個試圖往里面瞧的外人。但是遲到并沒有讓他們免于對那里的展品做出選擇。如何建立起鋼鐵世界的替代品，使之強大到足以抗衡市場資本主義的破壞性力量，同時又有很大的開放性，發揮人民的民主的、自愿的能量，同樣是美國人必須思考的難題之一。

# 第二章 大西洋世界

## 風景

19世紀末的兩個現象讓北大西洋進步人士的聯系成為可能。第一個是北大西洋區域主要國家迅速融合的經濟發展。在歐洲和北美古老而復雜多樣的政治和文化棋盤上開始出現越來越集中的經濟組織，它們馬上可以被辨認出來，不管是北大西洋區域的這一端還是另一端。對持續的社會政策交流來說，沒有什么比工業資本主義社會風景的這種戲劇性擴張更重要的了。在一個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上，經濟力量是特別具有進攻性的侵略者，也是特別強大的經驗集中者。

第二個現象沒有第一個那么具體，也更脆弱，但對于跨越國界的社會和政治網絡的形成同樣重要。這就是對共同歷史和脆弱性的新理解。現實的新風景和交織的思想景觀，二者在大西洋進步紐帶的形成中發揮著同樣不可缺少的作用。要讓社會政策能夠越過政治邊界相互借用，不僅必須具有共同的經濟和社會經驗，而且還要承認這背后的親緣關系。人們必須看到各政治體遭遇到類似的需要和問題，在共同的歷史框架內活動，為想象中的共同未來而奮斗。相互聯系是核心的假設。如果只有對比或者想象中的文化差異，可能大量存在嫉妒和驕傲，但不可能有社會政策上持久不斷的相互交流學習。

在大西洋社會政治時代，這兩個相會聚的趨勢都不是沒有遭到人們的反對。民族主義是19世紀后期和20世紀初期生活中強大、猛烈的力量。盡管工業資本主義的社會風景有共同特征，但還是因為經濟差異而四分五裂。好在這個時代里，民族國家間真實的和想象中的距離還是縮短了不少，使得社會政策交流成為可能。我們將在第三章詳細考察美國進入這個國際交流新網絡的開始階段，重點關注1870年代和1880年代跨越大西洋的經濟辯論的潮流。但是，要開始考察北大西洋進步聯系，我們最好先談論它的機構，也就是新形式國際政治所賴以形成的想象力、經濟和政治的重新布局。

從第一批歐洲人來到北美大陸的時刻起，歐洲就占據了他們政治想象力中根深蒂固的核心地位，但是描述兩者關系的用詞并不總是紐帶。相反，從美國獨立戰爭到19世紀后期，主宰大西洋關系的比喻就是截然對立。歐洲是舊世界，是衰落和腐朽的大洲；美國是新世界，是重生的大洲，嶄新歷史恩賜的所在。“我們有全新的社會模式，與從前嘗試過的任何模式有原則上的不同。”威廉姆斯學院馬克·霍普金斯如是描述19世紀中期的正統觀念。這種對抗赫然聳現，超過了實際情況，巨大而極端的對立情緒使得歐洲的政治經驗無法被拿來使用。[[44]](#_44_78)

我們可以用幾種方式思考這個問題。主流的“共和”思想對歐洲和美國政治關系的理解是：舊世界的暴政是新世界的自由的對立面。透過這個有色眼鏡來看，舊政權的王公貴族、長期存在的軍隊和教堂成為歐洲大陸的實質。貴族通過壟斷管理權，似乎把像巨大磨盤一樣的國家機器懸掛在歐洲人民頭上。歐洲人民承受苛捐雜稅、嚴酷控制、地租剝削、窮困潦倒，在政治和經濟寄生蟲的雙重壓迫下呻吟。

相反，新世界自由的天才把人民的意志和福利放在首位。憲法管理、官員任免和選舉權的民主化、消除世襲特權，以及最后在全國推翻奴隸制暴政，所有這些讓美國人覺得自由的火炬已經向西傳遞到新世界的共和國。在這些方面，例外主義論的美國歷史前景深入人心。當人們處在這樣的共和國心態下，大洋就像護城河一樣成為思想的屏障。J.赫克托·圣約翰·克雷夫科爾在1782年描述美國前景的時候定下了調子，“沒有貴族家庭、沒有朝廷、沒有國王、沒有主教、沒有教會統治權、沒有看不見的權力賦予少數人非常顯眼的權勢；沒有大工場主雇傭成千上萬人為他干活，沒有奢侈浮華的精細高雅”，取而代之的是“新的法律、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會體制”。[[45]](#_45_78)

用這么對立的術語來看待他人的國民，實際上不可能非常有效地從其極端對立面中解放出來。共和派對美國的理解完全依靠與想象中的歐洲的對立來形成。在這個框架內思考的人有時候想象美國是個獲得世界歷史豁免權的孤島，能夠隔絕舊世界的命運和歷史進程。有時候他們以救世主的姿態扭轉這種關系，相信自由的火炬將最終從新世界重新返回陳腐的歐洲。不管怎樣，新舊世界的關系陷入相互強化區別和差異的過程中。

共和派描繪的歐洲形象不是完全出于一廂情愿或者幻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到歐洲鄉下參觀者之中，善于觀察的美國游客的標志之一就是好奇地問這個鄉下的主人是誰。問題的答案肯定強化美國人的愛國熱情。1873年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四分之一土地歸360個大地主所有；在同一年，350個地主擁有了蘇格蘭所有土地的足足三分之二。[[46]](#_46_76)從土地所有權這個基礎來看，古老貴族仍然在政治和國家機構中維持著強大的權勢和地位。在19世紀末期的歐洲，除了法國和瑞士以外，男性普選權都沒有實現，而在美國至少在理論上是實現了的（在實踐上是白人男性）。其中最極端的一個例子是比利時，直到1893年大罷工最終迫使政府讓步前，成年男性人口中具有投票權的人不足十分之一。即使在1890年代改革以后，財產擁有者和大學畢業生的多重投票權體制仍然允許最富有的三分之一在議會選舉中擊敗所有剩余人口。在普選權限制方面緊隨比利時之后的國家是瑞典，就在1909年普選權改革前夕，成年男性在瑞典國會（Riksdag）選舉中達到財產審查要求的人不足三分之一。[[47]](#_47_74)

德國的國會（Reichstag）選舉中男性公民擁有普選權，但地方和邦議會選舉插入了非常嚴格的壁壘限制，所以1900年，社會民主黨雖然在國會普選中能指望四分之一選票的支持，但是仍未能成功地把一個代表送到普魯士議會。哪怕最隨意參觀德意志帝國的人都不可能不注意到容克在軍隊、政府高級管理部門、普魯士議會和國會中的龐大政治勢力。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比德國在民主進程方面效率高多了，但是即使在1890年三大普選改革法案之后，居住和財產方面的限制仍然使得每十個成年男性中有四個失去投票資格。即使經過資產階級財富不斷增加的一個世紀后，世紀之交的英國內閣中幾乎一半席位仍然被擁有土地的貴族把持著。[[48]](#_48_72)

19世紀歐洲的激進民主分子同樣談到歐洲和美國的對比，幫助宣傳了美國的前景。約翰·布萊特描述的美國形象反映了他自己對開明英國的理想：“自由的教堂、自由的學校、自由的土地、自由的投票、出身最貧賤的孩子也可自由選擇的職業。”亨利·喬治1880年代在英國激動人心的巡回演講吸引大群的人來傾聽，他帶著美國口音嚴厲譴責土地壟斷對政治和經濟造成的傷害，實實在在確認了新世界的激進理想。連馬克思派社會主義者，比如英國社會民主聯盟的海因德曼（曾經在1880年游歷美國）或者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威廉·李卜克內西（在1886年游歷美國），回來后也都對美國民主實驗的成功印象深刻。詹姆斯·布萊斯總結了一再出現的主題：“美國在有些方面走在歐洲國家前面，歐洲有可能會沿著她走過的道路前行。她手里還拿著一盞燈，與其說是為自己照明，倒不如說在為后來者提供幫助。”[[49]](#_49_72)

但是如果說民主未來在西方的形象吸引了1870年代和1880年代歐洲貴族的想象力的話，讓這個形象變得完美的是美國人自己。在這個世紀中期，美國社會中上層的人士因為好奇心驅使、便宜的蒸汽船旅行價格、手頭可以支配的大量財富等，開始大規模前往歐洲游玩。他們的反應很快就落入期待的模式。美國人就是抱著尋找證據顯示自己獨特性的心理去的，在19世紀中期游歷歐洲回來后感到心滿意足。

一個非常說明問題的例子是吉爾伯特·哈文1862年的大旅行。作為新英格蘭循道宗信徒和廢奴主義者，哈文在國外待了九個月，從英國緩慢經過法國、德國到了圣地。像他那個時代和階層的其他人一樣，哈文根據讀過的書和崇拜的作家設計旅行線路，以表達對其的崇敬。從英國湖區（在詩人華茲華斯光環中陶醉）開始，一路經過蘇格蘭（那里有大量司各特和彭斯的古跡）、考文垂（因為莎士比亞文物）、倫敦（他通過薩繆爾·約翰遜的記錄而認識）、巴黎、滑鐵盧（因為威靈頓和拿破侖），然后經過萊茵河的鄉村來到路德的維滕堡（Wittenberg），他到這里時正好是圣誕夜。雖然哈文試圖把心思放在文學方面，可是他做不到。普通英國農民簡陋的小屋里“沒有書籍報紙，也沒有對我們來說早就不是奢侈品的很多東西”。這些房屋擠在地主大片領地邊緣的狹小空間內，而普通農民根本買不起土地。所有這些情景縈繞在哈文的想象中，就像反對奴隸制的自由土地之外的景象。他在到達英格蘭當天就寫道：“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美國優越感。”即使在湖區，他也停下來詢問佃農的地租，在他看來地租高得嚇人。就在跨越英吉利海峽前他寫道：“沒有親眼見到的人都無法想象英格蘭群眾的悲慘生活狀況，社會壓迫實在太可怕了。”[[50]](#_50_72)

但是歐洲大陸更糟糕。在英國，哈文已經開始對擴大選舉權的辯論表現出濃厚興趣。他渴望約翰·布萊特發動爭取美國式普選權的大型民主運動。跨越海峽來到拿破侖三世的法國就像落入赤裸裸專制暴政的深淵。他震驚地發現婦女從事艱苦的體力勞動，即使巴黎也沒有恢復他的心態平衡。巴黎花費巨資修建的新大街在他看來不過是名利場的新建筑形式。他敢肯定皇帝寶座不可能長久，這是“君主正騎在民主的老虎背上試圖安撫，但根本控制不住”。哈文繼續往前來到“歐洲大陸的第二個暴政國家”普魯士，經過賭博的老巢威斯巴登（他稱為“地獄本身”，雖然他不能抗拒去看一眼確認）來到路德的城市，在這里哈文的愛國主義、新教教義、民主激進思想一下子全部爆發。舊世界肯定要完蛋了。新教教義和民主“這兩個啟示最終將主宰歐洲和世界。路德和美國將在上帝的幫助下改變所有這一切”。[[51]](#_51_72)

共和思想模式與歐洲的遭遇是愛國主義的課程。美國旅游者心中已經固定的兩個極端使他們注意力集中在落后和貧窮的證據上，比如農民的木屐、鄉村黑面包、在田野里勞作的婦女等。他們突出顯示了歐洲君主們的虛偽和裝腔作勢：盛裝游行和豪華場面。西奧多·蔡爾德覺得1880年代末期印制在手絹、刺繡在沙發靠墊上、刻畫在煙斗上等無處不在的皇室景象特別可笑。美國人非常不熟悉的正規軍經常讓他們感到厭惡。喬治·卡爾弗特1852年在海德堡報道說：“這些人控制國家，就像丑陋魔鬼般無所事事，簡直是普遍性的污染瘡痂。”杜波依斯回憶他在1890年代的學生生活時說：“我看到的柏林是軍官的城市，他們軍服筆挺，盛氣凌人；一個幾乎每天都有盛裝慶典的城市，他們昂首闊步高唱歌曲走過勃蘭登堡大門，讓全世界看到給（蒙上帝恩典的）威廉皇帝突然的敬禮。到處都是軍人、軍人、軍人。”[[52]](#_52_72)

皇帝和士兵是外在的標志，美國人認為這些代表著普遍的、過分傲慢和強大的國家權力。康涅狄格州教育委員會主任警告1870年代初期打算到歐洲大學留學的美國學生說：“在那里國家總是核心角色，在你的周圍或者說你的上方總有個力量令人無法抗拒的大手。”龐大政府的功能就是壓迫、腐化和掠奪其人民。他警告說，在“王子似的慷慨和統治者對大眾需要的同情”等華而不實的證據下面總是存在同樣的欲望：“至少是培養民眾的忠誠，如果不是壓制思想或者讓爭取自由的努力陷入癱瘓的話。”[[53]](#_53_70)

進入20世紀，新世界民主和舊世界暴政的對比繼續影響美國游客對歐洲的描述。1900年在德國為《麥克盧爾》雜志（McClure）工作的時候，雷·斯坦納德·貝克確信在“文明”世界沒有一個工人愿意去做德國勞工，忍受粗糙的面包、低廉的工資、高額的稅收負擔——為了供養龐大且花費巨大的軍隊，還要受到“蝗群般的大大小小官僚階層”的侵擾。十年后，布克·T.華盛頓帶著他的導游和代筆作家羅伯特·帕克動身前往歐洲。帕克曾于世紀之交在德國學習過四年，他把華盛頓介紹給歐洲的社會主義者、工會主義者、社會改革者。他們一起由1880年代的勞工積極分子、如今是英國內閣成員的約翰·伯恩斯帶領參觀倫敦“城市社會主義”的成果。他們離開旅游者經常參觀的道路，來到波希米亞、波蘭的村莊、意大利南部看望非洲裔美國人的最新移民競爭者，這些地方是新移民的源地。但是對華盛頓來說，沒有什么東西讓美國例外主義的前景黯然失色。“他是美國人，”帕克后來說，“他認為美國的一切都比歐洲好。他只是想找出上面的污垢，要親自發現歐洲最下層者沒有任何東西超越美國最下層者。”[[54]](#_54_70)

在這樣的目光審視下的歐洲當然沒有什么可以學習的了。美國勞工聯合會（AFL）的塞繆爾·岡珀斯在1909年返回童年時代生活的英格蘭度暑假，再次表達了這個觀點。“舊世界不是我們的世界。它的社會問題、它的經濟哲學、它的當前政治疑問與美國沒有關系……在【國家】排行榜上，美國是第一名。”[[55]](#_55_70)

到了19世紀最后十年，這些慰藉的共和理想在美國人頭腦里開始越來越頻繁地遇到一個競爭者，那就是以“審美的”框架看待舊世界與新世界的關系，中心問題不再是壓迫和自由，而是文化、風俗和時間。與舊世界發展的緩慢和有機力量對比，襯托出新世界生猛的、競爭性的、未完成的特性。這種新對比產生的政治后果比從前的對比更讓人不安，但仍是用時間和文化之類兩極對立來表達的，所以兩個大洲很難找到共同的社會政治基礎。

最有力地鼓勵了審美情緒發展的是大旅行這樣強勁的潮流。試圖尋找想象中的前現代的、沒有政治沖突的歐洲，19世紀末期到歐洲旅行的美國中上層階級游客很快陷入商家旅行指南的現成術語中。首先，大旅行是認識歷史和名勝古跡的好機會。這是一個大洲，上面散布著眾多古跡，而且歐洲本身就像將自然和人工完美結合形成一個有機整體的博物館。擁有共和理想的游客把歐洲看作等待民主啟蒙和覺醒的地方，而審美主義者眼中的歐洲就像一幅畫，沒有變化，保存完整。威廉·威洛比在1891年從英格蘭給家里寫信時說：“那里看起來好像該做的事情全都做完了。”林肯·斯蒂芬斯從漢堡表達了同樣的內容：“任何東西都完美無缺，一切收拾利落、井然有序，沒有爭吵謾罵，沒有灰塵，沒有拆除的建筑。”對于有些美國人來說，古老的歐洲散發出絕望和悲觀的氣息，正如E.A.羅斯指出的，是一種“深深的悲哀”，與“西部徹頭徹尾的玉米棉花樂觀主義”形成鮮明對比。但是審美主義者美國游客渴望看到的歐洲就是寧靜悠久、古色古香，就像古老的天主教堂的石頭一樣光滑明亮。[[56]](#_56_70)

像共和主義者的歐洲形象一樣，淳樸古老的歐洲的形象在美國游客來到歐洲之前就已經存在于他們的頭腦中了。1850年開始在英國鄉村旅行的弗雷德里克·勞·奧姆斯特德剛離開利物浦五英里遠就發現他長久以來渴望看到的東西。“啊，我們來到它的懷抱中了！鄉間——如此的鄉間！綠草如茵、翠色欲滴、晶瑩剔透。我們站在那里被它的美麗驚呆了。”他繼續寫道：“一幢石頭房屋出現在我們眼前，鄉間道路繞過它，在它與另一幢房屋之間穿行，又一拐彎，在我們左邊出現的是一座教堂——古老的、爬滿常青藤的鄉村教堂，有棕色的石頭和紫杉樹——我們一眼就認出來了，還有綠樹成蔭、古老幽雅的英格蘭院落。”他第二天又寫道：“這樣的景色我以前從來沒有見到過，但是它的一切對我來說非常熟悉，就像我自己家鄉的山谷。這是我們詩人的故鄉！我們祖先的家園！親愛的英格蘭母親啊！如果我親眼目睹您的風采而無動于衷，那才讓人覺得奇怪啊。”[[57]](#_57_68)

這樣的比喻幫助跨越了一些想象中的新舊世界差距。在培養與歐洲的文學紐帶方面，19世紀末期美國人獲得了他們有些人迫切渴望得到的東西：古老的歷史和“更大整體的歸屬感”（正如年輕的阿拉巴馬游客1891年說的）。審美大旅行的游客在歐洲暢游，鼻子伸進維多利亞后期圖書館的羊皮書里。簡·亞當斯1880年代第一次到歐洲旅行時，在蘇格蘭讀司各特，在意大利讀羅斯金，在德國讀卡萊爾。年輕的凱里·托馬斯1881年從英格蘭給家里寫信時說：“我已經不再是美國孤魂，我已經找到了我的根源：我的城堡和遺址、修道院和教堂小鎮、茅草屋、我的湖畔、詩人的故鄉、戲劇的風景、英國的大霧、紫色石南花”。[[58]](#_58_69)

不過，就在共同文化傳統的意識使十九世紀末期的美國人心中把兩個大陸連結在一起時，新和舊、生猛和穩定的對比卻迫使它們相距更遠。非常典型的是，在海外的美國游客對令人想起美國的內容不感興趣，對于破壞他們想象的歐洲穩定的經濟變化力量興趣更小。即使眼光敏銳的觀察家奧姆斯特德也沒有讓向他抱怨的英國農民破壞他浪漫的心境。制模工人協會（Molders Union）的約翰·弗雷在倫敦白教堂（Whitechapel）區的貧民窟參觀，但是他沒有讓讀者了解英國制造業中心的細節，理由是所有的工業城鎮都差不多。人們更愿意尋找英格蘭的鄉村（亨利·詹姆斯所說的“純潔正宗的英格蘭”）而不是商業化的倫敦，萊茵河谷的遺跡而不是粗俗和一意孤行的柏林，天主教堂（如老奧利佛·溫德爾·霍姆斯所說的像干奶酪一樣芳醇）而不是議會。1890年代中期來自佐治亞的年輕婦女梅·肯尼在歐洲大旅行時，在巴黎乘馬車沿著大街看一個又一個景點：歌劇院、圣母院、巴士底獄、先賢祠。她的有些同伴登上埃菲爾鐵塔，可她拒絕了，因為擔心它的現代性破壞了城市的魅力。[[59]](#_59_68)

這樣的歐洲遭遇沒有激發出吉爾伯特·哈文在維滕堡參觀時所發的那種世界歷史變遷救世主之感。從政治上看，我們很容易看出，在對歐洲進行審美上的重新評價時民主理想急速貶值。具有審美眼光的游客讓擠在一起的木屋披上了古色古香的神奇色彩，讓士兵的軍服染上燦爛的顏色。亨利·亞當斯回到倫敦后半開玩笑地說：“對于英國改革，亞當斯什么也不關心。”“他討厭變化，他寧愿讓教皇仍然留在梵蒂岡，女王繼續待在溫莎城堡作為歷史見證。他不愿意把歐洲美國化。巴士底獄和貧民區如果好好保存是值很多錢的古董，主教和拿破侖三世同樣如此。游客是討厭創新、欣賞塵埃的極端保守派。”1870年代初期，人類學家劉易斯·亨利·摩根無法把凱旋門看作專制暴政紀念碑之外的任何東西；但一代人之后，約翰·弗雷認為它是世界上最漂亮的街景的一部分。弗雷在參觀拿破侖的陵墓時沒有發出絲毫的譴責。曾經被立憲政體、選舉權的擴大、奴隸制的廢除清晰標識出來的歷史進程，如今陷入一片混亂中。[[60]](#_60_68)

對于早先的民主信念模糊表現出的這種懷疑不只是大旅行的怪癖。縱觀美國和世紀末歐洲的寬廣前線，曾經認為民主的形式框架已經足夠的許多人不像二十五年前那么自信了。普選權和立憲政體、貿易自由和個人自由，僅作為政治議程的這些東西失去了早先的光彩。到了世紀末，歐洲的激進分子已經開始放棄從前對美國的崇拜，因為他們吃驚地發現美國托拉斯和壟斷機構不斷鞏固，正式承諾民主的國度爆發大規模的抗議活動，還有美國政治讓人擔憂的腐敗猖獗。1890年代中期，最傾向于美國的早期費邊社成員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e）說：“二十五年前美國是先進英國政治思想的指路明燈，但現在不是了。”現在克拉克可以肯定的是：“僅僅是理論上的民主，沒有伴隨任何社會改革，完全是個錯覺和陷阱。”美國作為西方民主櫥窗的形象在歐洲激進分子看來褪色了。由于擔心移民投票權問題，在黑人選舉權問題上打起退堂鼓，許多美國人也加入了普遍撤離19世紀中期民主真理的行列。[[58]](#_61_65)

這種用有機主義而非共和主義術語對歐洲的重新閱讀，如果說和人們對形式憲政民主喪失信心分不開，只看到它的保守或者懷舊的政治意義則是錯誤的。美國中產階級游客渴望從想象中的前工業化時期舊世界的穩定性中尋找什么呢？不就是對美國無法無天、充斥暴力的野營探險的嫌惡嗎？歐洲是和諧融洽的“有機整體”，美國是“無法無天的”；一個有共同的風俗習慣，另一個是絲毫沒有減弱的激烈競爭和個人主義。這個二元論推開了更古老的政治對立，深深扎根于歐洲審美形象的核心。

到了世紀末，歐洲進步人士把同樣的對立性用在美國本身。在充滿改革思想的歐洲人游覽美國的報告里，世紀之交美國城市的骯臟是個永恒的主題，它成為政府管理缺陷和社會破碎化的比喻。查爾斯·布思的芝加哥是泥巴和垃圾的集合，到處扔的都是破舊鍋爐和排水管。湯因比館的薩繆爾·巴內特認為波士頓更是垃圾遍地，散布著比白教堂區本身更骯臟的房屋。1897年曾經到美國尋找著作資料的年輕記者拉姆齊·麥克唐納認為，芝加哥“像精神錯亂的家伙，從頭到腳污穢不堪，輕率魯莽”。作家H.G.威爾斯警告說“沒有秩序，沒有預見，沒有總體規劃”。[[62]](#_62_66)

這些是游客的粗略印象。但是一位非常認真的英國醫生阿瑟·莎德威爾曾經穿過工業化歐洲的心臟地區收集資料，他1903年到達美國后開始進行工業社會的對比研究。在紐約他經常不由自主地“想起歐洲南部可憐的小鎮”。這個城市的建筑的“主要特征”，他寫到，就是“無法無天、破破爛爛、個人賣弄擺闊、公眾麻木冷漠”。這里的工業似乎正坐在勞資沖突的“火山口”。莎德威爾報告說：“這些全是倉促做成的東西，讓她滾蛋！送她上地獄！就是這個話。”德國的工業方法很徹底，英國的自我感覺不錯。比較而言，美國的主要特征是：“雄心勃勃、膽大妄為、進取心強、永不安分、渴望創新、善于發明、爭強好勝、貪得無厭。”[[63]](#_63_66)

大多數歐洲批評家認為他們知道背后的原因。他們眼中的美國是個正在飛奔的國家，過分忙碌于私人的事物，無暇把各部分組成一個整體；隨手扔掉拋棄的東西，胡亂對付公共生活，專心釋放個人能量。沒有更大的整體意識來管理永不停歇的、無所顧忌的能量。巴內特認為美國是個“去除了政府保護”的社會。它的居民“沒有國家是一個實體、美國是一個整體的概念，沒有國民意識”。拉姆齊·麥克唐納認為“沒有人能夠憑良心說，這不是一個被民主自由和平等的原子化概念所破壞、只知發財和模仿的國家”。約翰·伯恩斯重新強調了這個主題：美國的前景“遭到限制和阻礙，因為過分強調單元而忽視集體、過分強調個人而忽視社區、過分強調獨占而反對國家”。驚人的私人智慧、混亂不堪的公共秩序、遙遙領先的私人企業、雜亂無章的社區——這就是擁有進步思想的歐洲游客的印象。舊世界培養的生活共同體遭遇新世界輕舉妄動的個人主義。美國成為與“和諧有機整體”歐洲截然對立的另一極端。[[64]](#_64_66)

在強調社會和合作方面，大西洋兩岸對比的審美框架不是沒有社會政治潛力。但是這個時候，共和思想和審美意識兩個極端都充當了阻止社會政治從舊世界到新世界流動的強大限制性力量。在大西洋關系的共和思想框架下，歐洲國家只能跟隨美國先驅者的腳步前進。而在審美思想框架下，新舊世界的對比深陷在文化中無法移動的層次。只要歐洲和美國仍然處于對立的兩端，局限在想象中的時間的兩頭，社會政治相互借鑒就有難以跨越的巨大心理障礙。

那種夸張了的歐洲對美國人的自我形象非常重要，在政治上卻沒有什么用處。吸引美國游客到歐洲的那些想象風景最終迫使兩大洲想象的歷史進入徹底分開的軌道。要讓社會政治的大西洋交流成為可能，相當數量的美國人必須越過新舊世界的想象中的風景。他們要開始不再把美國和歐洲看作被大洋和時間分開的大洲，而是被當時同一個變化和分裂之海沖刷的整體。

在19世紀大旅行的極端之外，在共和派和審美派游客的視野之外，促進會合的引擎其實已經在忙碌工作。在大西洋的兩岸，一個新世界正迅速形成，里面有煤炭和鋼鐵、工廠城鎮、蔓延的都市區、聚集的資本、大群的勞動力、新形式的苦難。19世紀末期的埃森、曼徹斯特、里爾、匹茲堡不僅僅是類似的現象，平行的獨立發展。它們都是迅速擴張的世界市場的一部分，這個市場要用這么豐盛的方式把商品運送到1900年的巴黎。

這個新世界的誕生地是英國。從18世紀后期開始，工業資本主義的力量已經徹底顛覆了古老的農業經濟，當19世紀末期美國游客開始來尋找司各特和華茲華斯的社會風景時，發現一切都變了樣。新經濟秩序的磨房、機器、蒸汽泵在1790年代的倫敦進入威廉·布萊克的意識時，仍然是陌生的、革命性的，“專橫的齒輪/相互強制的運動”。到了下個世紀末葉，英國礦山和工廠的產量高居世界之首。在1870年，英國生產了全世界工業品的近三分之一。英國的煤礦在1870年的產量是相距最近的對手產量的2.5倍，鐵礦石的產量是4倍，在棉紗錠方面，英國的領先幾乎是5:1。[[65]](#_65_66)

這些數字讓當時人很感興趣，通過工作過程的國家化，它們把工業生產的統計數據變成了國家地位的標志。北大西洋經濟體的各國激烈爭奪市場，操縱貿易和關稅政策，牢牢控制殖民地市場，企圖在工業老大的競爭中超越他人。然而，將注意力集中在民族國家，意味著扭曲起作用的根本力量。投資、管理和生產技術像水銀流動似的跨越國界，在北大西洋的貿易大動脈推動下迅速傳播。到了19世紀末期，那些了解大洋兩岸新舊世界工業區的人印象最深的不再是區別，而是非同尋常的相似性了。

實際上，最重要的共同紐帶就是煤炭。19世紀，雖然不是所有的工業國家都坐在煤礦上面或者附近，但大部分都是如此。煤炭是工業革命關鍵的自然資源，它是給本世紀提供動力的蒸汽能源的關鍵，是鋼鐵生產不可缺少的燃料。煤炭動力運送貨物、推動機器、烹調食物、加熱壁爐，煤煙在歐洲和美國城市繚繞。因為運輸起來非常沉重和昂貴，煤炭吸引了投資者、企業家、工人和城市來到它身邊。煤炭豐富的地區不僅成為生產的高爐，而且成為勞資沖突的高爐，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最大工會組織的所在地，也是任何地方的國家經濟行動的早期場所。

19世紀英國的四大工業基地中，有三個都處于煤炭豐富的地區（第四個在倫敦）。最重要的是英格蘭北部的大型紡織廠和工廠聚居區。1901年，英國超過十萬人口的大城市中，有三分之一以上都處于以曼徹斯特為中心方圓四十英里的區域內。這里是英國工業化的心臟地帶，是游客像避開麻風病地區一樣避開的狄更斯小說中的世界。第二個幾乎同樣大規模的工廠聚居區沿著蘇格蘭南部展開，從格拉斯哥到敦提，這里同樣蘊藏著豐富的煤炭和鐵礦。據說人們要是在1880年代沿克萊德河而上，在沒有看見格拉斯哥前就能聽到造船廠大錘的喧鬧聲。格拉斯哥是當時英國的造船中心，是資本豐裕、貧民窟聚集的世界貿易中心。英國的第三大工業區是圍繞伯明翰的英格蘭中部地區，因為熔爐的強光和爐渣而被稱為“黑鄉”。狄更斯嘲弄地稱新工業城市為“焦煤城”（Coketown），但實際上焦煤城到處都是。[[66]](#_66_66)

焦煤城穿過比利時、法國北部，經過從里爾到列日的廣闊礦藏區，在各個本質方面都是英國原型的復制品。比利時的礦山、工廠、密集的工業城鎮讓它成為歐洲大陸工業最密集的國家，在這里工人居住區過分擁擠，工資低廉，大量使用童工，文盲率高得讓人驚訝。越過法國邊界，同樣的社會風景延續著。法國北部是工業心臟地區，法國的煤炭和棉紡織品大部分來自那里，是法國大型的、家長制工業企業的所在地，是激進的法國工人運動的戰場，到了這個世紀末，成為工人階級社會主義的堡壘。[[67]](#_67_64)

東邊，同樣的場面出現在萊茵河低地和魯爾區。資本投資來到魯爾區比較晚，但是187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沒有哪個地方工業化進展比這里還迅猛。到了世紀之交，魯爾區及其周圍工業城市群（絲綢紡織中心克里菲爾德、機械中心杜塞爾多夫、新興的化工產業中心巴門和埃爾伯費爾德、煤炭鋼鐵中心多特蒙德、克虜伯主導的埃森）成為歐洲大陸最大、最密集的重工業集中地。在1890年到1990年間，以魯爾區為中心的德國鋼鐵生產超越英國，很快幫助德國在世界制造業產量份額方面超過英國。德國迅速邁進的工業擴張并不完全取決于萊茵河低地的企業，還包括西里西亞的煤炭鋼鐵企業，包括阿爾薩斯—洛林，以及薩克森，像比利時一樣集中了煤礦、紡織企業、過分擁擠的住房、（正如保羅·格勒在1890年代發現的）充滿深刻仇恨的工人。19世紀中期的美國游客發現德國是野蠻的、讓人討厭的一灘死水。到了1900年，德國工業地區在經濟轉型方面甚至比美國本身還要快。[[68]](#_68_64)

在大西洋的西邊，因為同樣的貿易體系，尤其是英國資本的注入、英國技術的整體引進，同樣的力量也開始起作用。當然，充足的水力資源給予美國舊工業區一抹田園風格的色彩。1903年阿瑟·莎德威爾吃驚地發現新英格蘭地區的紡織廠“相當漂亮和柔和”。到了19世紀后半葉，工業區的“歐洲化”傾向已經非常明顯了。蘊藏大量煤炭的賓夕法尼亞是美國的經濟心臟。美國兩個最重要的制造業城市紐約和費城，就是利用賓夕法尼亞的煤礦滿足高漲的能源需求。匹茲堡地區相當于德國的魯爾區。在中西部，伊利諾斯煤礦地區滋養了另外一個工業集中地，從東邊的匹茲堡和克利夫蘭到西邊的密爾沃基和芝加哥。1890—1891年從西到東游覽美國的薩繆爾·巴內特認為到芝加哥就像回到了家鄉曼徹斯特，同樣有密集的工廠和琳瑯滿目的廣告。匹茲堡讓貝特麗絲·韋伯感覺像來到落后的意大利或者英國老家“黑鄉”。阿瑟·莎德威爾也認為匹茲堡是熟悉的地方，“揭開蓋子的地獄”，像埃森和謝菲爾德一樣，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69]](#_69_62)

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也不缺乏快速和兇猛。1880年美國已經趕上英國的鋼鐵產量，1900年趕上英國的煤炭產量。在生產輪船和紡織品方面，英國仍然是難以匹敵的，但是英國、德國、美國在總體制造業產量的競爭中，美國的領先地位在世紀末已經成為不容置疑的事實。警惕美國人插入歐洲傳統的市場成為歐洲報刊的經常性話題。歐洲記者把這個現象稱為世界的“美國化”，更加恰當的想法應該是美國的歐洲化。若認為它展現了越過政治家和外交家清晰劃定的國家邊界的市場過程，那就更好了。[[70]](#_70_62)

焦煤城是新世界工業資本主義的第一個定義性因素。第二個是當時人所說的“大城市”的出現，說這個詞的時候既興奮自豪又特別地緊張不安。大城市不像工廠城鎮那樣是新鮮東西。作為貿易和資本積累的結點，它們曾在現代歐洲早期的經濟中發揮了關鍵作用。倫敦在1800年有一百多萬人口，巴黎有五十萬人口，維也納有二十五萬人口。但是19世紀最后十年大都市中心的增加卻是一個讓人吃驚的現象。從安德魯·默恩斯（Andrew Mearns）的《被拋棄倫敦的哀號》到雅各布·里斯的《另外一半如何生活》，到德國人對大城市（Grossstadt）的尖銳抱怨，大都市的增長對世紀之交北大西洋經濟體的社會改革者產生了深刻影響。[[71]](#_71_60)

大城市（不是城鎮而是人口超過十萬的都市）的增長是不容辯駁的事實。1871年，德意志帝國十萬人口以上的城市有8個，占德國人口的5%。40年后有48個大城市，其中柏林的人口超過一百萬，每十個德國人中就有兩個人生活在大城市。法國有15個大城市，英國和愛爾蘭有41個，包括特大城市倫敦，人口達到七百萬。在美國，1870年有14個大城市，1910年有50個。盡管有西部和南部農村巨大的稀釋性影響，美國在1890年的城市化程度已經和比利時一樣了，這是根據人口兩萬以上城鎮的居民在全國人口中的百分比來衡量的。在1890年北大西洋經濟體中7個百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有3個坐落在美國。[[72]](#_72_60)

這些城市中有些是重工業基地。更普遍的模式是貿易、金融、小規模制造業交織。倫敦東區、紐約下東區，以及北大西洋經濟體的類似地區，既是生產中心也是貧困的中心，是擁擠不堪的蜂窩，為大城市迅速增長的人口提供低工資、不穩定的工作。從銀行和時髦商業街等內部繁華核心區往外延伸，碼頭區、倉庫區、鐵路車站，再進入好像沒有盡頭的血汗工廠和小作坊、小商店、當鋪、貧民窟、廉價的工人住房區，全部都沒有規劃，混亂不堪。

正如工業區成為直觀了解縱向分配的動力的實例一樣，大城市為我們提供了體現對比與運動的實物。人們應該想象19世紀城市不是作為單位，而是街區的集合；在這些地方走過，就好像是穿過無休止的社會矛盾的叢林。一面是財富的高度集中，一面是貧窮的聚居區；一面是資產階級的優美馬車公園，一面是臟亂的酒館小巷；一面是漂亮的購物大街，一面是滿足大眾需要的大片當鋪、攤販、舊貨市場等。財富的兩極分化不是新鮮的東西，但是它們集中而且緊挨著構成鮮明對照的都市風景，只靠工資和市場這層薄薄的、冷漠的關系維系在一起，這卻是全新的現象，令許多觀察家不知所措，緊張不安。

大城市的顯著貧富差距是其主要特征之一，另外一個特征是財產和人口永不停息地流動。大城市天生不穩定，不僅在于它們與農村之間不斷后退的交界處，而且在于它們的核心，因為土地價值和財產使用隨著市場和風尚的變化而轉移。對流動性做出貢獻的還有每年涌入大城市的大量人口，在資源永遠也不夠的環境中掙扎著尋找空間和棲身之地。柏林、維也納、格拉斯哥、紐約都呈現出異常嚴峻的住房緊張局面。但是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沒有一個大城市能夠說充分解決了住房供應問題。交通和公共衛生問題同樣給城市當局帶來沉重的壓力，他們要努力把迎合城市新需要的新興產業如私有自來水公司、糞便運輸公司、有軌馬車路線等雜亂發展合理化。難怪大城市吸引了世紀之交進步人士這么多的政治能量和想象力。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如此鮮明強烈地表現出私有財產權利和公共需要之間的緊張沖突。

可以肯定，進入20世紀后，歐洲和美國的都市和工業區仍然是農業大海中骯臟擁擠的孤島。工業資本主義的城市風景突然崛起在周圍的農村背景之上。經濟革命時間最長的英格蘭在一定程度上是個例外。到1900年，英國的勞動人口中只有12%仍然依靠農業為生。同一時期即使在工業化程度很高的比利時，仍然有四分之一的勞動力在農村勞動。在德國，這個比例是三分之一，在法國和美國是40%多一點。[[73]](#_73_60)工業發展核心區以外是廣袤無垠的農村地區：容克控制的普魯士和波蘭的黑麥地區，奧匈帝國的莊園，南歐、愛爾蘭和斯堪的納維亞的農民土地，美國南方深處的棉花地，密西西比河兩岸往西無限延伸的平原等，這些地方在世紀之交的勞動人口中仍然有一半以上在從事農業勞動。

但是在對抗市場革命時，農村并不比城市有更多的免疫力。外國糧食在1860年代和1870年代開始大量涌入歐洲（從加拿大、俄國以及更重要的美國），給這里的農業穩定帶來了破壞性的后果。在愛爾蘭，這些壓力促使宗教和土地所有權方面長期的緊張關系升級為公然的佃農暴亂。如果說抵抗是常見的，那么逃離就更司空見慣了。極端的事例發生在瑞典，那里從1860年到1910年移民國外的人口達到20%。到處都出現鄉村人口以驚人速度離開家鄉到城市去的現象，讓當時的人們努力為留守農村的人口尋找新的莊稼組合和市場結構。[[74]](#_74_60)

因此，到了19世紀末葉，北大西洋經濟體普遍出現了被連根拔起的農民。美國城市吸收了大量這樣的人口，歐洲在流動方面也并不遜色，雖然游客往往專注于靜態的風俗習慣。在英格蘭，到本世紀末，只有四分之一的人生活在他們出生的地方，在1890年的柏林，30歲到60歲之間的男性工人中每五個就有四個出生在城市之外。到處都是移民，在英格蘭工廠工作的愛爾蘭臨時居民，在蘇格蘭煤礦干活的波蘭礦工，在法國南部煤礦干活的西班牙礦工，在比利時和洛林的工廠城鎮工作的意大利棉紡工人，以及在每個城市中干活的鄉下人。在1870年代的利物浦戶主中，四分之一是愛爾蘭出生的人。在德國魯爾區，1890年四分之一以上的礦工說波蘭語。在魯爾區的格爾森基爾欣鎮（Gelsenkirchen），三分之一的學生說波蘭語。[[75]](#_75_60)

市場和勞工的這些縱橫交錯的變化所產生的最明顯后果，就是新產品以驚人的速度出現。北大西洋經濟體的真實工資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這段時間內得到增加。同樣增加的還有教育機會、圖書和閱讀材料的供應、多樣化的可供消費的娛樂形式、流動性的渠道。即使在汽車和家用電力普及之前，普通人能夠購買的商品種類也以令人吃驚的速度發展，從汽燈到成衣，從廉價電影票到赴鄉下游玩的電車票等。當廉價工業品和外國糧食的潮流沖破了傳統農業社會的舊式農民和手工業者經濟，這種碰撞釋放出巨大的人類能量。要不是“改善”看上去這么確切地寫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物質歷史上，很難想象進步人士為什么對社會能夠不斷改善充滿信心。

但是如果19世紀的經濟革命產生了潮水般涌來的新商品，不能否認的是它們也帶來了新形式的苦難。按照邊沁主義計算法[[76]](#_76_60)，我們不清楚痛苦和快樂相比總體上的赤字是否在增加，但是市場革命強有力地改變了經濟痛苦的經驗和意識。農村生活的痛苦原先就是嚴重的和反復出現的：莊稼歉收、瘟疫、疾病、事故、生孩子。但是這些受財富、稅收和莊園勢力的社會制度塑造和強化，呈現出自然的（因而）難以避免的色彩。工業資本主義的痛苦不那么容易預測，它們的人性面孔不容易掩蓋。流動性和脆弱性隨著勞動力的商品化加劇而不斷增強。農民失去了土地、家族紐帶、風俗習慣的安全感，在新的工資勞動市場上，可能在一夜之間就會出現失去掙錢能力的情況。都市工人階級的早期研究者對勞動能力和窮困之間的脆弱界線非常著迷，以及人們如何變幻無常地從一邊被推到另一邊。在這些新形式的痛苦中，冷漠麻木、精心算計、愚蠢程度、小氣程度等人為之手至少和命運本身一樣強大。企業事故、房東的驅逐通知、老板對工資的不妥協態度都是明顯的社會事件。既然是權力和政治事件，有人認為肯定有社會和政治解決辦法也就不讓人吃驚了。

人類有意識行為的手在大城市生活的痛苦中和農村的痛苦中一樣明顯，正如民粹主義者對銀行和鐵路權力的控訴所示。托馬斯·哈斯克爾指出在19世紀末期，社會問題的根源好像消退了，慢慢變得辨不出蹤影了。[[77]](#_77_60)但是從長遠觀點看，相反的說法恐怕才是更恰當的。隨著風俗習慣在商業化的潮流中消退，人類力量的作用變得越來越明顯。出現了圍繞“社會”概念的整套詞匯——“社會經濟”、“社會政治”、“社會問題”、“社會疑難”，所有這些都證明了人們日益意識到市場資本主義的社會結構本質。痛苦是自古以來就有的，但是工資勞動市場的痛苦、大城市生活的痛苦和從前的痛苦不一樣，人們很難按照過去的模式接受它。

最后，人們不需要把農村生活浪漫化就可以指出，工業資本主義的新世界遭受遠比過去更明顯的沖突的沖擊。爭奪面包的動亂、都市暴動、農民起義曾經是前工業化社會的常見現象。但是不管中產階級進步人士稱新時代為徹底的“工業戰爭”是否正確，毫無疑問的是，社會各階級更頻繁地意識到對方的存在，有了比從前更深刻地制度化的仇恨。罷工成為新秩序最讓人不知所措的標志，雙方怨恨地、激烈地斗爭，隨著時代的前進，規模越來越大，讓國家越來越多地充當警察、協調者和軍事鎮壓者的角色。但是罷工不是市場關系新體制的外來者。像就工資討價還價一樣，罷工也是制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同樣的，雙方趨向集體紀律和組織機構的動力也是如此，不管是成立工人聯合陣線還是堅實的企業主聯合體。在有組織的工人團體和有組織的資本家團體不斷激化的沖突中，個人權利在什么地方終結、公共權利在什么地方開始成為永遠爭論不休的話題。當查爾斯·紀德把社會經濟領域描述為“社會和平”問題時，不管名詞還是形容詞都有沉重的分量。

焦煤城和大城市，物質生活的改善和日益加劇的不安全感：強調這個新社會秩序的共同輪廓特征并不是要否認其中的國家特殊性。不過，在所有重要方面，歐洲及其西面的經濟前沿是作為一個復雜的整體在經歷這些起伏動蕩的。在大西洋的兩岸，這個世界的輪廓、典型的風景、不滿和沖突的主要根源越來越明顯地突現出來。它是與旅游指南所展示的不一樣的歐洲，與美國獨特命運論者愿意承認的情況不一樣的美國。在政治和審美對比的表面之下，不存在新世界和舊世界的區分，只有共同的、經濟推動的新世界塑造過程。

## 進步政治

19世紀末的新大西洋經濟將鼓勵大西洋范圍的新政治。從1890年代的第一次萌動，新社會政治作為強大的政治力量在1910年代登上舞臺，在北大西洋世界的每一個首都都出現了它們的代表。即使遠離政策和思想革新的主要中心的美國也被卷進來了。

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組成一代新社會政治力量的人從未擁有共同的名字。他們中的有些人從來沒有找到用來稱呼自己的一致用語。威廉·貝弗里奇把自己稱作“托利民主黨”、“工人帝國主義者”、（“非常接近”）社會主義者、自由派。美國城市改革者弗里德里克·豪威自稱單一稅制派、“自由派”、“改革者”、“激進分子”。在國家的政治文化中，術語的混淆就更加明顯。在法國，社會政治的先驅者把自己稱為激進分子、社會連帶主義者、經濟上的干預主義者，或者干脆叫做社會改革（la réforme sociale）支持者。在英國，他們的名字有“新自由派”、“新激進派”、基督教社會主義者、費邊社成員，或“集體主義者”。在德國，十多個競爭的社會政治黨派和壓力團體圍繞一個核心詞匯“社會”（sozial）構成。[[78]](#_78_58)

但是，有一個詞已經非常接近共同的標準或特征：“進步”。作為政治稱號，它先出現在英國，誕生于1890年代倫敦激烈的城市政治辯論中，后來才在新世紀的前十年跨越大洋來到美國。到了1910年，在弗里德里克·瑙曼、 路約·布倫坦諾和其他年輕改革派知識分子的進步人民黨（Fortschrittliche Volkspartei）中，“進步”這個詞在德國也獲得了社會政治的色彩。[[79]](#_79_58)這對于社會政治支持者的自我定位是最重要的，認為自己不是獻身于抽象的原則，而是處于歷史進步前沿的獨特地位，那里生產和交換的革命性影響體現得最清晰和明確。

當然，之前的激進分子和改革者也想象自己在歷史的前沿工作，但是卻沒有把經濟作為改變的主要因素。自從偉大的18世紀革命后，他們的核心工程一直限制的不是商品化過程，而是君主國家的中央權力。政治權威機制是他們的天才構想：綁住潛在專制君主之手的成文憲法、自我限制的政府、議會自主性、大眾特權、擴大了的選舉權、更直接的代表性、更廣泛的公民豁免權、清晰的人權法案。

進入19世紀末葉，這些工程仍然是黨派政治和政治文化的框架。1870年在法國，拿破侖三世的帝國倉促地和普魯士軍事較量失敗后垮臺，剛剛開始第三次共和國的嘗試，局面仍然非常不穩定。現代德國，就是由把拿破侖三世趕下臺的普魯士軍隊打造的，在1871年剛剛出爐，正在忙于制訂憲法和國家建設。在1890年的英國，威廉·格萊斯頓做首相的第二年，自由政治的議程已經穩定推進了四分之一世紀：政治民主化、自由貿易、愛爾蘭權利、宗教異議者的自由等。1870年的美國，激進分子和改革者仍然處于內戰和分裂的余悸中，國家的政治重建和如何為前奴隸提供自由的議題讓任何別的政治考慮相形見絀。[[80]](#_80_56)

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進步運動對這些問題不是冷漠無情的。在議會多數控制原則還沒有確立的國家（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瑞典），或選舉權受特別嚴格的財產標準限制的地方（如德國的某些邦和市），或地主貴族仍然對平民多數擁有正式否決權的地方（如英格蘭，直到勞合·喬治為解決1909—1911年預算危機強迫上院屈服之前），很少能夠清理區分新老改革政治的議程。

但是，無論新社會政治的塑造者是維持舊的民主激進主義還是（更常見的情況）從中選擇性借用部分內容，通過反思或者修改來擱置其他內容，他們共同的觀念是，圍繞國家權力重新分配的政治已經不能滿足需要了。因為曾經是法庭、國王、地主貴族之特權的權威已經轉移到了資本所有者和工業家手中，因為權力和痛苦的根源主要已變成經濟上和社會上的，從前激進的法律—政治大拆除工程在反思社會和國家宗旨的需要面前逐漸消退。這就是威爾斯1906年在美國寫的文章的意思，當時他堅持認為：在波士頓規劃的野心勃勃的大城市公園體系中或者在尼亞加拉瀑布剛開始為安大略省供電的發電機中，可以發現比首都華盛頓特區更多的政治諾言。在首都，“聯邦政府被困于孤島之上，各種關系糾纏成死結，受保障措施約束，完全擱淺了，根本動彈不得”。這就是各地進步人士說光是取消權力并不能解決問題時所表達的意思。政治的核心從憲政體制轉向行政管理，從貴族特權的后果轉向日常生活的背景。英國的約瑟夫·張伯倫早在1883年就指出“未來的政治是社會政治”。[[81]](#_81_56)

通過個人和集體持續不斷的努力，社會政治的很多工作一點一點地完成了。煤礦和工廠工作條件上的公共限制，連同負責監督實施的拿工資的公共檢察員（現代社會政治的重要發明之一），在英國可以追溯到19世紀早期。英國財產所有者在出租和建造供人居住的房屋時自由權利有所限制，這是1840年公共衛生政治的杰作。俾斯麥體制賴以存在的地方性德國救濟會（Kassen）在帝國成立前很早就有了；鼓勵成立互助會（société mutuel）是拿破侖三世喜愛的工程。總而言之，進步政治的許多主要機構早就有了。但是直到這個世紀末，18世紀大革命確定的大政黨和組建聯盟的政治議題才開始轉向新的軸心。

流行的政治聯盟的第一次主要分裂出于機會主義，是和理論無關的應付危機和抓住機會的努力。強烈反對國家干涉私人工資合同的俾斯麥小心翼翼地退入他1880年的社會保險項目——為了解除非法的社會主義者的武裝，重新塑造德國工人階級對國家和皇帝的忠誠，把工廠主人的經濟“家庭”神圣性放到一邊。格萊斯頓1881年的愛爾蘭土地改革法案是類似的特例，它廢除合同，把公平地租問題轉交到特別的國家委員會，許諾國家資助從地主手中購買土地。這是臨時破壞自由原則的行為，目的是安撫愛爾蘭佃農沸騰的憤怒，最終把棘手的愛爾蘭問題從政治上趕走。

但是到了1890年，在北大西洋經濟體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更廣泛的、更持久的政治重新結盟的跡象，甚至在它的邊遠據點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也可以看到。那個十年的進步運動——威廉二世與“社會君主”概念的調情、法國社會激進主義的出現、新西蘭自由主義者和勞工的同盟、英國和美國的都市進步同盟，最初的來源明顯不同。在德國，1890年代早期的“新道路”是君主野心的成果。年輕的德國新皇帝要切斷和年邁的俾斯麥的關系（后者此時已不再愿意進行下一步的社會政治實驗），自上而下開始社會政治的道路：把大批改革派國家管理者吸收進普魯士政府，要求德國國會討論工業安全和管理的立法議程，鼓勵在現有新教教會內組織社會福音運動，親自干預1889年魯爾區煤礦工人的罷工事件，組織第一次歐洲范圍的政府間國際會議討論統一的勞工標準。相反，在法國，1890年代的社會政治產生于中產階級和共和派思想的先驅。萊昂·布爾熱瓦是最突出的典型，他是激進政治領袖和內閣成員、社會連帶主義哲學家、公共衛生聯盟（Alliance d'Hygiène Sociale）的主要推動者、“社會博物館”的榮譽主席。他的1895—1896年激進政府在反對教權和實行憲政這些傳統共和思想外，第一次添加了野心勃勃的社會政治議程：工廠雇傭工人規范、進步的所得稅政策、公眾養老金補貼。[[82]](#_82_56)

在1891年到1906年的新西蘭，自由派—勞工同盟吸收了其他成分。擁有大批羊群和土地的大地主與迫切渴望土地和工作的都市工人之間長期存在緊張關系，政府利用這種矛盾推動了一整套改革方案，包括土地累進稅、小業主的公共土地租賃、全面的工廠管理規定、（道德上可敬的）窮人不帶恥辱性質的養老金、成年女性的選舉權，還有對于組織起來的勞工實行強制性仲裁法律，把工資糾紛的死結從市場提出來，放在經過特別挑選的法官手中（這是世界上第一例）。[[83]](#_83_56)

新西蘭是1890年代進步政治的櫥窗。在簡·亞當斯的朋友和政治同盟者亨利·德馬雷斯特·勞埃德看來，新西蘭是“現代世界的政治頭腦”，是世界先進立法的“實驗室”，他曾經跨越半個世界到這里游覽。1898年錫德尼·韋伯擺脫對陷入憲法死胡同的美國政治的沮喪之感，同樣熱情贊揚：“你在這里看到的是真正的民主，人們真正得到希望的東西，不是1789年名義上的英國憲法。”[[84]](#_84_56)

個人的失望夸大了兩者的對比，在勞埃德的美國和韋伯的英國，新的進步力量已經在城市政治中發揮作用。1889年到1907年的倫敦，由自由派、勞工組織、費邊社等組成的進步人士聯盟顯著擴大了城市公共服務的范圍。在1890年代的格拉斯哥、波士頓、底特律等地，類似的改革同盟與公交公司、公用事業壟斷等爭吵不休，可以說是在演練很快就流傳到全國政治舞臺上的協商技巧和政治風格。

但是20世紀頭十年，北大西洋經濟體中沒有哪個政黨體制不受到新社會政治的強烈沖擊。在英國，1906—1914年自由派政府推行了一系列立法措施，它們的大膽、果敢在25年后仍然深深打動羅斯福的心。對上年紀的窮人，它從新西蘭那里借用了養老金體制；對經濟上陷入困境的病人，它從德國那里借用了強制性的工人健康保險；對受到嚴重剝削的工人，它授權澳大利亞風格的工資協調委員會建立法律上的最低工資標準；為了財政上的公平正義，它實行了累進制的土地稅和所得稅政策；對失業者，它實行德國風格的國家勞動就業網絡；對于那些用工需求特別不平衡的行業的工人，它進行了一個空前的實驗，由國家管理的保險均攤失業風險。1899年到1914年在法國執政的激進同盟雖然遭遇重大的失敗，但提出的方案并不少：累進所得稅、對上年紀窮人的公共醫療資助、法律規定的最高工作日標準、工會失業資助的稅收補貼、勞資沖突的公共調解，還有德國模式的強制性養老保險——這一政策轉變顯示出國際上新社會政治變幻無常的特點。在時間上和內容上，戰前美國政治中的進步運動作為整體的一部分融入北大西洋這個大模式中。[[85]](#_85_56)

在大西洋兩岸，利用這些新議題登上權力舞臺、獲得大眾支持的政治家有：英國的勞合·喬治和年輕的溫斯頓·丘吉爾、法國的克里蒙梭、美國的西奧多·羅斯福和伍德羅·威爾遜。政黨和壓力集團起草了包羅萬象的社會改革計劃。在20世紀以后的歲月里，盡管政黨對有些新議題產生了分歧和兩極觀點，但沒有任何政治能夠脫離社會政治的內容了。

參與這些活動的人知道他們的親密關系。西奧多·羅斯福1911年在歐洲旅行時，和威廉二世談論了外交、工業進步、國家養老和事故保險體系；在英國他迫切想和“新自由派”勞合·喬治以及倫敦進步人士中從前的勞工狂熱分子約翰·伯恩斯交談。一年后，試圖從美國進步黨的選舉失望中爭得一些勝利，米迪爾·麥考密克提議該黨派他自己、羅斯福、吉福德·平肖、喬治·W.珀金斯等一幫人到英國、比利時、德國、瑞士考察，“為報紙寫稿，會見白里安、勞合·喬治、溫斯頓·丘吉爾以及社會主義者右派”。堪薩斯進步人士威廉·艾倫·懷特用更激進的語言描述了同樣的心態：“我們美國和歐洲，都是彼此的一部分。有些東西把我們結合成為社會經濟的整體，雖然各自有政治上的變化。堪薩斯的斯塔布斯、巴黎的饒勒斯、德國的社會民主黨、比利時的社會黨，我敢說還有荷蘭的全體人民，都是在為同一個事業而奮斗。”[[86]](#_86_56)

進步人士在重新確定政治議題方面的成功，并不能保證他們的解決方案流行開來。任何地方新政策的推進都是間歇性的，逮著機會就做，喪失機會就停下來。1890年威廉二世的新措施到1894年就停止了；德國第二波的社會政治立法在1905年開始，1911年又結束。英國的新自由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耗盡了大部分的政治資本。1895年的萊昂·布爾熱瓦政府一年不到就倒臺了；1906年克里蒙梭政府的改革野心很快就消耗在工人罷工的洪流中。

戰前進步政治的脆弱性部分源于多個政黨同時競爭同一個領域。在法國，社會政治本質上就是聯盟政治，是脆弱的。在戰前的美國，沒有一個主要政黨能夠成功地壟斷所有進步議題。在英國，到了1905年，韋伯等人仍然忙著向保守黨“滲透”，相信這是實現自己集體主義抱負的更有前途的方式，比加入自由黨更有效。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社會主義工會仍然處于帝國合法性范圍之外，受到嚴格控制，其成員被排斥到最次要的管理職位。社會政治在全國范圍內是斷斷續續的，一條腿走路，因為改革者有時獲得了皇帝的垂聽，但隨后機會又被別人奪走。任何地方的新政治都制造了類似的敵人。業主和納稅人協會、雇主利益團體、各地商會飛速發展。在1910年后，法院的挑戰給法國養老保險法案打上了死結。在美國，司法體系成為社會政治倡議的墳墓是人所共知的。總而言之，新政治很難突破老傳統。不過，1890年到1914年間，改革政治采用新基調和新語言進行了重新改組。

新政治不僅由時代的經濟轉型所構筑，而且受到世界各地進步人士微妙地稱作“勞工問題”因素的影響。大量工人階級組織的興起是當時的一個主要特征，就像資本的新形式一樣，它的觸覺也是國際性的。從“美國勞工騎士團”組織者1880年代到英格蘭中部游說招募新成員，到英國和美國兄弟會代表團在各自的年度工會大會時交換位置，到馬克思繼承者的第二社會主義國際的工作等，勞工政治那明確有意識的國際性特征不容忽視。德國和瑞典的社會民主黨、法國和比利時的工人黨、英國社會民主聯盟、美國社會主義工人黨、第二國際本身都是在1875年到1889年期間成立的。四分之一世紀后，社會主義政黨成為北大西洋經濟體各地的主要政治挑戰。在美國，社會主義者在1912年幾乎得到百萬人的支持。在法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最后一次選舉中，每六個選民中就有一個社會主義支持者，在德國，每三個中就有一個。即使在腹地也不能不受影響。在瑞典，社會主義者在大選中獲得選票的比例從1900年幾乎為零增至1914年的30%；在丹麥，這個比例從14%增長到29%。只有在英國及其澳洲殖民地，社會主義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從政治上被邊緣化，很大一個原因是工黨已經搶占了潛在的政治空間。“1880年代及其后在國際上突然興起的群眾性勞工和社會主義者運動，似乎讓很多國家的政府和統治階級陷入基本一樣的困境中。”埃里克·霍布斯邦不無夸張地寫道。但是當時人并非沒有認識到這一點。[[87]](#_87_55)

在社會主義者和工會組織成長的背后，存在著更普遍、組織性不強的不滿，因其萌芽狀態和變幻無常而更令中產階級進步人士擔心。勞資雙方激烈對抗式罷工和關閉工廠是他們顯示實力的最明顯方式。從1880年代往后，這些活動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出現。1886年勞工騎士團爭取八小時工作日的全國范圍大罷工、倫敦碼頭工人和魯爾煤礦工人1889年的罷工，都預示著更大沖突的到來。1890年代初期，罷工浪潮席卷法國和美國；1903年到1906年，美國、法國、德國都爆發了大罷工；1910年到1913年罷工撼動了幾乎所有工業化國家。[[88]](#_88_57)反過來這也刺激了工會招募新成員。德國工會成員從1890年初期的不足30萬人猛增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250萬人；英國從160萬人增加到410萬人；法國從14萬人增加到100萬人以上；美國從1897年（可靠估計開始日期）的40萬人增加到260萬人。[[89]](#_89_56)

在這些挑戰面前，各國政府搖擺于軍事鎮壓和社會政治讓步的“柔軟擁抱”之間。意料之中的是，雖然進步人士渴望“社會和平”，他們同樣在矛盾中搖擺。勞資協調的機構吸引了很多進步人士的注意力，如新西蘭形式的強制性仲裁，如羅斯福和勞合·喬治親自干預勞資糾紛，又如1890年后在德國緩慢發展起來的工業法庭、調解機構、法定勞資委員會的網絡。但是一旦調解失敗后，進步政府（正如威爾遜、勞合·喬治、克里蒙梭都顯示出來的）會像保守政府一樣采取嚴厲措施。

正是在所有這些新力量領域——包括市場關系的迅速加劇、城市人口的迅猛增長、低層工人階級憤怒的日益高漲——新社會政治開始成型。工業資本主義的共同社會風景促使各國的股線交織到一起，深刻的共同的焦慮也把他們團結起來。資本和勞工的國際化是前提條件，但是北大西洋經濟體的進步政治包含自己的國際機構和動力學，在國際框架下重新改造社會政治的過程中，這些決不是可有可無的東西。

在歐洲內部，新跨國社會政治的最顯著特征之一就是一個國家通過的法律傳播到另一個國家，有時候甚至傳播到相互充滿懷疑和競爭的國家。早期的例子是英國模式的工廠立法在1870年代開始出現在法國、德國和其他國家。幾十年后，這種形式的借用形成了國家間相互影響和挪用的雜亂圖景。丹麥養老金制度（通過荷蘭）引進到英國，英國的工業債務標準引進到法國，法國的補貼制度引進到了丹麥、荷蘭和斯堪的納維亞，更加激進的法國進步人士甚至借鑒德國的強制國家保險制度。這些挪用中影響最大的是1911年英國《國家保險法案》，戰爭開始前不足三年，勞合·喬治稱贊它超過了德國自己的社會政治項目。

在這些現象背后并促使其得以實現的，還有一些不那么明顯的聯系紐帶。其中一個是志同道合的改革者舉行的國際會議，有專家也有業余愛好者。由于巴黎世博會的推動，舉辦國際會議成為這個時代最引人注目的成果。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定期舉行的國際會議名目包括勞工立法、福利和兒童保護、社會保險、失業、住房、花園城市、城市規劃、公共澡堂、監獄、公共和私人貧困救濟，而且還定期舉行工廠監督員、消費者聯盟組織者、城市官員、工會領袖、女性主義者參加的國際會議。每個會議都有持續的管理機構，它們厚厚的、一絲不茍的會議記錄成為設備良好的社會圖書館不可缺少的重要文件。[[90]](#_90_56)

另外一個是官方的或私人的參觀訪問。英國是最早吸引參觀者的磁石。從19世紀中期開始，英國自由運作的工人階級聯盟型機構（工會組織、合作社、友好協會）以及廣泛制度化的集體談判，就吸引了歐洲大陸改革者的目光，因為這些和19世紀中期歐洲常見現象格格不入。德國進步人士希望把德國工人運動從革命的社會主義轉移到其他地方，他們是特別熱情的參觀者，不僅自己前來，還安排德國工人到英國旅行。其他德國人來看英國的新花園城市、倫敦進步人士的城市工作、英國睦鄰中心運動等，從中受到啟發。[[91]](#_91_56)

到了世紀交替之時，出現了同樣強大的對德國好奇的逆流，因為英國進步人士渴望搞清德國社會政策與驚人的商業成功之間的關系。英國制造商在自由國際貿易體制下感到緊張不安，派工人代表團（詆毀者稱他們為“關稅旅游者”）來研究貿易保護主義者德國的勞工和社會條件。其他人開始研究德國城市的社會效率、帝國勞工統計局和社會保險體制的工作、德國貿易的技巧和技術教育等。[[92]](#_92_56)其他方面的調查涉及面更廣。英國農業改革者研究丹麥，丹麥改革者研究愛爾蘭。德國社會政策協會的調查具有世界性，法國社會博物館把研究人員派往世界各地。[[93]](#_93_56)

最后一個是，在每個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的國家都有影響很大的宣傳家，他們對別國的社會政策表現出濃厚興趣。如1890年代新西蘭勞工改革的主要設計師威廉·彭伯·里夫斯，他1896年被排擠出新西蘭勞工部后來到倫敦，很快被吸收進入費邊社，廣泛宣傳新西蘭社會政策。德國社會政治圈中有大量英國社會政策的崇拜者，從1860年受英國啟發創立希爾施—敦克爾（Hirsch-Duncker）工會組織的麥克斯·希爾施，到英國合作社崇拜者、德國信用合作社運動的主要人物赫爾曼·舒爾采·德里奇，到社會政策協會勞工關系著名專家路約·布倫坦諾。在德國社會民主改革派中，愛德華·伯恩斯坦和胡戈·林德曼都被1890年代倫敦進步人士的熱情深深吸引。[[94]](#_94_56)

世界性特征的典型例子是英國的威廉·道森。1880年代他作為經濟記者被派往德國，（像當時許多美國人一樣）找到了柏林的阿道夫·瓦格納經濟學講座，在那里以皈依者的迫切熱情，抓住了德國社會政治的初期萌動。他的前兩本關于德國的書（分別是關于拉薩爾和俾斯麥的）表現出讓人尷尬的過分熱情。他企圖創立一本英國刊物專門探討德國式“國家社會主義”，這一努力于1890年代初期失敗。但是經過這些魯莽的開端后，道森發現直截了當的報道是自己所長。1891年到1914年他又寫了九本關于德國的著作，近距離地、贊賞性地描述了德國社會政治的發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1908年，對于當時德國“權力崇拜”增長趨勢的新擔心讓他的語調清醒了不少，但是在英國沒有人比他更清楚了解德國的社會政治。當勞合·喬治需要德國社會保險方面的專家時，道森就被征召從事這個工作，他在政治生涯結束時仍是英國全國健康保險委員會的主要成員。[[95]](#_95_55)

在當時社會政治潮流瞬息萬變、兼收并蓄的情形中，道森一門心思借鑒德國經驗的行為異乎尋常。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他這一類人對新出現的進步政治十分重要。處于時代的經濟和社會力量交匯處，像道森這種國際社會政治經紀人擴充了思想、抱負、信息的交流，讓進步政治的國際紐帶成為可能。由于可以借鑒、修改的社會政治模式和項目的豐富資料儲備，這些人使讀者產生了解外國政治經驗的新渴望。這種渴望反過來把道森這樣的業余愛好者造就成為專家，為他們在政府內部以及政府之外的出版界贏得了同情的同盟者。有了這些資源，他們幫助了羨慕、挪用、競爭、宣傳、交流等國際交流模式的形成，在新的社會政治上留下獨特的印記。

這種世界性標記很難讓跨越國界的政治成為一模一樣的。社會政治的融合趨勢遭到深層次結構性差別的破壞，比如國家組織形式，以及始終存在、有潛在爆炸性的民族主義等。進步思想的成就比較適中：通過把政治想象力和當時趨同的經濟力量結合起來，暫時地把鋼鐵世界的政治集合在共同的框架之下。

來自這么遙遠的地方，美國人無法自動接觸在歐洲形成的聯系網和討論。正如我們看到的，讓他們保持距離的障礙既有物質上的也有文化上的：旅行的實際困難以及自己思想上對于新舊世界政治的海洋兩分法。但是，美國人慢慢地開始找到了跨越空間和思想障礙的道路。

早期的渠道是通過大學海外留學項目。從1870年代中期的涓涓滴滴到1890年代集體組織形式的潮流，一代學習經濟和社會科學的美國學生到德國攻讀研究生。他們漫游（Wanderjahre）式的日程從一個人傳遞到另一個人，直到固定下來成為通行的模式：在哈勒大學（Halle）約翰內斯·康拉德的經濟學討論課上學習一個學期，在社會政策協會的領袖人物古斯塔夫·施穆勒指導下寫一篇研究論文，幾乎總要在柏林聽阿道夫·瓦格納的講課，在他的課堂上展開關于古典經濟學的理論錯誤和倫理錯誤的熱烈討論。

更普通的早期交流模式是在勞工局內創立的。該局1885年作為勞工投票要求失敗的撫慰品而創立，但很快成為華盛頓主要的社會調查機構。其首次國際調查關注的是生活水平對比問題，（正如其他地方進行的類似調查一樣）傾向于給出讓本國人感到自豪的答案。但是該局的調查迅速得到擴展。在它的《公報》上，人們可以看到認真撰寫、資料翔實的報道，包括荷蘭窮人救濟工作、英國勞工調解機構、法國和德國公司福利政策、英國市營公共服務設施，還有典當業、公共澡堂、工人賠償立法、禁止童工立法、歐洲各國的工廠立法。1911年，當德國重新修改社會保險法律和英國推行《國家保險法案》時，該局都全文刊登了整個文件。[[96]](#_96_55)

有些翻譯和改編的工作是非常枯燥乏味的。在這個世紀結束之前，當類似的勞工統計局開始在歐洲成立以前，美國人獲得信息的愿望只能通過個人分發該局的問卷調查表的方式實現，發給盡可能多的外國政府官員、工會秘書、企業主，前提是他們肯花時間填寫。1900年該局的海外高級代表威洛比最渴望的事就是把這個乏味透頂的工作轉交給年輕的同事，乘下班船回家。但是這樣的經歷也成就了他的事業和專業知識。威洛比成功利用辛苦獲得的數據寫成美國第一部關于社會保險的書，開始了他的大學教授生涯。全國消費者聯盟首任主席約翰·格雷厄姆·布魯克斯1880年代第一次到歐洲旅行，為勞工局調查德國事故保險項目。紐約市最大的慈善房屋公司創立者古爾德起步于該局資助的歐洲公共和慈善住房項目調查。該局最著名的調查者可能是《新共和》雜志的創立者之一沃爾特·韋爾，他最開始是社會政治作家，專門搞歐洲鐵路雇傭條件的調查。[[97]](#_97_55)

另一種國際聯系是通過社會福音運動實現的。在北大西洋經濟體的每個角落，從早期的費邊社到德國福音派社會聯盟，到社會博物館恰當位置上的少數新教徒，進步政治內在地與社會新教主義糾纏在一起。作為社會福音派人士和記者在大西洋兩岸都非常有名的威廉·T.斯特德，是大西洋社會福音聯系網中的杰出人物。另外一位是基督教社會主義者布利斯，他是《費邊社文集》美國首版的資助者和托爾曼在“社會服務同盟”的合作者。美國和德國社會福音運動的紐帶從來沒有美國和英國之間那樣緊密，但是當芝加哥大學的查爾斯·亨德森1890年代開始報道德國社會新教主義的動態時，《美國社會學雜志》專門為他的報道提供版面。[[98]](#_98_55)

睦鄰中心運動是跨越大西洋的社會新教主義最著名的成果之一。在這里革新者是英國人。從1884年倫敦東區邊緣白教堂的湯因比館的開張，薩繆爾·巴內特的組織就成為吸引美國參觀者的磁石。簡·亞當斯1887年、1888年、1889年到此參觀。斯坦頓·科伊特曾在湯因比館住宿實習，他在下東區創建的“鄰里公會”（Neighborhood Guild）比赫爾館還早三年，是美國第一個睦鄰中心。理查德·伊利和瑪格麗特·德雷爾（仿效英國模式的婦女工會聯盟的創立者之一）1889年在湯因比館的參觀者留言薄上簽名。吉福德·平肖作為1890年到這里參觀的42個美國人之一留下簽名。來自波士頓安多福館的羅伯特·伍德、紐約學院睦鄰中心的維達·斯庫德、芝加哥西北大學睦鄰中心的查爾斯·朱布林、匹茲堡金斯利館的喬治·霍奇斯、澤西市惠蒂爾館的科尼莉亞·福斯特·布拉德福，在建立自己的睦鄰中心前都來參觀過這個圣地。[[99]](#_99_55)

不可避免地，美國和英國睦鄰中心的發展分叉了。美國運動根源于英國所不熟悉的女子學院關系網，比英國模式更迅速、更深刻地女性化。美國的睦鄰中心不同于湯因比館的牛津文化的矯飾（裝飾有典雅藝術展品以及煙斗之煙霧繚繞的閱覽室），其居民也不能很容易地借牛津劍橋的便利接觸到政府政策的制訂，它們對家庭、移民和鄰里關系等問題更警惕、更敏感。但是那種從一開始就防止美國睦鄰中心成為純粹慈善前哨的社會調查，則是倫敦原型的直接衍生物。美國睦鄰中心居民特別努力地維持與英國的聯系。赫爾館、格林威治館、麗蓮·沃爾德的亨利街睦鄰中心都充當了大量英國進步人士的客棧。在亨利街住過的人有格雷厄姆·沃拉斯（第一個居住在那里的男士）、帕特里克·格迪斯、瑪麗·麥克阿瑟和婦女工會聯盟的瑪格麗特·邦德菲爾德、早期工黨的基爾·哈迪和拉姆齊·麥克唐納等人。在海外改革者難以抗拒的落腳點赫爾館，簡·亞當斯吃晚餐的時候高聲朗讀亨麗埃塔·巴內特的信。1920年末期在芝加哥碼頭區的大學睦鄰中心，瑪麗·麥克道爾在她案頭為貝特麗絲·韋伯的傳記留了一個永久的位置。在芝加哥普善堂（Chicago Commons），格雷厄姆·泰勒把查爾斯·布思的照片放在圖書館非常醒目的位置。[[100]](#_100_55)

有時候社會新教紐帶會產生一些意料之外的結果。1880年代后期羅伯特·伍德在安多福神學院還是個年輕學生，早期的社會福音教師威廉·J.塔克挑選他來研究“社會經濟”課題。首先派他到紐約市調查社會主義和工會主義的關系，后來又派他在1890年到英國，在湯因比館居住半年。巴內特介紹他認識了社會福音運動領袖和慈善問題專家，如慈善組織協會的查爾斯·洛赫和查爾斯·布思、積極參與為倫敦窮人謀求定居點計劃的斯特德，以及《被拋棄倫敦的哀號》的作者安德魯·默恩斯。但是很快地，伍德對社會主義者的興趣超過對慈善家的興趣，勞工運動成為他最感興趣的工作。威廉·克拉克帶領伍德參與費邊社的討論（當時費邊社才成立六年），和他一起到英國北部工廠城鎮旅行，培養了他對新生的工會主義日益增長的興趣。在倫敦，伍德找到區工人俱樂部和襁褓中的社會主義運動。最重要的是，剛取得了1889年碼頭工人罷工的勝利，倫敦非技術工人的“新工會主義”讓他感到興奮。他認為碼頭工人約翰·伯恩斯是“了不起的人”；伯恩斯的合作者湯姆·曼是“英國當今社會最好的人之一”。伍德的《英國社會運動》總結了這些發現和1891年的熱情，是最早描述維多利亞時代后期英國外在的殷勤謙恭下面萌動的“社會民主”的書籍之一。[[101]](#_101_55)

伍德在費邊社的學習經驗將會形成一種典范，一種因重復而變得可以預料，甚至是公式化的事件。由于具備自我宣傳的杰出才能，費邊社成員組成了他們自己的跨越大西洋的關系網。他們中相當數量的人在1890年代都橫渡過大西洋。其中韋伯夫婦1893年游歷美國，從紐約到舊金山尋訪阿爾伯特·蕭、古爾德、布魯克斯（現在已經是老相識了）等人，還有勞工局的卡羅爾·萊特、西奧多·羅斯福、伍德羅·威爾遜（當時還在普林斯頓）、簡·亞當斯等。在這個十年內，格雷厄姆·沃拉斯、拉姆齊·麥克唐納、威廉·克拉克、伊尼德·斯泰西、帕西·奧爾登、珀西瓦爾·查布、約翰·W.馬丁都到美國做過演講。[[102]](#_102_55)

韋伯夫婦由于對美國政治的“幼稚”特征感到震驚，再也沒有重復訪美的經歷，但是其他費邊社成員形成了持久的跨大西洋的交往和聯系。威廉·克拉克成為亨利·D.勞埃德的好朋友，并且是埃德溫·米德主編的《新英格蘭雜志》的特約撰稿人。格雷厄姆·沃拉斯與幾十個美國人保持密切聯系，最后成為《新共和》內部圈子的成員。費邊社有些著名成員移民到美國，和布利斯一起在1890年代中期組織了位于紐約的費邊社美國分部，雖然壽命很短暫。一些美國進步人士加入了倫敦總部，其中有“婦女基督教禁酒聯合會”的弗朗西絲·威拉德、女性主義者夏洛特·珀金斯·吉爾曼、在成立“婦女工會聯盟”和“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中發揮關鍵作用的威廉·英格利希·沃林、睦鄰中心運動的查爾斯·朱布林。但是在費邊社看來成員身份并不比純粹的關注更重要。他們努力維持和鞏固美國紐帶，很快就使與韋伯夫婦喝下午茶和討論成為到歐洲訪問的美國進步人士的固定目標，就像愛好藝術的旅游者必然參觀大教堂一般。[[103]](#_103_55)

另外一個聯系逐漸增強的紐帶是國際會議。在1889年和1900年巴黎舉行的由法國人主導的社會經濟會議上，美國人只占很小的比例。在1900年“公共資助和私人慈善國際大會”的1639名成員中，美國人只有23名。巴黎博覽會那年夏天召開的“勞工立法國際會議”上，勞工局的威洛比和哈佛大學的約翰·卡明斯是僅有的兩位美國代表。但是在后來的一些年，美國人就多起來了。1910年巴黎舉行的失業問題國際大會有10名美國代表，同年夏天在維也納舉行的住房問題國際大會有28名美國人參加。如果不是發生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話，1915年的社會保險國際大會本來決定要在紐約召開（在美國首次召開這樣的會議）。[[104]](#_104_55)

自由派和進步觀點的雜志形成社會政治知識和交流的另外一個渠道。歐洲來信一直是人們熟悉的體裁，喜歡寫作的美國人如果不能在本地報紙上找到發表他（她）旅游感想的地方，那是非常罕見的。著名的政治旅行家威廉·詹寧斯·布萊恩等人動身時口袋里就有和報紙簽訂的合同，回國后把發表的文章集結成書出版。[[105]](#_105_55)旅游印象文體之外越來越多地加上了受特別委托進行調查的內容。阿爾伯特·蕭的《評論之評論》是斯特德的英國同名雜志的美國分支，是早期積極報道歐洲社會政治消息的渠道。很恰當地起名為《世界工作》的雜志是另外一個渠道。與社會福音有聯系的《瞭望》（Outlook，招募了曼斯菲爾德館的帕西·奧爾登和“新自由派”羅伯特·唐納德撰寫英國新聞）、《肖托夸會刊》（Chautauquan，在1904—1905年刊登了以“歐洲社會進步”為標題的系列報道），還有社會工作雜志《調查》（Survey）也是如此。

喜歡搜集揭發丑聞的報刊往往有世界性的好奇心。《麥克盧爾》雜志派雷·斯坦納德·貝克到德國看看他能在1900年發現點什么。它的對手《人人雜志》派查爾斯·拉塞爾在1905年到世界各地尋找社會進步最重要的事例。在“公益戰士”這一標題下，拉塞爾發表了很多文章，包括倫敦市政議會（LCC）的都市化工作（他用贊賞的口氣稱之為“樸實的、大膽的、不加限制的社會主義”）、瑞士直接民主、德國國家鐵路、澳大利亞工黨以及最熱情謳歌的新興新西蘭（這個現實的南大洋烏托邦）。有些雜志對海外進步潮流特別感興趣。本杰明·弗勞爾的激進刊物《競技場》（Arena）發表了大量他所說的“海外、外國實驗室”的報道。《新共和》創立的時候和英國的《國家》雜志有政治上的親屬關系，有不少作家同時為這兩家雜志撰稿。[[106]](#_106_55)

雖然好奇心和樂觀主義對這項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但有些最好的卻源于失敗。兩位最能干、最多產的世界改革記者亨利·勞埃德和弗里德里克·豪威，他們從事這個工作是出于挫折感和在家鄉陷入困境。勞埃德開始是芝加哥專于傳統經濟觀點的評論作家，1870年艱難時代把他震出了習慣的道路。他寫了一本憤怒揭露伊利諾斯州煤礦勞工關系的書，控告標準石油公司的壟斷行為，因此他一舉成名并積極投身民粹主義和勞工政治。到了1896年，他對民粹主義墮落成只是“自由鑄造銀幣”的政治感到沮喪，厭煩透頂。他給朋友寫信說：“我厭煩了亂翻污穢，我已經盡到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想開始砌墻，建造一個更美好的社會結構。”他不要成為理論家或者扒糞者，而愿做收集者——“沙拉”制作者（他后來說的），收集“歐洲和澳大拉西亞的所有好思想”。“烏托邦一直都有人寫，”兩年后他描寫自己的新政治信仰時說，

在我們發展到這個地步時，特別需要的是集中精力觀察世界不同地區在不同方面為“民有、民治、民享”而做出的各種事情。如果能夠激發美國人把所有成功的改革運用到自己的國家……用在城市管理、國家社會主義、自愿的合作社等方面，我們就可以在此地、在當下創造接近理想的烏托邦。

正是在這種心態下，他動身考察海外建設性的社會政治：英國和歐洲大陸的合作社運動、新西蘭的社會政治和強制性仲裁、瑞士的直接民主等。到了1903年他去世時，這些方面他都有著書。[[107]](#_107_55)

繼勞埃德之后向美國讀者宣講歐洲進步政治的著名人士弗里德里克·豪威有相似的經歷。他曾經在克利夫蘭市長湯姆·L.約翰遜的改革同盟中發揮過領導作用，但是當同盟在1909年陷入癱瘓時，他開竅了。漂泊中，他也動身到其他地方尋找成功故事。像勞埃德一樣，豪威把世界變成了圖書館，從中可以借閱現實的、經過檢驗的改革思想。很久以后他回憶道：“我曾經夢想社會民主，但我們需要的是事實。我要把德國、英國、瑞士、丹麥的成果集中起來，作為建設性民主的范例來展現，如果把國家看作服務人民的機構，我們也可能擁有這樣的社會。”[[108]](#_108_55)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十年，在這些溪流般匯合的對歐洲社會政治的興趣之中，還加上了受委托進行的調查研究。全國公民聯盟在1906年參與美國城市公共交通政治的激烈辯論，派出十五名專家組成的委員會考察英格蘭和蘇格蘭的城市公共所有權實踐。在1910年到1913年美國關于工業事故立法的辯論中，美國勞工聯合會、全國制造商協會以及若干州政府都組織了專門委員會，對英國和德國的經驗進行梳理以便從中吸取經驗教訓。由于城市改革運動的刺激，市政研究局的考察團1912年在法蘭克福花費四到五個月的時間收集高效城市管理的秘密。第二年夏天至少有四個由機構組織的歐洲考察團：喬治·普萊斯為紐約服裝行業的衛生控制聯合委員會考察歐洲工廠檢查方法，雷蒙德·福斯迪克為洛克菲勒資助的社會衛生局考察歐洲警察方法，另外一個歐洲社會保險調查是凱瑟琳·科曼為進步黨的信息中心做的。此外還有美國的歐洲農業合作和農村信用委員會，120多人的龐大考察團。有些美國旅行團不過是公費游玩而已，但是豪威和他的朋友林肯·斯蒂芬斯認為這種活動非常重要，所以帶領波士頓商會組織的80名商人在1911年游歷歐洲。[[109]](#_109_55)

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關心社會的美國人能夠參加特別組團到歐洲旅游。城市學院一位社會學教授在1911年為社會工作者提供暑期研修旅行，包括訪問倫敦睦鄰中心、英國花園城市、比利時合作社、巴黎托兒所。國際公民局（International Civic Bureau）1912年的歐洲城市旅游有豪威領導的籌備委員會。戰前最大的社會學大旅行，即教育旅游協會1914年的“公民和社會旅行”，計劃在歐洲旅行65天，帶隊者包括三位經濟學教授、紐約城市俱樂部的秘書、英國花園城市和城鎮規劃協會的執行秘書。旅行日程安排包括柏林的勞動仲裁法庭、帝國保險總部、慕尼黑職業學校、哥本哈根和布魯塞爾的合作社、阿姆斯特丹、利物浦和烏爾姆的城市住房、巴黎和法蘭克福的社會博物館、克虜伯和吉百利（Cadbury）工廠的模范工人住房、比利時流浪者勞改營、英國救世軍的失業者救助中心、杜塞爾多夫的兒童醫院、巴黎母嬰哺乳所、倫敦的公共澡堂、布魯塞爾的公共典當鋪，并且都穿插有關于城市規劃、住房、法國工團主義（syndicalism）、工會主義（trade unionism）和社會保險的各種研討會。除了對所有這些社會問題的熱忱，還有一些藝術畫廊參觀，以及到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鎮的莎士比亞故居參觀一個上午。[[110]](#_110_51)

《國家》雜志編輯在1914年夏天總結這些趨勢時說，我們美國人“不再瞧不起‘外國人’”。“很明顯，我們正在擺脫認為舊世界里沒有一個觀念適用于美國的態度。”[[111]](#_111_51)

美國和歐洲進步人士的利益和經驗交織在一起，對在大西洋兩岸起作用的社會力量的共同理解把他們團結起來，但是這種聯系的網絡不能夠消除跨大西洋進步事業關系中兩個長期存在的特殊性。第一是交流的不平衡性，第二是旅行的中介作用。

美國進步人士對歐洲同行經驗和觀點的借鑒程度遠遠高于歐洲人對美國的借鑒，這并非歷史的設定事實。在1880年代跨大西洋的激進世界中，影響最大的是美國激進經濟學家亨利·喬治。他對澳大拉西亞勞工政治的影響是決定性的，他1880年代對英國和愛爾蘭的五次旅行在這些島上引起轟動。喬治關于土地壟斷的演講刺激費邊社脫離了最初那種朦朧的唯心論。1880年代中期，喬治和他的勞工同盟在紐約市選舉中的勝利似乎成為定局。連馬克思的倫敦圈內也都認定首創精神轉移到了美國人手里。馬克思的女婿愛德華·艾威林1886年應德國移民社會主義勞動黨邀請到美國宣傳馬克思的正統思想，回來后反而向倫敦聽眾暢談喬治的“大帳篷”勞動黨。1889年錫德尼·韋伯寫道：“英國當前流行的社會主義運動可以說完全始于《進步和貧窮》在這里的傳播。”這也不過是稍微有些夸張。[[112]](#_112_51)

激進的和漸進的歐洲人在此后幾十年里繼續前往美國朝圣，從美國帶回社會政治觀點和革新思想。在1920年代費邊社的《讀什么？》小冊子里既有英國文章也有美國文章。[[113]](#_113_51)美國人的進步實驗如緩刑和少年管教法庭、公共公園和運動場、勞工統計局、女性選舉權，尤其是公共小學教育，都給歐洲進步人士以長遠的影響。從政治上說，正如1918年末伍德羅·威爾遜到達歐洲時的歡迎人群所清楚顯示的那樣，美國式民主的前景仍然魅力無窮。

但是，把這個清單和歐洲向美國傳遞的新方案清單并列起來，人們肯定發現美國方面嚴重入超。從睦鄰中心到分區條例，從勞工立法到農業合作社，從城市所有的交通體系到社會保險，這些從歐洲向西傳到美國的社會政治實驗比相反方向的傳播多幾倍。跨越大西洋的進步思想聯系不是單行道，但是在1870年到1940年期間對于美國參與者來說，沒有比“極端不平衡”這個詞更恰當的描述了。

這種不平衡的難堪跡象之一是歐洲進步人士對美國政治的興趣明顯減少。肯尼思·摩根在這個時期寫到，在美國人對英國進步政治的注意力“連貫和持久不斷”時，相反方向的興趣“從最好處說也是間歇性的、部分的”。[[114]](#_114_51)馬克思對美國政治的幻滅更是眾所周知。韋伯夫婦的失望出現得更早，兩者都受到理論的強烈驅使。

阿爾弗雷德·齊默恩1911年和1912年尋找進步美國的七個月朝圣之旅更能說明問題，也更讓人辛酸。剛剛研究了古代雅典的平民共和理想，齊默恩來到美國，心中充滿了古代和現代的公民政治文化理想，努力在新世界尋找政治活力的中心。在紐約，他參觀了聯合慈善大樓，搜尋該市的著名社會主義者，和西奧多·羅斯福共進午餐，出席群眾抗議大會紀念在服裝廠大火中因為被鎖在“三角女式襯衣公司”頂樓而遇難的146名工人。他觀察了一次選舉，參觀了下東區公立學校，那里的移民孩子向國旗敬禮“真正讓我感到美國是自由的土地”。他寫到“東區從某方面說是可怕的貧民窟，但是和英國的貧民窟不一樣，因為這里的人們充滿活力、希望和快樂”。去南方兜了一圈，試圖尋找杜波依斯未果之后，他來到威斯康星州麥迪遜。他熱切地寫道：“國家實際上是由大學來管理的，籠統地說……這里的經濟學學生是立法者……每個問題都先在課堂上辯論過了之后才會到立法部門辯論。”大學里有約翰·康芒斯（齊默恩認為此人可以說是美國的錫德尼·韋伯），議會立法文獻圖書館里有查爾斯·麥卡錫，真正的政治科學好像就已經實現了。[[115]](#_115_51)

齊默恩給妹妹寫信說“很多新思想可以用在國內”。但是從那以后，進步美國的形象崩塌了。他和美國人交談得越多，他的信心就越小。芝加哥野蠻的、徹頭徹尾的資本主義讓他不知所措。美國鋼鐵公司的模范城市，印第安納州的加里（Gary）在他看來是個可怕的堡壘。六個月后，他給家里寫信說：“我早已放棄把美國看成進步土地的想法。我的思想中剩下的唯一問題是它比英國落后多少年。我覺得大概落后80年，而且發展速度還沒有我們快。”[[116]](#_116_51)

到了齊默恩提到這個話題時，美國落后的說法已經在歐洲進步人士中根深蒂固了。有時候它是作為不屑一顧的籠統用語，如費邊社的皮斯在閱讀了約翰·格雷厄姆·布魯克斯對美國勞工關系的最新報道后總結：“在涉及人作為社會和思想存在的方面，美國比我們落后若不是幾個世紀，至少也落后幾十年。”有時候說法比較準確，如英國勞工運動支持者J.R.克萊尼斯指出，在勞工立法方面1909年的美國落后英國20年，在工會發展方面落后15年。不管怎么說，美國人很難認識不到外國人的看法：從政治和社會上說美國是發展停滯的國家的典型。[[117]](#_117_51)

像這樣的判斷不斷積累只能強化美國人的局外人意識，以及他們作為大西洋交流中的小伙伴的地位。對于這種邊緣化意識，大西洋進步交流的第二個持久因素增加了其分量。那就是美國參與者與新社會政治網絡的中心在地理上的距離。1900年巴黎博覽會上，美國人是后來者，迫切渴望占一個位置，了解一些信息。正是這種天生的地理關系讓美國人在遇到歐洲社會政治時，往往手里拿著介紹信，像到遙遠的地方短期考察旅行一樣。

從遙遠的地方過來，美國人很少看到正在建設的東西。“成品”（finished）這個詞如同線索貫穿在他們的記錄中。來自一個在他們看來充滿了碎片殘余和未完成事務的政體，他們要尋找實際的成就。對于建設成品而不是建設過程的強調常常模糊了歐洲社會政策制訂的政治。在德國的美國進步人士很少充分地認識到威廉皇帝時代的德國（或后來魏瑪政治時代）異常緊張的政治局勢。他們把約翰·伯恩斯當作偶像，而實際上伯恩斯已經成為早就爆發過的火山的灰燼了。到歐洲來尋找經受過檢驗的社會政治措施，讓他們強調那些能夠帶回去的措施的好處，而不是強調促使那些措施形成的同盟關系。這加重了他們以發明和理性設計的角度看待政治的傾向，這個概念讓他們不止一次極度失望。

他們從大老遠過來并且不斷對看到的東西感到吃驚，也促使美國社會旅游者的頭腦中產生落后他人的意識，這正是歐洲進步人士對美國的典型評價。正如我們看到的，19世紀后期來歐洲的美國旅游者傾向于不是用滯后而是用二分法來做比喻。19世紀末期在德國留學的美國學生把德國描述為雙面神（Janus）一樣的國家：既現代又反動。亨利·勞埃德從來沒有徹底解決謙恭和傲慢的平衡。他在愛國心澎湃的時候寫給弗蘭克·帕森的信中說：“我們從歐洲可以學習的東西很多，但是我們在未來一刻鐘內就要反饋給他們更多的改革，比他們在全部歷史上想象過的都多。”[[118]](#_118_51)

但是在抓住滯后的比喻時，一些美國人最終得以超越曾經主宰大西洋對比語言的極端對立和夸張。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十年，新術語已經深深扎根于美國許多進步人士的自我意識和語言中。“我們是否應該總是……‘站在路邊看著人家的隊伍前進呢？’”威斯康星的查爾斯·麥卡錫在他自己第一次到進步歐洲朝圣之后寫道，“我們是否總是聽返回的游客講述世界各地進步的故事，用狹隘和沾沾自喜的態度，愚蠢地相信我們不需要學習別人？而實際上我們面臨著每個國家在歷史上都一度遭遇的問題。”新舊世界的關系已經發生改變，現在成為進步道路上的長跑比賽。美國不是在時間上或者空間上與歐洲領先國家遠遠分割開來的世界，而是越來越像“地球上偉大民族中的隨軍商販（camp follower）”（正如《競技場》的一位作者寫的），一個落伍者，它就是落后了。[[119]](#_119_51)

考慮到北大西洋經濟體社會政治之間影響與聯系的深刻程度，考慮到“社會問題”的多面性、解決這些問題的途徑和渠道的復雜性，顯然，認為世界政治可以想象成為長長的參賽者隊伍在進行一場追求進步的賽跑，一個追著一個，這種比喻就像它取代的比喻一樣是牽強附會的。社會政治措施和抱負在傳播時的快捷特征，天生就意味著任何地方的具體混合成分都是不穩定的。競爭的各方沿不同的努力線路而分離，交互向前躍進。

但是比賽的形象指出了進步事業的明確方向，讓美國進步人士加強了緊迫感。查爾斯·亨德森對比美國和歐洲在兒童福利方面的方法后指出：“地球上最偉大的國家慢慢爬行在人道主義游行隊伍的后面。”弗里德里克·豪威的俄亥俄同盟者布蘭德·維特洛克重復了這個說法：在“新”舊世界學習民主的時候，“‘舊’新世界現在仍然對一個世紀前歐洲就解決了的城市問題敷衍應付、猶豫不決”。1912年在蘇黎世參加國際勞工立法協會會議的美國代表團承認，“看到美國被歸于落后國家行列的確讓美國人的神經難受”。但是來自落后國家的使者的意識明確了美國人的任務，那就是趕上世界上的進步國家，借鑒、修改別人的經驗，把別人的經驗用在美國環境中。[[120]](#_120_49)

落后者與領先者的比喻還幫助美國進步人士抵擋了對手們準備拋來的政治烏托邦主義指控。這讓他們的理想主義表現得理智而實際。本杰明·德·威特1915年寫道：“許多人認為進步運動建議通過立法進入千禧盛世。沒有什么比這更遠離自稱進步人士者的思想了。他們提出的建議是要讓美國在矯正性立法方面迎頭趕上德國及其他歐洲國家。”趕上世界上的“文明”國家是進步人士的持續主題。簡·亞當斯支持西奧多·羅斯福在1912年進步黨大會上的提名時，公開宣稱這一點：“新黨已經成為世界范圍內創造更公平社會這一運動的美國倡導者。在這個運動中，落在其他國家后面的美國在政治行動方面一直推三阻四，很不負責。”講這種話的人容易被指控說其項目不考慮美國國情、不適合美國特殊的政治傳統，這或許是事實，但這種言論也有相反的優勢。具有世界主義思想的美國進步人士承認新舊世界政治文化的鴻溝，努力把它轉變成可以克服的差距，因為那不過是在時間上落后他人而已。[[121]](#_121_49)

盡管這種重新確定大西洋關系的做法很牽強，但并非完全錯誤。他們說美國社會存在野蠻激烈的對抗，迫切需要新機構來控制沖突，促成社會融合，這種描述顯然是不錯的。他們堅持認為世界市場正在造就的社會背后存在著共同的經濟和社會力量，認為可以借鑒其他國家的社會政治經驗，這種觀點也不錯。就連美國落后這個觀點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雖然美國進步人士在極端失望的情況下可能顯得有點夸張。在政治民主方面，美國領先他人，而一直讓市場資本主義經濟自行發展，但是現在他們發現曾經崇拜美國的歐洲人已經把注意力轉向別的地方，即民主的社會任務。

“我們不再是上帝盟約壁龕的唯一衛士。”沃爾特·韋爾在1912年的《新民主》開篇中說，“歐洲不再匍匐在我們腳下學習民主的簡易課程……外國觀察家在描述我們體制時的意興闌珊讓人感到屈辱。”他接著說：“今天反轉過來了。美國不再向滿懷期待的世界講授民主，而是自己到歐洲和澳大利亞取經了……我們的政治和工業民主學生反而到澳大拉西亞、英國、比利時、法國和半封建的德國去留學。為什么歐洲烏龜跑到美國兔子前面了呢？”[[122]](#_122_49)

這種心態是美國進步人士主要的成就之一——暫時從圍繞在身邊的“地球中心論”意識中解脫出來。落后的國家是能夠奮力追趕的國家。在那個時代的民族主義背后，擔心世界可能已經超過美國這種思想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成就。它通過新政對美國政治產生的影響比任何歷史學家指出來的更廣泛、更深遠。因為遭到內向的反作用力，很難期待這些對于美國政治自足性的惱人懷疑能輕易贏得勝利。即使在想象力的領域，也沒有清晰可見的勝利。但是越過新舊世界之間橫亙的大洋，美國進步人士開始慢慢認識到——在想象中曾經是國王和天主教會控制的世界，有可以借鑒的模式、可以聯合的同盟者、潛在可用的經驗寶庫，有意料之外的進步歐洲的輪廓。

# 第三章 自由放任經濟的黃昏

## 自然行為和社會欲望

非常明顯的是，美國人與歐洲社會政治的更多接觸中第一條線是思想交流。它不是通過政黨、議會、考察團或者費邊社的交往，而是通過19世紀末期德國的討論會和演講大廳。它的典型標志是經濟價值的語言：針對新鋼鐵世界的倫理核心的爭吵，其黨派成員稱為針對自由放任的爭吵。

像大西洋進步紐帶的許多后來的線索一樣，德國大學紐帶開始時比較低調，甚至是隨意性的。雖然如此，從第一批美國人到德國攻讀經濟學研究生學位的1870年代中期，到留學生潮流達到高峰的1890年代末期，年輕的一代進步知識分子發現自己是在一個異常廣闊和活躍的國家陰影下，在一個對于自我運行、自我管理的市場爭吵不休的政治文化中，用外語作出自己的政治和經濟承諾。回到國內后，他們建立和充實了美國進步改革的許多重要機構，在廣泛的社會政治嘗試中留下德國經歷的痕跡。

既是與歐洲新社會政治的第一個機構上的聯系，德國大學紐帶也是第一個遭到否認的。1870年代和1880年代在德國學習過的美國年輕進步知識分子重新進入美國學術和政治爭議的大熔爐后，慢慢了解到選擇性記憶的好處。為了躲避“非美國主義”之類誣蔑性的帽子，他們堅稱自己的社會政治是純粹正宗的美國貨色。他們的主張來自伊利諾斯的大草原和“密西西比河谷的自由空氣”，理查德·伊利為他這一代人代言，雖然就他本人來說顯得特別言不由衷。這些主張不是發源于外國背景，而是直接來自美國本土的傳統和經濟現實。[[123]](#_123_49)由于1914年德國戰爭突然爆發而產生的厭惡掐滅了任何深刻思考的欲望。他們認真記錄的多部課堂筆記都留在檔案室里漸漸落滿灰塵，里面包括施穆勒的國民經濟、特萊希克的政治學、瓦格納的財政學、格奈斯特的普魯士憲法和行政法等。[[124]](#_124_49)

但是德國大學紐帶實際上產生了持久的歷史后果，不僅沖擊了昏睡中的美國大學，讓它們發生改變，也影響了跨越大西洋的社會政治本身。它打消了一群年輕美國人的地方性眼障，給予他們參與思想和政治改革方面國際運動的持久意識，用制訂政策的抱負和借來的影響公眾的新模式喚起他們的激情。更重要的是，德國大學紐帶形成了一個背景，在此背景下一代年輕的進步知識分子克服了北大西洋經濟體中社會政治最可怕的思想障礙：一個認為這些努力本身是愚蠢行為，乃至于是“不自然的行為”的思想體系。

“自由放任”（Laissez-faire）是批評家用來專指這個思想體系的名稱。德國人使用的詞匯是“英國經濟學”，顯示該思想的地位多么深刻地依賴于在19世紀中期躍升為世界經濟主宰的英國。其含義并不像后來常常提到的那樣，意味著國家僅僅成為悠閑的守夜人。即使在1850年代和1860年代自由放任經濟學家影響最大的時候，英國的國家之手仍然干預眾多領域，不僅有軍事和帝國事務而且包括經濟和社會事務。英國對于婦女和兒童勞動方面的法律限制、煤礦和工廠檢察員、英國的衛生管理規定、為窮人提供幫助的規定等盡管有明顯的不足，但和19世紀中期北大西洋經濟體的其他國家相比，發展都更充分。實際上，古典經濟學自由主義核心的原則（個人自由的領域可一直延伸到別人自由的邊界，但不能越過這個界限）能夠給予國家守夜人相當程度的活力。[[125]](#_125_49)

但是，即便歷史學家潛心尋找都未能找到純粹的管理休眠時代，自由放任時代也不僅僅是批評家們的回顧性建筑。不管自由放任還意味著別的什么，它首先意味著把經濟健康運行的主要責任從政治轉移到市場，從考慮國家利益轉移到考慮各種私人欲望。這是亞當·斯密的核心觀點，即國家的財富不是由重商主義國家天生拙劣的操作來促進的，更多是因為私人買賣所推動。正是因此，1846年廢止英國對谷物的保護主義關稅在自由放任的象征性歷史中如此突出，它被看作自由貿易與政府管理貿易的戰場。“古典”經濟學家不僅把權威衣缽從公共當局轉給私人競爭，從國家轉向追求自身利益的商人、企業家和制造商的勞動，而且還有很多其他貢獻。但毫無疑問，古典經濟學特別看重組織商品和勞動的競爭性市場的那些人的活動和行動范圍。

私人野心和欲望的工作不僅僅比國家努力更有效率，更加根本的問題是堅持認為私人貿易和討價還價的行為更“自然”。就像經濟責任從國家轉移到商人、企業家一樣，這個觀點有深遠的影響，它促進了經濟學修辭上的轉變，從政策語言轉向科學規律的語言。而且，它把經濟行為中的討價還價、難以駕馭的競爭提升到了更高級的抽象領域——市場，它被重新想象成為自然的、自動的、完全自我管理的特殊領域，它和其他社會活動的一切關系被剝離掉了。在生產和貿易領域，平衡的力量持續在起作用，只是由于“外來”的干預才會使個人欲望的自動力量有遭到破壞的風險。

私人的、追求自身利益的經濟行動之自然性可以有無窮盡的不同解釋。亞當·斯密說 “自然自由體系”，威廉·皮特在1795年擔心國家行為可能“阻礙”和“破壞”那種使價格、工資和貿易“總能自己找到合適水平”的過程，這都是自然性的表現。九十年后，約翰·格雷厄姆·布魯克斯在他的社會經濟講座中往剪貼簿上貼了一個風帆，宣稱在經濟問題中“應該首先考慮”的是“自然”，而不是勞工或者改革者多愁善感的欲望。這說明這個主張從來沒有失去它的力量。[[126]](#_126_47)

自由放任的宣傳家們沒有一個把天然和人為的區分推進到排除任何形式的國家或者社會管理。約翰·斯圖爾特·穆勒斷言說他“不知道（政治經濟學）有哪一條實際原則必定能適用于所有情況”，此話也同樣可能出自亞當·斯密之口。古典經濟學的力量比它的教條更加微妙，阿爾弗雷德·馬歇爾嘲笑這些教條都是“一些簡單的小故事，聰明的家庭女教師用它們來向圍繞在身邊的小孩子說明經濟真理在哪里”。它與其說是歸納出來一個原則，倒不如說是圍繞市場行為畫了一個特權的圈子。里面是自然的領域和“貿易的自由”，外面則是政治和社會。外來力量或許會管理、干預或者干擾，有時候有積極作用，更多情況下往往妨礙財富的創造。不管怎么樣，在自由放任的思想體系中，這類行動被看作闖入經濟過程特殊領域的外來者。自由放任不是絕對事物，而是舉證責任問題，它把這種責任如一座大山般堆在國家經濟行動面前。即使以靈活性著稱的思想家穆勒也從來沒有放棄這個基本觀點：“總而言之，自由放任應該是通行做法：除非為了特別重大的善，任何違背都是一種罪惡。”[[127]](#_127_47)

自動運行的經濟原則如果純粹建立在邏輯的基礎上，本來就夠讓人望而生畏的了。更何況，它還得到自由行動的自我觀念的支持，這種觀念存在于19世紀資產階級道德文化的最深處。如果自由選擇的行為是道德行為，“自由”貿易和交換就不僅具有經濟功用，而且成為道德成長的領域。這使得古典經濟學生硬的、有時候帶有宿命論色彩的教訓具有了道德含義，使它對國家的懷疑披上了倫理色彩。它把自我幫助和自力更生放在道德范疇的一側，把“干預性的”國家那種讓人窒息的“監護”，那種把公民當作小孩一般管教的“牽引繩”放在另一側。經濟上的“家長制”不僅把插手的事務搞得一團糟，還抑制了被牽住手的那些人的道德成長。集體政治行動與個人道德行動似乎成為“零和游戲”的一對冤家。私人市場行為的價值被人從經濟學規律一下子拔高到了社會道德的層次。

“自由放任”這個詞所集中起來的所有這些意義，構成了在力量和后果方面不可小覷的思想體系。其主要內容包括對國家行動笨拙性的普遍猜度和預設、對私人自我以外任何經濟主體的微妙去自然化，把充滿傾軋、哀號和殘酷競爭的早期現代市場從讓人懷疑的領域重新塑造成為自動平衡和道德自由的天堂。由于英國經濟增長奇跡的推動，這個觀點就隨著英國商品和影響力迅速傳播到世界各地。

美國作為英國的文化前哨，更早更深刻地接受了這個新經濟思想。在19世紀中期大西洋兩岸，從文化大都市到文化鄉村的教材、教學故事、布道、辯論、政治原則都充斥著對英國經濟學的簡單化總結，好像整個圖書館都被轉移了。19世紀美國人像英國同行那樣，也并沒有吞下自由放任思想在實踐上的全部必然結果。盡管英國貿易政策發生了巨大的革命，19世紀的美國國會卻拒絕調整步伐。自1816年以來，保護性關稅就是美國貿易政策的固定特色，是靠它保護市場的生產者堅定不移的信念（雖然受到強烈質疑）。在那個世紀前五十年，美國投資資本很少，國家資金和信貸保證了許多運河和鐵路上的早期投資。19世紀美國經濟是欠發達的經濟。企業家很少不用期盼的眼神渴望國家成為他們的促銷伙伴。[[128]](#_128_47)

大眾對于政治經濟學的理解更加復雜。正如威廉·諾瓦克最近重新強調的，即使是古典經濟學在大西洋兩岸如日中天的時期，國家在經濟活動中的角色在美國州政府和地方法典中也從來沒有消失過。19世紀中期法律記錄仍然充斥著公害法、貿易執照法、消防法、防止商業欺詐和勒索的措施、管理有害貿易的措施、促進公共道德的措施等。這些經濟立法中有些是老的，是17世紀18世紀管理良好的國家那些廣泛的經濟權力和許可權力的殘余，是在古典經濟學家開始大拆除工程之前就有的。其他一些內容是新的，比如，州議會和市議會漸漸豐富的公共衛生立法。其中許多措施對于財產所有者來說造成看得見的成本提高：有些措施不過是象征性立法，即便立法時打算要認真執行的法律也只得到斷斷續續的執行。像在大西洋經濟體其他國家的立法一樣，美國立法間歇性地在普遍的福利考慮和“自動運行”的市場那種自我限制性新意識形態之間徘徊。能最清楚地顯示自由放任思想影響力的不是法規匯編中的例外條款，而是在信念領域，即把公共經濟行動視為“自然”經濟法規和經濟“自由”領域中的“干預”因素。[[129]](#_129_47)

19世紀美國思想界的特殊組織形式對這些信念起了重要的強化作用。教派設立的大學在北大西洋經濟體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像這樣占據支配地位。學校管理委員會由牧師和企業捐款者組成，教學上依賴測驗和背誦，辛苦灌輸教材內容，哲學上致力于知識的總體邏輯，逐級上升，一直到大學校長自己教授的道德哲學的最高課程。

后果之一就是對簡單化觀念和過時觀念的結構性支持。1870年代中期埃德蒙德·詹姆斯和理查德·伊利在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經濟學時，講授的課程仍然是米利森特·福西特的《政治經濟學入門》，（正如她自己所說）該書是專門為中學生準備的。1870年代初期美國經濟學教授群體中有牧師、編輯、倫理學家、社會活動家，但是除了耶魯大學的弗朗西斯·沃克外，幾乎沒有哪個人在學術上的貢獻明顯超過教材中重新包裝的英國經濟學權威思想。在大學之外，辯論的范圍較為廣泛，像亨利·凱里這樣的記者和企業家試圖把關稅保護主義變成更全面的社會經濟學，但是大學體制讓凱里得不到學生和機構基礎的支持。[[130]](#_130_47)

正是因為這些原因，即使在一個把自由貿易當作英國奢侈品拋在一邊，給予鐵路和退伍軍人大量慷慨資助，列舉出自由放任規則的幾十種關鍵的例外的國家，這個信念本身在19世紀中期逐漸扎根并不斷發展。1880年代，有實踐經驗并了解大學經濟學現狀的阿爾伯特·蕭堅信“所謂的英國政治經濟學在其本國的教條主義信徒沒有像美國這么多”，也沒有這種充斥詭辯的文獻。弗朗西斯·沃克的評價給人留下的印象最為深刻：“雖然自由放任的思想在英國被廣泛肯定”，但沒有一個英國經濟學家“用美國這么嚴格的定義來理解它。在美國，它不僅成為經濟學正統思想的檢驗標志，甚至成為判斷一個人是否可以成為經濟學家的標準”。[[131]](#_131_47)

同樣的經濟學主張在同一時期也進入歐洲大陸。在法國，人們迅速且充滿熱情地接受這個主張，雖然保守派、社會天主教徒以及一小撮持異見的“社會經濟學家”表現出懷疑，但是在學術界和主流媒體評論中，查爾斯·紀德所說的“樂觀派”席卷了經濟學思想。[[132]](#_132_47)在抗拒的聲音相當強烈的德國，早在1790年代就可以在大學里聽到亞當·斯密的觀點。19世紀初期普魯士國家機構偉大的自由改革就是從英國榜樣那里獲得權威性的——這些改革包括消除同業公會對貿易的壟斷，解放農民對土地的依賴。但是在1848年和1866年間，在這個被詹姆斯·施翰稱為“自由貿易和企業自由的黃金時代”的德國，英國政治經濟學的概念深刻滲入自由派政黨、大學和官僚階層。所有這些都與人們對英國自愿性自助機構和中產階級習慣的濃厚興趣緊密聯系在一起：友好協會、工人協會和合作企業等。就連年輕的古斯塔夫·施穆勒在1864年也仍然肯定引進的正統觀念——盡管他1870年代帶頭攻擊英國經濟學。他在出版的第一本“勞工問題”著作中承認：“自我幫助和自我負責是解決我們時代困境的唯一辦法。”[[133]](#_133_47)

但是正因為德國的政策傳統和英國的形成鮮明對比，比歐洲其他地方或者美國的情況更明顯，所以自由放任思想遭遇的反對聲音也最強大、最迅速。早在1840年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曾經試圖表明，英國式的自由貿易只能擴大發達國家與德國以及他曾經客居八年之久的美國等發展中國家的差距。在此后幾十年里，李斯特進一步闡述自己的理論，企圖揭穿英國經濟學家自然法則學說背后的經濟利益真面目，成為德國反對派的號召力量。自由放任經濟不是天然的、普遍的科學，反對者如是說。它是英國出口品生產商的意識形態，是“曼徹斯特經濟學”、棉花紡紗機的信條。

從一開始，年輕德國經濟學家的反叛就伴隨著工業資本主義動蕩期間創立獨特的德國路線的渴望。到了1872年，自由貿易主義（Manchestertum）的批評家們已經形成了自己與之抗衡的經濟組織：“社會政策協會”，該組織里的年輕經濟學教授發誓要反抗英國經濟思想的“暴政”。它的創立宣言中說：“我們相信，部分對抗性的、不平等的個人利益那種不受約束的統治無法保證公共福利。”國家干預不是緊急性的權宜之計，不是一種“必要的惡”，而是“要實現我們時代和國家的最高任務之一”。[[134]](#_134_45)

反叛的經濟學家并沒有獲得全面勝利。他們剛一組織起來就被扣上了“講壇社會主義者”（Kathedersozialisten）這個爭議性的綽號。到了1874年，普魯士歷史學家中的新星海因里希·馮·特萊希克在攻擊中又添加了獨特的刺耳聲音，指控自由貿易主義的批評者們是為群眾性社會主義革命搞宣傳。第二年在柏林，年輕的亨利·法納姆的目光被書店櫥窗里展示的書吸引住了，這就是特萊希克的攻擊《社會主義及其保護者》，旁邊是施穆勒的反批評。從1870年代中期第一批美國留學生踏上德國土地的那個時刻起，德國的經濟討論就陷入歐洲其他地方所沒有的激烈辯論之中，自由放任成為辯論的焦點。討論甚至出現在與自由貿易時代正式決裂的1878—1881年之前——當時俾斯麥轉向貿易保護主義，把社會主義活動定為非法，清除了管理層中有親英國傾向的官員，在1880年代推行他的國家社會保險立法工程。[[135]](#_135_45)

1870年代實際上是北大西洋經濟體中經濟學家們充滿懷疑和關系緊張的十年。在法國，1870年代后期，經濟學作為大學法律院系一部分的制度化建設，意外帶來了一群年輕的、受過法學訓練的經濟學家，他們對自由放任的正統思想遠沒有當記者的前輩那么感激。在機構上說，那些支持新學派、豎起耳朵聆聽德國聲音的法語宣傳家中許多人仍然處于邊緣地位。埃米爾·德·拉維勒耶1870年代在列日大學教書，紀德在外省蒙貝利埃教書，但到了這個十年結束時，就連巴黎的法學院也包括了一位引起爭議的著名經濟干預主義者（interventioniste）。[[136]](#_136_45)

在英國，對古典經濟學確定性的悄悄退卻出現得更早。沒有像法國1870年代的機構重組和德國1870年代非常明顯的社會危機意識，英國經濟修正主義很少表現出它的大陸親屬那種激烈辯論。盡管如此，看一看當時的思想變化傾向，從凱爾恩斯（J.E.Cairnes）和斯坦利·杰文斯1870年代初期首次出版的批評意見，到阿諾德·湯因比1881—1882年從倫理學上對工業革命進行攻擊的演講，任何敏銳的讀者都不可能忽視古典經濟學在本土遭遇重大懷疑的事實。約翰·穆勒的《政治經濟學原理》一版再版時不斷添加限定性條件，也說明了同樣的事實。[[137]](#_137_45)

在國際社會普遍感到幻滅的背景下，美國經濟學教材中的死板教條很難長久維持下去。在這里，1870年代的經濟逆轉和激烈的勞工沖突也給古典經濟學的確定性帶來很大壓力。從《國家》雜志間或對“講壇社會主義者”的嘲諷，到英國評論或者是本國弗朗西斯·沃克的修正主義，1870年代的美國經濟學學生不能不感受到大西洋兩岸思想動蕩的反響。[[138]](#_138_45)工業資本主義在美國迅猛發展的負擔是不能被否認的。在自由放任經濟的黃昏，他們不可能一直保持如日中天的盛況。

但是，經濟學思想的轉變就像19世紀末期經濟本身的交流一樣是通過國際渠道展開的。19世紀美國經濟學首先成型于英國政治經濟的沖積沉淀，通過德國激烈的迂回曲折重新得到創造。一代美國學生在飽受簡化和修訂的自由放任信條的文化熏陶后意外地發現，他們所到的國家對古典經濟學的攻擊比歐洲任何地方都更加猛烈。從一個在政府管理結構和控制方面明顯虛弱的國家出來，他們開始觀察歐洲影響最廣泛的國家文化。強烈對比的沖擊和最初的無所適從，從政治思想落后地區突然進入思想精神的現代城市而產生的興奮和激動，成為后來的社會政治旅游者思想經歷的基本模式。突然從美國經濟學教材“清晰純粹的推理”中被拋出來掉進充滿爭議的大海，既讓人興奮又讓人困惑。[[139]](#_139_45)這種遭遇肯定造成離經叛道思想的大爆發，既不是本土的也不是德國的，而是兩者結合的產物。

沒有人有意識地建立德國大學在經濟學上的紐帶關系，更少有人預測到它的重要性。有好幾個對美國經濟學產生重大影響的人到達德國時心里渴望學習的是其他科目。理查德·伊利1877年到哈雷大學本來是要學習哲學的，只是發現自己選擇的哲學家已經退休，他才在哈雷一位年輕美國人西蒙·帕滕的帶領下進入約翰內斯·康拉德的經濟學討論課。帕滕自己也是抱著學習哲學的志向來德國，被哈雷的另一位年輕美國人埃德蒙德·詹姆斯拉到了康拉德的圈子里。[[140]](#_140_45)

即使在這種聯系達到最高峰的時候，德國大學也從來沒有壟斷美國的海外留學項目。在1890年代，查爾斯·比爾德到牛津大學，很快迷上了那里獨特的基督教社會經濟學。1895年后有些人發現了費邊社新創立的倫敦經濟學院，伊迪絲·阿伯特就是一個例子，來的時候剛趕上韋布夫婦開始“終止”英國濟貧法的運動。還有的人來到巴黎的索邦大學（Sorbonne）或者巴黎政治學院，[[141]](#_141_45)但是德國大學擁有體制上的強大的吸引力。德國大學是開放的公共機構，與牛津和劍橋等大學城中封閉的、貴族主宰的、奢華的學院不同。也不像法國大學那樣醉心于培養大批律師、醫生、公立中學教師等職業人才，德國大學的思想觸覺就像19世紀的學術本身一樣廣泛。1889年的學費非常便宜，人們估算在德國一年的費用加上往來大西洋的交通費，也只有在康奈爾大學、哈佛大學或者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一年費用的三分之二。哲學、歷史、語文學、神學等德國學術水平享有國際聲譽的學科自19世紀初就吸引了美國學生。1870年代留學德國的首批美國經濟學學生就進入了這些早就存在的軌道和優勢中。[[142]](#_142_45)

德國紐帶一旦形成，校友們就竭力維持他們熟悉的制度。埃德蒙德·詹姆斯派了一批又一批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Wharton）經濟金融學院的研究生到康拉德在哈雷大學的課堂學習，1890年代初期人們在那里經常可以發現10到15個美國留學生。詹姆斯幫助沃頓學院在教員中增加了一批德國學術背景的經濟學家：西蒙·帕滕、羅蘭德·福克納、薩繆爾·林塞、列奧·羅韋、亨利·西格、艾默里·約翰遜、約瑟夫·約翰遜。哥倫比亞大學是另外一個德國背景經濟學家集中的地方，那里也經常派研究生到德國完成經濟學最后階段的學習。[[143]](#_143_45)

19世紀后期留德的美國學生很快建立了相互交流和幫助的亞文化團體。1891年被詹姆斯和帕滕派到哈雷大學的薩繆爾·林塞對自己的計劃感到膽怯和不確定，正好和剛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伊利的課堂上轉來學習的艾默里·約翰遜住在一起。霍普金斯大學來的另一個同學亨利·西格照顧林塞度過患病的日子，敦促他前往維也納大學。當林塞到意大利訪學時，同伴是他沃頓學院的校友列奧·羅韋。在大多數學生最后落腳的柏林，瑪麗·金斯伯里1895年和1896年結交的美國同學很多，包括沃爾特·韋爾（后來是《新共和》雜志的創刊人之一）、愛米莉·格林·巴爾奇（后來是衛爾斯利學院經濟學教授和國際婦女組織的重要人物）、羅伯特·伍德（當時是波士頓南城慈善中心的負責人）、富蘭克林·狄克森（很快會成為達特茅斯的教授和鐵路立法專家）。[[144]](#_144_45)

在德國大學紐帶中像巴爾奇和金斯伯里這樣的女性很少。直到1890年女性才被允許作為旁聽生進入普魯士的大學。在此之前一些企圖到德國讀研究生的美國女生得費盡周折來到德國南部比較開明的大學，或者像弗洛倫斯·凱利、凱里·托馬斯那樣放棄德國來到女性可以獲得學位的蘇黎世大學。多年后，愛麗絲·漢密爾頓仍然記得她妹妹1890年代中期在慕尼黑大學經歷的折磨。因為對如何適當隔離她無法達成一致意見，學院最后臨時決定讓她坐在老師右手邊，她每天都要尷尬地面對一片德國男同學的面孔。愛麗絲·漢密爾頓自己記得遭遇男同學的惡作劇：手拉手沿著人行道跨步前進，把她逼進排水溝里。進步婦女的主要國際交流要通過比德國更遠的渠道：湯因比館的聯系、國際婦女普選權運動或者國際婦女大會的廣泛聯系。[[145]](#_145_43)

雖說德國大學紐帶在很大程度上是男性的經歷，但對19世紀末期對社會問題感興趣的那些年輕人來說，德國是思想的圣地，也是越來越依靠留學經歷的職業道路上的大站。到了1890年代末期，學習德國經濟學課程的美國留學生數目開始下降，因為和美國新成立的研究生院的成本相比，到德國留學的成本提高了：而且德國大學越來越擁擠，民族主義傾向越來越明顯：德國的經濟學反叛也越來越失去新鮮感。不過到這時，抱負和思想的重要傳遞已經完成了。在1885年美國經濟學協會的最初6名理事中，5名曾經在德國學習過：在早期26名會長中，至少有20名有此經歷。1906年，當耶魯大學的亨利·法納姆調查美國和加拿大116名杰出的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時，59名在德國學習至少一年以上。[[146]](#_146_43)

這些美國人的背景是可以預測的，他們中的許多人是來自北部州的新教徒，在當牧師的愿望受挫后才進入學術研究領域：但背景又不完全同一，不排除留學期間有各種各樣的反應。其實就在美國學生留學過程中，德國也在發生變化，留學生離開時的德國很難說和他們剛去時完全一樣。不過，盡管存在多樣性和變化，某些模式還是保留下來了。

最具個人色彩的反應是一種解放的感覺，正如伊利記得的：“快樂的擴張”。這個詞語在保存下來的回憶錄中多次重復出現，讓人感到意外，因為社會歷史學家已經把那個社會描述為19世紀歐洲最刻板的地方。對德國中產階級（Bürgertum）的死板，美國人并非沒有察覺。大學招生儀式好像官僚模式的滑稽表演。在凱里·托馬斯看來德國文化非常奇怪，太少的恭維、夸張的舉止、荒唐可笑的皇帝崇拜。盡管士兵、官僚，以及學生粗魯的男子氣都令人討厭，還有各種各樣的禁令，但是德國仍然給人解放的感覺。[[147]](#_147_43)

正如后來的旅行者感受到的，產生“解放的感覺”部分是因為把熟悉的東西拋在了身后。杜波依斯超越種族界限愛上了德國，覺得擺脫了“家鄉捆綁我的鐵鎖鏈”而徹底解放。有些人以不同的方式感受到文化腳鐐的松脫。薩繆爾·林塞和他的父母因為啤酒館爭議在往來書信中爭吵不休，林塞越來越想花錢聽音樂會、看戲，而且宣稱家庭的絕對戒酒主義讓他遭到社會孤立，這種代價太不值得。媽媽、爸爸、姐姐都遠涉大西洋來陪伴他度過歐洲的道德誘惑。相反，他則竭力說服他們過不那么“狹隘”的家庭生活，少受《主日學校時報》教條的限制。[[148]](#_148_43)

如果擺脫虔誠和偏見是這些事件突出顯示的內容的話，美國人的“解放感覺”還存在更深刻、更多政治色彩的內容，即他們稱為“社會性”的品質。像渴得要命的人一樣，19世紀末期留學德國的美國學生尋找德國中產階級的公共娛樂：音樂廳、戶外音樂會、公園、戶外啤酒園新奇誘人的氛圍。林肯·斯蒂芬斯寫道：“他們是真正的社會動物，這一點遠遠超過了美國人。”剪貼簿里夾著大量音樂會門票的其他人無聲地呼應了這個結論。讓他們感到吃驚的不僅是德國人享受生活的能力，而且還有休閑活動的公共性和社會性，不同于美國人理解的私密模式。[[149]](#_149_43)

實際上，“社會觀點”在每個地方都讓美國學生留下深刻印象。就像他們對公共娛樂的文化感到吃驚一樣，“社會觀點”也成為來歐洲旅行的美國社會進步人士一再重復使用的詞語。在德國，社會線索似乎沒有中斷，從戶外音樂會經過大學講堂一直上升到國家機構本身。甚至專心研究哲學的人也描述了在德國觸動他們意識的嶄新一類社會問題，流露出一種新發現帶來的興奮和緊張感。加瑞特·德羅普斯很久以后還記得德國人教會了美國人“關于相互交織的社會利益的更嚴肅概念”。[[150]](#_150_43)

這種社會教學中的某些內容是社會民主黨的杰作。19世紀末期美國學生在此之前從未見過基礎廣泛的工人階級社會主義運動，他們中的許多人以各自的方式試圖對它作出評估。1878年秋天，有關社會主義政治運動是否應該受到官方禁止的辯論正處在高峰，這時來到柏林的亨利·亞當斯閱讀了大量他所能搜集到的社會主義文獻，還把小冊子鎖在旅行箱中，以防女仆向警察舉報說他購買違禁品。瑪麗·金斯伯里不僅閱讀康德，經常看歌劇，還找機會聆聽李卜克內西的演講。在她旅居德國的最后階段，她和愛米莉·巴爾奇動身到倫敦觀看國際社會主義工會大會，聆聽讓·饒勒斯、韋布夫婦、基爾·哈迪的演講。但有的地方在大學招聘中嚴格執行反對社會民主黨追隨者的路線，德國教授必須不是社會民主黨人，他們的美國留學生也不能是。由于反對社會主義者的法律松動，約翰內斯·康拉德派薩繆爾·林塞去觀察社會民主黨大會，但是他很謹慎地確定林塞不會受到社會主義思想的影響。杜波依斯在德國社會主義運動的邊緣活動，他加入的團體是“社會政策協會”而不是社會民主黨。只有弗洛倫斯·凱利參加了蘇黎世僑居國外的俄國和德國激進分子小圈子，實際上使她和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運動聯系在一起。[[151]](#_151_43)

對美國留學生來說，比社會民主黨更重要的是德國19世紀末期的社會抱負。杜波依斯在1890年代得出結論說：“不到最后結果決不停止的德國邏輯已經從政治統一轉向社會統一——從國家是現實疆界的偉大軍事保衛者這一觀念，轉向國家是人民的社會和產業利益的保衛者和領導者這一觀念。”他認為，重新塑造國家政策的力量不是工人階級的壓力，而是相反：德國工人成為社會主義者是“因為德國教授宣傳社會主義，德國大眾領袖把它奉若神明，德國政府推行社會主義，因此所有德國改革運動或多或少都帶著社會主義色彩”。美國學生在國家和社會，公共和私人行為之間進行的認真區分變得模糊不清了。至于美國人已經習以為常的對國家干預的敵意和偏見，在德國政界好像根本看不到任何跡象。國家似乎無處不在，根本不擔心是否越過那些在美國被當做重要防御工事一樣捍衛的界限。人們看到新的國家鐵路、國家保險項目、街道上的士兵、打掃整潔的城市大街、官僚和規章制度、每次工會大會或者政治集會時坐在顯眼位置上防止侮辱皇帝的警察。[[152]](#_152_41)

最后還有教授。他們針對英國經濟學的攻擊性言論最終讓美國人聽起來沒有了新鮮感，失去了魅力。但是教授們本身作為公務人員，致力于建設一種明顯將“社會”和國家拉回其中的經濟學，他們是19世紀后期德國的強有力角色。由于擺脫了美國大學教學中煩雜的日常事務，他們在美國人眼中成了讓人羨慕的公共權威。他們不僅給大學生上課，每周特別舉行的演講對任何人開放，在演講中發表對當時公共問題的看法，尤其是柏林的這種演講往往成為引人注目的公共活動。德國一些著名的教授是議會上院的成員，大學在這些機構里面有自己的代表。他們的研究班中往往有律師和政府官員參加，這種研究班成為進入更高政府機構的階梯。他們自己創辦刊物（往往是愛爭論的），從事科學研究，就公共議題發表公開論辯，竭力擴大政治影響力，往政府機關里輸送忠誠的學生。美國大學教授很容易參與編輯部專欄和評論，也并非沒有自己的權威，不過對于剛剛從19世紀美國大學狹隘的清高狀態出來的美國學生來說，德國教授的公眾地位的牢固和深厚實在令人驚訝。[[153]](#_153_41)

美國學生通過他們尋找的老師明晰了兩國學術文化的對比。“社會政策協會”的核心人物中，英國色彩最濃的路約·布倫坦諾吸引的美國經濟學學生不多。研究內容涉獵社會學科眾多領域的馬克斯·韋伯連一個美國學生都沒有。因為從體制上看地位不安全，且專心探討熱門的自由放任思想爭議以外的問題，他在這些學生心目中不是引人注目的人物。在美國學生自己建構的“德國中的德國”，核心人物是最公開煽動對自由放任思想提出爭論的柏林人阿道夫·瓦格納和1882年后的古斯塔夫·施穆勒。一個是充滿倫理狂熱的理論家，另一個注重歷史和漸進式改革。但是，以對比鮮明的方式，兩人都宣稱一種經濟學，其中政府是擺脫不了的內在角色：作為一種社會工具，和市場本身相比同樣自然、同樣不可或缺、同樣處于經濟生活之外、同樣可能擾亂和搞砸經濟。在法納姆的調查中，其他任何老師都趕不上他們兩個的深遠影響力。[[154]](#_154_41)

不管是從個人角度還是從思想上看，最出風頭的人物是瓦格納。雖然歷史學家把他歸類于政治上和概念上讓人不安的那個分不清左右的類別，因而使之邊緣化，但是對于美國學生來說他是最突出的人物。伊利在1930年代仍然稱贊他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經濟學家之一”。瓦格納暴風驟雨般的思想生活見證了1860年代和1870年代德國資本的變革性社會力量。他是在維也納的商業大學（Handelsakademie）開始學術生涯的，正如他所記憶的那樣，哥倫布和亞當·斯密的兩根紀念柱主宰了這所大學及其教學思想。瓦格納自己的教學也是遵循這個模式。1869年在弗萊堡公共集會上第一次遭遇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時，他采取攻勢，先發制人地介紹鼓吹自力更生、私有財產的神圣不可侵犯、有限國家的原則等一攬子決議。[[155]](#_155_41)

但是從此開始，他發現無法隨心所欲地把社會主義的批評置之度外了。1870年來到柏林后，他看到城市里充斥著新財富和不動產投機家，這讓他更加不滿。他在一個月內給弟弟的信中說：“一個確定無疑的事實是，一切都因為財產觀念的變化而變化了。”到了1872年秋天他每周給四百個學生講授勞工問題，涉及范圍“相當廣泛，批評我們經濟秩序所依賴的基本法律原則：個人自由、私有財產”。他敦促弟弟“讀一讀馬克思、拉薩爾，甚至倍倍爾（Bebel）的著作”。不管社會主義者還做了別的什么事，他們“徹底打破了樂觀主義的粉紅色迷霧，正是這些迷霧使得占據主導地位的英國學派經濟學長期以來掩蓋了一切罪惡”。[[156]](#_156_41)

到了1873年，瓦格納肯定95%的社會民主黨理論是正確的。但是他沒有成為社會民主黨人，而是因為對馬克思有強烈意見而成為獨特的托利黨社會主義者。他1871年發表的演講“探討社會問題”是激情洋溢的呼吁，讓有錢人自愿限制自我欲望和追求自身利益的沖動。倫理的、先知的因素仍然是瓦格納教學的主要特色，它讓英國觀察家想到羅斯金，并且“口吻更生硬、更嚴厲”。1888年從哈佛大學來到柏林的加瑞特·德羅普斯記得，與瓦格納的講課相比，美國經濟學教學顯得乏味平淡。“德國教學方式激發更多的熱情，給人一種人類真正命運的精神感召。”德羅普斯發現在柏林，經濟學“更多浸透著社會服務的精神、國家尊嚴和功能的更高意識、社會福利的熱情。這對我來說是一種嶄新的體驗，我從來也沒有忘掉或者失去它”。[[157]](#_157_39)

瓦格納作為經濟學家最突出之處，不只是他對于把自我利益作為經濟主要推動力的嘲諷，也不是他對自由競爭天然和諧的神話表現出來的憤怒，甚至也不是他那個在“講壇社會主義者”中很罕見的論點：對財產的法律特權需要重新思考，直達其社會核心：而是在于瓦格納在很大程度上認為，國家對經濟活動的吸收是讓經濟生活重新道德化的關鍵。到了1880年代，他敦促國家企業擴展到鐵路、運河、銀行、保險、公用事業、礦業和住房等。為了把房地產投機者趕出城市，他提出沒收所有城市土地為公共所有。為了對抗資本家傾向于把工資降低到生存最低標準以下，他敦促制訂法律限制利潤、制訂公開的再分配的稅收政策。他在1880年代稱它為“國家社會主義”，目標就是在沒有社會主義的革命“瘋狂”和“犯罪”情況下，讓經濟“越來越多地從私人出來進入公共組織形式中”。[[158]](#_158_39)

針對教科書中認為德國對古典經濟學的反應是由歷史方法所主導的那種觀念，瓦格納的經歷能起到重要的糾正作用。正如他大量自由引用的馬克思和李嘉圖一樣，瓦格納把經濟學當作科學來講授，最終形成一個用他的名字命名的經濟學規則。作為古典經濟學家廢除國家功能的思想的對立面，該規則認為文明的前進意味著國家控制和國家企業的范圍自動地、不斷地增加。

如果瓦格納像他迫切渴望的那樣成功說服皇帝接受他的主張，他就可能成為一名宮廷經濟學家。因為失敗，他參加了煽動性的政治活動。不久就對“社會政策協會”的謹慎感到厭惡，他首先轉向阿道夫·施托克以親教會、親皇帝、反資本家、反猶主義等為基礎組織起來的群眾性政治運動——基督教社會工人黨，在1890年代后短暫的“社會君主制”春天里，他扮演了領袖角色，組織福音派社會聯盟。雖然瓦格納最后加入容克保守黨，他從來不是個容克原始主義者。他批評俾斯麥的反社會主義立法是“讓人遺憾的”，他為工人分享更高國民收入份額的要求辯護。在1890年代，他把工人協商權提交給魯爾區后差一點失去議會席位，那里的煤礦老板根本不吃這一套。他那樣混和了倫理嚴肅性與煽動性言論，憎恨富豪統治而堅持“社會”觀點，讓人很難把他歸類。但是在他的講課中從來不缺少的是一種取代市場的、收入再分配的社會政治觀念。他是沉浸在煽動性政治中的教授的典型，是作為世俗牧師為即將到來的“社會”時代布道的經濟學家。[[159]](#_159_39)

相反，古斯塔夫·施穆勒是個特別審慎明智的人。他對經濟學“個人自我主義”的不同意見并不比瓦格納膚淺，但不是來源于馬克思而是來源于歷史。他反對尋找沒有時間概念的科學（亞當·斯密的追隨者給經濟學加上了這種負擔），支持對經濟政策進行結合歷史背景和經驗資料的思考。在讓美國學生認識到所有經濟理論的歷史相對性方面，沒有人比他發揮的作用更大。通過他編輯的學術刊物和從他的討論課上流出的大量論文，歷史經濟學實際上成了施穆勒名字的同義詞。[[160]](#_160_39)

但是，歷史沒有給施穆勒提供持久的支柱。歷史經濟學作為拆解那種認為市場沒有時間性的“自然”概念的工具，對古典理論提出了有力的批評。但即使施穆勒也不能讓歷史成為經濟理論的可靠替代品。到了1890年代，最聰明的美國學生已經意識到歷史學派在不斷擴張的、無定形的實證結果泛濫中窮于應付，開始尋找施穆勒在維也納的對手邊際主義者了。[[161]](#_161_39)

像瓦格納一樣，施穆勒的持久影響來自于他作為國務活動家的身份。不過，瓦格納是講壇社會主義者的公共宣傳家，而施穆勒是其模范政策顧問。他在1882年從斯特拉斯堡借調到柏林大學的一年內，就組建了小型的政治科學協會，召集柏林教授和高級官員討論當前的立法問題：真乃學術滲透這門藝術的模范。他把自己和普魯士教育部的密切關系變為19世紀后期德國最有勢力的“教授制造者”。到了世紀之交的時候，盡管皇帝努力要稀釋施穆勒的影響，但是德國經濟學教授和政府官員中他的學生數不勝數。[[162]](#_162_39)

在施穆勒控制的所有機構中，“社會政策協會”是最重要的一個。成立這個協會的想法來自他組織的一次會議。1872年，是施穆勒被邀請在埃森納赫發表開幕演說，他從1890年到1917年去世一直是該協會的主席，他幾乎就是該協會的象征，盡管有些年輕的會員曾抱怨過這一點。像施穆勒一樣，協會也玩起技巧和謹慎的策略。從一開始，它就吸引了幾乎所有年輕聰明的德國經濟學家，還有一大批政府高官、記者、熱心公益的實干家，以及一些開明的企業家。在1885年經濟學大會（Economic Congress）解散后，“社會政策協會”就成為19世紀末期德國唯一的專業經濟學家協會。但是它不僅僅是行業協會，從一開始就作為網羅自由放任思想批評者的號召力量，其目的就是發揮政策影響力。[[163]](#_163_39)

在尋找手段的過程中，“社會政策協會”考慮了時間和場合。在最初的幾年，年度大會主要旨在為雇主、教授、記者提供針對“社會問題最緊迫階段”發表觀點的論壇。這些會議的高潮都在一般性辯論和針對當天議題的非正式投票上，其內容往往被媒體廣泛報道。俾斯麥在1878年后政策上的突然轉變讓“社會政策協會”陷入困惑。在對1879年俾斯麥新關稅議案的一場災難性的、分歧嚴重的辯論后，取消了非正式投票。1880年代“社會政策協會”放棄了勞工問題而討論比較安全的農業政策問題，讓俾斯麥的社會保險立法順利過關，只引起一些輕微的辯論。在1890年代它重新鼓足勇氣，嘗試為政府官員、大學生、牧師提供暑期社會經濟學課程。更持久的影響方式來自其專題論文形式的調查報告。到了1880年代后期，根據“社會政策協會”的大學經濟學家管理層設定的議程，該協會成為社會事實調查工廠，謹慎地、專業地為支持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的國家提供實證邏輯基礎，把動員公眾輿論的任務交給了其他組織。[[164]](#_164_39)

但是，“社會政策協會”最成功之處在于辯論滲透到制訂政策的政府高級官員中。像法蘭克福的市長弗蘭茨·阿迪克斯、普魯士財政大臣約翰內斯·米凱爾、1890年代初期“新路線”期間普魯士商業大臣弗瑞赫·馮·貝爾普施、普魯士統計局局長恩斯特·恩格爾等實權人物都被吸收進協會的管理機構。通過調查議題和辯論議題的選擇，“社會政策協會”的領導力量為實際上的社會政策制訂確立了框架。

其結果是非常謹慎的運作，常常引起內部的爭論和外部的攻擊。即使在初期，“社會政策協會”也沒有覺得邀請工人代表參與勞工問題的專題討論會是審慎的。由于把社會政策放在和憲法政策不同的領域內，“社會政策協會”回避了當時給德國憲法結構造成迫切壓力的民主化議題。即使在他們選擇的領域，“社會政策協會”的力量根本不是體現更大的、看得見的利益的帝國政治勢力的對手。德國改革派經濟學家受制于他們在國務中的特殊地位和隨之而來維護國家的義務，一方面對自己在國家事務中的影響力感到自豪，一方面又擔心哪怕流露一丁點的不忠誠就整體喪失影響力，所以他們決非美國人所認為的那么強大的人物。雖然如此，德國還是比英國和美國的同行早幾十年創造了后來進步社會政治的關鍵機構之一：教授和政府官員，學術研究和實際政策制訂之間的機構性聯系。

在大學專業知識和官僚政府機構的聯合方面，施穆勒具有堅定的信念。他出生于公務員家庭，從出生后就接受了高級官僚的傳統和自我形象。他認為政府官員與自私自利之徒不同，克服了競爭和追求自我利益的黑暗和血腥，可以保護廣大群眾免受有錢人的階級壓迫，作為“階級沖突中的中立者角色”。或許施穆勒的結論比瓦格納狹隘，但在德國帝國時代背景下，這已經夠大膽了。不顧俾斯麥和德國工業家們的反對，他堅定地支持勞工保護立法的通過。當托拉斯問題在德國政治中激化的時候，他的建議是在最大的卡特爾董事會留下國家代表的席位，征收高額的暴利稅。瓦格納提議通過稅收強制對收入重新分配，把市場相當大領域納入國家管理和控制：而施穆勒則從司法和官僚的角度將國家看成是中立的仲裁者，“超越自私自利的階級利益”，設定市場各方的行為界限，補償市場的受害者。[[165]](#_165_39)

在德國的美國留學生尋求這些人和這些觀點的時候，他們的經濟學觀念不可能不受到暫時的沖擊。拋棄本杰明·安德魯斯所說的“理論絕對性”的經歷（往往是痛苦的）一直縈繞在他們的記憶中。從施穆勒那里他們都學到了經濟學教條的歷史性。愛米莉·巴爾奇和埃德蒙德·詹姆斯回國后講授瓦格納的法則，即國家的社會功能應不斷擴大這一規律。其他人多年后仍然記得瓦格納的道德“真誠”和他對“社會思想”的重視。[[166]](#_166_38)

但是，像德國本身一樣，柏林的經濟學家是給人帶來困擾的老師。正如一個學生回憶的，他們對英美文化表現出來的民族主義芒刺、對美國作為純粹利益政治場所的蔑視，以及“對美國一切事情的輕侮”都讓美國學生感到苦惱。[[167]](#_167_38)最麻煩的是他們對民主的嘲諷和對皇帝和國家權威不加批評、畢恭畢敬的態度。在看到國家權力這般盛況的最初興奮中，美國學生有時候也認同一種借來的愛國主義。杜波依斯回到國內宣稱“如果真的存在上帝挑選的國王種族的話”，那肯定就是霍亨索倫家族（Hohenzollerns）了。薩繆爾·林塞在德國的第一個主動行為，是在聽到漢堡啤酒節的軍樂后跳上桌子，揮動帽子，和其他人一起高呼口號。美國學生中很少有人不對抽象民主心存懷疑。伊利認為柏林對城市普選權的限制如果用在紐約市將受益無窮。[[168]](#_168_38)

但是多數美國學生對于俾斯麥的鐵腕統治感到厭惡，他們討厭國會大廈（Reichstag）、朝廷隨行人員和大街上炫耀軍隊制服。詹姆斯認為俾斯麥對德國做了一件大錯事，阻礙了自治的成長。塞利格曼認為反對社會主義的運動把德國貶低為“近乎諸侯國的狀況”。美國學生談到俾斯麥1880年代的社會保險項目時的最好評價就是伊利的評論，說它非常“有意思”。約翰·格雷1890年警告說，講英語的人不明白社會保險建議和政府的壓制措施有多么密切的聯系。[[169]](#_169_38)

最后，所有在德國留學的美國學生多多少少都提高了反對國家權力過大的認識。瑪麗·金斯伯里回憶說看到警察局書記員在政治會議上就座，“讓美國和英國學生熱血上涌”。亨利·亞當斯很久以后帶著很少掩飾的憤怒寫道：“賓館老板給我安排房間前要求我出示護照，這讓我感到不愉快，還有強加在我身上不得不做的事，每天早晨要看報紙上的禁書名單，弄清我擁有的書刊中有哪些必須鎖在柜子里。”[[170]](#_170_38)

德國沒有引發模仿。從概念上和實際上努力把有用的線索從錯誤線索中挑選出來，這從一開始就是跨越大西洋進步紐帶的固有特色。這個任務使得到歐洲來的每個進步旅游者感到困惑。在德國的日子也讓這些美國人陷入有時候是非常激烈的思考。德國旅居生活最完整的日志是亨利·亞當斯1878—1879年在柏林寫的日記，里面涌動著信念變化的不安。亞當斯在1870年代后期決非天真的國外旅游者。他從格林內爾學院畢業后到安多福神學院和新成立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深造。他曾經聽過弗朗西斯·沃克的經濟學講座，在1870年代中期的艱難歲月獨立研究過流浪工人問題。他在來到瓦格納的柏林講座之前就已經獲得了霍普金斯大學的博士學位。[[171]](#_171_38)

但是亞當斯的準備中沒有任何東西預見到，他來柏林的最初幾個月在日記中描寫起尖銳的、煽動性的經濟問題。他開始研究社會主義問題，承認他在那里的工作“再次給予我踏入政治經濟領域的立足之地”。他擔心“自由放任”的問題，并開始制訂一個限制個人財產積累的計劃，雖然并不能令自己滿意地將其所有隱含意義追究到底。他問道：“問題是限制自由競爭，但怎么做呢？”在國外的第一個圣誕節后一個星期，亞當斯的使命被攪亂了，他的宗教思想陷入混亂，情緒變得狂躁不安。

我只知道英國經濟充當了……而且還正在充當那些把同胞踩在腳下之人的良心鴉片。奴隸制問題依然沒有解決。如果基督把掩蓋人們罪惡的外衣拿走是正確的，那么我同樣來揭穿某種障眼法也是正確的，這障眼法讓人們以為自己的不公正行為不是自己所為而是人們無法控制的法律的延伸。經濟學世界中沒有任何東西是人們無法控制的，必須提醒人們來控制這些法律。

亞當斯隨身攜帶有虔誠、理想主義和道德上的激烈思考。德國遭遇的標記是，它們進入了自由貿易主義的德國批評家的框架和語言：自由放任、“自由競爭”、“英國經濟”等。[[172]](#_172_38)

德國讓人不安，這是其本質。西蒙·帕滕回國后迫切希望“幫助美國文明從英國向德國基礎轉變”。在愛國熱情的勃發中，亞當斯發誓“努力工作決不讓美國和歐洲一樣”。[[173]](#_173_38)對于帶著這么多復雜的感情進入動蕩水域的這些人，人們不應該期待思想或者理想的簡單轉變。美國人不是進入了某個經濟學流派，而是進入一個進行社會問題激烈辯論的社會。但是德國對于自由放任的老生常談采取不遜態度，課堂上回響著對經濟學原理教材的控訴譴責，所有這些景象不可能不讓看到它們的美國人受到震動。美國學生在德國的逗留讓他們的倫理刻板觀念得到放松，為他們提供了學術生涯的新模式，拔掉了自由放任思想建筑的支柱，即使不是沒辦法重建，至少已經不再是不加批評的重復了。但是，在所有旅行中，行李最終都是要帶回家的。

## 講授經濟學

在德國留學的美國學生在1880年代開始自己的教授生涯后，第一個行為就是急忙重新確立當初在海外接觸的學術生活方式。他們把德國大學學習的確定性特征納入課程大綱內：講課、討論、研究論文、專著、學術刊物、研究生教育和博士學位等。他們還帶回了內容上可以清楚顯示德國標記的東西。他們開始為課程表上添加一些新課程，如社會政治學、社會經濟學、公共金融學（瓦格納的專長）、勞工和資本問題，用新閱讀材料為教材教學打開通風的渠道。伊利在入門性課程中要求學生閱讀瓦格納、拉維勒耶，對經濟學高年級學生（他警告說德國研究是不可缺少的）推薦瓦格納、施穆勒、克尼斯、羅塞爾，以及古斯塔夫·勛伯格新出版的合著《政治經濟學手冊》（伊利稱之為“最好的經濟學專著之一，如果不是寫得最好的話）。亨利·亞當斯在教書的頭些年帶領學生回顧經濟學的歷史，從重商主義者到英國古典經濟學，從“對英國政治經濟學的反叛”到“最新的德國經濟學”。[[174]](#_174_38)

1880年代初聽過伊利講課的富蘭克林·詹姆森尖刻地抱怨說，伊利“一再攻擊他的稻草人——假定的經濟學家，像往常一樣猛烈批駁他”。詹姆森認為伊利“心胸狹隘、內心充斥德國偏見”，但這后一個指控沒有說到點子上。在對德國表現出這么多復雜感情的情況下，伊利那批人中沒有一個回國后成為親德派。只有少數人保持著與德國朋友長期的聯系或者對德國政治發展維持著嚴肅的興趣。實際上，他們回來滿懷理想（偶爾以簡略的方式被他們與德國混合在一起），更多的是一種在國際思想運動中的參與意識。伊利要求學生匯報刊物上最新的爭論焦點，除了德國的《普魯士年鑒》和《康拉德國民經濟雜志》外，還有倫敦的《經濟學家》、巴黎的《經濟學家學報》。伊利那批人在學術刊物的書評欄目中也展現出同樣的國際化色彩。在作為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和經濟學教授學術陣地的《政治學季刊》中，從1886年創刊到1890年期間書評的一半都是外文標題，德國和法國的書籍大致平分秋色，當然還有一些意大利著作。無論如何，在德國大學的經歷大大擴展了美國人的思想文化。[[175]](#_175_38)

但是，課程或者課堂上的影響顯然不是他們追求的目標，德國留學歸來的經濟學家中這些思想領袖希望建立自己的社會政治學。德國人對自由放任的攻擊讓美國學生感到吃驚，其中受觸動最大的那批人在1870年代后期或者1880年代早期回國后不僅對自由放任感到懷疑，而且還懷有宏大的、仍不成熟的激進變革設想。阿爾比恩·斯莫爾給學生講授他對“自由放任的憎惡”。伊利在1884年寫道：“這個年輕的政治經濟學不再允許[經濟學]被當作貪婪者手中壓制或者壓迫勞工階級的工具。它不承認自由放任可以作為在人們挨餓時無所作為的借口，也不允許讓競爭效率作為掠奪窮人的幌子。”不過，困難在于發現一個項目和公共綱領。[[176]](#_176_38)

至于這個首批團隊多么渴望獲得在海外老師身上看到的公共影響力和權威地位，是怎么夸大也不過分的。他們積極投身大學新開設的課程中，講授熱點問題，如勞工問題、亨利·喬治的理論、勞工立法、壟斷、社會主義等。他們為公共刊物投稿，有些人還與工會組織接觸。到了這個十年的中間，同代人中膽子最大的伊利已經深入研究工人階級社會主義和勞工運動，發表了充滿同情的研究成果，在批評家們看來同情程度令人吃驚。他在勞工騎士團風起云涌成為巨大社會運動的1886年敦促有良心的美國人閱讀一篇勞工論文、參加一個工會組織，“為他們分擔一點痛苦，助他們一臂之力”。不到一年，平常情況下遠比伊利更謹慎的埃德蒙德·詹姆斯簽約成為約瑟夫·庫克激進的、短命的社會福音雜志《我們的時代》的“勞工改革”編輯。當喬治·麥克尼爾的《勞工運動：今天的問題》（由勞工騎士團資助）在1887年出版的時候，開頭三章關于工業革命的社會動蕩和勞工組織功效的歷史是詹姆斯寫的，是勞工和激進意見大合唱中唯一的學術界聲音。亞當斯也和勞工組織接觸過。這些行動雖然與阿道夫·瓦格納投身柏林工人階級政治不完全一樣，但是在道德經濟學熱情和政治上的不謹慎方面，他們確實非常接近。[[177]](#_177_38)

人們很難準確說明年輕留德經濟學家主張用來替代自由放任思想的內容是什么，但是可以清楚看出他們的強烈憤怒和盡可能獲得廣泛影響力的渴望。無論如何，他們不會成為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權論者，他們在德國和美國的經歷都強化了這一點。毋寧說，在整個1880年代中期，他們中的突出人物努力推動價值觀的轉型，要使其深刻和徹底到足以從道德根源處掏空競爭性個人主義的經濟學體系。伊利、亞當斯、塞利格曼都接受了合作的思想，不是作為自我幫助，而是作為勞工商品化的替代品。塞利格曼與富裕的德國猶太人家族的聯系讓他成為團體中最有世界背景的人。他從中世紀同業公會的研究轉向對英國基督教合作社會主義預言家們贊賞有加的研究。伊利投身于和主要英國合作者的聯系，讓他的學生調查合作社傳統和在美國開展活動的可能性。他發表于1883年的著作《現代法國和德國的社會主義》，在結尾不是寫到講壇社會主義，而是像塞利格曼的著作一樣討論金斯利和莫里斯的基督教社會主義項目。[[178]](#_178_38)

亞當斯對現存工資制度的替代手段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到了1884年他認為已經發現了一個答案，就是企業給予工人“財產權”——要么通過某種可以強制保障的長期工作崗位，要么通過共同管理或者分享利潤等手段的結合。不管細節如何，它將是“我有時候希望的財產和社會權利改革的先驅，它們將不允許這舊世界認出自己”。[[179]](#_179_36)

叛逆的經濟學家開始稱1880年代普遍的價值觀轉變為“社會主義”。這個用法是由英國人借用的，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術語。尤其是在社會基督教與牛津理想主義結合相交的地方，“社會主義”一詞在那個十年中可以在英國的各種角落聽到。人們可以發現穆勒1879年對“社會主義”的重新思考，薩繆爾·巴內特在1883年提出的社會改革一攬子計劃號稱“可實行的社會主義”，約瑟夫·張伯倫喜歡把“任何一種友好法案”都稱作“社會主義”。據說（從來沒有被明確否認）最著名的是格萊斯頓1880年代末期在下院的主要代理人承認的：“現在我們都是社會主義者。”[[180]](#_180_36)

一種故意的模糊出現在所有這些進步思想對“社會主義”一詞的使用上，這種模糊定義從錯位的宗教心態中汲取內涵，具有叛逆思想的年輕美國經濟學家對此都非常熟悉。他們的社會主義不是以階級或者國家為中心的，其核心是道德層面上的含義。社會主義成為激烈競爭的個人主義的反義詞，是令身居海外的他們印象深刻的“社會”觀點的延伸。伊利解釋說，社會主義意味著對經濟學“各人顧各人”原則的反叛。塞利格曼寫到，它意味著讓那些“傾向于把社會融合起來、使自我思想服從于追求共同利益”的力量有更大的作用范圍。[[181]](#_181_36)

通過這個思想通道，留學德國的經濟學家最終回到立法和國家管理的角色上來。他們吸收了太多的歷史，所以難以想象國家能夠和社會截然分離。早在1884年，伊利就運用瓦格納的術語指出國家不過是合作社的另外一種形式，像家庭和教堂一樣，是背后有倫理和精神力量的“強制性合作社”。對德國的同情，加上有贊成高關稅的家庭傳統，讓詹姆斯很容易宣稱國家“如果不是社會本身經濟演化的最重要因素，至少是最重要因素之一”。甚至比其他人更多懷疑國家權力的亞當斯也寫道：“不管是用‘國家’、‘國民’還是‘社會’，基本思想是一樣的。讓人看到的本質是有機增長，而不是機械安排。”國家不是社會之外的一種安排，也不是非自然的、外來的、干涉性的力量。伊利說得更直接：政府“是我們工作時必須使用的機構”。[[182]](#_182_36)

1885年和1886年，在德國產生、在美國加劇的異端觀點和理想的喧鬧達到高潮，在當時情況下，必然產生遠遠超出大學“茶壺漣漪”的影響。直接的事件就是勞工組織的驚人增長。1884年和1885年一系列非常成功的罷工極大鼓舞了士氣，美國歷史上第一次持久的全國性工人運動中，成千上萬的工人開始涌入勞工騎士團。在立法機構內，壟斷權力的問題被提上日程。與此喧鬧一起輝煌的還有亨利·喬治，他的影響力在1886年達到最高峰。所有年輕的經濟學家都公開或私下里反對喬治對古典經濟學簡化和激進的闡釋，即把經濟苦難的全部責任都歸咎于地租的罪惡，雖然他們羨慕喬治贏得群眾皈依的能力。[[183]](#_183_36)

留學德國的經濟學家設計的組織機構是“社會政策協會”的美國版本：美國經濟學協會。該機構的最初推動力來自詹姆斯和帕滕。在學生時代，他們倆都聽過約翰內斯·康拉德宣講“社會政策協會”的工作，向美國聽眾宣傳其模范作用。在1884年，詹姆斯第二次從德國回來后，就竭盡全力付諸實施。詹姆斯和帕滕散發的“國民經濟研究協會”草案標題中對經濟學概念的標準德語詞匯Nationalökonomie加以明晰的英語表述：National Economy（國民經濟），聲明中對于當時主要問題提出協會的立場，以便使之有“像‘社會政策協會’一樣確定的項目”。所有這些毫無疑問都是借用德國模式或抱負的痕跡。[[184]](#_184_36)

伊利和塞利格曼向所有剛從德國大學回來的經濟學學生游說，招募他們加入。在1885年9月召開了組織機構會議，共同綱領問題得到熱烈討論。亞當斯、詹姆斯和伊利都擔心協會給他們貼上“講壇社會主義”的標簽，或者看上去要求他們徹底拋棄英國經濟學。不只是亞當斯一個人堅持否認自己認同“社會關系的德國觀點”——這種觀點認為所有關系都集中在國家問題上。伊利的建議是把“自由放任主張在政治上不安全，在道德上不健康”這一共識作為記錄保存下來。不過這個建議因為語言太過激烈，多數人還沒有接受它的思想準備。[[185]](#_185_34)

但是從綱領的開場白“我們認為國家是個機構，其積極的幫助是人類進步不可缺少的條件之一”來看，沒有人會懷疑該協會成為自由放任批評者俱樂部的決心。即使我們不了解伊利私下里說過的話“美國經濟學協會的想法就是要在美國完成‘社會政策協會’在德國做的事”，或者伊利的開幕辭與施穆勒在埃森納赫演說的呼應之處，也能夠看出：協會竭力吸收有影響和有分量的外界人物為會員的熱情、設定的調查研究議題、提出政策建議進行辯論的最初決心等，都顯示了與德國人對貿易自由主義的異議有親密聯系。當這個協會在1887年招攬名譽會員的時候，拉維勒耶、瓦格納、克尼斯、羅塞爾都成了第一批被擁抱的人。[[186]](#_186_32)

意識到風向的爭議性，《科學》雜志的編輯讓詹姆斯安排系列文章解釋經濟學中的反叛。塞利格曼寫了第一篇，探討經濟學方法，文中他堅持所有經濟學主張的歷史相對性，“財產的絕對權利”也不例外。詹姆斯為國家的核心重要性辯護，指出它不是偶然性的、外來的經濟因素，而是任何企業“偉大和沉默的合伙人”。伊利預告了經濟學中新倫理因素的到來。（“打開你的穆勒、勛伯格、瓦格納、經濟學雜志，你就會很容易地了解到經濟學的思路大部分，或者說主要都朝向應該的方向。”）亞當斯的文章探討了法律和財產之間的關系。曾于1870年代中期在柏林和海德堡學習經濟學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里士滿·梅奧·史密斯，則是為統計學和實證研究方法辯護。[[187]](#_187_32)

所有作者都說他們的主張不是德國經濟學的簡單衍生物，但是沒有人能夠忽視他們的反叛中編織出來的新的世界性線索，如施穆勒的歷史方法、克尼斯和瓦格納的倫理原則、（通過詹姆斯傳達的）瓦格納關于不斷增加的國家功能的規律、（通過亞當斯和塞利格曼暗示的）瓦格納關于從最根本核心重新思考財產所有權傳統觀念的呼吁。

地位牢固的經濟學教授的憤怒像火山一樣爆發了。耶魯大學的阿瑟·哈德利并非自由放任的簡單鼓吹者，他承認在瓦格納的講座中學到了一點東西，但反駁說沒有人能夠一廂情愿地拋棄“經濟學原理的嚴格要求”。“相信經濟學原理可以由人類努力干預，這種觀點比相信自由放任極端思想危險十倍。”他堅持說經濟學的關鍵是發現人類意志無法超越的界限，如劣幣驅逐良幣，如草率的婚姻和太多的孩子意味著入不敷出、忍饑挨餓。政治經濟學“對立法者說‘你只能走到這里，不能再往前走了’，它不說‘這樣或者那樣的立法可以產生最好結果’：但是它說‘超過了一定限度，所有立法都是徒勞的’”。[[188]](#_188_32)而反叛者提出的回應是：接受經濟學是由不可阻擋的自然規律組成的體系就等于向宿命論和絕望投降。這成為他們回答所有其他問題的支點。

1886年《科學》雜志的交流把經濟學新叛逆的多數元素匯集到一起，如針對古典經濟學根本比喻的爭論、年輕的經濟學家渴望公共平臺和公共關注的熱情、他們的道德嚴肅性、他們針對自由放任思想的深刻和憤怒的爭論，以及他們與德國老師緊張和復雜的關系。那年亞當斯在其他地方寫文章探討“工資體系的顛覆”——這是經濟學關系中的巨大變化，造成的結果可能“等同于社會革命”：詹姆斯嘲笑“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老調”：塞利格曼寫到窮人和富人之間的鴻溝是“當今政治經濟的首要問題”。再看相對孤立于德國影響之外的1880年代中期英國經濟學學術辯論，與這里的激烈爭吵相比就簡直是在開禮貌的茶話會。美國經濟學協會的年輕叛逆者懸在經濟學與道德告誡之間，對自然運行的市場的觀念全力批判。[[189]](#_189_32)

在這個層次的反叛上，1880年代的美國大學還沒有準備好成為溫床。美國自由的邊界并不比嚴格控制社會民主黨影響的德意志帝國時代的邊界更狹窄，但是在美國，經濟學主張的叛逆者如果觸犯由企業家捐助者主導的大學財務和權威體系的話，可以自由運作的空間實際上就非常狹小了。在19世紀末的德國，擁有地位的勢力劃出一條最激烈捍衛的界線，那就是不能侮辱國家，但在美國更關鍵的界線就是不能侮辱財產權。當然，財產權在北大西洋經濟體中任何一個地方都不是小事，例如1890年代攻擊“講壇社會主義”的領頭者就有薩爾河流域的煤礦和鐵礦巨頭，這就是明顯的證明。但是在國家結構虛弱得多的美國，資產階級壟斷大部分高級崗位，又沒有來自大地主貴族的強烈競爭，所以批評自由放任的美國人就孤立得多、脆弱得多了。德國教授的地位對美國教授來說是望塵莫及的，雖然他們曾經非常賣力地戴上了研究和學術的華麗裝飾。

像北大西洋經濟體的許多對比一樣，美國叛逆者環境的脆弱性在一定程度上是公共機構時機選擇的產物。在德國，國家和大學比工業資本主義更古老，它們的權威地位早已確定。在美國，什么都是新的——內戰后國家的性質、階級關系、資本組織、勞工組織等，而財產重新分配的問題更切近核心。在這樣一個社會，公共生活的眾多基礎設施（圖書館、公園、教堂、大學等）都是有錢人捐助建造的，德國教授的權威地位很難轉移到美國教授身上。這就是密歇根大學校長詹姆斯·安吉爾表達的意思，他提醒亨利·亞當斯在美國不可能期待像德國學術界那樣的自由程度。美國和德國不僅思想模式不同，權力結構也不一樣。[[190]](#_190_32)

亞當斯是最早發現這個問題的人之一。因為還沒有獲得穩定的教授崗位，他的教學在1886年分成兩個部分，分別在密歇根大學和康奈爾大學兼職。從接受康大聘書一開始，執行校長就擔心亞當斯缺乏“與紐約一百位銀行家中任何一位交談而帶來的現實態度”。1886年春天，密歇根大學安吉爾校長在答復亞當斯的長久聘用合同申請時，要求他正式說明自己對私有財產、繼承權和國家社會主義等的觀點。亞當斯大膽回答說：“控制所有生產機構的最終權力來自社會，業主應該永遠被認為是管理資本的代理人。因此，至于說應該允許人們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生產中介，就好像他們對其有最終權力一樣，那完全是權宜之計的問題，只能通過實驗和常識來回答。”[[191]](#_191_32)

但是在八月份，亞當斯犯了錯誤，在康奈爾大學工程學院的公共集會上對財產“神圣性”作了同樣的批判，（同時還對最近勞工騎士團的鐵路罷工表示同情），當時該大學的主要捐款者之一就坐在大會主席臺上。主持會議的瑟斯頓起來反駁。他宣稱，那些在諸如鐵路公司一樣范圍廣泛的企業高層主管“總是強壯、勇敢、聰明、謹慎、有遠見、有開拓精神和精力充沛的人”，不可能容忍在競爭中被淘汰的罷工者或是無政府主義者對他們發號施令。抗議現行的工資水平是徒勞的，因為制定這些條件的不是人而是自然、貿易和上帝的“普遍強制性法則”。[[192]](#_192_32)

當時的所有經濟學虔誠言論在瑟斯頓冗長和即興的反駁中滔滔涌出。康奈爾董事會成員認為亞當斯的觀點“危害社會秩序”，建議終止他的聘用合同。由于迫切希望保住密歇根大學的聘用合同，亞當斯給校長安吉爾去信，卑躬屈膝地收回他過去八年著作中的言論，承認他的思想由于在柏林遭遇社會主義觀點而失去了平衡。在保持自我尊重的最后一個努力中，他還是忍不住建議校長本人看一看湯因比的《工業革命》。但是到了這時，羞辱已經成為事實，無法挽回了。[[193]](#_193_32)

在十九世紀末期美國經濟辯論的特殊情況下，對于留學德國的經濟學家來說，亞當斯的遭遇是讓人痛苦的教訓。1890年代充斥著類似的學術異端邪說案件，多數涉及經濟學家，正如瑪麗·福納顯示的，董事會成員很少失敗。即使已經升到沃頓學院學界領袖和薪酬體系塔尖的詹姆斯也最終被新教務長排擠了出去，后者本身也是大學的主要捐款人。1880年代仍然在積極爭取教授崗位，留學德國的年輕經濟學家們竭力把社會政治研究重建在不那么敏感的區域內。美國經濟學協會非常不情愿地放棄公開的政策規劃企圖。在詹姆斯的交通委員會和亞當斯的公共金融委員會都沒有能在政策建議上達成一致意見后，該協會拋棄了關于公共問題的常設委員會。“社會政策協會”選擇少數當時社會經濟熱點議題作為深入實證調查和辯論的切入點，而美國協會的會議很快退回到分散的個人投稿的大雜燴。到了1888年，為了渴望得到數量規模，該協會實際上悄悄放棄了宣言中的原則。[[194]](#_194_30)

從修辭上看，留學德國的經濟學家開始從1880年代的先知性語言退卻了，這種語言部分來自瓦格納，部分來自羅斯金以及新教徒社會福音主義。1880年代初期亞當斯、伊利和塞利格曼都關注過的工資關系本質問題，被悄悄從專業經濟學文獻領域剔除掉了。從社會主義者那里借用“社會主義”語言的討論就像早晨的霧一樣消失了。由于有大眾雜志的發表渠道和一幫忠實的學生，伊利比其他人堅持的時間更長些。1892年他提議美國經濟學協會的年會在位于肖托夸的循道宗信徒野營大會舉行后，雖然被迫離開了協會的秘書處，他還嘗試了一系列替代美國經濟學協會的社會福音選擇。不過，在1894年遭受對自己學術異端邪說審判的烘烤后，就連伊利也退卻了。

這個十年的逆轉還沒有嚴重到瓦解他們給經濟學價值帶來深刻變革的夢想——他們的企圖不僅僅是提供一些零星的政策建議。在大西洋兩岸，對當時個人主義的修改和重建與進步工程其實是糅合在一起的。不管“社會的”觀念是夾裹在社會連帶主義（solidarism）、費邊社還是德國教授“倫理”經濟學的語言中，所有的進步人士都想當然地認為其對立面不是法律或習慣的某個特殊安排，而是私人欲望的思想風氣。進步政治將永遠在預言性和特殊性的雙軌上前進。但是，希望由合作社一直向上延伸到積極參與社會事務的國家，這種夢想在1880年代的階級沖突中潰敗，所以在德國人與自由放任論爭的背景下學習經濟學的第一代學者只好竭力尋找不那么敏感的領地。在他們痛苦地尋找精心確定的措施和更不容易遭到攻擊的立場時，施穆勒模式從瓦格納的陰影下脫穎而出。

叛逆經濟學家的第一個謹慎措施讓他們返回到自己最擔心的德國紐帶癥結上：國家權力范圍的邊界問題。在自己的社會政治和德國老師的無限度國家語言之間，他們不能回避有建造更堅固、更安全界墻的必要性。結果，亞當斯在他的世界坍塌之前五個月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已經提供了它。雖然從來不用伊利關于“神授”國家機構的言論，但亞當斯以自己的方式一直試圖繞開人工和天然經濟因素之間的概念界線——這些界線把國家和經濟“自由”的領域區別開來。現在亞當斯在“控制國家工業干預的原則”中，返回到自由放任經濟學家的界限和差異等用詞上來。

在國家行動的合法性領域內，亞當斯強調了兩點。第一是在“競爭行動水平”下面確定底線的措施，以免市場動力學把倫理水平降低到最無恥競爭者的程度：從本世紀開始起在英國這就被稱為工廠立法。第二涉及“天生處于壟斷地位”的企業，因為創造一個競爭性的同樣機構成本高昂，讓后來的投資者利潤回報率非常糟糕，不可避免地導致競爭失敗。鐵路就是“天然壟斷”的明顯例子，城市公用設施是另外一個例子。在這些領域，市場本質上是失效的，亞當斯認為某種形式的公共控制不可避免，不管是通過公共特許權、價格管理、建立競爭性國家企業，還是創立完全公共所有的壟斷公司。[[195]](#_195_30)

這個十年經濟學正統思想維護者的不滿沒有減輕多少。《獨立報》評論家反駁亞當斯的文章說，“這是用最有力的形式表現出來的現代社會主義基本觀點，因為溫和克制的口氣而更加陰險狡詐”。但是留學德國的經濟學家欣然接受亞當斯的區分：在不干涉主義與德國國家概念的旋渦之間，這讓他們有了理論上的立足點。亞當斯自己并不是很清楚實際后果，在把這篇文章寄給美國經濟學協會發表前，甚至還特意添加了謹慎的聲明，說整個論證完全出自“個人主義”觀點。[[196]](#_196_30)塞利格曼（此刻）抓住亞當斯文章的謹慎一面，強烈主張亞當斯的工作“證明放棄自由放任并不意味著支持社會主義或者在任何實質上接近社會主義”。伊利選擇了亞當斯觀點中更加激進的道德內容，在吸收了亞當斯的天然壟斷觀點不到一年，就呼吁鐵路、電報、公交車、城市電力、煤氣和自來水的公有化，即使不能馬上進行，至少要緩慢地、穩定地推進。正在為防止費城的城市煤氣設施拍賣給私人企業而斗爭的詹姆斯欣然接受同樣的觀點。作為受大眾歡迎的進步政治產生的重要分水嶺，接下來二十年的城市公用設施斗爭都緊緊圍繞著“天然壟斷”論點開展。再往后，新政的《公平勞動標準法案》和田納西流域管理局仍然處在亞當斯關注內容的范圍內。[[197]](#_197_30)

如果亞當斯的文章幫助確定了叛逆者國家觀點的框架和焦點的話，仍然存在的問題就是如何創立比1880年代預言性的政治講壇更堅固的戰略基礎。在這個緊要關頭，施穆勒更謹慎的專家影響模式變得更加吸引人。當詹姆斯1889年再次開始美國的“社會政策協會”工程時，這次他的設計更加忠實于原型。像“社會政策協會”一樣，他野心很大的新組織“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目的不是完全的政策規劃而是辯論。由學院出身的組織者確定議程，它把教授和費城實干家召集到一堂討論公眾關心的話題。從第一次開始，該學會的仿效榜樣就很少遠離人們視野。早期的《年報》中常常有很大篇幅刊登來自施穆勒、古斯塔夫·科恩、錫耶納的阿基爾·洛里亞、維也納的歐根·龐巴維克、巴黎的保羅·魯西耶的長篇選段譯文。還有列奧·羅韋關于“社會經濟協會”會議的報告、威洛比關于“社會博物館”的報告、羅伯特·布魯克斯關于德國城市大會、約翰·格雷關于“社會政策協會”本身會議的報告。在一個固定的欄目，列奧·羅韋記錄了城市管理改革的最新國際觀點：薩繆爾·林塞為籠統的社會改革新聞做了同樣的事情。[[198]](#_198_30)在1902年，在德國大學紐帶的另一個校友艾默里·約翰遜的編輯下，它的《紀事》最終找到了持久的模式，是“社會政策協會”叢書在1870年代使用過的模式的變體。每期都登載專題討論會上專家就當時緊迫的政策議題發表的意見：城市所有權和特許權、工業調解和仲裁、住房、童工、企業管理、監獄管理、貿易和關稅等。

專家政策顧問實際上成為批評自由放任的學者們重新組合發揮影響力的一個場地。到了世紀末，第一代留學德國的經濟學家的學生通過占據大學教授與政府服務專家之間的社會空間，努力建立權威的新形式。他們的努力逐漸確定了美國進步政治的一個核心結構。艾默里·約翰遜以他在柏林提高的交通政策方面的專長，獲得了沃頓學院講師職位和“地峽運河委員會”的席位。他的同事羅蘭德·福克納成為1890年代初關稅審議時期參議院金融委員會的專職統計學家。阿德納·F.韋伯在柏林研究生畢業后到紐約擔任勞工統計局的副局長，這個統計局很快發展成為歐洲社會政策觀念的集散地。在這方面亨利·梅耶的生涯最典型。梅耶1894—1895年在柏林施穆勒和瓦格納的指導下學習，從瓦格納身上吸取了國家功能擴張的思想，從施穆勒身上吸取了反對演繹式經濟理論的基本態度。回國后，他利用自己關于普魯士鐵路體系的知識謀得了威斯康星大學教授職位，在起草威斯康星鐵路委員會法案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是這個委員會的首任主席，并且從1911年到1939年是聯邦州際商業委員會的成員。[[199]](#_199_30)

隨后，1880年代的人也學會扮演新角色。塞利格曼成為美國累進稅制方面的頂尖專家，雖然他強調這不是瓦格納那種明確的再分配主義原則。亞當斯在默默地講授勞工組織、社會和工業改革的同時，終于找到了發揮政策影響力的合適職務，成為新的州際商業委員會首席統計學家，他細心推動對稅率和工作條件進行技術上可靠的監督。伊利在1894年與威斯康星大學管理者發生沖突后，也學會了從專家政策內部滲透的藝術，沉浸在土地經濟學的議題中。[[200]](#_200_30)

這種取得影響力的路線變得如此熟悉，很快，從規勸到以大學為基礎的專家權威這個轉變看起來像自然的進步過程。作為專業化的社會過程的內在屬性，它似乎不需要解釋。但是這種權威系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從國外引進的，是國內政治和跨越大西洋的進步紐帶結合的結果。沒有誰迫使人們必須依賴大學教授提供制訂政策的專業知識。在這點上，也沒有誰強迫對專家的政治依賴。英國國家機器并不是掌握在專家手里而是在牛津和劍橋的業余愛好者手里。倫敦各部委吸收高級政務員和決策制訂者是從接受通識教育和有特權出身背景的人中選拔，候選人參加的競爭性考試在設計時就把政策專門知識看作無關緊要的。在進入這個圈子的人中間，聯系廣泛的自由職業者知識分子相當程度上比大學教授更常見。皇家調查委員會的成員構成也是如此。[[201]](#_201_30)

對于高級公務員在經濟學和公共法律方面的訓練要求，就像大學教授在大學講堂和政府部門穿梭的情形一樣，都是建立在大學和國家機構關系特別密切基礎之上的德國風格。公共調查委員會是其中一個典型模式。大學經濟學家是國家委員會的固定成員，即使相對來說屬于邊緣性的人物馬克斯·韋伯，在1890年代也被任命為聯邦議會的股票和商品交換調查委員會的成員。[[202]](#_202_30)

1890年代在德國留學的美國經濟學家把這個模式帶回美國，努力把它嫁接到美國更分散的國家權力結構上，并產生了相當程度的影響。從1883年基本上是從參議員亨利·布萊爾的口袋中拿出來的參議院勞資關系調查委員會，到1898年至1902年充斥著大量專家報告的工業委員會，到1912年至1915年的工業關系委員會（該委員會由威斯康星大學的約翰·R.康芒斯作為核心成員之一，還有大量的專職社會經濟學家為其效力），現代公共調查委員會的發展概括體現了教授提升為國家政策顧問的模式。新社會政策壓力集團如美國勞工立法協會、全國消費者聯盟、全國童工問題委員會的顧問機構，都充斥著大量留學德國的畢業生，這也說明了同樣的情況。在1908年，以大學為基地的專家和進步國家機構合作的進步時代高潮時期，威斯康星大學41位教授每人占據正式的國家委員會中至少一個席位。到了1914年政府換屆不到一年，教授們都被清退。盡管如此，滲入國家機構內部的活動證明，這是一條比亞當斯一代公共預言家式的抱負更可靠的獲得影響力的道路。[[203]](#_203_30)

簡而言之，由于他們第一次遭遇德國人特別激烈地攻擊曼徹斯特經濟學，德國大學紐帶的首批美國學生開始為自己尋找發揮影響力的手段和實現新國家意識的機構平臺。他們開始一點一點地幫助確定美國社會政治的因素。到了世紀末的時候，這批人已經做了很多工作，使得經濟學文本擺脫了他們年輕時代接受的倫理經濟學推論。如果說還沒有消除市場的“自然性”特權，至少已經做了很多工作讓公共行動和控制的機構變得更自然些。到了世紀之交，阿德納·韋伯確定古典學派和歷史學派的巨大爭論“早已了結”，陷入折中和妥協的融合中。國家和經濟的清晰界限演變成為出于私利和實際情況的考慮，雖然辯論仍然激烈，但已經沒有了前輩那種形而上學的爭論。[[204]](#_204_30)

因緣際會，19世紀末期一代有政治抱負的年輕知識分子意外地轉向德國留學，而在這些事件的所有后果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明顯的是：它給經歷這個過程的人烙上了持久的世界主義思想印記，讓他們成為歐美世界社會政治事業的自覺的公民。

德國大學紐帶開啟了美國社會政治的“跨越大西洋”時刻。這些留學生帶回美國的是一種強烈的自由解放意識，擺脫了年輕時代禁錮的思想世界——包括自由放任經濟思想那嚴格的、推理性的思想范式。他們帶回了新的政治理想和權威的新模式，帶回了美國政治中缺乏“社會”立場這一深刻認識，還有關于國家的社會可能性的新意識，這意識既讓人擔憂又讓人興奮。他們的道路連同接受他們思想和影響的學生的道路縱橫交錯，貫穿于這故事后來的各個章節。

但是正如他們的經歷顯示的，大西洋紐帶決不僅僅是思想的簡單傳播、思想類別的抽象傳輸，或者平靜愉快的游覽航行。留學德國的美國人對他們在海外所見所聞的緊張和痛苦的思考、他們的新社會政治與國內經濟結構之間的沖突都成為影響全局的因素。在不同國家組成的世界里，跨越大西洋的社會政治從一開始就是充滿陷阱和危險的。跨越大西洋的社會政治中持久存在的狂喜和緊張才剛剛開始。

# 第四章 自我支配的城市

## 都市生活的集體主義

1880年代開始的經濟學理論的斗爭在1890年代首次在“大城市”進入政治頭腦。現代讀者已經習慣于認為民族國家是社會政治中的主要角色，所以有必要停下來對這一點思考一番。20世紀末期美國重新泛起的“都市危機”言論充滿絕望情緒，一個世紀前的城市卻正位于跨越大西洋的進步人士想象力的核心地帶。正如現在人們常說的，如果有意識的公共行動能夠拯救當今城市免遭社會和經濟力量的蹂躪與毀滅，就需要各國政府動用意志和資源促其實現。但是對于大西洋兩岸老一輩都市進步人士來說，方案正好相反。如果要改造國家的話，首先就要抓住城市的社會可能性。

夾在民粹主義動蕩和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改革之間，美國進步政治歷史中這薄薄一片都市“時刻”并沒有被人們所忽略，但是它的國際動力學和視野還很少得到認真研究。不管是對于1890年代倫敦的費邊社、1890年代法蘭克福左傾自由派，還是克利夫蘭和芝加哥的進步人士，大城市都成為社會政治動員、實驗和爭議的主要場所。在塑造都市社會政治方面，沒有能夠和亨利·喬治或者阿道夫·瓦格納相媲美的體系創建者。都市社會政治的理論雖然不缺乏宣傳家，但仍然只是初具規模、模糊不清的。其共同元素是都市生活中平凡的物質設施：自來水、街道、有軌電車、公共澡堂、煤氣、住房等。但是，在關于誰應該控制這些商品和服務的斗爭中，在增進城市社會責任感、把城市從惟利是圖的商業利益中解放出來的夢想中，大西洋兩岸對自由放任思想的反叛投入了第一個共同的試驗。

大城市和社會政治之間的聯系是多方面的。當民族國家的首要事務是軍隊和帝國，公共福利則屬于地方政府的管轄范圍。那里有窮人救濟，也有大部分相互支持和幫助的體系。而且，大城市有相當多的資源來落實繼承下來的政治責任。雄心勃勃的年輕社會政治改革者來到倫敦、巴黎、芝加哥、柏林或紐約，吸引他們的力量和吸引農民、政客、企業家、藝術家來大城市的力量一樣。社會機構在這里扎根，而大學（牛津和劍橋除外）本來都是城市產物。可以肯定，大西洋兩岸的進步壓力集團和公共機構成員中大部分是城市居民。大眾媒體和動員工人階級的大機構都把總部設在城市，如果中產階級改革者需要且希望，這些都可以成為潛在的盟友。

最重要的是，大城市的結構本身融合了進步政治的一些關鍵問題。其中最重要和最明顯的問題是社會碎片化。工業資本主義的階級劃分就連在最黑暗的煤礦地區也沒有在城市表現得更清楚。恩格斯在1844年寫道：“對倫敦來說真實的東西，對曼徹斯特、伯明翰、里茲也是真實的，對所有城市都是真實的。”“任何地方都存在一方野蠻、冷漠、自私自利，另一方處境悲慘、痛苦不堪，任何地方都是社會戰爭、任何人的房子都處在被包圍的狀態，任何地方都存在法律保護下的相互掠奪。”[[205]](#_205_30)這個指控有點夸張了，但毫無疑問，大城市讓工業資本主義競爭性的、碎片化的面孔更加清晰地展示出來。從縱向來看，大城市分解成為利益和階級，從橫向看，區分成為鮮明對照的大片住宅區。人們走在這樣的街區中間，周圍情景的變化給人的感覺就像背景和舞臺陳設突然被拿走，換了截然不同的東西放在原來的位置上。大城市作為對比鮮明的次城市的集合而不斷擴張，這里一個金融區，那里一個高級住宅區，貧窮臟亂區、工廠集中區、倉庫和商店集中區、中產階級郊區和廣大的工人階級聚居區等，而這些大區又可以分成小街區和民族聚居區。在19世紀的倫敦和巴黎甚至沒有表面上的地方自治把所有這些組合起來，以免城市內的階級沖突再激發革命的火藥庫。

最讓人感到擔心不安的是城市中大量增加的貧窮勞動者。最廉價的住宅區里涌來大量失去土地的農民，他們由于不能在城市的工廠、機關和倉庫中尋找到安定的立足之地，只有在龐大的都市里從事不固定的、無需技術的勞動。他們把紐約市政廳陰影下的五點區（Five Point district）、倫敦散亂的東區的白教堂、柏林貧窮居住區的內院變成世紀之交悲慘生活的比喻。1902年到達英國的作家杰克·倫敦不知道如何去東區，但是知道他得去看看，正如在紐約的歐洲進步人士知道需要看看第五大道上富豪們的宮殿一樣。資本集中的地方和貧窮集中的地方，財富的貪婪炫耀和毗鄰的卑屈痛苦：城市集中了都市作家巧妙地稱之為都市生活“陽光和陰影”的東西。[[206]](#_206_30)

盡管城市是分裂和破碎的地方，但與此同時它也是巨大的集中地。在這點上，恩格斯沒有抓住其標志。如果沒有硝煙的日常戰爭是大城市生活無法擺脫的困境，那么，城市中人們相互依賴的程度同樣強大。城市居民通過范圍廣泛的商品和勞務市場進入城市，通過土地和住宅市場分為不同街區，由商店店主、小販、運貨人、中間商的龐大隊伍維持著。他們生活在相互倚賴的大網中，這網一方面力量異常強大，另一方面又看不見摸不著。大城市以外的任何地方都不像這樣完全依靠看不見的供應者來提供住宅和生活必需品。薩姆·巴斯·沃納所說的“私人的城市”，由很多私人決定組成的產物，實際上是由相互倚賴的關系組成的一張大網。[[207]](#_207_30)

不由自主地，城市無形的資本集體主義迫使集體考慮進入了人們的政治意識。大城市最緊迫的問題之一是健康。社會政治形成的大部分歷史，實際上可以作為圍繞公共健康概念而斗爭的故事來寫——健康不僅根源于個人紀律和衛生，而且也在于勞動和住房的社會環境。除了如老年、孩子出生和事故等傳統的健康風險外，城市又增加了因居住集中、相互倚賴而產生的風險，其中很多像水里的微生物，是普通人肉眼看不見的。正是1840年代英國埃德溫·查德威克率先進行的大型衛生調查，令人震驚地首次確定了都市疾病的生態學病因，顯示了污染的水井、不流動的污水溝和院子內部不透氣的窩棚有影響深遠的公共危害。由于財產所有者的個人算計，沒有人愿意為改善衛生狀況付出經濟上的代價。因此，衛生調查不僅提供了集中居住的人口在健康風險上的醫療教訓，同時也提供了經濟教訓，指出關注自我利益的商業行為對社會造成的危害。[[208]](#_208_30)

由于衛生科學的推動和霍亂疫病的威脅，加上人們對貧民窟道德敗壞的恐懼不斷加劇，19世紀政治當局首先在英國，后來在其他地方開始加強對私人城市的管理，制訂更系統的地方法規、建筑規范、衛生條例，確立定期住宅檢查等制度。影響更重大的是，政府當局開始慢慢承擔起某些商品供應者的責任，這在之前被普遍認為屬于私人供應商的范疇。飲用水首當其沖。當1840年代英國開始衛生運動的時候，北大西洋經濟體內的自來水廠幾乎全部是私人經營的，是用來賺錢的行當。但是在流行病和傳染病的刺激下，市政府開始為自來水供應的公共體系投資越來越多。膨脹的城市人口推動政府從簡單的管道作業到建造范圍廣泛的供水體系，包括水庫、渡槽、總水管、過濾廠等。到這個世紀末，自來水供應已經成為巨大的公共經濟活動。英國1905年最大的50家工業企業平均資本化程度是440萬英鎊，而伯明翰的自來水系統工程融資接近800萬英鎊，倫敦的新大都會供水局是4700萬英鎊。[[209]](#_209_30)即使從“守夜人”那種最簡樸的公共安全的概念來看，大城市生活的相互依賴性也能成為規模驚人的集體主義的發動機。

但是如果城市能夠而且應該賣水以確保私人自來水公司無法維持的充足清潔水源，它還應該提供其他什么東西呢？城市是否應該為了居民的安全照亮街道，為了身體健康和休養建造公園和運動場，為了讓公眾擺脫愚昧、叛亂和暴政而建造學校和圖書館呢？是否應該擁有城市的公墓和屠宰場以保護附近居民的健康呢？是否應該擁有公共澡堂呢？正如簡·亞當斯1892年宣稱的，在赫爾館周邊三分之一平方英里范圍內只有不到三個澡堂。或者為了確保小孩喝上不摻水的牛奶，是否應該擁有牛奶消毒站和供應站呢？或者醫院和門診所？[[210]](#_210_30)是否應該打掃街道，清運每天的生活垃圾？是否應該宣告不適合居住的房屋為危房，把它們拆除，在原地重建新的、質量可靠的、衛生條件達標的房子？是否應該建設城市公共交通線路，讓為了能步行上班而不合理地擁擠在一起的人口分散到更健康的郊區？一個城市到底要管理什么？應該把哪些東西交給市場刺激來調節？哪些要特許經營？哪些要自己擁有和經營？城市生活中預料之外的集體主義迫使人們思考所有這些問題，顛覆了傳統的觀念，模糊了私人和公共義務的界限。

城市政府任務的“功能擴張”是這個現象的社會學術語，但是這個比喻不應該讓人產生誤解。城市當局不管往哪個方向轉，它們添加的任務都會與已有的私人企業發生直接沖突。城市供應的新領域中沒有一項不是有人已經在做的。19世紀中葉的城市擁有很多商業自來水供應商、卡車司機、私人垃圾清運者、房屋出租者和房產商、兌水牛奶的銷售者、偷工減料的建筑商、公交公司、街道清掃承包者、各種形式的特許權擁有者。城市官員往往被人收買，他們在出售城市的商業可能性時，與商人勾結推動了城市的商品化。甚至污水處理也讓城市遭遇大大小小的眾多商業操作者，他們為處理城市的排泄物而獲利：污水池清潔工、污水處理工、糞肥清理工；為了微薄的工資，一群婦女專在夜間活動，把柏林有錢人家里的馬桶運送到施普雷河里。即使把都市生活中最卑微的必要工作收歸市營也絕非簡單的服務擴張，當城市承接服務供應者的任務時，就闖入了私人供應者的領域。

簡而言之，市營化意味著市場的減小和商品從私人向公共部門的轉變。一方面存在根據市場規則定價的商品和服務，它們由私營企業自主決定；另一方面是公共商品，即使有直接定價的話也是由社會來定價。后來，中間地帶會被一系列模糊了早先清晰界限的混合體來填充，如準私營商品，最初由私人創立但是接受公共管理；或者準公共商品，由公共確定但是通過私營企業來提供。但對于世紀之交的城市進步改革者來說，把什么確定在市場領域之內，把什么確定在市場之外是差別鮮明的，并且能產生重要的政治影響。雖然批評者有時候給他們貼上“集體主義者”的標簽，但進步人士并沒有把大城市生活集體化。這個任務是由城市商品和勞動市場的創造者、企業家和（這個世紀末的）壟斷者完成的。進步人士的工程不同，他們試圖把城市隱含的集體主義在自覺的、公共的界線上加以實現。

巨大的權力對大西洋世界的城市來說不是什么新鮮東西。中世紀和現代城市早期的社會和經濟能力一直是巨大的，不是理論上的空談。市屬機構收容病人，接濟窮人，擁有市場、碼頭、公共土地；它們管理價格和工資、守護街道、主持正義。進入現代社會，這些權力的殘余繼續存在于偶爾設立的公共市場、城市醫院、窮人農場或者城市采石場。但是外部受到民族國家中央集權化的胃口的挑戰，內部因企業自由領域不斷擴張的要求而成為中空，城市的經濟功能慢慢萎縮到一個受到很大限制的范圍內。

在19世紀中葉城市私有化高潮中，城市行動的范圍在北大西洋經濟體內變化很大，但是政策和觀點的趨勢是普遍一致的。當大城市對自來水、衛生、燈光和交通的需要開始超過了傳統的家庭作坊式技術能力時，在任何地方，抓住機會的都是私人風險資本家。私人提供服務的城市中，水不是來自私家水井，就是從供應商的水管流來；垃圾和廢物清理是小企業的領域；提供街燈的煤氣是從私人煤氣場購買的；電從1880年代的愛迪生和西門子專利工廠進入城市，一開始就是巨大的產業；交通運輸是很多商業承運者、搬運工、出租馬車和公共馬車夫、有軌電車、蒸汽鐵路公司組成的大產業。[[211]](#_211_28)

但是在城市消費者和供應商之間，摩擦和沖突是普遍存在的。由于各方面都在增長，城市迫切需要技術進步和服務的擴張。而城市服務的私人投資者把資本投入到自來水管道系統或馬拉的街車軌道線上后，最希望照管已有的投資以便得到所有回報。自來水私人供應商不大愿意進行昂貴的投資修建水庫、渡槽或開辟清潔水源，所以經常與城市委員會就自來水供應的可靠性和質量發生矛盾。倫敦就是一個臭名昭著的例子，到了1899年時還因為私人供水公司而動輒讓城市在夏天陷入水荒。[[212]](#_212_28)城市委員會和私人煤氣公司也常常因為價格和利潤問題爭吵不休。多倫多、紐約、格拉斯哥、慕尼黑、科隆等一再上演的情景是城市委員會與公交車專營權所有者的爭吵，商業公司不愿意把線路和服務延伸到城市密集居住區和核心地帶之外，因為只有那些地方的投資回報率是最高的。

沒有什么比壟斷地位更能有效地促進資本的生產率了。為了獲得壟斷地位，私人服務投資者大膽前進，所以，說他們不愿意投資進行昂貴的技術革新純粹是謊言。在投資規模特別大的領域，像煤氣和公交系統，投資者的熱情特別高，因為他們要搶在競爭對手前面。他們通過購買和撈取不打算實現的專營權，鼓動政府的一個部門與其他部門扯皮，行賄政府官員，或者干脆用收買競爭者等辦法讓提倡競爭的人來不及建立市場。在這些方面，叛逆經濟學家的“天然壟斷”主張中的形容詞“天然”是誤導人的。商業公共服務公司動用其所有的經濟和政治資源以便形成壟斷，并從中獲得19世紀后期所能提供的豐厚利潤回報。[[213]](#_213_28)

關于價格、利潤和供應的結構沖突形成了19世紀末期公共服務政治的一個背景，另外一個背景就是都市財產所有者對增加稅收負擔的根深蒂固的厭惡。只要城市被認為是不自然的稅收負擔，也就是在私人的、個人的預算中必須盡可能減少的開支，那么要求公共開支節儉的壓力就會成為都市政治的核心。任何地方的公共投資新建議都遭遇質疑和推遲。這個時代的先驅者、公共衛生學家埃德溫·查德威克在他的祖國英國一直陷入政治麻煩里，其里程碑式的《公共衛生法案》只推行了六年，查德威克的批評者就通過修正案讓法案陷入癱瘓，并永遠把他從公職崗位驅逐出去。1873年，霍亂橫掃漢堡讓人們看到城市供水方式的不足，但正如理查德·埃文斯顯示的，城市財產所有者協會頑強抵抗和官僚拖拉多年后，市議會才最終在1890年同意投資水過濾技術。私人提供公共服務的城市得以維持不僅符合商業供應者的利益，也得到厭惡稅收的意識形態的強力支持。[[214]](#_214_28)

這個模式的第一個突破是飲水和污水處理問題。由于受到英國公共衛生學家先驅的鼓舞，英國市政當局在1850年代率先把飲水供應從私人轉變為公共福利，逐漸購買商業水廠，投資城市管理供應的新系統。到了1879年，英國城市衛生區的幾乎一半都是由公共供水；到了倫敦改為公共供水體制前夕的1903年，在自來水供應方面的公共投資幾乎達到私人投資的兩倍。[[215]](#_215_28)為城市噴泉和消防栓供水的總水管并不是直接把水送到多數城市居民的住房內。為工人階級提供的公共澡堂來得更近。1846年的一個議案讓建造公共澡堂成為英國城市可以允許的開支，八年后倫敦有13個城市所有的公共澡堂。到了1890年代，最大的澡堂除設有淋浴澡堂和游泳池外，還有洗衣店、酒吧和公共演講廳。[[216]](#_216_28)

但是讓人感到矛盾的是，更充裕、更干凈的城市供水沒有帶來更多的健康。因為水流到污水池、地窖、廁所，匯入水塘和負擔過重的溪流和溝壑（它們充當了陰溝），沒有排干的、水多為患的19世紀晚期城市本身成為環境危害的根源。盡管遭到納稅人的反對，緊隨公共供水之后而來的是對于排水管和污水處理設施的更大投資，不僅是接收城市污水和馬糞的污水管（如游客參觀的拿破侖三世時代巴黎的大污水管），而且通過查德威克的技術突破，即連接到家庭“水廁”（water closet）的水沖衛生排污系統，慢慢開始讓夜晚干活的運糞工人和污水池清理工丟掉了工作機會。[[217]](#_217_28)

從公共供水到公共排水投資，再到后來（排水仍然不能帶來健康）更遙遠的水源供應和新的過濾技術，這一連串相互聯系的事情成為野心勃勃的市政府必須擴大行動范圍的幾個努力方向之一。有些聯系是技術上的，比如與水生疾病戰斗的不斷推進的前線；有些聯系是組織上的或者資金上的，如在城市供水廠、城市煤氣照明廠獲得的管理能力誘惑市議會向外尋找行動和利潤的新來源。另外一個擴大供應范圍的動力借了比喻的翅膀，起初針對城市污水臭氣引發流行病的衛生運動，現在擴展到了反對城市貧民窟和廉價棚戶區道德墮落和社會罪惡等“烏煙瘴氣”的運動。[[218]](#_218_26)針對貧民窟和“擁擠住房群”的戰役代表了都市更廣泛社會成本概念的開始，雖然它顯得有些裝腔作勢，而且對那些在清理貧民窟時被趕走，或者被整頓擁擠宿舍的檢查員發現而強行推進黑夜的人來說，未免過于殘忍。一旦城市事業的邊界開始向外延伸，所有這些因素都成為強大的加速器。

19世紀末期城市事業最受推崇的典型是約瑟夫·張伯倫的伯明翰。1870年代這個英國城市采取的措施本身沒有一項是嶄新的。讓伯明翰成為19世紀后期公民積極主義的代名詞的，是張伯倫對城市事業新領域間潛在的相互關系的把握、他對同時做所有事情的熱情，以及他在公共投資方面的精明。當張伯倫1873年擔任市長的時候，正如那個時期公共媒體描寫的那樣，伯明翰籠罩在工廠和車間排出的濃煙中，很難說是一個模范城市。該市的死亡率據說是島上所有大城市中最高的，商業供應者的管道自來水常常不能滿足需要，污水管的負擔過重。市議會對即將到來的龐大修繕開支感到害怕，頑固堅持公共開支的節儉原則。[[219]](#_219_26)

張伯倫是機器商品制造商，比長期主宰伯明翰市議會的小商人、小店主見多識廣，更習慣于大場面、大規模的行動。他提議通過城市直接提供公共服務的方式打破給排水、健康、稅收等僵局。因為專營權的優惠條款大發橫財的伯明翰煤氣供應商成為他的第一個目標。一年之內，城市已經買下他們的全部股份，把商業煤氣銷售中的利潤投入到改善市政條件上。從此以后，其他措施很快跟進。市里利用煤氣供應公有化獲得的收入購買并擴大了伯明翰水廠，開始投資延宕已久的污水處理和衛生設施改造。張伯倫抓住一項允許政府沒收不符合衛生標準的住所的法律，帶領城市開始野心勃勃的城市土地價值重建的活動。位于市中心附近的43英畝廉價住房被全部拆遷，居民被遣散，取而代之的是漂亮的新商業街，所需費用由向商業建筑投資者重新銷售毗連的土地所得利潤來支付。到了1890年，張伯倫自己已經登上全國政治舞臺，伯明翰不僅擁有公共煤氣收入、新公司街（Corporation Street）的繁華氣派，而且有新的公共澡堂、公共藝術學校、藝術博物館、新的城市公園、典范的污水管、新的城市污水處理廠。市政廳鑲有馬賽克和包含寓意的雕像，成為英國最昂貴的市政廳之一，這實際上是伯明翰的商業“市政改革”的紀念碑。[[220]](#_220_26)

咄咄逼人的商業市政意識是伯明翰城市復興的標志，伴隨而來的是城市權力悄悄的上升。到了1870年代末期，對納稅異常敏感的店主們已經失去對伯明翰市議會的控制，取而代之的是像張伯倫一樣習慣于更大膽的資本投資的富豪。生產商聚集在城市的煤氣和改造委員會，對城市的商業優勢保持高度關注。在沒有明顯的市政利益的領域，他們的興趣就明顯下降。在反對伯明翰一個又一個街區那種“背對背”的工人階級住房方面，城市議會沒有多少進展。到1900年的時候，這個城市幾乎四分之一的住房仍然沒有衛生的排污系統。難怪激進的經濟學家托尼把張伯倫風格的“市政商業”（municipal trading，城市接管產生收入的活動的正式名稱）貶低為商業支持者采取的為自身利益服務的工程：“顯然，這里沒有任何革命的種子。”[[221]](#_221_26)

但是在不那么激進的程度上講，里面還是有些值得稱道的內容。張伯倫自己吹噓說城市打破了“對于所謂政治經濟學固定原則的學究式堅持”，那些原則把市場行動的領域和合法的公共活動嚴格對立起來。[[222]](#_222_26)城市已經從原先那種財產所有者的有限看護協會，變成了一個大型經濟企業。伯明翰的公民資本家幾乎就沒有開始改變城市的階級關系，轉移到“公司街”之外的貧民窟仍然存在。伯明翰的政治教訓表現在另外一個層面：一個城市本身可能從其存在而造成的市場中成功索取公共回報。

到了世紀之交，人們在北大西洋經濟體的大部分地區都能看到伯明翰。最大的例外是法國，那里的城市處在國家官員特別嚴格的控制下，沒有獨立能力簽訂債務合同，幾乎排除了城市所有權實驗的可能性。但是在英格蘭、蘇格蘭和德國，世紀之交的前后十年都處于城市企業特別的繁盛期。[[223]](#_223_26)

到了1890年代，伯明翰在城市改革的領先地位被工業蘇格蘭巨大的、灰色的造船和機械制造經濟中心格拉斯哥所超越。在格拉斯哥，定調子的主要是公共健康而不是公共利潤。經過與煤氣供應商就服務充分性的不斷爭吵，該市比伯明翰早五年，在1869年把煤氣供應收歸市府所有。伯明翰的市議會把煤氣價格定得高，讓利潤流入市財政，而格拉斯哥把煤氣價格降低一半，而且免費出借煤氣爐子鼓勵更衛生的做飯方式、緩解城市的煤煙籠罩。為了取代已成蘇格蘭城市禍害的異常擁擠的、黑暗的石頭公寓，格拉斯哥城市當局不僅拆掉了貧民窟住房，而且在原址建造公共住房（類似動議在伯明翰遭到市議員反對）。當發電技術和電話技術進入蘇格蘭時，該市就開始為市民提供這兩種服務。[[224]](#_224_26)

但是，讓格拉斯哥的城市野心聞名于世的是公交車。雖然英國的幾個城市都擁有自己的地下軌道系統，但是在同等規模的城市中，還沒有一個建起屬于城市所有的街道鐵路網。在1894年，因為對私人專營者拒絕把運輸服務擴展到有利可圖的內城之外失去耐心，政府決定想辦法分散過分擁擠的內城人口，建立自己經營的有軌電車系統。私人專營者退回到公共馬車與城市公交車委員會正面競爭幾個月，直到私營公司失敗而退出。

德國城市雖然普遍比英格蘭或者蘇格蘭城市有更廣泛的權力，但在19世紀公共健康方面遠遠落在后面。柏林的骯臟是出了名的，甚至到了1872年時，查德威克斷言你可以從衣服上散發出來的臭氣辨認出誰是柏林游客。除了漢堡外，現代供水和排水系統直到1870年代后才進入德國大城市。但是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整個德意志帝國的城市由于新的工商業財富和城市間相互競爭的推動，在自來水、衛生和煤氣供應等方面的投資大幅度增加。到了1889年，德國一半的煤氣廠是城市所有的。十年后受到這些結果的鼓舞，德國城市大幅度購買發電廠，出手速度之快在整個歐洲沒有對手。[[225]](#_225_26)在商業公司占領的地方，德國城市官員開始更苛刻更準確地討價還價。柏林當局和城市公交車專營商在1890年代達成的協議不僅確定了總體營業收入上繳市政府的比例、在城市指導下完成技術改進的責任，還確定了公交車員工最高工作時間、最高票價以及特殊的、低價的、為工人階層提供的車票。[[226]](#_226_26)世紀之交到柏林來的游客會驚訝地發現過去技術落后和“骯臟的”城市變成了干凈和高效的模范，正如美國月刊《評論之評論》所說的，是“把現代衛生科學應用在公共管理上的杰出典范”。[[227]](#_227_26)

但是正如在英國的情形一樣，櫥窗城市都是遠離朝廷和帝國政治復雜壓力的小城市。伯明翰和格拉斯哥對于英國就像法蘭克福和杜塞爾多夫對于德國一樣。1891年到1912年在市長弗蘭茨·阿迪克斯領導下，法蘭克福開始龐大的建設項目，寬闊的新街道和公園、現代污水處理廠和垃圾焚化爐、城市澡堂、廁所、游泳池，還有新的公民大學，建在新的維也納風格的環城大道（Ringstrasse）上。在城市的東部邊緣，在美茵河上建造了雄心勃勃、利潤豐厚的城市碼頭，周圍都是城市繪制的工廠區和工人住宅區。它建立了城市管理的勞動局，后來德國其他地方紛紛仿效成立類似機構。它買斷了公交車專營者，擴展服務并為工薪階層提供廉價車票，還建設了屬于城市所有的發電廠，為運輸系統提供電氣化便利。為了減輕老城的住房壓力，它推行了擴張性的吞并郊區政策，給慈善協會提供貸款沿著新的城市公交線建造成本低廉的外圍住房，在德國制訂了第一個城市分區條例。杜塞爾多夫是個強勁的對手，有經過科學規劃的、歸城市所有的大港口，有城市抵押和儲蓄銀行、勞工交流市場和仲裁法庭，還有歸城市所有的當鋪、醫院、療養院、公墓、屠宰場、公共閱覽室、戲院和交響樂團。仔細研究這個城市的弗里德里克·豪威肯定，杜塞爾多夫比世界上任何城市擁有“更多的東西，為市民做了更多的事情”。[[228]](#_228_26)

張伯倫1891年把這種現象贊許性地稱為“城市社會主義”，當時“社會主義”表達的是英語世界最寬泛的意義。但是如果這是社會主義，也是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幾乎任何地方都和在伯明翰一樣，城市企業擴張的領頭人都是本地商人。雖然工會領袖出現在英國城市議會中不是罕見的事情，但是非競爭性的選舉、漫長的任期、白天沒有工資的冗長會議，這些都嚴重限制了即使擁有技術和財產的工會貴族的影響力。格拉斯哥的城市議會直到1898年才有第一批工會代表議員。作為長期以來把英國城市政府與公眾政治割裂開來的結構中的少數團體，工會議員從來沒有為戰前的城市“社會主義”定調。[[229]](#_229_26)

至于工人階級選民，阿爾伯特·蕭在1890年代中期得出的英國“貧民窟不投票”這一結論并不十分準確。競選1894年倫敦學校董事時，費邊社成員格雷厄姆·沃拉斯在投票的最后時刻看到拉選票者為他拉來的選民后很懊喪，這些男女“戴著破舊的草帽、面孔呆板、頭發亂糟糟的，被人用馬車或者汽車從做火柴盒、扣眼、廉價家具的地方或者酒館拉走，或者（因為是星期六晚上）是從床上拉走的，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樣子。在不熟悉的環境中，他們中的許多人似乎在努力搞清在門口時人家叫他們投票選舉的人名”。由于居住權的限制和在選舉日期前完稅要求的約束，貧民窟投票的人確實不多。專家認為這些限制的積累效應可能剝奪城市投票權名冊成年男性中25%到40%的人的權利。從政治上說，城市屬于資產階級，當然也包括新的公共經濟企業。[[230]](#_230_26)

在德國，排他性結構的門檻更高，要求更嚴格。市議會投票權的要求在德意志帝國的不同州會出現一些變化，但是甚至英國城市民主那種非完美模式，在德國都沒有一個城市當局達到。關鍵是一系列非常高的財產限制門檻。1904年在漢堡，在德國國會選舉中有資格投票的人口中，只有29%的人有足夠的財產在地方城市議會中投票；在1914年的法蘭克福，即使通貨膨脹讓財產門檻降低后，有資格投票的人仍然不過一半。在普魯士帝國心臟，城市議會席位的一半是為房產所有者預留的。讓普魯士的情況更加復雜的是城市選舉中的三階級投票規則。把選民按三個等級安排的結構始于把納稅人分成三種類別，從納稅最多的人開始往下：那些總體上支付城市稅收的前三分之一的人歸為城市投票者的第一階級，那些支付第二個三分之一的人屬于第二階級，剩下的人屬于第三階級。每個階級有權投票選舉城市議會中的三分之一議席。結果造成位于頂端的富豪權力異常集中，而來自底層的大眾壓力遇到非常有效的壁壘。在柏林，第一、第二階級投票者加起來只有城市選民的3%。阿爾伯特·蕭注意到在1890年代的埃森，第一階級的一名投票者在投票處一下子選舉了城市議會三分之一的議員。[[231]](#_231_26)

盡管有這些困難，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十年里，社會民主黨在進入德國城市政治的道路上還是取得了相當大的進步。在1912年的法蘭克福，他們占據市議會三分之一的議席，在柏林的份額幾乎一樣大。但是從結構上說，他們對政策的影響受到很大限制。在19世紀的末葉，德國城市管理集中在特別強大的專業官僚手中。受過大學教育、有終身教授職位的市長（Oberbürgermeister）如杜塞爾多夫的威廉·馬克斯和法蘭克福的弗蘭茨·阿迪克斯，都在德國城市政治中發揮領導作用，充當了針對純粹的財富和純粹的數量的緩沖器角色。這些人都是從公共法律和經濟學學位開始，從城市部門領導到地方行政官到小城鎮的市長一步步爬上來的。至于被賦予了救濟窮人、教育等職責的議會之外的委員會，其成員大部分是產業界和專業界的人士。簡單地說，德國城市控制者與控制英國城市的商人很相像，雖然技術和管理背景更多些。[[232]](#_232_26)

大城市的工人階級居民對于資產階級方式的市政商業心情非常復雜。城市當局和勞動群眾之間多年積累下來的不信任，難以讓當地大部分工人階級不假思考地贊成城市新工程。對于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期的多數城市居民來說，市政府是冷酷的、遙遠的存在，正如哈米希·福拉瑟對格拉斯哥的描寫：

地方政府是警察，在格拉斯哥這樣的城市因為成員大部分是從高地招募來的，具有外來占領者的某些特征。地方政府是城鎮法院負責判決醉酒鬧事者、流浪者、遲遲不納稅者，簽發驅逐房客的授權書等的法官。地方政府是在半夜和凌晨五點之間突擊搜查違章房屋，徒勞地試圖控制過分擁擠現象或者批評房客沒有保持公共樓道和廁所衛生的衛生官員……地方政府是在拆遷了窮人房屋后的土地上新建的、漂亮氣派的市政廳。地方政府是目光短淺的委員會，對窮人、需要幫助的人、病人的基本需要都吝嗇地不管不顧。地方政府是喜歡打人的老師和學校當局監督曠課的官員，他們實施強制性的“義務”教育但非免費教育。城市當局的這些表現中，沒有一樣是能讓工人階級中的許多人感到親切的。[[233]](#_233_26)

在這種普遍的基本態度外，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添加了更多的不信任。和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生產資料的宏大工程相比，沒收這里的水廠、那里的污水管只能讓人覺得可憐，這是遠遠不夠的。直到1893年，德國社會民主黨才放棄了對黨員參加市議會選舉的限制。接下來的十年，黨內爆發了關于城市議題的激烈討論，最終形成1904年的城市要求項目，但核心不是公共服務政治而是民主化和更平等的稅收政策。社會黨人一旦當選市議員就竭力推動傳統的工會議題：為城市工人提供的模范工作條件、失業者的工作救助、勞動法庭對工人投訴的判決，以及對窮人更慷慨的救濟等。[[234]](#_234_26)在法國，1896年的選舉讓社會黨在150個城市議會占了多數，工人階級社會主義的目標顯得更近：失業救助、幫助罷工工人家庭的基金、工作中受傷的工人的安身之處、對窮人更慷慨和更少侮辱性的幫助、窮人孩子的學校午餐和日托等。這是合作的、社會家庭政治，而不是公共企業的政治。[[235]](#_235_26)在資產階級的“市政商業”和工人階級的“城市社會主義”之間橫亙著期望的鴻溝。

但是讓城市擁有自己的基礎設施，把商品甚至要求嚴格的服務向外擴張，這種想法在政治含義上千變萬化，難怪階級的界限有時候顯得模糊不清。公共服務收歸市營概念的可塑性和它這種企業思想內反商業化的態度，給予城市所有權主張廣泛的吸引力，越過了本來壁壘分明的城市生活。正是在這個背景下顯示出了倫敦“進步主義”的意義，它在1890年代最高潮的時候，是北大西洋經濟體中受到最密切關注的城市政治實驗。

19世紀后期歐洲最大的都市聚集區——倫敦從政治上說根本就不能算一個城市。在1889年之前沒有任何有效的、城市范圍的政府，公共權威被轉移給分類煩瑣、交互重疊的錯綜復雜的機構。倫敦的警察力量直接受中央政府內務部領導，街道和地方衛生的責任被交給地方教區委員會，大規模的公共工程是專門任命的市政工程委員會的職責范圍。[[236]](#_236_26)倫敦的商業利益從公共權威的這種分散化中大撈利潤。倫敦是英國最后一批把自來水供應收到手里的大城市之一，幾乎比伯明翰晚了30年。在1889年，倫敦的主要公共服務如交通、煤氣、水電都是私人公司在經營。

那年，英國議會授權成立倫敦第一個全市范圍經過選舉的管理機構“倫敦市政議會”（LCC），長期壓抑的政治野心迅速浮上臺面。議會的“進步”多數派是換了名字的自由黨團體，進步議員中的一半以上是產業界和專業界人士。但是進步議員中還包括幾位女性，到了1892年，還有一排由社會主義者和工人組成的激進的后座議員。勞工少數派領袖約翰·伯恩斯是1889年倫敦碼頭工人大罷工勝利的領導人，幾年前闖入倫敦政治圈，在鮮艷的紅旗下向失業工人群體慷慨陳詞。尚處于新生階段，在尋找項目和政治舞臺的費邊社1892年派了六人到市議會，包括錫德尼·韋伯。[[237]](#_237_26)

決心追隨北方城市的市營公共事業的腳步，進步多數派很快投票要求把倫敦的自來水供應、煤氣廠、電力供應、碼頭和公交車收歸城市所有。為了模仿伯明翰的公司街，議會穿過國王大道（Kingsway）廉價商店和房屋區開辟了自己嶄新的商業街。以前市政工程委員會拆除貧民窟的地方，是讓私人建筑商和慈善住房協會重新蓋房，而現在議會建造和出租了在戰前歐洲最具創新風格的工人階級房屋。為了人民的道德提升和進步，他們在城市工人階級聚居區還建造了微型公園，配有音樂臺并舉辦免費音樂會。在1907年一個季節就舉行夏天音樂會1200場。它還投資貿易和技術教育，其成員負責檢查從音樂廳歌曲到煙塵危害的所有內容。從來就沒有放松對倫敦城市管理的英國議會阻礙了進步人士企圖管理煤氣、電力和碼頭的努力，并把自來水供應交給一個獨立的公共機構。但是到了1905年已經有了市營的有軌電車運行在倫敦街道上，在泰晤士河上航行的有市營的蒸汽輪渡，上面寫有倫敦市議會（LCC）的標志，沒有人會弄錯。

對于伯恩斯和勞工少數來說，倫敦市議會達到頂點的成就是組織自己的公共工程力量，繞過常常勾結起來競標城市工程的小承包商的“包圍”。伯恩斯選擇1889年污水處理委員會的一個席位，理由是它比任何其他機構雇傭的城市工人都多。當做出規避建筑承包商的決定時，他認為這是“為集體主義做的最大貢獻”。有三千多人在城市建筑領域工作，伯恩斯的觀點決不是毫無根據的，加上一幫文秘、監督者、運輸工人、學校教師等，倫敦市議會儼然成為世紀之交該市最大的雇主。[[238]](#_238_26)

伯恩斯推動勞動標準，費邊社則把市營服務業的概念推廣到更多的商品和服務領域。他們一個又一個添加需要市營的服務項目名單：市營的面包店和屠宰場，市營的防火保險，牛奶配送、市場、醫院以及酒類貿易徹底收歸城市所有。[[239]](#_239_26)圍繞市政商業的可能性，倫敦市議會積極分子編織了烏托邦氛圍。錫德尼·韋伯談論公交車和公共圖書館一樣免費；約翰·伯恩斯建議碼頭作為巨大的工人集體，用市營服裝廠把所有血汗工廠趕出去；激進分子暗示要擴大市營企業的范圍，從城市向外延伸直到全國經濟都社會化。城市所有權這一頂擁擠的政治帳篷確實變得非常寬大了。

但是，“市政商業”思想不可能無限制地激進化而不遭遇越來越強大的敵對勢力。到了1900年，經過十年倫敦進步運動后，反對者開始找到保守派組織反擊的手段。反城市所有化的叛亂表現出多種組織形式（財產所有者保護協會、保護中產階級聯盟、保護自由和財產同盟等），擁有雄厚的資金支持，其中大量資金來自商業電力服務公司。這些團體一起開始推動議會1900年和1903年對市政商業的調查。他們抓住“城市社會主義”言論中的任何漏洞，警告指出飛漲的稅率和英國城市的債務水平，盡最大努力拉攏小業主和中產階級納稅人脫離市政商業的同盟。[[240]](#_240_26)

階級是保守派的一張牌。1907年保守黨選舉海報上的城市社會主義者宣稱：“納稅人！我們要的是你的錢。”漫畫中的人向公眾伸出工人階級短而粗的手指，他胡子拉碴、帽子歪戴著，正是保守派眼中以工人為基礎敲詐中產階級的政治形象。錫德尼·韋伯多年前就諷刺過保守派的這個觀點：

個人主義者城市議員將走在市營人行道上，走在由市營煤氣照明，用市營的水、用市營掃帚打掃干凈的街道上，看到市營市場上的市營鐘表，發現去接市營學校上學的孩子還有點早（學校附近是郡瘋人院和市營醫院），將使用全國電報系統告訴他們不要穿過市營公園，要通過市營有軌電車來市營閱覽室見他。閱覽室在市營的畫廊、博物館和圖書館旁邊，他要在那里查閱一些全國性的出版物，準備他在市政廳的演講。他會說：“先生，讓社會主義見鬼吧，不要用荒誕愚蠢的言論浪費講究現實的人的時間。自助，先生，個人的自助才是讓我們的城市成為現在這個樣子的原因。”

1907年，市政商業的敵人打破了進步人士對倫敦市議會的控制。保守黨繼任者大張聲勢地廢除了直接的公共建設工程，把承包商請回來競標城建工程，賣掉了蒸汽輪渡。[[241]](#_241_26)

像多數行政革命一樣，城市服務業的革命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倫敦公共和私人服務的并存一直持續，直到1940年代該市的煤氣廠才最終歸公眾所有。城市供應的政治總是力量對比很接近。但盡管有這些爭議和反復，城市服務供應還是發生了一個重大轉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英國80%以上的自來水、約60%的電力、37%的煤氣是城市所有，80%的公交車運行在市營軌道上。在德國，公共服務業市營的趨勢同樣清楚無誤。在1908年和1909年，市政商業的爭議在美國處于最激烈的時候，弗里德里克·豪威調查了德國和英國50個大城市的公共服務業的市營程度。[[242]](#_242_26)有些聲稱擁有煤氣和電廠的城市生產能源只是為了街道照明或者公交車，有些城市擁有自己的公交車系統但出租給私人運營商。雖然如此，調查結果是很能說明問題的，具體數字如下：



大量投資公共工程，都市產業階級進步人士促成了城市和私有企業之間界線的重大轉變。他們為世紀之交的城市建立了一套新的集體任務，從最初關心公共健康開始，挑戰了明確的限制。在“福利國家”還只是民族國家上空的云彩之前很久，他們就開始精心策劃地方管理的公共服務和社會定價的商品之網絡了。他們已經進行了跨越階級的同盟試驗，不管帶有多少遲疑與試探性。對于美國進步人士來說，他們的工作不可能不是榜樣和典范。

## 山上之城

受到北大西洋經濟體共同力量的沖擊，美國的城市也不是19世紀更大都市模式中的例外。在那里，城市公共的管理核心也被廣泛的合同、專營權和購買行為所包圍；在那里，公共供應和商業供應的界線也受到挑戰并不斷移動。美國的市政府作為經濟參與者有相當的歷史經驗。支持者渴望得到便利的資產，像煉金術一樣把鄉村十字路口變成另一個辛辛那提或者芝加哥，于是19世紀美國城市政府在交通設施上進行巨額投資，常常遠遠超過經濟謹慎的限度——不僅投在公共道路和橋梁上，而且投在商業的和公私混合的交通企業。在1831年到1860年的佐治亞，鐵路投資的一半資本來自地方和州政府；1840年代和1850年代賓夕法尼亞地方政府在鐵路公司股票中投資約一千四百萬美元；費城本身投資接近一千萬美元。辛辛那提完全擁有一條城市鐵路線到其南部市場。[[243]](#_243_26)

緊隨1870年代經濟蕭條，許多投資出現暴跌局面后，若干州開始設立地方債務協定的高門檻，但是沒有一個州對城市潛在行動的范圍劃出嚴格控制線。美國的城市改革者或許羨慕德國城市相對寬松的經濟自主權，但是憲法賦予他們的能力遠遠超過法國市政府的權限。英國中央政府對地方政策決定和投資保留著嚴密和持久的權威，普魯士地方警察權力完全壟斷在中央政府官僚手中，這些情況在美國都不存在。

無論傳統還是法律能力都沒有排除美國與歐洲城市一致步入新的都市技術。跟從英國的先例，19世紀末期美國城市大量投資公共自來水和污水處理設施。在世紀之交的美國38個大城市中，除了8個外都擁有自己的水廠，這和英國比例大體一樣。除了巴爾的摩仍然被污水池困擾、新奧爾良是私人商業運作城市污水處理之外，其他城市都擁有公共建設的現代排水管。[[244]](#_244_26)

除了自來水和污水處理，公共投資的國家模式開始產生巨大分歧和變化。到美國來的歐洲游客咒罵美國城市街道的糟糕狀況。他們走過一英里又一英里，穿過泥巴、垃圾、腐朽木頭蓋板之間的污水坑——公平地說，城市當局也努力每天筑平和鋪砌道路、清掃街道上每天堆積如山的糞便和垃圾，必須承認美國的城市街道比歐洲密集居住的城市的街道更長更多。不過，在其他公共投資方面，美國城市確實世界領先。19世紀末期的美國城市給公立學校注入了大量資金，盡管這些學校常常過分擁擠、教職工不足。從1850年代末期紐約的中央公園開始，公園成為美國公共事業的另一個勝利，它們吸引了包括倫敦市議會公園委員會主席在內的歐洲大量羨慕者。到了世紀末的時候，美國城市積極購買大量環形公園用地——馬車游玩的公園，當然啦，這些綠色的城市之肺更多被富人而不是窮人使用，但畢竟是公共設施的巨大投資。公共城市運動場是美國的社會發明。當市營化運動在歐洲逐漸興起的時候，美國城市對這種大規模行動并不陌生。[[245]](#_245_26)

從一開始就有美國人充滿興趣地密切跟隨海外公共服務市營化的運動。其中許多人是有德國留學背景的。學生時代對德國城市管理感興趣的理查德·伊利，1880年代末期在游覽德國和英國城市歸來后倡導市營服務業的廣泛項目。把歐洲實踐與亨利·亞當斯的“天然”壟斷主張結合起來，伊利很快呼吁在非常廣泛的范圍內把城市服務設施徹底公有化。[[246]](#_246_26)在1880年代中期的費城，埃德蒙德·詹姆斯拿出德國和英國市政煤氣運營的資產負債表作武器，投入到爭取把城市煤氣供應重新收歸直接公共管理的運動。后來，隨著公交車進入美國都市政治中，詹姆斯從巴黎和柏林攻擊典型的專營權做法。[[247]](#_247_26)

第一個系統培養進步城市政治之大西洋紐帶的美國人是伊利的學生阿爾伯特·蕭，雖然他自己沒有在德國留學過。作為愛荷華的年輕記者，他在1880年代初期來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讀研究生，被伊利指派撰寫共產社會主義（communitarian socialism）的文章，后來寫中西部合作社的文章。作為《明尼阿波利斯論壇報》的社論作者，他從巴爾的摩返回中西部和專營權、衛生、城市管理的日常政治研究。由于對他所嘲笑的“自由放任妖怪”失去耐心，他作為非專業會員加入美國經濟學家協會。當他本科時期的老師杰斯·梅西拉他一起游歷英國，“手里拿著筆記本穿越鄉村，記錄英國當今政治和社會狀況”時，他猶豫不決。但是一年后在1888年，由于受到牽引著所有伊利學生的潮流的鼓勵，他自己開始了英國和歐洲大陸的社會學旅行。這次旅行讓蕭結識了英國記者和改革者威廉·斯特德，不到兩年，斯特德就勸說蕭擔任自己辦的刊物《評論之評論》的美國版編輯。在這方面，雖然張揚的斯特德和謹慎得多的美國合伙者之間關系有些緊張，但該雜志還是充當了英國和美國改革新聞的溝通渠道。從短期看，蕭回來后充滿了城市所有權改革者的熱情。緊接著連續三次旅行，隨后發表大量的報紙和雜志文章，最終促使他1895年寫成兩卷本的著作《英國的城市管理》和《歐洲大陸的城市管理》。[[248]](#_248_26)

蕭到歐洲城市考察時具有公共健康改革者的直覺，特別熱衷于發現事實，也愿意保留自己的懷疑。他在自己的書出版前夕給斯特德寫信說：“我畫的是一幅討喜的畫，但是我堅持一個原則，那就是我在所有這些事情上的任務不是發現外國人和外國體制的毛病，而是找到他們的優勢，以便我們從人家的智慧中獲得好處，從人家的良好表現中受到啟發。”[[249]](#_249_26)對城市政治科學的經典問題——如權力的監督制衡、責任的限制和分配，所有自從麥迪遜時代以來就一直占據美國人政治注意力的憲法政治機制問題，蕭并不是特別感興趣。英國城市管理特別能激起他強烈的好感，因為其務實的開門見山和簡單明了作風，用經過選舉的市議會來管理城市，只有最低程度的內部結構制衡。但是“城市管理的機制是第二位的問題”。蕭批評說美國“把太多的注意力集中在結構和機制上面，就城市而言，他們永遠不停地在改變它。他們永遠在全面檢修、修修補補，或者重新建造房子，但他們如此迫切希望準備好的房子，卻好像沒有多少吸引人和鼓舞人的用途”。[[250]](#_250_26)

在美國城市忙于糾纏不休的理論問題時，多數歐洲城市直接生活在實際運用的領域。用最實際的解決問題的方式，“不接受也不拒絕關于國家功能或者城市合作的任何理論”，歐洲城市為了居民的美好生活添加一個又一個功能。蕭這樣贊許地說，無意中用了張伯倫式的語言。不管是維也納的新環城大道還是巴黎的大排水系統、格拉斯哥的市營煤氣和公交車、倫敦的貧民窟清理和重建、柏林的衛生科學，還是德國城市對普遍福利的廣泛關注，人家的“城市集體主義”直接對準了居民的福利和“城市管家”的任務。[[251]](#_251_26)

蕭打算闡明的對比中最關鍵的一點是，大西洋兩岸的城市條件“在所有根本特征方面都是類似的”。雖然審美眼光的游客陶醉于歐洲歷史，但實際上歐洲最好的東西是新的。

50年前（在英國）沒有地下排水系統，沒有公共自來水供應，沒有像樣的街道照明設施；沒有街軌或其他城市交通體系，只有少量公共馬車或者馬車；沒有整潔的街道，沒有街道清掃的系統，沒有對擁擠聚居區家庭污物和垃圾堆積的城市處理；沒有城市建筑管理規定，沒有保護措施讓工人階級避免生活在衛生條件極差、過分擁擠的環境。沒有預防傳染病擴散的措施，沒有公共的消防部門，沒有公共教育體制，沒有用市政控制酒類買賣及其他受到當今城市嚴格管理和控制的丑惡現象；事實上也沒有城市公園和運動場之類，當然也沒有公共圖書館和閱覽室。離人們的想象更為遙遠的是公共澡堂或者經濟公寓區的公共洗衣店，或者市政府為城市居民的健康、舒適和保護而提供的其他十幾種服務中的任何一種。在偉大和繁榮的英國社區，這些服務現在已經成為廣泛延伸的市政活動的一部分。

歐洲城市取得成功的關鍵，正是在于擁有了美國人常常以為是自己專有的品質：講究實際、效率、雄心和現代性。[[252]](#_252_26)

蕭決心把都市政治科學歸結為純粹的行動，但并沒有引起充滿同情的反應。因為1820年代和1830年代成年男性普選權的防洪閘打開后，一代代“好政府”都市改革者一直在爭取監督、制衡、削弱或取消美國城市中公共權力的濫用。《世紀》的編輯雖然在1890年代初給他突出的發表言論的講壇，但從來沒有充分理解他的觀點。他們在竭力爭取公務員改革，認為蕭的觀點是說：像格拉斯哥一樣的城市取得成功的關鍵在于排除浮動選民，把城市事務交給商人進行企業式管理。為蕭的《英國的城市管理》寫書評的哈里·普拉特·加德森認為英國的商人管理和美國的民眾管理之間鴻溝巨大，根本就無法對比：“讓一個社區為了公共福利承擔更多責任是否是好政策的問題，在現存【美國制度】下根本就不是問題。討論這些純粹是浪費時間。”坦慕尼協會[[253]](#_253_26)以及一百個較小政黨機器的惡臭和腐敗從一開始就困擾著美國城市功能的討論。[[254]](#_254_26)

但是蕭的文章和書就在歐洲公共服務市營化運動的高潮時發表，它們的數據仍然是新的、吸引人的，因而獲得了比普通年輕作家的著作大得多的影響力。蕭來到紐約后，當時商人爭取城市資助的曼哈頓地鐵工程正在不斷積蓄力量，他的報告受到熱烈歡迎。1894年地鐵問題提交全市投票的時候，蕭在報刊上以及紐約上城的改革俱樂部重新講述格拉斯哥的故事，加以下城的睦鄰中心、主張單一稅制者和工會的組織工作，使這成為城市公交所有權方面最早的勝利之一。[[255]](#_255_26)

處在緊要關頭的其他人成為蕭的歐洲報告的忠實聽眾。1890年代初期正為票價和服務與城市公交車專營者爭吵不休的底特律市長黑曾·平格里，就從蕭的報告中吸取了大量內容。處于類似情形的舊金山市長詹姆斯·費倫也是如此。1893年威斯康星大學選擇城市公共服務市營化作為年度學生辯論的話題，支持市營化的一方獲勝，他們在陳述中大量引用亞當斯、詹姆斯、伊利和蕭的話。1890年伊利自己在談論公共服務的城市所有權問題時這樣簡潔地寫道：“參閱蕭博士……關于格拉斯哥的論述。”[[256]](#_256_26)

蕭的書成為1890年代歐洲和美國鼓吹市營服務業的進步人士的聯系結點之一。另外一個結點可以從1895年到1900年喬賽亞·昆西擔任市長的波士頓找到。昆西是英國工廠立法和城市管理的早期崇拜者，他年輕有為，有政治抱負又有足夠的錢到歐洲廣泛游歷。作為“穿綢襪的”有錢民主黨人當選，他刻意模仿歐洲先例，讓政府引入市營服務業的眾多項目。像倫敦進步人士一樣，他嘗試繞過承包商直接雇傭城市工人，以便提高城市工程的勞動標準。像格拉斯哥改革者一樣，他和煤氣公司、公交車公司爭吵。但是，昆西的注意力在于培養城市的社會和娛樂功能，努力重新創造社會性，這是自從留學生首次接觸德國以來美國人對歐洲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昆西把羅伯特·伍德聘請為特別顧問（伍德描寫倫敦進步主義早期動態的《英國社會運動》剛剛出版四年），在波士頓各地建造了公共澡堂、游泳池、健身房、公園、運動場。他按歐洲人的風格安排公眾免費音樂會和藝術展覽。[[257]](#_257_26)

在蕭看來，所有這些讓昆西成為世紀末美國城市管理“最杰出”的實踐專家。倫敦進步人士也把昆西作為自己的一員。費邊社成員約翰·馬丁認為昆西的波士頓最接近1870年代的伯明翰和1890年代初期的格拉斯哥。1898年到美國旅游的韋伯夫婦對他們見到的多數美國人感到膩煩和厭惡，對美國城市管理“幼稚”的復雜性不屑一顧，但認為昆西的工程是他們在美國發現的最好水平。當昆西因為增加城市債務的問題與議會鬧翻，并因承包商對于城市直接雇傭工人的投訴而于1900年下臺后，他接受韋伯夫婦的邀請到費邊社的新倫敦經濟學院發表演講，以此回報他們的稱贊。[[258]](#_258_26)

受到歐洲影響的城市野心的更大結點可以在世紀之交的紐約市發現。包括約翰·伯恩斯本人在內的五六名倫敦進步人士在1890年代到這里演講旅行，熱心推銷倫敦經驗。最初費邊社的珀西瓦爾·查布1894年和阿爾伯特·蕭相繼做關于“倫敦經驗”的演講。很快要移民到紐約擔任政治教育同盟領導人的約翰·馬丁，在1898—1899年做了五次關于倫敦經驗的系列演講。當時作為“改善窮人條件協會”總干事的威廉·托爾曼是該市的杰出人物，他的盒子里塞滿了格拉斯哥、倫敦、巴黎的幻燈片，他的手指伸進了政治和改革的巨大蛋糕中。1891年該協會在下東區建立了“人民澡堂”，由于房東往公寓里塞了這么多的房客，勞工局調查員發現在這些街區每一百戶家庭中只有兩戶擁有澡堂。托爾曼對英國風格的城市澡堂充滿熱情。[[259]](#_259_26)最強大的人是威廉·魯道夫·赫斯特，他1895年靠花錢進入城市的報紙市場。早在揭發丑聞的雜志之前就看到了抨擊行業壟斷大有前途，他很快在《晚報》（Evening Journal）的文章標題中插進對城市公共服務專營者的譴責和對公共所有權好處的稱贊，以及格拉斯哥和伯明翰在這方面取得的成功。[[260]](#_260_26)

由于其政黨機器和猖獗的市政腐敗，1890年代的紐約市對于斷斷續續啟動的“好政府”改革決不陌生。商人是市營服務業改革政治的通常贊助人，常用的言論是財政削減、超黨派中立、道德警覺，以及對民主政治的深刻厭惡——正如1875年到1877年蒂爾登（Tilden）委員會的情況，它建議把大城市的選舉權限制在擁有相當財產的所有者范圍內。政治老板的角色一直是把城市當作一系列服務的民主集合：需要提供商品的商業企業，需要捐贈的慈善捐款，需要獲得的利潤。相反的“好政府”模式在1890年代得到保持。威廉·斯特朗和塞思·洛都出身“公民聯盟”，在1895—1897年、1901—1903年先后打破坦慕尼協會對市長寶座的壟斷；他們都是有文化、有財富的人，竭力要塑造更廉價、誠實和高效的城市管理。

但是受到跨越大西洋對比的鼓勵，美國出現了日益增強的反向壓力，傾向于更加“積極的”、歐洲風格的項目。斯特朗政府堅決壓制星期天酒類銷售，但有點意料之外的是，它也給學校建設、清潔街道、按照倫敦模式建造的公共澡堂注入新資金——后者多虧了托爾曼在特別市長委員會的工作。[[261]](#_261_26)商人主導的改革俱樂部相信“公民復興”正在出現，他們在1897年創辦新雜志《城市事務》，很快投入到公共藝術、公共健康、城市稅收改革、住房、市營公共服務以及“城市社會主義”本身的討論。所有這些都大量引用歐洲經驗的例子。1898年12月的一期，編輯米羅·莫爾特比調查了從舊金山到布達佩斯的大西洋兩岸城市世界來證明城市“功能”擴大的普遍趨勢。[[262]](#_262_26)

當公民聯盟為了1897年市長選舉進行重組的時候，它的項目不僅包括公共澡堂和廁所，而且有為無家可歸者提供的新城市宿舍、更多的小公園、學校、河邊休閑碼頭、更嚴格的公共服務專營權。在倫敦很難掀起波瀾的項目卻讓《紐約時報》抱怨市營服務業的“狂熱，那些一知半解的人從伊利教授和其他社會主義作家那里撿來的一鱗半爪”。四年后，改革者在城市的所有合同上添加了八小時工作日，城市工程中“審慎增加”了直接雇傭的工人，自來水、電力、煤氣供應等歸城市所有：他們明確指出這是“開明和進步”的事業，堪與巴黎、倫敦、柏林、格拉斯哥或者伯明翰相比。在1901年的上城選舉活動中，塞思·洛的助手們談到了腐敗、妓女和財政削減。在下城為爭取工人階級投票權，他們談到倫敦市議會為工人階級建造的市營住房、柏林的污水處理廠、哥廷根的公共澡堂、德國城市到處都有的城市儲蓄銀行和當鋪、市營的煤氣和電廠，甚至倫敦由城市街燈加熱的投幣式茶水和可可機。[[263]](#_263_26)

可可機從來沒有實現，公共住房也沒有，市營當鋪也沒有實現。但是塞思·洛咽下了他對市營公共服務業的反對意見，懇請議會授權城市建造電廠為街道和公共建筑照明，即使在減稅的時候也給公立學校注入新資金。直到拉瓜迪亞上臺，高效城市管理的上城項目和擴張公共服務的下城項目才會融合。但是到了1890年代結束時，正如20年前在張伯倫的伯明翰一樣，“好政府”改革項目已經開始找到新鑰匙了。

在其他地方，圍繞城市專營權和采購等的腐敗和爭議性區域的斗爭產生了類似效果，但外來因素的介入更不明顯。在1890年到1897年的底特律，像張伯倫一樣的人物黑曾·平格里本來在辦生產皮鞋的公司，被地方商人推舉為共和黨市長候選人，他積極推動以很快的速度分三步收回街道：先從布設街道的可惡的承包商手中，然后從收費的道路橋梁公司手中，最后從分割街道而贏利的商業公交車公司手中把城市街道收歸市營。與公交車專營者就服務改進和票價進行長達兩年的斗爭，使黑曾·平格里變成了美國市長中最坦率鼓吹市營公共服務業者。在托萊多，制造商薩繆爾·瓊斯當市長時，為推動市營煤氣和電廠而與持反對意見的市議會進行激烈的斗爭。在克利夫蘭，第三位商人改革者，市長湯姆·約翰遜自己本身是公交車壟斷經營者，在閱讀了喬治的《進步和貧困》后他固有的思想支柱被摧毀，從1901年到1909年積極投入市營公共服務業政治運動。他的繼任者牛頓·貝克擴展了城市照明電廠，在城市公園出售市營的冰淇淋，經營兩個城市舞廳，由公園管理部的拖船捕撈的低成本魚在市場銷售。[[264]](#_264_26)

即使說中西部的市營服務業進步政治從歐洲先例那里吸取的營養，或許不像紐約、波士頓的都市進步人士吸取的那么多，但跨越大西洋的紐帶也并沒有在中西部市營化運動中消失。約翰遜1910年去世前到格拉斯哥取經旅行。托萊多的瓊斯繼任者布蘭德·維特洛克在1912年做了同樣的事，迫切想看看“從我們民主的立場看，在說英語的世界里管理最好的城市”。“我們對歐洲三十年前就解決了的市營服務業問題爭吵不休，猶豫不決。”維特洛克生氣地說，“而我們還非常高傲，決不從別人的經驗中學習任何東西。”[[265]](#_265_26)

把所有這些沖動最好地結合在一起的人，是約翰遜的重要政治盟友之一弗里德里克·豪威。豪威在霍普金斯大學讀書期間就受到伊利的影響，更被伊利1889年秋天請來霍普金斯講歐洲城市的阿爾伯特·蕭迷住。豪威后來回憶說蕭的城市圖景激發了他初步的政治熱情：“擁有財產和為人民做事的城市”。他在1891年春天和夏天動身前往親眼目睹這些地方，到柏林大學聽課，沉浸在歐洲政治文化中。手拿博士學位返回紐約后，豪威當了一段時間的記者，曾進入法學院，短期加入要把城市沙龍置于像他這樣正直的人監督之下的公民運動。[[266]](#_266_26)

離開紐約到克利夫蘭從事法律工作后，豪威仍然放不下社會議題。他搬進一所睦鄰中心，作為受托人和“友好訪問者”加入“克利夫蘭慈善組織協會”，給城市窮人帶去建議和同情，但是他從自己的努力中得出慈善是徒勞行為的結論。他迷上一個建議，模仿奧斯曼男爵的巴黎那整齊華麗的模式建造克利夫蘭公民中心。他成為商人的“市政協會”（Municipal Association）的秘書，在公交車專營權方面和腐敗做斗爭。由于他的公民中心愿景和對公務員改革的承諾，他在1901年當選克利夫蘭市議會議員。在政治抱負和非政治的公民團結理想之間掙扎，豪威摸索都市政治的道路帶著困惑和矛盾，這正是世紀之交中產階級公民改革的典型特征。

他后來聲稱，他真正的政治覺醒來自單一稅制的想法。豪威在湯姆·約翰遜擔任市長初期進入克利夫蘭政治，發現約翰遜和從前認識的改革者完全不一樣。此人性格迷人、豪爽開朗，是拿自己同行開刀的公交車資本家，而且最重要的他還是亨利·喬治的學生。像約翰遜這樣的單一稅制支持者在市營化鼓吹者中決不是罕見的。費邊社成員大量吸收喬治“非勞動增值”（unearned increment）的思想，他們從喬治那里遠比從馬克思那里吸收到更多營養。不管喬治的租賃觀念多么簡單，他對于那些不創造財富卻大發其財者的指控帶有相當的道德經濟學力量，他們從鬧市區攀升的土地價格或者在一個經濟活躍的城市從公交車專營權暴漲價值中獲利。亨利·亞當斯的“天然壟斷”觀念把公共干預的合法領域縮減到精確的、技術上可以確定的企業核心，喬治的觀點在道德上更廣泛、更容易讓人接受。重新抓住社會創造的城市街道和專營權的價值，意味著要沒收專營權所有者的不當得利，從實際上看就是公共服務業市營化。按照這個邏輯，市營化運動應該儲備有很多支持單一稅制者。布蘭德·維特洛克、記者林肯·斯蒂芬斯、湯姆·約翰遜都是亨利·喬治的門徒，豪威通過約翰遜也成為喬治的門徒。

在接下來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里，豪威和約翰遜在克利夫蘭進行公交車專營權的斗爭，剛開始為爭奪便宜票價激烈斗爭，被公交車公司拒絕后進行長期的公交車市營化運動，但最終失敗。這個運動澄清了豪威的政治本色，重新喚起了蕭多年前在他心中種植的政治圖景。在1905年，他聯系接受美國勞工部的委托到歐洲研究市營化運動，拜訪韋伯，并和約翰·伯恩斯一起走訪倫敦工人階級街區。1909年他再赴歐洲。第二年在約翰遜去世后，豪威來到紐約開始作家的生涯，論述城市問題，特別關注歐洲。結果到1915年他已有五本書和一系列在雜志顯著位置發表的文章，都旨在把歐洲都市進步運動引入美國人的意識。[[267]](#_267_26)

豪威肯定“在歐洲存在一個和法國大革命不相上下的騷動”。豪威沿著現在非常著名的旅游路線到格拉斯哥、伯明翰和倫敦，首先在英國尋找。他把《英國城市》一書獻給約翰遜，里面充滿了對英國市營化運動的稱贊。但是從他所接觸的單一稅制者們幻滅的眼光來看，豪威那個英國的吸引力比蕭時代的英國小多了。豪威厭惡英國上院和它所代表的以土地為基礎的等級制度。“大不列顛是土地投機者的樂園”，他警告說，一個反動地主階級統治下的佃戶組成的國家。當運動因為納稅人投訴而失去了影響力后，連他對英國式市營貿易的欣賞也逐漸淡漠了。豪威1913年不無失望地寫到“英國城市通過錢包來思考”。它的眼光總是集中在稅率上。[[268]](#_268_26)

到1910年，豪威的熱情轉向德國城市。他寫到，在那里人們發現一些城市不僅戰勝了曾經打敗湯姆·約翰遜的公共服務業利益集團，而且是擁有“團體自我意識”的“有機”城市。美國的城市不過是“偶然性，一個由鐵路、水或者工業組成的偶然性”。而德國城市是“有組織、有宏大目標和長遠眼光的生命體”。它們對城市活動沒有人為的限制，并用“數不清”的方式促進市民的幸福康樂。在稱贊德國城市生活的時候，豪威并沒有比蕭更多意味要單獨挑出其政治結構。不管是英國城市還是德國城市都沒有嚴重依賴嚴格公務員體系，盡管豪威本人曾認為那種體系是確保城市誠實的關鍵。選舉權限制并沒有把進步城市和反動城市區分開來（這種限制是歐洲普遍存在的）。城市管理腐敗的原因根本不在于政治結構。“我們想象政府組織形式，他們考慮具體活動。”他寫到，美國人陶醉于結構形式，結果把什么東西都變成“死胡同，相互扯皮、議而不決”。[[269]](#_269_26)

真正的關鍵在于城市活動的范圍——公民活動本身。讓城市自主管理，讓它做大事情，就會吸引不愿把城市政治留給小商販、小老板管理的有遠見人士前來服務。私有的城市不過是私人利益手中的玩物，如果讓城市活動在多方面接觸市民的生活，就可能產生新的市民忠誠度，一種“城市歸屬感”，一種新的集體意識。

現在回頭來看，很容易戳穿豪威塑造的歐洲城市形象中的虛幻成分，閃耀希望和理想光芒的“山上之城”。特別是在德國，他沒有多少能夠提供內部消息的人的幫助，對城市的直觀認識導致他錯誤地把有機城市建筑當作有機公民生活。他很少承認在德國城市管理的外表下政治斗爭多么激烈。像蕭一樣對歐洲城市的活動感到驚奇，他沒有看到對城市自主性的限制，那些限制雖然構成方式與美國不同，但同樣保持強大力量。

他沒有把探索歐洲城市的活動到底在為誰服務這個問題當作自己的任務。他寫到，在德國，城市商人“不是為本階級的利益在立法，這和美國商人不同”。他愿意擱置批評性的判斷，以至于遠遠超過了應有的分寸。“那是德國的異常現象之一。因為據我所知世界上沒有別的國家能夠做到這點。”[[270]](#_270_26)從本質上說，跨越大西洋的進步紐帶是傾向于理想化和極端化的。參與者非常迫切地渴望找到對立面來反襯夸大了的美國個人主義，所以誤解的可能性從一開始就非常巨大。

這個問題影響每一個中間人，1890年代考察倫敦的愛德華·伯恩斯坦，20年后考察柏林的豪威。從最直接的事實起，每件事情都必然經過信念和期望的濾網的過濾。波士頓公共公園運動支持者西爾維斯特·巴克斯特認為柏林“是最徹底的共和城市”。伊利宣稱德國城市是“有貴族傾向的共和國”。1899年在康奈爾大學獲得訪學德國獎學金的羅伯特·布魯克斯因為看不慣巴克斯特那類一廂情愿的思維，寫到德國城市管理在本質上是精英主義者的、絕對政治化的。首先通過阿爾伯特·蕭的目光了解格拉斯哥的許多人，在親眼目睹這座灰暗憂郁的石頭城后都難以相信自己的眼睛。布蘭德·維特洛克來參觀“只是作為理論存在于我頭腦中的公民生活的形式，或者遠方的一個傳奇故事”，看到格拉斯哥出人意外的貧困感到不可思議。其中的貧民窟讓他震驚——“潮濕油膩的樓梯，到處彌漫著貧窮的敗壞氣味……卑鄙骯臟、不可救藥、讓人絕望”。[[271]](#_271_26)

但是真正抓住歐洲城市生活崇拜者注意力的是那里沒有哪些東西。全國市政聯盟的主席威廉·福爾克在談到1911年的法蘭克福時說：“沒有讓人討厭的廣告牌，沒有堆積如山的垃圾，沒有城市中間投機開發的大片凌亂不堪的空地，沒有搖搖欲倒的公共住房，沒有衣衫襤褸、醉醺醺的路人。”[[272]](#_272_26)沒有坑洼不平的街道、擁擠不堪的公交車，沒有腐敗的城市管理者，沒有垃圾，沒有違法亂紀，沒有混亂或失控的狀況。這一類“沒有”越來越多，歐洲城市形成與美國城市相反的樣式，改革者不免拿它們來作對比。所有東西都摻入這種判斷中，從街道的寬度和鋪設情況到廣告的相對隱蔽性到觀察者的政治信念。反思和鏡子，內在的眼睛總是盯著美國，而外在的眼睛盯著歐洲，所有這些都影響判斷。

但是像豪威一樣的歐洲公民生活崇拜者并不是政治上的幼稚者。豪威知道容克貴族與（用他的話說）像地殼下面流動的熔巖一般不斷擴張的力量之間的區別——即便他為了自己的目的，選擇刪掉認為不重要的黨派分裂。他也決非天真地相信歐洲城市迅速進入服務供應和集體企業的新領域是美國人理解的那種民主。像豪威這類作家花費大量篇幅描寫的漂亮的城市澡堂和運轉良好的城市公交車，不僅僅是游記見聞。它們是將民主語言社會化的努力的一部分，要用服務、后果、結果等新字眼來平衡民主語言中的權利、特權等用詞。在他們強調城市作為的同時，試圖鍛造出一種民主的、市政的行動的語言，而不是單純的民主形式。豪威承認德國城市在管理結構方面是不民主的，但是“在服務方面是民主的，甚至是社會主義的”。他用的詞語簡直和十六年前波士頓的喬賽亞·昆西一模一樣。[[273]](#_273_26)

如果說豪威不像他后來自己描述的那樣在政治上天真幼稚，他通過新的“城市意識”獲得救贖的言論，也并不是薄到不可能被別人拿來解開同樣的政治謎團。他的話語在城市進步人士中一再出現。薩繆爾·M.瓊斯說：“我們的城市需要通過培養集體意識來拯救。”列奧·羅韋贊同這個觀點：時代的需要是新的公民“忠誠”，比私有美國城市形成的公民生活更開放的概念。格拉斯哥的城市公交車、倫敦的蒸汽輪渡、法蘭克福的公共公園和當鋪都化作有機社會的形象，資本主義的經濟分割通過公共企業和團體意識的新形式而重新結合在一起。和國家不一樣，城市既小又具體，可以把這種想法付諸實施。自我擁有的城市夢想，即城市有魄力經營自己的公共服務業，保留城市所生利潤的下金蛋的鵝，通過做的各種事情吸引市民對城市的喜愛和認同，這樣的夢想影響力非同小可。[[274]](#_274_25)

當然，人們無需到歐洲感受市營公共服務鼓吹者的設想。只要城市擁有或者提供了任何東西，從最簡單的公共治安開始，既不需要理論也不需要跨越大西洋意識，就可以想象一點一點地添加公共產品和功能領域。像許多政治思想一樣，城市所有權是個可以從眾多不同源頭著手的概念——一個能夠重復發明和多方面同時發現的項目。[[275]](#_275_25)歐洲先例的作用是為美國都市進步人士提供一套起作用的、現成的例子。沒有歐洲紐帶，市營各種服務業的概念可能陷入抽象的經濟辯論。米羅·莫爾特比在1900年寫道：“經驗、經驗、經驗”，而非理論，“才是英國城市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sine qua non）”。歐洲的重要性在于：美國人可能在從歐洲借來的積累的經驗基礎上越過經濟抽象辯論，越過以測量員的準確性確定公共領域邊界這一難題，抓住實踐本身。用豪威的話說，正是這個條件讓伯明翰、格拉斯哥、倫敦、法蘭克福或者柏林成為“所有人的經驗”。[[276]](#_276_25)

想象城市擺脫大量承包商、貪污者、企業家、專營權所有者糾纏，自覺管理和決定自己的命運——在20世紀早期美國先進的都市進步人士中間，怎么強調這些多半從國外引進的城市形象所體現的雄心都不過分。同樣也很難夸大他們對跨越大西洋的事件的認同感。美國問題被認為需要（哪怕是暫時地）求助于格拉斯哥公交車的經驗，這一點非常重要。在1912年的選舉活動中，伍德羅·威爾遜對馬薩諸塞州福爾里弗城（Fall River）的選民說：“你們知道全世界管理最成功的城市是偉大的蘇格蘭城市格拉斯哥。”林肯·斯蒂芬斯在談到歐洲市營公共服務業支持者時說：“他們遠遠跑在我們前面，自由派和激進派，他們都在積極工作，深入細節問題。”[[277]](#_277_25)美國市營公共服務業支持者的挑戰，就是要看看跨越大西洋的熱情在政治結構完全不同的地方可以進展到什么程度，而政治結構的重要性被他們忽略到最小。

考驗伴隨公交車而來，而且帶來了讓人不安的結果。現在回想起來，這個位點顯然比當時看來更重要。如果美國的城市所有權運動在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就形成氣候的話，就像英國和德國一樣，很容易為城市獲得利潤的煤氣供應本來可能就成為公共所有權議題的軸心。后來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主要的戰場就是電力的地區分配問題了。

煤氣和電力在進步時代都是競爭的領域。前者是20世紀初期煤氣燈照明的城市中的基本消費品，其價格永遠是爭吵不休的話題。查爾斯·埃文斯·休斯和路易斯·布蘭代斯都是由主張降低過分資本化的城市煤氣壟斷價格而卷入到政治活動中。但是1870年代和1880年代市營煤氣廠的經驗很少。費城1887年開始市營煤氣運作，是美國19世紀末期這樣做的唯一一個較大的城市，到了1897年重新把煤氣廠承包給私人公司，當時一片指控之聲，說此運營者和彼運營者都是一樣貪婪腐敗，讓人厭惡。[[278]](#_278_25)到了20世紀前十年，電力競爭威脅到市營煤氣經營的收入，城市議會對可能處于衰落的技術的新投資表現謹慎。張伯倫的伯明翰經驗的時機已經過去，美國人已經抓不住了。至于電力，時機還不成熟。為城市街道和辦公大樓照明的市營發電廠并不是稀罕的投資，但是只要家庭照明還是有錢人的奢侈品，電力供應就得不到都市政治的廣泛支持。

1890年代進入異常擴張時期的公交車是另外一碼事。公交車可能是每個人都離不開的服務。作為前汽車時代城市居民的出行工具，它們成為城市空間發展的關鍵決定因素、工薪階層周日外出踏青的手段，如果公交車票價能夠降低到一定程度，它甚至還是到郊區比較便宜的房子居住的必要條件。20世紀初城市政治最激烈的戰場就在交通問題上，受到歐洲人經驗激勵的城市改革者在這上面也投入了最殷切的希望。

19世紀后期美國城市中，沒有什么比交通政治更能清晰表現私人市場力量和公共方向之間的不平衡了。因迫切渴望有人提供服務，城市輕易地頒發交通專營權，很少考慮后果。當專營權所有者不能提供充足的服務時，市議會就授權更多的企業參與競爭。芝加哥城市當局在1884年到1895年頒發了98家公交車企業經營權，其中許多是完全根據預測的價值組建起來的紙上企業。結果是馬拉的公交車和有軌電車的雜亂拼湊，很少向城市返還任何收入。在這種體制下，好處是城市納稅人不花一分錢，缺點是雜亂無章，服務質量低劣。[[279]](#_279_25)

到了1880年代中期，有些城市開始與公交公司更激烈地討價還價，強力推行最高限價，對毛收入征稅或者對經營的車輛征稅。但是從總體上說，在授予專營權方面很少有什么限制。資本化是私人投資者的沖動，他們給股票摻水時，具有干旱地區農場主為牲畜提供飲水那樣的熱情。專營權都是長期的，到1899年，美國現有交通專營權中仍有三分之一是永久性的。根本沒有聽說對其經營進行公共監督。線路的計劃完全是私人主動提出或競爭的結果，所以完全自由的競爭使得經營者都盡力在利潤最豐厚的線路上投入最多車輛，公交車“阻塞”在波士頓鬧市區和芝加哥中心地帶，因為憤怒的司機在共同使用的道路上爭搶位置。

在1890年代打破這個局面的是資本和電力。它們從1880年代的交通混亂中理出了秩序——實際上是壟斷。1890年到1893年在密爾沃基城，由亨利·維拉德領導的辛迪加把城市公交車運營商從六家減少為一家，一個聯合的公共服務公司，它還吸收了城市所有的電力生產設備。還沒有開始投入改革政治的湯姆·約翰遜1897年在底特律成立了統一的公交車壟斷集團。查爾斯·耶基斯做了同樣的事，他把芝加哥環區北部和西部運營的公交車聯合起來。在曼哈頓運營的最后一條獨立公交車線路在1900年被該市新的運輸公司辛迪加吞并。根據歷史學家查爾斯·奇普的說法，在1902年美國最大的20個城市中，除了4個外，都存在交通壟斷集團。[[280]](#_280_25)

在某種程度上，公交車集團化的浪潮反映了1890年代的經濟發展趨勢。這種由擴張性金融資本和因經濟蕭條而衰弱的企業的合作也在馬口鐵、自行車、農業機械、鋼鐵方面形成壟斷。新公共服務公司名稱中“聯合”（consolidated）字樣的頻繁使用也很能說明問題：比如紐約市聯合煤氣公司，巴爾的摩聯合煤氣、電力照明和能源公司，芝加哥聯合運輸公司。電氣化使這些市場力量更加復雜，因為突然需要大量資本才能進行有效的競爭。從第一條電力公交車線路投入運行的1888年到基本完成從馬車到電車的轉變的1900年，電氣化使得運營和金融都發生了革命性變化。它把公交車系統向外擴張到城市邊界以外，通過在只有少數人掌握的公司擴張計劃之前購買便宜的土地，然后在新公交線路服務的郊區賣住房用地，就可以賺大錢。電氣化使服務面向更多旅客，但它擠掉了競爭。1890年代相互交織的技術和金融變革明顯支持了經濟學家的觀點，即在公共服務領域，只有壟斷才能最終生存下來。

新公交企業的壟斷地位、它們的金融和利潤前所未有的規模、它們對城市授權使用公共街道的依賴、它們在政治中的日常糾纏以及由此產生的影響力，肯定讓公交車投資者的野心與新城市改革者的野心產生沖突。由于公交公司的傲慢和公眾的要求，積極改革的市長們與運輸公司常常就安全和服務標準、向市財政返還更多利潤、勞工規范、足以讓城市交通民主化的低廉票價等爭吵不休。就連在底特律為爭取便宜的三分錢票價而努力的平格里，最初也只是把公交車城市所有權當作與運輸壟斷者協商談判中獲得優勢的籌碼，公交車市營化是作為萬不得已時的一種威脅。[[281]](#_281_25)但是，隨著歐洲成功的例子越來越多，抽象的討價還價籌碼慢慢成為了實際上的要求。

早期考驗出現在紐約市。在1890年代初期，因對于城市交通線路不足和私人資本投資者無法達成擴張服務的計劃感到失望，城市團體的廣泛政治聯盟成功組建了公共交通委員會，它得到授權可以設計、融資、擁有城市的地鐵——雖然還不是建造和經營權。紐約市商會牽頭往委員會里面塞了很多企業家，但是該建議也得到本市工會組織和睦鄰中心的支持。1894年對該問題進行的全市范圍公民投票以接近三比一的懸殊差距獲得通過。[[282]](#_282_25)由快速交通委員會（Rapid Transit Commission）的總工程師設計出來，參考了實地考察到的倫敦和巴黎的最好經驗，市屬二十一英里地鐵到1904年開始運行，規模僅次于倫敦私有的地鐵系統。但是市營地鐵在美國并沒有得到和在歐洲一樣的結果。不到一年時間，承租人就吞并了唯一的潛在對手曼哈頓聯合公交車公司。對曼哈頓島快速交通擁有了幾乎完美的、公共融資的壟斷地位，該公司拒絕委員會進一步擴張的建議，用老板奧古斯特·貝爾蒙的話說，繼續獲得“可觀”的利潤。[[283]](#_283_25)

在芝加哥，運輸資本家的掠奪更加膽大，都市進步人士沒有在所有權的不徹底觀點上耽誤時間。西奧多·德萊塞拿來作為其小說《金融家》主人公原型的查爾斯·耶基斯是起激化作用的人物。在1897年，隨著芝加哥運輸專營權即將到期，他試圖讓伊利諾斯議會通過一個法案，一下子把所有公用服務專營權延長到一百年。公眾的憤怒阻止了耶基斯的計劃，但是他的替代性措施獲得成功，把伊利諾斯經營權期限從20年延長到50年。在耶基斯的法案被撤消之前，一幫芝加哥議員從法案中看到自己可以得到的一罐金條，他們組織了虛假的電力服務公司，給予50年的經營權，然后興高采烈地把特權轉賣給其他投資者，從中大發橫財。[[284]](#_284_25)利潤實際上是芝加哥公共服務業的代名詞。在1890年代該市兩家主要的公交車公司從毛收入中拿出27%到29%作為紅利。[[285]](#_285_25)耶基斯把他經營的公司的資產注入他的各種控股公司和建筑公司，很快就離開芝加哥，但他的詭計和壟斷野心已經迫使格拉斯哥那樣簡單直接的市營公交車進入城市政治的視野。

1905年以直接的“立刻得到城市所有權”為政綱當選市長的愛德華·鄧恩，抓住了操縱政黨活動的政客們不愿意認可的一點（他們知道什么是熟悉的、有利可圖的體制）。作為一位有錢的愛爾蘭裔美國律師、簡·亞當斯（被他任命為城市學校董事）和克拉倫斯·達羅（被他任命為交通運輸政策顧問）的朋友，愛德華·鄧恩對歐洲城市政治非常熟悉。他曾在1900年到歐洲游歷，看到了正在推行的市營服務業運動，在講話中總是引用這一運動的成功事實和數據。他的主張得到工會團體、城市的報業巨頭赫斯特（Hearst）旗下報刊的認可和許多進步人士的支持。聽從湯姆·約翰遜的建議，他邀請格拉斯哥城市公交公司總經理到芝加哥來為建設低成本市營公交車線路祝福。1904年到1906年就這個問題進行的三次公民投票為城市所有權一方贏得多數，雖然最后一次投票沒有達到把計劃付諸實施所需要的三分之二多數這個門檻。[[286]](#_286_25)

鄧恩在芝加哥進行的城市所有權運動于1905年、1906年達到頂峰，那些年對全國性的活動也是關鍵。多次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威廉·詹寧斯·布萊恩環球旅行回來后熱情宣傳市營公共服務業的主張。赫斯特報系高調對工人階級表示同情，不留情面地揭露壟斷權力的罪惡，用讓人驚嘆的力量推動該事業的發展。在紐約市，赫斯特自己在1905年以廣泛的市營服務業訴求競選市長。由于工人階級的支持，赫斯特的“城市所有權聯盟”差一點就贏得選舉，如果不是坦慕尼協會選票計算作弊，幾乎可以肯定占上風。在克利夫蘭，湯姆·約翰遜努力組織一條低成本的、人民的公交線與城市私人的壟斷經營者競爭。在這些事件中，城市所有權的反對者加倍努力要阻擋一位驚恐的批評家所說的“降臨到我們頭上的社會主義蠱惑”。[[287]](#_287_25)

所有這些都碰巧和新聞界的扒糞運動高峰吻合起來，并從中得到促進。《麥克盧爾雜志》（McClure's Magazine）和競爭者大量刊登城市貪婪和腐敗的故事，爭先恐后揭露試圖從政府那里得到優惠的企業家和出賣公共利益的政府官員暗中勾結的罪行，林肯·斯蒂芬斯用貪污者的俗語“賄賂”（boodle）讓廣大民眾明白了這一切。[[288]](#_288_25)歷史學家開始把這種大眾的、進步的城市政治形式稱為“市政民粹主義”（civic populism）。正如1890年代的倫敦，市營公共服務業是其核心。

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料到各種折中妥協辦法會被倉促拋出應對城市所有權運動的潮流。調查委員會就是其中之一。到1905年9月，全國公民聯盟組織了后來屢屢復制的進步時代機構——一個發現事實的委員會，受委托收集大西洋兩岸的經驗和信息。全國公民聯盟精心平衡“公共所有權委員會”成員結構的策略，就是要確保不會出現意外。成員里面既有私營公共服務業負責人，又有公共所有權的坦率支持者——像伊利的學生愛德華·貝米斯、約翰·康芒斯等。康芒斯認為委員會1906年夏天泡在喝英國茶、聽報告中是浪費時間，他偷偷溜出來自己花一個星期時間和格拉斯哥街軌委員會密談。但在這么嚴重依賴國外經驗來制訂國內政策的論證中，委員會成員都非常嚴肅地對待他們的工作。[[289]](#_289_25)

讓康芒斯等人感到特別失望的是，委員會對公有與私有公共服務成本和收益的比較失敗了，原因不僅是委員會成員無法就收集的眾多英國數據的意義達成一致，更因為美國公司拒絕開放資料給調查人。但是1907年發表的委員會多數派的推薦意見并非對于市營公共服務業不利。委員會在城市所有權問題上不偏袒任何一方，要看城市的具體情況而定。不過，盡管四個公共服務公司的老總中有三個反對，委員會還是認為競爭原則在城市公共服務行業失敗了。委員會建議城市可以合法地自由選擇是否把公共服務公有化，只要獲得市民的認可。[[290]](#_290_25)

更有效的妥協是結構上的。路易斯·布蘭代斯兜售浮動計算法的模式，借用倫敦煤氣專營權的條款，把公共服務公司的合法紅利與服務的價格下降結合起來。其他人則敦促更嚴格的專營權條款。但是，市營公共服務業熱潮的最重要意義是恢復了管理委員會措施，并把它推向政治斗爭的前沿。管理委員會在19世紀后期的英國和美國都是用來處理鐵路價格投訴的，在美國由于法庭的制約導致其權力受到很大削弱，效果很小。但是在有些情況下，對這個概念的熟悉程度甚至比它的有效性更重要，而它迅速適應新變化的能力則遠比這二者更重要。[[291]](#_291_25)

政治學家把這種現象稱為政策“慣性”或者“道路倚賴性”。實際上，從1905年到1907年發生的事情是，曾失敗的政策手段在要求迅速和果斷行動的壓力下被拿來重新使用，跳出從前熟悉的道路，反而一下子成為解決從來沒有想象過的大范圍問題的答案。在1906年，由于迫切需要應對鐵路合并的強大壓力，國會試圖讓氣息奄奄的州際商務委員會煥發新生命。在此之前，威斯康星的羅伯特·拉福萊特曾經試圖通過同樣的手段來兌現他馴服本州鐵路公司的諾言。現在1907年面對交通危機，拉福萊特讓約翰·康芒斯起草一個措施，把鐵路委員會的監管范圍一下子擴展到在該州經營的所有公共服務領域：自來水、電力、煤氣、電話、鐵路、公交車等。查爾斯·埃文斯·休斯在1906年紐約州長選舉中擠走赫斯特后，要尋找一個消除赫斯特城市所有權問題威脅的方法。他發現自己的答案就在威斯康星計劃中：一個全州范圍專家組成的小型公共服務委員會，被授權批準收費價格、監督資本上市、制訂安全和服務最低標準。公共服務委員會1907年在威斯康星和紐約成立，這種主張迅速在各州議會中出現，到1914年底，除了三個州外，所有各州都搭上了這趟車。[[292]](#_292_25)

委員會的一個不小的政治優點是，公共服務公司很快看到了它的好處。委員會管理既可以緩和公共服務城市所有化的訴求，又可以把專營權的討價還價從市政廳過熱的政治走廊轉向更遙遠、更安全的州立機構。1913年在伊利諾斯成功推動成立州公共服務委員會，活動的主要資金提供者中有電力服務壟斷大亨薩繆爾·英薩爾。“全國電力照明協會”在成員公司中兜售這個觀點，說這給予他們“擺脫地方和政治影響的最大自由”。在阿拉巴馬州，當1911年新伯明翰城市章程授權對所有新的專營權問題進行公民投票表決，公共服務公司迅速行動起來，讓公共服務委員會法案在議會獲得通過；1920年補充條例的主要內容由伯明翰鐵路、照明和電力公司的首席律師起草。[[293]](#_293_25)

但是，當公共服務政治的核心問題能夠被確定為惟利是圖和瀆職（“扒糞者”傾向于這樣表達）等道德議題，這個管理委員會主張的吸引力就遠遠超過了直接受影響的利益團體。這個主張的承諾是多方面的：私人所有權受到公共監督的調節而緩和；讓投資者有合理可靠的回報；讓消費者有公共規定的服務標準。到了1912年，華盛頓州最高法院認定該想法“解決”了公共服務問題，給予民眾“公共所有權的所有好處，同時不用承受其負擔”。[[294]](#_294_25)

由始于格拉斯哥的一系列事件而得到復興，管理委員會的解決辦法扭曲了城市所有權運動，破壞了它的影響力，搶先消耗了很多政治資本，讓一些重要的盟友分道揚鑣，不過它并沒有消滅這個運動。為威斯康星法案撰寫公共所有權條款的康芒斯一直認為，委員會手段不過是權宜之計。在芝加哥和紐約，新的委員會很快就因為軟弱無力和剝奪地方政策制訂權威而遭受猛烈攻擊。有些最初被任命為管理委員會成員的人（如紐約改革俱樂部的米羅·莫爾特比）完全履行體現公共精神、奉獻專長的諾言，但是政黨仆從和從前的公共服務公司老總迅速成為委員會的成員，很快就清楚表明公共服務問題根本沒有真正解決。這個問題仍然成為市長們會議爭論的內容。在進步黨的左翼，有人熱心推動城市所有權主張的實現，包括羅斯福內閣中后來被稱為公共工程“沙皇”的哈羅德·伊克斯。美國公共所有權聯盟一直忙于宣傳鼓動的工作，如弗里德里克·豪威、愛德華·鄧恩、簡·亞當斯都當過該聯盟的副會長。[[295]](#_295_25)

總而言之，公交車“市政民粹主義”的材料仍然近在手邊。1912年查爾斯·比爾德認為城市公共服務所有權運動從來沒有比現在更強大，舊金山在這一年開始建設一條短途的市營公交車線路與私人經營者競爭；克利夫蘭市民投票支持城市電廠為大眾提供電力服務，邊界對面安大略省的城市也在這樣做；密爾沃基的社會黨政府上臺后（像倫敦激進分子一樣）討論直接實施的城市公共工程，（像法國城市社會主義者一樣）討論為窮人提供的免費醫療服務。1922年在底特律，平格里的繼任者又買斷了私人公交車線路。三年后，在州長艾爾·史密斯的祝福中，紐約改革者開始建設直接由城市經營的地鐵線。該市把它命名為“獨立”線，即獨立于運輸公司壟斷之外。[[296]](#_296_25)

雖然如此，對照英國和德國的情形，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在公共服務城市所有權方面漫長和激烈的斗爭結果還是讓人喪氣的。1920年代中期美國的69個“大城市”中，除了九個外全部擁有自己的水廠，有近四分之三的城市有公共市場。但是只有底特律、舊金山、西雅圖、紐約四個城市擁有或者經營自己的交通線路。只有奧馬哈、里士滿、德盧斯三個“大城市”擁有市營煤氣廠。九個城市經營自己的電力照明或者發電廠。在美國所有公交車線路中，公共運營商只占不足2%的比例；公共電廠發電量只有全國電力產量的5%；公共煤氣廠生產全國供應量的1%。與領先的英國德國相比，這些數字是渺小得讓人尷尬。[[297]](#_297_25)

夢想如此真誠，實現它的努力如此迫切，加上大西洋兩岸如此多的相似點，如此強烈的跨越大西洋認同感，結果為什么和美國城市所有權運動進步分子的預計相差這么遠呢？

時機和規模是部分原因。美國公共服務業市營化工程起步較晚，都市進步分子以公交車為開端。但是沒有積累的政府管理經驗的好處，要從電氣公交車系統入手，一開始就面臨成堆的困難。經過十年電氣化，世紀之交的都市公交系統在規模和復雜性上已經讓水廠和煤氣廠相形見絀。在美國尤其如此，因為美國運輸公司早期的電氣化和在郊外開發區的投資（這在其他地方是不允許的）使它們比歐洲同行強大得多。正如批評愛德華·鄧恩倚賴格拉斯哥經驗的人馬上強調的那樣，芝加哥的公交系統是全世界最大的。即使在世紀之交的人口只有格拉斯哥一半稍多的波士頓，其公交線路也是格拉斯哥的三倍，而且每日運送的旅客人數是格拉斯哥的兩倍。[[298]](#_298_25)這么龐大的體系讓城市單單依靠自身物質財產來購買是非常昂貴的，如果按這些公司過高估計的資本價值，購買它所隱含的債務負擔可能吞掉整個城市預算。先后順序很重要。美國城市已經錯過了市營煤氣的最佳時期，它們積累的管理困難的山峰更高了；再錯過市營公交車，它們又落下更多欠賬。

其他障礙來自法律。和法國不同，沒有總括性的禁令阻止美國城市開發市營服務業。很多法院和議會經過激烈和短暫的司法斗爭后，很快達成協議：那些依賴使用城市街道或者依靠城市頒發專營權的服務項目，都是市政府自己可以直接經營的內容。憲法對于城市負債總量的限制是更大的障礙，不過這些條款可以修改，尤其是對于城市投資能夠帶來利潤的“生產性”企業。不是法律的死板而是憲法裁判體制要求改革者應付的雙重戰場，消耗了他們的最大資源和能量成本。包括購買合同或者管理措施最小細節在內的一切都要經過政治體制兩次，先要通過政府正常審查程序，然后再通過法院審核程序，在這個過程中，投資者的財產權肯定成為聽證會特別關注的焦點。美國體制帶來的拖延和障礙肯定比進步人士在國外見識的多得多。[[299]](#_299_25)

但是讓市營公共服務業運動陷入困境的最大問題，是那個讓愛德華·鄧恩遭遇挫折的內容：腐敗。鄧恩本來希望借助于格拉斯哥的聲望和經驗，大張旗鼓地請格拉斯哥市營公交系統總經理來為芝加哥新的市營公交車祝福。此人毫不含糊地表示對這里私人運輸公司的糟糕服務和過時設備感到失望，可更讓他驚訝的是看到芝加哥上空飄浮的政治腐敗的惡臭，除非是萬不得已的情況下，他甚至不愿意推薦公有化了。[[300]](#_300_26)因為滿心指望的認可落空而陷入極度尷尬，鄧恩只好把那份報告裝進口袋。但是壓制報告并不能壓制背后的問題。城市的財產所有者對于票價和稅收的關心、那些因為城市的合同利潤而發展的小企業主的不滿——進步人士的反對派在倫敦利用的所有力量，所有這些再加上腐敗的重量，終于引起天平的傾斜。特威德（Tweed）對紐約金庫的掠奪、芝加哥城市議會那些所謂灰狼的胃口、費城共和黨機器靜悄悄的但一點都不遜色的系統腐敗等，都構成城市所有權辯論的背景音樂，實際上甚至淹沒了辯論本身。

都市政黨機器出售一個又一個有利可圖的城市特權，到世紀之交被“扒糞者”抓住揭發時，這已經是老掉牙的故事了。已經有一代精英和中產階級“好政府”改革者努力要糾正這些。限制和控制公眾選舉的官員特權是他們慣用的手段，其中許多來自歐洲的先例：按英國經驗成立的公務員委員會（雖然在英國，市政府不在公務員管理范圍）；按英國地方政府委員會模式成立的州監督委員會；模仿德國市長的職業城市經理人；或者歐洲風格的選舉權限制把城市交還給它的財產所有者。[[301]](#_301_25)

“好政府”改革者認為不完全民主的英國和德國的城市管理比美國更誠實、廉潔，這并非完全錯誤的。當然腐敗丑聞并非只是美國人才有的專利，比如1889年的一起丑聞就導致倫敦市政議會的前身“大都會市政工程委員會”倒臺。說到城市腐敗，英國調查官阿瑟·莎德威爾在1906年謹慎地說“英國人并沒有資格扔很多石頭”。酒館老板、房地產商人、房東、承包商——所有這些有證照、有利益可圖的人都是英國城市議會中的固定角色；在城市政策中有利害關系的人也毫不掩飾地把代表政治私有化。[[302]](#_302_25)但是，19世紀末期英國和德國的城市腐敗行為更隱蔽、更客氣，更多是優惠和好處的交換而非現金賄賂，也更少民主的特征。在這點上，時機也產生了深刻和廣泛的后果。有些地方，先有現代城市管理體系，然后才出現都市政治民主化，比如德國，以及基本上如此的英格蘭和蘇格蘭，這一點和美國完全不同。在美國，白人男性的民主早早興起，創造了一個更容易被某些人鉆空子的體制，他們把城市管理看作獲得私利的領域，更容易把公共職位看作要盡可能快撈好處的短期投資。

是遭遇民主之下腐敗的經歷最終讓專家管理委員會的主張如此吸引人——這個因素更甚于它的便利和熟悉、公共服務公司的秘密推銷、立法狂熱的力度。即使當專家已經被推開，公共服務公司已經學會如何巴結、討好管理者，他們之間的關系已經密不可分時，委員會公正性的氛圍仍然保留著。用威斯康星大學亨利·梅耶的話說，委員會概念的諾言是通過那些把科學的客觀性和法律的中立性結合起來的控制機構，“把公共服務業從政治中拿走”。[[303]](#_303_25)相反，因為容易接近現金流和以前夢想不到的大發橫財的機會，可能出現另一個特威德[[304]](#_304_25)或者“煤氣廠小集團”，對這一點的擔心和恐懼成為反對市營服務業運動的人最強大的武器。觀察家指出，只要芝加哥選民面臨的議題是對私人公交車經營的不滿，鄧恩的市營公交車運動就可以取得勝利。但是，純粹公共所有的公交車實現的可能性越大，人們的懷疑也就越大，支持鄧恩的比例就越小。

在腐敗問題面前，市營服務業運動的有些學術骨干悄悄溜走了。在1905年12月美國經濟學家協會討論公共服務業話題時，只有豪威和改革俱樂部的米羅·莫爾特比明確支持公共服務業公有化項目。阿爾伯特·蕭故意回避和躲閃。他的報告說“我們從國家的一端到另一端都在進行如火如荼的實驗”，他希望每個實驗都進展順利，但他不支持任何一個。長時間高舉服務業公共所有權大旗的伊利已經改變觀點加入到批評者的行列。伊利的批評者認為他改變主意是因為資助他研究的新公司的影響，他自己則擔心腐敗和管理能力等問題。[[305]](#_305_25)至于有公民思想的商人，在歐洲背景下本是公共所有權的核心支持者，他們對于城市基礎設施落入黨棍和企業老板之手這一前景的擔心非常強烈。在這種情況下，可敬的中產階級看中妥協的解決措施就沒有什么奇怪的了：公共擁有的公交車線路（而不是公交車本身）、浮動價格體制，或在管理委員會監督下的私有企業等。

在這些擔心和經歷的背景下，豪威、鄧恩、約翰遜不準備在公務員改革上花費時間，而是迫切要擴大公共商品和市營企業的范圍，這只能招來“天真幼稚”之類的指控。豪威堅持認為城市管理大事情將自動吸引本領更大、水平更高、更誠實的人進入市政府從事城市管理，但是在美國背景下有點不現實，不管伯明翰和格拉斯哥的情況如何。至于期望市營企業本身復興市民的“城市意識”的呼吁，它讓市營化支持者的項目容易被指責為愚蠢、缺乏判斷力，雖然他們可以提供大量對比成本的數據，講解德國城市效率的故事。

實際上，城市所有權鼓吹者對于腐敗問題的回答并不像看起來那么幼稚。腐敗問題的公共討論傾向于混淆區別，渲染一種普遍墮落的氛圍，但其實腐敗結構是復雜和多樣化的。在世紀之交的美國城市，它們至少表現出兩種形式：邊緣性腐敗和內部腐敗。

邊緣性腐敗出現在政府和私人供應商接觸的地方。政府通過合同、出售或者專營權給予私人投標者經濟機會，這種地方一直是腐敗者撈取好處的肥沃土壤。邊緣性腐敗的形式是賄賂、回扣、勒索、報償等。交換的東西通常是現金，雖然雇傭親戚朋友或者政治支持也可以當作交換籌碼。比如（查爾斯·愛德華·拉塞爾講的故事）二十二個市政委員會委員1884年以二萬美元一張的價格出賣他們的投票，這涉及利潤豐厚的下百老匯公交車經營權。被收買的是擁有投票權或者影響力的人。[[306]](#_306_25)但是邊緣性腐敗的最終受益人是收買者，那些通過非誠實手段獲得巨大商機的商人。

相反，內部腐敗發生在市政府內部工作人員身上，受益人是企業老板、政客以及得到他們恩惠的人。內部腐敗偶爾也涉及公然的挪用公款，雖然這種情況很少不被逮住。更常見的形式是虛報工資表，在招募人員時任人唯親、政黨分肥、工作效率低下。有時候涉及現金交易。世紀之交要得到城市職位，最常見的方式是賄賂；城市職位所有者必須捐款，此乃填充政黨競選基金的標準手段。但是交易對象除了現金外，同樣常見或更普遍的還有工作崗位、肥差，或者選舉日的集團投票等。有些國家試圖通過限制公職人員的投票權對付這最后一種腐敗。在德國，國營鐵路職工被明確剝奪投票權。在澳大利亞的維多利亞，政府雇員被排除在正常選舉之外，但給予他們獨立議會代表的資格，更公開地為自身利益說話。[[307]](#_307_25)

內部腐敗和邊緣腐敗的關系比這些手段表現出來的更加復雜。都市腐敗的矛盾在于：如果限制其中一種腐敗機會，就會增加另外一種腐敗機會。減少城市擁有和經營的企業，能減少內部腐敗的可能性，卻增加了邊緣腐敗的機會，私人供應商的賄賂就會泛濫。

這兩種腐敗在美國城市都很流行。城市政治機器毫不遲疑利用擴大城市服務的機會撈取贊助。城市自來水、衛生部門、警察、消防、健康監督、公共澡堂都（往往是公然）被用來作為政治忠誠的酬傭和優惠。但是如果林肯·斯蒂芬斯和他的“扒糞者”同行是對的，那么世紀之交美國城市腐敗最臭不可聞、最嚴重的情況就發生在邊緣地帶。正如耶基斯事件以及幾十件類似案子顯示的，咄咄逼人的私人資本和有興趣利用職權牟利的政府官員接觸的地方，出現腐敗的可能性非常大。豪威和斯蒂芬斯這些鼓吹城市所有的人認為圍繞專營權的邊緣腐敗是城市的最大罪惡，這想法其實不錯。但是在“扒糞者”把都市政治個人化，報紙編輯急于靠揭露政黨頭目腐敗丑聞來擴大發行量的背景下，公共服務業市營化鼓吹者的說服任務并不輕松。對于在開放的、多孔的、民主的美國城市發生更多腐敗的擔心，使得美國城市活動的領域很小，而讓最成熟的腐敗機會進一步加大。

那么，問題的核心是否在于多孔性本身呢？是否美國城市政治和政府職務分配的早期民主化（盡管有很多缺陷，盡管存在極力辯護的種族和性別壁壘）使朝向都市社會政治的轉型更困難了呢？城市改革進步人士中沒有一個人考慮這個問題。他們不愿意接受的結論是：他們的雄心因為歷史發展的層次不對而陷入困境。他們心目中自我擁有的城市是民主的實現。透過算術民主的形式外殼，他們看到了城市演變成發揮民主功能的生物器官。那是歷史前進的方向：從消極等待到行動，從形式到服務，對都市生活的相互倚賴性從無意識到有意識的轉變。那就是蕭強調城市“管家”時表達的意思，就是豪威所羨慕的“做事的”城市的核心——大膽的、集體的、公開的作為，期待共同回報。民主的結果不在遙遠的管理委員會，甚至不在選舉，而在格拉斯哥的公交車和倫敦輪渡的日常運行中。

美國城市進步人士很少承認，他們羨慕的歐洲城市的廣泛服務項目可能倚賴于一點：歐洲城市精英成功地長期推遲形式民主的實現。但是他們對兩種民主（形式民主和行動民主）親屬關系的竭力強調，顯示他們明白歐洲市營企業的教益是雙刃劍。歐洲經驗是否證明了城市行動野心越大就越能產生更誠實的公民精神？或者相反，跨越大西洋的政治結構對比，恰好突出了在美國政治背景下推行歐洲風格的城市經營真是愚不可及？美國城市管理的民主化是否排除了服務民主化的可能性？自我支配的城市的途徑會不會被一個最意料不到的障礙所阻擋，即政體過早的民主化使得國家機構被過度地挖空和私有化？

1905年到1907年的爭吵和爭論沒有為這些問題提供明確的答案。城市公共所有權改革者并沒有偏離目標太遠。自我擁有的城市，嘗試性地向外擴張到新的公共商品和公共供應領域，這個設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仍然沒有定論。由于1920年代電力爭議的推動，它將再次浮上臺面，清晰出現在新政擁護者的政治想象中。

可塑性是城市所有權觀念的內在特征。它可以被公共衛生改革者拿來作為工具；被蕭和豪威竭力爭取的那種具有公民思想的商人用作工具；在有些時候，還成為城市龐大的、大眾化的工人階級多數派使用的工具。就像進步人士的許多項目一樣，市營公共服務業運動是零碎的改革，在理論上顯得軟弱。它認識到城市生活事實上的集體主義，但它不是代表對市場的顛覆，而是選擇性地侵占其中公共特征最明顯的部分——明顯到連私營的公共服務公司都承認的部分，這些公司競相把“公共服務”作為招牌用在自己身上。

市營化運動是大西洋范圍第一個重要的進步工程。在借來的經驗和跨越國界的先例中，在共同的語言如細菌、污水處理、煤氣價格、公交車票價中，北大西洋經濟體的市營化改革者開始創造適度的、替代性的社會經濟來改造徹底商業化的城市。但是正如針對公交車和腐敗而發生的爭吵和喧鬧所示，市營化運動也是一個政治教訓，說明時機選擇的極端重要性以及細小差別的積累性效應多么巨大。在從民主形式轉向進步人士迫切渴望得到的民主功能過程中，這兩個因素在最后都發揮了特別重要的作用。

# 第五章 公民的抱負

## 私有財產，公共設計

進步人士政治想象中的城市既是動詞又是形象：既是劇烈的公共活動的表現，又是心中的圖畫。弗里德里克·豪威多年后仍然記得他“想象中的城市構造應該是什么樣子的……那是一個單元，一個有思想的東西，有清晰的目的，眼光遠遠超越當前狀況，預先采取措施適應將來的變化”。他寫到，從第一次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接觸阿爾伯特·蕭的課程起，“我研究城市就像別人研究藝術一樣，我對街道路沿、下水道、空中輪廓線特別感興趣”。[[308]](#_308_25)

藝術和下水道：人們對這種并列可能感到困惑和懷疑，在已被時間分開的類別中費力尋找自己的方位。但是進步人士的核心性格特征在于既從形式角度也從功能角度來看待社會政治。社會的核心價值應該體現在街道設計、公共建筑、居民區和城市風光上，這是大西洋兩岸進步文化的堅定信念。進步人士心中的城市既表現在公共水廠和公交車上，也同樣充分地表現在市民活動中心、城市分區地圖上。豪威記得他們渴望的是“美麗”。但是激起他們熱情的不是“美麗”本身，而是有意識設計的可能性：把公共選擇的秩序添加在城市土地、地區選擇和建筑風格的巨大而混亂的市場上。從城市規劃想法的最初萌動到“新政”和歐洲社會民主黨的社區建筑計劃，進步社會政治一直強調的理想是：社區不僅擁有自己的基礎設施而且體現自己的設計。給其中一面帶來能量的大西洋紐帶也激發了另一面的活力。

在某種程度上，進步人士在城市形式上的專注是旅行的產物。參觀者很少有浪費的時間，眼睛總在閱讀著形式和表面現象。就像在他們之前到歐洲考察藝術的大旅行朝圣者一樣，試圖在藝術外在形式上分析其內部文化內涵，進步人士都是形式的熱心學習者。在歐洲參觀的美國進步人士很少不陶醉在臨街建筑和城市風光上的，就好像每個國家的政治文化秘密都可以從這些內容中揭開。柏林街道的異常寬闊和城市當局在維持街道整潔方面的一絲不茍，以夸張的形式向美國人講述著德國人的效率和公民意識。維也納就是壯觀的環城大道，巴黎就是林蔭大道，紐約就是怪異的、高聳入云的摩天大樓。人們在每個城市都可以閱讀其獨特的建筑模式：一直延伸到柏林邊緣的四到五層廉價公寓的堅固方陣：數英里長的狹窄街道和投機商建造的英格蘭房屋，與衛生地方法規框架緊密結合：蘇格蘭城市高大的石頭公寓：波士頓擠到鄰居家占空間的三層木板房：紐約一幢幢廉價公寓形成的幽暗深谷。

歐洲人閱讀美國城市的愿望也同樣強烈。H.G.威爾斯認為曼哈頓的摩天大樓就是城市被“沒有靈魂的強大力量”控制的標志。相反，查爾斯·布思認為這些高樓訴說著新大陸無限的能量。隨著大西洋經濟體進步人士越來越積極尋找相互的經驗和革新，到處都是迫切閱讀城市形式以便發現背后社會意義的參觀者。[[309]](#_309_24)

盡管結果可能相互矛盾，但這些努力決不是愚蠢的。表面現象有時候會誤導人，最明顯的例子莫過于柏林了，其他地方的貧民窟都是公開展示出來的，而在這里都被藏在城市街區內部擁擠的棚戶區。不過在某種程度上，一個城市的形式和建筑、街景和輪廓線、公園和住宅區，暴露了城市土地和住宅背后力量的輪廓，眼睛是不會騙你的。伯明翰工人階級家庭的成排房屋十二英尺寬，后面有狹窄的一塊地，高高的籬笆，陰暗得不適宜生物生長。這和芝加哥的獨立小木板房完全不同，后者散落在泥濘的街道上，還散發著未干燥處理的便宜木頭的強烈味道。兩者都不同于華盛頓的后街陋巷、曼哈頓廉價公寓里合住的通風井：也不同于柏林那擁擠在一起的、一廳一廚的兩室公寓。曼哈頓、芝加哥以及一千個比較小的美國城市的連綿不斷、沒有盡頭的筆直街道，與巴黎的豪華林蔭道或者德國城市內部曲里拐彎的棚戶區不同。所有這些區別都反映了財產、法律和政治的不同混合體。

這三種因素都深刻影響著城市的外觀。土地財產和建筑資本背后的所有權可能是分散的，也可能是緊密集中的。都市土地市場的法律基礎可能適應迅速方便的財產交易，也可能適應錯綜復雜的、大盒套小盒式的租賃關系。城市空間發展的公共利益可能被有意識地展現，也可能讓位給市場價格和優惠等多種決定因素。比建筑學的作用更大，市場的這些因素或者（用M.J.唐頓更精確的術語）“占據支配地位的‘財產文化’”，也給予城市基本的形式。[[310]](#_310_25)

北大西洋經濟體的城市不管還能是別的什么，至少都是巨大的、劇烈攪動的、靠法律維持的土地和住房市場。在想象中，不動產或許強調穩定性，可實際上沒有任何地方比世紀之交的資本主義城市不動產轉手更快，或者表現出更深刻的商品化過程。由于流動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大城市是房地產投機的最成功的發動機。由于土地分割標價出售、出租，或者握在手里等待空想的使用方式迅速轉變導致其價值暴漲，所以土地成為可以倒賣的商品。因為同樣的原因，住房也成為商品。從建筑的普遍高度、密度到城市街道的模式、工薪家庭典型的居住空間，或者讓美國城市具有獨特的“豁牙”外觀的空地（投機者尋找大機會而握著不開發），讓人們從城市形式中閱讀到財產的權利和力量。

即使想象一下私人力量的這種合流是可以“規劃”的，在當時聽起來也會是大膽的政治宣言。相當數量的進步人士聚集在這種抱負上。紐約市公交車戰斗的核心人物米羅·莫爾特比擔任的第一個城市管理職務，就是一個調查歐洲城市設計的委員會的秘書。豪威一輩子都對城市規劃熱情不減。他的好朋友林肯·斯蒂芬斯1909年也在琢磨“我嘗試的最大一項工作”——創立“城市經理或者城市設計師的新職業”。弗洛倫斯·凱利的全國消費者聯盟是為勞動婦女爭取更好工作條件的先驅，她幫助組織了美國第一個城市規劃展覽。搜集了那么多社會政治理想的雜志《調查》從一開始就開放篇幅發表城市規劃方面的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社會福利事業的重要資金支柱拉塞爾·塞奇基金會幾乎花費了一半資產，在長島上建立模仿英國的模范郊區“森林山花園”。[[311]](#_311_25)

對于城市空間、住房、設計的關心在北大西洋經濟體的每個國家都激起討論。從1889年巴黎博覽會上關于工人住房的第一次國際會議起，住房國際會議就成為固定的活動項目。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城市規劃的示范地像磁石一樣吸引了眾多社會改革者：英格蘭的（日光港、伯恩維爾、萊奇沃思、漢普斯特德）：德國的（法蘭克福、烏爾姆、海勒洛、埃森的克虜伯居住區）。最有氣魄的國際城市規劃展覽和會議也一樣，最大的一次1910年在維也納舉行，吸引了兩千多名與會者。通過這些論壇，社會的和立法的手段得以異常迅速地傳播，包括模范住房設計、模范住房立法、街道規劃和城市分區模式、控制土地投機的機制、影響郊外土地發展的措施等等。[[312]](#_312_25)

到美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十年進入時，這個網絡已經基本形成，他們再次成為遲到者。部分因為此種原因，部分因為從來不能真正擺脫審美大旅行留在心中的歐洲那種和諧完美風景，美國人在跨越大西洋的背景下再次看到自己城市的雜亂無章后往往感到非常尷尬。豪威把典型的美國城市稱為商業“事故”，這個進步派的比喻有許多變體：人們發現城市“沒有統一感，沒有永恒性，沒有整個社區的權利意識”。剛剛從英格蘭新花園城市參觀回來的沃爾特·韋爾贊同這個觀點，美國城市除了“自私的利益沖突亂象外”還有什么？簡直就是一個“過分膨脹的、無法無天的”巴比倫。列奧·羅韋抱怨說：“城市不應該是狹窄和壓抑的大街的單調重復：不應該讓每個可用的空間都覆蓋閃耀的招牌，讓每個街道拐角都有一酒館，讓每個人都隨心所欲地建房。”[[313]](#_313_25)

實際上，世紀之交的倫敦像紐約一樣閃耀著眾多廣告。帝國時代柏林的街道門面過分體現裝飾和資產階級的自豪，在盛氣凌人方面并不比芝加哥的大煙囪遜色多少。資本主義城市在任何方面都表現出家族相似性，但是美國人認為商業化力量在美國城市中特別強大和不受約束，這也確實沒錯。在與私有化城市爭吵的背景下，看看巴黎甚至倫敦，美國進步人士不可能不注意到明顯的差別。他們把歐洲人在城市規劃方面的實驗當作某種社會設計的證據，即朝著公共需要的方向調整和規范市場。1930年代社會政治的關鍵詞“計劃”通過歐洲、通過城市規劃的思想成為美國的政治詞匯。Städtebau（德語，字面意思是“城市建筑”）是最初的名稱。在英國它被重新命名為“城鎮規劃”（town planning），用來表示土地和建筑的控制系統，在價格和市場交易“看不見的手”之外添加了看得見的公眾之手。它許諾對城市設計和前途加以新的集體控制，許諾房屋質量的新標準，許諾把磚頭和灰漿添加在公民改革者的“城市意識”上。豪威寫道：“我們開始看到城市是有意識、有生命的有機體，建筑師、工程師……管理者、夢想者能夠為了人民的舒適、方便、幸福而建造和設計。在很大程度上，城市規劃是第一次清醒地認識到社會的統一性。”[[314]](#_314_25)

懷有這些設想和抱負，美國進步人士成為積極傳播歐洲集體城市設計觀念的渠道。通過大西洋紐帶，他們一個又一個為美國帶回了整套規劃工具，有些束之高閣從來沒有使用過，有些被迫切拿來推行，有些做了修改。這些引進觀念的標志至今仍然清晰地出現在美國都市風景上，如借來的古典主義，體現在190年代中期及以后帶著巨大公民熱情建立的公共建筑中：如費城的菲爾芒特（現在的本杰明·富蘭克林）大街的城市風景區干道，是根據巴黎的奧斯曼男爵模式建造的：還有從德國引進的分區規劃，它像八哥一樣以變更的形式迅速在新土地上繁衍起來。如果認真尋找，你可以發現一些木板房仍然矗立在馬薩諸塞州的洛厄爾，它們是美國第一批公共資助住房運動的成果，是英國花園城市設計元素、新西蘭先例和本土勞工政治結合的產物。

進步人士的抱負變得更加深遠了，它們被儲存起來等到戰爭和大蕭條給予施展的機會。北大西洋經濟體中沒有哪個規劃師比美國人在190年代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制訂的城市藍圖更大膽，也沒有哪個地方在城市規劃方面像美國這么熱情真摯地推動。擁有自我意識的城市、市營公共服務業、對都市土地市場力量的約束、對于居民住房需求的關注、體現在市政建筑和公共空間的自豪感等等——一時間，這一切在大西洋兩岸進步人士看來都是一致的。

如果把測繪和不動產登記的秩序管理包括在內的話，每個現代大城市都包含一定程度的規劃。在統一的土地所有權和政治廣告欲望匯合的地方，如賓夕法尼亞州費城、朗方（L'Enfant）規劃的哥倫比亞特區，或現代歐洲初期作為王室權力櫥窗的任何城市地區，設計規劃確實非常詳細。但是在19世紀中期前的美國，讓所有這些都相形見絀的規劃是坐標方格。111年紐約市的直線街道計劃沿著東河的濕地一直推進到曼哈頓盡頭，有意表現出對地形狀況的冷漠，這成為一種模式。沿著這個開放性的坐標方格，讓私人投資者、投機建筑商、買家、改造者去建設希望未來可能批準或者市場能夠認可的任何東西。規劃委員會和分區條例都還沒有出現，在10年代以前，甚至沒有建筑標準去限制個人在填補坐標方格中空白區域時的特權。在勘測員辦公室里用尺子畫出，坐標方格規劃最大限度方便了土地銷售的速度和效率。正如英國城鎮規劃師雷蒙德·昂溫注意到的，坐標方格適合土地使用永遠在變動的城市，比如今天是居民區，明天可能成為商業中心或者倉庫區。[[315]](#_315_25)

坐標方格在所有這些方面是自由放任經濟的物質表現：一種將交易機會最大化的法律和社會設計，很容易地變成了思想上認為“自然”的做法。坐標方格方便、快捷、沒有限制，是資本主義城市的完美計劃。與歐洲古老的、積淀的城市外形相比，它給予1世紀美國城市一種更確切、更透明反映出經濟關系的形式。但它不是公共設計，除了最低級程度的含義外。除了像奧姆斯特德的紐約中央公園等罕見的例外，以這種方式建立的城市都是私人空間強、公共空間弱。不管是從實際上還是在象征意義上，它都沒有滿足進步人士日益增強的、把城市看作人們共同的家園的集體主義觀念。就像公民團結一體的沖動吸引美國進步人士關注格拉斯哥的公交車和倫敦的蒸汽輪渡一樣，這種沖動也吸引別人關注歐洲大城市的都市設計工具。

他們的第一站是巴黎。作為中央規劃形成的現代大城市的模范，1世紀末期沒有哪個城市比它更輝煌。劉易斯·亨利·摩根在1871年把巴黎稱為“世界上最漂亮的城市，它給予陌生人驚人奇妙的印象”。摩根心中的不是由擁擠混亂的街道組成的、經常被皇家活動場地所打斷的老巴黎，而是在早期城市結構之上大膽建造的新巴黎。在1世紀中葉，在拿破侖三世的敦促和喬治·尤金·奧斯曼的指導下，巴黎的重建大膽、昂貴，充斥大量的公共象征，北大西洋經濟體沒有哪個地方可以與之媲美。[[316]](#_316_25)

擔任巴黎重建實際工作的奧斯曼是一位多才多藝的規劃師，在他看來，城市決不是街道模式那么簡單。作為巴黎的行政長官，他負責監督很多英里新下水道的建設，要完成渡槽系統，最終解決城市依賴塞納河供水的難題。但第二帝國巴黎的心臟在它的街道。從1853年到1869年，在奧斯曼監督下從老巴黎混亂擁擠的老街中開辟了十多條寬闊的新林蔭路。實際上，西堤島上除了圣母院外的幾乎所有中世紀建筑都被拆除了，全部用龐大的政府大樓替代。星形廣場有一條條對角線林蔭大道交織，它們以幾何學的癡迷會聚于拿破侖野心的象征——凱旋門。

在可以選擇的地方，奧斯曼更喜歡開辟新街道而不是拓寬原有街道。購買內部地塊的成本低于獲得現有臨街地段的成本。更重要的是，在新繪制的林蔭大道上，奧斯曼和拿破侖三世看到了一塊白板，可以創造賦予第二帝國巴黎獨特性格的新街道景觀。為了確保新開發的臨街地段投資商符合公共空間的要求，奧斯曼規定了統一的飛檐高度和共同的水平窗戶線和陽臺線。結果整條街的臨街面吸引人們把目光投向景觀的頂點——公共廣場或者紀念碑。

奧斯曼用來努力把巴黎集中起來的豪華對角線林蔭大道非常昂貴。國家貸款和津貼支付了工程的部分費用，但正如奧斯曼很快認識到的，更廣泛的潛在資源是土地市場本身。通過購買便宜地塊開辟新街道，再高價出售新建筑地塊，他創造了類似于都市公共工程永動機的東西。如果說這個機制有方便合算的考慮，它也包含了某種公正性。如果有人突然發現自己擁有大片可以建設高檔商店和豪華住宅的土地，還有誰比這些人更適合資助街道建設的公共開支呢？

奧斯曼規劃下的巴黎地價飛漲是社會產生價格優勢的經典例子，如果用亨利·喬治普及的術語就是“非勞動增值”。作為補償，奧斯曼得到土地征用法案的幫助，法案允許城市當局征用的土地多于擴充街道本身所需的量。后來在美國被稱為“土地超額征用”（Excess Condemnation），這個技巧授權巴黎當局征用和購買沿著新規劃的街道的大片土地和建筑區，然后再以市場能夠承受的價格出售給私人投標者（附有嚴格的建筑規范要求），當局用這些收益資助改造工程本身。但是土地超額征用在奧斯曼看來也還是一只不夠肥的鵝。到了1870年，他的預算已經膨脹到失去控制的地步，成為拿破侖三世難以承擔的巨大負債。不過到這時，在公共強制和私人投機性投資的結合下，經過規劃、重新集中起來的城市在本世紀最有力的物質表現已經建成了。

人們從巴黎新街道上閱讀到的信息一開始就具有多重含義。新城市顯然比老城市效率更高，新的對角線林蔭大道極大地方便了交通和貨物分配。如果說新街道帶來了貿易前景，它們也預示著平定。絕非巧合的是，許多拓寬的街道集中在巴黎激進的工人階級舊居住區，從前那里常出現路障封鎖：同樣并非巧合的是，奧斯曼把兵營安置在最具戰略性的地位上，讓城市大軍更好調動。劉易斯·芒福德顯然不喜歡奧斯曼的巴黎，他說“馬背上的人占據了這座城市”。[[317]](#_317_25)新街道把城市和游行場地聯結起來，為行進的士兵、奔跑的馬車創造了表演展示的環境。它們是龐大人口轉移的發動機，尤其是對城市窮人而言。它們是龐大規模的公共建設工程，吸引大量建筑工人到首都來，以至于有些保守派擔心這些人的存在將破壞國家的所有社會緩和措施。

在這些深度混合的信息中，到巴黎來的游客竭力要辨別出城市的核心意義。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19世紀中期的美國游客常對奧斯曼的工程感到不寒而栗。但是對于1890年代中期的阿爾伯特·蕭來說，巴黎是歐洲大陸最激動人心的城市，用來給“世界一個教訓，讓人們認識到秩序、系統、邏輯、解放、打破傳統”。1912年被奧斯曼的工作深深打動的布蘭德·維特洛克贊嘆說，此人戰勝了“可怕的無政府主義和偶然性”，而這些依然控制著多數美國城市。[[318]](#_318_25)奧斯曼的城市以公眾利益的名義（不管是多么虛假和威重）進入都市土地市場深處。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看得見的。這個城市給所有喜愛它的人提出的問題是：如何創造出同樣協調的設計、對土地和建筑市場的同等控制，同時又消除帝國的獨裁和虛偽。

考慮到奧斯曼工作的多種價值，北大西洋經濟體的每個國家都從中汲取不同的營養就沒有什么好奇怪的了。柏林當局抓住了紀念碑式建筑的可能性。從詹姆斯·霍布瑞希特1862年的擴張計劃開始，能夠和巴黎媲美的新巴洛克風格的首都就圍繞著舊的內城建設起來了，有特別寬廣的街道、紀念意義的廣場、對角線林蔭大道及其兩邊迅速由投機商建造起來的公寓等。在英國，則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奧斯曼化，集中在貧民窟和衛生設施方面。按照伯明翰“公司街”的模式，英國城市當局拆除內部窮人和工人階級居住區建造商業街，通過超額征用土地再按建筑用地重新出售來補償開支。在1872年到1884年的倫敦，街道項目要求一個窮人聚居區拆遷（按加瑞斯·斯特德曼·瓊斯的估計，那兒有兩萬多人）。就像奧斯曼的巴黎窮人一樣，他們溢出來進入附近街區，很快超出其負荷能力后再往外遷，形成貧民窟水銀似的流動。德國當局關注城市發展中移動的邊緣的街道設計，而英國城市議會的注意力則集中在內城改造上。當奧斯曼的巴黎最終來到美國人視野中影響土地辦公室坐標方格的時候，它又有了不同的意義。[[319]](#_319_25)

巴黎激發的城市美學的第一批元素在1880年代后期零零碎碎進入美國城市，比如柱子、塑像、凱旋門，以及大旅行之后帶回家的其他東西。在1888年到1901年間，考慮到改造弗雷德里克·勞·奧姆斯特德位于布魯克林的非規整園林“展望公園”的任務，由麥金、米德和懷特建筑公司重新建造，采用古典柱廊、中央集中的景觀、凱旋門上面有馬和帶翅膀的騎士，這些都直接來自巴黎和柏林。1899年被《哈珀斯雜志》派遣到歐洲收集都市美化方法的查爾斯·馬爾福德·羅賓遜回國后，推動投資建設歐洲風格的公共廣場、街景、噴泉、公共雕塑、藝術品味的路燈柱、裝飾精美的街道標牌。他以毫不掩飾的模仿美學成為美國最成功的城市規劃顧問之一。[[320]](#_320_25)

歐洲激發的公共建筑的勝利，是1893年芝加哥世界博覽會建造的著名的“白城”。負責白城工程的芝加哥建筑師丹尼爾·伯納姆只是從圖畫書中了解過歐洲的建筑。他讓博覽會上赫赫有名的那些東海岸建筑師事務所確定審美議題。他們心中想著巴黎，在一個榮譽廣場上集中展覽其核心建筑群，明顯讓人聯想到1889年的巴黎世界博覽會。他們立意追求建筑和諧，共同的飛檐線、共同的白色外觀，建設出了世紀之交最引人注目的圣像之一。[[321]](#_321_25)

博覽會不過是個博覽會。在芝加哥矗立起來的臨時性石膏建筑來得快去得也快。但是它們留下了世紀之交公民進步人士非常珍視的公民團結的審美語言，體現在中央集中的景觀、成群的公共建筑、讓人驚訝的統一風格等。1901年建筑界勸說聯邦政府接管華盛頓特區的設計，從一層層的后來商業發展、鐵路入侵、時尚變化中挖掘1791年朗方的計劃，這個任務就被交給了芝加哥博覽會的負責人。作為顧問委員會主席的伯納姆最先采取的行動之一就是建議到歐洲考察。美國一個受委托設計國家首要公共象征的正式委員會，去旅行考察歐洲各大首都，拍攝各種東西，鉆研華盛頓特區地圖，辯論在哪里以及如何讓搬用的因素成功地移植到美國來，如果這樣的景象存在任何不適宜的地方，當時的人已經不再注意到了。[[322]](#_322_25)

在伯納姆的所有城市規劃中，華盛頓計劃是后來唯一被大致付諸實施的，但他的商業城市設計更能說明問題，也更重要，那些設計背后沒有古典模式可做基礎。伯納姆被湯姆·約翰遜帶到克利夫蘭，要尋找把資本主義城市龐大的、離心傾向的私有能量重新集中起來的建筑手段。他建議拆掉城市商業中心東北邊不景氣的濱水區，在那里建造大片新古典公共建筑——法院、圖書館、市政廳、聯邦政府機關、公共禮堂、統一的鐵路客運站等。這種設計理念部分借用巴黎的協和廣場，部分來自白城的中央院區。曾經召集克利夫蘭開明商人參與該工程的弗里德里克·豪威多年后還記得這個計劃多么激動人心，讓人分明感覺到進步的“城市意識”。他當時寫到，公交車戰斗是克利夫蘭進步人士的中心戰場，但是公民中心項目“把所有階級最緊密團結在一起”。伯納姆因為出色的克利夫蘭工作在1905年受托為舊金山設計總體規劃，他提議把公園和景觀林蔭大道與克利夫蘭風格的宏偉公民中心聯結起來，這次把中心確定在氣派的新對角線大道的交匯點，明確無疑地顯露出模仿巴黎的痕跡。[[323]](#_323_25)

城市規劃中最宏大的是伯納姆1909年對家鄉城市芝加哥的重建計劃。沒有哪個城市比它更徹底地受到商業企業的影響了。伯納姆的建筑師事務所曾經用鋼鐵框架的商業大樓幫助填充的芝加哥環區，當時受到高架路和環繞的鐵路調車場的束縛。芝加哥河是開發商們的煤炭場和鐵路調車場、碼頭、起重機、小工廠的大雜燴。從環區往南往西是數英里長由投機商建造的工人階級住房、沒有鋪設的街道、工廠、食品加工廠、鋼鐵廠、更多的鐵路調車場。伯納姆拿來芝加哥地圖，就好像每個地方都可以通過有意識的設計而修改一樣。他提議將鐵路調車場往后推移到郊區，把鐵路覆蓋的環湖區域建成數英里長的公園用地和湖塘，再用博物館和圖書館裝飾由此形成的格蘭特公園。對于環區，他提出了野心勃勃的街道擴寬計劃：對于城市其他地方，他提出開辟一套新的對角線干道穿過坐標方格，外面圍以一條環行路——如果芝加哥是巴黎或者擴大了的維也納的話，那就是舊城墻的所在地了。在這個強力集中的街道系統的核心點，在移民聚居的西邊、離簡·亞當斯的赫爾館有一個半街區遠的便宜土地上，他設計了一個公民中心，是芝加哥博覽會的中心場館的變體，它上面是個巨大的穹頂，（據規劃的一種說法）矗立在街道平面30層樓那么高的地方。[[324]](#_324_25)

試圖理解伯納姆芝加哥規劃的象征意義，會讓人們像看待奧斯曼巴黎一樣得出非常混亂的信息。一方面，伯納姆計劃是明顯與位于國家鐵路網樞紐的這個商業、屠宰場和鋼鐵大都市相沖突的規劃。他的規劃把城市中心的形體從商業發達的環區轉移出去，把注意力從商業轉向公民生活。在這個曾經為追求利潤把自然資源利用到極致的城市，伯納姆提議把整個湖濱地帶改造成公共場所。坐標方格街道模式曾讓芝加哥房地產商不受限制地擴展生意越過大草原，而現在他給這些方格加上了對角線林蔭大道，用奧斯曼都沒有夢想過的更堅定的向心對稱交叉匯集到市政中心。“大人國”規模的中心穹頂設計，是由于需要有一個足以讓城市的商業中心摩天大樓相形見絀的公民象征。伯納姆的藝術家更強調這一點，讓公民中心的巨大穹頂打破芝加哥單一同質的屋頂水平輪廓線，不完全是因為畫圖的方便。在一個充斥政治腐敗的城市，最豪華的建筑——相當于新芝加哥的圣彼得大教堂，必須是市政廳。

如果反商業特性深深扎根于這種表現公民美德的設想中，規劃的背景卻沒有一點反商業氣息。與伯納姆曾經擔任城市官方規劃顧問的克利夫蘭不同，芝加哥城市規劃是私人商業俱樂部的財產，由該俱樂部資助和宣傳。伯納姆用一位慣于向客戶推銷品位的建筑師的語言，強調審美、旅游和商業之間的復雜聯系。他的商業支持者不需要多少哄誘。他們寫到，有了正確的計劃，“芝加哥肯定能成為現代世界的中心”。為了敦促伯納姆規劃的實現，他們聘用了一位負責公共關系的人（稱為“宣傳總干事”），這個人連同由328名“公民領袖”組成的委員會向全市發起宣傳攻勢。“芝加哥規劃委員會”準備了兩卷長的推廣影片、一部一萬五千美元的幻燈片、學校課本（1912年到1920年代初要求全市學校八年級學生閱讀），以及為牧師舉辦的模范布道。它還為每個業主和主要租戶分發列舉城市規劃優越性的傳單。僅僅擁有一個計劃就是特別巧妙的商業炒作，成為城市及其未來的精彩廣告。[[325]](#_325_25)

在涉及商業的這些矛盾信息上，伯納姆自己特別強調“秩序”和“統一”等基本因素，以及把城市當作“有機整體”的需要。作為整個計劃“拱頂石”的公民中心將成為“公民團結精神的紀念碑”。[[326]](#_326_25)統一性激發了約翰遜和豪威這些公民進步人士在大草原上建立自己的巴黎的夢想，希望城市街道和公共場所的重新規劃能夠激發公民意識和公民生活的復興。他們的渴望讓跨越大西洋的榜樣顯出遠遠超過事實上所具有的條理性。奧斯曼從來沒有發表巴黎的總體規劃，或許是考慮到已經引起的反對聲音如同馬蜂窩。多數英國城市議會是一個項目一個項目零碎地搞，根本沒有總體規劃。相反，在美國，城市規劃就像雨后蘑菇般蓬勃出現。從1907年到1916年，超過一百個城市制訂或者委托進行了“總體”規劃，包括美國最大的50座城市中的一半。[[327]](#_327_25)在發現和信奉的過程中，美國人把他們采納的東西集中化了。

因為要追求這么大輸贏的冒險，受巴黎激發的城市規劃者只實現了紙上規劃的很小一部分就沒有什么奇怪的了。新的城市規劃委員會多數只有勸告和建議的權力，美國式城市規劃是表達理想的文件，而不是法律文件。在克利夫蘭的公民中心、芝加哥的格蘭特公園，人們仍然能夠看到進步人士想象中的公共城市空間的具體表現。但是受巴黎啟發而加在房地產坐標方格上的對角線林蔭大道，幾乎就沒有一條離開過規劃圖。紐約的城市規劃委員會1904年到1907年設計了行不通的星形廣場和雄偉引橋方案，幾乎樣樣落空。[[328]](#_328_25)同樣的命運降落在伯納姆芝加哥規劃的公民中心點。需要豎起來的公民中心巨大穹頂被投資者放棄了，因為他們看到了城市商業未來在河北岸的召喚，它原來設計的地點現在成為縱橫交錯的州際高速公路樞紐了。

本世紀前20年大膽提出的城市總體規劃付諸實施時的問題不僅在于公民和商業城市象征上的沖突，而且在于找到法律和資金手段把奧斯曼式干涉財產權的做法用在美國城市上。在這方面很能說明問題的是，伯納姆的芝加哥規劃的最后一章用于詳細討論實施的問題，由芝加哥律師簽字蓋章。

從巴黎和伯明翰的例子看，明顯的措施是超額征用土地，通過出售增值了的建筑用地來補償各種費用。費城異常昂貴的菲爾芒特公園道工程就是以這種方式開始的。但是對于大部分城市來說，州法院拒絕支持超額征用土地的法案，因為它構成了為他人利益強行剝奪某些財產所有者權利的問題。如果用公共財政支持主要街道建設，意味著又將遇到困擾城市公共所有權力量的債務限制。即使這些限制被突破，稅收資助的方式在政治上也有風險，可能遭到居住在遠離改造區域選民的反對，他們不大可能忽略這個事實：林蔭大道稅的主要受益人是那些在土地市場上最狡猾、最善于投機的人。1910年賓夕法尼亞的雷丁市（Reading），工人階級多數恰恰就是因為這個原因否決了商人的城市規劃。為了購買公園用地，美國的州已經找到了擴大特別征稅權限的方法，要求毗連的財產所有者交街道改造稅。通過把預計將從建造公園中受益的整個鄰近街區劃為特別稅區域，堪薩斯市在1900年到1915年資助了一套新的車行道公園幾乎全部的成本。但是開辟街道和公共廣場的利益很難攤到比鄰近的財產所有者更大的征稅區域，很難期待這些人同意將自己的財產分割成片并且還為這損失買單。在財產權和規劃的斗爭中，占優勢的一方在巴黎和在美國是不一樣的。已經被抵押給私人土地投資的城市實際上很難再重新制造公民統一的象征。[[329]](#_329_25)

受奧斯曼激發的規劃很少變成現實，這也不見得不好。因為過分集中化的傾向，他們的星形廣場和交匯的對角線街道注定要被汽車交通所吞沒。這些東西更容易成為支持者渴望公民團結的象征，而不是能夠將其付諸實施的機制。伯納姆風格的計劃是視覺的建筑，熱衷于對稱和象征，很少考慮到私有化城市中既定的財產權利和土地投機性投資的問題。實際上，正是因為規劃能讓每個財產所有者的利益都得到提高這一承諾，才能吸引商人參與到奧斯曼的規劃中來。但是赤裸裸的歐洲化審美觀的伯納姆風格城市規劃是個標志，說明大西洋的鴻溝是多么快地被跨越了——該規劃把商業贊助和渴望公民團結的進步思想傾注到巴黎風格中，而這種風格在不久前還被看作是對共和原則的公開冒犯。

在城市美化運動所喜愛的巴黎之外，還有另外一些對城市規劃的理解，比伯納姆甚至奧斯曼更深入地插進土地和住房市場。在這些發展中，德國城市占領先地位。他們的創新能力部分來自19世紀晚期德國城市特別嚴峻的土地和住房壓力。與能夠向任何方向蔓延擴展的美國城市不同，德國城市不斷膨脹的人口就像擁擠在護城河圍繞的營地里。在古城墻之外，有些德國城市被小塊的農家土地環繞，經過多代人的財產分割，很難合并起來成為可以出售的建筑用地。還有些城市，比如這個類別的著名代表柏林，被龐大的土地投機公司占有的地產所環繞，這些人有絕對的利益動機維持邊遠土地價格居高不下，直到它們可以合算地開發成為城市建筑高度條例規定的五層樓用地。考慮到城市化進程比19世紀末期歐洲其他地方都快，這些限制城市擴張的壁壘給予德國城市的土地和住房價格帶來巨大壓力。[[330]](#_330_25)

結果是城市人口密度比北大西洋經濟體任何地方都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倫敦，在每一幢建筑物里平均住8人，在費城這個數字是5人，在芝加哥是9人，在廉價公寓集中的曼哈頓是20人。但是在33個德國大城市，每幢住房里的平均人口是21人。這些城市的外部標志是建造在城市邊緣的低層公寓建筑，德國批評家稱為“Mietskasernen”（出租營房），在這種地方居住的內部體驗則是激烈爭奪空氣和空間的競爭。在1905年的漢堡，城市的幾乎一半人口居住在每戶只有兩個或者更少房間的住房內。在法蘭克福就幸運得多了，居住在這樣條件的城市人口只有三分之一。在擁擠最嚴重的柏林，四分之三的城市人口——包括成人、孩子和房客都擠在這樣的房子里。[[331]](#_331_24)考慮到這些情況，難怪自阿道夫·瓦格納等人1870年代的倡導開始，工人階級的充分住房問題就一直在德國社會問題辯論中發揮著核心作用。

如果單單因為需要就可以讓城市土地和住房問題政治化，那么改革運動的中心肯定就落在柏林了。英國城市規劃者帕特里克·阿伯克隆比稱1914年的柏林是“歐洲最擁擠的城市，它發展的時候，沒有通過小路和散亂的郊區住房往外擴展，而是慢慢把寬闊的城市街道和巨大的居民區推廣到空曠的鄉村，一舉形成充分發展的城市”。[[332]](#_332_24)美國游客對明顯缺乏英美風格的空間分割情況感到困惑——對中產階級和窮人在龐大的公寓區擠在一起的模式感到困惑，有錢人住在臨街的平房，經濟上不那么寬裕的人就擠在后面房間里，窮人住在屋檐下或者最黑暗的內室。游客有時候很難認識到德國首都的人口密度和經濟力量。麥吉·詹尼森報告說，與倫敦很容易看到窮人的情況不同，“柏林的貧窮被圍繞起來了，是隱藏的秘密”。他是少數幾個進入“出租營房”內部發現真相的大膽美國人之一。[[333]](#_333_24)歐洲沒有比這里人口密度更高的地方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柏林每幢房子里居住的人數是76人，是曼哈頓人數的三倍半。嚴厲的監督已經封閉了1870年代的許多地下室和閣樓。根據官方對于過分擁擠的定義標準，一個可以供暖的房間如果居住超過四個人就算超標，那么在1912年，有60萬柏林人都生活在過分擁擠的住房內。[[334]](#_334_24)

如果說根據柏林設想的未來縈繞在德國進步人士頭腦中，土地和住房政策的主要實驗則是在較小的、壓力較弱的德國城市，這些地方的進步政策團體有更多可運作的空間。被都市土地問題吸引的有些是講壇社會主義者，如瓦格納，或施穆勒的學生魯道夫·埃伯施塔特：另一些是德國單一稅制倡導者，1880年中期被組織成為土地改革聯盟：還有像阿爾伯特·蘇德庫姆、胡戈·林德曼，是德國城市社會主義運動的關鍵人物。最后，都市土地和住房改革運動中的最重要人物還包括中間派的市長，他們考慮到公共健康的責任，同時敦促市政當局進入公共商品和供應的新領域。[[335]](#_335_24)

這樣廣泛的和不確定的同盟力量必然會綜合運用各種措施：政府更嚴格地檢查是否達到衛生標準、居住是否過分擁擠，改革租賃關系法，以及擴展（我們隨后看到的）廉價、可靠的工人階級住房的供應。但是促成最大膽措施出臺的因素是投機性邊遠土地價值這一絞索。正如許多人看到的，解決住房困境的最簡單辦法就是城市搶先占有未開發的郊區土地市場，通過新的電氣化城市公交系統把它和都市工作市場結合起來，推動低密度、低成本住房的發展。這是分散性城市景觀的設想——比廉價公寓的城市在形式上更“自然”，正如許多德國人看到的，它只有在法律和經濟偶然性的人工溫室內出現。德國土地改革者羨慕英國帶有小花園的小房子，郊區聯排房屋的寬敞空間。[[336]](#_336_24)到20世紀初期，他們已經開發出實現這個理想的一套新的規劃技巧和市場干預方法。[[337]](#_337_24)

最直接的新工具是城市購買土地。本世紀早期一直作為土地銷售者的德國城市，開始為了引導都市發展而在其邊界內外購回大量未開發土地。受到1901年普魯士住房問題法令的鼓勵，搶在投機性開發商之前購買大量城市土地儲備成為引人注目的潮流。這個運動的領導者是烏爾姆，到1911年它已經擁有管轄范圍內80%的土地，有些土地已經被開發成小型單家獨院住房出售給居民（城市保留重新購買回去的權力）。法蘭克福在1906年擁有略超過一半所管轄的土地。它與建筑協會簽訂長期租借協議，保證在城市邊緣建造低成本工人住房。[[338]](#_338_24)

如果眾多農民地塊分布在周圍，把土地切割成無法搞建筑的狹小長片，即使私人開發商也會因為個別土地所有者待價而沽拒不出售而受挫。法蘭克福的弗蘭茨·阿迪克斯提出的解決辦法授權城市官員，在多數鄰居都同意出售時，可以按司法評定的價格從拒不服從的土地所有者手里購買土地，然后把這些地塊連成建筑用地重新出售。阿迪克斯的法案在普魯士立法機構受阻，被降低為法蘭克福特殊情況，這種征用最頑固的小地塊所有者土地的權力主要在于其象征性的意義而非實質效力。但是作為城市集體權利與土地所有者投機權利關系的聲明，“阿迪克斯法”（后來的名稱）得到那樣廣泛關注和報道也是理所應當的。[[339]](#_339_23)

更普遍使用的方法是對土地價值投機征稅。由于阿道夫·瓦格納的宣傳和德國單一稅制支持者的推動，以及19世紀末期德國政治文化強烈反對投機傾向的鼓勵，進入新世紀后，這種思想很快獲得巨大影響力。1904年的法蘭克福和1905年的科隆是首批征收土地交易累進稅的城市，設法征收土地價格上漲中非勞動所得的四分之一為增值稅，并且（阿迪克斯這樣認為）打擊對城市邊緣土地的投機。到了1911年，當帝國本身開始針對城市土地試征收兩年期的資本增值稅時，超過650個德國城市都群起效仿。這些城市迫切希望得到收入新來源，很高興讓納稅負擔首先落在投機的土地收益上。[[340]](#_340_24)

新德國措施的最后一個工具是城市分區。對于城市的不同區域確定不同建筑規范的思想，在19世紀末期的德國并不是不為人知的。典型的受益人是德國城市中的超級富豪，因為建筑規范常常為他們設定獨特的、階級隔離的花園住宅區，使其在多層廉價公寓向外推進時受到建筑高度限制的特別保護。城市從中心越往外走人口密度越小，從內部的中世紀棚戶區經過“出租營房”再到低密度的邊緣，這種洋蔥皮模式對德國中產階級有明顯的吸引力，他們中的許多人渴望逃脫不同階級混雜居住的傳統。1891年法蘭克福的分區條例，第一個覆蓋全城、對不同地區規定不同建筑標準的條例，就包括這種花園住宅區。它的首要推動者阿迪克斯卻是從不同的角度為城市分區辯護的，說這是限制邊遠地區土地所有者價格期待的手段。這也并非言不由衷。通過強迫城市邊緣的人口密度降低，法蘭克福的市議會希望鼓勵更便宜的、更低廉的郊區建筑。為了強化這點，法蘭克福城市分區條例還劃出留給低密度工人住房的邊遠區域：第二年推行的柏林城市分區條例也是這樣做的。[[341]](#_341_24)

作為城市建筑規范的詳細闡述，城市分區規劃具有的法律影響力和實際后果遠遠超過了美國城市規劃的紙上理想。在抱負最大的時候，城市分區規劃是一個在價格體系之前詳細制訂城市發展藍圖的手段：把工業發展放在靠近鐵路和碼頭的區域，預留方便工作和交通的區域用以建設便宜的、小型的工人住房，用公共表達的規劃打破土地所有者投機發財的美夢。

這些新措施中沒有一件戲劇性地改變了威廉皇帝時代德國的土地和房屋關系。因為帝國官員對于強勢的土地兼并和購買政策的阻撓，柏林仍然被限制在異常擁擠的石頭房屋里，這些官員厭惡自己首都的社會主義者多數派。住房改革者試圖通過全德國范圍的住房法律的努力，也在房屋所有者的抗拒和財產擁有者的游說下失敗了。雖然具有重要的象征意義，但非勞動所得增值稅一直不過是戰前德國城市財政收入中的涓涓細水而已。在1910年的柏林，這種稅收的份額只占城市收入的不足4%。即使在法蘭克福，阿迪克斯的土地市場干預措施也引發土地所有者團體的強烈反對。[[342]](#_342_24)不過，盡管規劃措施的力量有限，但德國對于城市土地市場運作的干預行動創造了一系列潛在可用的工具，人們可以運用這些工具來建設不同于私有化大都市和奧斯曼在塞納河上建造的游行廣場的城市。

在英國，城市規劃的抱負最初采取了和世紀之交的德國完全不同的方向。除了蘇格蘭之外，英國城市建設的特點是低矮和廣闊。在蘇格蘭，高額的土地價格和低廉的工資使得多層廉價公寓非常盛行。在德國城市把多層“出租營房”向外推到開發土地邊緣時，英國城市的外部邊緣擴張形式則是散亂分布的兩層聯排房屋，坐落在狹窄的、嚴格統一的街道和人口稀少的地塊上，這些區域都是在1877年后，嚴格按照地方政府委員會的建筑模式細則的衛生最低標準劃定的。為了抵消千篇一律和單調重復，一個街區的房屋可以建造飄窗，另一個街區可模仿都鐸王朝時期把木料鑲入灰漿中，再一個街區可在突出的屋檐上模仿瑞士的渦卷裝飾、蒂凡尼玻璃窗、仿希臘木頭柱子、漂亮的多彩屋瓦，或粉刷花哨的裝飾。在雜亂的建筑商手冊風格中，人們迫切希望通過可推銷的房屋外觀建立一種地方感。英國都市的形狀是傳統和創新的妥協，是法律嚴謹性和私人投資算計的妥協，不是市場自由選擇的結果。同樣的，它也不是事先計劃好了的。[[343]](#_343_22)

首批嘗試比最低限度的公共健康考慮更多的城市設計的人，是那些有家長作風的生產商。1888年利物浦外的日光港，肥皂廠老板威廉·萊弗奠定了受到廣泛拍照宣傳的公司村落的基礎，這是半木結構的、裝飾華麗的集中住宅區。更素雅的是喬治·吉百利在伯恩維爾可可工廠鄰近區域建造的雇工村落，這里外觀樸素的雙拼或者四拼房屋的街道匯合處是學校、商店、貴格會禮拜堂——被吉百利安排在城鎮的中央綠地。愿景在這些設計中發揮的作用并不小，這多虧了生產商直接擁有可開發的土地。但是起到重要作用的因素還有風景如畫的公司村落的廣告功能，以及誘人居住條件對于留住雇主所需技術工人的用途。[[344]](#_344_22)與這些英國公司村落類似的情況也可以在北大西洋經濟體的其他地方找到：在埃森，克虜伯贊助的瑪格麗特花園城（Margarethenhöhe）是戰前德國工人住房設計的高水位線：在伊利諾斯州有普爾曼，在賓夕法尼亞州有范德格里夫特——都存在高度自覺的技術和設計交流。

從經濟上和社會上來說更大膽的行動，則是埃比尼澤·霍華德在萊奇沃思建造的先驅性花園城市。萊奇沃思是個實驗場，在這里嘗試單一稅制的經濟、全面的城市計劃，嘗試創造比孤獨的鄉下生活或者壓力巨大的大城市生活都更有吸引力的生活環境。它開始于1903年，得到英國一些著名模范雇主的支持。身為合作社類型的空想社會主義者，霍華德特別關心把新城鎮的非勞動所得土地增值用在集體利益。萊奇沃思的主要建筑師雷蒙德·昂溫是受到德國中世紀城鎮美學激發的費邊社社會主義者。作為規劃、想象和自身投機抱負的混合體（從萊奇沃思火車站廣場出來的游客最先看到的景觀就是該工程旗幟飄揚的土地辦公室），霍華德和昂溫合作建設的城市馬上贏得國際好評，無論從形式上還是經濟上都成為進步人士設計的典范。沃爾特·韋爾注意到萊奇沃思的發展。

不是瘋狂的城市蕪生蔓長、令人厭惡的擴張，隨意性向外延伸許多英里，在更便宜或者主人更貧窮的土地上建造偷工減料的房屋……它不是配有高聳入云的煙囪，被單調房屋和了無生氣的四方院圍繞著的現代工廠城市……它不是沒有結構，不是沒有經過事先考慮的。它不是那種既擁擠又分散的城市，難看的光禿禿的空間被臨時圍籬環繞，車間、酒館、居民區亂七八糟擠在一起。

花園城市是經過規劃的，“有機的、綜合性的城市”。[[345]](#_345_22)

1905年，湯因比館的亨麗埃塔·巴內特聘請昂溫在倫敦邊緣做類似實驗，設計階級混合居住的郊區。在他的漢普斯特德花園郊區，昂溫創造了一個讓人吃驚的村莊，有著從德國南部小鎮借來的蜿蜒曲折街道，有廣場和內向環繞的死胡同（cul de sac）以創造鄰居空間，細膩的建筑偽裝掩蓋了村莊背后的階級差異。在歐美的戰前城市改革者中間，英國人嘗試的慈善村莊設計如漢普斯特德、萊奇沃思、伯恩維爾、日光港等是當時最著名的看得見的偶像，是重新把城市社會化的藍圖。[[346]](#_346_22)

但是，要讓這些小島在投機商建造的房屋的大海上變得不那么稀少，就需要更廣泛的公共權力。正是在這個關鍵點上，英國進步人士意識到來自德國的城市規劃技巧的重要性。宣傳德國規劃新措施的最初工作落在曼徹斯特都市改革者托馬斯·霍斯福身上，他是一位見多識廣的富翁，在1904年出版了《人們住房和周圍環境的改善：以德國為例》一書，這幾乎算不上是書，而是翻譯過來的德國報告和法規的匯編。由于受到伯明翰市議會住房委員會主席約翰·奈特福德的推動，該城市很快派遣一個代表團到德國考察城市規劃。奈特福德本人很快向議會提交議案，授權英國城市當局先于開發商購買城市邊遠便宜的土地（像德國那樣），與交通部門一起協調規劃，然后再把大部分土地出租給有限贏利的住房協會（按法蘭克福的模式）。[[347]](#_347_22)

因為在地方政府委員會上受阻，奈特福德的議案從土地購買計劃轉變成為一套規劃權力。在1909年《住房和城鎮規劃法》的規劃部分條款中，英國地方當局仍然不能從事一般的土地交易，但是它們有權為即將開始集中開發的具體的未建區域制訂詳細的發展計劃，在地方政府委員會的同意下，運用法律的力量實施這些計劃。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只有以奈特福德的伯明翰為首的一小部分城市制訂了發展計劃。英國城市規劃當局只能零碎地進行，對城市周邊的特定區域進行規劃。但是在這些區域他們可以設計街道和保留公共空間（根據毗連的財產所有者確定成本），把住宅區連成片，建立工業和商業區，（在開發前）確定密度限制，在特殊情況下甚至確定地塊界線。從萊奇沃思的經理辦公室來到地方政府委員會的城市規劃顧問新崗位后，托馬斯·亞當斯試圖說服美國人相信城市規劃法案做了需要做的一切，這顯然夸大其詞。[[348]](#_348_22)不過，在破壞傳統的土地所有權和特權方面，在賦予城市本身展望未來的權利方面，該法案確實做了很多貢獻。

到了伯納姆的芝加哥計劃完成時，簡單地說，歐洲城市規劃者已經創造了一套能夠深刻切入城市土地和財產結構的法律和管理工具。在德國的城市規劃設計師和英國花園城市設計者之間已經存在技術和視野的密切交流。我們已經知道奧斯曼的技術世界聞名，“廉價住房國際大會”吸引了歐洲和美國的眾多改革者。美國的城市土地市場之變化無常不亞于北大西洋經濟體的任何地區，美國的進步人士很可能陷入這些辯論和理想中，這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他們希望得到控制城市設計的措施，其中有些人迫切渴望獲得國際上的新技術。1909年不那么確定的是（雖然芝加哥計劃的法律顧問或許比多數人適合做出預測）：這些努力是否足以把美國的城市規劃從象征性的、視覺直觀的議題變成具有深刻社會效果的工程。這反過來取決于引進的工具中有哪些能夠在跨越大西洋后仍然保存其優勢。

## “對工人公平的城市規劃”

由于陶醉在借用的街道景觀、公民中心，以及企業贊助者的經濟抱負中，美國城市美化運動的主要設計師最開始很少注意歐洲城市規劃的新方向。把更深層次的社會政治目標注入城市設計的工作則落入一群社會工作者和睦鄰中心居住人員的手中，他們住在建筑過度的大熔爐里——下曼哈頓地區。和德國同行類似，他們的首要興趣不是在象征標記而是在土地價值和住房上，尤其是這些對于城市工人階級的沖擊。

這個群體中鼓舞人心的人物是弗洛倫斯·凱利，她1899年從芝加哥的赫爾館轉移到紐約市擔任全國消費者聯盟的主席。隨著她對女性工作條件的調查進入下曼哈頓的工廠和服裝廠的閣樓，凱利震驚地發現紐約工人階級居住區過分擁擠的狀況，在芝加哥還沒有見過的緊密擁擠在一起的廉價公寓，以及新出現的、黑暗的都市深谷。到了1907年，她網絡了一幫志同道合的朋友組成“紐約擁塞問題委員會”，亨利街睦鄰中心的麗蓮·沃爾德、紐約慈善組織協會的愛德華·迪瓦恩、僑居的城市社會主義者約翰·馬丁、《調查》雜志的保羅·凱洛格、住在格林威治館的年輕建筑師喬治·福特、格林威治館的瑪麗·金斯伯里·西姆柯維奇（后來在1930年代是她把所有這些關心都帶入公共住房運動），很快弗里德里克·豪威也參加進來。不到一年時間，他們聘用本杰明·馬什為執行秘書，此人經驗豐富，曾跟隨賓夕法尼亞大學的西蒙·帕滕學習，進行過歐洲和美國的乞丐和流浪漢調查，在格林威治館居住過，具有強烈的單一稅制信念。[[349]](#_349_22)

擁塞問題委員會很快派遣馬什到歐洲出席1907年夏天在倫敦舉行的國際住房大會，搜集可能得到的政策建議。馬什帶回了來自霍斯福和奈特福德的大量材料和他毫無羞慚地宣傳“外國模式的城市規劃”的熱情。在1908年春天，馬什和委員會在曼哈頓舉辦了提高人們意識的“擁塞狀況展覽”。其中非常醒目的是過分擁擠的城市的景象：血汗工廠居住區原樣大小的造型、晚上鋪上床墊讓工人睡覺的12英尺見方的地板、曼哈頓和布魯克林人口密度三維空間地圖、貧民窟照片、死亡率和疾病率圖表、描述曼哈頓土地所有權集中程度的圖表，還有由馬什特別準備的一對立方體，顯示從1620年代以來曼哈頓土地價格上升情況。但是，如果說美國情況位于中心位置的話，在墻上，委員會懸掛的是讓人目光朝外的暗示，如伯恩維爾、日光港的規劃和圖片、法蘭克福和科隆的城市分區地圖、柏林工人階級公寓住房合作社照片等。借來的解決辦法沒有讓人口擁塞問題顯得更緊迫，但是由于讓它呈現出得到解決的可能性，借來的措施把城市過分擁擠問題從命運或者自然狀況等變成政治問題。[[350]](#_350_22)

第二年夏天，馬什再次來到歐洲搜集資料，他把這次研究成果寫成了一本書，《城市規劃概論》（1909），第一次把清晰描述的德國城市規劃展現在美國讀者面前。1909年的春天，委員會組織了另外一次展覽，這次是在華盛頓特區向美國參議院大量展示德國城市規劃的材料，舉辦了美國第一次城市規劃問題研討會。[[351]](#_351_22)

受到馬什和擁塞問題委員會、紐約人民協會的豪威、新城市規劃技術的歐洲傳道士們的推動，美國人的學習熱情迅速上漲。來自英國花園城市運動的雷蒙德·昂溫、托馬斯·亞當斯、亨利·維維安、E.G.庫爾品，來自社區實踐（Kommunale Praxis）的阿爾伯特·蘇德庫姆，1910年柏林城市規劃展覽的組織者沃納·赫格曼等，都在1910年到1913年間到全美各地巡回演講宣傳城市規劃的社會政治意義。當查爾斯·羅賓遜編輯的、大量集中公民中心熱情和巴黎插圖的《救濟與平民》（Charities and Commons）雜志在1908年組織城市規劃專家評論的時候，馬什的文章“對工人公平的城市規劃”帶有對經濟問題的激進關注和德國財產控制的奇怪工具包，簡直就像高雅的唯美主義者茶話會上突然傳出的一聲粗魯斷喝。六年后，當《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組織類似討論時，英國和德國技術已經成為共同的流通用語了。[[352]](#_352_22)

目的和手段是公開的問題。對于擁塞問題委員會來說壓倒一切的命令是，要緩解那些迫使掙工資者家庭以更加高昂的聯合租金更擁擠地塞入下曼哈頓廉價公寓的壓力。這意味著打破曼哈頓島南端工廠和血汗作坊集中的狀況，把工業以更小節點分散在全市。弗洛倫斯·凱利認為實現這個目標的最鋒利工具就是城市購買土地，讓規劃者在城市邊緣地區分配工業區，建設低密度工人住宅區。到了1910年，她和西姆柯維奇忙于更加野心勃勃的規劃，它與其說接近阿迪克斯的想法倒不如說接近霍華德的想法，采取全州范圍的工業分散項目、分散模范城鎮、復興農村經濟等來遏制涌入曼哈頓的人口大潮。[[353]](#_353_22)

擁塞問題委員會的其他人按照英國和德國模式敦促通過居住法，限制特定廉價公寓所能容納的人口數量。約翰·馬丁認為人口分散的關鍵在于發展快速公共交通體系，采用歐洲風格的工薪族便宜車票。拉塞爾·塞奇基金會擔心如果沒有比投機商野心沖動更高的設計標準，郊區土地開發只會加劇問題的嚴重性，他們認為答案應該在英國花園城市中。在1910年，建筑師格羅夫納·阿特伯里充當雷蒙德·昂溫的角色，該基金會開始在長島鐵路沿線建造模范郊區，它的街道從昂溫式村莊大門緩緩彎曲向上，這顯然來自漢普斯特德的靈感。用阿特伯里的話說，在郊區土地市場上表現出的經濟力量無政府狀態中，“森林山花園”是沙漠中社會的、審美的“集體主義”綠洲。[[354]](#_354_22)本杰明·馬什的答案在于抓住地主的非勞動所得，征收土地增值稅，改善交通和降低票價，像德國城市那樣進行分區規劃。[[355]](#_355_22)到了1912年，馬什拒絕改變他對于土地稅的越來越一根筋式的執著，讓他失掉了擁塞問題委員會的職務以及在城市規劃運動中的地位（這運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德國報告所開創）。其他項目萎縮了，但城市分區保留了下來。

實際上，當德國和英國的其他舶來品逐漸衰落，城市分區卻在美國興旺起來，但那是在獲得與擁塞問題委員會完全不同的政治幫助之后。對于馬什和凱利來說，城市分區的前景在于工廠分散。到了1910年，懷著這個想法，擁塞問題委員會曾成功地在紐約議會通過了忠實模仿德國城市分區實踐的法案（但遭到州長休斯的否決）。該法案在城市的交通干線沿岸預留特別區域給分散的工廠發展，限制五層樓廉價公寓的向外擴張。

但是像每個進口政策一樣，城市分區一旦從原來的政治和經濟環境中脫離出來，就表現為可塑性非常強的措施，隨著目的和所有者的不同而不同。當擁塞問題委員會的城市分區建議失敗后，前來拯救者是政治派別完全不同的紐約人：該市高消費階層第五大道區域的商人。他們的首要目標是把服裝廠控制在曼哈頓島的南部，因為生產商希望更便宜地接近客戶，那些廠家正在逐漸侵占第五大道。商人協會大肆宣傳他們的首要客戶在午休時間被大群服裝廠移民工人擠出第五大道人行道的故事，所以他們對建立一個特區的想法很感興趣，在這樣的特區里新建筑的高度限制應該足夠容納規模適當的零售店，但服裝廠生產商要租用的話就嫌太低了，經濟上不劃算。當這個方案陷入泥潭后，第五大道商人采取了更簡單和更有效的方式，他們單方面宣布某地區禁止開辦服裝廠，抵制在這一地區內生產的商品，勸說本市主要貸款人拒絕為該地區的服裝廠建設提供貸款。但是在城市分區的潛在利用者之間的勾心斗角早就開始了。[[356]](#_356_22)

1916年最終實施美國第一部來自德國的城市分區法律的是另外一個團體：與城市俱樂部有聯系的一群有公德心的紐約商人和律師。對他們來說，關鍵的問題不是下曼哈頓的人口密度或者第五大道擁擠的人行道，而是不斷擴張的辦公室摩天大樓。在最終解決了交通壟斷機構對城市地鐵系統延伸的抗拒后，如果不阻止曼哈頓土地所有者馬上在中心區建造更多更大辦公樓的話，城市俱樂部擔心新線路的運載能力很快就被消耗掉（城市建設的沉重補貼就浪費掉了）。在這個緊要關頭，馬什和第五大道商人關于德國人不同建筑物高度限制的辯論就具有特別的吸引力。紐約新設施管理委員會的愛德華·巴塞特被任命為城市建筑高度特別委員會主席，他記得在1908年觀看杜塞爾多夫城市規劃展覽時“興奮不已”。擁塞問題委員會的喬治·福特是該委員會的秘書。城市俱樂部的城市規劃委員會主席弗蘭克·威廉姆斯被任命為歐洲調查官。他被派往歐洲，回來時帶回一捆詳細的城市分區地圖和條例規定，這被用于1913年秋天舉行的另一次有關美國和歐洲城市規劃技術的公共展覽。[[357]](#_357_22)

得到城市改革當局和州授權法案的支持，由另外一個城市委員會詳細起草，1916年的城市分區條例對于那些幫助把城市規劃技術引進美國的人而言是一個里程碑。美國第一個全面的城市規劃——紐約市的這一個，不再像伯納姆的芝加哥規劃只是紙上的東西，也不再是英國式的有限擴張計劃。它像德國規劃一樣，涵蓋整個城市不同用途和建筑區域的地圖。但是因為條例起草時得到對城市土地所有者財產權利特別敏感的律師的幫助，最終的條例在處理財產發展的可能性時特別謹慎。因為擔心來自法院的挑戰，起草者創立的一套建筑規模限制寬大到足以容納曼哈頓幾乎所有現存的建筑，因此（正如委員會竭力說明的）容得下鬧市區幾乎每個財產所有者可以想象到的潛在回報。用了些許建筑師的足智多謀，開發商很快發現了推高新的曼哈頓摩天大樓的方法，遠遠超過委員會最初設想的城市分區法案中高層建筑17層到20層的“經濟限制”。雖然城市俱樂部團體大膽談論摩天大樓時代的終結，但他們精心起草的條例很少觸及鬧市區的投機價值。[[358]](#_358_22)

1916年法案更鋒利些的牙齒在第二個革新：在城市邊遠地區專門設立居民區。這不是來自德國范例，但威廉姆斯本人就不喜歡德國城市商店和居民區混雜的典型模式——那里甚至在豪華區域也是如此。專門居民區的法律先例已經存在于法庭中，該案例是加利福尼亞成功把居民區中一些“累贅”清除出去，帶有明顯種族歧視意圖，當時加州選民首先想到的是華人擁有的商店和洗衣店。通過大量的照片描述工廠“入侵”居民區、貼滿廣告的商店“入侵”褐砂石房屋（富有階層）、公寓住房“入侵”單家獨院社區等，紐約城市委員會的最終報告把擁塞問題委員會爭取城市分區條例的活動推向成功的高潮——不過是在顛覆了最初的目的后。“入侵”形象產生的效果是，紐約州城市分區條例規定創立專門居民區的權力不在城市，而在每條街道的現存財產所有者。城市分區的任務不再是分散下曼哈頓過分擁擠的人口、過多的工廠以便讓工人階級能夠喘息，反而是保持下曼哈頓現狀不變。[[359]](#_359_22)

這種形式的轉變并非美國所獨有。在整個北大西洋經濟體內，在謹小慎微和種種限制的框架內擬定的新土地使用規劃措施，表現出特別小心翼翼的姿態，試圖在公共權力和私人財產權利之間維持脆弱的平衡。任何地方的妥協者都掙扎于同樣的考慮：如何防止土地和房屋市場產生社會代價最大的潛在后果，而又避免在實施過程中破壞市場潛在的能量。城市分區的可能性在1916年還沒有關閉，但是正如美國的首次實驗顯示的，其中無疑存在著借來的措施被扭曲偏向有產者特權的情況。弗蘭克·B.威廉姆斯在1916年相信，城市分區的主要賣點在于它不僅穩定土地價值而且讓它增值。到了1920年代，這一信條已經成為正統的城市分區規劃的固定內容：每個財產所有者都會成為精心設計的城市分區計劃中的受益者。[[360]](#_360_22)

總而言之，分區規劃在跨越大西洋后徹底改變了。本來試圖遏制財產投機利益的措施，在美國作為房地產經紀人的資產而大行其道。從城市規劃（Städebau）工具中孤立摘取出來，城市分區計劃在美國被用來增加財產。1920年當美國商務部剛剛開始大力推廣城市分區條例的時候，一位批評家哀嘆說：

至于城市分區，它已經從城市美化的手段提升或者跌落成為房地產價值的主要穩定者。現在，它的最堅決支持者是房地產抵押經紀人，他們希望把股票提升到占優勢的工業股享受的相對安全領域。從住房改革開始時一半出于理性、一半出于良心的反貧民窟運動走到如今這一步，可真是漫長的道路。[[361]](#_361_22)

確實，這個狀況與在良知指導下在城市邊緣搞開發的想法相距甚遠。這與萊奇沃思的“有機”形式或者伯恩維爾的工人階級住房模式相距甚遠。與“城市規劃”工具可能最終把城市居民從過分擁擠、骯臟、破爛的居住區和土地投機者魔爪中解放出來的想法相距就更遠了。

當然，缺失的成分是住房。林蔭大道和奧斯曼式的街道景觀的想象跨越大西洋與當地的推進主義（boosterism）結合起來。城市分區地圖的想法引起多種多樣的反應。對于紙上的計劃、靈活的類別、開發廣告等，美國人明顯容易受吸引，但說到都市土地問題的底線——提供住房，他們對公共手段的抗拒是根深蒂固的。

當然，北大西洋經濟體的國家沒有一個心甘情愿地為建造住房提供公共資金。任何地方的都市改革者的本能都是把住房問題留給私人主動性。市場自動調節的辯護者相信利潤這只看不見的手的威力。那些更清醒認識到很難既為城市工人階級建造低廉住房又使其有足夠利潤來吸引私人投資者的人，則渴望有限贏利的私人經營者的幫助：愿意在有限利潤前提下建造便宜、衛生住房的準慈善房屋公司，或者工人們自己組織的合作社。

住房慈善行動的最重要場地是在倫敦。從19世紀中期開始，樂意擁有5%的投資回報率和慈善良心的投資者在倫敦為工人階級建造了一些模范住宅。19世紀末期倫敦至少有30家模范房屋公司在工作，其中最大的一家是皮博迪信托公司（Peabody Trust），這是一位美國商人在世紀中期的捐贈。當19世紀末葉倫敦開始認真清除貧民窟的時候，當地政府想當然地認為有限贏利房屋公司應該承擔住房改造的任務，從城市當局那里購買被拆除的地塊再建造低成本的衛生公寓。

到了世紀末，慈善房屋公司的努力成為倫敦景觀中難以忽視的存在：高聳陌生的公寓樓，由于經濟原因而以廉價公寓的規模建造，顯示了它們出自慈善機構的特點，房客是經過嚴格的行為標準和要求限制的。查爾斯·馬斯特曼嘲笑它們中最嚴格節約性的皮博迪信托公司的街區房屋是“以新荒涼（Later Desolate）聞名的建筑風格”。但即使皮博迪的嚴格節約也趕不上迅速增長的住房需求。倫敦當局一開始就被要求根據拆除前擁擠和不衛生的住房所收的房租標準補償房主，結果他們發現無法出售拆除的地塊給有限贏利房屋公司，除非愿意承受巨大損失。慈善房屋公司中很少能夠按被拆遷的房客支付得起的房租重建房屋——即使他們不被驅趕到別的地方。連政府提供的低成本貸款也不能彌補資金缺口。在1905年，大約十二萬三千人居住在倫敦的有限贏利房屋公司建造的住房內，但是房屋建筑的速度趕不上倫敦工人階級人口增長的速度和貧民窟拆遷的速度。[[362]](#_362_22)

正是貧民窟、貧民窟拆除、住房重建等不斷加深的危機解釋了最后出現的反常現象：19世紀末期的英國成為北大西洋經濟體中第一個從市場或者準市場住房轉向直接的公共建設的國家，雖然在這里古典經濟學的信條在政治上仍然有很大影響力。經過20年貧民窟拆除，卻很少成功吸引投資者建造低成本住房，格拉斯哥市議會1889年退到城市公共建設安置房的權宜之計。一年后，《工人階級住房法案》授權地方當局從公共工程委員會借款建造職工住房。在伯明翰，盡管便宜的背對背房屋構成特別惡劣的流弊，奈特福德和其他市議員還是有效抗拒了市政商業的這最后一個階段。但是別的城市大膽使用這個立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利物浦和格拉斯哥的城市當局都建造了兩千多套的低成本住房。[[363]](#_363_22)

市營住房的櫥窗在倫敦。在1889年到1907年，進步人士控制的倫敦市議會給予市營住房一種獨有的烏托邦傾向和能量。倫敦市議會工程中的第一個——高出周圍房屋很多的五層到六層松散公寓樓群，和慈善房屋公司的模式沒有太大差別，雖然倫敦市議會的建筑師為房屋配備了更寬敞的內部空間、更豐富的建筑想象力，有時候在周圍建設學校、運動場、音樂臺、小型公共綠地等。因為貧民窟改造的棘手經濟困境，倫敦市議會進步人士開始把抱負轉向倫敦周邊郊區便宜的土地。沿著新建的市營電車系統，他們在南邊的圖庭（Tooting）和北邊的托特納姆（Tottenham）開始更大膽的由城市建造郊區工人住房實驗。在地方法規確定的狹窄街道上建成傳統的、狹長的聯排住房，郊區工程與必須考慮多層建筑經濟利益的城區工程不同，根本沒有那種由慈善機構建造的特征。暴露它們公共特征的是倫敦市議會建筑師堅持更慷慨的福利設施和內部空間標準，以及那些長長的水平線——人們現在看到它仍然印象深刻。他們挑戰投機性開發商的虛假個性特征，試圖把各單元統一起來成為連片區域，以促進鄰居的團結。[[364]](#_364_22)

倫敦的郊區工程建造得太好，太接近私人建筑商潛在的市場份額，返還給貧民窟財產所有者口袋的錢太少，因而很難受到普遍歡迎。當1907年保守派掌控市議會后，就終止了郊區工程計劃，重新去做永遠做不完的貧民窟清理工程。盡管如此，截至戰爭前夕，大倫敦的公共當局還是增加了一萬五千套低成本房屋。[[365]](#_365_22)

靠市營住房本身無法解決為低收入者提供體面房屋的難題。按照《工人階級住房法案》建造的工人住房，是為那些有技術、有穩定工作的人而不是為真正的窮人準備的。總體上來看，1890年到1914年在英國建造的住房中，地方政府建設的只有不足5%的比例。即使在格拉斯哥，新的市營房屋也只占總量的不足1%。[[366]](#_366_22)20世紀初期英國多數工人家庭和其他地方的工人階級一樣，生活在別人拋棄的擁擠不堪的房屋內。但是不管這些問題在戰前仍然是多么有爭議，英國政府還是為城市社會任務清單上添加了為工人階級提供體面住房的一筆。

歐洲其他地方的城市沒有英國貧民窟清理工程那么大膽，選擇了不同的住房政策道路。從1880年代末期開始，每個地方都很清楚單靠市場、慈善家或者雙方合作都無法滿足大城市對廉價住房的需求。在德國，社會政策協會從1885年到1886年開始進行住房問題的調查研究。法國廉價住房協會可以追溯到1889年。但是他們的答案不是像英國那樣公共建造住房，而是用公共資金和個人自愿相結合的方式。

比利時（在1889年）和法國（在1894年）率先在全國范圍內設立國家銀行，向為工人建造可靠住房的非商業性建筑機構提供低息公共貸款。在法國，社會博物館的朱爾·西格弗里德是該措施的首要推動者。在推動者眼里，所謂“西格弗里德法案”代表了精心設計的中間道路，既沒有對市場能力的幻想，也不像英國人1890年住房法案錯誤走上的“國家社會主義道路”（西格弗里德的用詞）。像“補貼論者”的許多社會政策一樣，法國法案在原則上總是比在實際執行上要強。地方當局一直等到補貼已經大幅度提高后才開始行動。但是法國模式被廣泛模仿，很快成為在國際住房大會上的主流正統思想。[[367]](#_367_22)

在德國，盡管有帝國中央集權和高效率的虛名，他們并沒有采取類似于1894年法國法律那樣的連貫政策。轉折點出現在1890年，當時從國會悄悄流出一個條款，規定在管理國家新的區域社會保險基金時，可由經理自行決定投資非贏利或者有限贏利的工人階級住房協會。這些迅速積累的公共儲蓄可以低于市場利率一個百分點左右使用，所以很快就成為非市場性住房公共投資的發動機，其他地方沒有辦法媲美。到了1890年代后期，人們可以看到法案的成果，圍繞寬敞、開闊的院子的新型模范廉價公寓，配備有運動場、閱覽室、會議廳、幼兒園、圖書館、洗衣房——社區福利的各種要素，無論多么具有家長式作風。[[368]](#_368_22)

在德國接受補貼性房屋貸款的，有許多是依靠已經完成的積累憑良心做事的英國式有限贏利房屋公司。另一些則很難與政治上界定的公共當局區分開來，因為德國官僚與社會的聯系特別密切。最大膽和最成功的有限贏利協會——法蘭克福的“小房屋股份公司”，是由市長和社會政策協會成員約翰內斯·米凱爾創建的。因為獲得大量城市貸款支持和租用便宜的城市土地，尤其是為此專門沿著新的公交車線路購買的土地，該協會及其姊妹組織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建設的住房占全市住房的比例竟然高達7.2%。[[369]](#_369_22)

更大的是在1890年之后住房補貼下興起的德國建筑協會合作社，有些是從社會主義者或者工會團體演化而來，有些是慈善團體的產物。和英國手工業者組織起來融資建筑房屋的合作社不同，德國的建筑合作社依靠大量工人成員每個星期交納的費用，投資建設合作社廉價公寓，然后回報以成員住公寓的機會。到1914年，合作社已經在德國建造兩萬一千套住房，幾乎和英國在同一時期公共建造房屋的數量一樣多。[[370]](#_370_22)

像在法國和英國一樣，德國的結果也是非常不平衡的。試圖通過全國統一的住房標準法這一努力沒能戰勝普魯士當局的抵制，只留下軟弱的監督權力的補丁。在勞工壓力非常強大而社會天主教活動又讓這壓力對資本家階級有一定影響的萊茵河地區，社會保險局拿出資金的一半用來建造工人階級住房。柏林社會保險局由財產所有者協會和房地產游說團體把持，投資工人住房的比例只占7%。杜塞爾多夫進行英國式直接由城市建造住房的實驗。烏爾姆和法蘭克福購買土地建設低成本住房。但是大部分德國城市什么也沒做。[[300]](#_371_21)就像在英國一樣，公共資助的住房主要是為技術工人和中產階級下層人士準備的，窮人根本進不來。歐洲沒有一個地方的進步人士說住房問題得到解決了。但是在1890年后的一代，住房問題或多或少進入了社會政治的領域。

所有這些歐洲住房供應的努力都被美國進步人士密切關注。有限贏利房屋公司作為主動引進的英國舶來品很早就來到美國。在世紀之交時，東北部的許多大城市都有一個或者多個慈善性房屋公司，雖然沒有一個（即使在該活動的中心紐約也沒有）達到倫敦的公司那樣的規模。住房情況調查、有限的貧民窟清理權、住房建設標準都成功地跨越了大西洋。公共住房投資的新措施也得到密切關注。有些美國支持者明確推崇1894年的法國法律。幾十個美國調查者走訪考察倫敦市營住房工程，受歡迎的由約翰·伯恩斯本人作為導游：該市的工人階級住房開發很快成為社會學大旅行必須停留的一站。其他美國進步人士頻頻出現在國際住房大會上，如1900年在巴黎、1902年在杜塞爾多夫、1907年在倫敦、1910年在維也納等。[[372]](#_372_22)

最詳細的美國調查是由全國住房協會在1914年夏天組織的，對最新的英國住房工程的參觀學習。簡直就是1906年全國公民聯盟城市所有權委員會的縮影，由協會的執行秘書約翰·伊爾德率領的七人代表團花費兩周時間調查英國住房的各個方面，包括公共和私人建設的住房。在萊奇沃思，埃比尼澤·霍華德給他們講解花園城市的原則。在倫敦，他們拜訪了約翰·伯恩斯、托馬斯·亞當斯、錫德尼·韋伯、雷蒙德·昂溫，以及倫敦市議會建筑辦公室的領袖人物。他們還參觀了東區貧民窟、皮博迪信托公司的建筑、倫敦市議會在東區和倫敦邊緣的工程、漢普斯特德，以及1909年法案下倫敦擴張計劃的第一個展品。在伯明翰、利物浦、曼徹斯特，他們基本重復了同樣的參觀行程：貧民窟、“正常”房屋、新的公共或者私人住住房改善項目，與普通房客交談，采訪住房建設和城市規劃負責人等。

伊爾德非常認真地記錄租金、成本、房客構成，對看到的許多內容印象深刻。他的結論是英國貧民窟沒有美國最糟糕的住房那么糟，盡管“街道小氣、單調”，“地面擁擠程度讓人害怕”，還有無所不在的高圍墻后院。比美國實施時間更長的衛生標準產生了更明顯的效果。他贊同英國地方政府所得到的依法征用土地的廣泛權力。他喜歡所看到的在1909年城市規劃法之下的開拓性努力，雖然不如城市分區那種范圍廣泛而較少隨意性的工作。不過從一開始，伊爾德的思想就集中在資金問題上。他很快得出結論：萊奇沃思非常漂亮，但是從嚴格的會計原則來看，它是不會贏利的慈善工程。等他來到曼徹斯特時，已經認為市營住房也不贏利。幾乎所有的模范住房都是掙工資者望塵莫及的。如果有地方不是這樣，那也是公共補貼的結果：是以改革的名義掩蓋起來的轉移支付。伊爾德在返回時寫道：“最大的問題是，英國城市用不經濟的租金出租房屋是否在把麻煩留給后人。”他拒絕超越那條線，那個先入之見。[[373]](#_373_22)

像他們之前和之后的美國人一樣，全國住房協會的成員傾向于發現自己希望發現的東西，錯過那些和自己先入之見不一致的內容。蘇格蘭博學者和城市規劃者帕特里克·格迪斯帶領伊爾德參觀都柏林老城，試圖讓他看看掩埋在后來那種資本主義土地擁擠中的“有機”中世紀古城的優越性。但是，伊爾德只能以一個驚駭的衛生監督員的眼光來看待那些古老街巷和彎彎曲曲的狹窄院落。紐約市三一教堂廉價公寓管理者愛米莉·丁威迪回國后確信，皮博迪信托公司的私人房客管理（像她自己的一樣）比市營住房管理要優越得多。曾經短暫加入該團體的愛德華·巴塞特認為，倫敦最好的東西是便宜的交通體系和城市分區的努力。該小組的最終報告稱贊了1909年城市規劃法案、城市的貧民窟清理權限、慈善住房等。但是他們說花園城市并不適合工人階級。托馬斯·亞當斯對于土地投機的擔心沒有引起反響。至于市營住房，他們認為這不適合美國。[[374]](#_374_22)

全國住房協會代表團持懷疑態度的意見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它的母體組織是一個單一音調的改革游說團體，因為它早先發現這個音調，就竭力避免其他聲音來干擾住房問題。1901年的紐約州《廉價公寓法案》曾經是該協會的最大勝利——一個從英國建筑規范借來而嚴格化的、早就該有的規范，把流行的建筑慣例中最糟糕的做法裁定為非法（比如沒有窗戶的房間、設在院子里的廁所），并且影響更大的是，推高了所有新公寓建設的衛生設計標準。新建筑的管理規定是關鍵：對現有情況的仔細調查、嚴格的建筑法規、確保法規實施的不懈努力。1910年全國住房協會的“教義問答”包含這樣的內容：

不要讓你的城市成為廉價公寓的城市……

不要建造模范廉價公寓，除非你獲得模范住房法規……

不要允許新貧民窟的擴大。預防勝于治理……

不要允許地下室居住……

不要允許使用不適合人類居住的房屋……

不要寬容房客的罪惡……

不要敦促對廉價公寓實行城市所有和城市管理……

不要混淆公共和私人領域的界限……[[375]](#_375_22)

在這些“不要”背后站著冷峻的、信心十足的慈善工作者勞倫斯·威勒，是他在拉塞爾·塞奇基金會的支持下成立了全國住房協會，他并非對住房建設領域的所有歐洲舶來品都表示厭惡。他自己的《廉價公寓法案》就從英國的公共衛生學家那里學到很多東西。作為城市規劃會議的重要人物，他很早就參加分區規劃活動，紐約州法案中授權城市禁止多家合租公寓的規定就是威勒的工作結果。他經常到歐洲訪問，也是國際住房會議的常客，雖然他堅決反對他們的結論。隨著年輕的主張者對他領袖地位的挑戰，威勒觀點中的例外主義主題變得更加強大。“在住房改革方面，我們需要特別當心從海外引進的舶來品……不是因為它們來自海外，而是因為舊世界國家的條件與美國的情況完全不同。”最后，威勒對廉價公寓的厭惡不能忍受任何提議干擾他的主要觀點：對建筑行業的管理。他認為，模范住房、稅收變化、交通狀況改善屬于住房問題的“畢業后”階段。人們遭遇兌水的牛奶時不會耗盡資源去建造一個模范牛奶廠，而是從牛奶供應中剔除不合格的牛奶。前者是私人資源的任務，只有后者的任務是在公共領域內。[[376]](#_376_22)

所有這些本來都可能是無關緊要的，但威勒是進步住房改革領域的第一個強大的主張者，他反對廉價公寓的方式限制了留給別人的思想和組織空間。這種先發制人現象在大西洋兩岸都存在。霍華德和昂溫很早抓住英國城市規劃運動的領導權，他們籠絡的聰明人小圈子主導了英國城市規劃政策幾十年，從本世紀的開頭幾年到1940年代工黨受萊奇沃思啟發的“新城市”項目。社會連帶主義者首先來到法國住房改革現場，認為改革應采取補貼論的原則，雖然法國的競爭者早已認為這辦法效率不高而放棄了。這些有時候被稱為國家改革政策的“風格”，雖然該現象產生于比“風俗”或者“品味”更加激烈的思想和經濟資源的競爭。威勒的圈子以攻擊性的姿態很早參與住房問題的爭論，他們對國家支持住房的憎惡造成了影響深遠的后果。

情況的確如此，更因為伊爾德在英國問題上屢屢回到的底線——“房屋租金低于成本造成經濟和道德傷害”，是美國進步人士圈子里普遍具有的共識。費城住房改革者卡羅爾·阿羅諾維奇在1914年前已是改變信仰支持歐洲大陸住房改革的人，他是威勒的最激烈批評者之一。但是在看了日光港花費不菲的精巧和雅致的建筑后，他也忍不住得出結論說，“用美國人的術語”需要問英國住房工程的一個核心問題是：“它能賺錢嗎？”“花園城市運動如果要向世界范圍推廣，并保持對實際民主精神的忠誠，它就必須翻譯成投資回報這樣的術語。”[[377]](#_377_21)

投資必須有回報，尤其是公共投資不應該成為轉移支付的幌子，所有這些都深藏于進步人士假設的深處。煤氣和公交車市營化支持者談論為了公共福利而獲取利潤，而不談社會補貼。公園和城市規劃受歡迎是因為它們增加了每個人的財產。城市分區支持者提出的是同樣的訴求。進步政治是建立在環繞周圍的資本主義框架下的，這一點在美國比任何別的地方更甚。

在這種機構性和社會力量的背景下，反對聲音非常小。模范房屋公司大多擔心公共補貼。注意力一直集中在土地價值上的本杰明·馬什認為市營住房不過是抑制工資增長的藥物。睦鄰中心的工作者渴望開放內城的“肺”，用微型公園和運動場帶來空氣、陽光，所以抵制內城重建。

至于城市規劃者，他們很快徹底和住房問題割裂開來。查爾斯·M.羅賓遜在城市規劃熱潮初期坦言住房是完全不同于公民藝術的“社會學問題”，這話像是感知風向的手指。“全國城市規劃會議”誕生于1909年擁塞問題委員會在華盛頓舉辦的城市規劃展覽，在1912年召開的第四次會議上，它已經把住房問題從辯論題目中去掉，交通、運輸、街道、公民審美意識等把住房問題擠到邊緣。喬治·B.福特在1910年關于城市規劃中“社會”和“建筑”的關系一文中說：“住房和城市規劃的相互關系……在美國根本就沒有搞清楚。”第二年參加全國城市規劃會議的雷蒙德·昂溫和托馬斯·亞當斯抱怨說，進入美國城市規劃專業領域的建筑師和景觀設計師根本就不考慮住房問題。但是他們的觀點沒有人理睬。只有馬薩諸塞州1913年城市規劃條例中有一條工人推動的規定，要求地方當局特別關注“人們的適當住房”：除此之外，很多城市規劃連對住房需求的粗略調查都沒有。分區規劃的流行正是因為它與推動工人階級住房完全脫離了關系。城市規劃是公共問題，在美國住房問題是私人問題。[[378]](#_378_21)

在這種情況下，住房問題的社會政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十年只是稍微前進了一點。一個“總統住房委員會”在1908年受命調查哥倫比亞特區住房問題，建議（像歐洲一樣）把公共信貸提供給建造工人階級住房的非市場機構。委員會的領導者是該市頭號有限贏利房屋公司的主管，該公司的工程因為缺乏資金支持已經停工。該建議在機構上有相當分量，但還是沒有任何結果。雖然被詳細討論，在住房問題上的補貼論原則沒有能跨過大西洋來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美國。[[379]](#_379_21)

更持久的活動是在馬薩諸塞州，這里得到該州勞工組織的支持。根據1911年的州議會法律而成立“宅地委員會”（Homestead Commission），用來調查資助“機械師、工廠雇員、體力勞動者等”獲得郊區小房子的方法。人們或許估計它就像兩年前的前任做的那樣很可能是空談一番沒有結果。但是在跨越國界的住房問題辯論影響下，在該組織的秘書、州勞工運動領袖亨利·斯特林的鼓動下，它展開了決定性的行動。雖然宅地委員會的名字可以追溯到拓荒者土地政策，但是討論的實質內容是歐洲和澳大利亞的住房政策，這方面斯特林是個熱心的學生。“世界上沒有哪個地方單靠土地所有者和建筑商的私人行為就可以解決工人的住房問題。”他在1913年寫道，“沒有一個國家完全依賴私人資本來解決人民的住房問題——不管通過普通的賺取利潤的方式，還是某些花園村莊的半慈善方式，還是合作社。”斯特林指責美國死死抓住這個錯誤觀念不放已經讓它“遠遠落后于其他文明國家”。[[380]](#_380_21)

當該委員會使用州儲蓄銀行中無人認領的資金為工人階級建造住房的建議被法院否決后，斯特林幫助通過了允許州直接建設住房的憲法修正案。盡管委員會中有人擔心它違背“貿易供求關系的自然法則”，但五十套住房的樣板工程1917年在洛厄爾的磨坊區外圍建設起來。其設計者是年輕的哈佛畢業生阿瑟·柯米，他是在萊奇沃思、伊林和漢普斯特德等地的英國合作住房實驗的崇拜者。柯米設想了一個規劃好的社區，有運動場、社區建筑、花園和社交中心，所有這些都安排在按最佳城市規劃方式設計的彎曲街道上，并且為合作所有，以便讓整個社會收獲非勞動所得的土地增值。柯米的合作所有權想法沒有得到斯特林的青睞，他更傾向新西蘭式個人購買項目。對該委員會工程打擊最大的是戰爭帶來的火箭式上升的通貨膨脹。1919年，成本比可以籌集的資本上升更快，斯特林的興趣由于戰爭勞工工作問題干擾而減弱，州政府撤離住房建設工地，留下十幾個房屋框架孤零零地在街道拐角處。[[381]](#_381_21)

在社會主義者的密爾沃基，戰前傾向歐洲方式的住房實驗熱潮產生了最大成果。以城市作為主要股東，成立于1920年的“花園房屋公司”要為工人階級家庭開發大片廉價的郊區住房。融資辦法是從德國學來的，合作所有權模式是從英國引進的，兩者都是該市的住房委員會主席1911年到歐洲考察學習半年之中掌握的。負責柏林和杜塞爾多夫城市展覽的沃納·赫格曼幫助設計了場地。其街道名稱是用來紀念前輩的：萊奇沃思、漢普斯特德、伯恩維爾、日光港大道。但是到了1920年代，密爾沃基社會主義高峰已經過去。入住兩年后，“花園房屋”的共同承租人投票終止了發展的合作特征，把房子賣給了租戶個人。[[382]](#_382_21)

這就是20世紀初期美國城市資助住房的總數：洛厄爾的12套房屋和密爾沃基的一百多套房屋。在克利夫蘭，戰前住房資助倡議一點結果都沒有。但是在英國，到1914年，公共當局已經建造了近24,000套房屋：在柏林，公共資助、非商業性協會建造的房屋達到11,000套：在法蘭克福，有5,500套：即使在公共投資受到嚴格限制的巴黎，也有2,500套。伊迪絲·埃爾默·伍德的房屋政治教訓開始于她在1913年發現關于歐洲住房政策的“總統住房委員會”報告，她痛苦地記得普遍的情緒：“城市提供的住房、城市進行的貧民窟清理，或者任何形式的政府資助（包括成本貸款）都是禁忌和遭人咒罵的東西，它們都是非美國的，是歐洲衰落的君主制的殘渣余孽，甚至連提到一下都是非常糟糕的。”[[383]](#_383_21)

他們的鼻子壓在其他國家經驗的玻璃上，美國公民進步主義者一個一個帶回家更周詳、更自覺的城市建設手段：法蘭西第二帝國巴黎的獨特外觀、德國城市規劃的工具，甚至英國和歐洲大陸住房社會政治實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十年，學習異常迅速，充滿著樂觀主義情緒。自己是外國產生的討論和技術面前的遲到者，這并沒有打擊美國公民進步人士的積極性，反而給予他們站在“文明”世界經驗的肩膀之上的機會。即使脾氣暴躁的勞倫斯·威勒也相信貧民窟“現在注定要消亡”。隨著城市分區從德國成功轉移到美國，他在1916年寫道，“經過一代人后，我們的情況將發生革命性變化”。[[384]](#_384_21)

但是跨越大西洋的進步人士紐帶是具有高度選擇性的薄膜，在有些地方表現出讓人驚訝的滲透性，而在其他地方則根本無法穿透。種種建議穿過邊界就好像經過一片復雜的網格和過濾器。種種先例不僅僅是簡單地交換，而且還被篩選、辨別、去掉背景、阻擋、轉變、夸大等。壯觀的街道規劃和城市分區進入戰前的美國，而公共資助的廉價體面住房就進不來。那么，是怎樣一些沉默的、選擇性的機制在起作用呢？

最簡單的、明顯得會誤導人的回答是需求。這種觀點認為，美國城市正在進行土地用途和價值的快速轉變，需要有條理的分區規劃圖和改善的街道設計。經營企業的功利目標丑陋不雅，加上缺乏王室貴族的財富來抗衡，美國城市也迫切需要規劃者設計的公園和裝飾性內容。由于房地產行業對民眾壓力做出的反應比其他國家迅速，美國根本就不需要住房建設上的公共投資。

這種功能論者的論點能糊弄不少人，但是作為歷史解釋，馬上就露餡了。1890年德國住房改革運動最終開始獲得實際力量，而這時的住房壓力比在1870年代動蕩的經濟繁榮時代（Gründerjahre）小得多，那年代擅自占地者還在柏林城門前扎營抗議。英國城市人口死亡率在1890年代比半個世紀前低，可要求住房改革的呼聲在這時達到高峰。1910年的美國都市住房標準比1930年糟糕得多，可歐洲式的公共資助住房運動在這時終于開始實行。為了清楚說明問題，我們不妨說，需求具有主觀性、政治性、與時代的關聯性，以及文化性。[[385]](#_385_21)

如果按當代的住房標準來判斷，美國的狀況當然可怕得足以激發對土地和房屋市場的更積極干預。讓人恐怖的是紐約，在那里，多層廉價公寓找到了大本營——這種房屋是讓北大西洋經濟體所有住房改革者產生怒火的東西。紐約的廉價公寓，原先在下東區像火柴盒子一樣擁擠在一起，現在蔓延到了布魯克林和布朗克斯區，陰暗、閉塞，只有透過狹窄的采光井進來的一點兒空氣，里面擁擠著家庭成員和幫助支付房租的額外房客，這種狀況和北大西洋經濟體的其他地方一樣糟糕。非常了解柏林、討厭那里廉價公寓的沃納·赫格曼認為下曼哈頓有“整個世界都沒有的最糟糕的狀況”。把倫敦和曼哈頓的貧民窟對比后，約翰·伊爾德肯定曼哈頓的情況更丟人、更悲慘。[[386]](#_386_21)

當然，紐約市是獨一無二的。紐約建筑物的平均居住人數在1900年是20:1。在芝加哥，這個比例只有9:1：在美國多數城市還不到7:1。在大紐約市和新澤西郊區外，在芝加哥、圣路易斯、辛辛那提、新英格蘭的各大城市，出租屋、單家獨戶、互不連接的房屋、雙拼或聯排的住宅是美國的典型。在美國，工人階級住房在總體上不像英國那么擁擠，更沒有德國那么擁擠。如果說到廁所和浴室等設施，它要好多了。[[387]](#_387_21)

紐約式廉價公寓區的范圍有限，但是這并不能保證別處的住房在世紀之交的美國人看來是體面的。簡·亞當斯的芝加哥是個爛泥灘，里面有污水四溢的臭水池和廉價的框架房屋。華盛頓背街的貧民窟和華麗漂亮的首都新貌形成鮮明對比。在1900年紐約慈善組織協會的廉價公寓展覽之后，住房調查的想法開始蔓延，公民團體積極撰寫揭露美國其他城市住房狀況的文章。[[388]](#_388_21)美國住房的糟糕狀況足以激發一波強大的揭露和警告運動。觸動的這根神經并沒有把住房供應和公共設計結合起來。

如果需求不是秘密發動機，自動清理出大西洋交流中的成功進口和不成功進口：那么，其他任何單一的因素也不能充當這個角色。在歷史問題具有重大意義的地方，因果關系肯定是非常復雜的，各種因素相互交織，相互依賴。

就美國來說，由于問題明顯威脅到慣常的財產權，利益和意識形態在交流議題的選擇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同樣的，現在我們熟悉的因素如時機、惰性、先例、搶占先機等也發揮了重要作用。當然還有資本的社會配置。在精英責任遠遠落后于積累和炫耀的沖動的情況下，肯定存在政策的后果。就像其他地方的同行一樣，美國企業家很愿意投資建設公司住房，尤其是在工廠位于偏僻地方，或者需要特殊的技術工人時。但是美國用于慈善房屋的普通資金在龐大的國家財富背景下，顯得非常少。美國沒有像法國廉價住房協會那樣爭取有限贏利房屋的游說團體，沒有像法蘭克福小房屋股份公司那樣規模的有限贏利房屋公司。美國花園城市協會幾乎與德國、法國的類似組織同時成立，是由社會福音牧師、城市規劃者、長島土地和鐵路股票投資者聯合創立的，但在1907年的經濟恐慌中銷聲匿跡。拉塞爾·塞奇基金會的森林山花園工程最終損失慘重，成為那種讓馬薩諸塞州在洛厄爾實驗泡湯的通貨膨脹壓力的受害者。[[389]](#_389_21)至于來自低層的壓力，它們都太容易在美國種族和民族分裂的城市中破碎了。在公交車和工業事故賠償問題上，工會組織可以被動員起來。但是對于多數工人階級美國人來說，住房問題仍然是處于沒有明說的公私分界線的私人一邊。

但是，不應該夸大這些因素中的任何一個的影響。美國城市家庭的多數（歐洲也一樣）是從別人那里租房住，私人財產的意識與50年后的情況相比還遠遠沒有得到普及。房東沒有廣泛的政治資產，當然沒辦法和公共服務業壟斷者相比。勞工組織的注意力集中在更接近生產領域的其他地方。但是當1915年進行投票表決時，選民對于授權州政府為住房提供貸款的馬薩諸塞州憲法修正案的支持與不支持比例是三比一。[[390]](#_390_21)

歐洲進步人士指出的是另外一點：美國法律的獨特性。托馬斯·亞當斯稱為“實際上是鑄鐵的憲法”，它限制美國城市進步人士的方式是其他地方的人感受不到的。[[391]](#_391_21)在城市公共服務業事務上，法院堅持對估價決定有最終發言權，這成為市營公共服務業倡導者的一個障礙，雖然不是決定性的。但是，在與私有財產的特權更接近的議題上，法院都參與進來，在土地、住房、城市設計等所有問題上留下自己的痕跡。超額征用土地、奧斯曼的巴黎的審美限制、德國模式的在城市周邊獲得公共土地、英國模式的擴張計劃，更不要說公共基金的住房投資，都與20世紀初期的美國憲法相沖突。在所有起過濾作用的因素中，法律的力量是特別明顯的。

在法律的分類表中，有兩個指導性原則特別突出。第一，政府機構只有在給予充分賠償、只有是為了“公共使用”目的時才能從個人手里征用財產。第二，財產從一個公民到另外一公民的簡單轉移從表面看是處于政府的合法權限之外的。這兩個原則在理論上過于簡單，在實踐中也是漏洞百出。它們并沒有排除立法，而是通過由原則、政治交易和政治經濟假設組成的網絡來過濾立法。和德國嚴格限制城市強迫土地所有者出售土地的權力不同，美國法院很快得出結論：不僅公共街道和公共建筑符合“公共使用”的標準，而且包括廣闊的馬車公園（carriage parks），法院允許城市看情況征用土地和征稅以便支持這些。為供應公共自來水、電、煤氣、公交車、電力等征稅被歸入“公共使用”的原則中相對容易。[[392]](#_392_21)

反對財富重新分配性質的立法這一原則在實際執行上仍然比較靈活，雖然它的靈活性較少得到公開承認。政府以稅收和開支權力所做的很多事情也是以某種方式從一些公民手中取得財產，以正義的理由（或至少權宜的理由）交給其他人。給內戰中北方老兵的津貼（批評者覺得過分奢侈和慷慨）和對于國內生產者很高的關稅保護就是這種做法——它們是19世紀末期共和黨政策的兩個關鍵。窮人救濟和鐵路公司補貼也是如此。從原則上說，城市分區也一樣，因為城市分區對于區域使用、密度、建筑規模等的規定都能夠讓甲財產所有者比乙財產所有者更有利可圖地使用其財產，后者也許同樣值得尊敬，只不過他的土地所處的地域不同。

如果說公共使用和反財富重新分配論原則給予20世紀早期美國法院理由，可以據此否定違背不動產業主權利和豁免權的立法，那么，政府保護公共健康和安全的首要職責同樣給予法院高尚的理由做出相反的裁決。所謂的“警察權力”原則是抗衡嚴格的財產權裁決的砝碼。作為城市健康和生活條件相互依賴性的法律表現，警察權力就像公共政策本身一樣處于深刻的動蕩變化中。[[393]](#_393_21)

不管法官從一堆相互矛盾的原則中選擇哪一張牌打出來，他們的決定都不是最終的。許多法律裁決在州最高法院一級就停住了——并未十分遠離政治領域的糾纏，還有可能遭到州憲法修正案的否決。憲法不是“鑄鐵的”限制而是額外的障礙，不是改革的簡單壁壘（雖然進步人士在沮喪之中常常這樣看）而是高度自覺的分類裝置。它讓某些法案通過，讓某些法案遭到否決，讓某些法案受到成本和限制條件的致命拖累，讓對法官行動的預測影響任何一個設想中的法案。

在這種背景下，超額征用土地就成為引進的城市規劃措施中第一個遭到法律阻攔的，也是第一個失敗的。奧斯曼的巴黎和整個歐洲的城市街道集中化改造的財政機器，就是城市有權征用比實際新街道所需更多的土地，再用銷售重新規劃后地塊的收入補償街道修建的成本。對于受到巴黎啟發的城市規劃者來說，沒有哪個合法權力比這更重要的了。在倫敦市議會國王大道工程高得驚人的兩千四百萬美元費用中，政府通過出售鄰近增值的土地收回兩千萬美元。這個故事在美國城市規劃者圈子里一再被宣講。早在1903年，馬薩諸塞州議會的特別委員會在法國、英國收集超額征用土地的法律和實際操作等信息。議會用一個嚴格限制的法律極其謹慎地回應，把超額征用土地的權力限制在根本無法作為建筑用地的少量殘余土地上，實際上沒有產生什么影響。當議會試圖擴張法案時，州最高法院否決了它，因為州的征用權不能用來從不情愿的財產所有者手中強奪財產并讓它最終落入私人手中，不管城市可能從中獲得多少的利益，如更漂亮的街道景觀、交通狀況的改善、商業的復興。在接下來的十年中，城市規劃運動的律師竭力修改超額征用土地法案以便獲得法院的認可。全國市政聯盟出版了一個樣板法案。紐約市一個有關稅收的特別委員會推薦了另外一個法案，該委員會的成員包括E.R.A.塞利格曼、弗里德里克·豪威和迪羅斯·威爾柯克斯。但是即使在州憲法修正案的幫助下，1920年代末期最后通過的計劃受到的限制還是這么多，使得超額征用土地的規定實際上形同虛設。[[394]](#_394_21)

奧斯曼化的第二個法律支點——“審美條例”更快、更徹底陷入同樣的命運。給予巴黎第二帝國風格的不是它的林蔭大道本身，而是在奧斯曼工程師之后建造房屋的投資者所必須遵守的建筑高度和審美標準，造成了秩序、連貫的城市意識，正是這些讓巴黎的美國人感到吃驚。但是在美國，法院很明確：公眾沒有超越一切的權力強行把審美意識加在財產所有者頭上——如果不向房主支付他們愿意建造的房子和規劃者想要的房子之間的差價的話。在那么多城市規劃者所熱衷的戶外廣告問題上，法院同樣站在財產所有者一邊。法院承認廣告或許對美好品味產生不良影響，它們在城市公園和廣場邊緣刺目地吸引注意力，甚至可能破壞城市在公共空間的投資。但是，宣稱它對公眾的幸福造成有形傷害，就完全是陷入純粹“審美”和“多愁善感”（1909年紐約法院的用詞）的判斷中。1907年英國的《廣告管理法案》不能被推廣到大西洋對岸。面對法院規定的賠償成本，伯納姆的商人支持者的所有“推動”幾乎無法在私人城市取得什么進展。[[395]](#_395_21)

在“社會學”傾向更濃的規劃者非常看好的地方——城市發展的邊緣地帶，法院同樣設置了跨越大西洋的政策引進障礙。沒有一個法院允許城市在私人投機者之前購買一般土地，這本來是弗洛倫斯·凱利覺得非常有希望的德國模式。城市可以接受慷慨贈予的土地，但是花費稅收收入創建沒有任何具體用途的儲備土地銀行，這種權力無法通過“公共使用”原則。[[396]](#_396_21)

英國1909年城市規劃法案的管理權限在美國城市規劃運動的律師們看來好像更容易實現。法案的細節在城市規劃者之間引起激烈討論，但是法院仍然非常堅決，私人賠償優先于大多數公共目的。這個問題以街道地圖之爭這樣簡單的形式進入人們的頭腦。就城市周邊來說，沒有什么權力比在建造之前確定街道走向更關鍵了，美國沒有哪個法院不肯把這個權力給予城市。當城市邊緣的財產所有者為了私人目的決定占用規劃的街道搞建設，困難就出現了。除賓夕法尼亞外的每個法院都認為該建筑不能為了建造街道而被征用，除非全額賠償財產所有者的損失。在實際的建筑和紙上的街道（可能總是改變或者從來也建不成，折磨所有者的財產使用好多年）之間的斗爭中，法院的裁決是傾向于保護財產的。因為模仿德國或者英國模式控制未開發土地的努力受挫，美國城市規劃者發現另一個措施，即注冊城市分區規劃的權力。不過，他們這種批和不批的權力（本來就是一種被動式的權力）在整個1920年代都沒有產生多少實際后果。因為沒有法律權威可以確定在未開發的城市周邊的哪個位置做什么，1907年后迅速發展起來的城市規劃委員會都是沒有實權的部門。[[397]](#_397_21)

至于住房，法院既有屈服的地方，也有抗拒的地方。在直接涉及衛生問題時，法院愿意迫使財產所有者遵守規定，不考慮補償問題。他們接受威勒的主張，反對空氣不流通的廉價公寓和公用的庭院廁所，認為這是警察權力的合法延伸。1904年紐約市不動產所有者推出（據他們說）被催逼的卡狄·莫西欽——一幢有20家住戶合住的廉價公寓的所有者，以此質疑城市權力，抗議城市要求像莫西欽這樣的貧窮房主安裝室內水沖廁所，卻不提供經濟補償。紐約法院駁回了他們的請求。加利福尼亞清除特別居住區內“累贅”（磚廠、舞廳、華人的洗衣店）的運動逐漸增強，也得到警察權力的支持。但是在對不符合衛生條件而要拆除的財產給予賠償的問題上，法院反過來支持財產所有者的主張。在英國，貧民窟清理的成本難以承受，更可氣的是貧民窟財產所有者可以借此發財，故意把房產糟蹋到公共衛生當局只好從他們手中買下來，這些情況迫使法律制定者削減可以允許的賠償。到了1890年，雖然實際措施落后很多，但法律條文已經規定，對于不能被改造成適宜住所的房屋的所有者，僅僅補償土地和任何能夠回收利用的建筑材料的價值。相反，美國的法院非常不情愿把房東的主張扔到一邊。[[398]](#_398_21)

至于公共資金資助的住房，只有州憲法修正案才能改變法院的反對。向一些節儉、溫和、勤奮的掙工資者征稅以便其他人（或許不那么節儉和勤奮的人）能夠住上更好的房子，實際上是在州的公民間進行財富重新分配，馬薩諸塞州法院在1912年這樣判決。只有居住在里面的人才感到開心，而公眾沒有辦法享受（像享受公園和城市街道那樣），所以在1920年代很多法院裁決中住房都是不能通過征稅來建造的，因為它根本不是公共用途，完全是私人的事情。[[399]](#_399_21)

在所有引進的城市規劃措施中，只有城市分區成功獲得了法院的認可。受到商務部的鼓勵和當地房地產利益團體的迫切擁護，到1925年已有四百多個城市通過了城市分區條例（是有整體規劃的城市的兩倍以上），到了1930年這樣做的城市已經超過九百個。城市分區如何能闖過法律對財產保護的大網，這一點多年后仍然讓人感到驚訝。城市分區讓擁有相似財產的人落入不同的等級：為了像散落在法院地板上的許多“公共用途”一樣遙遠和不具體的公共利益，城市分區能夠從投機的土地所有者想象的利潤中大大咬掉一口。持反對意見的律師譴責它“隨意性”干涉土地投資的自然流動，背后的原則模糊不清、想入非非，只不過反映了城市分區委員會和城市官員的“一時趣味”。即使最強烈支持居民區城市規劃的威勒在1917年也認為，城市分區的憲法基礎是“非常不可靠的”。接著從1920年馬薩諸塞最高法院開始，法院突然開始支持勢不可擋的城市分區條例：居民區限制任何形式的商業企業，排除公寓房屋，管理在私人土地上的車庫布局，一下子確定了現代的、階級分隔的城郊宿舍區法律框架。[[400]](#_400_21)

美國最高法院1926年正式確認這個法律思想轉變的裁定非常簡練，讓人很難看透法官的思想。區法院支持原告的財產權，接受原告的訴求，即在購買財產的時候就已看中工業發展的前景，而強加的居民區用途限制明顯破壞了它的價值。最高法院默認接受了商務部模范城市規劃法案的主筆者提供的辯護狀，該文件對于公共用途幾乎一字不提，更沒有說到投機財產的權利和民主決定的設計。弗里德里克·豪威那種通過規劃決定體現“思想”的城市幾乎不存在。辯護狀翻新了“入侵”的比喻，它集中在原告的工業發展即將帶來的“破壞”：不穩定、道德敗壞、價值貶低。保護自己財產免受鄰居財產所有者損害的權利是古老的、公認的法律。城市分區保證的也就是這么多。它不是戴著公共權力帽子而是戴著私人權力帽子才穿過法律的分揀機器的。[[401]](#_401_21)

法官為財產慣性權利感到的擔心決不是幻想。城市規劃的新技巧幾乎沒有威脅到財產本身，就像進步人士的其他發明一樣，只是在市場經濟的邊緣區域起作用。但是在那里野心的剪刀是足夠鋒利的。就像城市規劃運動旗幟下的一個人在1910年波士頓會議上說的那樣：“貧民窟、不衛生的居住區、缺乏公園和運動場、缺乏必要的娛樂設施、缺乏全面合理的快速交通體系，還有工廠和討厭的廣告等有損市容的景象”，所有這些除了美國城市“瘋狂的個人主義”和“市民不能主張對城市的所有權”之外根本無法解釋。[[402]](#_402_21)單從“所有權”比喻的相互競爭的用法，法院就看到非常激烈的角逐，它們不打算成為旁觀者或者冷靜的參與者。

對歐洲人來說，這個景象非常特別。司法決定在美國公共政策形成中的強大力量一直讓他們感到驚訝。貝特麗絲·韋伯認為給美國人的最大禮物將是“偶爾讓一個錫德尼·韋伯來發明方法躲避他們愚蠢的憲法”。英國進步人士通常把世紀之交美國的政治與澳洲國家拓荒者的創造性進行對比，前者似乎在憲法機器的鐵銹和摩擦中停滯不前，后者卻“無視先例和權威”而不斷進行政策實驗。作家H.G.威爾斯從華盛頓特區離開后，相信美國人擁有俄羅斯以西的文明國家中“最軟弱、最不容易接近、效率最低的”中央政府，由于憲法的限制而陷入“孤獨無援的死胡同，被保安人員團團圍住，虛弱不堪、一籌莫展”。“美國還處在18世紀，”威爾斯寫道，“他們把18世紀末期現代和進步的經濟模式拿來貼在憲法上，就好像要永遠貼在那里一樣。”[[403]](#_403_21)

威爾斯關于時代錯誤的這個提法是錯誤的。強勢的憲法裁定，這個在20世紀初期實施得遠比從前深刻的做法，與進步政治本身同樣都是新東西。從結構上說，強勢的法院裁決比歐洲進步人士認為的更接近他們自己的政治現實。正如進步人士自己知道的，在英國和德國城市，財產往往包含有特別的政治資產。市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財產的特別機關在發揮作用——為大大小小財產所有者爭吵不休的野心，為長期和短期的財產利益進行討價還價的妥協。歐洲的都市政治給予所有權特別的支持。在19世紀末期美國更加開放和民主的政治中，財產的形式立法特權已經被放棄，所以法院就進來縮減美國和歐洲的差異。它們成為美國類似于普魯士三級投票制或者英國的納稅人選舉權的東西。在以房客為主的城市組成的國家，美國的法院成為保護財產的特別機關，作為其代理人和代表表現得更加嚴厲和教條主義。

在這樣的情況下，難怪美國城市規劃運動特別感受到律師的負累。也難怪從馬什（激進一邊的）到威勒（保守一邊的）都發現，這一運動受到法律中財產權特權規定的嚴格壓縮。從外在來看最典型的美國政治機構特征，卻發揮了最有“歐洲特色”的政治作用，法院把“有機”城市的規劃大大壓縮，變成對財產所有者利益造成損害最少的計劃。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意外危急情況和1930年代的大蕭條，部分法律障礙將會消失。為未來做儲備，戰前這些更加有意識規劃的城市的設想保留下來，其內容是在公共生活的象征方面更慷慨，較少被私有財產所限制的。所以在1930年代雷蒙德·昂溫游說華盛頓建造公共住房的項目，或者伊迪絲·伍德（已經出版兩本關于歐洲住房政治的書）參與創立那個項目，也是并非偶然。與此同時，跨越大西洋的交流已經起了雖然不大但是非常關鍵的作用。如果說結果很不均衡，不平衡性是戰前每個國家的城市形式和住房政治本身存在的特點。即使在美國，背后的家族相似性也并不缺乏。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在伯納姆的芝加哥，正在建造一個新的大公園（格蘭特公園），在一片從鐵路貨場改造的狹長濱水區呈現巴黎規整風格設計。在它的后面，城市本身向外推進，里面有錯綜復雜的私人設計、地塊劃分者的利潤和美景考慮、開發商建造的街道和投機性住房、公交公司投資、對于土地市場的幸運和不幸的預測、野心勃勃的紙上計劃。這些東西中哪些內容會實現，將取決于政治、取決于大西洋進步思想交流的未來，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一點：美國法官如何獨特地繼續解釋利潤和財產的訴求，在這方面他們已經成為特別熱心的仲裁者。

# 第六章 工薪族的風險

## 工人保險

在關于社會政治的辯論中，從工廠立法到壟斷權，從公共衛生到交通政治，從城市規劃到城市住房建設，貧窮問題核心地位的缺失對于現代讀者來說肯定是個意外。在當今美國，社會政治爭議最后肯定歸結到貧窮和對于窮人的公共救濟問題上。當代社會政治的感情中心在于“福利”，但是這個概念比從前所說的福利狹隘多了。現代美國的“福利”不是指共同福利，而是窮人救濟，“福利國家”是現代的濟貧法國家。

實際上，20世紀末葉之前建設的所謂福利國家中沒有一個是關注窮人的。從俾斯麥到貝弗里奇，他們的目標人口是工人階級，是那些通過雙手勞動掙工資的人，而不是沒有工作的赤貧者。北大西洋經濟體進步人士特別關心的不是修補窮人的生活，而是尋找有效手段爭取讓那些還沒有赤貧、還在工作和掙工資的人避免陷入貧窮的深淵。

這并不是說進步人士的想象中沒有貧窮問題的位置。在1889年巴黎博覽會上，社會經濟部沒有什么地方專門針對貧窮或者窮人的救濟，雖然有些類別專門針對工人工資、互助組織、工作事故、國家經濟干預等內容。但是在1900年，添加了一個新的類別：“公共慈善”。在規模上比“互助保險”（prévoyance）小些，但仍然有超過五百家參展機構參與競爭，公共資助和私人慈善國際大會的夏天會議吸引了一千多人參與討論。[[404]](#_404_21)從紐約市的雅各布·里斯到倫敦的查爾斯·布思，北大西洋經濟體的每個國家都有研究現代大城市窮人問題的社會學家。但是純粹的貧困不是他們關心的問題。限制沒有道德約束的資本主義的自我破壞性社會影響，把明顯被市場搞糟了的工作從那些市場中抽出，用公共福利的反算計抗衡市場的原子化社會影響，這些是社會政治的任務。貧窮不過是社會問題諸般頭緒中的一根而已。

當時辯論的更緊迫的問題是勞動條件。這不僅是因為工人階級比赤貧者數量更多，其政治忠誠度對國家更加重要，也不僅是因為勞資之間長期的斗爭比赤貧者更加沉默的、悶燃的怨恨對社會穩定造成更大威脅，而且因為窮人成為進步人士心中的另外一個國度。

當然，沒有人能夠忽視窮人國家。農村很容易把貧困掩蓋起來，而大城市則把貧困集中，讓經濟苦難暴露出來——即便同時在設法隔離它。兩個國家這一主題用多種不同的語言表達出來：上層外殼和下層社會，討厭的富人和絕望的窮人。

在所有國家，兩者實際上有很多交叉的地方。乞丐占據其中一個結合點，在幾乎每個大城市都是引人注目的景象；而有組織的慈善活動占據另外一個更大的結合點。從醫院的門診部（這是任何地方的窮人醫療救助）到捐助的醫療所、施粥所、無家可歸者收容所、育嬰堂、棄兒和失身女子之家、慈善學校、分期借貸銀行、教區窮人基金、私人救濟所等，慈善活動范圍在世紀之交的城市是相當廣泛的。[[405]](#_405_21)

最后，對于赤貧者有公共救濟。在法國，天主教堂及其慈善活動仍然例行地、半公共地承擔慈善救濟的主要任務；維持公共的濟貧所（bureaux de bienfaisance）在1890年代中期之前還不是地方政府的應盡義務。[[406]](#_406_21)但是幾乎在北大西洋經濟體的其他任何地方，保證窮人不被餓死是寫在法律上的公共責任。靠稅收支持的公共的窮人救濟以前就有，不是新鮮事物，它扎根于可以追溯到工業化之前的集體福利概念。

公共的窮人救濟在英國高度發達。19世紀中期，從伊麗莎白時代稅收支持的教區窮人救濟結構，演化出了地方濟貧法當局和機構的復雜的世俗化體系。法律規定要保證窮人不被餓死，同時要盡可能節省開支，濟貧法委員會依靠威懾和補貼組成的復雜體系來運作。對于那些在道德上特別有權要求救濟的人，這些機構能夠提供直接的金錢或者物品救濟——所謂“濟貧院”的“院外救濟”。對于其余人來說，它們提供了兩個選擇，要么進濟貧院勞動要么任何救濟都沒有。雖然濟貧院陰郁可怕，但還是收集了很多非常貧困的人：出現臨時變故的家庭、沒有家庭資助的老頭（老太太比較少見）、每況愈下的酒鬼、被疲憊不堪的親戚送進來的家庭成員。在1850年英格蘭和威爾士的濟貧院里居住著12.3萬名“院內貧民”，加上88.6萬名“院外”接受公共救濟者，占全部人口的近6%。這個體系在設計上既要打擊窮人領取救濟的積極性，又必須給予前來要求救濟的人以幫助，是個道德上復雜、經濟上昂貴的體制，它的沉重稅負使得英國的窮人救濟政治比其他任何地方都緊張尖銳。[[407]](#_407_21)

英國窮人救濟的法律框架很早就來到美國，被吸收成為國家法律和地方實踐。在美國，窮人救濟體系甚至比英國更充滿了漏洞，因為窮人被推動從鄉下來到城市，漏洞范圍變得更大。被看作是當地政府照顧本村窮人的體系，法律框架很少許可照顧由擴大而動蕩的勞動力市場所產生的過渡性窮人。美國地方濟貧法當局常常費盡心機把救濟窮人的責任轉嫁到其他地方，把他們不想要的窮人遣返原籍。但是盡管這個體系不充分，救濟最無助的窮人的責任原則在法律上是固有的，比跨越大西洋的進步人士紐帶的新社會政治悠久得多。[[408]](#_408_21)

在法國，對于窮人的公共責任在19世紀末期逐漸擴大，因為激進分子呼吁國家分擔教堂的慈善領地；但是幾乎在任何別的地方，對于窮人的公共責任都在縮小。隨著窮人在城市集中的情況加劇（他們都是遠離村里支持的移民和陌生人），隨著社會關系經濟化的進展，公共當局減少窮人救濟支出的沖動更加強烈。地方當局有時候以非常快的速度提高申請救濟的門檻，對公共資金實行更加嚴格的限制，對窮人的行為控制也更加嚴格。一個早期的、被大量模仿的考察窮人的程序出現在1853年德國萊茵河地區的工業城市埃爾伯費爾德（Elberfeld）。從前經濟化的嘗試失敗后，埃爾伯費爾德市當局決定把城市濟貧基金分配委托給150位不拿報酬的受人尊敬的市民，每個人負責關注自己所在社區的窮人救濟問題。后來它被稱為埃爾伯費爾德體系，因著降低救濟成本的名聲，它于1870年代和1880年代在德國迅速傳播開來。柏林一個地方就擁有二千多名不拿報酬的“榮譽”濟貧者，他們會定期家訪。[[409]](#_409_21)

這個體系又在“慈善組織”的旗幟下從德國傳到英國和美國。第一家慈善組織協會1869年在倫敦成立，其美國分部由倫敦總部一個從前的志愿者1877年在布法羅創立。招募婦女而不是男人作為窮人的“友好使者”，美國和英國慈善組織的員工與德國不一樣，他們不屬于公共機構，也不分發公共救濟金。他們認為自己的職責是通過在（多愁善感的）給予者和（或許沒有資格的）接受者之間建立嚴格審查的體系，來控制和規范私人慈善活動。但是，慈善組織項目的第二個要點有公共性和政治性：把公共當局從以家庭為主的“院外”窮人救濟中徹底排除出去。

慈善改革者把公共窮人救濟限制在濟貧院居民的運動，不管在英國還是在美國都沒有完全成功。在英國，上年紀的窮人仍然是濟貧法委員會同情的重要對象。但是其結果還是引人注目的。在1870年到1878年，英格蘭和威爾士接受公共窮人救濟者的比例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幾乎所有的減少都來自“院外”公共救濟的削減。在美國，“科學慈善”的鼓吹者在很多方面取得成功，減少了院外救濟的開支。在1870年，布魯克林市給予38,170個人以家庭為基礎的救濟；在1880年，一個都沒有。到1879年費城也是一個也沒有。在1900年人口超過二十萬的21個美國城市中，慈善組織協會領袖自豪地報告說，十個城市“實際上沒有給予公共救濟”，兩個給予“非常少”的救濟。[[410]](#_410_21)

更加慷慨的公共義務保留區仍然存在，盡管或許是陣發性的。在1890年代蕭條時期，美國城市官員在特別的私募救濟金廣告中合作，在冬天開放警察局讓無家可歸者棲身，或者通過緊急公共工程項目努力縮減失業人數（這比較少）。在都市政治模式還沒有落入慈善改革者運動中的地方，城市仍然從公共資金中為小部分窮人分發燃料和食物。[[411]](#_411_19)

但是由于新思想如此關注公共機構效率和私人的道德敗壞，公共同情和義務的古老傳統顯然在逐步瓦解中。慈善組織協會的核心思想是：不明智的慷慨解囊只能刺激更多的要求；這也是多數進步人士相信的原則。韋伯夫婦也相信，雖然沒有明說。他們堅信在對待貧窮這個問題上“道德因素是最重要的議題”，“不加區分、沒有條件、無償的慷慨救濟造成窮人性格上的道德敗壞和個人努力的松弛”。[[412]](#_412_19)在進行救濟工作時需要限制和審查。為了確保窮人不認為救濟是理所當然的，許多國家規定接受公共救濟的條件是放棄投票權。窮人并非沒有得到慷慨的濟貧法委員會、緊急救濟委員會，或者地方社會主義者多數（如在1896年后的法國）的同情，但是對于多數中產階級社會改革者，包括那些摸索新型社會政策的人士來說，窮人是遙遠國家的公民，從社會上和心理上都與跨越大西洋的進步人士心中的國家相距甚遠。

因而一點都不令人意外的是，進步人士的想象力常常集中在把窮人孤立起來的計劃上，把他們趕出來，送到更好的、更嚴格控制的環境中接受改造，城市也可以擺脫讓人難堪的景象。查爾斯·布思《倫敦居民的生活和勞動》第一卷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緊接在他估計城市窮人的規模和性格的首次統計學嘗試之后。在布思看來，問題的核心不是倫敦階級結構底層的流浪者或者半犯罪分子（他稱為A階級），他認為有效的減少布施的方法將會消滅他們。關鍵問題也不是工作的窮人（C階級），雖然工資很少，但工作比較固定。而這兩者之間的階級，即從來沒有固定工作的倫敦多余勞動力儲備才是問題所在。布思建議，為什么不把倫敦東部人口的11%（布思的計算）全部集中起來作為國家的監護對象，以家庭為單位運送到土地和生活必需品便宜的地方，在隔離起來的經濟體內工作，就像巨大的、多樣化的窮人農場？布思承認這是“社會主義”，雖然在理論上并不比英國濟貧法更有社會主義特征。“在照顧無能力者的生活時，國家社會主義是合適的方式。”B階級中的出類拔萃者將出人頭地，剩下的人將被城市排除掉，就像人們排干沼澤地，用人工堤壩和運河進行的墾荒工程。[[413]](#_413_19)

布思的紙上規劃（他很快就放棄了）非常時髦，足以讓人采取實際措施。在德國，對乞丐和“怕工作”的人的壓制非常嚴厲，社會改革者建立了一個由二十多個志愿的農村勞動聚居區組成的網絡，專門用來孤立和改造窮人。荷蘭也有自愿性和懲罰性勞動農場網絡，雖然沒有在消除都市貧窮方面取得什么進展，卻吸收了村子里的部分窮人到嚴格監督的農場勞動，（堅持到底的人）還可以居住在得到資助的住宅。[[414]](#_414_19)在自己特色的大吹大擂下，救世軍把類似項目帶到了英國，在這里，把城市窮人送到鄉下的想法和帝國把他們殖民到世界各地的思想結合起來。在1903年到1905年失業危機最嚴重的時候，連英國左派也考慮過勞工殖民地的想法。威廉·貝特麗絲記得，為失業者服務的倫敦中心團體的“野蠻年輕人”喬治·蘭斯伯里，以教士的熱忱敦促成立農村勞工殖民地——他還曾經幫助顛覆了對倫敦東部一個主要工人居住區“院外救濟”的法律限制。韋伯夫婦1909年對于國家管理的失業保險這一熱議項目感到懷疑，曾經提出布思建議的版本來回應：系統設計進行行為改造的勞工殖民地，用來吸收城市中的多余勞動力。[[415]](#_415_19)

政治上的模糊性絕非勞工殖民地思想的最不重要的資產。蘭斯伯里想象失業者的勞工殖民地是合作社會生活新形式的萌芽。韋伯夫婦的反烏托邦想象則指向紀律，通過斯巴達式的勞動、體操、訓練、戒絕飲酒、粗茶淡飯、技術教育達到目的。離蘭斯伯里最遠的一個極端是最大的勞工殖民地——比利時的梅爾克斯普拉斯（Merxplas）勞改營。這是國家罪犯流放地，1910年里面有五千多乞丐、流浪漢和輕微犯罪的人，在比利時北部三千英畝土地上有工作車間、農場、像部隊一樣嚴格的宿舍。這里像其他地方一樣，必須工作卻沒有救贖的希望。到了1910年，梅爾克斯普拉斯當局已經認定進入到這里的人沒有改造好的可能性，把政策變成了簡單的隔離。遠離酒精和女人（這里和其他地方一樣，勞動營居住者大部分是男人），也沒有了軟心腸的施舍者幫助或者稅收支持的公共救濟，沒有了人口再生產的機會，所以貧窮流浪漢就慢慢消失了。梅爾克斯普拉斯是個極端的例子。但是給予所有勞工殖民地項目影響力的是孤立窮人的邏輯：為了防疫、為了環境和行為改造，或者為了政治復興。[[416]](#_416_19)

美國進步人士對這些思潮的歡迎程度和歐洲同行一樣。哈佛大學社會問題的先驅老師弗朗西斯·皮博迪研究了荷蘭和德國1890年代的勞動營并大力贊揚。約翰·格雷厄姆·布魯克斯也是如此。皮博迪在1894年承認荷蘭勞動營的原則是“社會主義”，但它是“遠遠超過熟悉的社會主義討論”的東西，不是向國家提出要求的社會主義，而是國家對個人提出要求：“以某種程度或者方式，通過自己的頭腦或雙手或兩者的結合為國家福利做貢獻。”皮博迪說如果國家勞工殖民地是“社會主義，我們就最充分地利用它吧。它也是文明穩定的希望和司法慈善的秘密”。[[417]](#_417_19)

實際上，在美國最接近實現窮人殖民地思想的人是改革派社會主義者和律師埃德蒙德·凱利。1906年英國流浪問題委員會關于歐洲大陸勞動營的報告，讓凱利對把流浪乞討的窮人隔離起來的想法產生了濃厚興趣。他訪問過梅爾克斯普拉斯，但是真正給他啟發的是比較小的瑞士勞動農場。因為得到阿爾弗雷德·E.史密斯和慈善改革協會的支持，他在1911年紐約州議會上成功推動了根據瑞士模式建立勞改農場的法案。由于得不到州里撥款，凱利為流浪窮人設立的勞動農場工程沒有實現。但是就連簡·亞當斯在1913年也肯定勞動農場“和其他形式的慈善活動發展是一致的”，是失業問題的嚴肅解決方案的一部分。[[418]](#_418_19)

窮人是另外一個國家，在某種程度上是社會改革者想象中的外來者。社會政治不是從他們開始的。即使最終歸結為社會保險的思想辯論也不是從考慮窮人情況開始的。辯論中的關鍵階級是工人階級，是靠脆弱的經濟線索懸在布思所說的貧困線以上的人。正如進步人士看到的，他們的任務不是要消除貧困，而是減少那些在貧困線邊緣的人因為命運不濟跌入貧困深淵的可能性。社會保險（一開始被稱為工人保險）是專門為工人階級準備的，濟貧院、勞工殖民地、中產階級友好訪問者才是為窮人國家準備的。

貧困問題政策集中在救濟的有效管理上。社會保險思想的核心是不同的、全新的現代概念：風險。它把難以捉摸的命運變化可能性分攤到更大的公共群體上去。社會保險不是隔離的項目，就像它努力為之彌補裂縫和傷害的市場社會一樣，社會保險的關鍵是共謀關系和相互依賴性。

針對勞動風險的保險從一開始并不是國家的發明，而是工人自己創造出來的。在整個北大西洋經濟體內，煤礦和工廠工人、商店店員、酒店店員、街坊鄰居聯合起來相互支持，以對付工資勞動的經濟風險。疾病、事故、失業、年老體衰或者掙工資者的死亡：這些是勞動力市場上工人最主要的風險，當時沒有病假工資、事故賠償、養老金，對多數工人來說也沒有起碼的工作安全感。他們的恐懼在于，其中任何一種情況都可能像剪斷線頭一樣突然結束家庭的收入來源。這些人生過程中難以預料的、可怕的災難對于掙工資者而言，就像火災風險對于沒有參加保險的商人一樣。難怪工人們竭力通過互助組和共同基金的方式減少可能的風險損失。

工人互助保險俱樂部的最原始形式很難和彩池或者集合賭金區分開來。工作伙伴在一年的開頭給共同基金捐款，如果生病或者死亡可以從中得到補償，剩余的錢（如果有的話）到了年底在余下的人中間分配。在英國它們被稱為“石板俱樂部”，可能是因為懸掛在酒店墻壁上用粉筆記載成員賬目的石板的緣故吧。這種形式的本地俱樂部往往和酒館、教堂或者工作地結合在一起，具體數目現在已經無法計算。它們介于賭博俱樂部和互助兄弟會之間，非常不穩定，從保險精算上看也未必可靠，在工人聚居區無處不在。

更大的利益團體闖入了這類互助協會。在歐洲大陸，主要參與者是國家。在德國，零碎的行會互助主義經受住經濟自由派的瓦解作用而保留下來，準公共的工人福利機構以若干種古老的形式幸存。在歐洲大陸任何地方作為國家特殊利益焦點的采礦業，傳統的礦工聯合會（Knappschaften）已經被當作自由貿易的障礙而聽任其衰落，現在卻由于1854年普魯士的法案而復興起來——這次是作為法律規定的強制性保險基金，吸收礦工和雇主交費作為共同管理的基金用來支付礦難、疾病和死亡補償。在高風險的采礦企業之外，強制性保險基金就少多了。和錯綜復雜的熟練工協會、行業協會、兄弟會并列的是由地方管理的救濟會（Hilfskassen），吸收工人自愿捐款以抵御疾病風險的一種準公共保險基金。1845年的普魯士法案切斷了手工業行會下面的最后一個法律支持，同時授權城市當局強制性要求某些類別的工人加入救濟會。雖然這個規定包括的產業工人相對來說比較少，但是在德國，這個可能性使得私人風險和公共利益之間的界限保持流動和模糊。[[419]](#_419_19)

在法國，互助會（société de secours mutuels）具有準官方色彩，和德國的救濟會（Kassen）不一樣。這些地方協會通過1852年的法案重新組織起來，被要求到政府備案，吸收地方名流為領導成員；他們可得到國家保證的利率，作為回報，必須把財產的大部分存放在國家管理的中央基金中。資本家大佬被吸收為榮譽會員，大大提高協會的社會聲望和收入。1898年后，公共的征稅補貼也起了這種作用，國家本身越來越多地承擔了贊助者的義務。作為帝國社會政治的姿態，拿破侖三世還在這個混合物上添加了特別國家銀行，公民可以向這些銀行購買失去勞動能力保險，以優惠費率獲得老年年金。[[420]](#_420_19)

在英國，工人階級互助主義領域最積極的鼓吹者不是國家機構，而是兄弟會和商業企業。通過特許給予集體成員的精算保障，全國性組織吸收地方風險池，組成由成員、規范和支持構成的更高級組織網絡。1900年英國和愛爾蘭國家注冊的“友好協會”（互助協會的正式名稱）有兩萬四千個。但是在五百萬會員中，三分之一屬于最大的四個協會。疾病保險是最常見的做法：疾病期間的工資幫助家庭成員度過不能工作的日子，并可以按照協會合同得到醫療服務。友好協會的會費非常高，普通工人大部分繳不起，但是在技術工人中間，友好協會會員資格是獲得安全和尊重的主要來源。[[421]](#_421_19)

更厲害的是商業保險公司。在德國和法國，吸收工人階級的保險公司發展緩慢；但是在英國，所謂的集資協會，像皇家利物浦協會（Royal Liver）或皇家倫敦協會那樣純粹出售保險而沒有任何地方管理偽裝的郵購協會，世紀之交時在成員數量上已經超過了非商業性的對手。反過來，他們又很少能夠和為群眾提供便宜險種的純粹的商業保險公司媲美。這些被稱為“工業保險”公司，因為其目標市場是產業界掙工資的工人群眾。在發工資的日子，成群結隊的代理人在工人階級街區宣傳和收取每周的保險費。正如本特利·吉爾伯特描述的，“頭上戴著一頂常禮帽，耳朵后別著一支鋼筆，上衣口袋里裝著一瓶斯蒂芬牌藍黑墨水”，保險費征收員是工人階級街區的固定角色，是音樂廳諷刺劇中一眼就可以認出來的小丑。批評家指責（有一定道理）征收的這些錢只有可憐的很少一部分作為賠償返還給了工人。死亡保險的賠償很少超過一百美元的，為群眾辦的商業保險根本不是人壽保險，而是喪葬費保險，只能避免遭遇像乞丐一樣被埋葬的羞辱。盡管有這些缺陷，工業保險公司在工人階級不安全環境下仍然得到迅速發展。它們在1900年時聲稱擁有兩千萬保險單，另外還有集資協會擁有的六百萬保險單。[[422]](#_422_19)

人們應該想象到北大西洋經濟中存在縱橫交錯的種種互助團體和保險機構：管理的和非管理的；商業的和友好互助的；計算上非常原始的和高度系統化的等。結果形成的體系既是日常生活的固定模式又不能滿足日常生活所需，涉及范圍很廣同時又漏洞百出。沒有其他組織能在工人階級中扎下這么深的根。在1911年據說工會會員達到三百萬的英國，正式注冊的友好協會（排除集資協會和工業保險公司）聲稱擁有六百萬會員。當然，會員身份可能不止一個，有重疊的情況。總體上說，這意味著包括小孩在內每八個人中就有一個是友好協會的注冊會員。與此同時，在法國互助會有四百萬成人會員，相當于全國人口中每十人有一個會員。[[423]](#_423_19)

在美國，哪怕最粗糙的官方統計都沒有，工人互助協會的規模及其在經濟上的重要性需要人們去猜測。顯然這個體系范圍廣泛，遠不止幸存下來的那些油漆脫落、屋頂扭曲的小鎮共濟會或者伐木兄弟會會議廳所顯示之規模。每個工人階級街區都有俱樂部和會所。1908年在賓夕法尼亞州的鋼城霍姆斯特德（Homestead），瑪格麗特·拜因頓一個星期內統計到50家慈善協會的通知。在芝加哥的意大利社區，打著旗子、伴隨著鑼鼓和笛子演奏的互助協會游行成為星期天的固定節目，正如簡·亞當斯說的，會員“慶祝他們取得的成就：至少在自己周圍建立了躲避災難的一面薄墻”。杜波依斯估計了兄弟會和互助會成員在1890年代費城黑人中的數量，大概是城市黑人成年男性中的三分之一。在世紀之交的印第安納州一萬五千人口的密執安市，有26個兄弟會會所，幾乎都是以雇傭勞動者為主，還不計算以教區為單位的天主教和路德教互助會。在互助主義的集中地曼哈頓下東區，有近兩千個互助協會。[[424]](#_424_19)

更精確的成員數目估計可能風險更大。在1891年，康涅狄格州勞工統計局統計了386個互助協會，這些協會吸收了十二萬七千會員，（在東北部工業區）達到全州每六個居民中有一個會員的密度，比八年后西伯姆·朗特里在英格蘭約克郡統計的七分之一的比例略高。到了20世紀初期，估計的數字更高。在1915年，從“金色西方土著人子弟”、“紅人改進會”到“赫爾曼子弟會”、“圣約之子會”等加利福尼亞兄弟會加起來，每五個居民中就有一個會員。在1914年的馬薩諸塞州，兄弟會宣稱幾乎每兩個本州居民中就有一個會員。用這樣的方式計算，數字顯然夸大了互助會在工人階級生活中的存在。多數當時的專家認為應該把會員人數砍掉一半，因為里面可能有從工人階級以外吸收的人。在這個基礎上再砍掉一半，因為里面有多重會員身份，人們可能加入兩個甚至三個協會以增加抵御風險的機會。即便如此，從剩下的數字看，工人階級互助協會結構仍然和當時歐洲的情況相當。[[425]](#_425_19)

美國互助協會機構的虛弱之處不在于會員人數少，而在于他們在社會和政治上的分化。在英國和法國，友好協會和互助會在社會政策辯論中發揮強大的公共角色的作用；在德國，救濟會和自愿協會形成俾斯麥的社會政策不得不考慮的一個軸心。相形之下，美國同行的無所作為讓人驚訝。除了1920年代“雄鷹兄弟會”要求公共資助養老金補貼的活動這個例外，最好的兄弟會機構在影響公共政策方面也只是要求提高地位的例行公事而已。至于更小的、教區的、工廠的、街區的兄弟會分會以及病人俱樂部、葬禮基金會等，則因為移民工人階級的內部派別斗爭使得力量大為削弱。美國工人風險池的最有效的組織基礎——語言、信仰、種族、民族差別，在促進互利的行動中也造成分裂。在這些民族和種族分裂的基礎上很難形成共同的公共政策。

在這種情況下，“工業保險”行業的美國分支發展迅速。到了1911年，美國已經有2470萬份保險單，是兄弟會成員數目的三倍，在資金上相當于當時德國國家社會保險體系的金額。[[426]](#_426_18)工人階級的自愿性互助協會也得到發展，只要工作或者工資不穩定就會出現這種協會。但是沒有統計，在政治上沒有影響力，沒有公共注冊的承認和國家支持，也沒有中產階級團體的加盟贊助，加上內部派系林立，所以自愿性協會沒有成長為美國公共政策形成和管理的支撐點。

在大西洋的兩邊，自愿性預防風險的機構給予參加者的保障，都只覆蓋工人階級家庭所想到的未來災難的一小部分。病假工資和（尤其是美國）喪葬費用是最常見的利益。因為會費很高，有些互助協會還提供簽約醫生的服務或者（更少見）遺屬撫恤金。除此之外，包含的險種就大幅度減少了。只有組織最好的技術工人工會提供失業保險。除了個別大公司的雇員外，退休金對于產業階級來說還是奢侈品。

性別更突出地加劇了這些局限性。沒有任何地方的互助協會保險范圍包括女性工人特有的風險：懷孕、生孩子、嬰兒照顧等，所有這些都能一下子掐斷女性收入的渠道。工人保險是男性工人的保險，兄弟會強化了這一點，特別強調男性團結的儀式兼保險特征。石板俱樂部的家就在男人集中的酒館里。女性只是作為保險費征收員每個星期拜訪的對象，才在自愿保險結構中發揮值得注意的作用。對女性來說，掙工資只是勞動生涯中相對短暫和壓縮的一部分，她們用不那么正式確定的方式湊成了一些互助體系，和男人的既是社交俱樂部又是投注池的模式在結構上不同。不管是自愿風險池機構還是后來作為補充的國家保險體制，從總體上看都不是為女性服務的。[[427]](#_427_18)

保險雖然受到限制，但是它無處不在，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生活的現實。保險本來是為待遇最好的技術工人服務的不完善體制，其效率隨著工資梯度的下降而迅速削弱。它不是為女性設立的，也從來沒有購買到真正的安全網：真正的保險，即保證“躲避災難的薄墻”不會在工人階級家庭周圍破碎，讓家屬依賴私人慈善機構的慷慨救助或者成為濟貧法嚴厲審查的對象。不過，日常互助主義雖然只是破爛的斗篷，卻是靠平均法則緩解工人最嚴重災難的方式的生動體現。

被1910年美國觀察者稱為社會保險的另一種東西出生于德國。社會保險在兩個重要方面和自愿互助方式明顯不同：這兩個方面都把風險和共謀關系的邊界向外擴展了許多。首先，最重要的是，它強迫雇主參加工人的風險池。因為工人生活的絕大部分被工作占據，事故、疾病、老年虛弱、失業等不僅是工人的風險也是企業的責任。社會保險將工業風險的概念社會化了，認為有權力確定工作條件的人有責任承擔工業生產的重擔。

社會保險的第二個創新是讓風險基金也成為工人必須購買的東西。這一方面是要加固在保險精算上不穩定的、經常重組的自愿互助協會，另一方面也把參加保險的人員擴展到普通工人階層，而且最重要的是，減少了那些不斷從自愿體系的缺口和漏洞中跌出去的人對救濟機構造成的壓力。工人的風險基金開始是作為和命運搏斗的社會連帶主義賭博。在社會保險中出現了更加公共化的主題：在工人、雇主和納稅公眾間，對私人工資討價還價中產生的社會成本進行合理分配。

當19世紀晚期德國開始對工人保險問題展開辯論的時候，這個問題還不是十分清楚。包括俾斯麥在內，沒有人認識到國家作為龐大保險公司的前景。從1880年代在德國誕生到1911年英國自由派政府意外使用，到后來美國新政者的借用，社會保險的歷史是一系列僵局和臨時拼湊組成的。

在德國，這些拼湊做法產生的關鍵點是在救濟會和礦工聯合會。在理論上對雇主和工人都有約束力，它們在19世紀中期德國維持了強制參加風險基金的模式。當1870年代中期經濟崩潰的時候“勞工問題”激化，每個城市的大門前都積聚著乞丐和流浪漢，重新讓救濟會發揮作用的思想吸引眾多批評自由貿易主義的人士就沒有什么奇怪的了。1874年社會政策協會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詳細辯論。但是只有少數人如阿道夫·瓦格納主張強制性的、公眾的救濟會。多數人傾向于要求工人為防范造成收入喪失的災難而參加保險，但是可以讓他們自由選擇任何一種保險協會。多年后，古斯塔夫·施穆勒仍然認為1880年代強制性保險立法太草率了。路約·布倫坦諾當時完全反對。但是早在1870年代就已經清楚的是，公共強迫和救濟會機構形式的某種結合是社會政策可以做到的事情。[[428]](#_428_18)

最初的政策形成工作中沒有一項是俾斯麥的貢獻，但是標準的記載常常把功勞歸功于他。在擔任新德意志帝國總理的時候，俾斯麥在1870年代中期把注意力從外交轉向國內政策，保險根本不是他考慮的議題。他發表的回憶錄中完全略去了1880年代通過的著名社會保險法案。由于注意力集中在不斷增加的社會主義者的投票上，俾斯麥最關心的不是工人面臨的風險而是工人階級的政治忠誠度，后者因為他在1878年壓制了幾乎所有的社會主義活動而造成危機。不過，因為全面爆發的合法性危機的緊迫性，那個舉措倒是促使當局加快研究政策來贏回工人階級對既定社會秩序和國家的支持。[[429]](#_429_18)

俾斯麥的本意不是保險，而是帝國供應。他根本不喜歡要求工人向國家福利基金交錢的觀點：“如果工人必須付錢，對他的影響就失去了。”他最初想象的是，工業事故賠償金應該完全由雇主和帝國本身支付。他否決了社會政策首席顧問允許私人保險公司承擔雇主事故責任風險的建議，理由是它會使利潤和生意概念侵入他希望為帝國創立的社會保險領域。來自下面的社會主義訴求要用來自上面的社會供應抗衡。贈送關系的出現可以讓潛在的激進主義者相信，保護他們福利的最強大機構仍然是帝國本身。[[430]](#_430_18)

由于德國議會拒絕接受俾斯麥最初建議中包含的稅負，在人為加劇的危機中，產生了另外的東西：強制性保險法案的三重奏。首先在議會通過的是1883年的疾病保險法案，結合和擴展了現行的救濟會（Hilfskassen）：要求某些類別的產業工人必須參加經過認可的疾病保險，并添加了雇主必須為保險基金繳納的稅款。1884年的事故保險法案用法律規定的工業事故賠償標準取代現行的賠償法律，由強制性的、半官方的雇主互助協會管理。第三個是老年和失去勞動能力強制保險法案，集中工人的會費、雇主的稅款、象征性的帝國補貼成為退休金基金，為殘疾的工人和超過70歲的老工人服務。只有在這里，俾斯麥越過顧問的反對和議會的抵抗，成功推行了最接近他思想的原則。即便如此，1903年強制性保險機構吸收的基金中只有7%是來自帝國本身，47%來自雇主的稅款，46%來自工人自己交的錢。[[431]](#_431_18)

俾斯麥的意志與德國國會的抵制相沖突，社會保險產生于妥協，在開始時就充滿惰性和即興拼湊的混亂問題。1883年疾病保險法案把疾病賠償委托給新老救濟會的復雜組合，其中許多按2:1的比例由工人和雇主提供資金。到了1909年，其中有23,000個提供病假工資和簽約醫生的醫療服務，沒有一個完全相同的賠償金。另一方面，工業事故保險的成本完全攤在雇主身上，由半官方的雇主基金管理。還有第三種管理機構是特別為養老保險基金而設立的，雇主和工人的保險費這次是各付一半。

雖然管理分散和不完整，德國體系仍然不斷發展，在1880年代的產業工人核心外增加了其他的人口。疾病保險法案一下子把參加注冊互助協會的德國工人數量翻了一番，達到所有掙工資者的40%。到了1914年，擴展到包括農場和家務勞動的工人。實際上德國幾乎所有掙工資者都在疾病和事故保險法案的保護下。1911年保險體系中增加了領薪水者，有不同的管理機構和特別優惠的賠償金。給工人家屬的疾病賠償到了世紀之交的時候在許多救濟會已經普遍存在。給孤兒和無法工作的寡婦等的遺屬撫恤賠償在1911年也被納入進來。

德國保險體系是對工人階級社會主義進行的先發制人的打擊，卻被其批評家稱為社會主義本身的縮影，它不僅在管理上混亂不堪，而且在指導傾向上也矛盾百出。吝嗇小氣是其突出的表現。從一開始，資助的水平就故意壓得特別低。病假工資一般來說只有工人正常工資的50%—60%。在工傷事故方面，雇主提供的賠償只是在工人失去工作13個星期后才開始，然后賠償金額由上訴委員會裁量確定，而他們的決定往往對雇主很有利。靠養老保險過退休生活從設計上就是不可能實現的。養老保險法案下的保險費是人人都要交的，但是獲得賠償的只是那些交了整整30年保險費的人，這個體系在德國工人階級中不受歡迎，也根本沒有推廣開來。[[432]](#_432_18)

所有這些限制都是為了維持人們因為饑餓而工作的常規刺激，但是伴隨而來的還有其他難以預料的慷慨大方。在事故保險體系的刺激下，德國雇主在安全設施和管理上的投資速度是北大西洋經濟體內任何別的地方都無法媲美的。因為需要給投資找到出口，到了世紀末的時候，積累了大量保險基金的管理者開始把資金注入到公共設施上，醫院、療養院、公共澡堂、給水排水設施、低成本房屋等，所有這些方式給德國社會帶來深遠的影響。

工人保險體系內的權力關系也是類似的兩面性。德國保險法案本來的設計是要支持中央集權國家，結果卻把權威轉移給了一大堆亂七八糟的輔助機構。社會民主黨反對1880年代的法案，說它企圖用國家慈父般慷慨饋贈埋葬工人階級的激進主義。但是由于疾病保險法案（根據保險費交納比例）分配給掙工資者在疾病保險基金管理中三分之二投票權，社會主義者很快找到了力量僅次于工會的組織基礎。到了世紀之交時，社會主義者多數已經控制了許多最大的城市疾病保險基金，這讓簽約醫生和帝國官員感到憂慮。到這時候德國國會中的社會民主黨議員已經開始固定地給社會保險體系投贊成票。到了1920年代右翼人士威脅要解除它的時候，他們就好像把它一直當作自家的東西一樣擁護。[[433]](#_433_18)

對于工人的最后一個主要風險——失業，德國保險官員從來沒有設計出切實可行的解決辦法。沒有了帝國立法的幫助（1906年由于成本考慮而停止），失業救濟只得靠城市自己來選擇怎么提供。1910年，多數德國城市建立了公共勞動力交流市場：城市資助的就業大廳，失業工人可以在這里嘗試尋找廣告招聘的崗位。德國一些城市還借鑒比利時和法國的經驗，嘗試為工會的失業基金提供補貼，努力減緩救濟機構面臨的季節性需求高峰。[[434]](#_434_18)

但是，1880年代從德國開始的關鍵因素并非這種法國式的補助金，而是強制性原則。無論德國模式的福利國家還做了別的什么，從此后它把國民分類歸入風險池，從他們身上抽取特別稅，和從掌握工作條件決定權的雇主身上征收的同等稅款結合起來。他們將勞動風險的部分內容社會化，目的不是讓赤貧者得到幫助，而是不至于讓生活中可預料的災難把正常工作的工人推入政治激進主義的懷抱，或者推入依靠公共救濟才能生活的困境。

在政界就像在時尚界一樣，新穎從來都不能保證有人模仿。與國際上“社會問題”的辯論熱潮在時間上巧合，德國1883年到1889年的革新得到了廣泛的關注。在此后20多年的國際聚會中，社會保險的德國設計師積極游說。但是除了鄰居奧地利之外，沒有其他國家迅速跟進。離開了德國特有的地方風俗、國家野心、政府合法性危機的背景等，強制性工人保險絕非可以輕易移植的做法。正如1900年巴黎博覽會上展示的社會政治競賽表明的那樣，它在思想上有強大的競爭者。盡管德國帝國保險官員不遺余力地宣傳，人們并沒有太多理由期待在世紀之交，強制性社會保險很快就能超越其歐洲中部出生地。

在對付勞動風險的其他候選體制中，最顯著的一個是更嚴格地監督管理工作場所，首先給工人帶來風險的正是工作場所的問題：比如工作危險性和強度、長時間加班、缺乏保護裝置的機器、充斥棉絨和煤塵的空氣等等。這是德國人中比俾斯麥左傾者選擇的道路，他們認為這比追著救護車跑的工人保險更可取。在俾斯麥被撤職后短暫的政治改革春天中，在1890年柏林舉行的第一次國際勞動立法大會上，勞動保護標準成為主導性議題。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它們吸收了北大西洋經濟體內強大的改革能量。可以肯定，勞動保護立法在任何地方都是非常艱巨的任務。雇主對公開確定的勞動標準以及闖入工廠的檢查采取強烈抵制的態度，每一步都遭遇頑強的抵抗。[[435]](#_435_18)遭到更強烈抵抗的還有法定最低工資的思想，如果低于這個工資，工人一天的勞動所得不是生活，而是體力和精力的赤字。1900年用在某些“血汗工廠”上的最低工資立法只出現在澳大利亞的兩個省，在那里人們擔心亞洲工人會把歐洲和澳大利亞工人擠走，這才是法律實施的主要理由。但是，盡管這些措施的實行在政治上面臨很多困難，其邏輯仍然是直接清楚、有說服力的。

第三個替代方案既不是保險也不是預防，而是強化現有的互助性保險體制，維持其自愿特征，但通過公共補貼擴大其影響力。19世紀末期這種對集體性自助加以稅收資金支持的最突出例子是法國。在那里，地方疾病保險協會、雇主退休金基金、1905年后的全國工會失業基金等都得到這種方式的補貼。相對來說，管理起來簡單，而且對現有利益團體和組織的挑戰性較小，又因為天主教和新教徒社會進步人士的宣傳而成為普遍接受的原則，類似的補貼體制迅速在歐洲大陸推廣開來。在瑞典、丹麥、比利時、意大利、瑞士，自愿性疾病基金像法國一樣獲得政府補助。在比利時、挪威、丹麥，以及德國、瑞士、意大利的許多大城市，工會的失業基金同樣得到政府補貼。

由公共補貼卻并不公開強制的互助主義政策并沒有假裝為每個勞動者編織一個安全網。從設計上說它讓缺乏遠見者——在實際上它讓沒有技術、工資低廉的人從這個體系的巨大縫隙中漏掉了。到20世紀初期，全面性議題已經開始動搖對補貼論原則的信心。在法國，進步人士先驅者對于國家強制都充滿再認識。到了1901年連萊昂·布爾熱瓦都已經認同強制性的、國家管理的養老保險的原則——作為本土產生的互助保險（mutualité）機構和社會連帶主義思想的德國補充。法國進步人士最終在1910年通過了一個養老保險法案，但是在工人中間非常不受歡迎。由于法院拒絕支持強制性減少工資的原則，這個法案被閹割了，最終成為讓人尷尬的政治失敗。補貼論社會政治充斥著實際上的缺口和過分的倫理期待。但從表面上看，它并不比德國強制性保險的拼湊結構更少連貫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沒有任何別的體制比它更廣泛。[[436]](#_436_18)

最后，對所有這些模式提出挑戰的，是簡單地把公共補貼給予有救濟需要但并非自身原因造成的公民。這種思考模式并不是出于風險考慮。從工人階級和窮人立場上看，它發自一種正義感，從中產階級和國家官僚體系角度來看，它源于濟貧法管理上的某些尷尬。隨著濟貧法當局在世紀末加強了管理和對窮人的控制，從嚴格控制中出現了反方向的努力，挑選某些種類可以接受公共救濟的人，為他們提供不那么降低人格的救濟體制——因為這些人的困境中本人的責任比較少。由于這種思想，英國1885年后，患病的窮人被允許享受濟貧法中規定的醫療服務，同時不被剝奪投票權。在法國，特殊補貼網絡涵蓋了患病和殘疾的窮人；另一個補貼給予貧窮母親和孩子免費的孕期和分娩期照顧、國家法定產假期間工資損失的部分補償、對孩子多的家庭的補貼。這些構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北大西洋經濟體最高度發達的“母性”福利國家。[[437]](#_437_18)

但是，最麻煩的是上年紀的窮人，因為一輩子的辛勞，身體衰弱并且在走下坡路，只能從事更不體面的、不確定的、工資越來越少的工作，這并非自身的過錯。在給予上年紀窮人特殊補貼方面，這個時代最受關注的實驗是丹麥的。1891年的一個法案授權丹麥地方當局給老年申請者提供不剝奪資格的救濟，如果申請者此前一直體面地生活，在道德上沒有問題的話。實際上，該法案創造了一個單獨的體系，為貧窮正派、以前十年都沒有吃過救濟者提供少量的、不交費的老年“津貼”。七年后新西蘭對值得尊敬的窮人（非亞洲人）采用了類似的養老金體制。地方法院需要每年一度對他們的品行進行考察，但是在1900年詳細記錄新西蘭養老金中這樣一次考察的亨利·D.勞埃德認為，被拒絕的申請者只有十分之一，主要是因為遺棄家庭和酗酒。“沒有濟貧法那種影響（在政治上剝奪資格）”的津貼和救濟并不是完全擺脫了公共救濟的干涉性。除了一輩子努力工作外，不要求接受者交費，所以根本不算保險。但是把老年、體弱、產假、疾病等作為單獨的特殊類別，作為并不完全在個人控制之內的情形，這些補貼不言而喻地承認了工人階級家庭長期以來知道的問題：勞動的非故意風險。[[438]](#_438_18)

這里有四個競爭候選的手段對付每個掙工資者腳下的深淵：強制性國家管理的社會保險、法律規定的最低工資標準或者工作條件、公共補貼的自愿互助協會方案、給予無可指摘的窮人的救濟。它們相互競爭或者相互結合，吸引著不同的支持者和選民，頻繁出現在國際政策聚會、主要的評論雜志、各國議會大廳。

在這些政策之間選擇的問題最突出地出現在1906年到1911年的英國。那個時期英國的自由派政府，就相當于美國的西奧多·羅斯福和伍德羅·威爾遜政府合二為一。上臺的時候，除了脆弱的然而政治上不可缺少的與勞工的同盟，手頭沒有什么項目，擔心英國在國家社會“效率”競爭中落在后面，同時認識到格萊斯頓自由主義遺產已經消耗殆盡，這些“新自由主義者”成為迫切的政策借用者、跨越國家政治文化障礙的拾荒者。從1906年到1911年，他們引進到英國的政策有最低工資立法、養老金、公共就業市場、窮人孩子的學校午餐、學生的醫療服務、累進性的土地稅和所得稅，所有這些都很容易在外國找到先例。最后，出乎所有的預料，他們還引進了德國模式的社會保險。[[439]](#_439_18)

在新政府面臨的社會問題中，老年貧窮問題成為最多人關心的話題。在世紀之交的英格蘭和威爾士，65歲以上的老人中每五人就有一人領取窮人救濟，這個議題的潛在政治力量是很難忽視的。[[440]](#_440_18)對于政治風向非常敏感的張伯倫在1893年籌建了皇家老齡窮人委員會，他主張一個以1850年路易·拿破侖的革新為模式的制度：稅收補貼的養老金，可以通過郵局購買。

皇家委員會的另外一個成員查爾斯·布思提出了更激進的建議：用稅收補貼給予全英國每個65歲以上的老人每星期五先令的補助，不管其經濟條件如何，只排除最近剛剛得到貧困救濟的人。布思的建議產生于道德主義和打破傳統的奇怪結合，這在他的勞動營項目中已經為人們熟悉。正如他在1891年第一次宣布自己的主張時說的，不是要削弱濟貧法，而是要加強濟貧法，以便徹底消除以家庭為基礎的“院外”窮人救濟。如果人們把老人從救濟名單中除掉，就能一下子消除濟貧法救濟對象的三分之一以上。這樣子人們不僅能大幅度減少濟貧法項目的規模，而且通過排除能夠引起公眾強烈同情心的部分人，就可以把窮人的類別精簡到最底層的不適應環境者、醉鬼、乞丐、性格不良者等——要么需要特殊機構限制要么應聽任命運發落。布思把養老金和收入檢驗割裂開來的建議不是出于尊重老人得到救濟的權利，它的理論在于對國家干預的厭惡和對虛偽的仇恨，他認為任何方式的道德檢驗都會助長虛偽之風。[[441]](#_441_18)

不管布思提出的建議多么怪異，每個星期五先令普遍養老金的想法很快引發支持的洪流。到了1902年，工會、合作社、一些有影響的進步人士（其中有湯因比館的薩繆爾·巴內特、伯恩維爾的喬治·吉百利）已經表示支持。同樣支持的還有友好協會，它們一方面擔心自己的部分領域被國家占去，另一方面也面臨越來越多的老人需要醫療福利的壓力。當1906年自由派政府上臺后，不用交費的普遍養老金建議由于工人階級的支持開始被提上日程。

勞合·喬治在關于養老金的問題上寫道：“現在到了我們做一些對人們有直接吸引力的事情的時候了。”但是，財政方面的考慮顯示問題更為復雜。抓住丹麥和新西蘭的先例，政府把布思的普遍養老金建議改變成為添加更多限制的模式：稅收支持的、不交費的、給予超過70歲并通過道德考察的窮人的養老金。這個結果，用歷史學家帕特·塞恩的話，是“為非常老、非常窮、非常可敬的人”設立的體系。這樣的形式只有慈善組織協會反對，1908年法案很容易在議會獲得通過。[[442]](#_442_18)

養老金辯論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幾乎全體一致地反對德國模式的強制性養老保險。盡管里面有嚴重的缺陷，但可以肯定，英國模式的養老金法案比1889年德國方案慷慨大方多了。把養老金發放給個人而不是掙工資者，英國法案不像德國在男性和女性的勞動生涯上有歧視。在英國制度下，養老金福利比德國高，不需要接受者交費，從一開始就覆蓋了至少有三倍的人。[[443]](#_443_18)但是即使作為參考，德國模式也很少進入英國人的辯論中。一個孤立的議員以支持的口吻談到社會保險政策，結果遭到站在政府立場上的查爾斯·馬斯特曼的駁斥：“它是管理控制體系和嚴格標準化模式，完全不符合我國的傳統。”赫伯特·阿斯奎斯首相支持這個觀點，因為建立在“審查和強迫的基礎”上，強制性社會保險在英國是“絕對不可接受的”。[[444]](#_444_18)

英國政策制訂者排除德國社會保險先例，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在1890年代末期英國關于事故責任立法的辯論中，雖然所有各方都收集了德國國家保險局報告中事故賠償和發生率的數據，沒有一個有影響的英國政治人物認真對待德國模式的、國家管理的事故保險。英國對于1903年到1905年失業危機的反應是授權地方委員會舉辦應急的公共工程，以及一陣對勞動營的熱情。當時德國關于失業保險可能性的辯論很少傳入英國人的耳朵。

但是到了1911年，政府推動的社會保險項目和德國的相比（勞合·喬治堅持說）一樣大膽、一樣全面，甚至更慷慨。在導致對強制性社會保險原則的態度逆轉的因素中，跨國進步人士紐帶的作用不可低估。德國關稅政策的企業界崇拜者的努力宣傳，加上報紙上警告德國在經濟和帝國勢力方面競爭的緊迫感，使得揭示德國社會進步秘密的工程突然獲得了政治分量。[[445]](#_445_18)

威廉·貝弗里奇是新政策知識分子之一，對他們來說這些事件暫時提供了一個入口。他在1903年從牛津大學來到湯因比館作為副主管，雄心勃勃要形成“城市生活問題的權威觀點”。薩繆爾·巴內特對倫敦東區失業工人示威的景象感到震驚，推動貝弗里奇成立更理性的“非慈善式”救濟政策。貝弗里奇迫切渴望得到任務，很快作為倫敦失業問題緊急協商委員會的重要成員而處于政策辯論的核心。由于這個經驗，加上布思的倫敦碼頭工人研究、帕西·奧爾登對于德國城市勞工交流市場運作情況的報告，貝弗里奇很快得出結論：減少失業的關鍵是減少市場上就業不充分的人的數量。國家管理的、高效的勞工交流市場體制是他的方法。1907年8月，貝弗里奇親自訪問德國，回來后不僅對自己的勞工交流市場觀點更堅定了，而且帶回了新的、意料之外的對德國社會保險體制的尊重。貝弗里奇寫到，與“免費禮物”式的養老金不同，德國模式“把國家作為完整的一體，個人作為其成員貢獻自己的一份力量，必要的時候強制進行”。貝弗里奇批評養老金是倒退到女性恩惠的時代，他認為正是從保險中，人們才能發現與“工業化時代日益增加的復雜性和相互依賴性”相一致的基本原則。[[446]](#_446_18)

比貝弗里奇的德國發現更有直接影響力的，是勞合·喬治1908年夏天在養老金法案通過后作為財政大臣對德國的旋風式訪問。對于柏林帝國保險局為期一天的訪問本來除了強化對德國效率的朦朧感受外不會收獲太多，但是勞合·喬治回國后當天接受采訪時稱贊德國救濟和保險的“詳盡和完美的機制”，這顯然不僅僅是禮貌用語。與此同時，也許是受到貝弗里奇的影響，新當選的34歲的貿易委員會主席溫斯頓·丘吉爾已經開始兜售德國那種“社會組織”承諾，作為自由黨政治未來的關鍵主張。丘吉爾在1908年3月給首相赫伯特·阿斯奎斯寫信說：“在英國成長起來的巨大而分散的社會保障和保險網絡的下面，在較低的層次上，必須存在一種德國式的國家干預和管理的結構，雖然不能取代前者。”到了這年年底，丘吉爾的項目膨脹到已經包含勞工交流市場、大大擴張的公共工程、濟貧法改革、國家對鐵路更嚴格的控制、延長了的義務教育、強制性的失業和疾病保險等。他敦促首相說：“我說，把俾斯麥主義的一部分插入我們整個工業體制的下面，等待其后果，不管它是什么，我們做到問心無愧。”[[447]](#_447_18)

政治野心、對新思想和戲劇性姿態的迫切需要、由于競爭和野心而對德國的興趣，在這些因素外還必須加上俾斯麥的敵人強調的一個因素。社會保險因為能獲得雇主和受益人的繳款，比直接由公共提供工作或者救濟的方式便宜多了。當政府的野心遭遇1908—1909年金融難題后，社會保險的干涉性機制與其在財政方面的優越性相比就顯得微不足道了。許多公務員專家不是很熱情，但是在收入難題面前內閣改變了立場，開始向外國尋求政策建議，甚至包括關系疏遠的德國。

到了1908年末期，勞合·喬治努力推動疾病保險。由于受到新的失業危機和激進人士“人人都有工作”訴求的壓力，內閣很快同意了沒有嘗試過的失業保險。第二年又通過了由威廉·貝弗里奇在貿易委員會主持擬定的勞工交流法。當勞合·喬治介紹勞工強制性的疾病和失業保險的政府法案時，他排除了顧問提出的縮短演講、不提德國淵源的建議。“我寧愿起來告訴他們在德國雇主和雇員承擔的比例是多少，我的計劃沒有要求這么多，卻做得更多。然后坐下根本不用發表演講，而不是把那些內容刪掉。”[[448]](#_448_18)

不同的背景下有不同的結果。雖然受到政治反對派的騷擾，俾斯麥并沒有遭到現行保險機構的一致反對。德國自愿互助機構是地方性的，德國商業保險業在1880年代還處于初創階段。這些都和20世紀初期的英國不同。勞合·喬治想當然認為疾病保險應該是吸收同化友好協會而不是取代它們。《國家保險法案》關于疾病保險的最初草案是，雇主、雇員和國家出資都存放在由工人選擇的友好協會或工會的福利基金中。但是懷疑國家侵犯自己的生意，以及擔心多余成員會加重負擔，使得動員友好協會加入該計劃時遇到抵制和困難。[[449]](#_449_18)

工業保險公司欣然挺身相助。商業保險公司成功消除了為寡婦和孤兒提供撫恤金的法律規定，這本來會與它們自己的生意形成直接競爭。更重要的是，它們成功地修改法案，最初該法案就是要把疾病保險管理限制在非贏利的、民主管理的協會中，修改后則讓商業保險公司可以分出非贏利的附屬機構來做這個事。當然，對于公司來說有利的是，它們可以插足喪葬保險的銷售，商業保險公司運用可以動用的所有資源擠進來。在英國法案通過了一年半后，在這個法案下注冊的40%是屬于保險公司的或者收款協會的衛星協會，另外23%是屬于由總部管理或者由代理人自己管理的、沒有地方分支機構的友好協會。[[450]](#_450_18)

在利益團體間的地盤競爭中，醫生不可能置身事外。在《國家保險法案》出臺前，英國普通醫生中的一半是在友好協會合同下工作的，影響生活的合同條款令他們焦躁不安。醫生們成功地游說當局剝奪了獲得許可的協會直接和醫生簽協議的權力，相反允許受益人從當地衛生委員會認可的醫師名單中挑選自己喜歡的醫生，而醫生們希望能主導這樣的委員會。《國家保險法案》中有關失業保險的部分也向既得利益機構扭曲和傾斜，雖然沒有那么大幅度。失業保險的覆蓋范圍有限，在多數情況下是針對七大周期性強的行業中的勞工。伴隨著法案的保險條款，工會組織普通的失業救濟基金得到少量補貼，以平衡所覆蓋行業中那些減緩用工需求波動的雇主所得到的補貼。

總而言之，強制性社會保險像在德國一樣，一下子構建了一個激烈競爭的巨大新領域，現有的政治和商業利益集團都闖進來要分一杯羹。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德國，強制性疾病保險的機構很快形成了高壓控制的帝國大海中的社會民主小島；而在更加民主的英國，強制性疾病保險領域反而成為高層經濟利益集團爭奪的競技場。

英國的妥協并非讓每個人都滿意。工會大會嚴重分裂，其左翼反對侵占工人工資的任何強制性保險計劃。到了1913年，工黨呼吁撤消法案中的疾病保險部分，在無需交費的基礎上重建保險。韋伯夫婦嚴厲抨擊貝特麗絲·韋伯所說的“勞合·喬治卑劣的疾病保險計劃”，說它只是修修補補，根本不能預防風險。他們提出的競爭性項目就徹底多了：擴大的公共衛生服務（從根源處掐滅環境造成的疾病）、全國性的最低工資標準、反周期的公共工程開支；對于仍然貧窮的剩余部分，則有系統化的培訓機構、勞動營、紀律和強制戒酒。甚至勞合·喬治也在1911年的備忘錄中寫道：“保險是暫時性的、必要的權宜之計。在不遠的將來，希望國家能夠承擔完全責任為疾病和失業提供救濟。”[[451]](#_451_18)

1911年的《國家保險法案》和《養老金法案》不一樣，不是自下而上長期醞釀和發酵的結果，不包含政治文化上的地震性變動。它誕生于高層決策機構，是觀點、抱負、難題和機會特定組合的產物，不過仍然代表了有關勞工風險思考的微小但卻重要的改變。貝特麗絲·韋伯幫助布思進行倫敦窮人調查時并非沒有感受到貧窮的持久效應，她擔心法律“無條件的”和“自動的”救濟所產生的道德影響。溫斯頓·丘吉爾對這種道德擔憂的反應表明了工業風險的新論調：“我不想把道德和數學攪和在一起。”模范性格從來未能給予掙工資者防范勞動力市場動蕩的保證。該法案的宗旨在于用“平均數的新基礎”取代“偶然性的老基礎”。[[452]](#_452_18)

英國《國家保險法案》顯示的內容還有，在面臨政治難題的時候，在社會理想跑到傳統機構手段前面時，決策者和立法者可能被誘導把眼光放開，看到超越本地傳統外的東西。地位牢固的利益集團雖然能夠扭曲其結果，甚至改得大大走樣，但不能完全抗拒。在英國對社會保險的態度逆轉中，北大西洋經濟體內的政治競爭和交流產生了戲劇性的結果。但是，如果英國能，美國為什么不能？

## 利益領域

在美國，人們對于外國在減輕勞工風險方面的實驗從來不缺乏興趣。對工人的保護性立法就是特別說明問題的例子。美國人已經借鑒了英國人的許多這類措施，相當數量的現行法律已經可以在美國法律書中找到，雖然有些只是象征性的，根本沒有得到實際執行。但是，隨著1890年代歐洲勞工保護立法的風起云涌，美國卻跟不上人家的步伐了。在這點上，熟悉北大西洋經濟體兩岸情況的人們的思想是共同的。法國1892年和1900年通過了主要的工廠新立法，德國在1891年俾斯麥下臺之前，英國在1901年采用新立法。比較而言，阿瑟·莎德威爾在1903年認為美國人幾乎就沒有有效的工廠立法體系。約翰·格雷厄姆·布魯克斯同年附和了這個觀點，指出：“在一流國家行列中，沒有哪個國家在這方面的立法比美國還弱。”地域上的參差不齊和執行上的效果不佳，工廠立法只是政黨吸引工人階級選票的誘餌，但是對于了解歐洲發生的事情的人來說，世紀之交美國工人階級的生活好像根本沒有得到保護性立法的關照。[[453]](#_453_18)

作為大西洋進步紐帶中的主要壓力團體之一，美國勞工立法協會（AALL）在這種立法滯后的特殊形勢中確定了它的基礎。該機構的母體國際勞工立法協會，由呼吁統一的勞動保護法律的法國、比利時、德國著名社會經濟學家在1900年成立。最初的兩個項目是限制工廠女工上夜班和消除工業中的磷毒害。1901年，成立了一個德國分支機構“社會改革協會”，古斯塔夫·施穆勒、阿道夫·瓦格納、路約·布倫坦諾在發起倡議書上簽名。不久，法國、英國也出現了類似的全國性機構，在日內瓦還建立了機構總部。

1905年，施穆勒從前的兩個學生，耶魯大學的亨利·法納姆和紐約勞工統計局的阿德納·F.韋伯，利用美國經濟學家協會年會之機組織了國際勞工立法協會的美國分部。理查德·T.伊利當選為該組織的主席，約翰·R.康芒斯當選為首任執行秘書。從一開始，美國勞工立法協會的成員都是受德國影響的進步經濟學家。該協會認為自己最初的工作“主要是教育性的”：首先是國際勞工立法協會刊物《公報》英文版的傳播。執行委員會稱之為名副其實的“進步立法手冊”，這種立法中的有些內容“遠遠超過我們這個國家已經做的，因而應該受到廣泛關注”。當美國勞工立法協會開始積極的議會游說行動時，它的第一場戰役，即磷頭火柴工業更嚴格的安全標準，直接脫胎于落后形勢的政治和國際勞工立法協會的先例。[[454]](#_454_18)

與美國勞工立法協會的教授們爭取更嚴格的工廠立法相比，政治性更強、在當時效果更好的是圍繞在全國消費者聯盟弗洛倫斯·凱利身邊的一幫女性。消費者聯盟也是從歐洲引進的舶來品，不過美國旁支很快在影響上超過了倫敦母體。美國聯盟最初的成立是作為紐約市婦女的一種溫和抵制協會，她們對于百貨商店女性員工低廉的工資和長時間的工作感到震驚。弗洛倫斯·凱利在1899年擔任執行秘書后，該聯盟已經擴大范圍，通過給達到工資、工作時間和安全等標準的商店的產品貼上“白色標記”，成長為在女性內衣行業提高勞動標準的運動。該聯盟的榮譽職位大量吸收了有德國學術背景的名流：如約翰·格雷厄姆·布魯克斯、理查德·伊利、薩繆爾·林塞、亨利·亞當斯、查爾斯·亨德森、塞利格曼等人。但是它的組織力量主要是婦女：國際婦女界的著名人物莫德·內森、格林威治館的瑪麗·金斯伯里·西姆柯維奇、鮑林娜和約瑟芬·戈德馬克這兩姐妹，以及弗洛倫斯·凱利。[[455]](#_455_18)

在離開芝加哥到紐約之前，凱利作為伊利諾斯州第一任工廠檢查員已經跟立法者和法院交過手了，她幫助把聯盟的消費者壓力策略轉變為政治行動。到了1902年，該聯盟已經派生出單獨的推動童工問題討論的游說團體，林塞是其第一位執行秘書。招募戈德馬克的姐夫路易斯·布蘭代斯加盟，該聯盟采取精心組織的法律辯護行動，支持在國家法律立場上限制女性工人的最高工作時間。[[456]](#_456_18)

和美國勞工立法協會不同，全國消費者聯盟并沒有突出國際上的聯系。該聯盟的主要修辭手段是揭露和“扒糞”。其調查者把鼻子伸向空氣不流通的血汗工廠、充斥蒸汽的洗衣房、罐頭食品廠、街道攤販。她們收集關于女性工資、預算、衛生、就業、生活標準等方面的大量數據。但是聯盟的國際意識也決不是看不見的。和傳統的跨越大西洋進步紐帶相反，該聯盟很快在歐洲發展姊妹組織，到1910年已經在法國、比利時、德國、瑞士出現了類似機構。[[457]](#_457_18)

該聯盟國際觸覺的更驚人的標志，可以從約瑟芬·戈德馬克指示下聯盟為勞動時間案件而準備的“社會學”辯護狀中發現。很難說有任何現代意義上的“社會學”含義，這些辯護狀沒有列舉清楚的實驗證據，也沒有非常連貫的觀點。泄露它們內容的是長長的標題：“作為限制女性工作時間的立法基礎的世界經驗”。從1908年穆勒訴俄勒岡州案辯護狀的一百頁補充材料擴增到1915年附在邦廷訴俄勒岡案辯護狀后的一千頁材料，規模的增加等于是對世界上衛生、疲勞、工作時間立法文獻的大搜羅，就好像國際銀行的大型檔案柜中的內容已經被整體傾倒進法律爭論中。[[458]](#_458_18)

在凱利本人最終認為最根本的立法，也就是最低工資立法上，聯盟的國際借鑒是直接的、毫不掩飾的。澳大利亞對最低工資立法實驗的消息通過不同的渠道傳到美國。有些人是聽到美國勞工局的特別報告，還有的人如約翰·瑞恩是通過社會天主教團體，或者通過澳大利亞記者愛麗絲·亨利獲得的。亨利1906年到美國進行女性眾多問題演講旅行，后來作為全國婦女工會聯盟的編輯和澳大利亞勞工實驗專家留了下來。[[459]](#_459_18)凱利自己在1908年日內瓦國際消費者聯盟大會上接受了這個觀點。當時來自英國的全國反血汗工廠聯盟的代表在與會者中積極宣傳這個措施，他們差一點在議會中取得勝利，要把澳大利亞模式的最低工資法案在1909年引入英國。[[460]](#_460_18)

消費者聯盟成員在第二年起草的最低工資法案，沒有像1938年后美國立法機關那樣確定統一的最低工資。相反，忠實于澳大利亞和英國的先例，它授權在被懷疑所開工資低于生存和健康最低需要的“血汗工廠”成立特別工資委員會。每個工資委員會的任務就是對目標行業的工資、利潤、勞工問題等進行系統調查，如果得出結論有必要加以糾正，它可以設定合法的最低工資標準。凱利被法案中系統提取工人證言的條款所吸引，認為它不僅是經濟上的安全保證，而且是工人行業代表的萌芽形式。

在爭取提高工資和工廠管理立法方面這些相互聯系的活動，其積累性影響是巨大的。消費者聯盟在1908年穆勒訴俄勒岡州案的勝利為限制女性掙工資者勞動時間開辟了立法道路。從那時到美國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39個州實施了女性工作時間立法，其中19個州是第一次。同一時期通過的童工新法案累計更多，1911年一年就有30個，以1916年聯邦童工法案的通過達到高潮。最低工資法案運動遭遇法院更多可怕的抵抗，雖然消費者聯盟的辯護狀里有澳大利亞和英國的很多數據。但是9個州在1912年和1913年已經匆匆簽署聯盟所擬法案的變體。[[461]](#_461_18)

在美國和在歐洲一樣，勞工保護立法的運動是各種努力的奇怪組合，一方面要消除工作場所某些最危險的風險，另一方面是讓危險留在那里，確保只有成年男性會遭遇它們。勞工保護立法運動一開始，女性和童工屬于單獨的、特別需要照顧的類別就一直是核心觀點。但是在歐洲男人也被漸漸吸收進入專門為保護女性工人設立的帳篷，而在美國，性別造成憲法上的可怕癥結。和英國、澳大利亞的先例不同，美國最低工資法案把成年男人全部排除在外，這就是個明顯的例子，也讓凱利非常不滿。[[462]](#_462_18)聯盟在試圖把勞動時間的先例運用推廣到女性工人之外時遭遇同樣的困難。把一切曲解為婦女和兒童的特殊脆弱性，以及她們在治安力量保護下的特殊要求，憲法政治把性別置于美國勞工保護立法的核心。

在模仿歐洲先例時類似的女性化傾向，體現在另外一個政策手段向美國轉移的過程中：對無過錯窮人的公共救濟。在進入新世紀后不久，養老金問題在美國得到認真的討論，可以說是對英國上年紀窮人救濟問題辯論的回應，但當時沒有任何跡象顯示會有女性化的結果。美國爭取養老金的運動像在英國一樣，從勞工運動中獲得最強大支持。慈善團體則是激烈反對，因為他們認為不需要個案審查和管理的、沒有差異的養老金有嚴重的誤導作用。養老金建議在1915年馬薩諸塞州的六七個城市進行投票后，得到絕大多數人的贊成；在勞倫斯磨坊城和布羅克頓制鞋廠工人中間，贊成和反對的比率是4:1。但是在官方委員會中，這個觀點很少取得任何進展。[[463]](#_463_18)

在上年紀窮人養老金辯論中，有人提到內戰老兵養老金的前車之鑒。正如塞達·斯科波爾重新強調的，把鼻子伸入國會政治帳篷中的駱駝很快威脅要用整個身子占滿帳篷，內戰老兵養老金的先例在20世紀初期絕對沒有好名聲。本來是救濟北方軍隊受傷士兵的相對微小的殘疾補貼，在1890年后開放給幾乎所有在世的老兵，所需費用是當時軍隊數量龐大的德國軍隊補貼系統費用的十倍那么多。[[464]](#_464_18)

但是討論老年貧困救濟問題的國家委員會中，多數提出的是他們覺得更嚴峻的反對意見而不是內戰老兵補貼的先例。更加重要的是：超越憲法中“公共目的”原則而給予所有貧窮老人救濟的法律困難（弗蘭克·古德諾認為這是個有風險的問題，正如1920年代賓夕法尼亞法院所顯示的）、融資機制，以及最重要的，如果救濟的到來不讓人產生一丁點兒的難為情（即便是針對老年人的救濟），它可能對窮人道德感產生的“危害”。直到1917年，因為勞合·喬治和錫德尼·韋伯言論的廣泛傳播，一個重要的國家委員會（馬薩諸塞州針對這個問題的第三個委員會）才確認了不交費的養老金原則，但是仍無法就籌集資金的公平合理方式達成一致意見。1910年馬薩諸塞老齡委員會就排斥這個建議，認為它“不明智”或者“非美國化”，是對個人主動性的打擊，會“直接打擊社會進步的主要動力”。只是到了1920年代，國家才開始謹慎地把個別上年紀的窮人放在領取公共養老金的名單中（數量增加是在1929年經濟崩潰后）。[[465]](#_465_18)

在美國，無過錯性被確定在其他地方：不是老年的貧困，而是守寡母親的貧困。在美國爭取養老金的運動陷入政治停滯的同時，從嚴厲的濟貧法中挑選最配享受救濟的窮人這一想法的母性版本開始在美國各州法案中盛行。后來所說的“母親津貼”運動關注的是寡婦的經濟困境，正如斯科波爾和其他人揭示的，這也依靠了中產階級進步女性的政治力量。結果州法案授權縣政府建立單獨的、不貶損人格的特殊救濟，為通過經濟和道德測試的帶孩子寡婦或者棄婦提供救濟。由于女性團體的強力游說，除了九個州以外，各州都在1911年到1919年把母親津貼納入其法案中。[[466]](#_466_18)盡管地方當局維持的項目遠遠不能滿足需要，而且辦事拖拉，存在公然的種族歧視，法案還是幫助設立了無過錯窮人救濟的這個特殊類別。在法國，對于人口減少的擔心讓母性主義社會政策具有贏得公民支持的政治意義，而美國則不同，母親津貼運動的主導性語言是感情和女性的柔弱。這些法規以母性責任和家庭完整的語言為基調，至少在當時擁有足夠強大的文化邏輯來駁斥自力更生的論點。母親津貼法案用英國政策制訂者剛剛開始認真討論的術語，確認婦女生命歷程的特別經濟風險。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女權主義領袖已經在積極努力把美國的母親津貼法案的原則引進到英國社會法案中。[[467]](#_467_18)

在所有這些方式中，當時關于工資、風險、福利的辯論潮流席卷美國。偶爾回流到歐洲去影響那里的社會政策發展，結果，這些潮流都留下了廣泛的立法蹤跡。工廠立法、最低工資法案、無過錯窮人救濟等全部被吸收到美國政治中——盡管遭到性別界限的阻礙。更艱巨的問題是社會保險。

在這個話題上也很快出現了對知識的需求。1880年代和1890年代作為美國勞工專員，經常代表美國出席工人福利國際會議的卡羅爾·D.萊特組織了第一次調查。在1891年，他委托已經成為資深歐洲調查者的約翰·格雷厄姆·布魯克斯收集德國強制性社會保險的特別報告資料。歐洲范圍的工人保險報告在1898年由萊特的手下威廉·F.威洛比完成。一個調查小組在萊特繼任者的領導下在歐洲和美國展開調查，收集工人保險方面的更全面的資料，這次調查搜集了三大卷的法規和數據。[[468]](#_468_18)

但是首批報告的作者回來后沒有提供德國式強制保險的情況資料。布魯克斯非常謹慎地在德國關于安全及工人健康方面的成就和最近不得人心的老年保險法案之間保持平衡，沒有提出推薦意見。威洛比特別欣賞在法國看到的東西。法國互助會及其征募地方名流和公共補貼等因為外國味道太濃無法被推薦到美國來模仿，但是在威洛比看來，國家老年保險銀行是個有用和可以進口的手段。這種思想的變體在1905年人壽保險公司丑聞后獲得路易斯·布蘭代斯等人的認可。經過幾年的爭論，威斯康星進步人士在1911年建立了州人壽保險基金，因為沒有代理人和廣告，該基金的購買者并不多。[[469]](#_469_18)

但強制性保險就完全不同了。沒有強制性，社會保險的原則就無法實現。而如果有強制性，對于在早期政策辯論中表現活躍的許多美國人來說，該項目在政治上就是不可接受的。威洛比認為強制性社會保險建立在“美國人覺得奇怪的國家行動原則”上，根本不值一提。法納姆堅持認為勞工保護法案與公然的經濟重新分配措施之間存在根本區別，他斷定后者包括強制性社會保險在內。精英的美國工業委員會把整個勞資關系領域作為其管轄范圍，他們在1898年到1902年根本就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470]](#_470_18)

具有諷刺性的是，在美國傾向于德國模式社會保險的分散呼聲中，最響亮的聲音來自社會主義者。1908年末期，當明尼蘇達州雇工賠償委員會主席給勞工組織領袖寫信征求工人保險方面的信息，是社會黨的尤金·德布斯引導他了解標準的德國著作。社會黨的全國政綱在1900年成立以來就已經包括社會保險的要點。在1916年，雖然進步黨到那時已經偷走了社會主義者的社會保險議題，但迫使議會第一次聽證關于失業、疾病和養老保險的全國性項目的人，還是下東區的社會主義者議員麥耶·倫敦。很難逃脫歷史性的諷刺：社會保險——俾斯麥在1880年代為反對社會主義者項目而締造的這個最大成就，盡管其中的工資扣款仍然在歐洲掙工資者中引起巨大爭議，它在美國被重新修改后卻成為社會主義者提出來的要求。[[471]](#_471_18)

社會主義者對社會保險的借鑒中，最著名的人物是由醫生轉行為統計學家的伊薩克·魯賓諾。一位在1893年被迫離開俄國的富裕紡織品商人的兒子，魯賓諾1890年代末期作為年輕醫生了解到紐約下東區的苦難。行醫一兩年后，他聽了塞利格曼關于德國強制性工人保險的演講，受到啟發。實際上，在接下來的20年里，魯賓諾的激情一直集中在保險事業上。在1904年到1919年，他作為政府和保險公司的統計學家謀生，樹立起了美國強制性社會保險方面最博學專家的名聲。他與其他人共同指導了勞工局1908年到1911年對歐洲社會保險的詳細研究，撰寫了在新政前出版的關于社會保險的最重要著作，作為美國醫藥協會（AMA）社會保險委員會的秘書促成了美國醫藥協會1916—1917年對國家健康保險的短暫開放，還曾擔任加利福尼亞社會保險委員會首席專家顧問，該委員會爭取州健康保險的運動在1920年前的所有社會保險努力中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472]](#_472_18)

魯賓諾一直是社會主義者，對社會主義者內部爭斗的政治有諷刺意味的是，他還是簡單改革主義的犀利批評家。在其他人常常只把社會保險包裝成為強制性儲蓄的復雜機制時，魯賓諾沒有刻意否認收入再分配的因素。“否認社會保險是階級立法是沒用的”，它是為掙工資者面臨特別災難時提供的“社會保障”，是“為工人未來無法避免的貧困而提供的社會補貼”，是由有能力通過私人手段對付自己風險的那部分社會成員給予社會中更多沒有這種能力者的資助。[[473]](#_473_18)

與這樣一個自俾斯麥時期就存在不協調同盟者的領域頗為相稱的是，學術圈子內相當于魯賓諾的人物屬于完全不同的類型。查爾斯·R.亨德森擔任浸禮會牧師將近20年后才在1892年進入洛克菲勒的新芝加哥大學作為牧師，（碰巧）成為教會社會學的教授。亨德森在來到芝加哥之前擁有慈善組織協會關于貧窮的正統觀點，但是活躍的頭腦和永不停歇的社會改良主義將使他遠遠偏離當初的起點，他對改良主義毫不害羞、不知疲憊的勁頭讓大學同事都有些發怵。從1890年代后期到他1915年去世期間，他曾經擔任過國際監獄改革協會主席、美國慈善和矯治會議主席、芝加哥聯合慈善協會主席、芝加哥犯罪調查委員會成員、市長失業問題委員會秘書等，一直精力充沛地積極收集歐洲改革的思想觀點。[[474]](#_474_18)

1890年代中期在德國完成博士學位的一年期間，亨德森接觸到了德國社會經濟學。他很快就肯定，“德國人在他們所說的‘社會政治’方面遠遠走在我們前面，這個詞美國人理解起來都很困難”。社會保險不過是社會政治這一絞棉紗中的一根線而已，到了1906年，亨德森已經開始積極追求它了。應德意志帝國保險公司的請求，他寫了美國工人自愿保險的早期報告。他根據德國旅行經歷，報道了窮人救濟的方法、兒童福利，以及最重要的社會保險。和魯賓諾不同，亨德森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換一個環境，他或許可能成為社會連帶主義者或講壇社會主義者。他的社會保險觀點集中在“合作”和“國家團結”，而不是魯賓諾的階級正義上。把兩人統一起來的是某種社會理想主義、永不停息的深刻思想和德國。[[475]](#_475_18)

盡管有魯賓諾和亨德森這些先驅者的工作，許多美國人仍然無法接受社會保險的概念。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大多數工會一樣，美國工會堅決反對額外扣除工人工資的任何做法。也是出于這個原因，1910年法國工人蓄意破壞政府的強制性養老保險措施，拒絕購買所要求的保險印花稅票。社會政策專家疑慮重重。聚集了全國有關貧困和社會福利專家的“美國慈善和矯治會議”1902年成立了一個委員會研究工人保險問題。但是四年后這個委員會最終提出匯報的時候，發現除了一些空洞的詞語外沒有辦法達成任何協議。弗洛倫斯·凱利為德國模式的強制性保險辯護，約翰·格雷厄姆·布魯克斯在感情上更接近多數人的觀點，他謹慎地警告這個思想需要進一步檢驗。1907年，亨利·羅杰斯·西格為了激勵美國勞工立法協會，起草了全面的社會立法項目提綱。其開頭就列舉了勞工的風險：事故、疾病、傷殘、衰老、意外死亡、失業等。但是對無論哪種風險他都沒有提出強制保險的建議。西格認為英國模式的養老金、法國模式的疾病保險俱樂部補貼、國家對工會失業救濟金的補貼等都比德國模式更可靠。[[476]](#_476_18)

社會主義者太軟弱，工會反對工資削減，教授們過于含糊不定，難以激起人們對社會保險的興趣。消費者聯盟和女性俱樂部非常清楚保險原則不足以對付婦女勞動生活中的風險，而且她們從事工資勞動的時間太短暫，工資太低根本無法積累可觀的利益。[[477]](#_477_18)那些專門從事窮人救濟者，雖然不像反對直截了當的公共“補貼”那樣激烈反對交費的社會保險，但是太專注于區分真正需要和杜撰需要（后來發展成專業“個案調查”），因而也沒有多大興趣。

在這種意興闌珊的混亂中，根本看不出有任何跡象預示1911年到1919年美國關于社會保險的激烈辯論。像在英國一樣，需要有危機意識，有傳統的權宜之計根本無法解決的社會問題，才會使得五花八門各色人等病急亂投醫，咽下對德國中央集權的懷疑，求助于德國方案。英國的導火線是自由黨不得不適度向左派開放。在美國，導火線是受傷工人引發的危機。

像許多危機一樣，出現在20世紀前十年頭版新聞上的工作事故危機不是什么新鮮的東西。雖然工業事故的統計數據并不早于危機年份，但它們講述的關于機器、速度、冷漠、麻木和利潤的故事毫無疑問是老故事。在新聞“扒糞活動”高潮，在對于企業公司的傲慢和腐敗已經怒不可遏的政治氣候中，工業事故統計數據被公開曝光，給人們留下深刻印象——這是預料之中的結果。調查顯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美國，所有鐵路工人中每年有10%的人在工作中受傷。在礦業、鋼鐵制造、木材采伐、機器帶動的領域等，事故風險同樣高。[[478]](#_478_18)

這個問題對于所有工業經濟來說是普遍存在的。工作事故是最早引起俾斯麥關注的勞工風險。在英國，張伯倫意識到工傷議題潛在的政治影響力，在1890年就領導了工業責任改革的運動。但是統計數據清楚說明美國工作場所的傷亡增長速度是任何別的地方都無法相比的。世紀之交的美國鐵路事故率是英國和德國的五倍，煤礦重大事故率是英國的2.5倍以上，是普魯士的1.5倍。[[479]](#_479_18)存在差異的部分原因是美國工業勞動力中移民的比例較大，美國工廠和礦區雜亂的語言中，有關生存竅門的經驗之談并不總是很快被翻譯出來以保護新移民。但是世紀之交的觀察家注意到沒有保護措施的機器、簡陋的安全措施、缺乏對危險行業的法律定義、社會對工業疾病的漠視、雇主對于工人權益的麻木不仁等，他們認為看到了美國工業資本主義特別殘酷的一面。就好像在證實這點一樣，《華爾街雜志》在1910年的社論中說：“太多的安全措施剝奪了……工人應該學會承擔的責任。”[[480]](#_480_18)

但是事故本身并沒有造成工業事故危機。危機的起因是法律賠償機制的崩潰。當然，賠償費一直就不多。但是保護雇主免于工傷官司的法律仍然給予雇主在州法庭相當大的豁免權，他們擁有這種權利已經有半個世紀了。對于因為工友失職造成的事故（比如，在打開熔爐通風閥門這個緊張和危險的工作中失職），雇主在仍然沿用“同事過失原則”的法庭眼中就沒有法律上的義務。雇主沒有義務對知道工作風險的工人所受傷害負責（因認為在確定工資時就考慮到這個因素），也沒有義務為本身承擔事故部分責任的工人負責。

問題是隨著這些法律逃避條款的每一項變得越來越遠離工業工作的現實，陪審團和立法機構越來越不愿意接受它們。20世紀初的頭十年，受傷工人及其家屬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得到雇主任何形式的賠償。在1906年和1907年匹茲堡鋼鐵廠里，工傷死亡的工人家屬中25%沒有得到任何賠償，另外32%只得到不超過一百美元的喪葬費。如果打官司的話，費用高昂而且風險很大。伊利諾斯州每一百起事故中只有十五起提出賠償的訴訟要求，其中七起的訴訟結果對雇主有利。但是如果說該制度對受傷者非常不利的話，傷害案件的迅速增加，況且陪審團開始給少數幸運者慷慨的判決，這給法庭和公司都帶來特別大的負擔。在1910年的華盛頓州，法院的一半時間都在處理工傷案件。為了應對訴訟費和賠償費的上漲，雇主的事故保險費從1905年起上漲了兩倍。[[481]](#_481_18)

這里危機產生的壓力不是針對單一利益而是眾多利益團體。這是一個催生革新的僵局，解決辦法的爭奪戰造就了奇怪的同盟者和同床異夢者。有些鐵路公司通過建立公司救濟部門處理這個問題。資金幾乎全部來自工人工資的繳扣，而且要求工人放棄打官司的權利，以此作為獲得賠償的先決條件。公司救濟基金為支付一點可憐的賠償費向工人提出了異常苛刻的條件。[[482]](#_482_18)至于工會，則在努力要消除雇主在習慣法下得到的辯護。

更激進的觀點是向雇主提出工作事故全部成本的賠償要求，以此作為法律規定的企業成本，替代昂貴的、碰運氣的訴訟制度。這就是1890年代張伯倫在英國推動的制度。他的1897年《工人賠償法案》只是對某些最危險的行業采用公共確定賠償明細表的原則，但是該法案更廣泛的變體很快傳播到法國、丹麥和意大利。直到1902年的時候，阿德納·韋伯還為美國對此原則“幾乎完全無知”感到絕望，但是已經存在一些先例可以滿足美國未來需要。[[483]](#_483_18)

早期美國工人賠償立法的最強大推動者是西奧多·羅斯福，這是非常合適的。他的國家效率政治、保民官風格、親英派社會改革議題和張伯倫的非常相似。到了1907年中期，也就是英國自由黨新政府把張伯倫法案延伸到包括幾乎所有掙工資者之后一年，羅斯福總統把工人賠償原則變成了自己的原則。他在1908年的年度報告中宣稱：“在歐洲召開的事故賠償國際會議上，美國作為在雇主責任立法方面最落后的國家被挑出來，實在太丟人了。”[[484]](#_484_18)

到了那年年底，大企業主宰的全國公民聯盟、拉塞爾·塞奇基金會以及多家報紙都突然深入討論工人賠償的好處。因為擔心失去訴訟的權利，工會最初表示反對，但是除了在法院取得非凡成功的鐵路兄弟會外，工會的斗爭很快從原則轉向實際操作中的細節。雇主抓住賠償的部分原因是希望擺脫急劇攀升的訴訟費用，另外還希望通過處理勞工最深刻痛苦的問題拔掉工會組織的牙齒，使其無所施其技。因為受到多方面的壓力，立法機構也參與了這種事業。第一個仔細起草的工人賠償法案1910年在紐約實行，到了1913年，另外21個州已經搭上了立法的快車。[[485]](#_485_18)

這么快的立法速度只能通過大量模仿來實現。正是因為發現有現成的、歷史上成功的解決方案，才讓工人賠償法案的快速復制成為可能。在這個背景下，英國先例是不可缺少的。紐約“雇主責任委員會”根據1897年英國法案提出自己的建議，該委員會成員中包括亨利·西格和“匹茲堡調查”的工作事故專家克里斯托爾·伊斯特曼。全國公民聯盟同樣如此，1911年初期它的樣板法案在州立法機構中大量散布。[[486]](#_486_18)

張伯倫一直竭力要講清楚英國工人賠償法案不是社會保險。像1884年的德國法案一樣，英國法案把事故賠償的成本完全放在雇主身上。但是德國法案要求雇主加入強制性、準公共的互助協會來分散行業風險，鼓勵企業采取保障安全的措施；英國法案既沒有規定風險的聯合經營也沒有規定共同籌集資金。法案使得公司可自由地為賠償責任保險，不管采取什么方式：私人災害保險公司、自愿性雇主互助協會，或者自己的儲蓄基金。法律規定的事故賠償和社會保險是兩個完全不同的獨立原則。

但是，考慮到辯論進程的迅速發展和要討好的選區的多樣性，有些美國人越過英國模式而青睞德國模式就沒有什么奇怪的了。這樣一來就造成對1880年代社會保險遺產的重新評估。意識到1908年風向中的議題，拉塞爾·塞奇基金會勸說紐約市希伯來慈善總會的負責人李·K.弗蘭克爾重溫布魯克斯和威洛比探討過的內容。弗蘭克爾則招聘了紐約市保險精算師和社會改革俱樂部成員邁爾斯·道森，他曾為紐約州議會起草根據英國模式制訂的工人賠償法案。兩人夏天到歐洲訪問考察，到羅馬參加社會保險國際大會，回國后都開始崇拜德國模式。在那次大會上法國和意大利的代表都對補貼主義的優點進行深刻反思。在他們看來，嚴格的安全措施和雇主互助協會的預防工作尤其有無與倫比的好處。在他們的報告還沒有完成之前，弗蘭克爾被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聘用。但是道森這個“瘋狂的精算師”（全國公民聯盟的執行秘書在發火時使用的詞匯）仍然是德國模式的堅定辯護者，同時是商業性企業事故保險公司的坦率批評家。他的觀點來自1905年和1906年作為查爾斯·埃文斯·休斯的手下對人壽保險欺詐案的調查經驗。[[487]](#_487_18)

早期辯論中鼓吹德國式強制性事故保險的另一個著名美國人是喬治·吉列，“明尼蘇達州雇員賠償委員會”中來自州雇主協會的代表，雖然他支持這種保險的原因和道森完全不同。德國模式吸引吉列的地方在于，他印象中雇員會為事故保險基金交費。在原則上，吉列是錯誤的，但是在實際上，考慮到受傷的德國工人不得不用盡疾病補貼才能得到事故保險賠償這個要求，不能說他是完全錯誤的。比全國公民聯盟更右傾的全國制造商協會1910年派遣了兩個領袖人物到德國，在那里他們得到帝國保險局官員們的盛情款待，收集資料后得出吉列的結論。他們很快把制造商協會的重心放在按德國模式制訂的自己的方案：強制性工業事故保險，由雇主和雇員共同為基金提供支持。[[488]](#_488_18)

德國工業事故保險不是隨便哪個人所說的那個樣子。但是在相互借用的流動政治中，借用者的高度混雜是驚人的。從左派的《調查》到右派的全國制造商協會都開始稱贊德國模式的優越性，組成了不同聲音的大合唱。

隨著議題從傳單轉向法律，競爭的主軸不再是工人的繳費問題了，因為立法機構對這一點沒有多大興趣。關鍵的問題是誰將獲許占據新的工人賠償法案建立起來的經營領域。為了確保賠償機制有意義，需要有人保證即使小雇主也能承受災難性事故會帶來的潛在成本。因為看到公共創造的市場的巨大優勢，商業性災害保險公司迫切渴望做這個工作，但是在很多方面，它們從前的表現記錄并不令人滿意。英國法案下的經驗顯示，災害保險公司更不愿意通過鼓勵工廠采取減少事故的措施（如德國雇主互助協會做的那樣）來維護其利潤空間，寧可在法院打賠償訴訟官司。管理和傭金的成本很高。在工人賠償法案讓參保成為強制性的地方，商業性保險公司以市場能夠忍受的最高值來向俘獲的客戶收取保險費，沒有顯出一丁點兒的內疚。[[489]](#_489_18)

在那些對于工人賠償保險領域私有化感到憂慮的進步人士中間，強制性雇主互助協會的德國模式并沒有取得多大進展。只是在馬薩諸塞州有一個起草委員會認真對待它。更直接的替代方案是建立國家管理的雇主保險，要么像德國模式的挪威借用者在1895年嘗試的國家壟斷的形式，要么像1900年后新西蘭采用一個競爭性的公共保險局。在這些借來的模板中，很快成立了第一個美國公共工業事故保險基金。到1911年俄亥俄州和華盛頓州已經讓這個體制運行。兩年后，俄亥俄基金成為大部分雇主必須交納的強制性措施。這個由州礦工工會主席威廉·格林起草的法案不僅得到工人的支持，而且得到州工業雇主幾乎全體一致的支持。他們已經看到在1910年通過了英國模式的工人賠償法案后，紐約保險公司費率提高到兩倍甚至五倍。[[490]](#_490_18)

在1911年到1913年的加利福尼亞，州工業事故委員會著手在立法機構推動設立公共保險基金。該委員會的主席后來報道說，從新西蘭“借過來”，但“給它穿上更適合加利福尼亞工業和政治形勢的衣服”。在1913年的紐約，勞工的代表在建立州壟斷性的工業事故保險基金的戰斗中失敗了，雖然那是因為保險公司代理人和玩忽職守案的律師采取了預防性行動，八百人圍攻奧爾巴尼。[[491]](#_491_16)

盡管如此，在1910年到1913年推行工人賠償法案的22個州中間，三分之一的州建立了強制性的州保險基金或者（如紐約最終平息爭論的妥協辦法）旨在與私人保險公司競爭的選擇性的州保險基金。在1913年后，來自保險公司的巨大反向壓力扭轉了潮流。到1919年創立新的州保險基金的勢頭停止時，私人保險公司已經占據了工人賠償保險市場60%的份額，州基金占22%，剩下的是雇主互助協會。但是在工傷賠償斗爭中產生的日常同盟和思想的裂縫中，社會保險找到了美國進入點。[[492]](#_492_16)

在這個由危機、困境、借鑒、臨時創造組成的鏈條中，核心事件是思想改變的速度。在紐約州最初對1909年工人賠償法案審議的時候，克里斯托爾·伊斯特曼認為勞工代表“不知道我們在說些什么”。在1909年到1910年召開第一次工人賠償委員會會議的時候，雖然了解歐洲體系最基本信息的渴望非常強烈，但是對于公共的、強制性的德國式社會保險的興趣不過是舉向空中的一只孤掌。[[493]](#_493_16)工人賠償辯論讓美國人了解對付勞工風險的公共保險概念，它激發了形形色色、數量驚人的美國人對德意志帝國保險體制的興趣。就在這些爭議進行期間，1911年夏天英國出臺了《國家保險法案》，從而使得已經在進行的過程得到擴展和加速。

關于勞合·喬治提案的大西洋影響范圍，路易斯·布蘭代斯是特別敏感的指示器。1908年布蘭代斯仍然在考慮個人養老金，作為社會福利領域最重要的一個項目，通過儲蓄銀行便宜購買。當1911年6月他在美國慈善和矯治會議上演講的時候，開始呼吁包括疾病、事故、傷病、失業、養老等在內的“全面的”社會保險。他呼吁說，這是“提高社會效率的道路”，是德國、法國，以及現在英國緊緊追趕的“同一條道路”。不到一年，西奧多·羅斯福加入到這個事業中來。他的進步黨在1912年的競選綱領中許諾“按照美國的需要修改”的全面社會保險。[[494]](#_494_16)

但是，思想流動的最明顯例子是美國勞工立法協會。因為其早期的核心問題是工業健康和疾病，美國勞工立法協會很快被吸引到工傷問題的辯論中。該議題成為他們從1908年到1912年會議的中心問題，但是核心主張是預防而不是賠償或者保險。當（后來被證明是反常的法院判決）紐約上訴法院否決了該州1910年工人賠償法案后，紐約州勞工聯合會率先爭取修改憲法，增加覆蓋范圍以便不僅讓工人賠償法案合法化，也讓稅收資助的養老金、傷病保險、疾病保險等合法化。因為1911年英國法案而改變思想的亨利·羅格斯·西格也同意這個觀點。他斷言“我認為我們可以肯定這個國家要跟隨歐洲的步伐”。“在空氣中可以感覺到”。但美國勞工立法協會本身傾向于更狹窄的、更謹慎的戰略。[[495]](#_495_16)

直到1913年初，受到修正案爭議的打擊，該協會才最終成立了社會保險委員會，成員包括西格、亨德森、魯賓諾、道森等。在當年夏天的會議，即“第一屆社會保險全國大會”上，發言者詳細探討突然擴大的議題領域：承擔工人賠償風險的是國家基金還是私人公司，養老是靠補貼還是需要個人交費的保險，還有疾病保險、失業保險、母親津貼等。一年后，美國勞工立法協會的議題調整圍繞在社會保險這個新核心，變為美國最積極和最重要的社會保險游說者。[[496]](#_496_16)

在亨德森的推動和1913年到1915年經濟衰退的巨大影響下，該協會首先轉向失業問題。英國1909年的勞工交流法案和1911年的失業保險計劃，作為現成的答案，很快成為美國專家有關失業問題觀點的起點和結果。到1914年，美國勞工立法協會已經支持一個公共的勞工交流項目、針對周期性失業的公共工程項目、誘導雇主將招聘模式規范化的措施，以及失業保險——實際上是英國項目的翻版，并用召開會議和加強宣傳等方式擴大該議題的影響。紐約市長的失業問題委員會1916年初期在西格敦促下認可了這個項目。到了年底，威廉·M.萊塞森認定失業政策的基本框架在大西洋兩岸非常清晰，根本不用討論。他已經離開約翰·康芒斯的討論課，專門從事勞工經濟學的研究。[[497]](#_497_16)

但是到了1915年，亨德森去世，美國勞工立法協會的優先議題又轉向健康保險，積極推動通過州議會的病假工資和健康保險法案。從保險精算師的角度看，疾病比無法預計、搖擺不定的失業問題容易處理多了。與仍然需要更多實踐檢驗的失業保險不同，健康保險已經擁有二三十年的實踐經驗。不像在公共養老幫助問題上保險和補貼原則之爭讓專家產生分裂，從英國模式到德國強制性健康保險的轉變產生了可操作性的手段和原則的共識。

康芒斯從前的另一個學生，如今是美國勞工立法協會執行秘書的約翰·B.安德魯把美國勞工立法協會的健康保險樣板法案描述為“英國和德國體制中最好部分”的結合。實際上，因為起草者是魯賓諾、西格和紐約立法起草基金會的約瑟夫·張伯倫，它基本上屬于德國模式，核心內容是為低收入工人及其家屬提供的病假工資和疾病治療，還包括針對生孩子的花費而提供的少量補貼，盡管弗洛倫斯·凱利擔心這可能鼓勵丈夫為了得到這筆錢故意讓妻子懷孕。因為認定與工作有關的壓力和疾病是導致工人健康出現問題的罪魁禍首，補貼的來源應該一半由雇主繳納，一半由雇員繳納，各地的基金都由雙方共同管理，就像在德國一樣。美國最大膽的修改是提供喪葬費補貼（明顯是對工業保險公司經營范圍的侵犯），這是包含在要約中的內容，勸說工薪族只要每個星期交到保險費征收員手中一點錢，就可以購買到喪葬補貼和疾病保險。[[498]](#_498_16)

1915年末期發動的、由美國勞工立法協會支持的健康保險運動，在后面的月份中發展極其迅速。在1916年和1917年，健康保險法案被介紹進入18個州的議會。1917年有兩個州的特別委員會報告了健康保險問題；馬薩諸塞州委員會對美國勞工立法協會的建議持贊同和反對態度的人數正好相等，加利福尼亞委員會支持的法案吸收了兄弟會和工會（英國模式）進入保險金管理。十多個全國性工會團體和州勞工聯合會簽署了強制性工人健康保險的原則。州醫師協會和美國醫療協會社會保險委員會的注意力不是集中在反對州醫療保險上，而是像英國一樣，把醫生塞進建議中的保險管理機構中。[[499]](#_499_15)

處于所有這些活動組織核心的美國勞工立法協會規模從來不大。在1914年最高峰的時候也只有3600名成員。到了1910年才有資金派遣自己的代表出席在歐洲舉行的國際勞工立法協會的大會；兩年前，該協會不得不和已經在路上要出席國際消費者聯盟會議的弗洛倫斯·凱利和莫德·內森合作。美國勞工立法協會的大部分人是學院派經濟學家，理事會的主要成員基本上都是德國大學紐帶背景出身的，在1912年和1913年卷入紐約工人賠償問題爭吵之前，他們幾乎沒有任何的政治經驗。和法國及德國同行不同，該協會沒有吸收著名政治人物加盟，像勞工權益保護國際協會法國分部的亞歷山大·米勒蘭，或者德國社會改革協會的普魯士前商業部長弗瑞赫·馮·貝爾普施等。雖然它宣稱其榮譽副主席中有零星的一些工會領袖，美國協會中沒有類似于德國協會那樣廣泛和機構性的附屬工會。[[500]](#_500_15)

面對這些復雜的劣勢，美國勞工立法協會從其他國家的先例中汲取力量。樣板法案是協會首要的政治工具，尤其是在社會政治立法仍然是新鮮事務、起草法案的倡議仍然是政府外事務的時代，這種工具的力量更加強大。在關于社會保險辯論的最早階段，在一個集滿了業余愛好者和知識缺乏的領域，在工會、雇主協會、政府調查者競相從海外社會保險中獲取經驗的時代，美國勞工立法協會在使用借來的知識發揮應有價值的政治斗爭方面的確是很出色的。

實際上，從1907年工人賠償方案的首次嘗試性討論到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思想的流動是有重大意義的。1916年末期加利福尼亞社會保險委員會針對這些新問題做了個調查，對象是美國經濟學家協會和社會工作者組成的“美國慈善和矯治會議”的成員。雖然只有五分之一的成員回答了問題，但是在回答者中有三分之二贊同在美國推行強制性社會保險，健康保險可以作為第一步。《調查》現在開辟了專門發表社會保險新聞的專版。當時影響最大的慈善組織人物愛德華·T.迪瓦恩在1909年的時候曾認為社會保險是不必要的。到了1913年，他開始談論通過社會保險強制工業界“支付產品的全部成本、人的生命和體能成本”的正義性。[[501]](#_501_15)

辯論的新轉折、社會保險討論的新政治可行性、關于歐洲勞工交流和疾病補貼體系的流利對話、像西奧多·羅斯福這樣迫切要搭乘勞合·喬治式政治順風的風向測試者，以及在強制性問題上的思想轉變，都標志著自從1902年“美國慈善和矯治會議”無結果的辯論以來輿論上的戲劇性變化。地方動態強力推動了這種變化：美國工人階級安全體系的散亂和不充分、美國工業資本主義運作模式的冷酷無情、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保民官式新執政風格等。但是如果沒有大西洋紐帶，這種變化是難以想象的。

不過，雖然思想和政治轉變引人注目，但它并沒有給美國帶來社會保險，至少當時沒有。到了1913年末，事故保險公司的反游說力量已經奪走了爭取州工人賠償保險基金運動的影響力。仿效英國1909年和1911年法案爭取失業保險政策的短暫運動，也隨著戰爭引起的繁榮而逐漸悄無聲息了。失業保險得不到工會組織的信任，也沒有在任何地方進行過廣泛的檢驗，無法說服任何州議會進行嘗試。強制性養老保險也因為沒有像查爾斯·布思或者勞合·喬治這樣的人物來打破僵局而陷入困境。健康保險離成功只有一步之遙。在美國1917年春季進入戰爭的時候它還處于舉棋不定的狀態。魯賓諾肯定它的成功只是時間問題，這不是沒有理由的。但是在工人賠償法案、母親津貼法案、勞工管理法案幾個月內一個州一個州獲得通過的快速立法狂熱的時代，可以肯定的是社會保險遭遇到相當強大的抵抗。

渴望從戰前立法中獲得比實際更多的東西，社會政策歷史學家不斷回頭探討第一波美國社會保險運動的局限性，試圖從它的失敗中尋找美國獨特的結構和材料。所謂“歐洲”成功和美國失敗的籠統假設比通常所承認的情況更不牢靠。社會保險不過是北大西洋經濟體在1914年戰爭爆發前傳播的許多相互競爭的經濟措施中的一項而已。在比利時、意大利、丹麥、加拿大、新西蘭、澳大利亞都有大量的社會政策倡議，但是沒有一個倡議具備社會保險的獨特特征。瑞典的社會保險首次實驗，一個內容寬泛的養老保險法案，到戰爭爆發時實行了一年；在法國，由于1910年養老保險法案的失敗，德國式社會政策實驗也搞得一塌糊涂。完全由偶然事件促成的英國模式幾乎沒有進入實際運轉。在這種相互聯系和偶然事件組成的網絡中，美國的差異與其說是類別性的（如國家權力明顯軟弱，特別反對集體福利考慮的意識形態等等），倒不如說是同樣的材料因為擺放順序不同（比如城市政治中表現出來的情況）或者按不同的比例混合而成（比如關于財產的法律政治權力）而出現差異罷了。

在美國例外主義者的解釋中，最讓人不滿意的是認為特別的“美國思想”抑制了人們接受社會保險的觀點。[[502]](#_502_15)我們不否認意識形態發揮了作用。在美國就像在其他地方一樣，在社會保險斗爭中，反對者們動用了能控制的每一丁點兒的意識形態能量。社會保險是“非美國性的”，因為它是“發瘋的家長制作風”，是新形式的“工資奴隸制”，是保護個人自由免受“社會主義禍水”危害的“堤壩上的窟窿”。1911年英國法案威脅到“摧毀英國人性格中的陽剛之氣”，全國公民聯盟的調查者在1914年得出結論；它向“男人情感”宣戰，意味著“惡毒破壞工人階級的榮譽感”。[[503]](#_503_15)

但是美國辯論中的任何東西都可以在1880年代的德國和1908年后的英國同等極端化的言辭爭論中找到。社會保險有“父權制特征”；強迫性手段即使能帶來可敬的行為如儲蓄，也消除了行為中的道德因素；根本不考慮個人的錯誤或具體背景就保證補貼的發放，無論這個保證是多么微小都只能弱化性格；風險預防領域的公共干預只能造成家庭責任和團結遭到破壞；從強制性保險項目產生的兵營式標準化后果看，付出的代價太大，根本不劃算……所有這些雖然常常被包裝為“美國觀點”，其實同樣快速地出現在俾斯麥的反對者或者勞合·喬治的反對者口中。就連“德國造”的指控也不構成對美國社會保險支持者特別不利的障礙，因為它在英國和法國社會保險批評家中也很流行。

對于所有這些論點的駁斥回響在北大西洋經濟體的任何一個地方。《獨立報》在1911年撰文支持英國社會保險項目：“大量工業化國家為了生存相互競爭，這種斗爭并非不再可怕，雖然現在是靠商業操作而不是靠血流成河完成的。”“這些國家必須達到并維持勞動人口的標準效率，否則就要破產倒閉。”人們或許可以把這個項目稱為布蘭代斯所說的“社會效率”，或者亨德森所說的“國家團結”，或者丘吉爾和貝弗里奇所說的“社會組織”、“國民效率”，或者法國進步人士所說的“社會連帶主義”。它的標記是關心國家力量、人力資源的高效發展，對西奧多·羅斯福所說的“工業主義劣勢淘汰體制”產生的“人類殘骸”的保護。這是社會保險論點中冷酷、算計的一面。但是也存在柔情的另一面，希望社會保險能夠成為通向人人都渴望但是從來沒有實現的“社會和平”的重要一步。從雙方的視角來看，前一個時代抽象的道德個人主義，如魯賓諾所說的“對自助的盲目崇拜”，可能顯得確實薄弱和狹隘。誰若試圖衡量這些論點在各國相對的意識形態力量，就是面臨一個不可能實現的任務，在這些國家里社會保險的辯論都在借用的詞匯和共同的極端觀點下迅速展開。[[504]](#_504_15)

這里不是說要忽視意識形態的力量，只是要開始確定在什么地方它具備美國獨特的力量。最明顯的地方是社會保險運動和戰爭的時機。1911年勞合·喬治提到德國的時候仍然能夠用競爭對手的言辭和尊敬的語氣，1912年西奧多·羅斯福的競選演說中充滿類似的情感色彩。正如我們看到的，這種羨慕和忌妒的情緒在戰爭期間并沒有完全消失。但是在政治中，沒有什么比時機更重要了，從美國1911年和1912年發現德國式社會保險到1914年夏天戰爭爆發，之間這個機會的窗口特別小。無法掩飾其德國影響的健康保險處于特別脆弱的狀態。1915年末期美國勞工立法協會的樣板健康保險法案出臺后幾個月內，“德國造”的指控像手榴彈一樣扔過來。在1917年美國宣戰后，人們只要提出健康保險問題，反對者肯定提出德國式尖頂頭盔來回擊。[[505]](#_505_15)美國明確借鑒他人的事實本身、社會保險支持者喜歡談論的落后論主題、從已經存在的歐洲經驗那里提出觀點等，在1917年后都成為潛在的負擔。

意識形態在美國勞工聯合會（AFL）圈子內部也發揮了很大作用。那里對國家干預工資談判的懷疑仍然根深蒂固，有太多破壞罷工的法院強制令為佐證，又有工人階級“男子漢氣概”這種持久的維多利亞信仰做支撐。美國勞工聯合會的永久主席塞繆爾·岡珀斯是工人賠償運動的早期擁護者。但是工人的強制性保險項目由于從工人收入中扣除保險費、工人選擇受到限制、復雜的注冊和管理機制、隱含的“男子漢氣概喪失”等問題，在岡珀斯和美國勞工聯合會領導層來說都是受詛咒的對象。和教授占主導地位的美國勞工立法協會合作從來都感到不舒服，岡珀斯在1915年辭去了該協會榮譽副主席的職務。第二年，他擅自闖入麥耶·倫敦的工人保險聽證會攻擊倫敦和魯賓諾是社會主義者，譴責社會保險本身是在社會主義孵化場孵出來的壞蛋。[[506]](#_506_15)

岡珀斯不能為整體的勞工組織代言，率先把社會保險提到議會的州勞工聯合會也不能。在對強制性社會保險表現出這種混亂和矛盾的感情上，美國的勞工組織并沒有任何特別之處。1914年前北大西洋經濟體中沒有一個地方的勞工組織起草社會保險項目，或者在推動社會保險實現方面發揮了重要的政治影響力。即便工會最終支持和認可了來源于政府或者中產階級改革協會的措施，也從來就不是沒有抗拒和反對的聲音。掙工資者交稅的原則毫無例外地遭到勞工組織的反對，雖然這是社會保險概念不可缺少的原則。國家失業保險尤其不受工會歡迎，因為懷疑它是迫使技術工人接受非技術工作的手段，擔心它成為破壞罷工的工具。養老保險從1889年一開始就成為產生憤怒的土壤，因為工人現在為老年交稅，而他可能在老年到來前就死掉了。在德國和英國，社會保險很明顯是作為工會自己獨特的社會政治項目的解毒劑而形成的。這些項目包括不用交費的養老金津貼、工會的合法地位、為失業者提供的公共工程等。

盡管如此，美國以外沒有一個國家的全國勞工聯合會名義領袖像岡珀斯這樣，在社會保險問題上如此親熱地巴結那些主宰全國公民聯盟的企業巨頭，或表現出如此明顯的意識形態信念。對于那些試圖看清政治潮流的人，如欠工會越來越多政治人情的伍德羅·威爾遜，美國勞工聯合會領導層小圈子的思想刻板僵化造成特別嚴重的后果。

如果說時機和地位在意識形態辯論中發揮了關鍵作用的話，還有一個更深層的差異涉及到移民和種族問題。要建立與社會保險不可分割的最低補助標準，就要求統一的最低標準能夠確定下來。但是對于競相影響20世紀初期美國政策和政治走向的人來說，這并不是很清楚的。全國公民聯盟在答復外國人詢問時公開表示擔心美國保險體制怎么能設計出來，因為：“存在三種不同的貧困——土生土長的美國白人的貧困、移民的貧困、有色人種的貧困。每種貧困都和自身的工資水平、就業機會、職業教育程度有關。哪個國家的保險法案能夠照顧到這些不同社會群體的需要？”全國公民聯盟工業事故責任方面的權威P.T.謝爾曼想當然認為移民的工人賠償金補貼應該低于美國公民的，或許只有一半那么多。共同補貼標準在嚴重分裂的南方，在反華、反日情緒未消除的加利福尼亞，在有移民“種族”類別的北方工業城市并沒有平均的社會含義。以上所有這些都是阻礙采取行動的因素。[[507]](#_507_15)

以這些可精確指明的方式，北大西洋經濟體內共有的意識形態因素在美國獲得了獨特的傾向。但是最重要的差別在其他方面：利益領域的組成。不管是俾斯麥的德國、勞合·喬治的英國，還是進步人士的美國，社會保險支持者試圖要占據的壁龕沒有一處是空的。從最隨意性的石板俱樂部往上走，每一層都有權利要求者。隨著時間的推移，占據這些地位的人的組織性越來越強，索取到越來越多的讓步，越來越有效地抗拒外來的侵犯。

1880年代德國法案的起草者的背景是：工會運動在政治上激進但組織渙散，雇主利益沒有高度發達的組織表現，救濟會還沒有政治影響力，保險業還處在初創階段——所有這些優勢都是沒有辦法復制的。社會保險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德國國家多么強大，臨時決定從準公共機構的大雜燴中成立管理機構，而是因為現有占據者規模小、力量分散。

相比之下，勞合·喬治面臨的是利益領域深刻發展的局面：高度組織化的、政治上非常熟練的工會運動；自我意識強烈的醫療行業；擁有大量權利人的保險領域。不管是商業保險還是兄弟會保險都要維護自己的領地。正是因為這些區別才迫使把醫生、友好協會，以及最終1911年把工業保險公司拉攏到健康保險管理中，就像這些區別促使把工會拉攏到失業保險管理中一樣。在許多領域已經被其他機構占領后才成立英國保險機構，大量吸收了早先存在的機構進入自己的組織。

在美國，既得利益團體的組合再次出現差異：工會相對來說比較弱，而且內部分裂；自愿性保險兄弟會非常膽怯，在政治上幾乎沒有影響力；醫生更加獨立；大企業組織效率要強得多；商業保險公司手法高超嫻熟，攻擊性強。差別不是完全的；問題不是某一因素存在或者不存在，而是社會保險支持者企圖要樹立公共形象的領域中的總體構成。最終，沒有什么比這點更重要了。

首先是企業界。俾斯麥和勞合·喬治都依靠個人的、家長制特征的雇主的支持，并不害怕模糊私人和國家家長制的界限。兩者都沒有遭遇組織起來的全國性雇主協會。在英國，雇主議會聯盟在1911年《國家保險法案》通過后馬上成立，正是為了彌補法案起草所顯示出來的企業影響力有限情形。相當于美國“全國制造商協會”和“全國公民聯盟”的英國機構——“英國制造商協會”和“英國工業聯盟”，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才成立。然而在美國，雇主政治組織在社會保險辯論之前就出現了，因而在辯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全國公民聯盟承諾推行社會和平戰略，采取與工會合作的措施，把工人賠償法案當作其主要事業和標志性勝利之一。但是沿著這條路線采取進一步的行動就不是他們愿意做的了。該聯盟激烈反對成立國家工人賠償保險基金。至于籠統的社會保險，該聯盟的工作人員1912年時還認為這種想法“非常危險”。他們1914年派往英國考察新健康保險體系的勞資代表團報告說它不管是從財政上還是道德上都破產了；反對在美國進行類似實驗的時候，該聯盟是強大和卓越的宣傳家。[[508]](#_508_15)

人們可能容易假設大企業是反對公眾干涉它已經攬到自己身上的事務，但實際上并非如此。1917年前的美國公司健康計劃提供的保護非常粗劣。雇主建立的養老金非常罕見，在對馬薩諸塞州雇主進行的調查中，362家企業中只有4家提供養老金。但是未來眼光能夠與實際利益同樣讓人積極占據一個領域，就像土地投機者等待建設時機一樣。雇員補貼體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美國沒有多大聲勢，但是它足以讓雇主極端妒忌這個領域的競爭性的先行者。[[509]](#_509_15)

像雇主一樣，醫生在利益領域中占據的位置也是美國和其他地方不同的。在德國，19世紀末期醫療專業化是在已經成立的公共健康保險體制框架內形成的。與救濟會簽合同從事醫療工作是剛開業的醫生為了生存肯定要做的事情，也是不可缺少的步驟。在世紀之交的英國，與友好協會簽約工作是英國醫生生活中幾乎同樣重要的組成部分。這并沒有減緩醫生在《國家保險法案》談判中采取的激進態度，也沒有阻止醫生針對威廉皇帝時代德國的救濟會規定舉行的罷工。但是在這兩個國家，在簽約工作經驗框架內的醫生政治把注意力集中在從擴張的國家權力中撈取更大管理權限。在美國則相反，獨立的私營診所是常態，簽約醫療服務很少見。到1917年前，由地方組織起來的醫生采取措施激烈反對簽約工作，尤其是公共簽約行醫；他們反抗醫療協會領袖在即將到來的健康保險體制內爭奪權威。這里在“德國造”指控背后同樣存在要保護的利益領域。[[510]](#_510_15)

但是，在所有游說團體中，毫無疑問沖在最前面的是商業保險公司。他們的代理人群體遍布每個城市和鄉鎮，他們動用一切力量宣稱法律上新確定的保險領域都是自家領地。是他們反對州委員會的推薦，撬開馬薩諸塞工人賠償體制，讓私人保險公司在1911年參與進來。俄亥俄1913年推行的州壟斷工人賠償基金法案讓保險業狼狽窘迫，但是它的反應是確保其他主要工業州不要步俄亥俄的后塵。一個企業游說團體“工人賠償宣傳局”在1913年到1929年運用反對國家保險基金的論點圍攻政策制訂者。“美國保險經濟學協會”在1916年后做了同樣的事，反對美國勞工立法協會的健康保險宣傳活動。企業利益涉及眾多議題；醫生們最初有意見分歧；但保險公司基本上是用同一個聲音和力量講話。

可以肯定，保險公司對社會保險事業的敵意因改革者對它們的仇視而進一步加深。1905年人壽保險行業金融騙局被揭露，事故保險公司在工人賠償辯論中扮演蓄意阻撓的角色，以及“工業保險”公司讓人吃驚的管理費用的曝光，這些都讓保險公司在進步改革者心中的形象受損。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勞工立法協會并不同情英國讓商業保險公司進入健康保險立法的妥協做法。該協會在其健康保險法案中添加便宜的喪葬補貼，很明顯是要搶去商業保險公司在工人階級中的生意。大東方保險公司告訴代理人1916年的紐約健康保險法案敲響了“所有保險公司和代理人的喪鐘，對你個人來說意味著花費一生時間建立起來的生意和客戶關系被徹底破壞，也意味著失去黃油面包”。這當然是比較夸張的說法，不過里面確實有一定的道理。[[511]](#_511_15)

但是，明目張膽的反對并不是保險公司唯一的對策。20世紀初期在銷售團體“工業”保險單方面占主導地位的兩家美國保險公司（大都會和保德信），合起來占有市場80%的份額。[[512]](#_512_15)其中比較大的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在1910年有超過一千萬份保險單，它并不只管積累自己的領地，而是警惕地關注著可能的競爭者。公司警告代理人說，只有讓投保戶數量翻一番（驚人的比例，即全國每五個人就有一個持有大都會公司的保險單），他們才能在面臨國家保險威脅時感到安全。與此同時，該公司確定了先發制人的策略。在1909年，它挖走了仍然在為拉塞爾·塞奇基金會進行歐洲工薪族保險調查的李·弗蘭克爾來負責公司新的“福利部門”，試圖證明社會保險是多余的。

該公司所說的現在不再以贏利為目標，隨著弗蘭克爾的任命而進入“當今世界思想的洪流”顯然是夸大其詞的吹噓。但是弗蘭克爾確實帶領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積極進入保險業以前一直忽略的新領域。在他指導下，公司分發了數百萬份公共健康傳單，包括結核病防治、兒童照顧，甚至《蒼蠅生活的一天》——這是保險代理人連帶免費蒼蠅拍贈給客戶家庭主婦的東西。該公司與亨利街睦鄰中心的麗蓮·沃爾德合作，為投保戶提供上門醫療服務，當然這要由代理人斟酌，認定醫療服務似乎是可以防止保戶過早死亡和提前使用保險金的一種謹慎投資。該公司比較緩慢地開始實驗雇主的團體保險單，首先是團體人壽保險，接著更謹慎地嘗試團體健康保險。弗蘭克爾在此過程中一直是讓人困惑的公共人物，他在實際上反對國家社會保險措施，但在原則上不愿意譴責它們。保德信公司的弗里德里克·霍夫曼認為他“非常危險……不是保險公司的人，仍然扮演著一直擔任的角色——社會改革者”。不過霍夫曼有自己的個人企圖。比較溫和的觀察家可能認為弗蘭克爾代表了福利資本主義在最人性化和最強大時先發制人的能量。[[513]](#_513_15)

在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采取先發制人的行動等高端做法時，霍夫曼的保德信保險公司采取了蓄意阻撓的低端做法。在此發展中，霍夫曼本人是個復雜和讓人好奇的人物。最初他在波士頓及其周邊工人階級街區銷售工業保險單，1890年代初期來到弗吉尼亞一家保險代理公司工作。雖然是沉溺于當時種族“科學”的人，霍夫曼還是敏銳地認識到南方黑人這個作為精算上的未知數而被大商業保險公司忽略的人壽保險市場。霍夫曼自己開始制作可用的死亡率表格，四處尋訪墓地收集壽命數據。他的工作引起保德信公司總裁約翰·F.德萊頓的注意，很快聘請他作為調查統計師、常駐公司的專家、總裁顧問、負責與學術界交流的特使。霍夫曼是美國經濟學家學會、美國慈善和矯治會議、美國公共衛生協會、國際結核病協會、全國公民聯盟的活躍會員，當然也是美國勞工立法協會的會員。當美國勞工立法協會任命他為1913年社會保險委員會負責人時，他自豪地說當選者是他而不是弗蘭克爾。[[514]](#_514_15)

但是霍夫曼作為“保險業者”的特色太濃了，根本沒有認識到社會保險除了作為市場競爭者之外還能是別的東西。他第一次接觸社會保險辯論是在1900年，當時保德信派他到巴黎安排公司在博覽會上的獲獎展覽。在國外看到的“危險”信號使他一直比較悲觀。他認為保險公司加入到英國健康保險體制內的做法在本質上是不穩定的。政府遲早會把葬禮補助添加到自己的健康保險項目上，一星期幾個便士就可以了。這將是管理費用高昂的工業保險行業的末日。在他看來，1912年的德國由于公共葬禮服務和喪葬保險項目而充滿活力，肯定能用非常便宜的保險費率搶走他公司的保險單。在每周都寫的匯報信中，他給上司提供了大量建議，基本上是和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做法相似的先發制人行動：把公司業務拓展到沒有開發的商業健康保險領域、聘請公司醫生為保險客戶提供醫療服務、公司基金投資低成本住房建設等——任何措施，只要能提高公司的公眾形象，消除他在海外看到的“威脅”。[[515]](#_515_15)

保德信保險公司為霍夫曼提供的角色和弗蘭克爾的不同。在美國勞工立法協會社會保險委員會，他成為本公司的防波堤。在工人賠償問題上，他的觀點和美國勞工立法協會的核心觀點相距不遠；因為事故保險不是保德信公司的業務范圍，他在工人賠償辯論中沒有提出辯護意見。在反對女性上夜班或者從事危險工作的法案上，他和協會都完全贊同。但是健康保險的第一聲利益雜音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他在美國勞工立法協會社會保險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后寫信給德萊頓說：“我自己的立場當然是絕對中立的，但我也有充分的寬容，以免讓人產生反感或者懷疑我過多受到與保德信公司的關系影響。”在謀略上勝過道森和魯賓諾（他認為是委員會中最“危險”的人），霍夫曼被認為是在1913年美國勞工立法協會社會保險大會上封殺任何決議的功臣。在起草協會的樣板健康保險法案期間，他腳步拖沓，故意阻礙；一面徒勞地敦促保險公司主動參與醫療保險領域，并告訴他的雇主們，他越來越肯定公共健康保險“特別險惡，是對我們利益的巨大威脅”。[[516]](#_516_15)

到了1916年，他在保德信保險公司的祝福聲中辭去委員會的職務，公開參加到公司的斗爭中。隨后出現了暴風雪一般的文章和報道否認在美國實行健康保險的必要性，運用了大量有關健康和死亡率對比的表格和數據譴責美國勞工立法協會的宣傳“公然編造虛假內容”，揭露英國保險法案的虛偽，駁斥用歐洲先例作為證據的合理性：“如果你去過德國就可以欺騙任何人。”保德信保險公司運用傳單對各州首府狂轟濫炸。約翰·康芒斯在沮喪中抗議說，所有反健康保險的材料都“來自同一個源頭，不管是誰給你的，你可以看到所有的炸彈、所有的事實和統計數據都可追溯到美國保德信保險公司或弗里德里克·霍夫曼先生”。[[517]](#_517_15)

要不是戰爭橫插進來恰好提供了反對德國經驗的理由，要是威爾遜總統扮演了政府中有些人鼓動他扮演的羅斯福式角色，霍夫曼的努力或許會產生不同的結果。如果兄弟會和互助會力量更強大，沒有那么多分裂，如果他們能像英國一樣嘗試與政府結盟排擠商業保險對手，或者像法國一樣作為政府的附屬機構運作，工業保險公司本來可能遇到更多競爭。工業保險在美國和在英國一樣都沒有得到充分發展；倫敦和紐約的姊妹公司的關系非常密切。但是在想象中自愿互助協會的家鄉，互助保險協會的軟弱讓人驚訝，他們分裂和膽怯地守住自己狹小領地的做法給工業保險公司巨大的競爭優勢。結果，在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高端道路和保德信保險公司低端道路的夾擊下，在醫生普遍造反、企業抵抗、保險代理人動員的情況下，社會保險的鼓吹者形不成氣候。沒有可能，至少在當時不行。

利益的組合從來不是固定的。技術進步、市場變化、公共政策改變都會創造和摧毀企業的經營領域。在每次領域重組時，地位爭奪重新開始。保險應該成為獲取利潤的地方還是非商業活動場所，經營者是大公司還是小公司，是聯邦政府、州政府還是地方政府，是私人團體還是公共團體等？落后國家具有可選擇的優勢：因為落后，實驗和錯誤的成本都轉移給先驅者了。后來者趕到時，各派立場都已非常清晰，技術已經預先包裝好，并不斷精細化了，別人的經驗可資利用。這就是在某些情況下落后者反而可利用落后的優勢超越先驅者的原因。19世紀的美國和德國生產商把借來的技術用在新工廠上反而具有了超越英國對手的能力，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還有在社會政治領域，英國有能力借用丹麥和德國經驗在1908年到1911年的社會福利提供方面超越德國。正如勞合·喬治展示的，后來居上的競爭優勢決不可小覷。

但是如果說落后國家有明顯的優勢，落后的風險就是可能會排除某些選擇。當選擇的時刻到來時，采取行動的范圍或許已經被預先設定了。籬笆可能已經在地上插好了，不管占領者在履行工作時表現是好是壞，要把他們趕走是非常困難的。如果說勞合·喬治政府能夠用超過俾斯麥的視野和大膽來計劃，因為同樣那種局勢處境，也會要求他與已經存在的利益集團進行更多的妥協。在美國，社會保險運動的專家利用落后優勢從歐洲搜羅教訓和靈感，但是該領域集中了太多既得利益者，社會保險的推動者根本就無法取得突破。在城市服務領域，在都市土地和房屋市場，商業設施供應者和房地產投資者早已占領了這些領地，事實如此。政治落后的劣勢是，當這個議題最終列入政治選擇的議程時，作出有效決定的時機也許已經過去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十年里，人們不可能看不到美國在社會政治議題方面異常迅速的擴展。不過志向的改變多于立法變革，立法變革多于利益排序的變更。把工人賠償法案納入政治，不管是對英國式還是德國式社會保險來說都不是有效的楔子。一旦工作事故和雇主責任的危機解決以后，剩下的內容就基本維持原樣而已。窮人是遙遠的另外一個國度，工薪族的風險只是略微減少了些，工人階級家庭和赤貧家庭之間的安全網仍然漏洞百出。落后的劣勢好像注定要超過落后的優勢——除非戰爭改變利益組合的領域，除非戰爭讓美國更像歐洲。

# 第七章 戰爭集體主義

## 1914年的歐洲

1913年夏天，《調查》的保羅·凱洛格像往常一樣尋找投稿者和觀點。在他的領導下，該雜志在過去十年中已經從慈善組織活動的喉舌成長為進步的社會改革思想的集散地，涵蓋的范圍擴展到增長中的社會政策議題的各個角落，包括勞工立法、社會保險、貧民窟改造、城市規劃等。但是這次凱洛格專注的不是議題而是地域。他給大西洋兩岸進步紐帶中的十多位重要人物寫信，勸說他們來年為雜志投稿。其中包括約翰·伯恩斯、漢普斯特德館和湯因比館的亨麗埃塔·巴內特、“新自由派”經濟學家J.A.霍布森、愛爾蘭土地改革者霍勒斯·普倫基特、社會主義者基爾·哈迪，以及無所不在的錫德尼·韋伯。他給這所有人都發出了同樣的邀請：給美國人“從舊文明到新文明的‘前進命令’，需要防止和避開的事、需要追求的事”。[[518]](#_518_15)

在很多方面，這個姿態概括了美國社會政治的跨越大西洋時刻的特征：它的國際主義、樂觀主義，感到美國處于國際對話邊緣，雖然不容易聽清楚，但了解別人在說什么很重要。凱洛格呼吁他社會福利新聞報道的獨特風格，“在邊疆搜索”，他的狩獵場地赤裸裸地跨越大西洋兩岸。他本人就是大西洋進步紐帶的力量甚至能改變美國中西部鄉下孩子生活的證明。凱洛格成長于密歇根州卡拉馬祖，父親在木材生意中失敗，他自己也失去對小城市報業工作的熱情，所以來到東部的哥倫比亞大學求學。1901年在紐約慈善夏日學校學習，他聽了塞利格曼、弗蘭克·J.古德諾、薩繆爾·M.林塞（都有德國留學背景）、希伯來慈善總會的李·弗蘭克爾以及紐約慈善組織協會的愛德華·T.迪瓦恩等人的課。迪瓦恩聘凱洛格擔任雜志的助理編輯。與《調查》辦公室在同一層樓的拉塞爾·塞奇基金會1907年勸說凱洛格指導匹茲堡社會調查，美國首次類似于查爾斯·布思在倫敦進行的那種調查。[[519]](#_519_15)

一年后，凱洛格來到歐洲，試圖搞明白他的調查團隊在匹茲堡收集到的資料的意義所在。與他一起工作的還有全國消費者聯盟工作人員鮑林娜·戈德馬克、忙于為紐約市擁塞問題委員會收集資料的本杰明·馬什。凱洛格采訪了約翰·伯恩斯、薩繆爾·巴內特，還參觀了萊奇沃思，考察了柏林合作公寓的一個典范，竭力想搞清楚克虜伯為主的埃森的大家長制和匹茲堡草率方法之間的對比。在匹茲堡，殘疾工人的數量第一次由匹茲堡調查的成員系統地統計。簡單地說，凱洛格從密歇根老家進入社會改革的國際舞臺，在1913年他已經成為進步世界的公民，和其他人一樣對前瞻性的和新鮮的事務有敏銳的感受力。[[520]](#_520_15)

但是在歐洲進入戰爭前十二個月時，凱洛格好像根本沒有意識到任何崩潰的跡象。他寫到，舊世界跑在了新大陸前面。當然，凱洛格的歐洲熟人對未來也沒有更清楚的認識。霍布森后來回憶道：“1914年夏末的戰爭對我們來說是可怕的意外，幾乎沒有人相信它的到來。”[[521]](#_521_15)那時候沒有人看不到對立加劇的民族情緒、瘋狂的軍備競賽，或者國際外交越來越激烈的交鋒，但是就像1900年巴黎世界博覽會公開展示的一樣，競爭并不妨礙積極吸收利用對方社會政治的發明和經驗。競爭在跨越大西洋的政治中天生存在，給戰略和思想的國際流動提供了能量。僅1914年安排的各種形式的國際會議就達兩百多場。[[522]](#_522_15)就在戰爭宣言發表前夕或者之后，美國人的歐洲熟人還深深處在戰前的計劃和野心中呢。霍布森有充分的理由稱戰爭是“1914年的意外”。

實際上，1914年夏天，美國進步人士遍布歐洲各地，在尋找許多人希望可以成為自己未來事業的東西。全國住房協會的研究小組1914年7月來到英國。因為伯納姆頭腦中還沒解決的議題，芝加哥鐵路車站委員會派遣一個龐大的代表團到歐洲考察一體化城市鐵路設施的問題。當年夏天，沃爾特·李普曼在英國竭力鼓動作者們為新的進步雜志《新共和》供稿。全國公民聯盟調查歐洲健康保險項目的委員會也在英國，正打算在8月初跨越海峽到德國去。在所有代表團中野心最大的是教育旅游協會的“公民和社會旅游團”，他們68天的全歐洲進步事業考察計劃涵蓋了從德國社會保險到法蘭克福城市分區規劃，從比利時梅爾克斯普拉斯勞改營到法國社會博物館，從倫敦市政議會的城市公交車和住房實驗到英國花園城市等眾多內容。該旅游團的宣傳冊子上寫道：“舊世界管理最好的社區的市政和社會科學比美國先進半個世紀。在現實的經濟學、社會學和公民藝術等任何方面，歐洲都可以教給我們很多東西。”為了強調這點，1914年夏天查爾斯·布思在美國與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共進午餐討論最低工資法案。[[523]](#_523_15)

在這社會政治的動議中，美國市政和社會旅游組織者緊張不安地意識到自己的落后。他們有兼收并蓄的興趣，像沿街叫賣的小販一樣往筐子里裝各種社會政策和機制，就好像這些能輕易地從一個環境移植到另外一個環境中。在這一切中貫穿著一個共同的主題。從美國大學生對歐洲體現的“社會性”感到振奮不已，到公交線路或者工人風險的非商業化等零碎的努力，大西洋進步紐帶中許多人的目標就是更強大集體生活的元素：“團結”、“公民意識”、“社會”等。

在1914年夏天到歐洲來尋找這些營養的所有美國人中，最有趣的人是蘭道夫·伯恩（Randolph Bourne），部分因為社會政治和他最初的本意相距甚遠。戰爭前夕他更像個唯美主義者而不是進步人士，戰時作品讓伯恩成為進步左派最有才華、最有激情的作家之一，那是后來的事。當他1913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年度吉爾德旅行獎學金時，沒有理由相信他最后會像教育旅游協會服服帖帖的成員一樣，向獎學金提供者匯報德累斯頓“不同尋常的”城市屠宰場或者在菲爾特城市垃圾處理場看到的“科學資源和經濟奇跡”。[[524]](#_524_15)

伯恩的意識中并不是完全缺乏公民理想。同年早些時候他曾經發表了對自己青年時代新澤西郊區階級關系的研究：伯恩看到的是，位于底層的消極的移民工人階級，位于上層的用老鷹一樣的眼睛密切關注獲取經濟利益機會的統治階級，以及他所屬的被擠在中間的中產階級。這實際上是美國的縮影，其主要特征就是“非社會性”——完全缺乏“團體”意識。但是伯恩沒有要給吉爾德委員會提供社區結構的對比研究。他的朋友范·懷克·布魯克斯1914年在英國回憶說：“我在哈佛相識的一半遲早會出現在皮卡迪利廣場。”對于伯恩來說，大旅行同樣有巨大的吸引力。[[525]](#_525_15)

手里拿著貝德克爾（Baedeker）旅行指南，心中澎湃的是審美情感，伯恩開始了在歐洲大陸藝術畫廊和大教堂之間的旋風般的旅行。在巴黎的旅行途中，他購買了一份饒勒斯的《人道報》（L'Humanité），但是自我認識到的激進姿態很少減緩他的藝術朝圣之旅的步伐。跨過海峽來到英國后，他找到久聞大名的一位威爾士作者，開展了有關弗洛伊德的冬季大討論，盡興后主人送他前往倫敦。

在倫敦，伯恩的政治口吻激昂起來，不過并不是羨慕的語調。他在信中抱怨說：“我們從像F.C.豪威這種多愁善感者那里得到一個非常理想化的英國形象，他們描繪的英國正大踏步邁向國家社會主義。”他本人看到的英國則是讓人窒息的虛情假意。在貧民窟內嬌滴滴表演牛津風格矯揉造作的湯因比館，“是我所知道的體現英國思想徒勞無用的最精彩例證之一”。他認為錫德尼·韋伯是“用給遲鈍的孩子講算術題的耐心”講解問題的漸進主義者殷勤的典型。他確信可以在韋伯吹噓的市營企業中發現隱藏的腐敗。英國女性的普選權運動讓他感到振奮，但實際上除此之外沒有任何東西能打動他。自由黨的社會項目好像已經耗掉了所有精力和連貫性；費邊社搖晃不穩，蹣跚前行；中產階級對于爆發在他們周圍的階級斗爭麻木冷漠。“英國遭遇一連串可怕的罷工，我們指望有秩序的工會主義勝利慢慢把工人階級送到舒服和發揮影響力的位置，這種愚蠢理論每天都被駁斥得體無完膚……我們或許處于1813年而不是1913年，很難看到資本主義因為這些斗爭而受到一丁點兒的削弱。”[[526]](#_526_15)

相反，巴黎讓他感到高興，部分原因可能是他剛開始很少能用法語跟別人交談，他在巴黎只能通過眼睛而不是聆聽韋伯式社會算術來了解情況。他結識了一位“研究社會學的英國婦女”，她帶領他聽演講，參觀模范廉價公寓和花園式郊區等。他愛上了巴黎，試圖尋找奧斯曼之前的巴黎的漂亮遺跡。[[527]](#_527_15)

但是真正打動伯恩想象力的是歐洲鄉村的社會建筑。他后來寫到漢普斯特德的集體主義有形實體，其“重疊和高聳的屋頂”下傾伸向周圍的荒野，就像“新文明的楔子”，“一個集體生活的實驗室”。他在歐洲保存下來的中世紀村莊中看到同樣的線索。駐足于傳統的市場，連同其城鎮、市政廳和教堂高塔，你就能獲得“社會凝聚力的強烈意識，這地方不僅是商品買賣之地，而且是社會交流中心，有堅韌交織起來的共同生活，給予所有成員援助并保持自給自足”。街道本身體現了“某些根深蒂固的對整體美和公共設計的社會敏感性”。[[528]](#_528_15)

其他人說了同樣多的話卻沒有意識到這些詞匯中包含的進步可能性。但是到了伯恩在1914年7月到達德國時，想象中的過去的社會凝聚力和可設想的未來的政治共同體已經在伯恩的頭腦中融合在一起，成為充分發展的社會政治。盡管耳邊響著戰爭即將來臨的傳言，他還是迅速穿行在現代和中世紀的德國，羅滕堡和諾德林根的古城、新工人花園郊區、烏爾姆的市營住房、紐倫堡的公共澡堂。他的目光集中在市政形式上。他要到挪威和瑞典——“那里有這么多先進的社會法律和機構”，然后在8月去參加在維也納舉行的國際社會主義者大會。戰爭爆發時他還在柏林，所以趕緊連夜坐火車到邊境去。[[529]](#_529_15)

在德國的短暫停留讓伯恩表現出截然相反的兩種反應。他討厭德意志帝國的軍國主義、物質主義和咄咄逼人。他在德累斯頓時寫到“德國人心中有一種我說不出來的東西，但是我知道我不喜歡”。雖然他羨慕德國最新建筑的大膽和雄偉，坦率承認“對其市政科學非常著迷”，但他給母親寫信說如果再也不來德國，他會很高興。但是過了不到一年時間，伯恩開始對比德國繁榮的“社會”和“公共”形式與美國的“混亂和野蠻”。“一團亂麻般無盡頭蔓延的城鎮似乎不是城鎮而是聚居區的零碎嘔吐物”——如果按美國這種“混亂和野蠻”來衡量，德國城市簡直就是“公民藝術和設計的典范”。它們“在政治上是非民主的，在政策和精神上卻是極端民主的”，給予其市民“真正需要的東西，遠比我們的民主體制能夠給人民的東西要多”。為了解釋德國城市的秘密，伯恩又使用了弗里德里克·豪威的內在“社會意識”這一術語。[[530]](#_530_15)

進入1915年，在編輯越來越不耐煩的情況下，伯恩繼續進行“我們在美國已證明只能導致財閥統治的個人主義民主”和德國那種“真正的社會民主”之間的對比。他說：“德國人似乎真的相信共同體擴散的美麗和福利優越于任何個人興趣和利益的考慮。除了在德國以外，你能在哪里找到……處處繁榮，看不見貧民窟的蹤影，城市、村莊和鄉村干凈整潔，就好像一只看不見的公共巨手在不斷修補、清洗和裝飾？”H.G.威爾斯曾經贊嘆的“偉大國家”，還有哪里如此接近理想的實現？[[531]](#_531_15)

伯恩承認德國人實現的“偉大國家”也有嚴峻和殘酷的一面。再過兩年，當伯恩看到美國戰爭國家的巨手殘忍地打在不聽話的人身上，他將用全部的精力批評國家權力。但是現在他沒有談論太多政治，甚至沒有談論德國，只是談論理想。在他的心目中，他用來建造跨越萊茵河的對立原型的不僅是德國城市效率或者中世紀的美麗，更多的是他對一種超越私人利益陷阱的社會制度的渴望。和豪威不同，伯恩不敢肯定人們是否能在沒有德意志帝國的軍國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情況下獲得公民意識。他比“公民和社會旅游”組織者更講究實際，對人們從文化框架內提取任何一塊兒社會機器部件的做法缺少信心。他不想把德國做法引進到美國，即便是經過挑選的片段。他想用想象中的中世紀城鎮和自己心中塑造的德國做鏡子，表達對本國骯臟的、反社會的政治文化的輕蔑和尷尬。在同胞們攻擊德國的社會理想之前，讓他們先創造些更好的東西吧。

伯恩后來寫到，他1914年的旅行回頭看來就像“在火山口邊緣蹣跚學步的天真孩子”。他看到“天真幼稚者在歐洲可能看到和感受到的東西，這一年，在火山爆發前最后時刻那讓人窒息的安靜”。[[532]](#_532_15)他也感受到1914年之前和之后吸引這么多美國進步人士到大西洋紐帶中來的力量。在他們一半親眼所見一半想象出來的連貫圖景中，統一性是關鍵：一種共同的集體意識，有機構和視覺形式與之相吻合。沒有一個美國人預料到他們也會卷入歐洲的火山爆發，順著火山口的邊緣滑進去，獲得自己的統一性內容。

1914年8月熔巖噴發而出后，多數美國進步人士對戰爭的開始感到震驚和困惑。沒有一件事情是在意料之中的，更加意外的是國際調解和斡旋徹底終止，以及橫掃柏林、倫敦、維也納和巴黎的激進民族主義。《新共和》的編輯在一年后總結說是對歷史深層問題的注意誤導了他們：“我們研究比較政府，了解勞工運動和各國家選舉權推廣的輪廓，我們一貫認為民主、普選權、權利平等、社會立法正像仁慈的疾病在一個個歐洲國家中蔓延開來。”推動歷史前進的是經濟和社會力量，而不是返祖性的民族主義力量。“我們更愿意看到歐洲國家一個接一個沿著民主進步的直線，盡力朝同一個方向前進。”[[533]](#_533_15)

看到作為社會政治先驅的歐洲各國陷入戰爭旋渦，對美國進步人士來說確實是痛苦的。伯恩在8月底寫道：“時鐘的旋轉在歐洲徹底停止了，我如此欽佩的文明顯然要被撕為碎片，以至于在戰爭結束和生活重新恢復正常前，我甚至不愿意考慮歐洲了。”進步思想的記者雷·斯坦納德·貝克在筆記中透露：“自從戰爭開始，我覺得自己的思想陷入前所未有的惴惴不安。每個確定性的東西似乎都進入了熔爐。”[[534]](#_534_15)

在戰爭爆發后的幾個月里，進步社會議題的崩潰剛開始似乎是絕對的、普遍性的。在德國入侵比利時一個月后，約翰·海恩斯·霍姆斯在《調查》中問道：“如今的英國還有誰在談論國民保險、女性選舉權，或者打破土地壟斷呢？德國爭取專營權改革的運動在哪里？誰在乎比利時的合作社、法國的工團主義，或其他任何地方的社會主義？……在美國還有誰在這時候思考娛樂中心、住房改善，或者最低工資標準呢？誰來爭取寡婦的補助金、推動禁止使用童工的運動、深刻研究失業問題？”總而言之，誰“還把社會運動放在心上”？[[535]](#_535_15)

面對這種沮喪，美國進步人士試圖弄清楚他們是如何誤讀了歷史標志。正如在多數思想危機的時刻，重要的不是改變其看法的基礎而是要重新組合最少的部件，設法把在他們面前爆炸的那一塊包含在內。最簡單的思想策略就是把德國劃分成兩個共存的國家，一個是進步的，一個是反動的。這條界線在豪威等人戰前的文章中就十分常見。進步的德國總是被描述為一個充滿自由思想、以都市為基礎的國中國，位于容克貴族統治的、受普魯士支配的古老帝國內。許多人現在得出結論說，崇拜德國公民生活的進步人士對于內部德國的前景判斷沒有錯，但是可悲的是，他們錯誤地估計了它突破周圍政治外殼的能力。進步人士的評論中存在一種急不可耐的情緒，要把戰爭責任歸咎于容克貴族的“中世紀遺風”、歐洲君主和“戰爭軍閥”。[[536]](#_536_15)

概念困境特別困擾著在德國留過學的美國教授。對于其中許多人來說，“兩個德國”的論點提供了可以逃避沮喪的出口，但是德國人明顯的強烈團結讓人很難堅守這條線。德國社會主義者和進步人士對戰爭未加反對、軍事象征的泛濫、透過第一手材料看到的決心和目標的統一性，都使得把德國分成現代和返祖兩部分的努力復雜化了。更痛苦的是，1914年10月約一百名德國杰出知識分子簽名發表公開信為入侵比利時辯護，他們堅持認為劍和思想的事業、德國軍事力量和德國思想文化是不可分割的整體。簽名者包括德國大學中的精華，如古斯塔夫·施穆勒、約翰內斯·康拉德、弗里德里希·瑙曼，甚至路約·布倫坦諾。[[537]](#_537_15)

在最強烈崇拜德國的地方，認識到老師的背叛這個現實最讓人痛苦。戰爭開始兩年后，西蒙·帕滕仍然努力尋找能為親德國的信仰辯護的根據。他承認“新德國哲學”一直是“我的宗教”，用來抗衡追求自我利益的“英國”理想，它講授了社會活動的價值和“社會脈搏”。已經準備要到柏林做訪問教授的亨利·法納姆非常惱火地寫到，他的德國朋友肯定“受到可怕的強迫觀念的影響”。阿爾比恩·斯莫爾在1917年9月《美國社會學雜志》上以洋洋灑灑長達28頁的編者按表示個人絕望，最后只能得出結論說，德國人瘋了這句老話不再是個比喻而是醫學上的現實。隨著美國公共輿論開始反對德國，曾留學德國的美國教授很少人能像斯莫爾或帕滕那樣堅持原來立場那么久。伊利非常機靈地改弦易轍，幾個月來一直擂響戰爭準備的戰鼓。但是進步思想的記者在戰爭開始初期幾個月試圖尋找心理解釋，他們承認對歐洲“瘋人院”感到困惑，稱之為“非理性”的爆發、返回野蠻時代的返祖現象等，這些反應都暴露了同樣的心態。[[538]](#_538_15)

還有一些美國進步人士漸漸發現通過經濟學解釋戰爭的方法。弗里德里克·豪威1915年秋天出版概述德國社會進步的《社會化的德國》，似乎在用一個已經消失的時代的古老語言向評論者訴說；但他到了1916年已經把德國人的瘋狂，單一稅制式，歸結為經濟特權。[[539]](#_539_15)但是這些解釋沒有一個能滿意地揭開戰爭之謎。兩個德國的論點因為證據正好相反而不攻自破；德國人瘋狂的觀點本身顯然就是在心理上受到折磨的人提出的；經濟學解釋的失敗是因為進步人士中很少有人對通向戰爭的道路有足夠深刻的經濟學認識。

最終把進步人士從困惑中拯救出來的不是對戰爭起源這個奧秘的解答，而是通過希望來回避這個問題：越來越感到這場戰爭可能并沒有讓進步事業的歷史進程脫軌，不管它迂回旋轉乘客的方式多么可怕。其中部分內容是進步領域本身包含的反應性樂觀主義。甚至伯恩在1914年9月在很罕見的樂觀時刻寫道：“雖然世界的時鐘停止了，但我們可以學習很多有用的東西，至少能盼望重新大調整。”但是意識到戰爭可能帶來和平時期無法達到的某些目標，倒也并非只是天真的想法。德國把1914年8月巨大的戰爭動員能力維持到幾個月之后，遠遠超過其參謀部的預計；隨著德國戰爭經濟繼續大量生產出戰爭所需物資，如炮彈、燃料、武器、士兵，確實又有人認為有了需要學習的德國教訓。

在1916年美國軍事準備動員時，西奧多·羅斯福忍不住承認：“美國要從德國學習的東西比從其他國家學習的東西更多——比如對于非功利主義理想的忠誠，還有社會和工業效率的基礎，在現代工業主義條件下對個人保護和全民幸福絕對必要的那種社會化政府行為措施等。”沿著這些線索為德國辯護最強烈的，是特立獨行的社會主義者阿倫·本森影響下的《皮爾遜雜志》（Pearson's Magazine）。本森寫道：“傾囊下注打賭，德國效率不是建立在‘人人都為自己’的思想基礎上。德國人比任何別的國家都更進一步接受和實施了社會主義原則。”證據不在馬克思那里，而是在德國的軍事成功中明擺著。[[540]](#_540_15)

在戰爭的最初幾個月，同樣常見的是把英國猶豫蹣跚的戰爭機器歸咎于恰好相反的品質：過分強調個人自由的習慣、被自由放任思想牢牢困住的經濟。但隨著時間一個月一個月過去，英國也開始被描述成在戰爭的命令下社會化了。該工作的大部分是英國進步人士的功勞，他們給美國通訊者提供大量報道，講的是他們自己愿意相信和美國人希望聽到的內容。《新共和》是這種報告特別重要的渠道，因為里面有大量英國通訊員，包括J.A.霍布森、H.G.威爾斯、格雷厄姆·沃拉斯、哈羅德·拉斯基、諾曼·安吉爾、阿爾弗雷德·齊默恩。在《新共和》出版的第一年度，即1914—1915年，查爾斯·福塞估計四分之一以上的投稿都是來自英國紐帶。這些撰稿人中沒有一個做出對英國戰爭動員不加批評的描述，但是報道滲透過來的情況，比如合理規范戰爭期間勞動市場、動員工業生產的努力等，形成了英國社會政策在發生遠比1906年到1911年立法更加激進的巨大改變的印象。英國社會工作者宣告了戰爭爆發后橫掃英國的“緊密團結”的到來。“英國真的開始紀律嚴明起來了。”美國記者雷·斯坦納德·貝克1915年8月寫道。“社會主義者夢想中多年后才能出現的條件一下子產生出來了。”[[541]](#_541_15)

不是所有的進步人士都肯定戰爭的社會好處是真實的——或者（即便是真實的）值得如此可怕的無休止的殺戮。女性進步人士對戰爭的社會性影響比男性同行更加懷疑，常常迫切希望到戰爭前線親眼看看。1915年肩負徒勞的和平使命到德國，愛麗絲·漢密爾頓描寫了她看到穿著德國軍官制服的阿爾伯特·蘇德庫姆時多么驚訝，兩年前她曾在赫爾館見過這位社會主義者公民改革家。負有同樣使命到這里訪問的瑪德琳·多蒂看到歐洲到處都是殘廢。硝煙熏黑了的窗戶在哀悼，灰色救護車“無休止”地穿行，城市失去了年輕人，反戰的社會主義者在柏林偷偷摸摸、提心吊膽地聚會。給她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這些景象而不是社會團結。[[542]](#_542_15)

社會主義者知識分子也懷疑“戰爭社會主義”改變歐洲的論調，但是有自己非常不同的理由。他們一直堅持“社會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巨大差別。差別在于前者的制度是所有權在群眾手中，而后者經濟結構的核心部分掌握在國家手中。但是，在社會主義者和進步人士觀點匯合的地方，就連這些差別也因為戰爭的熱度而融化了。

威廉·英格利希·沃林對于越來越多“戰爭社會主義”討論特別不情愿的接受，便是很說明問題的例子。從事十年的進步事業后在1910年成為社會黨黨員，沃林成為特別警惕地揭露真假集體主義差異的人。針對社會主義改良派的任何計劃——密爾沃基式的社會主義城市夢想、費邊社的市營化項目、比利時社會主義合作社，他都提出了“國家社會主義”的指控。沃林反駁豪威的說法，認為對于德國更恰當的詞匯不是“社會化”而是“政府化”，或者更準確地說，容克貴族控制下的“階級組織化”。控制是關鍵。只要資本仍然掌權，認為資本主義國家的公共所有權會帶來任何根本改變的想法就是“愚蠢的”。[[543]](#_543_15)

但是在戰爭出人意料的改變中，在沃林看來，社會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界限也變得模糊了。1914年他曾發表了對國家社會主義更加正統的論述，確定它在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本身”的歷史發展時期中的順序，每個階段都是下階段“絕對不可缺少的準備”。社會主義者現在面臨的問題是，戰爭期間的經濟動員到底代表了歷史路線的前進還是后退。在1915年和1916年，由于愛國主義不斷增強，沃林對于“戰爭社會主義”逐漸表現出越來越樂觀的情緒，他與自己所在的政黨也發生激烈沖突。他警告說“僅僅國家化”不是社會主義；他擔心戰爭被用來作為馴服勞工運動的棍棒；但是到了1918年，沃林認為戰爭“100%或者1000%地”增加了實現真正民主集體主義的機會。[[544]](#_544_15)

如果一個像沃林這樣特立獨行的社會主義者都能拋棄國家社會主義和真正主義內容的區分，進步人士轉向戰爭集體主義的道路就更容易了。在1915年初期，《新共和》編輯仍然提醒讀者說，海外“大規模滑向集體主義”不過是“國家社會主義”的風潮——是“沒有任何真正內容”的社會主義的獨裁者偽裝。“強迫命令下的集體主義和激進民主集體主義是兩碼事。”雖然如此，看看歐洲交戰國在戰爭中形成的社會組織，再對比《新共和》編輯在1915年秋天概括的“我們現在解決失業、疾病、老年、育嬰等的笨拙方法”，很難否認如下結論：戰爭集體主義已經夠好了。[[545]](#_545_15)

慢慢地，落后論的想法又浮現出來，歷史之箭被重新弄直了。《新共和》編輯在1916年末抱怨說，美國還要“糾纏在19世紀工業混亂”中多長時間呢？沃爾特·李普曼1917年3月在《新共和》社論中說“和世界上其他偉大國家相比”，

當今美國在組織上是最落后的國家之一，思想上是最膽怯的。不管戰爭還帶來了別的什么，它至少教給英國、德國、加拿大和法國：大規模行動是可以計劃和實施的，現代國家必須用大量金錢思考，法制主義和自由放任的傳統顧慮和教條是老人的幽靈……在經歷最嚴峻的考驗后，進步國家已經發現從前那種無組織的追求利潤的競爭是不健全的、浪費的……但是美國在沒有國有鐵路和船運的情況下艱難前行，其礦產資源沒有社會化，水資源被剝削，基礎工業匆匆進入競爭，食物分配是一團亂麻，教育體制嚴重匱乏，工人組織半半拉拉、組織渙散、在社會結構中得不到承認。[[546]](#_546_15)

克里斯托弗·拉希把戰前進步人士特征描述為不安地圍繞權力中心旋轉，對于沒有行動感到沮喪，從心理上說不能接受戰爭可能令人采取的中性立場。[[547]](#_547_15)但是他們渴望的不是權力本身，而是戰爭社會化的歐洲國家典范。伍德羅·威爾遜在1917年沒有僅僅給予美國進步人士一套理想化戰爭目標。經過多年讓人沮喪的政治努力，他為他們提供的是戰爭集體化國家的可能性實驗。

許多進步人士領袖充滿希望地抓住了這個機會。沃爾特·李普曼在美國宣戰不足一個月時寫道：“我們站在集體主義的門檻上，它比任何一個社會主義政黨計劃都更偉大。”約翰·杜威在紐約《世界》雜志上說：“私有財產……已經失去了其神圣性。”進步記者威廉·阿倫·懷特同年夏天心滿意足地說：“剝削制度的基礎遭到破壞。”這種巨大變革的意識在進步人士對戰爭的理解中非常關鍵。豪威早在1915年就寫到，戰爭代表一個歷史過程，危機過去后沒有一個工業化國家能夠恢復到戰前的個人主義。[[548]](#_548_15)

這種對歐洲戰爭的解讀，這種對戰爭帶來社會變革可能性的信念，要求許多進步人士暫時拋棄權力分散論者的本能。他們對城市、社區、公共強化互助機構的著迷暫時被包含共同利益的民族國家概念所替代。有些進步人士在巨變面前猶豫不決，陷入痛苦的孤獨中。到了1917年秋天，看出太多問題的伯恩痛苦地寫到“美國半軍事化的國家社會主義的傾向”。[[549]](#_549_15)因為戰爭經歷而突出的民主控制問題很快就會回來，這讓有些進步人士去尋求更牢固的民主基礎——這個基礎不是建立在沒有階級的公民團結概念上，而是與工人階級結盟的英國式基礎上。抓住戰爭集體主義機器并使其民主化，這成為進步人士的希望和挑戰。

但當時，戰爭期間社會控制的勢頭非常強大。費城城市研究局的內瓦·德爾道夫參加了1917年12月各個社會科學協會的年會。她勝利地報告說，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信念：“自由放任死了！社會控制萬歲！”[[550]](#_550_15)

在整個大西洋世界，戰爭期間政治經濟的變革確實影響深遠。任何地方的老規則都發生了沖突，爭斗的社會黨派被套上國家控制的韁繩，市場大幅度縮小，公共事務領域戲劇性地膨脹。但是有時候提出的觀點——戰爭是公共福利最好的朋友和最主要的歷史推動力，這個說法是經不起推敲的。[[551]](#_551_15)重要的不是戰爭本身而是斗爭的經濟化。如果勝利像普法戰爭那樣迅速，也就是德國戰爭計劃者希望復制的結果，那么這場戰爭根本不會給社會政治帶來任何影響。因為雙方陷入僵持階段，機動性戰爭轉變為生產性和物資裝備性戰爭，這成為決定區別的關鍵。在1914年秋天，法國陸軍部要求每天生產100,000枚火炮炮彈，到了1918年初，因為部隊仍然陷在戰壕中，陸軍每天需要的炮彈是278,000枚。戰爭物資的超強生產需要迫使交戰國政府越來越深地卷入經濟控制、物資和勞工組織，最終是社會改良——為了保持生產機器的正常運轉。[[552]](#_552_15)

最先出現的是供應組織。自從國有制的軍事用途在1870年明朗以后，德國就一直在購買鐵路系統。在英國和法國，私人所有的鐵路系統在宣戰后幾天內就處于政府管理之下。煤炭、食品、船運遲早要納入國家控制之中，因為計劃者在努力解決分配問題。為確保原材料供應和戰爭物資生產的優先權，涉及到關鍵性戰爭物資的命令型經濟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出現，在德國非常迅速，英國和法國則有些猶豫。沒有一個民族國家設置負責這個任務的政府機構。在缺乏現有國家機構的情況下，大批商人涌進柏林、巴黎、倫敦和華盛頓來負責戰爭經濟公司和戰爭生產委員會，他們運用國家權威發布指令。戰爭爆發時草率營造的經濟控制體系往往被認為效率不如戰爭系統化外表顯示的那么高。在戰爭經濟委員會內部，商人—政府官員眼睛盯著自己的利益討價還價時，就像在市場中的表現一樣。盡管戰爭期間征收超額利潤稅，但任何地方的戰爭物資供應者的利潤仍然一路飆升。經濟控制，即使是暫時的礦山和鐵路國有化，并沒有給所有權、投資和利潤的根基帶來任何變化。但是在交戰國中沒有一個繼續相信僅靠市場本身就能夠實現緊急情況所需要的效率、目的和生產的高度集中。

組織勞工比組織供應要困難多了。如果要維持戰爭物資生產的話，與勞工組織簽訂和平協議顯然是必須的。德國和法國依賴非正式的社會契約——戰爭時期愛國主義第一次高潮中形成的“城堡和平”（Burgfrieden）、“神圣同盟”（union sacrée）。在英國，在1915年初彈藥生產短缺陷入危機狀態時，政府不僅贏得了戰爭期間不罷工的正式誓言，而且還有工會工作規則的削減。在美國，政府與勞工聯合會在戰爭一開始就簽訂了協議。

雖然勞工和平的代價各不相同，但是每每都包括政府正式承認工會在戰爭國家組織機構中的正式地位，這在1914年前幾乎是不可想象的。在法國，戰爭期間的聯合政府在1914年末讓社會主義者自米勒蘭爭議后首次加入政府。在英國，第二年春天，勞工組織第一次在內閣有了立足之地，其代表進入各大戰爭工業委員會機構。在美國，家長制政府的主要批評者，勞工聯合會的塞繆爾·岡珀斯得到一個由顧問和管理機構組成的復雜組織頂峰的席位，其中多數機構至少有象征性的工會代表。到了1917年夏天，岡珀斯被安置進入國防委員會的顧問委員會；社會主義者阿爾伯特·托馬斯指導法國戰爭生產；工黨的阿瑟·亨德森進入新的英國五人戰時內閣，從外表看，政治轉型確實是驚人的。盡管在德國，作為軟化和平條件的孤注一擲的動作，直到戰爭末期才邀請社會主義者進入內閣，但社會主義者聯盟也早已悄悄地被納入到事實上的勞工管理機構中。

戰爭期間勞工政策的一面是會議桌上的象征性席位；另一面是勞工協商和調停機構的迅速發展。戰爭讓工資糾紛前所未有地公開化，成為可以公開仲裁的事。在英國，勞資談判在戰爭前是被廣泛接受的，1915年后政府參與仲裁過程顯著增多。在勞工組織軟弱和笨拙的地方，政府權威支持勞資聯合委員會組織——稱為“惠特利會議”（Whitley Councils），來理順現存的勞資申訴協調機制，阻止權力下放到激進工會管事手中，更重要的是推動了更緊密的生產合作。在美國，對工會的正式承認比英國罕見多了，政府很快批準戰爭工業的勞資談判，如果不是和工會談判的話，至少是和工廠委員會或者公司雇員協會。在集體談判最弱的德國，最終政府和企業都讓步，答應勞工選舉工務委員會的要求，除了名稱外這完全是對工會主義的讓步。

維持勞工和平的問題在于它本質上是不穩定的。因為戰爭期間通貨膨脹使得工資購買力下降，加上難以滿足的征兵需求減少了勞工供應，使得仍然在生產線上工作的工人談判力量增加，因而需要不斷做出妥協。為了控制和合理安排人力資源流動，德國政府在1916年求助于公然的征用勞工。在英國，旨在抑制戰爭工業工人轉行的 “暫離證”制度來自同樣的緊迫要求，也同樣不受歡迎。部分是作為對這些和戰爭期間其他控制措施的抵制，部分因為工會得到保護的新地位，工會會員數量在戰爭期間大幅度上升。在軍隊吸收了大量工人到前線當兵的德國，工會會員從1913年到1918年底之間只增加了14%。在英國，增加了50%；在美國（從1916年到1918年底）增加了25%；在法國，到戰爭結束時，法國勞工聯合會的成員數幾乎比戰前翻了一番。在戰爭最初幾個月中近乎絕跡的罷工1915年再次出現；到了1917年，罷工在法國、德國、英國都達到危機的程度。所有這些使工業和平的條件很不穩定，需要不斷地重新協商。[[553]](#_553_15)

鎮壓是很容易的選擇。在工廠的躁動變為激進政治的地方，不管是美國西北的木材工人還是克萊德河畔的蘇格蘭機械工人，政府都毫不猶豫使用在戰爭剛一開始就抓住的宣布緊急狀態的權力。在法國，社會主義者部長們在戰爭的第三年因為“神圣同盟”（union sacrée）在沖突的壓力下分裂而離開聯合政府。但是在其他地方，為了維持戰爭初期的團結局面，在和平時期可能受到強烈抵制的妥協條件開始被填進脆弱的勞工和平框架的缺口。最低工資和最高工作時間法案在政府授權下得到推廣。在德國，國家養老保險資格的（高得不受歡迎的）年齡要求從70歲降到65歲。更加戲劇性的是，皇帝在1917年德國罷工最高潮時宣布，作為戰前德國政治基石的三個階級普魯士選舉制度在戰爭結束后可重新協商。

讓德國政治關系走上談判桌的形勢同樣推動了對女性政治的讓步，因為她們大量進入戰時生產工作領域。在英國，1918年選舉權法案最終把選舉權普及至所有成年男性，也把投票權推廣到超過三分之一的成年女性。在美國，伍德羅·威爾遜簽署女性的選舉權修正案也是建立在同樣的戰爭形勢基礎上。在戰爭意外拉長和不穩定的情況下，政府對生產的關注能夠產生非同尋常的效率。[[554]](#_554_15)

同樣非常重要的是，戰爭把進步人士從社會政治的競爭邊緣拉入戰爭國家迅速增加的社會機構中。1914年約翰·海恩斯·霍姆斯感到絕望：需要“許多年”以后才能在這塊土地上再次聽到社會工作者的聲音。[[555]](#_555_15)實際上，政府到處招募社會工作者來支撐社會和平。在西伯姆·朗特里領導下的英國軍需部福利科里面就有大量進步人士。甚至戰爭初期的普魯士戰爭部也從“社會改革協會”招募大量勞工專家。

在美國，社會進步人士被大批納入政府或者準政府服務機構。陸軍因對衛生、士氣、福利等方面專家的需要吸收了許多人。其他人則被作為勞工關系專家、調解員、工業福利專家、勞工標準制訂者受到招募。全國消費者聯盟中的許多成員被聘來監督對戰爭期間女性新工人的管理。赫爾館的格雷絲·阿伯特在戰爭勞工政策委員會中負責戰時執行關于童工的規定。約瑟芬·戈德馬克擔任全國國防委員會疲勞問題專家，她的妹妹鮑林娜·戈德馬克被任用為鐵路管理局女工特別部經理。弗洛倫斯·凱利本人擔任戰爭部勞工標準控制委員會成員。拉塞爾·塞奇基金會的瑪麗·范·克利克成為勞工部女工局的局長。亨利·西格則成為造船業勞工調節委員會的秘書。李·弗蘭克爾和美國兒童局的朱莉亞·拉斯羅普參與起草政府的戰爭風險保險法案——這是聯邦軍人和海員的自愿性人壽和殘疾保險項目，有意識與內戰的補助金制度區分開來，作為社會保險原則的重大突破而廣受稱贊。[[556]](#_556_15)

在社會和經濟的妥協與控制的錯綜復雜網絡中，誰來控制戰爭期間集體主義這個問題是無法完全被壓制的。在戰爭的緊急情況下靠市場力量顯然是不夠的，但是經濟力量放在誰手中，不同的國家做法不同。在德國，軍方擔心政策問題落入議會之手，最終把幾乎所有關鍵權力抓在自己手里。在英國，政府當局開辟出異常龐大的自治領域，軍需部那個由勞合·喬治創立的龐大帝國，直接擁有和管理著機械和彈藥工廠，是在任何別的地方都沒有的。在法國和美國，對戰爭經濟的指導主要落在了企業身上，要么通過緊急借用的經理們組成的委員會，要么通過戰爭鼓勵形成的卡特爾。R.H.托尼后來有關英國戰爭經濟的話在任何地方都是真實的：“盡管規模巨大、異常復雜，它幾乎完全是臨時拼湊起來的。”這個事實在很大程度上把戰時經濟管理和從前存在的經濟學結構、所有權和力量結合起來。[[557]](#_557_15)

但是如果說國家、軍隊、企業因素的組合在不同的戰爭集體主義經濟中各有不同的話，家族相似性更加讓人注目。它們的共同特征不僅僅是對戰爭需要的自動反應。即使在戰爭期間，它們的相似性也是建立在相互吸收和借鑒對方設計的基礎上。在戰爭初期失誤頻出的幾個月里，英國報刊稱贊所有經濟力量總動員的德國模式。由于對德國組織非常感興趣，勞合·喬治在1916年后期從軍需部調到首相辦公室之后進行了大改組，推行一系列集中權力的改革：緊急煤炭國有化、成立新的食品部、加大航運控制、縮減戰時內閣。英國還向法國戰爭經濟管理者施加壓力，要他們實行更緊密的控制。

美國人最后進入戰爭，并從落后的優勢中獲取大量利益，以超乎尋常的速度采用了其他交戰國的常規做法和先例。英國進入戰爭狀態十六個月后才實行征兵，而美國在六個星期內就出臺了征兵法案。意識到英國讓運輸公司自愿合作的實驗造成的混亂，威爾遜政府在宣戰前就開始創建國有緊急運輸船隊。英國戰時政府等待十個月后才正式邀請勞工代表加入政府，而岡珀斯的位置在戰爭開始前幾個月就已經落實好了。在鐵路方面，美國人猶豫了九個月的時間，直到瓶頸問題實在嚴重時才創立了英國模式的鐵路管理局。全國戰爭勞工委員會的仲裁機制直到戰爭開始一年后才充分動員起來。但是，戰爭經濟的基本結構在六個月內基本到位，包括戰爭工業委員會、運輸局、緊急食品和燃料管理局、緊急戰爭稅、計劃委員會的勞工代表席位等。

在戰爭邊緣旁觀的三年里，美國人尤其密切關注英國勞工政策的錯誤和困難。勞工部發表了1917年英國戰時勞工法令詳細匯編，對勞工標準感興趣的美國進步人士詢問英國來訪者戰爭工業內部工作規則削弱的影響。[[558]](#_558_15)因為對戰爭初期幾個月內勞工短缺和普遍勞工動蕩之間明顯的聯系印象深刻，威爾遜政府拒絕了英國先例，誓言要維持戰前的勞工標準。威爾遜政府沒有試圖從工會那里得到具有法律效力的不罷工諾言（英國這種做法到了1917年好像只能鼓勵未經工會批準的自發罷工的蔓延），而是獲得自愿不罷工的保證，成立戰時聯邦調解服務處。

在所有這些方面，吸收歐洲交戰國的經驗極大地縮短了美國學習的時間，加快了進入戰爭集體主義的步伐。這就是看起來具有諷刺意味的現象背后的邏輯：在北大西洋經濟體中最抗拒國家干預的美國，在戰爭緊急情況下是最快速采取干預措施的國家。在其他國家沒有地圖摸索前進的地方，美國飛躍進入有組織的戰時經濟——這種速度反過來加重了美國進步人士被戰爭投射到新世界的意識，在這里從前的所有口令都失效了。

進步人士認為跨越和平時期障礙的意識在住房政策前沿尤其強烈。當然，戰爭工人住房只是戰爭經濟龐然大物的一個微小側面，如果和關心勞工政策的進步人士數量相比，對戰爭住房工程表現濃厚興趣的人數總是不多。但是正如我們看到的，1917年前人們對國家資助住房的抗拒是非常堅決的。如果戰爭期間跨越大西洋的紐帶能夠改變這些，誰也無法預料戰爭集中起來的能量會產生什么結果。[[559]](#_559_15)

從戰爭一開始就顯而易見，戰爭計劃者將不得不對付戰爭工人住房危機。1917年夏天新招募的工人開始成千上萬來到船塢、兵工廠，像上漲的河水從和平時期的河床蔓延流出。在賓夕法尼亞州造船基地切斯特市，全國住房協會的調查者估計，到1918年涌進這里的人比從前四年多40,000人。這么快速的人口移動只能讓住房市場陷入混亂，但是需求本身并不能確定解決問題的方式。[[560]](#_560_15)

最直接的權宜之計就是讓市場自己調整，提高租金，提高租房的利潤空間，鼓勵過分擁擠和普遍的湊合。除了這些，作為最初級的干預，臨時解決辦法是暫時把工人安頓在當地居民家中。改善交通運輸條件，從足以吸收工業新雇員的人口中心開出特別火車或小公共汽車是另外一個可能性，但怕工人們在長途顛簸后筋疲力盡。最明顯的解決辦法是盡快建造盡可能便宜的臨時營房，最好由工業承包商自己建造，如果需要政府可以貸款；還有最后一種辦法，那就是直接由政府部門負責。快速建造像軍營一樣簡易的臨時住所：要不是有英國的先例，這肯定成為美國人的戰爭住房做法。

但是在英國，戰時緊急住房的需求出現在不同的先例和政治氣候背景下。那里剛開始也是臨時兵營式房屋。在倫敦東南的伍爾里奇皇家兵工廠，工人數量從戰爭前夕的11,000人一下子暴增到1917年的74,000人，在全新的工業城鎮如蘇格蘭邊界的格雷特納，軍需部炸藥廠的11,000名雇員遍布在荒野上，除了兵營房屋沒有其他辦法：像軍隊一樣一排排的低矮營房。因為英國木材短缺，計劃者很快不得不使用較長久的混凝土房屋。但還是英國戰前市營住房建設的經驗，在促成從臨時房屋到補充國內永久性住房的轉變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1915年，政府已承諾一個龐大的戰時工人住房計劃，按最好的花園城市和工廠村莊設計。以雷蒙德·昂溫為首的花園城市建筑師作為團體進入戰爭住房委員會，這次是以民族國家為贊助人。[[561]](#_561_15)

兵營建筑1915年后并沒有停止，但是花園城市設計者使用戰爭期間集中的權威在公共住房設計中引入新規模和社區概念。倫敦市議會郊區邊緣設計者不得不遷就的狹窄街道遭到拋棄。在伍爾里奇，為兵工廠技術工人建造的一個擁有約1300座房屋的村莊建在中心綠地周圍，和20世紀英國將要建設的風景如畫的郊區一樣。在格雷特納，昂溫把1915年的戰爭兵營打扮成為村莊，里面有巧妙開辟的街道和慷慨配置的公共設施。在四年工作中，軍需部建筑師建起了10,000幢永久房屋，和倫敦市議會在過去二十五年建造的一樣多。

因為擔心遭到破壞，軍需部工人住房的報道受到嚴格審查，只能緩慢滲入美國。傳播的關鍵人物是新上任的《美國建筑師協會雜志》編輯。這本制作精美的雜志是有關建筑風格的權威，也是建筑精英主義的旗幟。我們不清楚經理們為什么要聘用查爾斯·H.惠特克擔任編輯，此人是一位富有魅力的世界主義者、單一稅制支持者、威廉·莫里斯風格的社會主義者。我們同樣不清楚他怎么能在激起巨大爭議后仍然穩坐編輯寶座。不管怎樣，到了1917年秋天，他開始在雜志上發表英國戰爭工人住房的報道。除了發表他能從審查官那里搞到的東西，他還派遣紐約市建筑師弗里德里克·阿克曼帶回更多內容。[[562]](#_562_15)

阿克曼是一位受到鼓舞的記者。他的文章是經濟激進主義和戰爭樂觀主義的結合體，顯示出令人興奮的色彩。他在10月份從格雷特納發回的報道說：“親眼看到這一切，認識到這是現實；見證一個盛行法律、秩序和計劃的龐大的工業共同體；看不到貧民窟而且意識到這里再也沒有貧民窟；認識到有可能在強化的工業和工人正常生活之間維持平衡——讓人感到一種很少能體會到的激動震顫。”軍工城是個活生生的例子，說明如果國家從“極度個人權利和財產權利”的教條中擺脫出來，盡“全力”而為時所能產生的巨大威力。阿克曼寫到他在戰爭時期的英國不光看到了房子，“我非常榮幸地看到……未來的遠景”。[[563]](#_563_15)

激起對蘇格蘭荒野這種情感爆發的不是國家的大手本身或者設計多么優美。阿克曼排斥伍爾里奇風景如畫的魅力，對其缺少公共設施感到失望。讓阿克曼認為看到未來的，是昂溫那視覺上更簡單的、從社會角度看又更慷慨的格雷特納和伊斯特里格斯計劃：俱樂部、市政機構、學校、教堂、牙科醫院、電影院、公共洗衣房、“社會和工業融合”的精神。[[564]](#_564_15)

在《美國建筑師協會雜志》，惠特克把阿克曼的報道和照片集合成為高調的宣傳，鼓動在美國推行類似的住房項目。他聘請伊迪絲·伍德來描述歐洲公共住房貸款體系，理查德·S.蔡爾茲來解釋英國對付投機的辦法，錫德尼·韋伯來稱贊即將到來的政府與建筑師的合作關系，而惠特克本人撰寫在戰爭氛圍中可感知的價值觀重估。[[565]](#_565_15)阿克曼自己則不知疲倦地宣傳他在演講和幻燈片中看到的東西：

和過去完全不同，我們現在必須仔細審查自己的極端個人主義傾向、相對缺乏體現合作精神的社會成就、對政府控制的戰栗和恐懼，尤其是我們物質主義的目標。除非我們克服這些傾向，否則將絕對限制我們趕上其他國家的步伐。他們雖然遭受的痛苦和損失比我們更大，但是從對付戰爭的共同努力中學會了實踐社會民主的某些意義。[[566]](#_566_15)

伊迪絲·伍德后來聲稱“阿克曼的文章阻止了美國戰爭住房采取臨時性的木頭營房形式”。[[567]](#_567_15)她的判斷或許夸大了阿克曼的作用，但并沒有夸大英國先例的影響力。在技術工人嚴重短缺和流動率驚人的情況下，英國例子的具體性、“完成性”，連同就是好住房穩定了英國戰爭勞工這種夸張的想法，確實占了上風。

到了1918年春天，美國推行了一個類似項目。戰爭期間，速度就是命令，因而速度給予那些了解英國原型的人帶來優勢。可能主要因為他在《建筑師學會雜志》上的文章，阿克曼本人被任命為緊急船運公司的首席設計師。馬薩諸塞州宅地委員會在洛厄爾的開發項目設計師阿瑟·C.柯米成為美國住房公司的區域設計師。昂溫最親密的美國通訊員約翰·諾倫為這兩家機構做設計。

美國戰爭住房開發中沒有一個是英國的復制品。美國規劃師比英國同行更常用集中和對稱的設計，會聚到公民中心場所，就好像視覺上的統一性會幫助抑制美國“沸騰的混亂”。至于每所房屋，印度式平房、新殖民主義模仿、仿農舍、新喬治王朝風格的街區都有支持者。但是在康涅狄格州沃特伯里、弗吉尼亞州紐波特紐斯、賓夕法尼亞州埃迪斯通等地，街景直接來自昂溫的《城市規劃實務》或者萊奇沃思和漢普斯特德的記憶，比如成排的房屋聚集在長長的屋頂下，英國花園城市設計者非常羨慕的德國風格的隆起或者插入元素，這些都毫無疑問標志著靈感跨越大西洋的源頭。[[568]](#_568_15)

戰爭住房項目剛剛開始，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停戰日就讓它夭折了。但從項目開始時的速度、計劃者對發展方向的信心來看，戰爭工人住房仍然是個非常突出的例子，說明政策借用內在的豐富資源。在不足十個月的時間內，緊急船運公司和美國住房公司建造了英國軍需部在四年戰爭期間建造的永久房屋的一倍半。根據周圍大片投機商建造的房屋來看，這也不過是滄海一粟。讓戰爭住房項目顯得重要的不是建筑物本身；甚至不是國家所有權這個事實（因為不像英國從一開始就批準歸還給地方政府當局，在美國戰爭住房戰后處理是非常不清楚的）；也不是社區公共設施（在匆忙動工的工程中它們還只是一紙規劃書）；而是一種政治文化在戰爭緊急狀況下斷裂和改革的意識。

在1917年和1918年的其他地方，人們也很難抗拒對戰爭社會化影響力的信心。如赫伯特·胡佛這樣的工程師和哈里·加菲爾德這樣的教授都來參加國家有組織的食品和燃料供應；從戰前的金融冒險中形成了聯邦管理下系統的鐵路體系；戰爭風險保險局推出數以千計的政府保險單；勞資雙方在中立的政府專家監督下討價還價等等。

1918年5月洛克菲勒基金會主席來到英國，用“特別的熱情”調查格雷特納的結構和福利機構。喬治·文森特不敢肯定這么“精彩的”機構如何能夠轉變成為和平時期的東西，如何能在沒有戰時國家那種自上而下的緊急權力時取得這些集體成就，但是前景非常清楚。“我們參加了這場偉大的戰爭，這種共同利益的認識比從前任何時候把我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一起……我們不能再回到從前的個人斗爭或者群體競爭的矛盾沖突中。這場戰爭決不允許我們再回到從前那種古老個人主義了。”[[569]](#_569_15)

## “幾乎熔化”的社會

要讓臨時措施永久化，要在和平中實現戰時的集體主義精神和機構：這些是戰爭時期緊急措施給大西洋兩岸進步人士提出的挑戰。很快圍繞這些企圖而形成的詞就是“重建”。它最初來自法國對受到戰爭破壞的東北部重建的討論，很快成為戰后規劃的籠統說法。當英國戰時政府在1916年春組織委員會預測戰后問題時，一開始就用了“重建委員會”的名稱。在英國，重建野心很快影響到國內政治辯論的每個角落，后來迅速跨越大西洋來到美國。

在英國，政治和士氣在重建討論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隨著比利時戰爭罪行故事開始失去在1914年和1915年發揮的影響力，隨著軍隊陷入一場沒有明顯結果的沖突中，隨著人們對于戰爭越來越多的厭倦，勞工運動開始撿起協商和平的呼吁，勞合·喬治政治許諾的核心就是戰爭不僅要贏得勝利，而且要進行戰后勝利者的改造。在戰爭的最后幾年，為普通英國士兵和軍需工人建立更加美好的世界，這個姿態開始成為支撐公眾士氣不可缺少的手段。“毫無疑問的是，現在的戰爭……為本國工業和社會條件的重建提供了機會，這幾乎是全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1917年3月勞合·喬治以經過精心設計的夸張語氣對工黨代表團說：“整個社會幾乎熔化了，只要你堅定和果敢地行動，就可以給這熔融物質打上幾乎任何印記。”[[570]](#_570_15)

實際上，在戰爭最后幾年出現的重建運動不是一個而是兩個，一個在官方部門，另一個在普通勞工階層。前者的工具是1917年夏天成立的重建部，其任務（正如內閣指出的）不是“重建戰爭前的社會，而是根據戰爭期間的社會經濟條件創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該委員會集中了大量進步人士：貝特麗絲·韋伯、惠特利（工廠勞資聯合委員會項目）、西伯姆·朗特里（軍需部福利局主任）、阿爾弗雷德·齊默恩、帕特里克·格迪斯、雷蒙德·昂溫以及研究德國的專家威廉·道森。他們一起積極推動把戰爭的社會和經濟教訓運用到戰后和平中來。勞工關系專家敦促緊急情況下成立的“勞資聯合委員會”制度化，完全展開成為永久咨詢機構，從生產第一線開始一直上升到高層的聯合經濟委員會，以便維持“戰爭建立起來的階級合作”。貝特麗絲·韋伯自1909年以來就一直推動建立嶄新的公共健康部代替濟貧法。花園城市團體敦促戰時住房項目擴展到和平時期國家資助的大規模住房項目。勞改營鼓吹者和社會保險專家則擔心戰后失業問題。經濟學家把專業知識用于逐漸從動員和控制中解放出來，以便慢慢適應和平時期的經濟調適過程。威廉·道森總結了專家重建辯論的教訓，運用可以追溯到1880年代德國課堂中的術語說，首先需要防止的是返回到致命的困境——“自由放任通行證”（laisser faire,laisser passer）。這不是英國進步人士帶入戰爭的議題的總結，但是聯系的紐帶毫無疑問是存在的。[[571]](#_571_13)

而在英國勞工領域，1917年到1919年的重建討論是在戰爭期間明顯斷裂的經驗下進行的。工作規則的緊急削弱、技術工人讓位給新手造成的技術“稀釋”、戰爭中的投機倒把、生活費用的急劇上漲、戰爭政府對工會領袖的籠絡等——所有這些因素都破壞了戰爭初期的愛國熱情，導致1917年憤怒的自發罷工大爆發。第二年參加罷工的人數更多，到了1919年，罷工浪潮已席卷整個大西洋經濟體各國，罷工人數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多。

戰爭不僅動員了英國的勞工階級，而且讓他們更加激進。在戰前關于社會政治的辯論中，勞工組織扮演一個遙遠和模糊的角色，因為擔心工會核心議題遭到淡化而削弱自己存在的理由，對國家措施充滿疑慮。與一系列撤消工會罷工權和糾察權的法院決定相對抗的英國工黨本身，1914年也仍然和工會聯盟沒有多大差別。現在，由于戰爭將經濟和社會關系政治化，工會的政治野心像個大氣球迅速膨脹起來。

英國勞工的轉變部分集中在國際事務領域。到了1917年底，因為對取得太少勝利和造成明顯不平等的犧牲的戰爭感到幻滅，工黨迅速轉向勞工作為權力經紀人進行和平談判的路線。俄國工人蘇維埃把國家權力抓在手中的報道是強烈的催化劑，不過最終還是戰爭集體主義本身決定了勞工運動的新方向。英國戰爭經驗模糊了曾竭力維護的經濟和政治間的界限，把市場吸收到名義上民主的國家控制下，在所有權舊結構下悄悄出現了聯合的甚至民主控制的潛在機構，英國戰爭經驗勾勒出的世界和發生在俄國的情況幾乎一樣新鮮。在1918—1919年爆發了眾多有關工資和勞動時間的傳統沖突，頻繁得讓勞工關系專家來不及去平息；與此相伴，工業控制的新興重要性不容忽視。勞工聚會時提出來的越來越急切的問題不僅是如何維持戰爭對資本特權的部分廢除，而是如何把工業企業本身民主化。

人們對于達到該目標應該使用的手段還沒有共識，只隱約感到有巨大的可能性懸在一個不穩定的政治時刻。在勞工會議上，鼓吹十多種不同形式的工人控制權的人在招募支持者。礦業工人認為礦山應該永久收歸國有，正如礦工協會秘書想象的，由工人和技術專家組成的聯合委員會來管理。鐵路工人在談論徹底擠走戰前管理者，由工人代表和公眾組成的委員會實行控制。基爾特社會主義者柯爾夢想“戰勝國家（dishing the state）”，在廢墟上建設以生產為基礎的經濟民主。工會管事中激進分子在討論建立英國蘇維埃的問題。[[572]](#_572_13)

空中的眾多烏托邦景象讓工黨著迷。工黨1918年初期的著名重建文件《工黨和新社會秩序》決不是美國進步人士認為的基礎文本。它的兩位主要作者在戰爭大部分過程中都是處于工黨邊緣的人物，拉姆齊·麥克唐納由于宣傳戰爭和平主義而陷入孤立，錫德尼·韋伯因為從不掩飾對工黨領導層遲鈍表現的蔑視而自我邊緣化。但是對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來說，《工黨和新社會秩序》鼓舞人心的語言和魔力讓它與官方重建文件區分開來。它宣稱從前古老的、個人主義的資本主義生產體系已經死亡——以此為基礎的整個“文明”都已經死亡，這是戰爭的犧牲品。沒有任何形式的“修補”工作能夠讓它復生。取而代之，工黨認為要建立“一個新社會秩序，不是建立在斗爭而是建立在兄弟情誼上；不是建立在爭奪生活條件的競爭上，而是建立在精心設計的生產和分配的合作上，不管是體力勞動還是腦力勞動的參與者都能獲得利益”。[[573]](#_573_13)

在新社會秩序的四大“支柱”中，兩個是典型的韋伯式觀點：一是對資本的一次性巨額“征稅”以便普通百姓免受戰爭成本的傷害；一是“普遍性的國家最低保障”，這是韋伯夫婦喜歡的詞匯，指國家保障的就業、工資、醫療和工作條件等標準。第三個支柱是從前激進分子的分享財富口號：“剩余價值用于公共利益。”最后一個支柱是一線工作的工人中產生的說法：“工業的民主控制”，具體的主張是對英國的鐵路、礦山、電力供應的國有化，更籠統的說法是“不光有經濟上還有政治上的最廣泛的參與權，這正是民主的特征”。韋伯和麥克唐納承諾，這種新社會秩序將不再像從前一樣建立在狹隘的“階級”利益基礎上，而是一個為了“共同利益”的“共同的家園”，是“所有領域的體力和腦力勞動者的家”。[[574]](#_574_13)

工黨在1918年6月實際采用的重建計劃已簡化為具體方案，看起來更像一個委員會拼湊起來的配件組合，而不是“家園”或者“社會秩序”。比喻被剪掉了。韋伯談論的普遍最低保障太容易讓代表們想起濟貧院，因而被拋到一邊，取而代之的是更傳統的工資和工作時間等政綱。但是政黨綱領也保證說勞工決不會滿足于戰后的“修補工作”。[[575]](#_575_13)至于說政黨承諾的“體力和腦力勞動”相結合，該黨采用的方式是不僅歡迎其所屬工會和游說團而且歡迎個人加入。由于戰爭使得立場更激進，消費者合作社也迅速加入事實上的勞工聯盟中。[[576]](#_576_13)

在把經濟組織起來和政治化的所有這些方面，戰爭讓工人階級振奮起來，用遠比勞合·喬治愿意接受的熔融程度更高的戰后重建前景激發他們的想象力。當激進的美國記者瑪麗·希頓·沃爾斯1918年11月來到英國后，她感覺到

無論你走到哪里，無論是倫敦工人委員會還是婦女工人聯盟，關于新英國的討論總是伴隨著你。你一刻也無法擺脫這些討論。它們在英國社會上下流動，通過工廠委員會和工人委員會進入工人階級的家庭，從基爾特社會主義者到工會、女性合作社基爾特，再到威爾士礦工學校。到處都群情激動，到處都存在著對新世界的熱烈需求。[[577]](#_577_13)

在1919年接踵而來的不可避免的抱負沖突中，罷工主導了節奏。英國政府精心制訂的緩慢復員計劃就是要巧妙配合工人與工作，避免造成重建部那些計劃者擔心的高失業率，但是因為1月的士兵大游行而失敗。2月煤礦停業的威脅只是因為成立了特別調查委員會才得以解除，這個委員會的一半成員由礦主任命，另外一半（錫德尼·韋伯和R.H.托尼是成員）由礦工協會任命。那年春天該委員會進行了關于私人所有和永久國有化二者相對優越性的公共聽證會，雙方都有一連串證人出席公開辯論。一個同樣前所未有的姿態是在2月召集的全國工業會議，參加者有包括企業界、勞工界、政府代表在內的六百多人——在有些基爾特社會主義者看來，簡直就是胚胎中的經濟議會。這是要制訂出戰后工業社會契約的條款。[[578]](#_578_13)但是所有這些都沒有阻止罷工的進一步加劇和工會組織的日益壯大（單單1919年就有將近一百五十萬人）。

在這些聯合壓力下，政府轉向更多的獎勵政治。在現有的失業保險項目上添加了一個緊急失業補助法案，讓士兵能度過復員后最初的困難階段。政府還答應給予那些愿意耕種的返鄉士兵以帝國的土地。最重要的是，消滅貧民窟、建造體面住房躍居戰后重建議題的前沿，而且采用慷慨的經濟資助來推動，這種慷慨（就像失業補助一樣）后來讓政府計劃者感到后悔。勞合·喬治公開談論房屋問題——“適合英雄們”居住的房屋，有花園、澡堂，甚至客廳。但在私下里他談論的是革命，他敦促內閣說，即使住房計劃“將花費上億英鎊，但這和國家的穩定比起來算得了什么？”[[579]](#_579_13)

處理因為戰爭而收歸國有的企業是更棘手的問題。勞工竭力要永久國有化，商人要求立刻恢復到戰前狀態，政府決策者意見不一致，猶豫不決。1920年初，重建委員會前任成員阿瑟·格林伍德仍然認為煤炭和酒類買賣的國有化是迫切的問題，鐵路、航運和銀行也距此不遠。[[580]](#_580_13)但是往另外方向推動的力量更強大：勞合·喬治已經開始精心策劃并運用手腕來操縱的恐布爾什維克主義心理、民意調查中的保守派偏向，以及投資者和商人把工業帶入預期中的戰后激烈國際競爭的渴望。政府駁回了煤炭委員會勉強通過的國有化決議，相反提出了按區域重組煤礦公司的主張，公司董事會中設置工會代表。鐵路行業也提出了同樣的建議。漸漸地，其他戰爭經濟控制也被拆除了。主要的戰爭經濟部門，與戰爭時期相比已經僅有外殼，也在1921年徹底解散。工業委員會計劃者希望建立的永久性勞資委員會在1921年因為工會的退縮而破滅。[[581]](#_581_13)

到了礦工們最終在1921年正式罷工，經濟陷入衰退，雇主降低工資和裁減人員時，再要改變事態已經來不及了。戰爭的烏托邦情緒，正如威廉·道森曾經說的，進入“嶄新時代”的濃烈意識和把戰爭集體主義材料建成“新社會秩序”的熱情被消耗殆盡。新首相斯坦利·鮑德溫宣布“本屆政府不會試圖去控制國家的工業”。[[582]](#_582_13)

但這是條高低不平的道路，盡管鮑德溫口口聲聲說恢復，英國的社會政治已經被永久地改變了。1920年的緊急失業救助將成為戰后英國的主要特征一直延續到1930年代的大蕭條時期。戰時住房項目也維持下來（盡管有保守派周期性的停工），公共的、工人階級“委員會”房屋緩慢擴展為英國新特征。也很重要的是，戰時勞工政治的改變也維持下來了，不僅有導致1926年大罷工的積蓄的憤怒，而且更重要的是，戰爭克服了勞工長期以來對做好事政府的懷疑，讓工黨進入英國社會政治的主流。

雖然細節來自英國，但是歸根結底趨勢是普遍的。不管在社會民主黨意外繼承了他們長期不信任的政府的德國，還是在仍然處于政府管理權力邊緣的法國，社會民主和進步政治之間的界限因為戰爭而發生了深刻變化。在整個歐洲，勞工政治現在非常活躍，不僅在談論工人委員會和聯合控制，而且在談論社會保險、住房、規劃、經濟管理等——所有“資本家”的社會政治議題；從前的正統社會主義者與這些議題是保持距離的。在這方面，戰時緊急經濟集體主義實驗、社會和平的脆弱結構、熱烈討論的重建計劃，甚至1919年破滅的烏托邦，都有持久和深遠的后果。

在北大西洋經濟體西邊，戰爭結束后希望的興起與破滅也同樣發生了。在美國像在歐洲一樣，戰爭期間出現的重建抱負撞到了更加激進的勞工運動，撞到了渴望盡快讓國家工業恢復到戰前“正常”狀態的雇主。雖然具體情況在美國，但是背景、意識、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國際性。

主要的海外模范是英國。戰爭期間和戰后的德國被隱藏在宣傳迷霧之下，有關法國的報道主要集中在軍事方面，但美國進步人士對英國重建的消息特別感興趣。《調查》在搞到英國重建部的報告要點后馬上發表。惠特利會議成立各種形式勞資聯合委員會的建議引起美國人的廣泛注意，因為它正好和不斷強化的勞工調節機制的需要相吻合，也和把戰爭中的民主理想引入工業這種旨在提振士氣的模糊言論相吻合。《新共和》在1917年秋天請人描述英國計劃，指出了惠特利觀點與國內以“難以抑制的敵意”為特征的勞工關系的對比。編輯忍不住補充說：“人家已遠遠跑在美國的前面。”到了1918年底，隨著美國戰爭工業中成立的一百多個惠特利式工廠委員會，戰爭勞工仲裁者在縮小差距方面做出很大貢獻。[[583]](#_583_13)

在所有英國重建計劃中，《勞工和新社會秩序》在美國引起的反響最大。《新共和》稱贊它“可以說是由負責任的政黨提出的最成熟的、精心設計的項目”，開辟專刊全文轉載。《調查》因為錯過了1918年2月的機會，在8月全文刊登了工黨的重建計劃。礦工聯合會雜志轉載了《勞工和新社會秩序》，加利福尼亞州勞工聯合會在1918年秋天的決議中引用了大量內容。在白宮，威爾遜總統的秘書約瑟夫·塔馬爾蒂確保總統能看到這本書。當威爾遜開始在春天的演講中插入即將來臨的“政治經濟重建”內容時，塔馬爾蒂敦促他再大膽一點。加利福尼亞進步人士麥耶·李斯納寫到，西奧多·羅斯福稱之為“多年來出版的最激動人心、最有啟發性的政治文章”。《新政治家》的結論是：“《勞工和新社會秩序》到來后，至少在東部和中西部各州，似乎很少有俱樂部、協會、大學、教堂或者論壇不受到影響，來詢問英國勞工組織到底在想什么，計劃做什么”。雖然有自我吹噓的一面，但這樣的說法確實有點道理。[[584]](#_584_13)

為什么美國進步人士從英國戰時宣言的干草垛中單單挑出《勞工和新社會秩序》大加贊揚，并寄予太多自己的希望呢？這確實不是很容易解釋的問題。該文件公然支持社會主義項目，發誓“消滅”控制工業的私人資本家，支持將大部分工業國有化，它在美國進步人士圈子里決不是可利用的資產。赫伯特·克羅利在創辦《新共和》之初就曾經保證該刊物的思想“激進，但不是社會主義者”。凱洛格的睦鄰中心和社會工作人員讀者并非標準政治意義上的激進分子。那些對《勞工和新社會秩序》不以為然的人中有西奧多·羅斯福，他對李斯納抱怨說“其中5—10%的內容純粹是共產主義貨色”，讓它受到玷污，就像一滴污水污染了清泉。《新共和》擔心“美國進步思想的膽怯和興趣淡漠”將阻礙人們接受宣言的真正意義，這種擔心確實有道理。[[585]](#_585_13)

然而，在美國進步人士竭力要相信戰爭帶來的轉型影響時，韋伯和麥克唐納讓細節從屬于歷史理想化比喻的這一決定，使得《勞工和新社會秩序》比相對灰暗的官方版本的優勢更大。英國文件承諾了美國進步人士最希望聽到的東西：再次確認舊秩序已經失效——正如《新共和》編輯說的“根本無法修補了”，戰爭的社會成果決不能再失去。跨越大西洋的進步紐帶從來沒有成為特別精細的政黨區分工具。《勞工和新社會秩序》與籠統的重建討論相融合，為美國進步人士提供了在威爾遜身上他們半嘲諷半羨慕的東西：自我夸耀的新社會理想主義諾言。從1918年起，關于戰后“新秩序”的討論在美國進步人士對沖突的評估中無所不在。秋天時《調查》已經肯定“資本主義不可能不受任何挑戰和控制地復辟”。威爾·杜蘭在1918年6月的《日晷》上寫道：“新社會秩序已經到來，這是不容置疑的。”[[586]](#_586_13)

這種跨越大西洋的進步紐帶對英國政治辯論術語的吸收，有助于解釋為什么到了1918年末期（這時美國參戰剛剛一年，在戰爭中的犧牲與英國相比非常微小；工人情緒穩定而且最初的愛國熱情還沒有減退；尚且沒有高舉戰后承諾來支撐戰爭士氣的迫切需要；企業生產戰爭物資的速度似乎證明了資本主義崩潰完全是一派胡言），美國對重建計劃的討論會這么熱烈，甚至比英國還多。威爾遜并不是這個現象的領導者。當第一撥的英國重建委員會報告跨越大西洋滲透到美國的時候，威爾遜對美國重建計劃的支持者說現在考慮這些措施太早了。當1918年11月停戰突然到來時，他告訴重建委員會支持者說已經太晚了。在《勞工和新社會秩序》發表的頭幾個月里，他只是籠統討論即將到來的重建，到了1918年12月國會年度報告中，他往后退縮只是提到簡單的“調整”。即便這時，他的頭腦中想的仍然是國際關系，根本無法提供什么具體建議。他對國會說：“我自己沒有堅定的判斷。返回和平狀態的過程……很可能超過任何機構的研究和任何可能提供的援助。指導和平進程并不容易，還不如順其自然。”[[587]](#_587_13)

因為沒有上面的指導，重建熱情似乎從社會本身的毛孔中爆發出來，由部分借來的理想主義推動，用部分借來的語言包裝。弗蘭克·沃爾什寫到，到了停戰日，美國已處于“重建會議和計劃的風暴的中心，這些會議和計劃來自可以想象到的任何團體，有高雅之士，有反動組織，有工人也有其他人”。在1918年11月到1919年中期，美國勞工聯合會、美國商會、聯邦宗教協會、全國天主教戰爭委員會、婦女工會聯盟、社會工作者、農民、州勞工聯合會都拼湊起自己的重建計劃來。有6個州成立了正式的重建委員會。《日晷》夸耀自己的重建計劃，合作者包括約翰·杜威、海倫·馬洛特、托斯丹·凡勃倫。威廉·詹寧斯·布萊恩的《平民》也發表了自己的重建計劃。自從1918年秋天就一直以特別宣傳冊的形式轉載英國重建報告的《調查》，現在用每個月的第一期專門討論重建議題。運用借來的英國基爾特社會主義的語調，查爾斯·H.惠特克在《美國建筑師協會雜志》上呼吁一種“超越工業主義”的建筑和社會秩序。親戰爭的社會主義者在1月份創辦標題是《重建：新時代的來臨》的嶄新刊物。劉易斯·芒福德后來回憶那個時刻說：“在1919年的街道上出現了二十種不同的天堂。”《新共和》的編輯無意識地使用了勞合·喬治的術語：“我們當今的社會就像熔化了的鐵水，可以塑造成任何模型。”[[588]](#_588_13)

其實這個重建的新瓶子里裝進去了很多陳酒。但是美國進步人士加快步伐追趕1919年早期英國的腳步，就好像自己的未來就在那里一樣，這一跡象特別引人注目，說明重建運動的國際影響力多么大。早在7月份，《調查》的駐英國記者阿瑟·格里森指出了“討厭的危險：大批的美國調查團、委員會、特別代表團一批又一批踩在同樣的青草地上，直到把它踏成爛泥狀”。簡·亞當斯、沃爾特·韋爾、格里森本人都出現在1919年初煤炭委員會聽證會上。《國家》雜志的奧斯瓦爾德·加里森·維拉德在停戰后動身到英國。赫爾館的元老朱莉亞·拉斯羅普和格雷絲·阿伯特前往英國是要為美國兒童局調查兒童福利措施。查爾斯·H.惠特克是勞工部特別代表，去研究英國建筑行業中的基爾特社會主義。瑪麗·麥克道爾調查英國公共住房問題，美國勞工立法協會的約翰·B.安德魯斯要親眼看看英國公共健康保險的經驗。美國勞工部、全國公民聯盟、全國工業會議理事會都競相派出了雇主代表團考察英國的勞資關系。全國公民聯盟派遣另一個代表團試圖研究健康保險問題。[[589]](#_589_13)

對于尋找的內容或者它對美國政策的意義，調查者的共識并不比戰前的更多。美國勞工部長1月份組織的雇主小組報告說，以工會為基礎的集體談判在英國起作用；在“沸騰的不平靜”之下，它是最有希望朝向穩定的力量。2月份動身的全國公民聯盟代表團的結論是沒有任何值得從英國學習的東西。3月份的全國工業會議理事會代表團報告說，英國正在走向赤裸裸的布爾什維克主義，雇主屈服于聯合控制的要求，政府缺乏遏制勞工運動泛濫的政治意志。報告說，一整套的“流行語和口號，比如‘國有化’、‘集體談判’、‘工業民主化’等被炮制出來，這些詞語有廣泛吸引力，但內容模糊，沒有確定性。尤其是在這個不管是在工業還是在政治領域都充滿激情和暴力，不滿情緒泛濫的時刻，‘變化多端的短語’是十分危險的”。[[590]](#_590_13)

在這個形形色色的抱負和烏托邦激烈競爭的喧鬧中，在到處都談論重建的“新時代”、“新秩序”、“戰爭已經開啟了新世界的門”時，從英國引進的內容只是發揮了部分作用。[[591]](#_591_13)戰爭集體主義經驗、美國進步政治的救世主式口吻、當時任何利益集團的議題都要貼上“重建”標簽之風，都是重要因素。但是正如戰爭是國際事件一樣，戰后重建野心也是如此，超越了民族國家的邊界。

在停戰后的最初六個月提出的美國重建計劃熱潮中，沒有哪條線索比把戰爭經濟的某些特征延續到和平時期這種希望更常見了。社會工作者在11月呼吁戰爭時期的公共就業服務永久化，將戰爭住房工程進行到底，把士兵和水手保險擴展成為全面的社會保險體系。教會團體渴望擴展戰時最低工資標準，擴展戰爭勞工調解局推行的工業和平機制。全國城市聯盟的公民改革者建議保持戰時工業委員會的核心功能，“確保我們在戰爭期間獲得的領地”。更讓人驚訝的是該聯盟建議戰時國有化的鐵路和電報電話服務仍然留在聯邦政府手中；如果要返回私人投資者手中，必須在消除“從前的私人所有制投機性和反社會性特征”以后才行。加利福尼亞進步人士希拉姆·約翰遜認為鐵路應該留在政府手中不再是“可以爭論的問題”。[[592]](#_592_13)

在威爾遜政府內部，有人贊同戰時緊急情況下的集體主義不能簡單地解散了事。在1918年11月共和黨選舉勝利后，約瑟夫·塔馬爾蒂從早先建議的鐵路永久性公共管理立場上迅速后退，但敦促威爾遜采納類似勞合·喬治的項目：養老金、健康保險、聯邦最低工資標準、最長工作時間法案、政府住房項目、“控制”基本原材料、聯邦政府承認集體談判的權利、按戰時勞工委員會精神設置永久性聯邦勞資糾紛處理機構、維持聯邦就業服務項目，還有以英國模式為基礎的國家工業會議，像“惠特利項目”那樣制訂改善了的勞資關系規范。他應和勞合·喬治的話說：“對付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真正解毒劑就是社會重建。”威爾遜的郵政部長公布了政府永久擁有電報電話服務的計劃。鐵路管理局的威廉·麥卡杜提出了聯邦鐵路管理延長五年。燃料管理局的哈里·加菲爾德建議成立由勞工、經營者、公共代表組成的和平時期燃料委員會，協調煤炭行業的糾紛。[[593]](#_593_13)

不過，盡管英國和美國的重建野心有這些平行發展，卻存在關鍵的差別。其中有些是開始于高層，如威爾遜總統。他和勞合·喬治的戰爭領袖才能之間有很多共同點。按英國的說法，兩人都是“自由黨—工黨”（lib-lab）政客，得到勞工廣泛支持的進步人士。1916年由于美國勞工聯合會的積極支持而連任，威爾遜進入戰爭時，比從前的任何一位美國總統都更接近于同工會正式結盟。[[594]](#_594_13)但是威爾遜選擇在方方面面掌管勞工—進步聯盟，偏偏就除了在他自己的頭腦中。在美國其他進步人士通過英國發現勞工政治中的新利益的地方，在勞合·喬治竭力收買工人階級重新支持自由聯盟的地方，威爾遜的戰后政策制訂充斥著普遍性的、無階級的進步人士的高調。

勞合·喬治試圖利用重建旋風為自己的利益服務。威爾遜則相反，既擔心又蔑視，不愿意走近它。他回避勞合·喬治那種戰后社會承諾的政治，而是建立了一個特別的海外國際重建項目，幾乎接近于放棄國內的內容。要是西奧多·羅斯福領導戰時政府（這正是他迫切的渴望），事情的發展有可能完全不同。但是威爾遜心思不在這上面，加上1919年的前六個月都待在巴黎，無法擺脫他認為此前只是主持戰爭中臨時反常措施的意識，越快拆除戰時體制越好。

因此，戰爭集體主義機構一方面群龍無首，加上沒有根基良好的國家機構的維持，幾乎在一夜之間就開始解散。“校際社會主義協會”的哈里·萊德勒1919年1月訪問華盛頓時頭腦中滿是重建計劃。在政府工作的第一個朋友卻告訴他“不會有什么重建計劃”。弗蘭克林·萊恩的內政部工作人員正忙著計劃在聯邦開墾的土地上安置大量士兵。而除此之外，各個戰爭部門盡可能快地卷鋪蓋走人。[[595]](#_595_13)戰爭勞工局在12月初申請解散。戰爭住房工程的工作隨著停戰到來而結束。完工的工程以低價出售給私人投資者，其余的放棄了。食品和燃料管理局在6月解散。鐵路維持在政府控制中一直到1920年初，但是麥卡杜本人在停戰后兩個月內返回到利潤更加豐厚的私人企業工作中。戰爭持續的時間不夠長，沒有來得及形成常態意識，也沒有培養出專注于其運作的管理者隊伍。戰時借調的管理者離職回到企業事務中去；辦公桌幾乎還沒有擺放好，辦公者就離開了。無論如何，政府外的重建熱情不可能阻止戰時緊急政府管理部門陷入崩潰。[[596]](#_596_13)

歸根結底，讓威爾遜政府重新采取行動的不是進步人士的紙上計劃而是勞工的壓力。受到戰爭期間集體談判勝利的鼓舞，加上國外事件的刺激而更加激進，工會組織在新年開始充滿了積極行動的樂觀主義心態。就像在英國一樣，工人控制權的議題擴散到戰時政治化的經濟以外。因為有些領袖受英國模范所吸引，礦工聯合會呼吁煤炭行業國有化、勞工參加的煤礦共同管理，以及獨立的勞工政治。在廣泛散發的由勞工律師格林·普拉姆起草的計劃中，鐵路工會建議鐵路國有化，由勞工、管理者和公共委員會三方組成的機構共同管理。國有化政綱在州勞工聯合會決議中太多了。礦業和鐵路工人工會提議成立罷工聯盟，顯然是模仿英國礦業工人、碼頭工人和鐵路工人的“三方聯盟”。岡珀斯和美國勞工聯合會的行業工會領袖竭力反對這種潮流，不大情愿地加入美國勞工聯合會重建委員會，他們堅持認為傳統的行業工會比新式勞工共同管理主張的優越性更大，并對任何愿意聽講的人說英國勞工的新政治方針不可能長久。但是，被1919年的渴望吞沒的美國勞工聯合會，在1920年的大會上脫離岡珀斯的領導，支持普拉姆計劃。[[597]](#_597_13)

更關鍵的因素是，停戰后十二個月出現了一系列的罷工，其激烈程度比美國歷史上任何時期的罷工都要厲害。工業界地動山搖的戰場出現在煤炭、紡織、服裝、航運、鋼鐵等領域，工人要求增加工資、縮短工作時間、把戰爭期間管理者給予的緊急優惠常態化、把戰時緊急狀態的代表體制變成工會明確的談判權。總之，1919年走上街頭罷工的人數達到四百萬。20世紀只有另外一個年份罷工人數超過這次，那是在1946年。

面對同樣的力量勞合·喬治采用承諾、恐嚇、操縱等手段，而威爾遜政府直到1919年秋天，即將近一年的罷工風潮后才開始修補遭到破壞的社會和平。在鋼鐵行業即將罷工的時刻，政府召開特別工業會議，這顯然是英國2月份勞工關系會議的翻版。有大約60家雇主、美國勞工聯合會任命的工會代表、政府選擇的公眾代表在10月初齊聚華盛頓特區參加會議。威爾遜沒有為會議確定議程，他認為戰爭時期那種利益合作關系會很自然地再次建立起來。英國會議持續了兩年半時間，而美國會議兩個星期后就不歡而散。美國勞工聯合會的代表試圖抓住戰爭期間得到的臨時優惠，堅持以工會為基礎的集體談判原則；而雇主則非常固執地要求保留與他們愿意承認的任何工人代表談判的權利。“公眾”代表提出惠特利主義的某種形式，這些代表中有很多福利資本家。英國工會和雇主在19世紀末期逐漸清晰化的協商和談判的共同基礎在美國卻不見蹤影。一切都歸結到工會在和平時期經濟談判桌上的地位，矛盾全面爆發。[[598]](#_598_13)

因陷入死胡同，工會憤而離開。“公眾”代表組成的第二場會議匆忙召開，撿起某些議題，提出了成立類似于1919年《英國勞資法庭法》的勞資糾紛協調委員會機制。[[599]](#_599_13)但是到這時候，煤礦工人已經參加到鋼鐵工人的罷工中來了。威爾遜政府重新恢復了曾迫切希望拆除的戰時煤礦管理機構，采取不亞于戰前法院最大力度的強制令鎮壓煤礦罷工。戰爭期間的強制性法律機器被嚴厲地用來對付外國勞工激進分子。在情緒重新極端化的情況下，從歐洲借來的處理緊急狀況的公共勞工協調機制陷入崩潰。1920年成立的處理工資和工作條件的鐵路勞工委員會三方會議一年后解體，因為資本方和公眾方的代表聯合起來要廢止鐵路工人的工會協議。美國在勞工仲裁機制方面受到最廣泛關注的創新——“堪薩斯勞資關系法庭”發動了（作者聲稱）和外國原則“完全不同”的行動，開始宣稱在任何情況下，州中所有基礎工業領域的罷工、抵制、糾察、停工等都屬違法。[[600]](#_600_13)

由于有效的公共協調機制破產，主動權重新落到雇主身上。即使在工業會議失敗之前，他們就開始準備好新的“自由雇傭”（open shop）動議要限制戰爭期間的工會擴大。惠特利主義的卓越地位（去除了惠特利委員會在英國與勞工組織的關系）、“工業民主”的言辭，都被適當修改以符合公司控制的雇員代表體制那種“美國計劃”。在雇主的反攻下，鋼鐵領域的戰時組織崩潰，國有化運動在煤礦領域也漸漸削弱。鐵路工會面對國會要剝奪其罷工權利的法案時也被迫從普拉姆計劃的高地退卻。到了1923年，在雇主反攻和1920年底就已經非常嚴重的戰后經濟衰退的聯合壓力下，工會會員已經從戰后最高峰下降了幾乎三分之一。[[601]](#_601_13)

最后，“紅色恐怖”也給倒退潮流推波助瀾，在美國表現得特別強烈。就像從1917年到1920年革命思想在世界范圍有傳染性一樣，人們對它的恐懼性反應也是如此。勞合·喬治在1919年末期就開始利用人們對布爾什維克革命的恐懼，大肆宣揚“一小撮但是非常活躍的人不知疲倦地、陰險地利用我國勞工組織的力量達到顛覆國家的目的”。到了1920年底，由于醞釀的全面罷工威脅，勞合·喬治從議會得到范圍廣泛的緊急狀態處置權——當1926年全面罷工的威脅變成現實時，它給了政府所需要的鎮壓工人的權力。[[602]](#_602_13)

美國在北大西洋經濟體西邊，人們或許料想它比西歐和中歐遭受革命的沖擊要小得多，但是由于移民工人階級的強大力量，美國政治實際上受到的沖擊更大。作為保守派政治焦慮的“引雷針”而言，就連最赤色的蘇格蘭機器工人都比不上移民工人。在1919年突然爆發的反對外國人、反對激進思想的情緒中，非常明顯地借用外國經驗的進步項目突然陷于非常易受攻擊的地位。紐約州立法機構調查煽動性活動的委員會給《調查》、《國家》、激進工會以及睦鄰中心支持者等貼上“和平主義者、失敗主義者組織”等標簽。《紐約時報》攻擊普拉姆計劃是“通向列寧和托洛茨基原則的一大步”。沃爾特·李普曼在1919年11月憤怒地寫道：“在這時候，在內政問題上站在1912年西奧多·羅斯福的立場的人，在外交上站在威爾遜第一次到巴黎時的立場的人，以及在寬容原則上站在約翰·彌爾頓兩個半世紀前的立場的人，現在肯定、絕對要被指責為和平主義者、親德分子或者布爾什維克分子。”[[603]](#_603_13)

強大的利益團體已經表示反對的健康保險成為最明顯的犧牲品之一。在戰爭剛一開始的時候，健康保險的鼓吹者已經迅速把援引的先例從德國轉變為盟友英國，以避免被指控為“大普魯士主義”。但是這一姿態很少引起注意，“德國造”宣傳上又添加了“布爾什維克主義”標簽，健康保險被說成社會主義“國家醫療”形式。美國勞工立法協會在1921年還繼續推動健康保險宣傳，正如約翰·安德魯斯指出的，徒勞地抗拒“在停戰后興起的極端反動的潮流”。魯賓諾已經在1919年末放棄了斗爭，到巴勒斯坦指導一個醫療使團去了。[[604]](#_604_13)

希望這么強烈，失敗又這么干脆。早已存在的勞資關系模式的區別、布爾什維克主義牌的不同打法、不同的國家機構體制、高層領導的不同特征，都讓美國的下坡路比英國陡急得多。但是在美國戰爭結束也并不標志著簡單地返回原來狀態。像消退的洪水中挾著泥巴和沙礫的旋渦，戰爭集體主義實驗留下了一大堆殘渣。1920年代勞工關系的標志——正式確定的公司代表計劃，是直接的戰爭遺產。赫伯特·胡佛在戰爭期間參與開展國家推動的企業合作，他把這個經驗變成1920年代共和黨計劃的核心。再后來，戰爭期間集體主義經濟的經驗在羅斯福新政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從戰爭集體主義烏托邦經過夸張的重建計劃再到重大妥協后的殘余影響，這整個軌跡是國際性的共同特征。即使那些一直堅持美國得到上帝垂青與眾不同的人，也通過跨越大西洋的紐帶卷入這個戰后國際動態的旋渦中，就像卷入戰爭一樣。

在戰爭的國際殘余中需要考察的還有一個內容。1918年的一些美國進步人士覺得《勞工和新社會秩序》不僅僅是籠統的經濟和社會重建計劃。他們在“體力和腦力”勞動者的說法中看到了全新政黨的宣言：一個用理想主義語言為大眾利益代言的勞動黨，其中有知識分子如韋伯、麥克唐納發揮的空間；或者反過來說，一個得到工人階級選民支持而強大的知識分子政黨。《新共和》的編輯在轉載《勞工和新社會秩序》的編者按中說：“美國自由派在近期一個不可回避的政治任務就是推動美國工人的組織工作，以便發揮可觀的政治力量……在憲法爭論項目上，觀點越激進越好。”[[605]](#_605_13)

在某種程度上，腦力和體力勞動者的政治聯姻想法對美國進步人士來說是新鮮的。在一系列的問題上，比如市營化斗爭、工傷賠償運動等，進步改革者和工會領袖都是在同一戰壕里奮斗的戰友。但這樣的結盟并不容易，常受到阻礙，前者幾乎不加掩飾地蔑視工會領袖狹隘的團體利益追求，工會領袖則覺得這些進步改革派更多關心的是社會和平（和他們自己倡導和平的專家仲裁者地位）而不是工人具體的物質利益。在這個意義上，戰爭標志著進步人士和工人階級關系的試探性的、不徹底的改變，一種預示并幫助開辟后來新政道路的結盟機會。要通向這些新形式勞工和進步人士聯盟的前景有許多道路可走，對于美國人來說，最寬廣、最重要的是英國道路。

就像許多其他大西洋紐帶一樣，美國進步人士對于英國工黨可用政治模式的發現不是整體上的，而是零零散散的。《新共和》在英國投稿者幫助下發現它，其中許多人就是在戰爭期間的壓力下從自由黨轉變立場進入工黨的。[[606]](#_606_13)相反，《國家》改變則是因為對戰爭的懷疑。《國家》老板和編輯奧斯瓦爾德·加里森·維拉德在戰爭初期并非經濟上的激進派。他在1912年的選舉中渴望尋找一位能夠把美國帶回格羅弗·克利夫蘭道路的候選人。他甚至責怪戰前的《調查》過分同情勞工。但是維拉德戰爭期間的和平主義使得《國家》與國家的審查之手激烈沖突，所以編輯部吸引了一幫激進主義者，也讓維拉德和反戰的英國左派有了接觸。英國工黨在對似乎無休止的戰爭感到不耐煩時，開始與國內反對戰爭的少數派修補關系，并在1917年12月發表了清晰的和平目標。這個事件給維拉德留下深刻印象。在停戰后的幾個星期，維拉德到英國考察，尋找英國工人階級“人民的和平”的設計師拉姆齊·麥克唐納（維拉德的政治“理想典范”）和“圣徒般”的喬治·蘭斯伯里。到1919年，他已改變了戰前對勞工的態度，渴望出現美國政治重新調整，以便能夠促成知識分子和工人結合起來的民主力量，建立像英國那樣的聯盟。[[607]](#_607_13)

在進步編輯中，保羅·凱洛格是最接近于從源頭感受到英國騷動的人。因為迫切想知道美國紅十字會在法國的救助和社會工作情況，他在1917年夏天來到歐洲。和維拉德不同，凱洛格不是和平主義者；因擔心外交政策分歧導致雜志訂戶的分裂，他在美國宣戰后已經辭去在美國反戰聯盟的工作。但是毫無疑問，戰爭的殘酷性讓凱洛格情緒低落，他急于看到一些社會進步來充當這場災難的補償。在法國看到的景象讓他震撼，迫切需要的是更鼓舞人心的勞動而不是紅十字會的臨時包扎性工作，他回憶說自己在歐洲時“特別孤獨”。1918年1月他跨過海峽來到英國，參加了工黨的諾丁漢會議，驚訝地發現戰爭目標的辯論讓他著迷。凱洛格認為這里是帶著普通英國工人口音的語言說出來的伍德羅·威爾遜理想主義，是威爾遜的民主和非帝國主義和平理想。他在那年春天寫信給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說英國勞工運動“是當今歐洲最自由的力量，是與總統的自由國家領導權相平行的最可靠力量”。雷·斯坦納德·貝克從同年在英國的切身經歷中得出結論，用幾乎同樣的語調說，真正的威爾遜主義者不是在政府而在工人階級中間，“今天的工黨是英國公眾生活中的精華”。[[608]](#_608_13)

《勞工和新社會秩序》剛開始并沒有激勵凱洛格。他相信其中的國有化政策要點已經脫離了草根勞工階層的愿望：下放經濟控制權并使其民主化。但是從這個起點，凱洛格很快轉向對工黨國內項目的深刻羨慕。他在1918年4月寫到，英國勞工運動“既不同于傳統的工會主義也不同于從前階級意識強烈的社會主義”。這是“有機的”和“民主的”運動，旨在推動“戰時共同體特征”同時又沒有戰爭的標準化和侵犯個人自由。[[609]](#_609_13)

凱洛格對英國勞工運動的崇拜日益強烈還受到阿瑟·格里森的鼓勵，此人1918年初期帶領他在英國游覽，最后成為《調查》聯絡英國勞工運動的特使。格里森是時代提供的一個典型的例子，說明戰爭能引發怎樣的狂熱情緒，當戰爭政府不能回應它的時候，這種激情就迅速轉移到勞工運動上。格里森這個從耶魯大學畢業來到紐約雜志社寫漂亮“散文詩”的文靜、深刻、充滿理想主義的記者，在1914年戰爭爆發時，他正在英國創作一系列英國生活的文學速寫。他作為救護隊志愿者奔赴前線，很快參加到同盟國戰爭事業中。他在英國官方的暴行調查委員會對德國戰爭罪行作證，在美國雜志上敲響戰鼓；當第一批美國士兵最終來到歐洲時，他為他們講戰爭目標。他在1917年紐約的《論壇報》上連載的《英倫三島》一書是對英國因為戰爭而振奮起來的經濟和社會的熱情描述，目的就是激發國內進步人士介入戰事的熱情。[[610]](#_610_13)

正如格里森在1917年初期看到的，工黨在英國戰爭社會化場面中是靠邊的。“說建設性思考是勞工的貢獻是一種恭維，但這不是事實。”他喜歡把勞工運動的風波比作“毫無防備的可憐人遭受潮汐巨浪的打擊后手足無措”。其領袖沒有建設性遠景也沒有綜合性重建計劃，普通工人“沒有教育”、“缺乏想象力”。格里森在1917年初期通過西伯姆·朗特里和福利工業家初次接觸勞工問題，他的政治英雄是重建委員會的阿爾弗雷德·齊默恩和《圓桌會議》圈子里的社會帝國主義者。從這個角度看，英國勞工似乎很難把問題想出什么結果來。[[611]](#_611_13)

但是到了凱洛格1918年初期到達英國時，格里森的理想主義正迅速轉移到英國勞工運動上面，政治抱負的變化將使他深深投入到實現工人控制的運動中。1917年底英國工黨從專注于工會事務的狀態中蘇醒，改造成了真正的政黨而不再僅僅是工會聯盟的政治委員會，加上它從陷入戰爭機制困境的政府中挪用民主口號的做法，都幫助格里森進入工黨的軌道。在戰爭政府的權力胃口不斷膨脹的時刻，工黨下放控制權并使其社會化的目標在格里森看來是了不起的清晰思想。

作為《調查》的英國社會政治特約通訊員，格里森根據新材料寫成了第二本書《英國勞工和戰爭》，合著者還有保羅·凱洛格。這是兩人思想的結合：凱洛格渴望民主的、人民的和平，格里森對工業民主的興趣日益強烈。[[612]](#_612_13)到了1919年初，格里森口袋里塞著《調查》的薪水再次返回英國，作為該雜志的記者要報道正在創造的新世界。他再次尋訪朗特里，忠實地發回一篇關于惠特利委員會的文章，但是他相信真正的新聞在工會管事的運動、礦工的國有化運動、爭取勞工控制的新興力量。他給凱洛格寫信說“政府在住房、土地墾殖、海外移民、教育等方面的活動比不了”勞工的草根動蕩，“因為它們是項目和計劃，不是人的運動”。即使錫德尼·韋伯也不清楚這個潮流在往什么方向前進，雖然他夢想由沒有利益糾葛的公共管理者來分配有效組織起來的權力。[[613]](#_613_13)

到了1919年中期，格里森肯定歷史的潮流是在朝向自下而上的社會主義運動，以煤礦和工廠為中心的不成熟的、本能的、“沒有哲學的革命”。“白廳官僚機構的權力受到地方政府的削弱，就像國家社會主義在工人控制下得到緩和一樣。隨著執行權的擴張，就需要權力下放，這是英國式的平衡策略……一步一步、零敲碎打、雞毛蒜皮但切實可行。沒有整潔的法國定論、沒有教條主義的哲學、沒有德國中央集權的機器”，也沒有美國的“歇斯底里”。他再次描述自己意識到的潮流：“功能代表、產業工會主義、生產者參與控制、多元化的統治權……最近勞工的激情和動力全都在里面。”[[614]](#_614_13)

在1919年中期的動蕩日月中，格里森把所有這些東西發回《調查》辦公室。在傳統社會工作人士的強大壓力下，凱洛格大肆刪減格里森的文章，雖然總是道歉。針對格里森建議的讓《調查》和《新共和》合作在美國建立英國勞工運動永久出版渠道，凱洛格只是敷衍應付。但是實際上，到1918年底，兩人已經把《調查》拉入到自下而上形成的“新英國”毫不掩飾的同盟中。

維拉德、凱洛格、格里森等美國人對英國勞工運動情有獨鐘，部分原因是他們能看到在國內很難看到的東西：工人階級有充滿理想的心靈和善于思考的頭腦；而美國的工人大部分是長著奇怪面孔，操怪異口音的外國移民。考慮到塞繆爾·岡珀斯強烈譴責干涉勞工運動的“知識分子”，考慮到岡珀斯因為社會保險與美國勞工聯合會結下的怨恨，或者考慮到進步人士認為勞工堅持要把在工會隨波逐流作為獲得勞工部任命的主要標準，《勞工和社會新秩序》能夠公開邀請體力和腦力勞動者攜手這一點本身就讓人振奮。

美國人急于找到跡象表明勞工運動不僅自己思考而且愿意接受別人的思想，他們費盡心機尋找英國工人階級知性主義的每一條證據。工黨的費邊社紐帶，像麥克唐納和蘭斯伯里等著名的記者在黨內的領袖地位，煤礦工人選擇牛津大學教授作為他們在煤炭委員會的代表，以及純粹的“腦力勞動者”如錫德尼·韋伯和G.D.H.柯爾能加入工人運動核心領導圈等，都說明了這個問題。

因為同樣的沖動，他們迫切地抓住勞工運動的教育臂膀“工人教育協會”。雷·斯坦納德·貝克在結識了創立該協會的合作社人員阿爾伯特·曼斯布里奇后，迫切想把他帶回美國。曼斯布里奇的牛津老師和盟友（資深人士包括阿爾弗雷德·齊默恩、柯爾、托尼）、公共基金、渴望思想文化的技術工人，一起集中起來進行為期一年的經濟和勞工問題學習。在許多美國進步人士看來，這代表了美國工人與知識分子之間緊張和相互不信任的關系中所欠缺的東西。美國人對英國勞工運動的表述在1918年后總是把它說成建立在四根支柱上的房子：工會、議會中的工黨、合作社運動、工人教育運動。雖然任何講究實際的統計都可能把最后一根支柱看作牙簽一樣的小玩意兒，如果和其他支柱相比的話。貝克寫到“工人和學者的結合”是在戰時英國最激動人心的事情。格里森在1919年冬天要在工人教育協會更激進的競爭對手——勞工學院開設兩門課。[[615]](#_615_13)

當然，他們在談論英國的時候心中想的是美國問題。話題可能是英國勞工，但是核心文本是岡珀斯、威爾遜以及美國進步政治的未來。在這個上下文中，確定英國勞工政治的意義的斗爭只能在國內引起政治裂痕。凱洛格1918年春天剛剛從英國返回，岡珀斯就向他提出挑戰，要在強烈支持戰爭的全國公民聯盟聽眾面前與他舉行公開辯論。威廉·英格利希·沃林為支持戰爭的少數社會主義者辯護，污蔑凱洛格的報告是“親德國的和平主義宣傳”。在商人聽眾的歡呼和喝彩聲中，岡珀斯嚴厲抨擊“愛管閑事的知識分子”，這個《調查》、《新共和》、錫德尼·韋伯聯合體，以為他們比美國工人自己還清楚工人需要得到什么。[[616]](#_616_13)

岡珀斯和沃林已經在努力工作，要按照自己單純的工會主義和直截了當的戰爭愛國主義重新塑造英國的勞工運動——恰好和凱洛格、貝克、格里森的目標相對立。岡珀斯實際上已經從英國工會大會的邊緣挑選了做這個工作的人：“全國總工會”的威廉·阿普爾頓，他是相信男子漢自助的反社會主義者，這一點和岡珀斯本人非常像。威爾遜政府迫切想阻止協商和平的言論傳播，1918年春天派遣美國勞工聯合會領袖代表團試圖鼓起英國和法國擁有類似思想的工會主義者的戰爭決心。在7月份，政府為沃林的支持戰爭的社會主義者同行提供資金去游說海外社會主義領導人。在9月份，一個包括岡珀斯本人在內的代表團前往倫敦參加同盟國勞工大會。《勞工領袖》報道，岡珀斯站在大廳中央，頭上戴著帽子，一支接一支地抽著煙卷，準備好單槍匹馬地迎戰對社會主義或者中歐勞工運動的任何妥協。貝特麗絲·韋伯寫到，美國勞工聯合會代表團“堅決主張、一再主張說，至少自從他們參加戰爭后，戰爭是在民主和無私一方與獨裁和貪婪權力一方之間進行的。不管什么時候有人提出爭議，美國人就重復他們的信條——語速更慢，聲音更大，時間更長”。[[617]](#_617_13)

有關英國勞工政治的斗爭是要爭奪誰來控制和誰來代表工會運動的問題。它恰恰產生于岡珀斯的教條和凱洛格、格里森等人之感受的對比，后者感到英國1918年和1919年興起了流動性更強、更分散化的、“有機的”勞工運動。不是所有在1918年或1919年自稱進步人士的美國人都站在英國路線的勞工聯盟一邊。那些認為贏得戰爭勝利比國內民主重建等異想天開的空談更重要的人，以及認為對階級利益的任何妥協都破壞了無階級的公眾共同利益的人，還是對英國路線無動于衷。要不是戰爭的破壞和工人動亂，要不是戰爭國家膨脹的領域內每個經濟和工業關系的暫時政治化，使得那些關系面臨意料之外的嚴峻民主考驗，大西洋對岸的情形很可能引不起美國進步人士的興趣。但是在那個時刻，英國成為美國進步人士的橋梁，有些人通過它開始從中產階級專長和影響力的政治轉向像勞工一樣廣泛的民主社會政治同盟。

如何把半是借來半是想象出來的模式帶回家總是最困難的問題。有些想按英國工黨原則搞勞工運動的美國進步人士甚至親自加入勞工組織。通過他們的努力，勞工知識分子這個在歐洲比在美國更熟悉的角色開始緩慢在美國出現。弗里德里克·豪威是個著名的例子，他戰前發表的歐洲報道洋溢著對無階級的公共利益政治的忠誠。作為紐約港移民官員，豪威突然碰到戰爭期間的國家權力。因為他遲遲不愿意驅逐又一批外國激進分子，最終被迫辭職后，他放棄了中產階級社會政治，靠擔任普拉姆計劃的宣傳家在鐵路工會活動中闖天下。曾經是擁塞問題委員會秘書的本杰明·馬什成了鐵路工會主辦的機構“人民重建聯盟”的主席。[[618]](#_618_13)

格里森朝著同樣的方向前進。1919年底從“全都疲憊不堪”的英國返回后，他曾經在《自由人》找到出口，在那里他竭力支持在國會的空殼旁邊成立以職業為基礎的工業議會。在工業研究局，他研究煤礦問題，試圖“在美國掀起像英國煤炭聽證會那樣程度的辯論。他在1921—1922年作為工會“國有化研究委員會”的專家成員幫助礦工復興了煤礦國有化主張。他是1921年美國對應于英國勞工學院運動而成立的“布魯克伍德勞工學院”的校董。那年晚些時候在進步工會主義者合并成立工人教育協會美國分部的時候，格里森也是創始人之一。[[619]](#_619_13)

但是，對于受工黨思想激發的多數美國進步人士來說，勸誡比跨越階級滲透的這些例子來得更自然。他們心中想象的工黨不是工會大會的戴布帽子的群體，甚至不是工人中深入學習經濟史的受教育者，而是背后有真理和數字的宣言：跨越階級但沒有階級意識。由于受到《勞工和新社會秩序》的啟發，他們很容易地錯把它當作工黨本身。贊成單一稅的《大眾》在1918年春天用沒有諷刺意味的話問道：“此前非常蔑視工會主義的數千美國自由派在問‘我們怎么能和勞工接觸？’”其實，《大眾》也是最熱切推動這個問題的機構之一。[[620]](#_620_13)

進步人士的開始動作是1919年3月發表在《調查》、《國家》、《新共和》、《日晷》等雜志上的“致所有美國人的呼吁書”，針對所有“體力和腦力”勞動者。呼吁書的支持者包括豪威、《新共和》的赫伯特·克羅利和沃爾特·韋爾、《國家》的奧斯瓦爾德·加里森·維拉德、《自由人》的阿爾伯特·杰伊·諾克、單一稅制支持者阿莫斯·平肖和喬治·L.萊考德、社會宣講者約翰·海恩斯·霍姆斯、格林威治館的瑪麗·西姆柯維奇、西北大學睦鄰中心的查爾斯·朱布林、女性主義者夏洛特·珀金斯·吉爾曼、城市社會主義者卡爾·D.湯普森，甚至還有像霍普金斯這種1912年進步黨的鐵桿老兵——為了這樣的目的，一起松散地組織成了“48人委員會”。[[621]](#_621_13)

但是階級鴻溝不是單單通過一則宣言就可以跨越的。勞工斗爭在1919年不斷加劇后，傳統的勞工組織被越來越緊地逼到承認工會地位這一議題的墻角，他們不愿意用48人委員會里中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模糊理想稀釋自己的項目。面對勞工的缺席，委員會把目光轉向1918年末芝加哥勞工聯合會組織的獨立工黨。這個黨像48人委員會一樣無足輕重，它借用了英國名稱，吸收了幾百個地方工會組織參加，提出了一套進步政治綱領：工業由民主控制、公共服務設施公共所有、女性完全平等、戰爭利潤資本稅、社會保險、言論自由權利徹底恢復等。但是如果對比進步人士理想化的英國模式，即錫德尼·韋伯的頭腦和工會大會的肌肉相結合，結果只能是讓人失望的。查爾斯·梅爾茲在《新共和》上哀嘆說這個政綱背后沒有主導性的遠景，“其中沒有企圖像英國工黨那樣建造一種新社會秩序”。[[622]](#_622_13)

為了進行需要大量腦力勞動的思考，48人委員會把1920年的大會安排在工黨芝加哥大會召開的同一時間。但是在48人委員會的指導委員會（其中推動直接單一稅制路線的人占上風）和跨城鎮的勞工代表之間，只有很少一點珍貴的共識。委員會的領導堅持無階級工人黨政策，只要它努力爭取公共服務業的公共所有權；工會領袖要求工人黨追求工會權利和對工業的民主控制。由于談判者爭吵不休，48人委員會的基層成員沖向勞工大會——像1912年進步黨大會代表那樣高唱“基督徒戰士，前進”游行進入工黨的集會大廳，他們的影響力很快消散了。[[623]](#_623_13)

在1924年“進步政治行動會議”的提名會議上，進步人士再一次唱起了“基督徒戰士，前進”。這次體力和腦力政治結盟的倡議來自工會，遵循的是更傳統的歐洲路線，但這次聯盟的后果要大多了。在進步黨名稱的復興中，鐵路工人工會起了帶頭作用。他們在戰時國家經濟管理之下發展得非常好，但是到了1922年初期，隨著鐵路勞工委員會的解散，反對罷工的嚴厲強制令重現，加上一系列對工會組織權利非常不友好的法院判決，使他們迫切希望采取獨立政治行動。腦力勞動者再次表現出積極的意愿。奧斯瓦爾德·加里森·維拉德擔任會議的財務助理，弗里德里克·豪威作為秘書，本杰明·馬什作為實地組織者之一。1917年分裂時出走的社會主義者充滿熱情地重新加入。《新共和》和《國家》清楚提到英國例子，也表現了一種回歸。簡·亞當斯、保羅·凱洛格、杜波依斯、約翰·杜威、約翰·R.康芒斯、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保羅·道格拉斯等都表示了支持。當羅伯特·拉福萊特接受大會的提名進行1924年的總統大選時，連美國勞工聯合會都表明支持的態度。[[642]](#_624_12)

1924年的進步黨有工會支持的基礎和中產階級的上層結構，是美國本土上最接近英國工黨模式的東西了。拉福萊特在1924年贏得17%的選民支持，是人民黨在大選中獲得最大支持度的兩倍，是尤金·德布斯在社會黨鼎盛時期獲得的支持度的兩倍半。直到世紀末沒有另外一個第三黨候選人的支持度超過這個高峰。在議會制情況下，1924年的進步黨本來可以組建相當力量的議會立足點，一個為下一場選舉打基礎的強大舞臺。

但是這一次，工會開始警惕勞動黨政治，對進步人士盟友更加警惕。甚至在11月以前，當拉福萊特獲得全勝的機會開始變得越來越渺茫，柯立芝政府抓緊修補一些工會籬笆的時候，鐵路兄弟會就開始支持更傳統的經紀人政治。把政治看作市場的習慣很難扔掉，在這樣的市場里，工會最好是把最終的忠誠留給它自己，在一次又一次的選舉中把商品賣給出價最高的政黨。非常不愿意一下子把所有政治資源都耗費掉的鐵路工會也開始向中間立場退卻。礦工聯合會的約翰·劉易斯已經把1919年激進分子清除出去，并表態支持柯立芝。而美國勞工聯合會的支持沒有得到多少看得見的回報。

但是受到拉福萊特高支持度的鼓勵，社會主義者和進步知識分子迫切希望把“進步政治行動會議”變成永久性機構，但是工會為減少損失決定退出。當一個事實上的工黨在1936年后最終依附在民主黨地方和種族聯盟后，勞工組織在黨內將沒有正式的構成性地位。借用過程中理想化和思想化的英國工黨模式沒有辦法在美國堅持下去。大西洋進步政治中充滿了這種偏離方向的紐帶，時間點的距離足以造成關鍵的、結構性的差異。

但是，如果在戰爭退潮后留下來的東西只是理想層面的，我們也不應該低估它。哈里·萊德勒1919年末寫道：“有許多人感到華盛頓的政府注定要帶領美國直接進入集體主義國家行列，這種集體主義不是沒有……官僚制度和（通過政府債券利息）從前的股東大軍的慷慨支持，但是工業秩序已經遠遠脫離了斯賓塞式個人主義。”[[625]](#_625_13)回頭再看這個時代，很容易辨識出這種幻覺。受戰爭集體主義實驗啟發的進步人士錯誤地以為，1917年和1918年特別迅速的政策學習過程會是永久性的。他們錯誤地認為戰爭結束時的激情是“常態”。他們夸大了戰時國家在階級和片面利益問題上的中立立場。他們過分強調了公共利益的明確性和公共利益代言人責任追究的容易性。在1917年的信心中，他們很少認識到這些問題。像1914年的蘭道夫·伯恩那樣尋找別樣道路替代美國過分個人化的生活方式，多數進步人士是帶著迫切的期望進入戰爭的，H.G.威爾斯替他們說出了想說的話：要看看這個“偉大的國家”在加入高效的共同行動后到底能取得什么樣的成就。

但是對于有些進步人士來說，戰爭和戰后重建狂熱提供了階級關系的意外教訓。特別對那些最接近跨越大西洋政治的人，它教會他們對鞏固的權力產生新的懷疑，對小規模的、甚至與階級有關的民主陣營表示欣賞。從理想化的德國的破產中，他們學會了應該對強大的中央集權的歐洲國家保持小心。戰爭時期形成的擺脫私人貪婪和片面利益的、相互合作的整體經濟觀念維持了下來，但是同樣維持下來的還有對國家權威的新警惕，許多進步人士在1917年和1918年曾希望這樣權威的實現。進入新政時代，有人希望勞工運動能把市場造成的經濟結構民主化。其他人則尋找合作化道路那頭的任何形式。還有其他人認為可以在歐洲邊緣的小地方找到解決問題的答案。

# 第八章 農村的重建

## 合作農莊

社會政治議題開始于新事物。在受到經濟轉型影響最深的現代性邊緣，社會政治支持者把力量組織起來相互寬慰，交流經驗教訓，對控制問題感到擔憂。老式的貧困從來不能像勞工工資新領域那樣引起進步人士的興趣：老式的貿易也無法和市場商品化的外向沖擊相比：老式的生產也不能和人員集中、經濟力量龐大的新世界相比。分散在廣大農村地區的受傳統約束的人口剛開始根本就沒有引起他們的注意。

1872年在社會政策協會的組織會議上，沒有人提到農業的困境。十三年后美國經濟學家協會組織會議上也沒有人提到農民的苦難。1900年的巴黎，產業工人在社會經濟展廳中投下的影子是巨大的、毋庸置疑的。要在展品的迷宮中找到農村生活的經濟和社會材料需要特別的耐心。“社會問題”是雇傭工人的問題、勞工問題（Arbeiterfrage）、大城市問題、勞工和壟斷資本的結合問題。剛開始，農村完全在思想的另外一個領域。

但是從當時的任何人口數據上看，農村在20世紀很長時期內都是重要的存在。雖然農村人口一代一代像從水庫中漏水的小溪一樣輸往城市，村莊和歐洲鄉下仍然是獨立存在的大洲。從愛爾蘭到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越過普魯士和中歐平原，然后在地中海沿岸返回，歐洲鄉下包圍著城市和工業核心。在1930年，愛爾蘭和意大利的一半勞動力還在從事“原始的”經濟領域活動：林業、漁業，以及最重要的農業生產。在瑞典，類似的比例是39%，法國36%，丹麥30%，德國29%。在美國，玉米、小麥、棉花等農田一望無際地綿延在費城、新英格蘭、芝加哥三角區的西部和南部，農業人口的比例是22%。[[626]](#_626_13)

這么多的農村人口決不僅僅是可有可無的殘余力量。隨著普選權的普及開始出現農業政黨。在由都市和工業核心的議題決定的政治波譜中，農民政黨沒有固定的和可以預測的地位。農村利益問題能夠提出的基調受到政黨領袖、市場力量和政治環境的影響，從19世紀末期美國的民粹主義主張到19世紀末期德國容克控制的農場主聯盟，或保守或激進。典型的情況是，農業政黨在更強大政治參與者的場地上扮演充數的角色。但是當農民政黨把命運和工人階級政黨結合起來的時候，他們對進步政治的影響力就相當大了。瑞典就是一個說明問題的例子。這里的社會民主黨獲得長期執政就是因為1933年和農民黨的結盟而實現的。同樣道理，美國新政也是這樣，北部工人階級選民和南部棉農利益的結合維持了它早期的大膽措施。[[627]](#_627_13)

從經濟上說，農村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丹麥黃油、瑞典木材、新西蘭羊肉、美國小麥和棉花都在各自的出口經濟中發揮核心作用。在1930年代的法國和德國，農產品占了全國產品總量的五分之一：在意大利這個比例超過四分之一：在美國，雖然有工業制品和服務的龐大的國內市場，這個比例仍然達到十分之一。[[628]](#_628_13)農民的口號“一切下面都是土地”是對這種經濟狀況的簡單化和道德化說法。在農業黨看來，手工業者、工廠工人、銀行家和股票投資者、藝術家和牧師都裝點了文明，但是他們都得吃飯：從經濟上說，農民的土地和勞動支撐了所有這一切。這個主張有點夸張了，但是在農業經濟占這么大比例的情況下，其說法顯然包含了一些真理。1933年這么多最好的、最聰明的年輕新政支持者進入農業部決不是沒有道理的。在那里他們試圖弄清農業蕭條的原因，相信只要農村購買力恢復了，整個經濟復蘇的力量就回來了。

如果說農村具有的經濟、政治、人口等方面的重要性超過城市進步人士認可的程度，同樣道理，它也很難說像這些人想象的那樣一成不變。在這個時代，商品化的龐大機器在農村的作用并不比大城市或者工業城鎮的作用小。給土地及其產出的“商品”定價當然不是新東西。讓人不安的力量是農業市場擴張的規模和程度。隨著鐵路、營銷、信貸網絡等越來越進入農村深處，從前規模小、競爭力弱的貿易網絡在壓力下陷入崩潰。更多農產品開始越過更長距離的銷售網，經過更多中間商和加工者的參與，產品價格被更遙遠、組織更有效、資本化程度更高的參與者來決定。農村掙工資的勞動力沿著越來越密集的交通線和交易途徑，進入把城市和農村結合起來的勞動力市場，這個市場甚至跨越大西洋。至于土地，它已經成為越來越復雜的債務和貸款金字塔的場所，扣押權和抵押貸款、地主和佃戶討價還價的場所。農民或許仍然穿早已習慣的木屐：世界各地的農村人還要彎腰鋤地，滿口鄉村土話暴露自己的身份：地主或許從一磅的交易中，從佃戶或者佃農那里得到一磅半的尊敬，但是鄉村在對外交往上的遲鈍掩蓋著它越來越融入世界農業市場這一事實。

雖然如此，農村在一個關鍵領域與城市居民的世界不同。在力量集中的時代，農業生產仍然是地方性的、小規模的、個人的行為。就連在易北河以東最大的容克的土地或者紅河谷的富饒農場，在經營規模上都無法與經濟領域中的交通、銀行、制造業大公司相比。把工業勞動力組織起來比把農民組織起來要容易多了，雖然也存在困難以及危險的罷工武器等。農產品生產者一個個把產品送到市場上，他們對市場的控制力越來越小，越來越難以隔離市場風險。在農民分散和分裂的經濟力量與農業市場資本更充足、組織程度更高的參與者的力量之間，存在明顯的、經濟上是可感知的差距。

在這種持續的不平衡中，在商品和休閑方面的時代成就中只有很少一部分進入農場主或者佃戶的口袋。20世紀初期農業市場是經濟效率和未償付社會成本之間的經典聯姻。便宜的食物是以犧牲眾多農產品小生產者的教育、健康、理想為代價的。最弱小的農民，即愛爾蘭佃戶、美國黑人佃農、丹麥農業雇工成為北大西洋經濟體中最大規模的受剝削的、辛勞的窮人。

在這個背景下，沒過多久社會問題就讓進步人士把目光轉向了農村。社會政策協會在1880年代的議題中增加了農業經濟問題，理查德·伊利到1890年代已在培訓美國農業經濟學家。慢慢地，在都市社會改革者群體之外，農村社會改革者的國際網絡也開始出現。農民在其中不占主要角色，他們的政治傾向像他們的社會組織一樣是地方性、區域性的。北大西洋經濟體國家的農業社會經濟學中間人很可能是宣傳家、慈善家、農業經濟學家和教育家。有些人獲得了國際性聲譽，比如創立德國農業信貸合作社運動的萊茵蘭村長弗里德里希·威廉·賴夫艾森，愛爾蘭新教徒地主的良心、西奧多·羅斯福最喜歡的外國農業改革者霍勒斯·普倫基特。但是和政策交流的其他國際網絡一樣，是更小的、更謙虛的參加者組成的普通成員維持了它的存在。

這個類型的一個例子是威斯康星州的查爾斯·麥卡錫。他不是出生在農村而是在馬薩諸塞州的布羅克頓，他愛爾蘭出生的父親在那兒的皮鞋廠工作。麥卡錫14歲離開家到都市工人世界游蕩，憑著思維敏捷和橄欖球天賦半工半讀上完了布朗大學，最后來到威斯康星麥迪遜大學理查德·伊利的門下做研究生，兼當橄欖球教練。到了1901年，麥卡錫在威斯康星大學謀得教職和在州首府工作的職位，負責幫助立法者把思想更有效地融入法案中。進步法案的發動機“立法參考圖書館”很快就證實了麥卡錫的夸耀：“州改善運動的十分之九背后都有他的功勞。”[[629]](#_629_13)

麥卡錫的第一次歐洲旅行是1910年作為州貿易和工業教育特別委員會成員到德國參觀，但是他對海外立法實驗的間接體驗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時候。到麥卡錫的州辦公室參觀的人印象深刻的是傳單和樣板法規的國際色彩，“數千種報紙……幾乎包括了世界上每一種語言”。當霍勒斯·普倫基特在1911年路過麥迪遜宣傳工業合作社的時候，麥卡錫像其他人一樣對這個新想法非常著迷。麥卡錫的政治理想、愛爾蘭背景、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治興趣、作為主要農業州立法專家的地位，都幫助他和普倫基特很快建立起密切的友誼。在商定1913年親自前往參觀愛爾蘭和丹麥農業改革的成果后，麥卡錫根據普倫基特的愛爾蘭模式開展美國農業合作社運動，并派遣首批組織者到都柏林接受培訓。[[630]](#_630_13)

麥卡錫參謀部中的主要南方人克拉倫斯·坡進入國際農業改革領域的路線雖然不那么曲折，卻同樣是出乎意外的。克拉倫斯·坡出生于北卡羅萊納州農場，和麥卡錫一樣出道很早，想要找到獨特的謀生方式。作為北卡羅萊納最重要的民粹主義報紙《進步農場主》的實習記者，他很快收購了這家報社，在接下來的六十年時間里，他把該報作為向南方農民宣揚農業改革的講壇。到了1908年，克拉倫斯·坡已經積蓄了足夠的資金供一位年輕人到歐洲周游旅行。他本來打算參觀博物館和詩人的故鄉，但歐洲鄉村的精耕細作意外吸引了他的目光。克拉倫斯·坡對讀者贊嘆說在英國鄉下看不到破敗的籬笆、荒涼的土地，沒有泥濘的坑洼不平的道路，沒有文化深處的得過且過、沒有美國農村典型的輕率的農業浪費。法國農村同樣讓他驚嘆不已，“這里沒有泥巴，沒有溝壑，沒有荒草，沒有破落的房屋和牲口，沒有密灌叢豬，沒有丟人的佃農茅舍”。[[631]](#_631_13)

沒有佃農，沒有黑人，沒有美國南方這么大規模的文盲，沒有懶惰，沒有棉花和煙草的陷阱：克拉倫斯·坡充滿種族性和地方性色彩的觀點，南方讀者無需仔細破譯就能明白。當1899年北卡羅萊納選民遇到美國黑人的公民權剝奪問題時，克拉倫斯·坡為這個措施辯護。但是克拉倫斯·坡受歐洲人啟發對于無“散亂部分或者參差不齊邊緣”的農業的興趣，不僅僅是看到沒有美國種族制度特殊包袱的鄉村。克拉倫斯·坡在歐洲的所見所聞幫助他在民粹主義熱烈和抽象的言論與專家和農業改革者實際瑣碎的風格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兩次歐洲之行后，在1912年，他像有經驗的社會政治旅游者一樣明白了目的地：到倫敦親自了解勞合·喬治的新社會改革項目，看普倫基特在愛爾蘭的工作，以及丹麥農村。[[632]](#_632_13)

像麥卡錫一樣，克拉倫斯·坡帶回了對歐洲試驗過的各種形式農業合作社的熱情。歐洲政府的非理論的實用性也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他們對道路和貿易教育的投資，他們的郵局不僅把信件送到農民的家門口，還送包裹，出售人壽保險，辦理儲蓄業務。他的《南方人在歐洲》的獻辭，“獻給所有警醒的南方人，從其他時代吸取我們時代的教訓，從其他國家中吸取我們國家的經驗”，表達了克拉倫斯·坡的新政治身份。[[633]](#_633_13)

像克拉倫斯·坡這樣的南方人在大西洋進步紐帶的初期并不處于顯著的位置。該地區的大學和歐洲的聯系遠沒有北方大學那么頻繁。城市進步改革沒有在南方扎下根來。和其他美國人相比，南方白人不僅容易對外來東西產生懷疑，而且容易背負區域歷史的特殊包袱，因而造成一種和世界的雙重隔絕。對從前一無所知的歐洲實用農業改革的認識給南方進步人士強烈的震撼，推動他們走上大西洋舞臺，而城市公有公交車和掙工資者的風險沒有做到這點。因為認識到南方農業的落后和貧窮，以及這種落后對南方普遍福利的拖累，他們竭力要在歐洲的鄉村中汲取社會政治教訓。

在這種努力中，美國人加入了其他人的行列：如試圖跟蹤丹麥農業復興的可輸出經驗的愛爾蘭進步人士、研究比利時農業組織的英國調查者、在德國的印度和意大利農業改革者。他們都在尋求農業復興的秘密——以對農村小生產者不那么不利的方式恢復農產品市場平衡的可行措施。

正統的經濟學家對于農村貧困問題的答案很簡單：讓農村流失人口的過程繼續下去，直到過量的農業生產者削減到一個相對有利的程度，因為生產者過量會降低各自的最低報酬，注定導致永久性貧困。這種人口流失的天然終點就是城市。但是已經深深擔心大城市中社會等級分化，多數進步人士并不歡迎放任農村人口流入城市的做法。把農村中多余的小生產者集中在帝國不那么擁擠的地方，這是大西洋范圍內認為更加吸引人的做法，但不是所有國家都有實現這樣目標的帝國體制。[[634]](#_634_13)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試圖提高國家對農業利益的促進力度。關稅保護和出口津貼就屬于這個類別，還有國家農業專家刺激農民進行商業性農業生產的努力，教農民更詳細地記賬，在肥料、雜交種子、更新機器設備方面擴大投資，實際上，就是把農民和地主身份變成商人身份。這些努力的最大受益者是大生產者，而不是小業主或者（更少是）鄉下的佃農或打短工者。所有競爭國都在玩這個游戲，在他們激烈競爭奪取農業出口貿易的優勢時，不斷從對方學習改進自己的措施。但是促進措施難以避免的是民族主義意圖，在持久的國際意識和紐帶方面顯得比較弱。

在國際農業改革圈子中占主導地位是第三種方案。這種方案認為農村虛弱問題的關鍵不是農村人口太多，或者缺乏資本經營意識，而在于農村社會經濟的原子化，所以克服這些問題的法寶是社會“組織化”。要在農村形成合作的、社會連帶主義意識，在分散的、互不信任的小生產者之間推動新型合作機制，這是在吸引麥卡錫和克拉倫斯·坡等人的辯論中提出的獨特觀點。

至于措施則有很多不同形式。得到最廣泛贊同的希望集中在發展農業合作社。信用合作社提供了當地地主或者抵押銀行之外的選擇，購銷合作社是繞過本地飼料肥料商人的手段，牛奶合作社是當地商業乳品廠的替代選擇，倉庫合作社、飼養合作社、銷售合作社都有自己的發言人。在歐洲，經過了半個世紀的組織工作，形成了它們組織嚴密的協會性網絡。

另一些農業進步人士把希望建立在改善農村教育問題上。為農民提供經濟學知識，使他們對社會和歷史有廣泛的認識，更好掌握最新農業技術和方法，培養更深刻的合作精神，這些被看作更廣泛、更開放的農村文化的基礎而受到贊揚。他們相信文化復興將帶來經濟復興。

抱負最大的是從底層創立新形式農業社區的想法：從設計之初就要推動合作精神和社會團結的農業社區。規劃的農村居住區這個想法對于農村復興的辯論，就像烏托邦社會主義對于19世紀關于雇傭勞動的辯論一樣：實現的困難程度并沒有減弱觀點本身的吸引力。

所有這些方案，從19世紀末期到1930年代大蕭條時期以幾十種競爭性的形式在北大西洋農業進步人士中傳播。從賴夫艾森銀行到《聯邦農業貸款法案》，從愛爾蘭文化復興到威斯康星合作乳品廠，從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的墾殖社區到加利福尼亞中部的州屬農莊，從丹麥的民俗學校到它們在阿巴拉契亞南方的后代，形成了一個精心編織的網絡。具有國際頭腦的農業進步人士從來沒有完全發號施令，但他們的項目不管是從思想上還是政治上都給新政帶來了力量。

現代觀察家對農業進步人士感到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拒絕接受農村的宿命，無論這宿命是過去的惰性還是市場和價格的推動力量。他們堅信農村是柔韌靈活、容易改造的，農村偉大的內在運動可以隨有意識選擇的渠道而彎曲——特別是由于其他很多東西的命運取決于它。農村的經濟復興是問題的開始，但是在這之外還有一種意識，即社會組織的新普遍原則即將誕生——不管這希望是體現在合作社鼓吹者傳福音般的狂熱，還是在民俗學校校長的宣傳中。在農業進步人士看來，每個小業主在讓每個人變得更貧窮的競爭中孤立無援不僅僅是農村獨有的現象。正如1919年全國農村生活會議指出的，這是時代“個人化傾向和傳統”的標志。[[635]](#_635_13)

農村的社會模式是根本模式。要改造它成為“社會性更強”的形式，要給它注入更多“集體性社會行動”的內容，就等于抓住了國家的核心歷史模版。土地的社會模式是一切下面的基礎。為此，農民的口號表現出獨特的進步意義。

農業進步人士改革群體的所有機構中，在大西洋進步紐帶中發展勢頭最強勁的是合作社。1930年代的大蕭條中，合作社就成為關于農村重建辯論的固定話題。在擁護者眼中，合作社是重新構建生產關系的手段、購銷的新模式、道德和經濟價值重建的模版。在將近一百年的時間里，合作是公司資本主義的孿生兄弟、影子和進步替代品。

從歷史上說，合作社、投資公司、工會實際上有非常重要的共性。所有三者都是法律上和制度上的嘗試，要超越私有的、獨占的個人主義體制。所有三者都是把眾多的小資源組合成更大的集體力量。公司形式的天才在于其高超的聚集和擴張能力：從長遠看，工會的天才在于其阻撓和提要求的能力：合作社的天才（同時也是其弱點）在于創業和民主理想的結合——從當時經濟和政治科學的正統觀點看，那樣是應該很難融合的。

合作社的第一批宣傳家是烏托邦社會主義者。正是他們在1820年代、1830年代的法國和英國宣傳手藝人可以團結起來拋棄老板，重新獲得自己勞動力的價值：消費者可以團結起來趕走投機商和放債人：可以從自私自利的經濟剝削中再造世界，形成“真正的、社會商業新體制”。但是合作社更清醒和持久的機構模式是后憲章主義英國工人階級創造的。現代合作商店首先出現在1840年代英國洛奇代爾的手工紡織工人中，它們從成員手中籌集資本，按合理的價格將商品賣給成員，再以分紅的形式給成員分配利潤，根據成員表現出來的集體意志做生意。[[636]](#_636_13)

合作商店是自成一統的公司，實際上是集投資者、消費者、管理者為一個共同體。從政治上說，合作協會是小規模的簡單民主。在根據資本份額組織起來的公司中，投資者投票：一股一票。在合作協會中，正如19世紀英國合作者制訂的原則，成員投票：一人一票，不管背后的財富和經濟能力如何。

無論是從功能上還是從政治上看，結果都證明這樣簡單的形式適應性特別強。在英國，合作商店在工人階級和下層中產階級生活中深深扎下了根。英國合作商店的成員從1873年的35萬人增加到1900年的170萬人，再到1935年的750萬人。所有英格蘭家庭的45%和蘇格蘭家庭的55%在1930年代都屬于某個合作社。為了給地方協會提供便宜的商品，聯合經營的批發合作社積極進入生產領域，它們有自己的農場、工廠、煤礦、面包房、北海打魚船隊，甚至在錫蘭還有生產茶葉的種植園。[[637]](#_637_13)

不同的背景下推動產生不同的合作形式。在法國，合作者特別強調小商店和建筑領域生產者的合作，有時候讓國家充當積極的贊助人。在19世紀后期的德國，最強勁的增長是合作信貸協會。1840年代末由崇拜英國工人階級自助的赫爾曼·舒爾茨·德里奇介紹到德國：1892年在舒爾茨·德里奇的協會下面有一千多個合作信用銀行，該協會外面就更多了。十三年后，帝國合作信用聯社從總體上看占五大商業銀行資本總和的一半以上。[[638]](#_638_13)

如此眾多形式的機構很快進入鄉村。弗里德里希·威廉·賴夫艾森1864年在萊茵蘭組織了第一個農民信用合作社。到了1890年代中期，農村合作領域出現了包括普魯士國家本身在內的贊助者的競爭，迅速發生了跨越國家邊界的擴張。由意大利北部改革者從德國引進，合作人民銀行和農村信用社（casse rurali）靜悄悄地改變了意大利農村信用結構。在英國和德國合作社影響的交會之地丹麥，更加引人注目的轉變出現在農業生產和加工中。丹麥第一家合作乳品廠開辦于1882年，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該國一半的養豬戶和幾乎90%的牧場主屬于合作屠宰場或者乳品廠。[[639]](#_639_13)

歐洲沒有哪兩個國家的農業合作社是完全一樣的。德國農業合作社傾向于把多種功能匯集在當地一個共同的屋檐下。丹麥則相反，專業化是普遍原則。到了20世紀初期，多數丹麥農民屬于多個合作社：共有一臺脫脂器的乳品合作社、合作屠宰場和臘肉廠，或許還有合作飼養場、合作蛋類經銷社、合作商店、購買飼料和肥料的合作購銷社、一個或多個合作出口經銷社。賴夫艾森合作社開始于精神和道德復興議題，慢慢開始鼓勵商業農場的實踐。丹麥和愛爾蘭合作社一開始就是積極的現代化力量。查爾斯·麥卡錫在1913年第一批看見丹麥奶牛時，每頭牛身上都有“控制”其消費和生產的合作社記錄單，也不像美國奶牛那樣隨意漫游，而是明確規定每天用柵欄圍起來的一塊牧場。他認為這是科學管理的標記。[[640]](#_640_13)

不管采取什么樣的形式，合作社在歐洲鄉村經濟復興中的作用是確定無疑的。丹麥是最突出的例子。因為被普魯士奪走了南方省份，它的糧食生產在外來商業的沖擊下遭到極大破壞，丹麥在1870年代處于危機之中——就像對這段歷史的相似性感慨頗多的美國南方人經常指出的那樣。丹麥農民中的最下層是歐洲最貧窮的人。通過把糧食生產改變為向英國出口高質量黃油、雞蛋、臘肉的集約化生產，用多樣的、交叉的合作社把力量集中起來，丹麥小農場主到了20世紀初期已經再次享受到讓歐洲人羨慕的繁榮和富裕。霍勒斯·普倫基特的愛爾蘭農業組織協會迫切想用同樣的辦法提升愛爾蘭農民的生活，在1890年代初期竭力要實現愛爾蘭農村的“丹麥化”。在一定程度上，農業的未來不在于雇傭佃戶從事糧食生產的大型傳統農莊，而在于為周邊的大城市生產價值高、分級細的產品的精細小型農場：1890年后歐洲農村合作社的快速發展與此密切相關。[[641]](#_641_13)

合作社有能力采取這么多不同的工作形式，從生產達到出口等級的黃油到推銷“誠信和社會性商業”的新體制，它的政治特征就像蜥蜴隨著情況和環境的不同而變化。洛奇代爾先驅者剛開始是歐文社會主義者，舒爾茨·德里奇是古典形式的經濟自由派，賴夫艾森是基督教道德說教者，法國合作社（Union Coopérative）的查爾斯·紀德是持異見的社會經濟學家。在1890年代到1930年代合作社形成的高峰時期，幾乎每一個主要的歐洲社會運動都有合作社的參與。在法國，工廠和礦山所有者是合作零售協會的最積極推動者，（正如他們認為的）并非沒有一點兒鼓勵工人培養中產階級經濟美德的意思。在意大利，天主教會積極行動要建立合作信用銀行。在德國農村，容克保守派、賴夫艾森派、反猶主義者、國家農業官員都積極推動各自的合作社運動來競爭。[[642]](#_642_14)

到了19世紀末期，發展最快的是工會或社會主義者支持的合作社。正統馬克思主義者堅持認為自己的科學社會主義與前輩模糊的烏托邦主義存在巨大分歧，他們很難發現合作社思想中除了小資產階級的吝嗇烏托邦之外還有其他。但是由于工會和地方工人協會強力推動，勞工和社會主義者合作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成員數量在比利時和德國超過其他合作社。愛德華·伯恩斯坦在漸進社會主義的最重要宣言中承認，合作協會不是“社會主義”，但具備了“足夠的社會主義成分”，成為“社會主義解放不可缺少的杠桿”。[[643]](#_643_13)

簡短地說，合作社并不符合當時處于主導地位的經濟和政治類別。受到中間商、商業乳品廠經營者、商業借貸者激烈反對的合作社不是資本主義。隨著周圍競爭性個人主義文化的不斷加強，合作社成員顯得格格不入。甚至舒爾茨·德里奇也要求屬下的信用合作社在章程上寫上經典的勞工口號：“人人為我，我為人人。”[[644]](#_644_13)但是如果合作社不是資本主義，它也不是社會主義。合作社員鼓吹自助的剛勁形式，雖然這種自助是合作者把資源和能量結合起來共同提高。

結果，這個運動在社會主義者和資本主義者兩邊都不穩定。在比利時，工人合作社把利潤的一部分直接返還給社會工人黨的金庫，合作社充當了社會主義運動的主要新兵招募場。在戰時英國，合作社運動和工黨的命運結合在一起。但是在其他情況下，合作社與股份公司之間的界限往往是不穩定的。合作社根源于技術工人、手藝人、小農場主等社會團體，很少對窮人和沒有技術的人感興趣，主要通過聯合自身力量努力奮斗實現出人頭地的理想。尤其是在美國，普通合作者對獲得大機會的渴望非常強烈。

盡管模糊不清，缺乏穩定性，但合作社思想的獨特性和替代性從來不能被完全掩蓋。合作協會不僅僅是精心管理的商店、乳品廠或當地銀行。貝特麗絲·韋伯把合作社看作經濟生活民主轉型的組織中心點。法國合作者贊美“自私的垮臺”。他們給合作商店的命名體現了同樣的精神：“聯盟”（Union）、“新家庭”（Famille Nouvelle）、“團結”（Solidarité）。在查爾斯·紀德看來，合作社是超越自我利益和競爭的控制的下一階段：“注定要取代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645]](#_645_13)

一個如此變化多端，蘊涵如此深刻激情的運動很難逃脫在大西洋之間的拉扯。從1860年代的全國勞工聯合會到1880年代的勞工騎士團，美國工會一直是合作理想的節點。從內戰以后開始，每個農民組織也都曾經對合作社的思想著迷。在1870年代，在爭取脫離農村商店經營者束縛的斗爭中，“農民協進會”（Granger）會員從安排合作批發購物轉到合作購買農業機械。然后，當設備制造商拒絕賣給會員機器時，他們頑強努力，親自為會員設計和制造特殊收割機。在1880年代“農民聯盟”非常活躍，有全國范圍的合作糧食倉庫計劃。1902年到1910年間，“農民協會”和“美國權益平等協會”發展，希望農民能聯合控制某一作物的大部分來對抗商人和投機者，從而控制最后的價格。但是由于過分擴張，農民合作社一次次成為圍繞他們的繁榮樂觀主義的犧牲品。農民協進會的泡沫在1873年的蕭條中破滅了。農民聯盟會員滑向銀幣自由鑄造的許諾，農民協會的棉花聯營和美國權益平等協會的煙葉聯營到1910年都破產了。美國的的薄弱處不是在視野上，而是在于以地方為基礎的小規模基本合作模式——正是它在改變歐洲鄉村。[[646]](#_646_13)

在這方面，正如國際合作聯盟看到的，1910年代的美國記錄“特別軟弱”，這也是有理由的。英國合作社運動的基礎是牢固建立起來的合作零售商店，這在美國實際上是不存在的。1930年代以前都沒有計算過人數，美國零售合作社的成員如果按國家的人口比例衡量，可能不到英國的十分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合作信用社在新英格蘭和紐約以外的美國很少能找到，而在戰前德國數量達到16,000個。在新英格蘭，是法屬加拿大紡織工人越過邊界將合作信用社帶入美國，當然還有紐約的猶太人移民。[[647]](#_647_13)

美國鄉村重復了這種不平衡的模式。在明尼蘇達、威斯康星和衣阿華構成的中西部偏北三角區，部分建立在德國和北歐移民團結基礎上，谷物倉庫和乳品合作社的網絡開始改造區域農村經濟。在1915年，全國農業合作社的一半業務都是在這個地區開展的。在北卡羅萊納，1915年要求注冊和鼓勵農村信用合作社的法案開始產生首批稀疏的成果。但是除了在中西部偏北區和加利福尼亞中部的水果生產者合作社外，穩定的農業合作社就像夏天的冰霜一樣罕見。據估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德國農民中的四分之一是地方農業合作社的成員（共有約15,500個這種合作社），而美國在同一時期的比例只有不足10%。[[648]](#_648_13)

歐洲農業經濟復興中合作社的中心作用，以及它們模糊的、調解性的政治（和美國進步人士本身的非常相似），創造了一個再次嘗試進口的成熟環境。不過，這次的領導者是政策制訂者而不是農民。這次跨越大西洋的工程的主要聯絡人是霍勒斯·普倫基特。一位瘦小頑固的新教徒、盎格魯愛爾蘭貴族，普倫基特在大西洋兩岸的聲譽處在最高峰。西奧多·羅斯福聲稱要任命他為農業部長，如果允許任命外國人擔任這個職務的話。羅斯福的自然資源保護主義干將吉福德·平肖是普倫基特的親密朋友和崇拜者。克拉倫斯·坡把普倫基特的照片印在其著作《農民如何合作》的封面上。驚人數量的美國進步人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十年中前往都柏林的“普倫基特之家”拜訪。其中包括理查德·伊利、亨利·D.勞埃德、克拉倫斯·坡、平肖、麥卡錫、美國農村生活委員會八個成員中的三個（普倫基特本人在這個委員會成立時還發揮了指導作用）、羅斯福和塔夫托政府的農業部長、威爾遜政府的南方農業推廣項目主任，還有后來成為新政時期農業部長的年輕的亨利·H.華萊士。19世紀末期美國旅游者曾經對愛爾蘭的貧窮和幾乎從每個鄉村樹籬背后都會冒出的乞丐感到震驚。但是到了1913年，沃爾特·李普曼認為普倫基特的愛爾蘭是歐洲最激動人心的國家。他在那年秋天寫信給朋友說，一個月時間里他就沒有讀過其他著作。[[649]](#_649_13)

這個被稱贊的對象并非合作社思想的最初創造者。但是普倫基特有宣傳者不知疲倦的精力、與美國的密切聯系，以及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本人對美國紐帶的需要。普倫基特出身于愛爾蘭擁有土地最多的家族之一，在牛津大學畢業后返回都柏林外的老家，當時的他對未來沒有明確計劃。就像英國富有家庭的年輕子弟一樣，他渴望到美國發財。在1879年到1889年間他每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待在美國西部，或投機城鎮產業或在懷俄明州放牛或投資牧場聯合體，養成了他對美國事務和政治的濃厚興趣。他在后來幾乎每年都訪問美國考察自己的投資經營情況，到密歇根州巴特克里克的凱洛格療養院療養（吉福德·平肖是療養的伙伴），也傳播農業復興的主張。[[650]](#_650_13)

1889年普倫基特被招回家去管理家族財產，興趣轉向農業復興。愛爾蘭農業在1840年代遭受饑荒的破壞，在1870年代和1889年因為激烈的國際競爭、愛爾蘭農業的小規模這一傳統問題、無所不在的農業租賃、激烈的地租沖突等聯合影響而再次遭到沉重打擊。政府的解決辦法是補貼佃戶購買他們租種的土地，一個龐大的項目。普倫基特采取了另一個方向的措施：推動歐洲大陸風格的合作組織。到了1894年，他的“愛爾蘭農業組織協會”開始運行。借鑒丹麥的經驗，利用了脫脂技術的新變革，普倫基特的組織者很快在愛爾蘭成立了很多合作乳品廠。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愛爾蘭牛奶一半出自合作乳品廠，在價格和質量上都有了明顯改善。[[651]](#_651_13)

在合作思想縱橫交錯的種種趨勢中，普倫基特強有力地支持高效率的企業組織。在他三位一體的口號“農業好、生意好、生活好”中，他對美國朋友堅持說生意好最重要。愛爾蘭的失敗不是文化上的，他認為“他們落后主要是因為經濟和生意質量”。不過，盡管普倫基特努力推動生意思想，他的愛爾蘭農業組織協會從來沒有把項目窄化為單一目的。雖然普倫基特譴責“國民生活中的政治迷戀”，他卻毫不猶豫地繼承家族擔任議會議員的傳統，并以此說服成立愛爾蘭農業和技術指導部。作為該部1899年到1907年的部長，他開展了雄心勃勃的政府農業推廣項目，這比美國的史密斯—利弗農業推廣法案提早十年。作為愛爾蘭農業組織協會的秘書和《愛爾蘭住宅》的編輯，他聘請了筆名為AE的詩人喬治·W.羅素，用神秘的激情撰寫愛爾蘭即將擺脫貧窮、孤立、對個人家庭生存的“狂熱”專注——通過農村合作機構的重生。在美國，衣阿華州華萊士的三代人都貪婪地閱讀《愛爾蘭住宅》，在AE影響下長大的年輕的亨利·華萊士在1930年代初邀請詩人到美國農業部做關于農業重建的演講。愛爾蘭農業組織協會成為農業復興可能性的象征，原因在于其眾多因素的融合：脫脂器和詩歌、互助思想和生意原則、國家專業幫助和認真分級的黃油。[[652]](#_652_13)

除此之外還有普倫基特作為宣傳家的技巧。從1890年代中期開始，普倫基特向能接觸到的每個著名美國人談論他的愛爾蘭農業組織協會。到了1907年后，因為發表反對天主教會的誹謗言論而失掉了他的政府職務和政府對愛爾蘭農業組織協會的補貼，他創立跨越大西洋的支持基礎的愿望就更加強烈了。普倫基特對小約翰·D.洛克菲勒游說得特別殷勤，為了得到對愛爾蘭的數百萬捐款，他把對洛克菲勒那種陳舊思維、“狹小壓抑的房間和二流飯菜”的厭惡放到一邊，努力去說服這個大亨。[[653]](#_653_13)

但是，普倫基特最重要的收獲是結識了西奧多·羅斯福。他經常到白宮拜訪，兩位貴族交流西部牧場的故事，到了1907年普倫基特已經說服羅斯福成立研究農村問題和需要的藍帶委員會。美國鄉村生活委員會成員包括農業教授和進步農村記者，它在1909年的報告中支持“新農業和新農村生活的逐步重建”。它的關鍵詞是“組織”，直接來自普倫基特。在組織的時代，對鄉村非常不利的虛弱性就在于缺乏鄰里之間的合作，沒有強大的鄉村機構：分散的鄉村生活產生孤獨和“社會貧瘠”，任何形式的“組織”都極為薄弱。正是這些驅使農村孩子離開土地，削弱了農民的影響和地位，落在組織性更強的經濟活動參與者控制下。鄉村生活委員會的宣言代表了和從前農業激進主義的有意決裂。在農村生活專家看來，根本原因不是掠奪性的利益團體、壟斷農產品運輸的鐵路、銀行，或亨利·喬治所說的地主：除了有些針對農民“權利”的調解姿態之外，過去民粹主義者的許多議題都拋到一邊了。真正的罪魁禍首是缺乏足夠的“共同感受”、軟弱無力的“農村社會意識”——農民那種對自身不利的個人主義。[[654]](#_654_13)

鄉村生活委員會的報告體現了農業社會學的專業化并確定了議題。在接下來的二十年里，美國農業社會學家試圖繪制農村“社區”地圖，對比農民協會和城市居民協會的密度，提倡加強學校和教堂的建設。[[655]](#_655_13)對于羅斯福和普倫基特（羅斯福勸說他寫一本向美國人解釋該報告的書）來說，最根本的需要非常具體：能夠和歐洲密度媲美的農業合作社體制。到了1913年，普倫基特在努力創建美國農業組織協會，來推動“建立在合作原則基礎上的[美國農業]的徹底改組”。普倫基特在日記中寫到，平肖是負責人，威斯康星的查爾斯·麥卡錫做具體工作。兩年內，普倫基特說服安德魯·卡耐基提供了啟動基金。最初的兩個組織者，得克薩斯一位農業記者和威斯康星權益平等協會的一位組織者，在1915年夏天被派往愛爾蘭接受培訓。[[656]](#_656_13)

美國農業組織協會當然是大西洋進步人士紐帶的產物。它結合進步理想、卡耐基資金、移置的愛爾蘭抱負，旨在向北大西洋經濟體內最現代化的國家傳授最貧窮、最傳統的國家得來不易的經驗，這深刻地說明了它在交流中所處的時刻。但是由于大西洋紐帶，也產生了大西洋負擔。當第一次世界大戰蔓延到愛爾蘭時，普倫基特竭力要兩面討好的愛爾蘭內部的緊張關系加劇了，他的美國組織無法逃脫必然的后果。在中間立場越來越狹小的情況下作為溫和工會主義者，普倫基特發現自己的合作乳品廠受到愛爾蘭內戰雙方的攻擊。當民族主義者最終把普倫基特在都柏林的家焚燒成一個空殼后，他逃亡到英國避難。因為戰爭中得不到運動領導者的指示，普倫基特的美國盟友轉向其他項目。平肖放棄了合作組織的任務，麥卡錫先后擔任工業關系委員會的主任、戰爭期間食品管理局的職務，曾作為進步思想的民主黨候選人競選參議員，但沒有成功。正如崇拜德國的進步人士在1914年發現的，大西洋紐帶是雙刃劍，它既可以給改革政治以力量，也可以讓它們特別易受攻擊。

但普倫基特和愛爾蘭已經做了不少，把合作社思想注入到美國進步人士的核心議題中。對于重要的農業專家圈子來說，農業問題現在似乎不是市場存貨過多、土壤枯竭或者租種別人土地，而是不充分的社會形式和集體努力。公開的問題不是農業進步人士是否要共同努力推動合作社理念在美國的發展，而是在這么做的時候，他們是否能夠讓合作社實踐不偏離方向，掉進周圍的資本主義或者個人主義野心的大海。

第一個也是最關鍵的考驗發生在農場信貸方面。信貸問題一直是農村政治的痛處。因為遠離大銀行，受到商人和小城鎮銀行地方信用壟斷的控制，常常陷入債務危機，農民針對現存信用體制怨聲載道。鄉村利率很高，尤其是在銀行業不發達的南方，長期的、分期償還的抵押貸款根本就沒有聽說過。農民借兩年或者五年期的貸款，許諾在規定日期一次還清貸款和利息。考慮到農業價格和收入的變幻無常，事實往往不能如此。對于美國農民的許多需要來說，如果歐洲的農業信用合作社能夠超越政治和法律差異成功地進口到美國，那簡直就像量身定做的一樣。

這時候，中間人戴維·魯賓出現了。他是薩克拉門托市標新立異的商人，如果他出現在美國歷史上的其他任何時期——自學的歐洲專業知識不那么重要的時候，幾乎可以肯定他會默默無聞。此人出身于紐約正統猶太人家庭，十多歲就來到加利福尼亞闖天下。和同父異母兄弟哈里斯·韋恩斯托克一起，他創辦了不二價、不賒賬的紡織品店。在1880年代到圣地的旅行中感染了對農業的熱情，這兄弟倆在資產中添加了加州中部的水果農場。韋恩斯托克加入加州進步政治，開始滿世界尋找調解勞工糾紛的方法，并通過自己的努力贏得了美國工業關系委員會九人小組的一個席位。到處旅行的魯賓也到了歐洲，但是他心里想的是農產品價格偏低這一難題。[[657]](#_657_13)

相信只有讓糧食和市場信息在世界范圍內傳播才能讓農民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趕上運輸和金融托拉斯，魯賓敲了歐洲各地的門，終于在意大利國王那里找到了新國際農業機構的贊助者。1908年他把該機構的總部設在羅馬，開始深入體會歐洲進行的一代農業改革的成果。因為自己控制著一個傳單印刷廠，有大概五萬個農業組織的通訊錄，有數不清的《圣經》語錄和道德寓言，加上自學成才經濟學家的信心，他開始向美國同胞宣傳自己發現的東西。

像市場一樣，信貸處于農民困境的中心。魯賓明白，只要農民一直是土地多，現金少，他們就不能和擁有流動資金的人進行充分的競爭。他如饑似渴地研究賴夫艾森和舒爾茨·德里奇的合作社、意大利的信用銀行。但是抓住魯賓想象力的是更具異國風格的普魯士“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Landschaften）。作為普魯士國家組織和管理的土地所有者協會，“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實際上是農民或地主聯合抵押借款的機構，土地所有者通過它把擁有的財產集合起來，從而具備跟私人抵押銀行討價還價的能力。按合作運動的英國工人階級先驅的原則，“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不是真正的合作協會。它根源于從前的社團主義，國家作為他們的管理人，沒有假裝內部民主。但是出于一位推銷商那種迫切合并的愿望，魯賓認為“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體現了合作造成的經濟奇跡。農民不用一個一個到當地銀行請求貸款，魯賓想象美國農民協會在全國范圍投資市場海洋上流動金燦燦的土地抵押證券，以股份公司那樣的規模和自由來運作，把靜止的、潛在的土地價值變成“流動的資金”。他說，“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代表了美國方式的信貸，農民版本的“美國企業合并、美國公司、美國信托”。[[658]](#_658_13)

魯賓把他的思想，即農民腳下實際上就有無限的信用，帶到1912年4月納什維爾舉行的南方商業大會上，激發了代表們派調查委員會親自看看歐洲農村信用體制運作情況的強烈愿望。結果，美國的“歐洲農業合作和農村信用委員會”是那個時代跨越大西洋政策考察的最不尋常的機構。在魯賓的領導下，大約120個美國人在1913年夏天結隊來到歐洲，他們中幾乎一半是南方人。魯賓帶領委員會成員到賴夫艾森位于科布倫次附近的老家朝圣。（華盛頓的代表充滿熱情地說“憑空弄到數百萬美元”。）但是他們的大部分時間花在聆聽政府官員和農業專家的代表發言，就像組成了龐大的陪審團在聆聽證言一般——歐洲的專家知識集中起來讓美國普通人來評判。[[659]](#_659_13)

在促成委員會結論的斗爭中，大西洋兩岸的競爭者竭力爭奪優勢地位。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試圖搶先占有這個議題，通過對歐洲農業信用體制的官方報告，雖然贊美賴夫艾森合作社和“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但認為沒有必要采取聯邦行動來推廣任何一種模式。伍德羅·威爾遜在委員會動身前夕上臺，派遣了另外一個代表團隨同前往，隨后緊張地又派出另一個，更冷靜和謹慎地探討同樣的領域。[[660]](#_660_13)對魯賓沒有好感的普倫基特激烈游說要擴展調查的范圍，不僅僅局限于土地抵押貸款問題，并把旅行日程從意大利和德國改為丹麥和愛爾蘭。當委員會最后終于來到都柏林聽AE（喬治·羅素）和普倫基特的演講時，普倫基特無法掩飾他對“半官方半政治的旅游者組成的超級機構”的沮喪。[[661]](#_661_13)

實際上，委員會的結論本來能夠讓普倫基特高興的。多數人報告說歐洲農業“驚人的”事實是地方合作社的網絡。經過兩代人的努力，合作社已經帶來了農業繁榮，甩掉了歐洲農民落后的俗套觀念。合作社占據歐洲農民商業活動的三分之一到一半，成為“西歐農業經營的特征”。盡管委員會多數并不缺乏具體的建議，但歐洲壓倒一切的教訓是教育。農村復興首先要通過讓鄉村彌漫合作“精神”，有“社會秩序”的理想，“生存斗爭將讓位于工人的兄弟情誼：依靠共同努力獲得生活富足的人們將本能地首先想到集體，其次才想到自己”。[[662]](#_662_13)

委員會的少數派規模很小，但是其不同意見異常尖銳。美國農民因為種族、宗教、習慣和欲望而分裂為多個團體，完全沒有歐洲的互助基礎。他們沒有永久定居下來，形成足以監督各自性格和信用的密切的相互關系。和歐洲農民不同，美國人“野心勃勃，欣賞個人主義，渴望獲得財富和成功”。他們天生就是“商人”，“對分擔別人的財務負擔有一種天生的厭惡”。總而言之，美國農民是資本家，他們堅持認為和歐洲的對比沒有比這更突出的了。[[663]](#_663_13)

如果說美國農民的性格是接踵而至的辯論的核心問題之一，那么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合作社的自助與國家資助的關系。魯賓支持“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模式，把聯邦政府拉進來作為抵押貸款的最后擔保人。激進的農業組織則要求沒有歐洲那些復雜中介參與的、直截了當的政府貸款。伍德羅·威爾遜威脅說要否決任何為農民提供特別補貼的法案。普倫基特堅持合作協會必須從相鄰社區自下而上形成，魯賓認為合作社的天才在于在上層開發投資基金。[[664]](#_664_13)

在這些原則的不和諧聲音中，國家資助的鼓吹者更好地抓住了歐洲歷史經驗。正如所有美國人的報告都承認的，歐洲任何地方的農業復興都靠集體自助、慈善活動和國家資助的復雜組合所推動。如果不是國家資助買下愛爾蘭地主的土地，如果沒有德國農業關稅和國家資助的中央銀行給予地方信用合作社所需的流動資金，如果沒有愛爾蘭農業組織協會早年的半官方地位，美國人看到的畫面將是無法想象的。問題的核心不在于選擇立場，而在于找到一種有效的平衡。

美國的平衡法案——歐洲經驗和自身發明的復雜結合，終于在1916年在威爾遜遲到的同意后獲得通過。在新特許的私人土地銀行體系之外，《農業貸款法案》確立了區域抵押銀行的準公共體系，其貸款不是給予農場主，而是給予農場主的貸款協會。農民們組成這種協會，認可其成員的信用可靠性，愿意承擔集體風險的因素，就有權得到長期的、分期償還的、歐洲式的抵押貸款。而銀行把抵押貸款轉變成債券，在市場上推銷給私人投資者。這是魯賓的“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體系，聯邦投資擔保顯得頭重腳輕，不過能看出它的起源。但是在農業貸款法案的起草者眼中，抵押債券不過是開頭而已。他們相信在強制性的農業貸款協會周圍將會出現一批不斷擴大的專門化農民合作社，比如短期貸款、營銷、儲存和加工等，就像膨脹的晶籽周圍的結晶體。因為心里有歐洲農業復興的經驗，《農業貸款法案》的起草者把農村信用問題和農村社會組織問題結合成一個巧妙的整體。[[665]](#_665_13)

從農民迫切利用法案提供的條件這點來看，1916年的《農業貸款法案》一下子取得了成功。批評家們預測其合作機制將成為空文，結果卻相反，在法案的推動下出現了大約3400個農業貸款協會。到了1929年，依據該措施已經發放了超過10億美元的農業貸款。但是那些擔心美國農民是否能履行合作理想的人也不是沒有道理的。在讓人擔心的戰爭金融氣候下，加上法案是否違憲這個不確定性，通過出售合作抵押債券接通幾乎取之不盡的私人投資資本寶庫的承諾幾乎一下子煙消云散了。私人投資者發現在新的抵押體制下沒有利潤可圖，所以把錢投資到其他地方，讓聯邦政府財政部為該體系提供資金支持。[[666]](#_666_13)

在地方層次上，《農業貸款法案》的承諾和實際結果之間的差距更大。因為像精于算計的商人眼睛盯著不同的利息，農民很樂意建立必不可少的農業貸款協會，將現存的私人抵押貸款換取便宜的長期的公共貸款。但是他們對于貸款協會的民主管理沒有同樣的興趣。許多任命地方銀行家和商人作為協會的經理。法案的推動者曾經設想的作為農業貸款協會副產品的短期合作信用社沒有能夠變成現實。如果新的農村社會秩序的潛力確實休眠于農村，單單一個聯邦法案和大量的公共貸款并不能讓新社會秩序誕生。

農民合作社運動的高潮實際上出現在1920年代，看起來非常接近國家補貼的資本主義，共和黨政策制訂者和企業家組織者結為同盟。有效的組織引擎不是扎根地方的賴夫艾森合作社、小規模的合作乳品廠，或者村里的合作商店，而是區域性的大規模營銷合作社，把農民的產品收攏在統一的標簽下，集體與運輸公司、中間商討價還價。這種形式的供銷合作社是大西洋范圍的普遍現象，丹麥1914年出口的黃油中五分之一都是通過農民出口協會完成的。[[667]](#_667_13)但是任何地方的營銷合作社都沒有美國的這么繁榮或有這么大的經營野心。

用這種方式成功組織起來的第一批農民是加利福尼亞果農。到了1917年該州橙子的三分之二是通過加利福尼亞水果種植者協會出售的。受到戰后共和黨政府的鼓勵，合作營銷在1920年代初蓬勃發展。1923年的《農業信用法》把政府短期貸款直接交給營銷合作社。1922年的《卡珀—沃爾斯特德法》（Capper-Volsted Act）給予了農業合作社免受反壟斷指控的特權。1926年的《合作銷售法》免除了它們的聯邦營業稅。在商務部，赫伯特·胡佛把營銷合作社作為他農業項目的核心內容，部分原因是試圖避開要求直接價格支持的壓力，但同樣因為胡佛在它們身上看到了高效的現代公司的影子。胡佛認為，就像企業式組織從工業資本主義早期的“極端個人主義”中創造公司秩序一樣，企業式營銷合作社在國家適度的鼓勵下，也能為農業做同樣的事。[[668]](#_668_13)

在胡佛的社團主義理想外還必須加上美國農民組建農業卡特爾的迫切愿望，實際上也是趕繁榮潮的幻想。如果反托拉斯法的赦免給予農民合作社像工會那樣的地位，那么主要的合作社組織者兜售的遠景實際上就是壟斷優勢的夢想。這些野心的最有力支持者是加利福尼亞合作體制的法律設計師，也是魯賓—韋恩斯托克家族紐帶的另一個成員，阿倫·薩皮羅。他是個有才華的福音派教徒，從得克薩斯的棉花地到南方的煙草區到處傳播集體控制農產品價格的主張。

薩皮羅工作的短期效果是非常明顯的。在1923年到1926年營銷合作社蓬勃發展的最高潮，美國煙葉生產的一半是通過一兩個煙草協會營銷的。雖然棉花從來沒有被控制得這么好，在該運動的高潮時期，一百多個棉花營銷合作社也擁有棉農30萬人。正如薩皮羅堅持認為的，這就是大企業規模的商業農業。它的成功秘訣不是地方或者民主互助主義而是價格控制。薩皮羅態度謹慎：除非通過和成員簽訂有約束力的長期協議而形成穩固的市場地位，有希望獲得至少一半的農產品，否則這種項目就不值得做。大合作社的權力被牢牢地控制在高層。總而言之，農業合作社是通過穿上大企業托拉斯的外衣在美國興起的。[[669]](#_669_13)

在某些方面，這種壟斷資本主義形式和功能的借用，是我們現已熟悉的時機選擇的后果。19世紀歐洲的合作社在經濟領域的最初立足地只是被商業利益輕微占據。德國信用合作社是在商業銀行不愿意經營的領域找到機會的。在愛爾蘭，乳品合作社是利用了乳品生產上的技術革命。到了20世紀初期，當美國的運動最終開始興起時，可利用的經濟空間已經大幅度縮小，對抗性力量的組織性更強了。這種情況下，煙草種植者卡特爾密切模仿煙草加工者的寡頭壟斷，或者加利福尼亞水果、干果種植者卡特爾模仿他們所面對的鐵路的規模和市場地位，就沒有什么可吃驚的了。因為控制地方政治的當地商人成功阻礙農業推廣員鼓勵地方合作社的開展，合作社在地方層次上軟弱無力，只好從上層開始。

如果遲到是美國農業合作社結構頭重腳輕的部分原因的話，更大的原因在于農民自身的野心。在緊要關頭，多數農民關心的主要是價格，對合作社不感興趣，只想控制市場而不考慮身邊可持久的合作社勞動。在美國，讓人惱火的是，合作社和資本家協會的界限是漏洞百出的。合作乳品廠和糧食加工倉庫并不自動把成員限制為農民群體，它們由合作社本來打算取而代之的中間商和資本投資者來管理，甚至在有些情況下是由這些人發起的。許多地方農業合作社如果不是在法律框架下享受的一些特權，根本無法和商業企業區分開來。[[670]](#_670_13)在地方層次上民主管理非常欠缺，區域性營銷合作社甚至連假裝的民主管理都懶得去做。在最急迫的時刻，當農業卡特爾掙扎著要保證成員不至于過早廉價出售時，他們竟然墮落到使用暴力和威脅等手段。

許多大規模的農業合作社不是夢想著逃避價格體制而是想控制價格，結果反而成為市場變化的犧牲品。1926年煙草合作社在控制市場方面求之過急而失敗，合作社解散造成數千會員的流失。到了1927—1928年，它們實際上已經消失了。棉花營銷合作社的命運隨著棉花價格的起伏而動蕩不定。到了1927—1928年，其成員已經下降到“薩皮羅主義”高潮時期的一半。小規模的合作社反而更好地幸存下來。在1913年美國擁有3,000個農業合作社，到了1927—1928年間有11,000個，其中一半仍然位于中西部北方。芝加哥聯合屠宰場接收的牲畜的一半都是由它們集體運送的。美國奶酪的近三分之一是它們生產的。它們的糧食倉庫分布在北方平原州各地。[[671]](#_671_13)帶著戲劇性興衰傳奇的誘惑以及光鮮的商業化的美國外衣，合作社進入了鄉村，在美國心臟地帶存儲下歐洲人的觀點。

但是讓合作社適宜對外輸出的可塑性特征同樣也意味著：任何地方的合作社實際上都是其周圍政治文化的敏感試驗。形式上的靈活性促使合作社思想與比利時的社會黨政治、與19世紀德國賴夫艾森的道德提升項目、與AE（喬治·羅素）的愛爾蘭詩歌聯姻，在美國卻讓合作社理念遭遇到周圍的商業野心。移植到美國的過程中擠掉了合作社反對資本家的沖動，放大了它貪婪的欲望。美國很容易地擁抱了合作的形式，卻拋棄了超越資本主義的社會秩序理想。美國文化把本來要改造它的催化劑給吸收掉了。

## 島嶼社區

對于有些通過進步人士眼光看待歐洲農業的人來說，新舊世界農村生活最引人注目的對比不可能從歐洲日常的合作社中找到。實際上，差別在定居模式本身。大西洋兩岸觀察美國和歐洲鄉村的人士不會看不到其中的差別。展現在人們眼前的歐洲鄉下就像一系列的小村莊。人們從一個村子越過土地或者牧場邊界到另外一個。每個村子都是一個密集的結點，圍繞著教堂或者市場擠在一起的農民房屋和彎曲的街道。與這種集中在一起的居住方式不同，美國鄉村極其分散的農莊確實是突出的例外。歐洲鄉村的空間設計讓人看到就是紐帶和義務。美國模式等于是個人主義的視覺語言：每個農家都被相連的大片土地包圍，每個農場主就是自己私人領地的國王。[[672]](#_672_13)

正如經常出現的情況，眼睛往往夸大了現實。歐洲農村的聚落形式像美國的任何地方一樣，可能是激起怨憤的溫床，也可能造成迅速的暴力沖突。相反，美國鄉村分散的農場掩蓋了相互之間的社會紐帶——一方面是互助性聯系，如相互借東西、一起干活、星期天拜訪：另一方面是強制性聯系，如地主所有制和種族控制等。[[673]](#_673_13)在大西洋兩岸，地方性的例外總和主導性模式不同。歐洲也存在分散的農村居住區，在美國也存在集中的農村居住區：猶他州沙漠中摩門教徒的四平方英里居住區，是心里想著上帝的紀律建成的：新英格蘭的曾經非常繁榮的農業村莊的殘余：阿巴拉契亞谷地和山凹的沒有計劃的集中居住區。

雖然如此，考慮到所有這些變化，歐美農村對比仍然是明顯的。美國鄉村存在大量的城鎮——商業中心點，有商店、農產品運輸設施、信貸和農業用具中心、雄心勃勃的小鎮資產階級。但是大部分農民并不住在這里。由于邊疆區域的不斷移動、便宜且很容易轉讓的土地、故意設計的聯邦宅地法案等政策，加上方便的鐵路，使得農民居住得很分散。這里的主導模式是趨向分散、保持距離和獨立。從大西洋角度看，美國鄉村的反常之處是農民沒有居住在可以親密交流和日常合作的距離內，甚至不在相互能聽見喊叫的距離內。

19世紀初期美國人很驕傲地承認這點。對于共和國的海外游客來說，老式集中居住的農村是舊世界落后的證據。被貴族的廣袤土地包圍在中間，以便牧師和莊園主代理人能夠更嚴厲地發號施令，農民緊湊的村莊似乎在表明歐洲權力不平等的普遍現實。美國南方獲得解放的奴隸在1865年后盡力逃脫原來那種農業模式，拉著他們的棚屋來到田野里。一個美國人在1890年代抱怨說，歐洲鄉下小村莊“擁擠在彎曲街道上的可憐的兩層房屋”，離農民干活的田地步行兩三英里的距離。在許多美國觀察家看來，這是落后的、沒效率的、不民主的、荒唐的。[[674]](#_674_13)

但是在進步人士對于社會和政治敏感性的重新評價中，農村改革者開始懷疑以無序的洛克式個人主義為特征、沿著地平線一個接一個農場推進的美國模式，感到是深陷在過去泥淖中的模式。弗里德里克·豪威在1919年提出批評，說美國農村的主導設計是“無政府、無組織、無確定性，不利于社交活動，讓人感到孤單，缺少所有正常男人和女人都需要的東西”。北卡羅萊納州大學農村社會經濟學教授E.C.布蘭森1923年在德國南部寫到，美國鄉村的“致命”缺陷在于其“孤立的農莊”、普遍的“孤獨”、缺乏真正的農村“共同體”。美國鄉村地廣人稀更加強了農民經濟和政治上的無組織。在這樣的環境下鼓吹經濟合作簡直等于在迎著草原大風吹口哨。要真正復興農村意味著為歐洲農村最持久的習俗之一找到它的美國新形式。[[675]](#_675_13)

20世紀早期農業進步人士不是第一個宣揚更集中定居點的必要性的人。對美國農村的考古會發現各種形式的更加集中的農村居住區私人實驗，它們在不同程度上結合了宗教紀律、烏托邦政治和不動產投資等。那些鼓吹重新集中的農村的進步人士繼承了先例，但又有所不同。他們計劃中的鄉村群體是世俗的、科學的，不是教會的、烏托邦的。他們的目標是從許多微薄的財產中創造出集體的民主力量的新利息。因為農村的健康如此依賴它，僅有私人理想主義發動機是不夠的，這一次，國家將成為規劃中的農村社區的支持者。

美國農村生活專家中的許多人認為，重新改造農村生活物質框架的想法是不現實的。絕大部分的農村人完全排斥這種想法。但是通過在西部山區、干旱的澳大利亞、普魯士東部平原、加利福尼亞中部等地錯綜復雜、相互聯系的水資源和土地政治，為農村居住區制定新物質框架的想法甚至也進入美國。

規劃的農村定居點這一思想的關鍵人物是灌溉工程師、自學成才的社區規劃師艾伍德·米德。1920年代初期的肖像顯示他是個溫雅的、慈父般的人物，和1920年代典型的商人不容易區分開來，除了他缺少一只胳膊之外，那只胳膊是在一次電車事故中失掉的。米德出生在印第安納州南部，在他家的農場長大，在第一次有機會時就離開家鄉去上大學，希望將來當土木工程師。1880年代末期他在懷俄明州找到土地工程師的工作。在土地開發和礦山開采都依賴供水的西部州，工程師的主要工作是爭奪水權，這是19世紀末期各種競爭性主張、怪異的野心和明目張膽的欺騙的淵藪。溪流沿岸土地所有者覺得可以自由宣布他們能想到的任何東西作為潛在的水需求，競相往上游走要勝過對方的水權主張，然后把投機的灌溉開發賣給運氣不好的農場購買者。這種體制讓講究秩序、努力工作的米德非常惱火，他幫助懷俄明州修改憲法，賦予該州比西部其他地方都更廣泛的水資源裁判權。米德從這個工作開始了作為灌溉和公共土地政策專家的生涯。被胡佛大壩圍起來形成的米德湖是他最持久的遺產。胡佛大壩是在他1924年到1936年去世期間作為美國墾務局局長主持建設的工程。相應地，米德的灌溉工作讓他成為農業定居點建設的專家。他成為美國國家推動的農村建設的最顯赫鼓吹者、新政居住區建設的祖師爺。但所有這些都要求收集美國以外的經驗。[[676]](#_676_13)

澳大利亞是米德迂回旅行的驛站。1907年擔任維多利亞州河流和供水委員會主席后，米德在澳大利亞待了八年，負責落后干旱地方的水資源開發。他繼承下來的灌溉工程其實是1880年代來自美國人的靈感。土地是19世紀澳大利亞最變化無常的政治議題。大牧場主中的許多人是本世紀初擅自占地者，他們控制著落后地區。而土地激進分子對土地壟斷表現出亨利·喬治式的怒火。迫切需要替代性的定居點模式，想改革的州政府派一個委員會在1885年到加利福尼亞考察加州如何使用集約的灌溉農業逐漸取代了綿羊牧場主。

委員會考察的加州灌溉開發是私人的投機行為。維多利亞州政府借鑒了目的，改變了手段，把這個想法轉變成雄心勃勃的公共工程——大壩和干道運河，以此把墨累河盆地變成小農場聚集區域。取得政府投入是與澳大利亞政治傾向相一致的。因為缺乏定居者也缺少私人資本，世紀之交的澳大利亞人熱切渴望政府推動的投資來幫忙，這種愿望比其他任何說英語的國家都更強烈。高關稅壁壘、對非白人移民的限制、慷慨的公共基礎設施投資、進步的勞工保護法律、公共推動的定居點等都是澳大利亞“殖民國家主義”的組成部分。[[677]](#_677_13)

米德剛來時的問題是干道運河的水白白流走，田地里卻沒有水，國家投資幾乎完全沒有回報。擁有與運河毗連土地的牧場主和小麥種植者沒有興趣為了更集約的農業生產開發他們的土地：都市工人階級雖然對土地壟斷者感到憤怒，也對精耕細作的農業沒有實際興趣。當時的批評家和后來人都曾提出謹慎的做法是把投資當作打水漂了，承認這是個代價高昂的錯誤。但是米德有更大的野心并且能使得別人栩栩如生地看到美妙的夢境，就像他們自己在做夢一樣。提高針對放任土地干旱不灌溉的土地所有者的稅負，米德的機構買斷他們的大片土地，再分成小片，開辟灌溉小渠，建造房屋，種植莊稼，從歐洲招募移民來此耕種，并為他們提供占售價大部分的貸款和適當的管理以確保這些人有效地使用土地。[[678]](#_678_13)

米德的詆毀者聲稱他試圖把加利福尼亞的模式生搬硬套在一個地方，這里生產的眾多水果和蔬菜可能賣不出去。米德從一開始就不喜歡放牧的澳大利亞，稱其為“巨大內陸陰森森的孤獨”。他看待澳大利亞就像看待懷俄明一樣，非常憎惡土地投機者。如果他這種思想不等同于單一稅信徒，至少非常接近單一稅傾向，他迫切希望看到土地最大限度地充分使用。但是如果米德從美國西部引入了某些土地政治的內容，他也給澳大利亞帶來了更遙遠的觀念。他在1903年夏天到意大利的波河流域考察，對意大利小農場主們有能力用最少的水權訴訟去經營復雜的灌溉合作社印象深刻。1910年他對歐洲進行了更為詳盡的考察，一方面是要在潛在的移民中推銷到澳大利亞定居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是要看什么樣的優厚條件能夠吸引精耕細作的歐洲農業生產方式在墨累河盆地上扎根。他從普倫基特館到丹麥到處尋找歐洲的模式，要阻止人口從土地流失。在米德看來，印象最深刻的是德國“家園聚居委員會”，該機構用民族主義的巨大努力防止東普魯士的破產農莊落入波蘭購買者手中，買斷大量的產業后，把德國小農場主遷往那里，并為他們提供種子、房屋、工具和專家幫助。[[679]](#_679_13)

澳大利亞的政治環境，連同米德在歐洲學到的東西，造就了他花費下半輩子時間去宣揚的事業。在1910年他寫到，他在維多利亞州開始的工作在美國“肯定被稱作瘋狂的社會主義”。澳大利亞國家不僅擁有鐵路而且有冷凍運輸車、冷藏庫，能很方便地讓農民接近世界市場：如果罷工導致鐵路線缺少燃料而面臨關閉的威脅，國家只需購買自己的煤礦就行了：國家還擁有儲蓄銀行、森林、街道公交系統。在此背景下，推廣公共農業定居點沒有一點矛盾，十分吻合。[[680]](#_680_13)

1915年返回加利福尼亞擔任加州大學鄉村制度教授后，米德很快進入進步政治圈子，隨身帶來了澳大利亞的國家觀念。和從前任何時候一樣，土地仍然是關鍵問題。因習慣于利用花哨的廣告宣傳、農民的無知、水供應方面似是而非的信息，州私人土地開發公司再一次成為引起爭議的內容。在土地開發公司把沒有價值的邊角料土地賣給新移民買主的威斯康星，理查德·伊利的圈子正在制訂計劃讓州委員會管理土地開發企業。在加利福尼亞，米德說服加州聯邦俱樂部（Commonwealth Club）的商人進步人士支持對中央山谷更有秩序開發的大膽方案。正如在維多利亞州一樣，展示的土地開發工程是直接由政府機構運作的。哈里斯·韋恩斯托克促成米德被任命為新的“州定居點和農業信用委員會”主席。經過兩年大力的游說活動，立法機關批準了土地聚居的想法。米德通過在伯克利的辦公室的繁忙通信監督這項工作。由140個家庭組成的乳品業聚居區1918年在奇科附近的達勒姆成立。第二個更大的農村聚居區1920年在圣華金河谷的德爾亥啟動。如果米德的計劃順利實施，很快還會出現至少五六個聚居區。[[681]](#_681_13)

在很多方面，州土地委員會工程總結了米德的澳大利亞項目，它的成功米德一有機會就大吹大擂。州土地開墾協會購買土地，把它重新分割成10到60英畝的小農場，修整和挖溝以便進行灌溉，挑選最有希望的申請者來使用，為他們提供長期的抵押貸款，并種上頭一茬莊稼：所有這些都在定居者得到土地之前完成。但是在兩個方面，加利福尼亞的做法和米德的墨累河項目不同，這都觸及了美國進步政治深層的緊張關系。第一個是該項目集中了大量來自大學的專家，教授們蜂擁到兩個聚居區來就像警惕的母雞。加州大學土壤科學家推薦聚居區的地點，州建筑師設計房屋和農莊，加州大學一位畜牧學教授挑選要飼養的動物，大學培養的常駐農場經理提供日常貸款和農業建議。[[682]](#_682_13)

米德的第二個創新是更加精心開發的社區概念，這在澳大利亞是沒有嘗試過的。在維多利亞州，米德的“密集居住區”項目是分散的、填充式的項目。然而在德爾亥、達勒姆則是集中起來的小農場，其設計就是要展現集中在一起的合作優勢。為兩個聚居區制訂的紙上規劃包括了符合最先進的城市規劃思想的社區中心。達勒姆的規劃包括會議大廳、學校、游泳池、網球場、永久的家畜展示廳：在德爾亥，小農場盡頭以規劃的村中心為樁固定。雖然從空間上看，聚居區的固定樁是社區活動中心，但是從經濟上說，聚居區的關鍵機構是強制性的農民合作社。種子、機器、牲畜都是通過合作社購買，牛奶通過合作社銷售，牲畜飼養受合作社管理，農民的自我管理也是通過合作社來實現。合作、大學專業知識、澳大利亞“殖民社會主義”、高度關心的家長制作風（來自米德和常駐管理者）、少量類似經濟民主的東西，以及長期存在于進步人士心中的社區理想等都融入了這樣的設計中。

很難過高估計1918年和1921年間的這種組合所引起的關注。幾十個代表團心中想著20世紀農業的命運，前來參觀達勒姆整齊規則、點綴著一座座平房和高大橡樹的農場土地：或者參觀德爾亥的竭力抗衡牧羊場吹來的風沙的果園、葡萄園、花園。在澳大利亞，米德提供了國家規劃的土地居住區作為打破大牧場主壟斷土地的手段，讓國家在大壩和運河上的投資發揮效益。在美國，米德通過大量的文章和演講，用另一番說辭來描述聚居區：作為農村階級關系全面危機的解決辦法。米德堅持說，農場主擁有土地的歷史已經一去不復返了。因為傳統農場生活的單調和孤獨，農場的孩子逃向城市，他們家的土地被資本充足的投機者以下一代拓荒者出不起的價格攫取，然后再租給新的佃農。隨著20世紀初期美國佃農數量的上升，米德的焦慮也被提升到更廣泛、更緊迫的程度。

米德還在這種重新封建化的鄉村圖畫上添加了種族主義傾向。當時英裔加利福尼亞人對德爾亥的孩子和附近日裔美國人農家孩子上同一所學校這個傳言反應強烈，在美國退伍軍人協會支持下舉行抗議：米德從前的澳大利亞同事堅持限制亞洲移民：德國人要讓德國農民重新擁有東普魯士土地的工作也很早吸引了他的注意。米德的種族主義雖然并不比這些人更厲害，但畢竟還是很強烈的。米德抱怨說從家庭農場流出的人口是“美國人”的撤離，地主招募來填補空缺的佃農是墨西哥人、日本人、中國人、葡萄牙人和印度人。更加讓土地管理委員會看到這一問題緊迫性的是，緊挨著德爾亥聚居區北邊出現了一個私人支持的日裔美國人農業聚居區，這里有工作勤奮的小農場主和社區范圍的合作社。[[683]](#_683_13)

“加州是白人世界的邊疆。”米德在1920年對舊金山聽眾說。到達勒姆、德爾亥申請土地的黑人被支往別處：看到德爾亥廣告上寫“全美國人”的社區，看到美國退伍軍人協會的海報置于村中心最醒目的地方，亞洲裔美國人知道怎么回事，根本就不去申請。但是重新把“白種”美國人吸引到農場來不光需要種族意識。米德堅持說，精耕細作的灌溉農業是新邊疆的出路，要讓它發揮經濟效益就需要國家指導加上完全不同于“從前無計劃的個人主義農村社會”的合作社。原始的鄉土主義、世界范圍政策潮流的國際呼吁、烏托邦主義和警惕全結合在一起。加州土地管理委員會的聚居區不僅僅是開墾試驗，還是未來的潮流，是“新社會機體”模式和“更好的新農村文明”。[[684]](#_684_13)

闖入米德項目的戰爭為他的觀點提供了更廣闊的背景。加州的努力在1918年夏天剛剛開始，米德就被招募到了華盛頓特區，那里對轉業軍人經濟未來的焦慮感很強烈。米德促使把他的標記貼在戰爭集體主義情緒挫敗時唯一一個幸存下來的官方重建計劃上。在勞工部，弗里德里克·豪威和路易斯·波斯特已經在進行部分模仿勞合·喬治的大型戰后公共工程計劃，要用政府支持的農村定居點來吸收沒有工作的人。在內政部，部長富蘭克林·K.萊恩正兜售一個在西部墾區工程中由政府資助建立士兵定居點的項目，用來吸收無地的、垂頭喪氣的、可能發生暴動的轉業士兵。米德的貢獻在于說服萊恩改變了觀念，從在無主的公用土地儲備中劃撥土地獎勵個人，轉變為建立有規劃的集中定居點。由于豪威和米德的宣傳工作，加上萊恩的游說和接近百萬份的內政部傳單（“嗨，你想擁有在農場的家嗎？”），內政部軍人聚居區項目讓重建旗幟一直飄揚到1920年。對戰爭軍人有特別優惠的德爾亥定居點成為這個想法的第一批受益者。[[685]](#_685_13)

不管建議多么宏偉，國家支持的軍人農墾村的試驗并沒有在全國范圍內展開。認識到離開故鄉的老兵不是萊恩想象的布爾什維克火種，人們很快開始反對這個計劃。克拉倫斯·坡和《進步農場主》一樣站在農村居住區一邊，但是在已經擁擠的市場中添加政府資助的競爭這一威脅，讓多數農民和他們在國會的盟友反對這個項目。隨著1920—1921年戰爭推高的農產品價格出現暴跌后，這種反對的聲音就更加激烈。[[686]](#_686_13)

米德的加州聚居區尤其沒有做好應對1920年代初期農業衰退的準備。德爾亥的問題最嚴重。因為建在需要有昂貴的水泥管灌溉系統和管理成本的地方，只有馬上銷售掉土地才能補償損失，德爾亥在價格下跌時就慘了。在1922年到1923年米德和德爾亥的農場管理者辛苦對付購買需求減弱的問題，發起宣傳攻勢，派遣招聘人員到東部尋找潛在的買家，試圖通過能量和意志力對抗農業的普遍衰落。但是因為投資回報的前景不樂觀，土地銷售緩慢。當補充債券議題在1922年的投票中以微弱票數失敗后，米德不再直接管理加州土地聚居區，接受了新南威爾士和巴勒斯坦的顧問任務。德爾亥定居者要求免除他們的貸款，加上內有戰爭老兵的支持而更加膽大，竟然把米德的肖像從社區大廳取下來掛在樹上。當德爾亥定居者最終獲得特殊優惠待遇后，達勒姆定居者提出法律訴訟要求得到同樣的優惠。到了這個十年的末尾，州政府回到保守派政治力量的掌控中，注銷了這兩個陷入困境的聚居區，拋售它在米德“家長制”實驗中的股權。[[687]](#_687_13)

但是典范聚居區的經濟困難并沒有耗盡規劃農業聚居區的主張。這么緊密地交織了多股進步政治的農村理想，它的理論依據包含異常活躍的流動性，會根據眾多變化的需要而重新建立起來。或許米德用中央集權的、澳大利亞式做法扭轉了美國鄉村生活改革者關心的內容，或許他重新社會化的農業前景是依靠專家管理和顧問而頭重腳輕，或許他的“把政府放到農業上來”（他的敵人這樣說）的主張隱含著公眾代表們不愿意接受的過多成本和風險，或許他認為個人主義農業已經黔驢技窮的觀點激起了農民的不滿，但是，這么突出地模仿外國經驗的米德聚居區實在是聚集了進步人士想象力中太多的內容，不可能被完全拋棄。

因此，規劃的農村聚居區的失敗迫使它尋找更好的機會。米德曾希望農墾局接收這個項目。愿望受挫后，他在南部進步人士中又激起另外一撥支持者。其中一個就是與眾不同的土地開發商休·麥克雷。此人自從1920年代初期一直在鼓動人們對一個私人融資的、農業化的“美國式萊奇沃思”的興趣，它將在北卡羅萊納州東部建設精耕細作的10到20英畝的環形農莊。麥克雷的“農村城市”工程擁有著名的進步人士加盟的顧問委員會（鄉村生活委員會的克拉倫斯·坡、平肖、萊恩、凱尼恩·巴特菲爾德、阿爾伯特·蕭、雷·斯坦納德·貝克，米德本人也在其中），其選址計劃由雷蒙德·昂溫最好的美國朋友約翰·諾倫來做，其宣言指責說因為農村沒有能滿足現代“渴望社會和有知識伙伴”的需要才導致農村人口流向城市。可以說這是進步人士改造落后和原子化農村的夢想的另一個變體。[[688]](#_688_13)

米德給予1920年代末期發現他的南方進步人士的貢獻，是接近農墾局基金的可能性，和一個仍在等待適當需求和政治機會的現成辦法。同盟者選定了一個議案，按照達勒姆和德爾亥模式在南方每個州開墾的土地上建立規劃的農村示范社區。米德和麥克雷召集的推動該建議的群體中不乏南方土地和鐵路投資者，他們迫切要提高自己擁有的松林地的市場價格。但是對于同盟中的鄉村生活改革者來說，項目的根本內容是“人的改造”。北卡羅萊納大學農業社會學家E.C.布蘭森在解釋規劃聚居區的最新理由時寫到，“南方農民……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農民的生活都不同”，完全陷入孤獨和無知。不是靠增加學校或者農場代理人的數量就可以改變的，只有實際展示出來的別樣居住區模式才有望改善。因此，米德的方案原是為補償公共灌溉工程費用，后作為解決農村階級關系危機的辦法，還曾短暫地作為吸收轉業軍人的措施：現在又被他的南方支持者轉變為讓南方農民對其低效率的、個人化方式感到羞愧和受到教育的新途徑。[[689]](#_689_13)

在可以借用的政策和環境固定的政策之間，在可以選取的政策與深植于政治和社會環境之中而無法選取的政策之間，關鍵差別就是靈活性。在傳統情況下，靈活性體現在手段和形式上，但是在形式抓住了想象力的另一些情況下，可動的部分就變成了理由闡述。集中了空中的這么多對比和焦慮，專家規劃的合作農場成為解決一直延續到1930代初期的一個又一個問題的流動的答案。雖然它無法實現，但在新政前夕它也不會消失。

有人把農村的虛弱歸咎于經濟組織的分裂和個體化，有人把它歸咎于土地上分散和孤立的居住模式，除此之處還存在第三種人。在他們看來，農民的最根本弱點在于他們的思想和價值觀。鄉村的原子化，“缺乏組織和凝聚力”使得弱小的農民成為其周圍組織良好的利益團體的犧牲品，對合作社的懷疑使他們更容易受到那些利用農民經濟幻想賺錢者的影響等，這些或許都可以追溯到觀念和文化根源。[[690]](#_690_13)

在一定程度上，這個觀點是無法反駁的。合作社成功與否依賴于它們的成員能否形成比占有性的個人主義更大的信念。從賴夫艾森合作社到米德的加州農場聚居區，沒有一個農村重建運動不為這一方向的強大宣傳努力留出空間。但是如果土地方式最終是由文化決定的話，要開始的地方就是學校了。

問題是要弄清楚教授什么東西不會讓農村的處境更加不利。讀書識字和農業技術教育顯然是農村人的利益所在。會計算的佃農不會自動具備免疫力防止商人地主在算術上的欺詐，但更有能力和他們討價還價。技術先進的農業合作社在農業市場上比僅僅由貧窮和低效率結成的合作社有更多優勢。困難和障礙在于找到教育的形式，把農村小孩帶到讓人陶醉的讀書學習和城市生活的潮流中去，同時不刺激抱負遠大者盡快逃離農村。AE（喬治·羅素）寫到，城市只需點頭招呼，世界各地的農村人就流向城市——隨著報紙、圖書、集中的學校讓人們看到思想刺激和知識狹隘的鮮明對比，流失速度更快。[[691]](#_691_13)農村學校怎么才能在啟蒙人的思想時不加速讓最聰明的農村孩子逃離農村，最終不導致遲鈍和愚蠢的人繼承土地呢？

對于在這兩難困境中掙扎的人來說，北大西洋經濟體中最重要的國家是丹麥。美國一些進步人士在戰前已經找到了丹麥，克拉倫斯·坡和麥卡錫就是其中的兩位。費蘭德·P.克拉克斯頓在從田納西農場到美國教育部長的職業生涯中，1896年碰巧發現一所丹麥民俗中學，使他成為美國南方民俗學校的積極推動者。布克·T.華盛頓宣稱丹麥是戰前黑暗歐洲農村唯一的一處亮光。但是因為丹麥缺乏一個像普倫基特那樣的媒介人物和歐洲更大國家的吸引力，對戰前丹麥的宣傳不利。教育旅游協會1914年歐洲公民和社會旅游分配給丹麥三天時間，塞入了它的信用社和乳品廠合作社、城堡和博物館、養老金制度、典范住房和典范的垃圾處理技術。美國農業合作和農業信用委員會1913年只是把丹麥作為選擇性的附帶旅行。[[692]](#_692_13)

但是在戰爭對國家名聲的重建中，丹麥在美國進步人士心中的地位急速上升。1920年初期的愛爾蘭在內戰中消耗掉了，德國從經濟上說已經大傷元氣。美國進步人士在1919年后對于美國頭重腳輕的戰爭國家感到幻滅，在他們看來，小規模具有了新的優勢。最熱烈崇拜戰前德國的進步人士弗里德里克·豪威到了1920年已經把熱情轉向丹麥。正如豪威看到的，推崇合作的丹麥是個看不到國家權力常見的浮華裝飾和虛榮的聯合體：這是一個“只關心自己領土內的精細發展和三百萬人口的幸福生活”的國家。豪威認為這個事實本身就使它成為“現代世界最有價值的政治展品”。約瑟芬·戈德馬克在1930年代中期用同樣的方式描寫丹麥社會政策，新政管理者聽到她的姐夫路易斯·布蘭代斯說：“在可以去丹麥的時候為什么還要去俄國呢？”正如1927年一位美國觀察家說的，丹麥徹底擺脫了“歐洲政治的旋渦”，暫時處在進步人士世界的十字路口。[[693]](#_693_13)

到了1923年，布蘭森報道說丹麥已經被外國投資者“踏平了”。待在丹麥鄉下的兩個月中，他遇到了來自日本、維也納、柏林、加拿大以及漢普頓學院、阿巴拉契亞社會服務社等的教育者，更不要說一火車的英國牧民、一個社會工作者云集的會議，所有這些人都是來學習丹麥農業復興的秘密的。他相信“這個時候丹麥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都受到這類學生徹底地研究”。

他們是農民和農業組織官員、大學教授、各級各類的老師、從實際生活而不是從故紙堆里做博士論文的研究生、立法委員會和受托團體、國會議員、華盛頓農業部的實地調查員、英國議會議員、內務部選派人員、睦鄰中心人員、社交秘書、公共福利官員、代表美國社會工作基礎的研究生、為關于丹麥的著作而來收集資料的作家、斯堪的納維亞—美國獎學金學生，等等。

他們都“把丹麥當作政治學和社會經濟學的現場實驗室，相互交換地址和介紹信”。[[694]](#_694_13)

為了推動北歐國家與美國相互交流而成立的美國—斯堪的納維亞基金會為研究丹麥農業合作社、丹麥工業組織和丹麥民俗學校提供特別的獎學金。后來成為美國農業部合作營銷局第一任局長的克里斯·克里斯汀森獲得了其中之一。第一個以丹麥為模式的美國民俗學校創始人奧利弗·坎貝爾獲得了另一份。同樣還有年輕的美國黑人社會學家E.富蘭克林·弗雷澤，不過考慮到美國種族敏感性，該基金會從公開宣傳中刪掉了他的名字。[[695]](#_695_13)

在丹麥的多數進步人士參觀者心中地位最高的是農業合作社。豪威斷定合作社是丹麥農業復興的關鍵。布蘭森得出了同樣的結論，在丹麥的幾個星期內，他看到丹麥農民的生活水平與北卡羅萊納艱難掙扎中的貧困形成鮮明對比，“真是讓我的頭腦熊熊燃燒”。農村城市的推動者休·麥克雷承認他幾乎被丹麥農業合作社的“能量嚇壞了”。在南方種族分界的另外一邊，富蘭克林·弗雷澤在九個月詳細研究返回后，支持在南方黑人中建立小規模農業合作社，作為種族仇視的大海中自力更生的經濟民主小島。[[696]](#_696_13)

較少美國人注意到土地改革的國家之手在丹麥農業復興中的作用。因為擔心在鄉村經濟中最貧窮、最受剝削的領域的鄉村政治動蕩，丹麥政府在1899年啟動了一個項目，為處于邊緣的農場佃農購買自己的小塊土地提供政府補貼。政府的目的并非完全無私的。在該法案下進行的買賣大部分只有七到八英畝，雖然足以讓所有者在農村落腳，但是不能確保他們從農業雇傭勞動市場中抽身，大農場主需要雇工干活。雖然如此，小土地法案促成了丹麥式農場租賃的大幅度下降。該法案經過擴展、放寬，最后在小土地社會主義者聯盟的推動下成為肢解一些最大產業的工具。在1850年，42%的丹麥農場經營者是佃農：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雖然小土地所有者仍然是丹麥農村明顯孤立的社會和政治群體，但是現在只有10%是佃農了。[[697]](#_697_13)

美國進步人士對自己國家的佃農率感到警惕（在1880年到1920年已經從26%上升到38%），按說可能愿意宣傳丹麥的小土地立法。但是土地改革在憲法上非常困難，代價高昂，在南方還受到種族政治的困擾。布蘭森雖然是北卡羅萊納州“農場租賃和農場所有權資助委員會”的成員，但他幾乎沒有注意到丹麥的土地改革。甚至豪威也沒有推薦它，他還自我欺騙地相信丹麥農業學家是擁有共同利益的單一階級。

如果說美國進步人士系統地弱化丹麥社會政治中國家之手的力量，倫敦和曼徹斯特的熟悉問題在丹麥也很少進入他們的意識。丹麥的工人、周期性失業危機、社會主義者和沖突，都要比閱讀進步丹麥報告的美國讀者可以想象的更多。1920年丹麥工人開始了總罷工。1924年，和第一屆英國工黨政府幾乎同時，丹麥社會主義者組成了自己的第一個短命政府。但是美國進步人士不去看丹麥勞工和資本家的戰爭或者實際上的丹麥政治。他們到丹麥時心中想的只有農業共和國。他們很少能夠不從本國鄉村的角度來看丹麥，正如布蘭森說的“眼角處總有北卡羅萊納的影子”，他們的印象緊緊圍繞著隨身攜帶的膠片。[[698]](#_698_13)

但是，如果說社會主義者和國家往往掠出了美國人的目光之外，丹麥的民俗學校則吸引了他們的注意力。美國進步人士在民俗學校中發現了丹麥農業合作社統計表中令人困惑的數據的答案：農民從個體到合作共和國的轉變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民俗學校也是許多丹麥人自己喜歡講的故事。它們比合作社還古老，形成于還處在德國侵略的余悸中的1860年代。到了1870年代每年大概有三千年輕人加入，到了1920年代后期，有人估計丹麥農村人口中可能有三分之一在年輕時都上過民俗學校。

實際上，民俗學校是19歲到25歲的農村年輕人聚會的場所，男女在不同的時段，在一個季節從各自的農場或者村子集中到一起。從教學法來說，民俗學校的任務是文化復興。其中很少講授美國農業學院教材上的經濟農業之類內容。很多根本就沒有書，也沒有成績或者考試。他們的課程安排通過丹麥文學和歷史的討論，結合了丹麥的文化民族主義與合作社群生活的經驗，這些都在唱歌、集體游戲和老師激動人心的講課中得到強化。民俗學校的創始哲學家尼古拉·弗里德里克·瑟弗林·格倫特維，他本人就是把斯堪的納維亞民間文學從貴族沙龍的奚落中提取出來的關鍵人物。民俗學校對于丹麥農業復興的作用就相當于詩人改革者AE（喬治·羅素）試圖為愛爾蘭農業復興所做的一樣——即便不是精神動力，至少是日常實際合作的精神附屬部分。[[699]](#_699_13)

在這個框架內，民俗學校的變化很大。美國人傾向于參觀歷史最悠久的學校：從哥本哈根乘車一個小時路程的洛斯基爾德，或者培養民俗學校老師的阿斯科夫，那里白領子的學生和學院環境讓他們想起美國家鄉。在這兩處之外，更多學校的興衰主要依賴于校長（Forstaender）的個人眼光和魅力了，其中很多校長就是學校的主人。有些給予體操特殊地位，有些學習宗教。有專門為小土地所有者開設的特殊民俗學校：也有社會主義者資助、為城市青年工人舉辦的學校：還有為了增進世界和平而辦的，吸收外國學生。但是不管什么形式，共同生活的經驗和老師激動人心的“生活語言”是所有這些學校的核心。它們雖然宣揚民族主義，卻有多樣性：雖然是私立學校，卻得到國家學費補貼資助。正如丹麥農業合作社一樣，作為其文化附屬物的民俗學校自由結合了私人和公共力量。

丹麥民俗學校非常樂于向參觀者開放，甚至歡迎那些還沒有學會丹麥語的參觀者。加上參觀學校比考察農業合作社關系的迷宮容易多了，所以它們很快引起美國進步旅游者的注意。費蘭德·克拉克斯頓派遣了教育局特別調查團研究民俗學校的措施。布克·華盛頓忽略丹麥課程和他自己的塔斯基吉學院那種貿易學校培訓的差距，把他的項目掛在人家的聲望上面。漢普頓學院的《南方工人》刊登了關于民俗學校的最初一些報道，富蘭克林·弗雷澤是其中一位作者。[[700]](#_700_13)在1920年代，進步教育者組成了另外一個參觀團。[[701]](#_701_13)與美國進步人士想象力中的教育學家傾向一致，丹麥民俗學校的校長們傳達了美國參觀者喜歡聽的信息：如果有效農業復興的前提是合作，那么合作的前提就是教育——不是剝去農民根本聯系的那種學習，而是文化復興的教育。

不可避免的是，有些美國人試圖把觀察到的東西帶回家，在美國成立類似的學校。最忠實于丹麥模式的努力是克里斯·克里斯汀森在威斯康星創辦的學校，他是美國—斯堪的納維亞基金會獎學金獲得者、農業部農業合作方面的專家，現在是威斯康星大學農業學院的院長。克里斯汀森在1932年重新設計了威斯康星農民短訓班課程，把二十多歲的農村年輕人集中到麥迪遜進行四個月培訓，獲得他們在孤獨環境中得不到的浸入式體驗：歷史、藝術、社會學、經濟學課程，還有唱歌、公共演講和體育等活動。他們寫詩，在約翰·斯圖爾特·柯里的鼓勵和影響下畫畫。從密蘇里農場到耶魯神學院再到丹麥赫爾辛格任國際民俗學校老師的約翰·巴頓，被邀請前來講授丹麥土地改革和社會運動。合作組織課是必修課程。[[702]](#_702_13)

丹麥民俗學校固然很吸引人——精力充沛的年輕農民熱情聆聽老師的“生活語言”，但是這是不容易移植的東西。問題在于“民俗”。在某種程度上，這問題是虛假的，是翻譯中的錯誤。丹麥詞匯（Folkhøjskoler）的比較準確的翻譯應該是“人民的高中”。folk這個詞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攜帶的額外人類學含義在字面上是不必要的。雖然如此，沒有共同方式和文化的強烈紐帶、沒有生動活潑的集體生活傳統為基礎的“民俗學校”是無法想象的。

但是在美國特別明顯的文化異質性情況下，其農村是競爭性移民和種族亞文化的“百衲裙”，到哪里尋找美國版本的民俗學校的課程呢？人們到哪里尋找民歌、傳奇故事、傳統舞蹈、文學和歷史等能被農村年輕人毫無問題地當作自己民俗的東西呢？即使在威斯康星鄉下，農民的父輩或祖父輩很多是德國、波蘭、瑞典、芬蘭移民，也是在這方面形成挑戰。在這樣的困難面前，美國主流成人教育運動這么強烈地朝向信息和技術能力方面就沒有什么好奇怪的了，它不是要塑造共同體身份，而是要培養更有效的個人能力。

但是，在許多觀察家看來，有一個地方似乎吻合丹麥激發的農村復興的文化標準，那就是阿巴拉契亞，或者當時被普遍稱為南方高地的地方。民俗學校的南方崇拜者的理想很快在這里扎下根來。這里比南方其他地方在種族上更加單一，教育程度更低，遠離商業和現代性的腐蝕，南方山區正是成人教育實驗的理想場所。在19世紀后期，到南方山區來的外地人認為這里的文化是孤立的、衰退的，是世仇宿怨、私酒釀造、文盲愚昧之地。但是到了20世紀初期，歌謠和工藝品收集者開始在阿巴拉契亞尋找在其他地方已經消失了的技能和文化遺產，比如帶有伊麗莎白時代文化風格的歌曲、傳統的鄉村舞蹈、傳統的絎縫和木刻技藝等。在這個比商業資本主義更古老的文化紐帶中，或許可以找到復興運動的基礎。[[703]](#_703_13)

高地民俗學校運動的倡議者是重新評價南方山區文化的積極分子。奧利弗·坎貝爾是歌謠收集者先驅，當時少數人開始到山區尋找那些了解在郵購班卓琴流行之前的音樂的鄉村民謠歌手，她是其中之一。她的丈夫約翰·坎貝爾曾在1890年代從馬薩諸塞州的安多福神學院來到南方，在傳教士開辦的院校里教書。在1908年他說服新的拉塞爾·塞奇基金會增加南方高地分部，調查經濟發展另一端的農村，以平衡它的都市工業社會生活調查的項目。在1908年到1919年間，坎貝爾是該分部的唯一成員。他試圖運用在倫敦和匹茲堡完善的社會調查技巧研究這里的需要和資源，重新確定外來指導機構的工作。

如果和歷史活生生的聯系是這個地區的優勢，那么“極端個人主義”就是南方山區的弱點，正如約翰·坎貝爾看到的那樣。私酒釀造、世代結仇和暴力活動是區域特點，但是更大的文化負擔則并非阿巴拉契亞獨有。坎貝爾在1916年寫道：“個人主義是偉大的美國弱點，在山里人——幸存的原始美國人身上，自由主義被提升到至高無上的地位。”正如在美國其他地方一樣，這里“合作……是我們迫切需要的東西”。因為坎貝爾夫婦的志向從傳統的教育轉向關注文化與合作的項目上，難怪丹麥例子抓住了他們的想象力。克拉克斯頓首先告訴他們民俗學校的主意。戰爭爆發時，他們已經買好了到丹麥的船票，已經在為南方高地建造自己的民俗學校而籌款了。[[704]](#_704_13)

奧利弗·坎貝爾在1919年丈夫去世后開始實施他們的聯合項目。在美國—斯堪的納維亞基金會獎學金幫助下，她1922年和1923年在斯堪的納維亞待了14個月，大部分時間仔細觀察丹麥民俗學校，也曾經到愛爾蘭尋找AE（喬治·羅素）。到了1925年，她已經籌集了資金在北卡羅萊納州西部山區靠近布拉斯鎮（Brasstown）的地方購買了農場，作為“約翰·C.坎貝爾民俗學校”的場所。前幾年，它沒有招收學生，集中精力在鄰近居住的農民中開展地方合作乳品廠、合作養雞場、合作購銷社和合作信用社。在星期六晚上，學校邀請農民進來參加講座、農業討論和唱歌。當1920年代末第一批學生到來后，課程表包括歷史、文學、民間舞蹈、唱歌游戲、體操、在學校的試驗田上干活、復興山區手工藝。

阻止山區孩子流向城市的趨勢（奧利弗·坎貝爾極度不信任城市對人的影響），復興山區社會風俗而不是教育年輕人擺脫它們，同時把山區文化自我破壞性的個人主義轉變為互利合作，這些是坎貝爾民俗學校的宏偉抱負。相較于把書本知識灌輸到學生頭腦的典型農村學校方式，甚至相較于肯塔基州東部的松山定居點學校（Pine Mountain Settlement，參觀者注意到那里的學生是多么干凈、整潔，知道怎么使用餐巾，行為舉止“就像高貴家庭的有教養孩子一樣”），坎貝爾與傳教士那種教化傳統的決裂是引人注目的。在坎貝爾民俗學校沒有考試和學分，經過一兩個實驗后，她放棄丹麥式講座而改成討論課，話題圍繞整個世界，然后再回到山區農業問題上來。她籌集到資金幫助學校的畢業生購買附近的小型牧場。通過“南方山區手藝人大會”，她幫助推動了該地區的手工藝復興。她愉快地承認用“學校”來指她從事的活動是容易誤導人的。通過更聰明的農業、手工藝品生產、成立合作社等，她希望找到高地經濟和文化復興的新模式。[[705]](#_705_11)

但是，這些沒有一個真正解決“民俗”問題——這不僅是坎貝爾心里的問題而且是阿巴拉契亞本身就有爭議的風俗問題。方塊舞確實是本土色彩的，但是它們與喝酒和喧鬧密不可分的關系讓許多山區教會人員感到無法容忍。班卓琴和它那新式“鄉土”音樂在那些尋找活著的古老文化的人聽起來感到不舒服。在山村手工藝復興中心，外地專家刪掉糟糕的設計，把好的模型包給別人去做，這一切都是打著原始民間藝術的旗號。民俗學校的文化復興力量取決于它們有能力溝通深層的、前意識的集體身份特征。如果沒有這種特征和素質，該怎么辦呢？

面對這種不和諧因素，坎貝爾很難完全抗拒回避問題的誘惑，因而更加緊密地依賴進口的丹麥模式。早先她已經聘請兩位年輕丹麥老師負責學校的動物和乳品廠。學校講授的是丹麥體操。唱的是丹麥歌曲和坎貝爾最喜歡的阿巴拉契亞鄉土民歌的混合體，丹麥舞蹈（謹慎地改名為“游戲”）與當地民間舞蹈結合起來。

過分忠實于事實一直是跨越大西洋的進步紐帶的問題。美國城市規劃者在自己的街道上看到巴黎的星形廣場和凱旋門：市營公用事業支持者想象格拉斯哥的公交車在芝加哥抬高的軌道上轟鳴：艾爾伍德·米德想象波河河谷果園出現德爾亥沙地上：類似的那種幻覺不可能完全從坎貝爾的北卡羅萊納山區消失。在大西洋進步紐帶中轉變與模仿的沖動之間，美國民俗學校先驅者特別努力地保持著平衡。

在民俗學校運動中作為坎貝爾學校最著名的競爭者，“高地人民俗學校”用更激進的方式對待“民俗”概念包含的議題。1950年代南方危言聳聽者的告示牌貼了馬丁·路德·金在高地人民俗學校課堂的照片，這在南方白人種族隔離者看來好像證明金從前是共產主義者。實際上，高地人學校的源頭和坎貝爾學校一樣與丹麥深深糾纏在一起。高地人民俗學校的創始人邁爾斯·霍頓本人是阿巴拉契亞南方人，有強烈的社會福音新教徒主義色彩。霍頓離開該地區的磨坊和小工廠到坎伯蘭學院讀書，后在基督教青年會做組織工作，有年夏天從大學返回田納西州奧佐恩組織《圣經》學習班。從那個夏天開始，霍頓關于長期“奧佐恩項目”的筆記不斷增多，其中充滿自我懷疑和對方法的困惑。當他1929年來到紐約市協和神學院尋找藍圖時，他閱讀了約翰·杜威的作品，萊因霍爾德·尼布爾把他納入麾下。他1930年到芝加哥大學時仍然在尋找，看是否能從羅伯特·帕克和赫爾館那里了解社會變化如何發生。“我試圖在每個人身上試驗這些想法，每個人。”他后來回憶道。“我無法把這個想法理清楚……每次我想讓它到我希望的地方去時，就模糊不清了。”霍頓在芝加哥遇見的一位路德派牧師告訴他，他的“奧佐恩工程”聽起來像自己年輕時在丹麥上過的民俗學校。不到一年，霍頓就來到了丹麥，親眼看看民俗學校運動是什么樣子。[[706]](#_706_9)

正如霍頓后來選擇性記憶所顯示的，他的丹麥之行是讓人失望的，是突破簡·亞當斯在類似狀況下所說的“準備的陷阱”之前的最后一個階段。他幾年后回憶說，只有埃斯比約的民俗學校讓他感興趣。實際上，他已經閱讀了民俗學校運動的任何英文著作，他還自學了丹麥語。他帶著奧利弗·坎貝爾的書和她的介紹信，在丹麥到處尋找民俗學校。對于他遇見的每個鄉村校長，他都試圖檢驗自己有關宗教、心理、社會變化的觀點，企圖參透運動影響的秘密和“生活語言”的實質。[[707]](#_707_9)

所有這些進口的線索都匯合在霍頓的項目中。高地人民俗學校的另外一個創始人唐·韋斯特像霍頓一樣在丹麥待了一年，寫他的把丹麥教育方法用在阿巴拉契亞南方的神學學位論文。當高地人民俗學校在1932年田納西州蒙蒂格爾開學后，民間舞蹈（丹麥的和山區的）、鋼琴課和民間音樂、放映韋斯特和霍頓歐洲見聞幻燈片的講座、婦女罐頭食品合作社、霍頓講解思想如何變化的課程等都是工作的一部分。在合作社的組織工作上征求了奧利弗·坎貝爾的幫助。高地人民俗學校的土地是曾經上過威爾斯利女子學院和康奈爾大學的歷史學家麗蓮·約翰遜給的。她在參加1912年納什維爾“南方商業大會”時看到聽眾被戴維·魯賓的演講徹底征服。約翰遜自己也受到激勵，來到羅馬，沉浸在歐洲合作社的文獻中，竭力為“歐洲農業合作和農村信用委員會”爭取捐助者。她還擔任委員會的行政助理，撰寫了大量報告，后來前往田納西東部看自己能否成為當地欣欣向榮的合作社運動發展的種子。雖然蒙蒂格爾在地球的另一端，從歐洲各地而來的道路還是和它匯合起來。[[708]](#_708_9)

不過，和坎貝爾的布拉斯鎮不同，蒙蒂格爾的農業生產早已成為歷史。到1930年代初期，木材和煤礦利益已經主宰了該縣的經濟。和坎貝爾不同，霍頓是社會主義者，至少自從協和神學院時期就是社會主義者。他邀請約翰·巴頓從麥迪遜來到這里講解合作社，巴頓的妻子麗貝卡·巴頓講解勞工文學，但是早期的大部分老師是來自協和神學院的學生，其中許多人比他還激進。在高地人民俗學校，山村歌曲和方塊舞與勞工歷史和當代經濟形勢等課程結合起來。當丹麥一校長問他要講授什么內容時，霍頓回答說：“我要按倫理原則（意思是愛）講授社會學和歷史。”到了他坐下來給預期的捐助者寫信時，他的目標成為在南方山區發展“無產階級文化”，扎根于當地但不再是對階級和經濟一無所知的本土領導力量，能夠幫助山里人有效地抗拒大量掠奪廉價和無組織勞工的煤礦和紡織工業。他認為南方的歷史資源中有它對資本主義的抗拒——“是防御，確實如此，”他提醒自己，“不過仍然有一定價值。”[[709]](#_709_9)

在大蕭條時期開辦學校，加上這么多微妙平衡的抱負，高地人民俗學校人員很快被吸引到周圍爆發的勞工斗爭中。在一個月之內，霍頓就因為試圖寫該州北部煤礦罷工的故事被逮捕。學校把學生放在罷工糾察線上，其中有些人遭到工廠保安開槍射擊。學校開始把縣里的“公共事業振興署”的工人組織成工會。在1937年，當產業工人聯合會（CIO）在南方發動聯合組織行動時，在罷工活動中一直很積極的高地人民俗學校宣布把它的“全部資源”都投入到勞工運動中。

但是，隨著勞工承諾的增多，高地人民俗學校的地方紐帶慢慢解體。它獲得了聯邦緊急救濟署自助合作司的地方罐頭食品合作社撥款，但是當查塔努加（Chattanooga）報紙紛紛抗議把錢“交給紅色分子和勞工組織者”手里后，它很快就失去了這筆錢。經過七年精心的地方組織工作，被扣以“赤色分子”的帽子以致最后成為自己開展的項目的負擔，學校當局決定徹底與地方政治決裂。從霍頓的“奧佐恩”抱負要在南方山里人中間創造一個自然化的社會變革中心點，高地人民俗學校后來成為勞工左派的地方組織基礎（再后來的民權運動基礎）。可以說它是按自己的方式運作的布魯克伍德勞工學院，在一個別有鄉村特色的環境中。

奧利弗·坎貝爾曾經給霍頓寫信說她很難“看出如何能在你已經開始的基礎上發展真正的民俗學校”。[[710]](#_710_9)最終，霍頓自己的回憶錄同樣全面地貶低引進的丹麥經驗。實際上，高地人學校中不難發現丹麥跡象。它強調團體合作生活、跳舞和游戲，老師和學生從鄰居中汲取山村歌曲作為1930年代勞工左派的激進亞文化的一部分，霍頓自己選擇充當自始至終尋找“生活語言”的哲學校長（Forstander）角色。這些都是高地人民俗學校的大西洋紐帶的體現，就像坎貝爾的學校在布拉斯鎮做的事情一樣，只是方式不同。

但是最后，如何把地方民間文化和風俗與徹底的社會變革運動結合起來這個奧秘像難倒坎貝爾一樣難倒了霍頓。他在田納西山區建設的產業工人聯合會營地和坎貝爾對丹麥經驗的修改不同，但是兩者都沒有找到方法把民俗學校的核心諾言帶回美國——周圍的政治文化中有太多與之強烈抵觸的趨勢。

霍頓還在丹麥的時候在筆記中寫道：“毫無疑問，這里的高中一舉成名是因為開始于19世紀初期的一股潮流，似乎是因土地法而使希望成為可能。”和早期民俗學校實驗同時出現的是席卷丹麥的文學和文化的蘇醒，并推動了這些實驗。霍頓問道：“如果沒有潮流，這樣的學校可能出現嗎？或者它里面有潮流嗎？”[[711]](#_711_9)他的問題進入了農村改革者難題的核心。如果在土地下面藏著更深層次的機制、期望和文化，那么整個地質結構本身怎么能夠移動？

在某種程度上，所有受歐洲啟發的農村改革者都面對這個問題。在他們討論的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和乳品廠合作社、丹麥奶牛和澳大利亞國家主義、民俗學校和農場村落等問題背后，核心內容既關乎市場不平等也關乎價值觀，既關乎國家的農業心臟地帶也關乎美國本身。農村人雖然并不總讓他們愉快，但是代表了每個人。鄉村的過分個人主義代表普遍的原子化，這或許是拓荒者做的事情，或者是很少受到約束的市場的作用，或者就是文化本身。在最后投身于田納西山區之前，霍頓在這么多筆記卡片上寫滿難題和疑問，一直非常擔心這個問題：文化轉變的潮流是在哪里產生的？

編織成為跨越大西洋進步紐帶的敘述最后都縮到傳記中，如丹麥校長講述的關于格倫特維的故事，AE（喬治·羅素）關于普倫基特的故事，米德關于他在澳大利亞內地戰勝土地壟斷者的故事，或者合作社成員關于洛奇代爾那一群英國人先驅的故事等。但是如果歷史變化的潮流不在個人或者機構，而在文化本身，人們如何能期待像民俗學校或者農業合作社這樣脆弱的移植機構在根本上影響它的進程呢？

問題不是能否引入的問題。在適當條件下機構能夠成功地越過國界轉移，這一點顯然毫無疑問。合作機構和合作社就像吉普賽人遷徙一樣都越過了歐洲的領土界限。有可能這樣說而并不算過度曲解歷史：從英國的歐文主義者到德國的舒爾采—德里奇和賴夫艾森運動，到意大利人民銀行先驅者，接力棒一直在傳遞。通過像普魯士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這樣外國風格的想法，美國農民長期要求聯邦資金援助的呼聲最后在政治上看到了成果。文化潮流不是不靈活的，就像它們不是嚴格按照民族國家確定的一樣。

跨越邊界本身不是問題。美國鄉村重建者面對的根本問題是引進的機構不能保持不變。當引進的改善農村社會弱點的措施包含的前景與周圍市場文化格格不入，移植起來就變得非常困難了。在機構被成功吸收的地方，那是它體現了市場文化的特征。1920年代中期的大型營銷合作社，由于推動者的熱情和壟斷野心，構成最發人深省的例子。當引進的措施在適應和運用的過程中無法不被改變，當任何東西都在變動中，人們如何能找到變革的阿基米德支點呢？

這就是新政者即將繼承的無所適從的窘境，就像他們將繼承大西洋進步交流的其他許多產品一樣。兩次戰爭期間農業重建項目的每一項都進入了他們廣闊的議程中。愛爾蘭和丹麥的合作社、米德的農場村莊、民俗學校思想、普倫基特對于農村“組織”的專注、AE（喬治·羅素）對于農村生活“狂熱的……孤立和個人主義”的關注，最后都來到華盛頓新政者的走廊里，連同對文化本身的一種新的、深刻的敏感性。[[712]](#_712_9)1930年代正常政治的暫時終結可能給改造美國鄉村高度原子化經濟的工程帶來什么樣的第二次機會，這個問題就有待于新政者去發現。

# 第九章 機器時代

## 美國對歐洲的入侵

在所有鄉村改革者中間，點燃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代最熱切期待的人不是霍勒斯·普倫基特，不是艾爾伍德·米德，甚至也不是阿倫·薩皮羅，而是亨利·福特。福特喜歡吹噓說，他的機器造得這么便宜，連每個農民都可以擁有轎車和拖拉機，這將給農業勞動帶來革命性變化。它將消除艱辛的勞作，將把城市和農村結合起來，將給大眾帶來各種商品和流動的極大自由，而這在以前任何歷史時期都是少數精英的特權。社會政治做不到的事，技術革新將要完成。“新時代”是機器時代，福特是它的預言家。

新時代既是實現了的社會事實也是公共關系的奇功，但是它對大西洋進步紐帶內的影響流向產生了重要作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一代里，歐洲社會政策制訂者和美國同行一樣擅于越過國家邊界撿東西，但是他們手頭有比美國更重要和更方便的地方去搜羅社會政治革新。讓美國人覺得惱火的是，面向大西洋的美國進步人士對于歐洲社會政治表現出非同尋常的好奇心，而歐洲人對進步時代的美國卻興趣不大。逆著戰前社會政治紐帶的主要潮流，確實有一些歐洲進步人士越過大西洋來到美國，看他們能從美國的學校和操場、少年法庭和睦鄰中心、勞工統計局和生活水平等方面吸取哪些經驗。但是美國的大西洋進步紐帶的動態不在于對稱性而在于不平衡性，在于參與者意識到的差距和落后以及對落后處境的尷尬。

在這方面，1920年代標志著事實和意識的關鍵轉變。領先國家和落后國家的論調仍然存在，其他人或許會談論獨特的國民天賦和不可相比的政治命運，但是那些塑造大西洋進步紐帶的人的標志，則是把世界看成沿著進步的共同跑道奔跑的一隊選手，有的領先，有的落在后面。1920年代并沒有根本改變一同賽跑的比喻，但是在大西洋兩岸，這個十年打亂和混淆了參賽者的先后順序。

第一個打破戰前不對稱性的，不是很快被歐洲人統稱為“福特主義”的那些技術和經濟轉變，而是戰爭本身。美國遠征軍在1918年夏天進入旅游手冊上歐洲心臟地帶，不是作為臨時糾集的外國同盟中的小伙伴，而是作為拯救文明本身的十字軍，這正是美國進步人士希望看到的。伍德羅·威爾遜在1919年末簡要概括戰爭的道德時，用美國戰爭宣傳機構在大西洋兩岸整體兜售的彌賽亞式語調說：“美國有極大的優勢來完成拯救全世界的使命。”在威爾遜為自由的歐洲制訂民主未來時，在多佛、巴黎和羅馬歡呼的人群列隊歡迎他的場面中，不難想象世界進步的火炬確實已經再一次傳遞給了美國。[[713]](#_713_9)

沒有人比跟隨美軍進入法國的進步人士更深刻感受到戰爭造成的角色顛倒了。他們是作為非戰斗人員一部分的紅十字組織者、前慈善機構參觀者和業余救援人員。美國社會工作者在報名參加這種活動時，大部分任務是幫助美國軍人給戰爭“消毒”，但是很快把工作擴大到遭受戰爭破壞的法國平民的需要。法國救濟機構中最大的是美國紅十字會的平民事務部。里面聚集了戰爭期間被臨時借來的社會工作領袖，主要工作是照顧法國難民和被遣返者、發放救濟物資、協助平民傷員的康復、負責嬰兒護理中心、兒童健康中心、提供健康和衛生展示課程等。[[714]](#_714_9)

即使在趕去幫助遭到戰爭破壞的法國時，美國救濟工作人員仍然不能抗拒改革的誘惑。在這方面最重要的領域是被“摧毀”的巴黎東北地區。這里是1914年后期德國撤退后留下的一片廢墟，到處是彈坑、枯萎的樹木、扭曲廢棄的帶刺鐵絲網，還有饑餓。馬恩區和默茲區已經成為英國貴格派教徒救援者的領地。索姆區和瓦茲區成為美國的項目。最先進場的是史密斯學院救援隊，在1917年夏天負責關照努瓦永附近的15個小村莊。瓦薩爾、巴納德、威爾斯利、古徹、斯坦福等學院組織了其他救援隊，總體上等于戰爭中男性救護隊志愿者的女性道德對等物。史密斯學院的女性居住在被炮火破壞的村莊里，用社會調查的方式清查居民和資源，建立醫療所，發包縫紉工作為村中婦女提供微薄收入機會，分發緊急食品救濟，繞過村中男領導以形成有利于婦女的分配網絡。因為擔心法國農民的孩子漫無目的的消遣方式，她們組織了美國式娛樂項目和集體游戲。[[715]](#_715_9)

總而言之，他們的表現就像睦鄰中心工作者，特別是擔心社會的松散解體和“極端個人主義”，他們發現自己需要與之作斗爭。當他們夢想為自己的工作留下永久性遺產時，心里就開始要把法國衰退的公民意識組織起來。正如史密斯學院救援隊的露絲·蓋恩斯設想的，每個重建的村莊將包括新的“人民之家”，緊挨教堂建在村里的象征性中心，同時還有淋浴澡堂、醫務室、俱樂部、圖書室、母嬰護士站，還有公民展覽室：這是按改進了的美國形式返回到歐洲的微型公民中心。

美國人迫切希望按照更接近他們想象中的歐洲的方式改造法國，在蘭斯（Reims）重建的競爭中表現得更加分明。蘭斯是遭到破壞的地區里最重要的城市，在戰爭結束時簡直是一堆瓦礫，一塊白板，其建筑中一大半已經挖空或者破壞。負責此項工程的喬治·B.福特是美國睦鄰中心網絡、擁塞委員會、紐約市分區規劃活動和歐洲旅行的老兵。在作為美國紅十字會重建服務中心主任來到法國后，他成為法國政府流動的城市規劃專家，在1920年蘭斯重建設計競賽中奪魁。

福特的計劃是各種從巴黎進入美國進步城市規劃的影響的特別集合。穿過老城內彎曲密布的街道，福特想象開辟一個直接從奧斯曼借來的林蔭大道和星形廣場網絡，他的草圖清除了擁擠在教堂周圍的房屋和商店，在福特看來它們模糊了城市的法定公共中心。他在蘭斯的郊區點綴著新公園和美國式運動場，以便開展接受管理的社會化活動。在城市的四個主區，他規劃了美國風格的社區中心，奧斯曼的巴黎是沒有類似內容的。正如蓋恩斯曾經設想的，里面有醫療服務、公民團體會議室、禮堂、圖書館，甚至還有禁酒的自助餐廳。進步人士渴望的公民團結、他們在巴黎撿到的或者在歐洲鄉村古老的市集廣場看到的凝聚力圖景，被福特用比歐洲社會化程度更高的形式帶回到蘭斯的設計中。[[716]](#_716_9)

社會工作者的歐洲冒險是暫時性的，但是美國消費品的大潮在戰爭結束時從美國幾乎無限豐饒的機械聚寶瓶中源源不斷涌入歐洲。這個影響更持久、更深刻得多。歐洲人對美國商業入侵的擔憂早在戰爭之前就開始了。德國商人早在1902年就憂心忡忡地談論“美國危險”。但是沒有任何東西能與1918年后貿易流向的改變相提并論。[[717]](#_717_9)

美國商品對中歐的入侵最明顯，因為戰爭讓戰前歐洲運轉最良好的經濟機器幾乎陷于停頓。在直到1919年中期簽署和平協議后才結束的同盟國食品封鎖下，在戰爭賠款壓力造成的高額稅負處境中，加上1922—1923年的超級通貨膨脹的無底洞，德國在20年代前五年實際上處于經濟崩潰狀態。1920年代初期到柏林的游客報道說城市瀕臨絕望，沒有笑聲，只有緊張和饑餓。據說連當時出現在每個主要街道的妓女也帶著貧窮和絕望的表情。作家馬修·約瑟夫森認為城市的一半在“荒淫無度中醉生夢死”，而其余人則“忍饑挨餓”。社會學家羅伯特·林德更加清醒的眼光則看到中產階級柏林人在免費的市營施舍處排隊，他們的湯碗用報紙包著，或者藏在書包里面，因為要保持最后的一點臉面。[[718]](#_718_9)

五年后，在游客看來柏林到處充斥著美國商品。伍德·克魯徹在1928年寫到，柏林中央幾乎沒有一家商店的櫥窗不會提醒美國游客想起美國。在庫達姆大街上人們可以在新的、亮堂堂的美國風格餐廳買到美式冰淇淋汽水、波士頓烤豆、“薄餅和糖漿”。隨處可見進口的美國工程技術。克魯徹寫道：“我看到的歐洲城市中沒有哪個比它更像紐約，而且進一步模仿的努力是有意識的，一直在繼續。”戲院里上演的是美國戲劇，報紙上登的是美國新聞，電影院里是美國電影，書攤上是“美國風”（Amerikanismus）的激烈爭論。[[719]](#_719_9)

柏林是1920年代歐洲商業美國化的典型例子，部分因為“道威斯計劃”貸款在1924年后大量進入德國，以減輕賠償款負擔。但是很難說柏林是孤立的，查爾斯·比爾德在1929年初期報道說，在幾乎每個英國城市都有美國式廉價便利店。在伍爾沃斯風格的“一價商店”（magasins a prix uniques）壓力下，法國零售合作社竭力通過專業經理人和更大膽的廣告技巧把他們的方法現代化。美國風格的廣告到處可見，比爾德寫到“巴黎充斥著美國標志”。柏林海報宣傳美國口香糖的快樂，維也納的環城大道閃爍著美國風格的燈光廣告。在電影院，美國出現在從斯德哥爾摩到土耳其的屏幕上。在1925年美國電影入侵歐洲的最高潮，就在報復性配額實施之前，美國產的電影在所有放映電影中的比例在德國是60%，在法國是70%，在英國是95%——伴隨著而來的是比實物更大、更誘人的美國消費品的特別宣傳。[[720]](#_720_9)

比爾德寫到美國“已經鉆入歐洲人的意識”。它的爵士樂、它的節奏、它的色調、它的商業主義滲透到歐洲大陸。但首先是作為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生產大量消費品的、效率高得神奇的機器，美國重新進入了歐洲進步人士的象征性世界。美國天才的結晶從前是民主，后來是壟斷者和富豪，現在是“福特主義”。這個詞在1920年代的歐洲隨處可見。福特的企業革新——他創建了為大眾生產標準化汽車的大規模生產、流水線機器運作模式，連同他吹噓的足夠讓工人也能買汽車的高工資，給歐洲社會觀察家留下深刻印象。比爾德注意到，單單在德國，關于效率和合理化（Rationalisierung）的參考書目就有數百個標題。亨利·福特的自傳是1920年代德國的暢銷書。法蘭克福社會博物館在本來就很擁擠的名單中加入了一本專題論文集，題目是“福特和我們”。1927年在維也納舉行的國際勞工立法協會、國際失業問題協會、國際社會保險委員會聯合會議上，據一位美國參會者講，最熱門的話題是“福特主義”對勞工和社會的影響。[[721]](#_721_9)

為了親眼目睹機器生產之鄉，一批新的記者越過大西洋來到美國。“跨越大西洋的朝圣之旅又出現了，”古斯塔夫·施托爾佩爾寫道，“可以說是——再次發現了美國。”社會博物館派出創始人的兒子安德烈·西格弗里德了解1920年代的美國。國際花園城市和城鎮規劃聯盟1925年在紐約這個城市的新摩天大樓陰影下開會。德國工程師成批前來，緊跟著的是德國工會和社會民主代表團進行獨立評估。德國書評家注意到1927年時出現的美國題材書籍的“洪流”。汽車、城市生活、工廠、商店、芝加哥的西爾斯—羅伯克郵購公司（Sears and Roebuck），以及人們有機會一定要去的位于密歇根州海蘭帕克和里弗魯日的福特工廠：這些都是新美國之行的目的地。[[722]](#_722_9)

有一點人人都同意。從對消費品的占有角度看，美國工人和歐洲同行相比的優勢是毫無疑問的。這些是城市間的對比，繞開了鄉下和種族分割的美國南方，也沒有對兩大洲的窮人命運的對比做出判斷。但是顯然，戰前工業界普通非熟練工人實際收入的大致相等現已不復存在。赫伯特·胡佛吹噓“我們工人平均的周工資現在可以買歐洲任何工人兩到三倍多的黃油面包”，此話不能從字面上理解。但是1920年代中期了解真相的德國觀察家認為美歐平均實際工資差距不小于2:1。[[723]](#_723_9)

消費品統計數據強化了這一點。在1932年，美國居民中收音機聽眾的比例是歐洲的3.5倍，電話用戶比例是歐洲的8倍，汽車用戶比例是歐洲的26倍。1928年世界工業產品中40%來自美國的工廠和車間；除俄國外，歐洲加在一起的份額是42%。I.M.魯賓諾在1930年代初的結論是：“我們是世界上最富裕的人，是歷史上最富裕的國家。”[[724]](#_724_9)

在承認美國驚人的物質生產力之外，歐洲進步人士的美國印象很快陷入失望。1920年代美國城市中公然的商業主義甚至讓倫敦人和柏林人也感到震驚。H.W.馬辛厄姆報道說：“商品本身都長著嘴，‘買我，賣我’。”一個見多識廣的美國人在芝加哥告訴阿瑟·費勒：“我們不建造房屋，而是建造可以投機的商品。”幾乎是每個歐洲旅游者首選目的地的曼哈頓把這些最初印象推向極致。置身于早上的薄霧中或者黃昏的閃爍燈光中，1920年代的曼哈頓空中輪廓線讓人陶醉。典型的感受是“簡直如仙境一般”。但是仔細觀察，那里全是勾心斗角和殘酷的競爭。那些“似乎直搗天空”的大樓是在激烈爭奪光亮和地位，正如建筑師恩里希·門德爾松說的，那些像熱泉一樣“噴射”，把“金融的力量拋到20至50層樓”。德國都市規劃師羅伯特·施米特把它們稱為“美元大樓”。《形式》（Die Form）的編輯沃爾特·庫爾特·貝倫特的判斷則是：“難以描述的墮落和枯燥，讓人反感的丑陋混合體。”[[725]](#_725_9)

1920年代美國給歐洲批評家印象最深的不是商業主義或者混亂不堪，而是其同一性。標準化和系統化統治一切。考慮到這個時期激烈的國內沖突（1920年代美國激烈的城鄉文化斗爭、三K黨、勞工斗爭、北部新的種族貧民窟），乍一看，這確實是讓人困惑的錯誤判斷。但是對于第一次遭遇標準化產品物質文化的人來說，就未必如此了。給他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人們的打扮相同，穿同樣的箭牌襯衣領子，接受西爾斯·羅伯克公司商品目錄上的季節指令。阿爾弗雷德·魯爾抱怨說：“到什么地方你都遇見同樣的東西，一切都是大規模生產的產物。”[[726]](#_726_9)

標準化消費品、標準化服裝規格、面向大眾的品味指令的驚人泛濫可以部分解釋這種印象。其他原因是“禁酒令”（Prohibition）的功勞。安德烈·西格弗里德認為1920年代美國人的思想被福特和加爾文教派雙雙束縛，它們的結合把每一點的想象力都吸引到生產上去。喬治·杜亞美想象了和美國人進行的辛辣諷刺性對話，討論衛生管理過量性生活的可能性。用文化來對抗純粹的機器文明，用精神對抗物質享受，用高尚欲望對抗低俗欲望，強烈批評標準化、系統化的美國人是令保守派歐洲人特別愉快的做法。但是這種批評不僅僅局限于他們。路約·布倫坦諾把大眾廣告控制下“人的標準化”作為美國報告的固定內容。對于美國化現象的批評家來說，機器之鄉是生產機器化的人的國度，他們的欲望成為心理學工程師新說服力的俘虜。[[727]](#_727_9)

正統馬克思主義者也批評機器時代的美國，不是因為該時代的專心物質生產在倫理上是錯誤的，而是因為在企業主指導下機器的物質承諾是不能兌現的。他們認為，“后期資本主義”受到無休止資本積累的消耗和破壞，承受遠遠超過工人階級消費能力的生產力負擔，只能跌跌撞撞進入必然的內部崩潰。正如蘇聯招募美國工程師以及列寧著名的擁抱泰勒主義（Taylorism）所證明的，這種確信并不排除對美國生產技術的模仿。但是對模仿和借用的稱贊是經過小心限定的。在戰后，當時的憤青貝托爾特·布萊希特吸收了他能找到的任何美國東西：幫派、俚語、小說、流行歌曲、大城市摩天大樓。但是當布萊希特從1920年代初期的激進主義進入1926年后更加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渠道時，美國在他看來就變得破舊、衰敗和腐朽了。[[728]](#_728_9)

對1920年代美國物質前景最感興趣的不是歐洲政治中的左派或者右派，而是在激進主義者、左翼自由派、實用社會民主黨交匯的進步人士陣營。在保守派看到機器系統化和左翼馬克思主義看到超級剝削的地方，資本主義的進步批評家看到了讓他們印象深刻的其他東西：工業資本主義的機械化不再向內剝削剩余勞動，而是向外滿足更多人的需要。《新政治家》的記者在1929年寫到美國的驚人成就不在它的繁榮本身，因為這些很容易從它碰巧的地理位置和豐富的資源來解釋。持久的美國成就是大規模生產的經濟中內在的心理“革命”：認識到只有大規模消費的基礎才能維持繁榮局面。在歐洲雇主斤斤計較日常開支，舍不得提高工資和技術投資的時候，美國雇主卻把大量利潤投入在新機器研發上，并通過提高工人的工資創造龐大的新需求市場。《新政治家》報道說，他們“扔掉了我們的資本、利潤、工資等概念”，他們發現“沒有亞當·斯密、李嘉圖、約翰·穆勒甚至卡爾·馬克思制訂的所謂法律”。所有這些在機器生產的邏輯中都消失了。[[729]](#_729_9)

美國人在高工資、高效率、合理化、大規模生產消費品中——簡單來說在“福特主義”中，不僅發現了永久繁榮的秘密，而且還“解決了仍然困擾歐洲的根本問題”。正如菲利浦·柯爾在倫敦的《國家》雜志支持的觀點：他們創造了大規模生產的經濟，卻沒有對抗性的階級利益，沒有內在的政治斗爭，沒有艱苦的政治交易。[[730]](#_730_9)

福特主義作為一種進步思想入侵歐洲，它是面向未來的、靈活的、社會改良主義的。前來參觀的歐洲商人擔心福特主義隱含著大量風險性投資，傾向于非常謹慎地躲過把這個主義用在自己身上的尷尬。相反，前來美國參觀的社會主義者和工會代表團則對美國化機器大規模生產的可能性印象深刻。一次海上航行本身不能擦去對美國幾乎不受限制的資本主義的批評。在歐洲進步人士和工人階級中，對美國激進的、烏托邦式的評價常常在復雜的甚至矛盾的局面中遭遇。但是從最好處說，機器實現了民主化。瑪利亞·皮斯卡托回憶說她丈夫1920年代的左派劇院團體中“沒有一個人到過美國”，但是他們知道美國意味著“富饒之鄉的客觀存在，有物質天才，有繁榮、有口號，還有偉大的上帝——‘機器’”。[[731]](#_731_9)

最后，美國的機器文明不僅體現在它的消費品和經濟概念上，而且在某些激進的歐洲人看來具有美學特征。年輕的工業設計師沃爾特·格羅皮烏斯在戰前的1913年著名德國設計論壇上擺出的14張照片，顯示了帶大窗戶的美國工廠和大型糧倉，在塑造機器時代的象征語言時起到重要作用。作為沒有虛假門面和資產階級裝飾的功利主義形式的樸素形象，它們在歐洲的激進派、現代主義者圈子里激起強烈反響。勒·柯布西耶在1923年拿起格羅皮烏斯的糧食倉庫照片，夸張地運用其中的成分和幾何圖形來解釋《走向新建筑》（Vers une architecture）。布魯諾·陶特用它們作為他的《現代建筑》的引子，恩里希·門德爾松把布法羅作為他1924年參觀機器時代新偶像之旅的景點，他寫到，在他到達紐約之前很久，頭腦中就有了布法羅的“柱形倉庫”。[[732]](#_732_9)

當然，建筑教材上的糧食倉庫和它那實用主義的簡單線條不是美國，正如福特主義或者西爾斯—羅伯克公司商品目錄不是美國一樣。它們是美國的組成部分，這個國家遠比任何圖片偶像所能包含的東西更加復雜。1920年代在美國的歐洲建筑師很快把格羅皮烏斯的圖片從自己的頭腦中驅逐出去。只有在半建成的骨架狀態，美國摩天大樓才滿足現代主義者的機器審美標準。它們在建成后，在借來的歷史裝飾和對地位和高度的激烈競爭中，根本就不是功利主義的了。布魯諾·陶特尖刻地報告說，你在美國只要愿意付錢就可以購買任何審美和歷史風格的仿制建筑：模仿都鐸王朝時代的房子，模仿西班牙風格的煤氣站，用大批生產的鑄鐵制成的希臘式柱子，或者看起來“就像牛津或者劍橋大學屋頂一樣”的風化的瓦片（廣告這么說）。簡單的、沒有裝飾的機器在1920年代的美國不是藝術，歐洲人的工業設計專業還沒有到達美國。但是美國的鋼鐵骨架、橋梁大梁、柱形糧食倉庫、福特森拖拉機、生產流水線和T型福特汽車、折疊床、高效廚房設備給予機器文明一套強大的象征性表現。[[733]](#_733_9)

在所有這些方面，1920年代標志著美國在歐洲社會政治意識中的重生，以及歐美思想交流方面重新得到一定平衡。像往常一樣，術語是濃縮和簡化了的東西。福特主義、趣味標準化、形式上的功能主義革命、商品的民主化——都是從美國一團亂麻中抽出來的線索，就像弗里德里克·豪威和克拉倫斯·坡的歐洲是亂麻中抽出來的線索一樣。它們存在于兩次戰爭期間涌入歐洲的其他美國貨中間：道威斯貸款、爵士樂音調、電影偶像、在被戰爭破壞的法國看到的禁酒餐館。兩次戰爭之間的思想和影響運動仍然很難被稱作對稱的，但是當美國進步人士對歐洲的興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重新出現，這種交流和以前相比就遠遠不是單向的了。

從近距離看，機器時代的美國對于1920年代的美國進步人士來說，遠不如外國試圖評估福特主義的許多人認為的那樣吸引人。消費品革命是不能否認的，盡管遠非歐洲進步人士有時候想象的那樣平均分享成果。可是，這個時代內部的社會政治機器遠遠落后于多數面向大西洋的進步人士帶入戰爭的議程。

在勞工關系方面，這個十年最廣泛地宣傳的進步是許多美國大企業中“工業民主”的擴展。作為戰爭時期強制實施的申訴協調機制的殘余，新雇員代表計劃是對戰前時代獨裁性、對抗性管理方式的一大突破。固定化的工廠一級的勞資協商機制一直是北大西洋經濟體進步重建項目的核心特征。德國社會主義者在1920把它們寫進法律，要求在戰后德國經濟中事實上全面建立工務委員會。美國自愿主義的結果從來沒有達到那個水平，但是在有些大企業帶頭的情況下，新雇員代表計劃包括的工人數量從1919年的39.1萬人增加到1924年的120萬人。那年美國工會會員總人數達到330萬人。[[734]](#_734_9)

但是，沒有任何地方像美國的工廠代表制這樣與搶先阻止工會組織的計策如此密切地結合起來。只有在服裝行業，新工業民主體制包括了工人獨立組織的工會。雖然號召美國勞資聯合委員會在工資問題上提出意見，但事實上它們中沒有一個哪怕在理論上有德國同行那樣查看企業利潤賬目的權力。在1924年后，在清楚看到雇主已破壞了戰爭期間和戰后工會化運動的基礎后，新雇員代表制的組織迅速緩慢下來了。以每天5美元、自由雇傭、管理層獨裁為特征的福特自己的工廠根本就沒有假裝實行工業民主。[[735]](#_735_9)

說到工人工作風險的日常防范，機器時代美國的名聲和實際成就之間的差距就更加明顯。因為社會保險項目在州議會大廈受阻，最大的福利資本家和保險公司闖進來占領新領域中他們最渴望獲得的地盤。這個時期最常見的新工人福利是團體人壽保險和公司投保的微薄退休金。因為遭到醫生的反對，團體健康保險要罕見得多。對于最可怕的勞動風險“失業”，個別雇主在首次精確計算季節性工人流動總量成本的幫助下做出了戲劇性的姿態。寶潔公司在1923年非常著名的舉動中保證5000名最低工資雇員的工作崗位。在以突然變化的季節性雇傭而聞名的服裝行業，雇主和“國際女裝工人聯合會”的代表在克利夫蘭確立了每個季節最低的帶薪工作周數保障。在芝加哥和紐約，雇主和美國服裝工人聯合會建立了聯合投資、聯合管理的失業基金機構。[[736]](#_736_9)

但是與自1920年代以來不斷深化和擴展、更系統和覆蓋面更廣泛的歐洲社會保險體制相比，美國福利資本家一個一個的創新很少能改變工人一生的總體風險。在大蕭條前夕，工人中參加雇主投保的團體人壽保險的不足五分之一，參加公司退休金項目的不足八分之一，參加團體健康保險或事故保險的不足二十分之一，參加各種失業保險的不足百分之一。[[737]](#_737_9)

福利資本主義的政治顯示了同樣的雙面性。1920年代的共和黨政府沒有顯示出要回復到19世紀中期自由放任理想的跡象。正好相反，胡佛領導下的商務部實際上是公共政策改革的工廠。將國家的私有經濟機器流暢化和合理化是胡佛的目標，為此他投入了極大的精力和智慧。商務部管理者鼓勵產品的標準化、雇傭程序的規范化、經濟信息的快速流動。他們推動農民的經銷合作社來穩定動蕩不定的農業市場。他們還出臺了第一批系統的聯邦政策來運作反經濟周期的公共工程開支。政治上的“美國計劃”沒有撂下政府的促銷角色。[[738]](#_738_9)

但這是高度減弱了的社會政治。胡佛在重建市場主要機構的努力之余，并沒有相應的興趣在市場化造成最大人類傷害的地方去縮小市場規模，或者去對市場運作確定更嚴格的法律和憲法限制；他更沒有興趣建設能與集中于高層的市場權力相抗衡的民主力量。福利資本主義的“福利”從上往下滲透，通過大生產行業的工人工資卡上顯示出來，但是它的發起者不是激發弗里德里克·豪威或者簡·亞當斯的社會連帶主義公民協會。結果總體上的平衡并沒有阻止許多進步人士領袖在1928年投票支持胡佛，簡·亞當斯自己就這么做了。但是它同樣也沒有阻止1920年代凝結著面向大西洋的進步人士這么多希望的項目的一連串失敗。

社會保險是這個十年非常明確的災難。公共管理的健康保險1918年和1919年在加利福尼亞和紐約失敗后石沉大海。即使戰后嚴重的失業危機也沒有讓英國式失業保險克服哈定政府的堅決反對。1924年后勞動黨思想陷入混亂。對于女性進步人士群體來說，一個重大勝利是國會在1921年通過了《母嬰保護法案》，但是到了1927年在醫生游說團體的強大壓力下它的展期遭遇失敗。憲法領域的失敗更加苦澀。全國消費者聯盟委員會第二次企圖通過“聯邦童工法案”來繞過一個州一個州改革的煩瑣工作，這次嘗試像第一次一樣被裁定為違反憲法。1923年后，最高法院開始撤消州最低工資法案，駁回戈德馬克—布蘭代斯的“社會學”辯護狀，支持它現在堅稱為憲法基石的原則：政府不能合法地篡奪市場確定商品和勞動價格的權力。

在所有這些過程中，不容忽視的是對外國社會政治的新的傲慢。克拉倫斯·達羅苦澀地寫到這個時代是“超級愛國主義精神”控制一切。美國人孤立于國際勞工組織、國聯的國際勞工標準機構之外，被許多進步人士認為這是讓人尷尬的形象傷害。現在“美國的”這個形容詞添加在社會政治的所有領域。醫生為企業藥品辯護說這是“美國的”方式，雇主宣布他們反對工會的行動是工業和經濟關系中的“美國計劃”。沃倫·哈定總統在解釋為什么在1921年把失業保險從白宮失業會議議程上刪掉時說：“當今的美國是建立在一些經濟、工業、政治生活根本特征上的，是這些使得我們成為如今的自己，這個殿宇現在不需要重建。”[[739]](#_739_9)

在進步人士陷入孤立和失敗的背景下，難怪從前的比喻和渴望被重新喚起。觀察到1919年華盛頓特區召開的國際勞工立法大會沒有任何一位美國官方代表參加的獨特場面，W.L.錢納里認為美國當然屬于“落后”國家行列。亞伯拉罕·艾普斯坦在1920代中期看了養老法案的對比后說：“總說歐洲是古老的、理想化的、傳統的，而我們是務實的、有效率的，這個老觀念在我最近的海外之行中徹底被打破了。”保羅·凱洛格在1928年巴黎國際社會工作大會召開前夕寫到，與國內的“幻滅、繁榮、物質享樂的死海”相比，歐洲給美國人一種“潮汐涌動的意識”，一種積極運轉的感覺。到了1923年，林肯·斯蒂芬斯再次寫到歐洲是個巨大的“實驗場”，從列寧的俄羅斯、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到工黨領導下的英國。“美國不能幫助歐洲，但是如果我們謙虛地停下來看看或聽聽那里人們的斗爭的話，歐洲能夠幫助我們啟蒙、給我們消遣和指導。”[[740]](#_740_9)

慢慢地，與這種不斷增強的情緒相呼應，歐洲朝圣之旅重新出現，社會學大旅行的廣告再次出現在各地的自由派雜志上。到了1930年代，有五六家機構經營歐洲學習旅行安排，到1933年，還包括《調查》雜志本身。[[741]](#_741_9)組織得更好的是新的、私人資金資助的歐洲獎學金。美國—斯堪的納維亞基金會的旅行獎學金支持了雙方許多學生互訪交流。奧伯蘭德信托基金在1931年后為美國—德國的交流做了同樣但更大規模的工作。在后來七年里，該基金會獎學金的美國獲得者包括簡·亞當斯（雖然她病得太厲害而沒能前往）、赫爾館的元老愛麗絲·漢密爾頓（學習德國工業疾病保險）、杜波依斯（學習德國工業教育）、城市規劃者約翰·諾倫，以及大量美國市長、林業學者、公共管理專家、娛樂和公共衛生工作者等。[[742]](#_742_9)

美國進步人士在1920年代發現的歐洲和從前不一樣，更多地美國化了，緊跟著戰爭的動蕩后，也更加民主了。社會民主黨和工黨現在成為政治上的主要反對黨。他們即使很少上臺執政，也到處站在執政的門口；美國進步人士也比從前更清楚地認識到自己和外國社會民主改革的親密關系。

最后，大西洋兩岸的進步政治落在俄國革命的陰影下。在尋找1920年代歐洲變化的最前沿的人中，沒有一個能夠忽視新蘇維埃實驗。麗蓮·沃爾德、約翰·杜威、杜波依斯、羅伯特·拉福萊特、西德尼·希爾曼、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保羅·道格拉斯、林肯·斯蒂芬斯都在1920年代訪問過蘇聯。到了1926年，美國俄羅斯研究中心正在推動俄美交流，沃爾德和杜威是榮譽副主席。俄國經濟發展計劃的龐大，他們要在完全不同于林德曼所說的“貪婪”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社會的嘗試，都不可能不讓美國進步人士心動，其中很多人很快從新俄國那里讀到了美國人曾經有的強烈的創新精神。但是進步人士的大部分，即使那些受到蘇聯理想主義鼓舞的人，也沒有把俄國當作榜樣。來自蘇聯的報道是1920年代國際社會政治報道中最熱門的內容，它們擠占了之前德國和英國在美國進步人士思想中的部分地位。但是進步報道中的蘇聯是原始的、未開發的邊疆，從經濟上說根本談不上現代性，除了自然資源和野心相仿外，很難和美國相提并論。[[743]](#_743_9)

俄國實驗雖然讓美國進步人士感到著迷，并沒有讓更古老、更發達、努力維持和改善資本主義而不是打破和超越它的歐洲相形見絀。美國人再次來到這里尋求經過考驗的緩和市場個人主義控制的手段。但是這次在1920年代更加復雜的智慧經濟中，他們汲取歐洲社會政治經驗的渴望正好遭遇歐洲人對美國機器生產的社會可能性的著迷。兩大洲的進步人士現在從不同的落后性認識出發，都向對方尋求自己的未來。在接下來的理想和借鑒交流中，這兩個潮流并不常常相遇。歐洲對美國社會政治的影響與美國對歐洲經濟和文化上的入侵在很大程度上是各自獨立的。但是在影響確實相遇的地方，比如在魏瑪德國垮臺前，它們創造出一些社會政治形式，其諾言和創造性一時照亮了大西洋兩岸。

遭遇的領域是住房。像汽車生產一樣，住房建設是機器時代最引人注目的現象。1920年代后半段，住房建設高潮席卷北大西洋經濟體各國。在德國到了1920年代末期，新住房建設的速度是每年30萬套以上，比戰前的高峰還多一倍。在英國，新住房建設從1910年的8.6萬套增加到1927—1928年的26.1萬套。在美國戰前的五年中（1912年到1916年）平均每年新建住房的數量是50.5萬套；在大蕭條前的五年中（1924年到1928年），這個數字是84.8萬套。在一個以長期繁榮和衰退循環為標志的行業，1920年代后期確實是空前繁榮的時期。[[744]](#_744_9)

在美國，住房建設繁榮是私人行為。土地和建筑投資者在20年代重建了美國，有單元套房和電梯公寓，有二聯式套房和獨棟平房，也有迅速蔓延的郊區仿古建筑。他們利用分區和地塊規劃的公共權力，在美國土地上建立了專有的中產階級有車族郊區。在美國的幾乎每個大城市，整體的住房密度在1920年代下降了，在有些城市這是1870年來的第一次。家庭擁有住房的比例節節攀升。在1890年28個大城市中只有6個城市由居住者自己擁有的住房比例達到了三分之一。到了1930年，這些城市中有21個達到了這個比例。[[745]](#_745_9)

胡佛在1931年對美國人講話說：“擁有自己的住房是我們國家幾乎每個人都有的夢想和希望。”在商務部長任內，他就努力在高度分化的建筑業引進更加節省成本的方法，以便把新建普通房屋的價格降低到多數美國人可以承受的限度內。建筑材料規格的標準化、建筑規范的標準化、模范分區法規都是從這個工作衍生出來的。少數資本雄厚的公司自己試圖把規模效益和大生產的技術用在住房建設上。但是在主要是小公司參加的高利潤行業，這些把機器前途帶到住房建設上的零散努力沒有在成本或者供應上取得多大進展。歷史學家蓋爾·拉德福注意到在芝加哥1885年到1925年間，最低檔次的房屋價格的增長速度比總體生活成本快一倍。住房專家粗略估算1920年代末期一座4000美元或者以上的新房只有美國家庭中最有錢的三分之一可以買得起。在1932年的克利夫蘭，過去五年中沒有建設在那個價格以下的新房子；而同一時期在費城，最便宜的新房屋以3990美元在市場出售。房屋成為1920年代最基本的“機器”，但是在高工資和大規模生產的地方，它們是奢侈品。[[746]](#_746_9)

相反，在戰后歐洲，住房沿著雙軌制進行：有錢人通過市場買房，大眾則可以有公共資助住房。在英國，公共和私人房屋建設從1920年代中期開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都同時迅猛增長。在1920年代后期德國短暫的住房“噴發”期，住房投資中一半來自私人，一半來自公共機構。在1919年到1933年歐洲總共建設了600萬套新住房，其中有300萬套是私人住房市場框架以外的。在以商品民主化為自豪的時代，為民眾建造的大規模房屋建設是歐洲人的一大成就。[[747]](#_747_9)

單從這一努力的規模來衡量，戰后的大故事應該是英國。在1920年代英國為白領中產階級建造的90萬套新商品房之外，工黨和保守黨政府合作建設了60萬套新工人階級住房，讓稅收支持的、公共發起的住房建設成為英國社會政治的主要支柱之一。它們被稱為“委員會”房屋財產，因為城市委員會發起和管理而得名。到了這個十年結束的時候，它們已經在幾乎每個英國城市郊區發展起來，就像“焦煤城”本身最終把里面的人們傾倒進陽光里。英國的這種建筑規模在北大西洋經濟體內沒有一個可以與之媲美。在倫敦東部城市邊界之外的貝肯特里，倫敦市議會（LCC）建造了一個“大城市”規模的工人階級衛星城，在1934年完成后容納115,000個房客在此居住，其中大部分是在附近福特汽車廠上班的工人。曼徹斯特城市當局談到在世紀末要把一半的城市重建。在1932年飛越英格蘭的劉易斯·芒福德寫到，乘飛機旅行者能夠看到兩個國家在下面，一個是老的黑色的英國，完全根據“經典的供求法則不受任何約束”建造，“一排又一排暗淡的屋頂擁擠在一起……一條又一條街道沒有一絲綠色”；另一個是新的綠色英國，公共建筑的紅磚綠草，嵌接在古老城市環境的邊緣，而且他相信很快就會將其淹沒。[[748]](#_748_9)

1920年代的英國委員會房屋不論從設計還是生產技術上都不是建筑業的靈感來源。四四方方的兩層，新喬治風格設計，以雙拼或短聯排住宅形式來建造，按照雷蒙德·昂溫的一英畝十二家的松散模式，沿著數英里長蜿蜒曲折的郊區街道像四坡屋頂的鞋盒一樣散開，它們沒有現代性的偽裝。娛樂設施和商店很少，貝肯特里的居民抱怨說酒館尤其少得可憐。喬治·奧威爾描寫典型的委員會房屋：“全都是房子，房子，紅色小方盒房子千篇一律，有女貞柵欄和瀝青道路通向前門口。”[[749]](#_749_9)

英國住房的社會革命從金融和階級標準上看是內部革命。委員會房屋把空間民主化了。有浴室、屋內廁所和廚房——當然，對于緊挨著廚房火爐居住的傳統家庭來說廚房實在太小，但是比以前配備的東西好多了；三個臥室給予普通家庭成人和孩子分開的私人空間，而這以前都是只有中產階級才能享受的奢侈品。它們一下子提高了英國工人階級住房的水準。擁有前后花園、坐落在綠色環抱中的委員會住房是工人階級英國人進入郊區的門票，這里是戰前私人開發商為專業人士和中產階級搶先占有的領地。

英國新工人階級郊區代表了歐洲住房建設努力的一種形式；維也納市營廉價公寓代表了與此不同的、明確集體主義的形式。從1919年到1934年，城市議會控制在社會主義者多數手中，維也納成為戰后歐洲城市社會主義最重要的試驗場。面對一個熟悉的窘境——即要宣傳自己沒有權力直接實現的經濟革命，維也納城市社會主義者轉向文化和環境。德國和奧地利社會主義者長期培育了體育和體操俱樂部、青年團體、討論會、講座和合唱隊等組織網絡，所有這些都是要推動未來重建工程所需要的社會性格。在維也納，社會主義的這個內部世界被徹底公開對外。維也納城市社會主義的一個臂膀是建立了歐洲最詳盡的公共母嬰保健體系；另一個就是在住房狀況比柏林還糟糕的這座城市開始住房建設。[[750]](#_750_9)

維也納第一個住房建設努力是在城市邊緣，由于被擠出城市過分擁擠的住房市場，轉業軍人及其家屬在戰后幾個月內在公地上擅自占地聚居。在最初的混亂之后，在城市當局和貴格會救濟工作人員幫助下，無家可歸者組成市場園藝合作社，漸漸變成穩定的生計定居點，后來成為美國新政生計居住區項目的重要樣板。但是在1923年獲得新的征稅權力后，維也納住房項目的主要勁頭是建設大規模市營公寓房屋群，足夠在后期資本主義社會的世界里形成一個自己的世界。1934年，內戰把社會主義者趕下臺后，勝利者轟擊新城市住房群體的最大者，把拒不合作的人趕出去。但是在1923年到1934年之間，每年平均建立起30幢新城市公寓，到了1934年，維也納人口中的12%都居住在這種房屋內。[[751]](#_751_9)

作為住房，維也納公共房屋也提供了許多可以批評的地方。標準的市營公寓很少超過英國標準的委員會房屋內部空間的一半。廚房、客廳、一間小臥室是普通模式，外加一個廁所、小門廳，很少有浴室。不過，即使這些標準也超過戰前維也納私有市場上提供的條件，因為當時除了廚房和一個多用途的小廳（Stube）之外，內部管道、對角通風、煤氣燈、單獨的臥室等都是工人階級買不起的。精打細算節省費用，維也納設計者把余額用在集體空間和公共設施上。大的住宅區擁有托兒所、幼兒園、公共浴室、洗衣房、會議室、工人圖書館、母嬰診所、沙地、運動場、合作社雜貨店、飯館，也許還有地方健康保險協會辦公室、政治集會場所等等。所有這些都受社會規則和監督的復雜網絡來管理。[[752]](#_752_9)

社會主義者維也納住房的內部革命與外部的雄偉建筑風格相攜手，這風格被大膽展示，即使最隨意的過路者都不可能不注意到它。英國委員會住房簡樸和（除了重復外）不張揚，維也納工程則用雕塑和四到六層樓高引人注目的正面景觀展示自己，人們要經過紀念碑式的拱門進入建筑的內部世界。1920年代最著名的市營公寓群是沿著圣城大街延伸了五分之三英里的卡爾·馬克思大院，里面集中了1325個住戶。幾乎同等規模的還有五六處，包括喬治·華盛頓大院。[[753]](#_753_9)

維也納公共住房是以階級為基礎的。城市當局宣稱通過對資產階級征收房屋和奢侈品稅來為工人建筑房屋。他們的努力有效地掐斷維也納的私人房屋投資，但是北大西洋經濟體其他任何地方，稅收補貼的工人階級住房租金都不曾低到讓沒有技術的工人家庭都能承受得起。馬奎斯·蔡爾茲在提到該市的工作時寫道：“每個對改革、住房和社會進步有任何興趣的旅歐游客實際上都要看看維也納建造的漂亮的工人階級公寓。”英國住房專家伊麗莎白·登比把維也納房屋稱為“本世紀最偉大的住房建設成就”。[[754]](#_754_9)

但是機器時代和住房問題交匯的最不同尋常的地方在魏瑪德國。那里，英國花園郊區傳統、維也納社會主義者對勞工團結和社區設計的承諾、美國糧倉的現代主義審美觀、德國年輕一代對資產階級矯揉造作的反叛、美國福特主義的社會化變體，聯合起來創造了歐洲一些最漂亮的工人階級住房。這種匯合的時間很短暫。但是在魏瑪共和國初期，在1924年經濟穩定期和大蕭條之間，為群眾生產“生活機器”是主要任務，其中的創造性在北大西洋經濟體中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與之媲美。[[755]](#_755_9)

在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和重建的激情讓年輕的建筑師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激進。在1920年代設計了一些最好的柏林新住房的布魯諾·陶特從1919年到1921年陶醉在充滿幻想的烏托邦里。當馬格德堡社會主義者城市委員會1921年任命他為城市設計師（Stadtbaurat）后，他開始用野獸派繽紛顏色為城市老街墻粉刷。陶特的主要合作者馬丁·瓦格納1920年代初期努力要把柏林建筑業組織成為能夠擺脫資本家中間人控制的行會。德國工人階級住房誕生于烏托邦努力，是對帝國和戰前資本家的做作和虛假做出的反應，一種在共同革命中聯結政治與建筑的決心。[[756]](#_756_9)

這個努力的金融背景隨著1924年超級通貨膨脹的突然終結和對房東征收新的所得稅而到來。該稅旨在平衡房東從利率的大幅下降中可望獲得的部分非勞動所得，是專門指定用于魏瑪憲法中保證的“有權住體面房屋”的款項。結果提供了一張巨大的畫布，由一幫沉溺于機器時代現代主義社會前景的建筑師來發揮其創造力，就像傳統主義者英國同行所享受的那樣。

法蘭克福是第一個重要城市來實驗金融和設計新工具，那里自1880年代起住房倡議就成為進步人士的議程。在左翼民主派路德維希·蘭德曼市長和該市新社會主義者“城市建設顧問”恩斯特·梅的指導下，該市從1925年到1931年開始新的工人階級住房建設。有些直接由城市建設，有些通過城市為主要股東的有限贏利公司建設。在梅的辦公室里設計為社區單元的街區，一種嶄新的住房開發開始出現在法蘭克福：精心種植的花園土地中間一排排低矮的、立體主義的水泥預制板房屋，平屋頂上有曬太陽的露臺，拉毛粉飾外觀顏色有如彩虹一般。[[757]](#_757_9)

建筑師稱它們為“解放了的房屋”。即使現在，當人們走過按照弗蘭茨·阿迪克斯1891年的原始分區規劃在城市港口附近開辟的工人階級住房區時，早期的梅式房屋還是讓人印象深刻。人們走過賴夫艾森街和舒爾采—德里奇街上工會資助的房屋，九到十二套房屋擁積在四層高的人字形或者駱駝背形的屋頂下，感覺它就像以夸張的規模放大出來的資產階級別墅；接著來到戰后城市建設的聯排房屋，仍然保留資本家品味的跡象，如拱門和百葉窗，塞在沉重、高聳的屋頂老虎窗下的三樓；再沿著拉薩爾街、馬克思街、恩格斯廣場突然來到梅式低矮的、兩層的立體主義聯排房屋，它們的正面沒有任何裝飾或者偽裝。

新風格的流行語是“光線”、“空氣”和“陽光”。但是從舊形式解放出來的住房不僅僅是對高聳屋頂和百葉窗之類限制的攻擊。社會現代主義的深層目標是打破19世紀美學和攀比之間的聯系，正如維也納一樣，他們不是要把房屋變為紀念碑，而是要使它簡化和民主化。

恩斯特·梅最著名的成就是在普勞恩海姆和羅默斯塔特建設的衛星城，在從法蘭克福城區越過尼塔河洪泛區的一條城市所有的新公交線盡頭。梅戰前在雷蒙德·昂溫的漢普斯特德辦公室工作兩年，了解花園城市設計的原則。他把昂溫的美學傳統主義去掉而換上了現代主義形式，圍繞著學校、運動場、河邊游泳場、合作托兒所、洗衣房、雜貨店和花園建造了低矮聯排房屋和三層和四層公寓街區，形成大幅度的曲線輪廓。他的建筑是花園中的機器，鮮艷的多彩墻壁映照在老城上，就像大型的廣告牌展示把功能主義和社會目的結合起來的建筑可以是什么樣。

法蘭克福在1925年到1931年建造了大約1.5萬套現代主義風格的市營住房，是德國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現代主義社會住房的櫥窗。在共和國的第二個櫥窗城市柏林，權力和倡議比在法蘭克福更加民主化。那里的新工人住房的建筑商主要是以工會為基礎的建筑協會，由公共資金提供補貼。其中最大的是馬丁·瓦格納的格黑格，它1925年和1927年按照陶特和瓦格納的設計而建造的馬蹄形開發區（Hufeisensiedlung），也是城市新社會建筑的最著名例子。聯排房屋、花園，以及公寓構成的巨大馬蹄形曲線，都與周圍資本主義大城市隔開，位于起到中世紀城墻作用的深紅色成排公寓房屋的后面。這個工程是民間風格的、浪漫的、現代主義形式的驚人結合。更大的工程是在柏林策倫多夫的城市森林邊緣的格黑格工程。在那里，陶特等人建造了工人階級花園郊區，幾乎有兩千套現代主義風格的房屋，把它的平屋頂、基本形式與大窗戶、低密度、花園、樹木和色彩相結合。還有十多個計劃中的大規模開發或者大型住宅區（Grossiedlungen）很快出現在古老的“出租營房”城市的邊緣。到了1932年，柏林建造了幾乎和法蘭克福一樣多新的激進風格的低成本房屋，其中70%由工會資助。[[758]](#_758_9)

從風格上看，新房屋結合了鹿特丹建筑師J.J.P.奧德、弗蘭克·勞埃德·賴特、現代主義繪畫和美國工廠設計、勒·柯布西耶和鮑豪斯的特征。勒·柯布西耶和鮑豪斯有難以匹敵的自我宣傳技能，因而主導了1920年代現代主義建筑的歷史，但是沒有給予現代主義審美促使其實現的發動機。鮑豪斯建筑是1920年代德國激進審美思想的驚人豐富的匯合點，它的1923年展示房幫助確定了“解放了的房屋”的形式。但是魏瑪德國的建筑行動不在德紹（Dessau），甚至不在格羅皮烏斯在那兒設計的小郊區工人階級住房工程，而是在大城市；工人階級政黨、工會組織是贊助人。

對于贊助新建筑的工會、公共住房工程機構來說，現代主義不是一種風格而是新社會和經濟形式的核心。為了宣傳它，梅在1926年11月創辦了《新法蘭克福》雜志。路德維希·蘭德曼在第一期上寫道：“新的人民、新的時代必須重造內在和外在的世界形式。”住房、建筑、商店招牌、交通、家具、游泳館都要重新設計。梅的助手在設計功能椅子、床架、臺燈、衣柜、門和門把手等，不僅是創造適合新房屋空間限制的裝飾，而且要打破戰前資產階級的美學觀，包括加厚軟墊的椅子、裝飾織物、小擺設和偽裝。功能主義是社會化社會的外在形式。陶特問在新文化向我們招手的時候，誰還要選擇“在過去文化的廢墟中生活呢”？[[759]](#_759_9)

中產階級住房協會堅持他們認為與其成員地位相當的高聳屋頂和小窗戶，大肆攻擊新的平屋頂建筑缺乏靈魂、死板機械、是窮人建筑，這強化了兩極對立。1933年希特勒被任命為總理后，策倫多夫的規劃者在最后的單元中屈從于風向，用高聳的紅瓦屋頂和暗淡的灰色納粹式拉毛粉飾。即使在1920年代末期房屋建設高潮時，魏瑪的多數城市也急忙逃離爭議，故意避開新美學。相反，社會現代主義者呼吁要把房子從無法承受的私人野心和攀比努力的負擔中解放出來：為后資產階級社會創造社區和房屋。

美國主義是這些社會重建主義混合野心的最后一個組成部分。這個觀點讓美國人措手不及，因為不管是公共的還是社會現代主義的住房都還沒有在美國出現呢。當年輕的美國人凱瑟琳·鮑爾1932年在柏林訪問德國建筑師恩里希·門德爾松時，門德爾松拉開他的折疊的墨菲（Murphy）床向她展示美國標簽。他的姿態不是隨意性的。雖然像路易斯·品克這種美國旅游者或許認為梅的新邊緣城市房屋是“怪誕”，但是德國人認為簡化的、往往是預制的實用形式、機器影響的線條、折疊床和標準化廚房是福特主義——是美國特征。[[760]](#_760_9)

社會現代主義的建筑師實際上從一開始就熱切充當了引進美國效率技術的渠道。像陶特和格羅皮烏斯一樣，其中許多人在他們的整套形式中為美國工業建筑留出了特別地位。從1920年代起，瓦格納的雜志《社會建筑業》已經刊載了很多美國工程技術的報道。鹿特丹的市政建筑師J.J.P.奧德把他的房屋描述為“可居住福特”（dwelling Fords）。瓦格納和梅都在1920年代訪問過美國，在它高聳的鋼鐵框架摩天大樓和資本家的奢侈中尋找理性化生產技術和效率設計。梅和陶特都被克里斯汀·弗雷德里克1921年翻譯成德語的《新家政》深深吸引住了，該雜志把廚房當作科學管理空間和工作的練習。在法蘭克福，梅的設計者產生了標準化、高效率、普爾曼風格的廚房讓房客來購買。梅開發項目中的床是可折疊、可轉動或可卷在一起的，節省空間的創意反映了福特工程師把生產機器越來越緊密湊在一起的技能。[[761]](#_761_9)

在柏林和法蘭克福，現代主義建筑師實驗了大規模生產建設的技術；由于沒有德國規格贊助者，這種實驗一直讓美國投資者望而興嘆。水泥預制板、標準化建筑構件、巨大的移動起重機、理性化的工作任務對于德國的規模經濟效益非常重要。在美學和社會術語上，結果是遠離美國人關于住房和房屋假設的世界。但是在把房屋看作住宅機器，看作是旨在給予居住者空間、空氣、隱秘性、公共設施的裝置這一想法中，福特主義紐帶的影響是深刻和根本的，不管其改造轉變多么讓人驚訝。魏瑪社會住房擁有的美國色彩比其他任何東西都更多，同時又更少。

在德國和在美國一樣，外表下的蟲子是經濟。陶特的馬蹄形開發區意味著土地和建設成本，最后決定了其價格超過了柏林工人階級的購買力。梅的羅默斯塔特住宅盡管有大規模生產的效益，也只有技術工人才能買得起。從1925年到1929年最初的創造性設計高潮后，追求更大節約效益的動力讓魏瑪建筑師轉入更加簡樸的風格。公共資助的工人階級住房縮小了內部空間，到了1930年到1931年間梅在威斯特豪森（Westhausen）進行的法蘭克福最后一個主要工程時，它已經降到維也納的最低限度標準。流行的規模從兩層增加到四層或五層。區分內部和外部社會世界的大幅度曲線因為排房（Zeilenbau）數學而抹平了：根據專家計算好的角度用尺子劃定長長的平行區塊，因為據認為那是使房屋朝陽的最好角度。到了1930年代，北大西洋經濟體已經分崩離析，德國住房方面努力的焦點在確定一個家庭所需要的最少空間和空氣等：“最低生存保障權”（Existenzminimum）。梅和他建筑團隊的大部分成員同年離開法蘭克福到蘇聯，那里有幾十座正在建設的城市，建筑業的未來似乎仍然是開放的。瓦格納抗議說在壓倒一切的經濟崇拜面前，更進一步的效率是徒勞的。兩年后，因為陷入財政危機，德國城市實際上除了邊緣地區為失業者建造的粗糙房屋外什么也沒有蓋：那是沒有室內廁所也不靠交通線的最簡單房屋。[[762]](#_762_9)

即使在1929年到1932年的排房階段，魏瑪新住房也有遠遠超過戰前工人階級住房的便利設施，這些設施是連中產階級美國購買者在新的平房開發區都不一定能有的。不管受到蕭條市場多大的打擊，魏瑪融合美國工程技術、現代主義美學、社會民主政治的沖動仍然在最后階段顯示出來：把私人的顯示財富的房屋轉向其外部的自然和社會環境，取消了表現地位的裝飾等負擔，把設計和融資手段社會化，降低成本直到體面的住房像T型福特車一樣無所不在。公共住房——1890年代政治和經濟絕望的標志，開始包裹在烏托邦希望中。在魏瑪住房中，機器時代美國的片斷在歐洲扎下根來，因背景和贊助者不同而得到轉化。把它再帶回家將是同樣復雜的對政治和贊助者的考驗。

## 現代主義政治

正如從前大西洋進步紐帶經常出現的情況，視覺的紐帶最先形成。以照片和文字圖片形式，對于住房和階級標準方面歐洲革命程度的意識開始返回滲透到1920年代的美國。伊迪絲·埃爾默·伍德早在1922年又來到歐洲收集她即將用在《西歐住房進步》中的資料，它是這十年中該領域最重要的一本書。1926年路易斯·品克被任命為州長阿爾·史密斯的紐約州住房委員會主席，他的第一個重大行動就是從倫敦到維也納考察歐洲住房。約翰·諾倫是經常到海外旅行的人。幾十個人的美國代表團前來歐洲出席國際住房和城鎮規劃聯盟年會（1926年在維也納，1928年在巴黎，1931年在柏林）和會后考察旅行。諾倫自己還在1931年的柏林會議上當選為會長。當住房問題在1930年代中期成為美國政治的熱門議題時，跨越大西洋的交流隨著興起，甚至產生了全國不動產協會。諾倫重復了1927年熟悉的觀點，“歐洲是社會經濟的巨大試驗場”。在本地典范失敗的地方，歐洲成為異常重要的信息寶庫：不斷旋轉的顯示對比、選擇、可能性、尷尬的展品。[[763]](#_763_9)

美國的歐洲住房專家認為，在為民眾建造體面住房的民主化過程中，一條腿依賴商業建設的美國已經遠遠被拋在后面是不可辯駁的事實。“活動宣傳家受習慣性影響，多年中或許繼續談論‘美國工人階級的生活標準’，就好像它是非常優越似的；但是我們在這方面的領先水平早就不存在了。”伊迪絲·埃爾默·伍德在這個十年之初就警告說。“不錯，我們確實有更多的汽車……[但是]西歐工人已經全部都得到八小時工作制，他們有健康保險、失業保險、養老金……更重要的是，再過幾年西歐普通工人將生活在我們的偶然性制度下只有少數幸運者才能居住的體面房子里。”她認為在這個十年結束時差距更加巨大了。在歐洲任何地方，“擁有家的權利”是作為社會諾言而提出來的，而在美國“在為需要者提供房屋的問題上，我們仍然感謝上帝，說是和別人不同，我們不干預神圣的供求法則”。[[764]](#_764_9)

在多數美國人對1920年代歐洲住房的評價中，機器時代住宅民主化的德國實驗并沒有占很大的數量。品克1927年在法蘭克福短暫停留，但繞過柏林直接把最高級的贊美留給了維也納。把英國和荷蘭作為公共資助的工人階級住房標準的伍德，在1922年訪問歐洲時根本就沒有把德國納入行程中。把德國的社會現代主義傳送到美國的任務落在一個外來的年輕人手里，這種情況在以前大西洋進步人士紐帶中經常出現。凱瑟琳·鮑爾從最初素描勒·柯布西耶的巴黎別墅到成長為美國勞工協會的主要住房游說者，她在住房政治活動中是個非同尋常的人物。在跨越大西洋的進步紐帶中，她的作用引人注目并具有標志性。

藝術是鮑爾的起點。她1926年大學剛畢業，作為政治上的幼稚者第一次來到歐洲，在巴黎左岸過了一年學習藝術和寫作的生活。如果說現代意味著后資產階級，鮑爾飽享了1920年代的現代情緒：冷嘲熱諷，超然冷漠，蔑視社會習俗，對眾多陶醉在她聰明、強烈、波希米亞式魅力下的人感到好笑。因為對建筑有初步的訓練，加上追求新鮮事物的眼光，鮑爾發現了1920年代后期巴黎正在建設令人印象深刻的現代主義新建筑：公然承認水泥鋼鐵梁柱的昂貴先鋒派別墅。她在1926年和1927年對萊茵河彼岸現代主義之左派、社會性變體還一無所知。[[765]](#_765_9)

到了1930年在哈考特—布雷斯出版公司的工作被經濟危機摧毀時，她也還不知道。她再次來到歐洲“從純粹審美的眼光看待現代建筑”。這次巴黎不能滿足她的好奇心了。現在歐洲建筑現代主義的新展區是工業聯盟1927年建立在斯圖加特山上的魏森霍夫居住區（Weissenhof）展覽，有陶特、勒·柯布西耶、格羅皮烏斯等人設計的明凈的現代主義別墅，在這些別墅后面塞進來一排奧德式寬敞的、最簡樸的可居住福特。鮑爾開始搜尋它，劉易斯·芒福德的介紹信讓她認識了柏林《形式》雜志的沃爾特·庫爾特·貝倫特，而貝倫特的圈子又讓她接觸到了魏瑪社會現代主義。投入到這嶄新的政治和形式世界，鮑爾很快看到歐洲真正的建筑事件是工人住房的革命。她報名參加在法蘭克福的新社會建筑短期課程，是150名參加者中唯一的美國人。他們在梅的帶領下奔赴羅默斯塔特、普勞恩海姆、威斯特豪森等地。她努力學習德語，采訪了現代主義住宅區建設（Siedlungsbau）的主要實踐者。她喜歡回憶這個故事：“我在1930年代在歐洲看到的東西是如此激動人心，竟然把我從審美家轉變成住房改革者。”[[766]](#_766_9)

回到家后，鮑爾把她感受的激動變成了發表在1931年《財富》雜志上有關梅的工作的獲獎文章。第二年初，她幫助組織了新歐洲住房設計第一次美國展覽。作為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現代建筑》展覽的附屬部分，里面掛有羅默斯塔特和奧德在鹿特丹的工程照片，還有早期排房工程之一的比例模型。1932年夏天，鮑爾再次返回歐洲，這次是作為劉易斯·芒福德的研究助理、導游和情人。芒福德作為美國文化和社會批評家處在學術生涯的最高峰，獲得古根海姆獎學金來研究技術史，并受《財富》雜志委托寫有關歐洲解決住房行業經濟困難的文章。鮑爾接手住房系列的工作，將資料系列化并構想了一些“結論”。當《財富》因為他倆拒絕淡化政府資助工人階級住房的責任，在刊載了前三期后取消了芒福德的合同，鮑爾發現自己面對堆積如山沒有使用的研究材料無可奈何。所以在接下來的兩年里，她努力把這座山變成了一本書——《現代住房》。由于論證有力和對歐洲經驗的熟練把握，這讓鮑爾一夜之間成為住房專家。[[767]](#_767_9)

《現代住房》實際上是十年前伊迪絲·伍德的歐洲住房倡議報告的修訂版。由于對形式與政治具備比伍德更敏銳的眼光，鮑爾開始指導讀者了解歐洲低成本工人階級住房設計最好工程的理論和實踐。鮑爾不是把它作為關于歐洲的書，而是作為人類住宿基本標準的書。到《現代住房》1934年剛印好出版時，把它作為歐洲的書只會成為表現政治懷舊情緒而已。她自己剛看到魏瑪現代主義住房，這個運動就走到盡頭了。到了1932年，羅默斯塔特房屋中很多都已空蕩蕩了。為了節省交通成本，其住戶回到了城里。鮑爾在恩斯特·梅動身前往蘇聯前夕會見了他。到了1934年，因為對蘇聯的官僚主義感到失望，梅又前往肯尼亞，陶特到了日本，而馬丁·瓦格納要動身前往土耳其。維也納的卡爾·馬克思大院和喬治·華盛頓大院在奧地利政治動蕩中落入它們最強大的批評家手里。英國保守派開始再次回到清理貧民窟。在德國，攻擊現代主義是“文化布爾什維克主義”狂熱跡象的批評正在展開，納粹開始用自己高聳屋頂和百葉窗體現的反動烏托邦理想點綴德國。

鮑爾把“現代住房”從其政治特殊性中抽取出來，強調其純粹的、直截了當的功能主義。曾經讓路易斯·品克驚訝的法蘭克福“怪誕”房屋代表了精簡到身體和群體基本需求的住房。“光線、空氣、寬敞、要緊和愉快的用途的意識。陽光、草地、色彩、形式。”綠化帶、低密度、“社區單位”規劃。這些是住房的真正標準。針對投機性開發商那些騙人的外觀、虛假的歷史偏好，甚至排房數學在鮑爾看來也具有一種清晰的、解放性的邏輯。現代住房意味著藝術在街坊和社區設計上的社會化，它意味著形式直接專注于舒適和適用，它意味著房屋重建不是建立在價格基礎上而是在不能違背的生物學標準上。[[768]](#_768_9)

她警告美國讀者，這是美國實用主義用于解決如此直截了當的需要，以至于要下功夫才能認識到它。她在1932年寫道，“使它[現代住房]在多數美國人看來不可思議的原因在于”：

它包含積極的必需品項目，直接確認和解決物質、經濟、社會和審美的需要。天知道，不是環境對美國人不重要，而是他與房屋很少有直接和參與性的關系。他太抽象了因而不在乎好建筑。房子就像玩物一樣是用來看的東西，或是作為擁有財富的炫耀，或是文化的文學象征，或者天天提醒居住其中的你是與世界上其他人競爭的孤獨者，或者只是一個掛帽子的地方，里面配有最新的掛帽子裝置。至少有些歐洲人顯然渴望好房子、高效率的休閑、健康、秩序良好的社會的廣泛參與……可是美國人真正的渴望的是什么呢？親愛的上帝，再給我一次機會，上帝啊，下次我一定在下跌前把它拋出去。[[769]](#_769_9)

她在《現代住房》中更清醒地寫道：“繞不開的事實是，現代住房背后的前提不是資本主義前提、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財產、根深蒂固的民族主義、階級差別、政府屈服于保護舊利益而不是創造新價值。”現代住房不能零碎地完成，“它不是在舊框架內的改革。它要么是提供全新都市環境標準的全新方法，要么什么也不是”。[[770]](#_770_9)

如果體面的工人階級住房要求必須給工業機器確定全新的目的，那么如何實現轉型呢？對1930年代初期所有像鮑爾那樣開始想象在大蕭條破壞的“價格”經濟之外發展出新的“用途”經濟的人來說，這是核心問題。“用途”從1930年代工程師的車間轉變成為十年之久的社會政治詞匯。甚至弗蘭克·勞埃德·賴特也討論他的新“美國風”（Usonian）房屋。但是如果現在的社會政治不僅要求法案，而且要求把機器生產能力和新目標結合起來，到哪里去尋找能夠帶來那種變化的歷史發動機呢？

這是鮑爾的旅伴心中想的問題。在1932年夏天，劉易斯·芒福德步她的后塵走向魏瑪社會現代主義。芒福德從這次跨越大西洋的遭遇中寫出的兩本書《技術與文明》（1934）和《城市的文化》（1938），是最受推崇的1930年代社會歷史批評。鮑爾1939年到歐洲旅行時帶著第二本書作為閱讀材料，指責在她看來屬于芒福德政治學中的軟弱之處，擔心他掩蓋了變革道路上“巨大的政治管理困難”。像他之前的許多進步人士一樣，芒福德認為他不是從政治而是從歷史本身看到了復興的力量。[[771]](#_771_9)

機器文明的未來是芒福德古老的主題。他在曼哈頓上西區德裔美國家庭長大，一直從書籍和作家那里尋找擺脫狹隘小資產階級風俗習慣的途徑。他沉浸在英國和愛爾蘭那些批評工業資本主義的作家思想中：約翰·羅斯金、H.G.威爾斯、蕭伯納、埃比尼澤·霍華德、AE（喬治·羅素）和最重要的——他的“導師”帕特里克·格迪斯。[[772]](#_772_9)像格迪斯一樣，芒福德對戰勝了從前“生活經濟”的19世紀沒有好感，它是金錢至上的、渾身煤污的、鐵路中心的、“古代技術的”。芒福德1920年代的書是考古練習，企圖從美國歷史中挖掘出被埋藏的文化資源，以對抗美國機器和金錢占主導地位的現在。

尋找有意義的美國文學和藝術傳統的工程在1920年代正在展開，芒福德是主要的參與者。他們試圖從金融家和道德家的巨大陰影下抽取出梅爾維爾和弗蘭克·勞埃德·賴特等人、快速帆船和大篷車的功能主義之美。芒福德熱情稱贊古老的新英格蘭村莊或者梭羅和惠特曼的預言家聲音，但是美國歷史的后來部分直到現在的“機械和都市文明”一直在走一條墮落的道路，滑入貧瘠的功利主義、膽怯的經濟和藝術、標準化的形式、機械化非人化的工業主義的深淵。馬修·約瑟夫森記得在1920年代末期芒福德英俊瀟灑、口齒伶俐，用“炙熱的信念”譴責機器文明的破產。殖民時代村落集體生活解體后就再也無法回頭了，拓荒者“用所有光榮遺產來交換煤氣燈、鋪平的街道、漿硬的衣領、摩天大樓”的迫切渴望“……把美國非人化工業主義道路打磨得像水泥路一樣光滑”。[[773]](#_773_9)

芒福德在第一次看到歐洲時并沒有覺得有什么不同。他在《日晷》的編輯地位在1920年的后重建幻滅中消失了。他坐船到英國擔任帕特里克·格迪斯的社會學協會雜志為期五個月的編輯。和格迪斯的助手維克多·布蘭德福一起在倫敦游逛，他看到的英國不是阿瑟·格里森的英國，自下而上政治重建的余燼還在燃燒——雖然芒福德自己參加了一次工黨會議，并因為看到煤礦工人工會的羅伯特·斯邁利而非常自豪。他透過布蘭德福和格迪斯的眼鏡看到的英國是在工業主義和土地壟斷力量碾壓下的“噩夢”。他肯定歐洲從工業主義得到的遺產中沒有一樣不是和“我們在美國看到的東西一樣惡心和悲慘”。他寫到如果歐洲有什么東西值得挑出來，那肯定是舊的而不是現代的東西：“某些機構、生活習慣、物質紀念碑……在歐洲已經看不見了”，但是它們的精神“仍然像環繞行會大廳、市場大廳和大教堂的微弱芳香一樣久久回蕩”。[[774]](#_774_9)

芒福德對機器時代嚴酷批評的部分內容在1920年代末期開始弱化。從根本上說，格迪斯一直是歷史進程的樂觀主義者。格迪斯寫到，即使在世紀之交的紐約市這座“地獄之城”（如果有這樣的城市的話），他認為已經可以看見“新技術”將來的跡象。在清潔的、去中心化的、使用電力的、崇尚合作信念的未來世界，19世紀的不平衡將得到糾正。在格迪斯確立歷史框架的新術語中，“新技術”文明最終替代“舊技術”文明：電代替煤，生物技術戰勝機械性。[[775]](#_775_9)

芒福德也不是沒有烏托邦理想。在1920年代初期面對戰爭住房項目的潰敗，他曾加入了圍繞在查爾斯·惠特克身邊的杰出建筑師和規劃師團體，旨在確保社區規劃觀念的生存。就是在這個工作中，紐約昆斯區建立了受萊奇沃思啟發的小花園郊區工程：日照園（Sunnyside Gardens），芒福德和家人也搬到那里居住了。在1930年他已經動筆寫一本新書《形式與性格》，試圖建立機器文明得與失的更清晰的“資產負債表”。雖然如此，只是在零星碎片、表格和片段（如霍華德的花園城市觀點、約翰·羅布林的布魯克林大橋、路易斯·沙利文的辦公大樓）中，芒福德才能意識到格迪斯想象中的新技術可能性。[[776]](#_776_9)

1932年夏天，即魏瑪的諾言終結前夕，芒福德在歐洲看到的東西最后給他的資產負債表以歷史推動力。他在德國尋找激進的新建筑，游蕩在法蘭克福和柏林的現代主義住宅小區和維也納工人住房群中，經常到老呂貝克的中世紀后期街道閑逛，在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館圖書館看書，一直沉浸在歷史中。后來他寫到在那個夏天的發現，就是由木頭和水的力量構成的中世紀后期世界的文化優勢：“前科技時代”（eotecnich）階段，它已經毀于煤炭、鐵路、金錢、戰爭混合造成的浩劫。但實際上是“前科技時代”過去和他在1920年代末期歐洲看到的后資本主義將來之間的相似性，這一點最深刻地抓住了他的想象力。[[777]](#_777_9)

呂貝克的讓他著迷的簡單、直接及中世紀外觀，和新社會現代主義排房住宅區呈現出意料之外的親屬關系。社會現代主義建筑有鮮明的機械性特征，和芒福德的日照園合作者傳統主義設計完全不同，采取了“機器的民間風格”，但不是美國摩天大樓建造者使用的東西。芒福德寫到，這種建筑扎根于“理性、合作、現實、不會引起反感的思想模式”，是專門“實現效用最大化，偽裝、炫耀、浪漫的一相情愿全部最小化”的建筑。機器不是獻給私人財富的炫耀而是為了合作和共同目標。[[778]](#_778_9)

1932年夏天在德國的人不可能錯過共和國脆弱性的跡象。芒福德后來發現，到夏天快結束的時候德國到處都是褐衫黨。經濟危機讓公共建筑工程停頓下來，雖然如此，他寫到“在任何現實的價值天平上，美國是窮國，德國是富國”。“想象一個階級區分和金錢價值被功能性經濟替代后的世界，人們看到這個新世界跡象的地方”不在“落后的”俄國或者“先進的”美國，而在1924年和1930年間德國建造的社會民主住房。在總結夏天的心得時，他寫到“對歐洲人來說機器再次成為實現人類目標的工具”。前資本主義的過去、后資本主義和現代主義的未來，組成了一個社會政治整體。[[779]](#_779_9)如果說芒福德1930年代預言性的社會預測是在夏天遭遇魏瑪現代主義中形成的，可能太過分了。新技術文明的經濟基礎是芒福德從1930年來一直呼吁的“基本共產主義”，從以賺取利潤為中心的經濟轉向以使用為中心的經濟，把資源集中在生產最基本生活必需品。[[780]](#_780_9)但是要影響未來，沒有什么比已經看到的東西更能提供幫助了。在像依靠分析政治一樣依靠視覺政治的著作中，芒福德對歷史傾向的建筑構造意識給了他1930年代著作預見性的力量。他從夏日歐洲之旅返回后不久寫道：“一個新世界開始出現，不過是以碎片的形式。”機器本身的邏輯開始推動歷史前進。[[781]](#_781_9)

到了1938年他的《城市的文化》出版時，芒福德能夠包括一系列新技術文明未來形象的插圖：田納西流域管理局的溢洪道、韋林和日照園城市實驗、底特律玻璃幕墻工廠、布拉格百貨商店、克里斯汀·弗雷德里克啟發的廚房、奧德設計的鮮明現代主義的教堂、從瑞士到日本簡單優雅的可居住機器。新政第一批公共住房工程占了一頁照片，新政在馬里蘭州的來自歐洲靈感的現代主義示范郊區“綠帶”新城（Greenbelt）占了另一頁照片。[[782]](#_782_9)

芒福德1961年在更加悲觀的情緒中重新寫這本書時卻打算把它們全部取出來，新書名為《城市發展史》。現在他認為“充滿歡快的期待和信心”的前本書是“像博物館一樣的東西”。回顧起來，他覺得自己吸收魏瑪靈感的樂觀主義、1930年代對“通用的、平等的、標準化的、共同的”現代主義基本形式的熱情，甚至前科技時代—舊科技時代—新科技時代的演化順序本身都是錯誤的。[[783]](#_783_9)

但是在1938年似乎正好相反。在一本嚴重依賴插圖的書里，芒福德把最高潮的插圖篇幅給了法蘭克福的羅默斯塔特。正如鮑爾的《現代住房》插圖一樣，梅的簡潔幾何形式呈弧形跨過大片的公園和分配的綠地，機器和花園再次成為一體。但是對于芒福德來說，住房是最不重要的部分。這里呈現的與其說是房子不如說是對歷史的期盼。芒福德寫到，在這里“個人需要和公共生活需要高效率地結合起來”。這是“預示新文明的形式：一種處于胚胎期的文明，就像17世紀資本主義和機械主義所處的狀態一樣。我們這一代面臨勇敢走向該文明的選擇，否則就重新落入野蠻狀態，以分崩離析的資本主義混亂和膽怯為特征，還有用神經質代替完整的秩序、法西斯主義……所以前進！”[[784]](#_784_9)

如果未來已經放在歷史的皮夾子里，社會政治的任務就是呼吁即將到來的形式出現。芒福德大膽地開始去完成這個任務。利用他在改革者建筑師圈子中的廣泛聯系和接近《新共和》的便利，芒福德在1930年代初期踏入住房政治。他和鮑爾與日照園團體一起，幫助組織了一系列最好的新歐洲工人階級住房和規劃設計展覽。他們對于住房問題的答案是不僅僅為了居住。芒福德在用德文寫給自己的便條中說：“住房是改革：住宅小區是新形式。”辦法是用規劃好的新社區環繞奄奄一息的“地獄”老城，每個社區一萬到一萬五千人，密度很低，有寬敞的公共空間：霍華德花園城市思想，不是處于早期慈善形式的，有昂溫的風景如畫背景的；而是如恩斯特·梅那樣加以現代化和民主化改造的。在新成立的住房研究公會，芒福德的助手們努力在進行設計和成本核算以展示它的可行性。如果像進步人士常常相信的那樣，光有視野和專業就能制訂公共政策，大蕭條中激進化的花園城市小集團就可能成功了。[[785]](#_785_9)

芒福德社會政治中所缺乏的是一個直接的、看得見的贊助者：一臺支持他的跨越大西洋遠景的社會經濟發動機，這要比理性的、不會引起反感的技術本身更有能力進行政治文化轉型的艱苦工作。芒福德早期對AE（喬治·羅素）和愛默生的熱情使他對中央集權的大機構沒有好感，對于富蘭克林·羅斯福也沒有好感，認為此人太喜歡修修補補而不愿意承認金融資本主義機器已經徹底報廢。芒福德很快對新政感到厭惡，對工人住房運動的短暫興趣也消失了。

但是社會政治問題超越了芒福德政治的具體內容。大西洋進步人士紐帶一直有一個危險，那就是旅行機制強調了一種視覺政治。它吸引參與者關注成品，淡化了成品創造所必不可少的經濟和社會過程，讓整體比部分更醒目。像在他之前的豪威和伯恩一樣，芒福德更看重他所向往的歷史時代的價值，對促使這個價值實現的政治不怎么重視。而形式比其價值更清晰。在1930年代用第一批社會現代主義藝術和現代主義公共建筑點綴美國小城鎮時，新政者很快知道了很多同樣的矛盾關系。

文化政治的難題是根深蒂固的。芒福德敦促社會重建，同時他又對在現行文化經濟框架內的重建感到絕望。他在1934年寫到我們的社會是“混亂的”，因為資本主義是混亂的；它們從社會角度看是規劃糟糕的，從經濟角度看是組織混亂的，因為資本主義本身是規劃糟糕、組織混亂的；它們不維持人類價值，因為資本主義把金錢價值放在首位……如果我們的社區在結構上主要表現出現代社會的掠奪性和寄生性特征，那是因為我們的文明作為整體沒有經濟地組織起來，以便產生可以像生物學家說的欣欣向榮的共生現象，一個合作生活的群體。[[786]](#_786_9)

文化重生的種子在于社區形式的重生，形式的重生等待價值的轉型。如果貶低社會現代主義者的“新柏林”、“新法蘭克福”烏托邦的變革理想，把他們的工作簡化為階級和利益政治，就是不忠于他們的核心工程；如果把工程的象征意義過分拔高，就把移植變成根本不可能的事。擠在這兩個極端之間，文化轉型的政治會很快從預言變為歷史悲觀主義。托萊多的布蘭德·維特洛克在1920年代退回到歐洲審美主義，《新共和》的赫伯特·克羅利轉入哲學都是例子。即使弗里德里克·豪威也在1920年代后期短暫地從政治中逃走，在楠塔基特島農場進行哲學思考。

芒福德還沒有退回到悲觀主義立場。他要把在魏瑪社會現代主義中意識到的新技術未來的種子帶回美國這一企圖，已經探究了視覺歷史角度社會政治的可能性。但是單單預測不能推動政治的車輪前進。如果實用的、民主的現代主義建筑要在美國找到合適的位置，就需要一個比歷史的無階級性力量更近便的贊助者。

凱瑟琳·鮑爾自己對魏瑪社會現代主義的閱讀在1930年代中期已轉變為完全不同的方向。她在1932年到1934年靠兼職為芒福德的建筑師和規劃師群體工作來謀生，她的照片成為社會現代主義首次在美國展覽的核心內容。但是到了她完成《現代住房》時，鮑爾已經相信魏瑪的根本教訓不在形式或者功能，而在于政治。現代住房不是歷史演化的產物，而是工人階級組織的作品，只有群眾性的、政治覺醒的勞工運動才能夠打破住房經濟學的流行框架使之成為現實。約翰·埃德爾曼遇見鮑爾時，曾認為她是“紅色分子”，她后來被迫在國會面前否認這個指控。芒福德絕望地感到她已經成為政客或者純粹的“造房鼓吹者”。不管這種標簽是否合理，鮑爾和芒福德在1934年時因為階級和政治原因分道揚鑣了。鮑爾努力在尋找高效的勞工住房運動的領導核心。[[787]](#_787_9)

這個運動的原材料在大蕭條時代的美國不難找到。如果勞工內在的社會世界遠沒有得到美國勞工組織像歐洲同行那樣的精心培養，但總有些重要的例外。最積極的是服裝工人工會。作為歐美兩大洲勞工團結觀點的中心，它們比其他工會更少迷戀男子漢獨立性，對廣泛的社會議題采取開放態度，所以在20世紀初期幫助維持了強健的內部和外部社會民主政治。在紐約市，服裝工人工會聯合會開辦了勞工銀行、信用合作社、勞動介紹所、勞資共同管理的失業保險基金。它還開辦工人子弟夜校和夏令營，推動成人合唱團和健身俱樂部，組織大宗食品和電力購買，給工會家庭按成本價發放冰塊和牛奶等。到了1930年代初期，工會在國內建造了兩個最重要的工會資助公寓群。其中第二個位于下東區，由一位年輕的匈牙利移民建筑師設計，直接從社會主義維也納借用大膽雄壯的外觀和內部社會福利設施。[[788]](#_788_9)

歐洲以工會為基礎的住房協會在1920年代的柏林留下引人注目的烙印，動員像上文提到的內容在美國形成類似協會的努力，落到了一個政治和審美異議者同盟的身上，其成員全都有延伸到大西洋對岸的聯系。鮑爾是通過具有世界眼光的、在法蘭克福長大的年輕建筑師奧斯卡·斯通諾羅夫進入協會的，此人在1929年移民美國前曾在勒·柯布西耶的工作室短暫工作過。斯通諾羅夫試圖通過敲工會的門爭取建筑合同，曾會見過美國針織品工人聯盟的約翰·埃德爾曼。而在英國托爾斯泰式社區長大的記者埃德爾曼已經從反戰群體轉而從事一系列激進政治行動，包括作為1924年拉福萊特競選運動組織者的有償工作，最后成為針織品工人聯盟的宣傳家和游說者。埃德爾曼首先通過服裝工人工會聯合會的組織者了解到工會資助的住房計劃，對方以接受信仰者的激情向他展示了一組維也納社會主義者住房工程的照片。[[789]](#_789_7)

針織品工人提供了需求和組織力量，他們中有些人曾在費城的新平房郊區購買了不可靠的房屋，結果在抵押貸款的壓力下又失去了。工會領袖提供了工程的社會民主政治。斯通諾羅夫提供了與審美現代主義的聯系。他為針織品工人住房做的最初設計——“三幢特別高的、平行的十層樓房屋”，是勒·柯布西耶碑銘主義和格羅皮烏斯最低生存保障數學的具有潛在災難性的結合。但是按工會成員住房要求的系統調查修改設計后，完成的工程接近魏瑪工人住房的最好模型。得到新政公共工程住房首批貸款，建在費城的紡織品工廠區的卡爾·麥克利住宅區結合了三層樓現代主義形式、水泥預制板、完全外國風格的窗戶（建筑管理當局最初在批準它時猶豫不決），以及工人階級商品房根本不敢想象的整套內部設施。里面院落中包括網球場、小型游泳池；該住宅區還有合作雜貨店、會議室、設備良好的醫務室、地下停車場，平屋頂有洗衣房和兒童沙池，大禮堂里經常開展講座、政治討論、藝術學習等。如果是羅默斯塔特把一塊“福特的美國”帶到尼達河谷的話，那么，卡爾·麥克利住宅區則代表了把一塊正宗歐洲社會現代主義帶回了家。[[790]](#_790_7)

在第一批住戶搬進去之前，斯通諾羅夫和埃德爾曼就在努力把工程的先例拉入基礎廣泛的草根性勞工住房運動。《猶太前進日報》的查尼·弗拉德克和斯通諾羅夫的伙伴、曾接受鮑豪斯訓練的阿爾弗雷德·卡斯特納一起，加上特立獨行的貴格派慈善家、后來成為麥克利住宅區常駐經理的威廉·金斯，共同成立了一個被樂觀地稱為“勞工住房協會”（Labor Housing Conference）的組織，總部就設在斯通諾羅夫辦公室的一角。鮑爾在1934年就是加入了這個組織，作為勞工住房協會的理論家、宣傳家、偶爾拿工資的雇員，和游說者。到了1935年，鮑爾和埃德爾曼成功地從美國勞工聯合會領導那里爭取到對聯邦公共住房項目的認可，把游說方向轉到國會內部圈子，最終促成了《瓦格納住房法案》。他們找來介紹鮑爾的住房法案草稿的議員本人也是在維也納長大的。[[791]](#_791_7)

把“現代”住房政治化給了它政治動力和支持群體。這使得社會現代主義的社會、經濟和美學抱負的復雜混合體具有跨越大西洋機構差別的潛在可能性。針對那些把公共住房看作貧民窟改造、或者窮人住房改善、或者實現埃比尼澤·霍華德社區理想的人，勞工住房協會努力把工人階級利益注入到住房政治中，不僅是作為住房的生產者（雖然這在贏得建筑業工會的認可方面發揮了作用）而且作為最終的消費者。勞工發起的工人階級住房工程很容易吻合歐洲大陸眾多大城市的社會民主政治，因為它也是通過公共貸款融資，用機器時代的最高效率建設的。

但是，在大西洋進步紐帶背景下，階級政治像文化政治一樣都沒有取得成功的便捷道路。創造草根勞工的住房需求，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也不是旦夕之功；像美國這樣的地方，工會的社會基礎設施分布不均衡，工作就更加緩慢。如果沒有以勞工為基礎的政黨支持，把那個需求和國家政策結合起來就更有問題了。正如大蕭條打開的狹窄政治窗口顯示的，在時機起重大作用的地方，傳輸機器是緩慢的。正如我們即將在第十章看到的，在法案運作的終局游戲中，過程面臨失敗和嚴重損害的危險，最后一分鐘的妥協中被組織良好的利益團體擠進來。

在1930年代中期的困難時代和組織斗爭中，沒有任何別的工會加入到推動工人階級住房工程的運動中。到了1937年《瓦格納住房法案》完成時，公共資助的機會之窗又一次關閉。盡管有設計最好的勞工住房樣本，現代主義建筑在美國沒有作為工人階級工程來動員。1930年代美國的住房機器不是為機器工人準備的。

在所有這些方面，惰性限制了美國工人階級住房運動的政治。但是如果要水銀瀉地般的速度，沒有什么比市場本身更快的了。市場對現代主義的所有要求，就是要它簡化成可以商業化的構件，拋掉其中的政治內容，更換贊助人。有包括品味在內的這么多東西等待銷售，有人嘗試這種工程就沒有什么好驚訝的了。當然商業現代主義不是美國特有的現象。把藝術用在商品設計中，這在戰前的德國工業聯盟就已經被打磨成一種工藝，而且在1925年巴黎裝飾藝術和現代工業國際博覽會上展出，確定了“藝術裝飾”（art deco）風格的流行。雖然如此，仍然沒有什么能與美國的現代主義去政治化速度和徹底性相比。在魏瑪德國，功能主義暫時用手指戳在資產階級文化的眼睛上。但是由于大西洋紐帶內在的改造潛力使然：激進魏瑪的功能主義美學席卷1930年代的美國時，不是作為新社會秩序的形式，而是作為摩天大樓建筑商或者消費品行業的一劑補藥。[[792]](#_792_6)

現代主義營銷的第一個跡象出現在1920年代末期的時尚商店櫥窗里。到了大蕭條開始時，一個專業產品設計者新團隊（其中很多成員和巴黎、德國、維也納的設計工作室都有密切聯系）在努力尋找方法，要讓機器顯得更像機器，而不是有什么功能上的理由：電話和茶壺的現代主義形式，在大蕭條時期旨在推動鐵路乘客數量和冰箱銷售的流線型薄鋼板防護層，用《新法蘭克福》的術語制成的醒目商店招牌，還有商店內的裝修讓奧德的立方體和半圓形變成可以出售的新鮮玩意兒。[[793]](#_793_6)

1933年和1934年芝加哥“世紀進步”展覽讓多數美國人第一次清晰地看到大蕭條時代商業化的現代主義，那里的先鋒派形式與熱切的商業贊助人的結盟實在是不容忽視的。“世紀進步”展覽位于按照丹尼爾·伯納姆的設計從湖畔和鐵路開墾出來的鬧市區公園用地上，伯納姆的兩個兒子是博覽會規劃委員會的成員。1893年芝加哥博覽會上，伯納姆的鋼鐵框架建筑被辛苦地用古典風格的裝飾物覆蓋；這次則到處醒目地展示其機械元素。參觀指南上把這種風格吹噓為“現代派”，它體現在展覽大樓上，體現在在由外部的塔柱懸吊支撐的屋頂、大樓暴露無遺的內部框架、吊在中央鋼鐵標塔上的建筑，以及更大眾化功能的平頂建筑群。所有這些都在維也納移民約瑟夫·厄本指導下粉刷成各種不同顏色，在晚上用霓虹燈照亮。通用汽車公司館展示了工作中的汽車生產流水線，凡世通（Firestone）展示了完整的輪胎工廠。博覽會建筑師沒有聲稱總體印象是漂亮的，而聲稱它是新穎的——現代主義新建筑為花費少量的錢購買展覽空間的公司充當了戲劇性的廣告牌。設計委員會解釋說，任何不夠這樣大膽的做法都無法吸引博覽會所需要的愿意花錢的觀眾。[[794]](#_794_6)

在因為大蕭條而削減成本之前，博覽會的一角本來打算安排完整的樣板城市，現在只有一個十一幢未來主義房屋構成的住房展區，由建筑公司用鋼鐵、玻璃、預制石頭和梅森奈特纖維板建成。其中大部分被標榜為可以買得起的實用性房屋。它們立體主義的形狀、樸素的外觀、寬敞的窗戶完全符合梅的法蘭克福模式。許多是預制品，其中鋼鐵部分就像小孩子的積木游戲一樣可以快速接合在一起。但它們不是更廣泛的團結的組成部分。它們是美國特有的生活機器：可以完全抽離于地域和社會環境之外。[[795]](#_795_6)

如果觀念和新穎性是現代主義在商業市場上的成功所必不可少的內容，那么現代內容還需要消除掉社會民主的過去。美國那些自命的現代主義正式策展人很快就開始行動了。菲利浦·約翰遜和小亨利·拉塞爾·希契科克在1932年組織現代藝術博物館劃時代的現代建筑展覽時還不到30歲，撰寫了確定“國際風格”的目錄。對他們來說，功能主義沒有位置，同樣沒有位置的是把建筑與滿足物質和社會需要的生活經濟重新結合，當然政治也沒有位置。他們為鮑爾和芒福德的住房展示開辟了一個附屬展區。實際上在整個1930年代，現代藝術博物館一直對社會住房設計保持著在后來年月不可想象的關注度。但是在約翰遜和希契科克對“現代”的整理中，住房作為不相關的東西被拋在一邊。他們認為梅的設計者花費很多心血去滿足其需要的“典型家庭”是“統計學魔鬼”，根本不屑一顧。[[796]](#_796_6)

現代主義的這種輕率的、年輕的、審美的商品化是不尋常的成就。激進政治和激進形式的融合產生出現代建筑，這種融合現在被剝去了烏托邦追求。現代主義的社會民主和工會贊助人被從歷史記錄中抹去了，雖然如西比爾·莫霍利·納吉后來抗辯的那樣，實際上每個現代主義建筑師的名聲都建立在公共資助的住宅小區基礎上。從1920年代歐洲的社會狂熱中，他們提取了純粹的美學模式，強調開放性的容量而不是群體，強調規范而不是軸心對稱，強調沒有另加裝飾的外觀，實際上，它是“現代”幕墻商業摩天大樓的典范。在大西洋紐帶一個最引人注目的轉變中，機器時代現代主義以這種形式回到了美國老家。[[797]](#_797_6)

未來不是在約翰遜和希契科克的1932年宣言中編織而成的。對比歐洲已經出現的住房革命，現代藝術博物館目錄和臨時在芝加哥豎立起來的亭子不過是臨時性展覽。在歐洲，到了1920年代末期，很大一部分地方已經得到重建，人們有了體面的、可買得起的房屋；新的、后資產階級的社會美學因素開始發揮作用；在英國磚、德國玻璃、水泥預制板中形成了住宅區的新形式。

但是在美國背景下，從海外借來的內容從一開始就面臨被分解成碎片的威脅。社會現代主義從原來的政治和贊助人那里被連根拔起，變成了一系列的沖突和矛盾。它是后資本主義未來的外殼，是階級關系革命運用在住房問題上，是純形式的原則，也是資本主義本身的最新廣告牌。魏瑪時代后期的勞工住房政治、機器生產技術、激進美學觀念的結合以零碎的方式進入到1930年的美國。但是構成因素不能保持原樣，在借鑒和運用過程中，大西洋的跨越讓一些關系遭到扭曲和解體。

和往常一樣，速度也是問題的一部分。觀點、政治、商品在大西洋紐帶中移動的路線是完全不同的。在這種情況下，像社會現代主義這樣復雜的群體不容易維持在一起。但更根本的問題與贊助人和政治有關。正是因為需要為每個引進的政策重新創造聯盟，使得借鑒過程本身破壞了社會形式的政治穩定性，產生眾多的變體。在觀點和創新的流動性比贊助人和政治的流動性強得多的體制中，重新組裝的雜合就成為國際交流的基本結構。因此，福特主義和1920年代歐洲社會民主政治聯姻；因此，在美國也出現了革命現代主義和摩天大樓商業的聯姻。

引進者在這些唐吉訶德式轉型中掙扎，竭力為借來的形式尋找穩定的基礎，企圖使借用關系的熵最小化。如果大西洋進步人士一個接一個制造的橋梁有以政黨為基礎的聯系紐帶所補充，這些破壞穩定的傾向本來可能受到更好限制。但實際上，贊助人總是有問題的，轉型總是近在眼前。

在這些方面，1930年代將是大西洋進步紐帶的關鍵十年。在大西洋的兩岸，大蕭條動搖和重造了政治和贊助人的現行結構。它像楔子插入政治體制中，美國20世紀歷史上沒有任何別的事件做到這一點。通過這個裂口，大量被禁錮的進步工程的洪水沖進來，都是帶著大西洋聯系的：克拉倫斯·坡的農業合作社、艾爾伍德·米德規劃的農村定居點、美國勞工立法協會的社會保險計劃、鼓吹市營化的進步人士的市政設計、戰爭集體主義者的經濟控制野心、芒福德來自工業資本主義灰燼中的新技術文明意識、鮑爾勞工住房的夢想等。后兩個工程在1930年代初期仍然在形成中，證明大西洋進步人士紐帶還有未用完的資源。問題是在大蕭條重新改變了的政治結構下，選擇性的、有時候變化無常的傳輸和修改機器如何把它們整理出來。

# 第十章 新政

## 災難時期的智慧經濟

劉易斯·芒福德在1934年秋天責備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政策為“漫無目標的實驗、零散的修修補補、對指導原則和明確目標的全然冷漠”。他批評新政沒有邏輯，只是漂浮在“混亂和矛盾的靈丹妙藥”的大海上。時值羅斯福政府進入大蕭條第二年冬天，芒福德那個季節處在特別激進的情緒中，但是他這種對新政缺乏連貫性的批評是1930年代的常見反應。即使政府內部的人如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和弗朗西絲·珀金斯都承認要在羅斯福的動作中找到中心傾向得靠某種碰運氣的猜測。倫敦《經濟學家》雜志的編輯評論該政府1933年和1934年經濟復興希望的核心《國家工業復興法案》，認為它可能“在單一法案下”收集了“最多樣的經濟和社會理論，超過已知的其他任何法規”。即將離任的美國政治學協會會長沃爾特·謝潑德在1934年末期做出了自己的解釋。“新政意識形態是不合邏輯、前后不一、混亂不堪的”，他抱怨說，新政項目“是一大堆沒有消化的、矛盾的實驗。如果有領袖的話，這位領袖騎上自己的馬，同時朝不同方向飛奔”。[[798]](#_798_6)

對于后來的歷史學家來說，新政的權宜之計仍然像身上穿著很多顏色不協調的衣服，讓人很難就來源和影響達成任何一致意見。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等人后來把新政一分為二，區分開1933年和1934年的“第一個”新政與1935年到1938年的“第二個”新政。前者對大規模經濟管理、協作和計劃有信心；后者如特格韋爾抱怨的，返回到伍德羅·威爾遜時代那種原子化的、反對大企業的政策。但是這種區分經不起仔細推敲。新政無法分成清晰的階段，是個多元傾向的迷宮。最近一位研究新政經濟政策的歷史學家寫到“從意識形態上說，羅斯福和新政是無主之地”：與其說是個計劃不如說是觀念和利益自由競爭的結果。[[799]](#_799_6)

有關新政遺產的觀點很快導致類似的矛盾。新政是勞工的勝利；是資本主義的救護車。這是公眾特別關懷窮人和失業者的時刻；同時又受到仍然控制民主黨的南方白人的階級和種族偏見的影響。新政對政治和政治爭論的影響比本世紀任何國內事件都大，成為20世紀美國進步政治的決定性時刻。但是它的邏輯仍然讓我們感到困惑。[[800]](#_800_7)

新政給予歷史學家的第一個難題是，同樣的事件怎么能既具有這樣的確定性又這么缺乏連貫性呢？第二個難題是，這么不尋常的法案大爆發究竟是怎么出現的？在充滿了這么多早期社會政策設計廢墟的土地上，新政的政策能量和首創精神的奔騰仍然是個奇跡。它一夜之間扭轉了進步時代跨越大西洋政治影響的模式。甚至亨利·福特對于歐洲的吸引力也趕不上羅斯福。歐洲進步人士現在大批涌入美國，參觀田納西州諾里斯鎮的“田納西流域管理局”模式、“重新安置署”的社區項目、華盛頓特區蜂窩般繁忙的計劃活動，如果幸運的話還作為羅斯福本人的聽眾。像美國人曾經前往德國、丹麥、新西蘭社會政治實驗室一樣，如今，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威廉·貝弗里奇、H.G.威爾斯、綱納·繆達爾等人都到美國考察新政措施。

不是所有考察新政的外國觀察家都喜歡所看到的東西。看到靠龐大的藍鷹游行來提升國民對1934年“國家工業復興總署”的熱情，英國獨立工黨的芬納·布羅威大為驚駭，他以為自己就像是來到了納粹德國。但是對于多數歐洲進步人士來說，新政是十年的黑暗中意料之外的燈塔。瑪格麗特·邦德菲爾德1933年剛從大西洋彼岸回來后對她的工黨同事說，“整個美國都出現了真正的思想革命”——顛倒了邦德菲爾德的美國朋友長久以來使用的比喻。她認為，對照美國新政的潮流，英國政治思想的停滯實在是讓人尷尬。凱恩斯在新政中看到了“中間道路”，也就是美國進步人士長期以來在歐洲尋找的馬克思主義和自由放任經濟之間的“中途客棧”。在法國，萊昂·布魯姆在1936年領導的社會主義激進政府上臺，其進步實驗的用語明顯來自美國新政。在英國，勞合·喬治把工黨尋求奪回政權作為英國的“新政”。勞合·喬治在1930年代初期相信“世界的前景和整個道路取決于”正在進行的三個政治實驗：俄國的集體計劃、意大利的社團主義和美國的新政，其中“美國人的實驗最重要”。[[801]](#_801_6)

大西洋兩岸交流中角色的顛倒如此明顯，這本身就是一個事件，但在夸張的語言下面有一定的真實性。在北大西洋經濟體內沒有任何別的國家對于1930年代的大蕭條做出像美國新政這樣強烈的進步人士反應。政治學家長期以來都注意到了這一點。他們寫美國社會政策是以間歇性停滯、戲劇性“政策突破”等“不規則”模式顛簸前進的，不是通過其他國家緩慢、持續的發展而是靠間歇性的“大撞擊”完成的。這“大撞擊”就是“新政”。[[802]](#_802_6)

相反，歐洲進步人士在1930年代困難時期遇到相當大的麻煩。在英國，1929年到1931年工黨政府在大蕭條的困境中一籌莫展。后來保守派控制的政府滿足于政策傳統和最少抵抗的路線得過且過。法國在1929年到1939年間政府像走馬燈似的換了二十多個，沒有一個留下多少長遠的影響。萊昂·布魯姆的人民陣線政府執政時間長，比多數政府抱負大得多，但也不過只有將近一年時間。在很多美國進步人士多年來的希望所在的德國，納粹獲得政權后自由派和社會民主派在政治上都基本滅絕了。歐洲進步政府中，瑞典的社會民主同盟獨自在1930年代開創了革新的道路，并取得很大的成功。它的工農政治聯盟結合社會投資的進步政策是二戰后社會凱恩斯主義的先驅。雖然如此，單單在出臺法律方面，甚至瑞典也不能和美國新政的記錄相比。在1933年到1938年，北大西洋社會經濟的落后者突然旋風般采取非同尋常的行動。美國烏龜成了賽跑中的兔子。[[803]](#_803_6)

這里出現了新政提出的難題：如何調和它在對于其他進步政府都非常嚴酷的十年里表現出的能量與它的極端混亂性。沒有了思想和意識形態上的激情，新政就是無法解釋的；但是，實際上任何尋找新政背后邏輯的努力似乎都在矛盾中失去頭緒。新政的謎團在于如何理解這些驚人的成功和明顯缺乏連貫之間的結合。

通常的歷史觀點強調美國危機罕見的嚴重性。該論點認為，美國的政治革新比其他地方更有力度，是因為美國更深刻地感受到對于習慣和機構的壓力。大原因和強烈的社會壓力導致大的反應，這是注重實際的功能主義的邏輯。

毋庸置疑，1930年代市場崩潰給美國造成特別嚴重的后果。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像美國一樣在兩次世界大戰間的經濟繁榮中讓投機價值和物質生活水平漲這么高，也沒有任何地方像美國的崩潰這么驚人和持久。只有在德國大蕭條的打擊可以與之相比，而在德國，按失業率達到20%以上的年份計算，失業危機持續的時間比美國的一半稍長些。把1930年到1938年（戰爭爆發的前一年）每年全國估計的失業率加起來創造一個指數，就可得到每個國家“積累的痛苦”指數：法國93，瑞典142，英國148，德國196，美國235。[[804]](#_804_6)

經濟的這種災難性破壞確實是痛苦而難以消除的經歷。1930年代到處是等著領救濟面包和從銀行提取存款的隊伍。失業的男人到救濟處尋求幫助，婦女在吃飯和穿衣上精打細算，銀行沒有資產，工業沒有市場，農民焦急地到處流動或不得不承受小麥30美分、棉花5美分的后果。所有這些都是痛苦而難忘的，又因為落在一直被認為是無限繁榮的時代，格外讓人驚慌失措。假設的情況是，崩潰越猛烈，最終的政策反應就越激烈。

但是在跨越大西洋的事件模式中，危機嚴重性本身對于預測1930年代政治革新的指示性很弱。在德國和美國，戲劇性的政策轉變確實和戲劇性的經濟崩潰是連在一起的——兩國政策差別也很有戲劇性。但是在瑞典，與革新政策反應聯系在一起的經濟危機遠沒有德國或者美國嚴重。英國的失業情況和瑞典非常相似，但工黨幾乎已經沒有新觀點。在法國，大蕭條的影響最弱小，可人民陣線積極提出各種計劃和項目。[[805]](#_805_6)在整個北大西洋經濟中，革新反應的水平不能簡單地和經濟危機的相對嚴重程度直接對應起來。

仔細思考一下，人們也不應該期待相反的情況。系統的破壞有助于催生革新觀點這一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個神話。理查德·佩爾斯在對美國1930年代社會思想的現有最好研究中寫道：“認為深刻的社會思想能夠從大蕭條這樣破壞性的經驗中產生，這種想法本身就讓人吃驚。”“沒有哪個危機時期特別有利于冷靜的分析或新概念的產生；在努力對付前所未有的新情況時，人們更傾向于使用繼承下來的或者本能的價值。”[[806]](#_806_6)平靜是用來反思根本內容的時刻，如果海水從船頭漫上來，人的腦袋就麻木了，只會老一套地尋找往外舀水的戽斗。

危機在以其他方式推動革新。如果持續時間足夠長，危機能把原來普遍確認的反應模式變成人們強烈質疑的對象。幾乎在任何地方，大蕭條初期階段不幸在臺上的政黨，如英國的工黨、瑞典的自由黨、德國任何派別的老牌政黨在信譽方面都遭受重大損失。在美國同樣如此。新政不像人們記憶中簡單認為的那樣是對大蕭條的反應，羅斯福上臺時大蕭條已經持續三年多了。新政是對共和黨振興計劃失敗做出的反應。由于胡佛政府無法阻止經濟繼續下滑，導致人們對市場自我調整能力喪失信心；新政就進入了這種情況創造的空間。因為破壞了傳統觀念，延長的危機就可能創造出革新所需要的空間。

危機政治的矛盾在于：當傳統觀念失效，最迫切需要新思想時，新思想總是最難找到。對精心設計的方案的需求往往和最不適合對政策構成進行反思的環境結合在一起：緊迫、混亂、得過且過的機會主義、對潮水般涌來的事情根本理不出頭緒。因此，危機的最重要影響之一是推高了正在候補的政策觀念的價值，也就是那些已經提出但是在政治上還無法推行的思想。

在現代政治中，這個危機階段是社會政策專家吃香的時刻。他們的觀點突然得到更加密切的關注，他們帶著裝滿了現成方案的小包進入政治領域。這些要對付危機的方案在危機到來前已經被設計出來并加以完善，這一事實并不一定貶低它們的價值。相反，在災難時期的智慧經濟中，方案的完整性以及直接從架子上取下來使用的可能性讓它們具有特殊的價值。危機導致了在現有政策觀念主張中瘋狂翻檢的舉動——那些能夠根據具體情況調整或者重新設計的觀念，恰恰又因為它們的家譜比當下更古老而擁有權威性。正是這種現有觀念快速進入政治中心，在危機政治中扭曲了常規時間線索。在緊急情況下推行的政策觀點常常是在別的情形下形成的、用來解決其他問題的老建議。它們是從過去一下子跳到現在。

最后，讓這種緊急的思想運動產生后果的因素是：危機改變了政治可能性的條件。在貶低和去掉某些議程的合法性的時候，與它們相聯系的東西也被貶低了。控制政治后果的權力、贊助人、利益、機構等坐標發生了轉移。影響力、合法性和否決權的重新組合，是事先制訂但沒有經過嘗試的政策措施進入中心舞臺的道路。在持續的影響深遠的危機中，可能一下子涌進來大量政策觀點。

新政以超乎尋常的準確性遵循了這個模式。革新不是開始于1929年的股市大跌，甚至也不是開始于1931年夏天的那個時刻——當時人們最終清楚認識到經濟不是在經歷如1920—1922年或者1913—1915年那樣的臨時調整，而是自1890年代以來從未遭遇到的大規模的災難性崩潰。只有在胡佛的已經達到外部極限的重新投資政策沒有產生任何效果后，傳統觀念的權威才開始瓦解。然后才是大量候補方案涌入新政府的真空，這正好是政府迫切需要的東西。新政第一個月推動的《民間資源保護隊法案》是1918年到1920年士兵安置計劃的修改。在同樣的緊急階段出臺的“田納西流域管理局”（TVA），也以這種或那種形式提出過，可以說已經在國會等待將近十年了。“國家工業復興總署”是1917年和1918年戰爭時期經濟計劃機構的復活。這個名單可以繼續羅列下去。

新政的有些成就沒有多長的歷史背景。公共管理總體經濟需求的凱恩斯實驗就是最重要的一個例子。由于受到1937—1938年意料之外的經濟停滯的刺激，把財政政策放到優先地位的思想轉型到這個十年結束時才開始在新政政策辯論中留下重要標記。[[807]](#_807_6)但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新政從進步人士的過去中吸取了眾多的觀點和議程。養老金和失業保險、公共建造住房、《全國勞工關系法案》、《公平勞動標準法案》、緊急工作救濟、農村電氣化、銀行和證券管理、控股公司法案、農村改革等都有危機前的根源。在風格、緊急性、聯邦政府和州政府關系、政治聯盟等方面，該政府創立的新開端是不容忽視的。但是作為立法項目，把新政視為一個頂峰和高潮更為準確：它是一代進步政治人士的建議和思想的大集中、大匯合。[[808]](#_808_6)

這些建議中的許多最初是為了其他情形而設計的，與復興破碎的經濟的關系顯得很牽強。有些內容，比如1935年實施的征收養老保險稅，與幾乎人人都知道的眼前危機之所需發生直接沖突，因為在那個時刻對消費者開支的任何限制都是危險措施。1933年末期在美國待了凄涼的一個月的威廉·貝弗里奇回家后，相信新政中有改革的一面也有復興的一面，而且很大程度上，這兩面在目的上相互抵觸。[[809]](#_809_6)

現在說他的觀點正確已經是老生常談。在新政者為自己確立的所有任務中，最棘手的是經濟復興的任務。他們做得最好的是運用熱情和想象力拋出數年前甚至幾十年前開始運行的項目填入缺口。我們不宜在新政推行的法案中進行橫向搜索來發現它的邏輯，新政是過去被禁錮的進步人士議程的偉大的、突然的爆發；新政最清晰的邏輯是歷史的縱向邏輯。

在早就在制訂的工程的大釋放中，驚人數量的內容都在某個方面烙有大西洋進步紐帶的印記——比新政者當時愿意承認的更多，比后來的歷史學家們愿意認識到的也多得多。這不是隨意性的結論。新政的革新問題和跨越大西洋的政策借用問題在兩個重要方面聯結起來了。如果在新政的美國有比1930年代北大西洋經濟體任何別的國家更多的進步革新，那首先是因為美國的政策積壓太多。在其他地方已經逐漸被接受成為法律的措施在美國常常被束之高閣，從而造成大量待用的法案。在大蕭條的低谷時期，傳統商業企業的權威處在低谷，法院處在特別強大的壓力下，意識形態觀念處在不斷變化中，利益領域暫時被重組，最核心的一些抵抗力量暫時消失。限制和釋放：一個太多液體含意的比喻，不過這確實是政治中的常見現象。

雖然如此，大阻塞的釋放不僅意味著從前有限制，它還要求河流中已經存在大量原木。專家們已經關注地在歐洲社會政策辯論的邊緣等待了這么長時間，在新政時刻終于到來時，他們積聚了很多沒有實現的政策建議。他們的檔案抽屜里塞滿了關于德國社會保險、倫敦住房計劃、丹麥農村復興方案、澳大利亞勞工法庭、英國花園城市、世界各地解決失業問題的措施等的小冊子。對他們來說，北大西洋經濟與其說是他們常常樂觀地描述的實驗室，不如說是一個塞滿了政治上無法實現的工程的櫥柜，在那里等待著權力結構變化的希望。在1930年代中期的危機中，那些從他處借來的工程被推到政治舞臺的中心。在集中這么多進步議程的同時，新政也集中了大量的歐洲經驗。

如果大西洋兩岸交流的過去在新政中存在，那么，大西洋兩岸交流的現在當然也存在。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危機一樣，大蕭條激發了北大西洋經濟體主要成員相互間對政策動向的關注和眾多共同的反應。

公共節約措施幾乎是大蕭條一開始的普遍反應。隨著稅收的減少，政府只好削減開支，掙扎著要保持預算平衡；正統的經濟學家和政府規劃者認為這是通向經濟健康復蘇的第一步。在政府沒有足夠快地削減開支的地方，銀行債權人強行要挾——左派憤怒地稱之為資本家的“罷工”。1931年英國工黨政府和1937年法國人民陣線政府都因為私人投資者拒絕日常政府運行所依賴的流動資金貸款而垮臺。更加謹慎的政治家學會親自控制預算大斧。最后的魏瑪政府陷入緊急預算削減，胡佛和羅斯福政府的財政部長同樣如此。羅斯福本人在立法上留下的第一個印記是1933年3月的《經濟法案》，砍掉士兵補貼和政府薪水，努力把開支和因為危機而大幅度減少的收入維持在平衡狀態。[[810]](#_810_6)

政府操縱信貸和利率是經濟危機持續時的第二個普遍反應。給遭受嚴重破壞的經濟領域注入政府緊急貸款是胡佛復興項目的核心，羅斯福接受了胡佛項目的機構內核并將其擴大，用政府的貸款不僅從金融結構頂端而下資助銀行、保險公司、鐵路，而且資助自下而上的小經濟企業。英國最終把復興希望寄托在低息貸款上；在很大程度上，瑞典的凱恩斯主義者也是如此。

不管政府沿著這些路線做了多少事情，各地的主要經濟利益都吵鬧著要得到更多即刻的救濟：農民要價格支持，工人要工作和工資，企業要擺脫市場競爭。最容易滿足的就是企業利益要求保護它們免受外來競爭沖擊。有些國家在1930年代進一步提高了本來已經很高的關稅和貿易壁壘，而信奉自由貿易的國家也開始改變立場。最明顯的政策轉變發生在長期以來鼓吹自由貿易的典范——英國，在1931年秋天工黨政府下臺一年內，保守派控制的繼任者就忙著建立關稅壁壘與貿易保護主義的德國和美國相抗衡。企業免受國內市場力量拖累的愿望卻是更棘手的難題。在德國、意大利、美國（在新政的國家工業復興總署階段），政府進入公然的工業卡特爾化，劃分市場和生產配額，努力阻擋大蕭條帶給價格和利潤削減的無情壓力。甚至英國也徹底地把受害最嚴重的行業——煤炭業卡特爾化，又以更零散的方式把造船和紡織業卡特爾化。各地只能同安樂不能共患難的資本家、商人在大蕭條時期急忙尋求免受市場壓力的途徑，必要的時候他們和國家結成聯盟。

比商人反應更快的是農民，他們扔掉了市場理想，要求政府提供關稅保護、市場穩定，或者公然要求政府確定價格。壟斷控制價格和供應的農業推銷委員會是普遍的權宜之計，還有在多數關鍵農產品領域的補貼和價格保證。在英國，對價格和市場的管理局限在幾種重要的農產品上；在法國，政府維持小麥最低價格的企圖壽命很短，而且效果很差；但是在瑞典，范圍廣泛、合作管理的價格支持這一承諾對于1933年農民—社會主義者同盟非常重要；在納粹德國，國家實際上全面控制農業價格和市場份額分配。在這個意義上，新政《農業調整法案》的價格和生產控制不過是洪大國際潮流上漂浮的小碎片而已。

因為經濟崩潰，勞工被迫處于防御的被動地位。危機初期，由于工作機會消失、工會成員數量下降和罷工活動低迷，長期以來抗拒政府對集體談判條款裁定的工會聯盟現在改變方針，要求國家從中協調促成勞工、政府和渴望穩定的雇主之間達成新協議。1935年的《全國勞工關系法案》、1936年人民陣線上臺開頭幾個星期炮制出來的法國《馬蒂尼翁協議》（Matignon Agreement）、1938年瑞典的“基本協議”，雖然在不同程度上結合了強迫和自愿的因素，但都是同樣的動態之下的產物。[[811]](#_811_6)

對工人來說更重要的是恢復工作和工資問題。在計劃者中間，從前的勞工殖民地的想法還沒有喪失吸引力。德國政府資助的在城市邊緣半自給自足的工人臨時棚屋區（Randsiedlungen）、新政的“民間資源保護隊”營地和自耕自給小農場工程、法國和英國為城市工人提供補貼鼓勵他們重新定居鄉村（或者最好住到帝國的邊緣地帶去）等等，都來自于消化掉工資經濟中多余工人的強烈渴望。靠工資為生的人自己則更喜歡口袋里有現金。英國工會頑強地游說延長緊急失業保險賠償。在法國，觸發性事件是每周工作40小時的工作分攤要求，促使1936年5月和6月罷工的大爆發。在德國、瑞典和美國，政府通過公共工程買斷工人工作的要求，大量投資勞動密集型的緊急建設工程如道路、公共建筑、住房等，有時候避免使用節省勞動力的機器，以便讓工作更持久一點。

政府把這些成份混合后產生的結果，就像它們從前的經驗、它們內部的利益結構和政治力量對比一樣變化多樣。美國特別傾向于嚴重依賴緊急工作救濟，將艱難時期城市救濟窮人的熟悉反應國營化。[[812]](#_812_6)在英國，從前存在的政策的拉力正好是朝著相反的方向，拒絕重復1905年到1907年的工作救濟實驗，讓政策制訂者轉向對1911年失業保險法案多次緊急修改，以頑強地努力要涵蓋從前設計時沒有包括在內的普遍的經濟危機。在瑞典，社會民主黨的政策制訂集中在按通行的工資安排公共工程就業。因為勞工成分較弱，新政聯盟傾向于緊急情況下的復活和救濟等權宜之計。德國那伴隨大量公共工程投資的社會政策有它自己的爆發力。不管怎樣，區別在于政策成分的組合不同，整個家族相似性在不同國家基本上是一樣的。

在這些共同反應背后是長期存在的跨越國界的思想和觀點交流紐帶。北大西洋經濟體的財政保守派都堅持節約、預算平衡和貨幣的穩定性。在英國被稱為“財政觀點”的這種主張之所以影響大，恰恰是因為它結合了跨越十多個國家邊界的經濟學家的集體智慧：經濟危機有天生的、最終自我糾正的緊縮性過程，直到工資和價格回落到足夠低的水平以便刺激重新投資。勞工組織也有共同的項目，在國際間流傳。減少勞工冗余和刺激消費者需求是它的核心：縮短工作時間、提高工資、擴展養老金以鼓勵上年紀工人從勞動力市場退出、延長義務教育時間以防止更多年輕人進入勞動力市場、開展公共工程來重新雇傭失業者、為仍然沒有工作的人提供失業補貼。進步人士則談論通過“計劃”引導和轉移市場力量。法國和比利時的改革派社會主義者對計劃經濟論（planisme）的興趣與貝弗里奇這樣的自由主義者一樣強烈；在美國，運用國家的計劃力量達成比單純市場競爭所能達到的更穩定的利益和諧，這一觀點位于羅斯福的內部顧問圈子（所謂“智囊團”）1932年和1933年討論的中心。[[813]](#_813_6)像這樣的政策“語言”在北大西洋經濟體中流傳，讓零碎的要求和緊急措施組成更大的模式。

同樣，一個國家往往非常關注其他國家的成功和失敗。許多關于經濟計劃的討論是因為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實驗所引起。即使在那些對意大利法西斯主義的殘暴方面感到厭惡的人中間，社團主義的名聲在1930年代初期仍然處于高潮時期。1934年在歐洲快速考察農業政策的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認為意大利是唯一沒有隨波逐流的政府。他在日記中承認“它是我看到過的最干凈、最整潔、管理效率最高的社會機器，它讓我感到妒忌”。[[814]](#_814_6)其他人則看到蘇聯不受周圍經濟崩潰的影響。在1932年和1933年經濟和政治危機的底谷時期，甚至保羅·凱洛格的《調查》也不斷給關心社會工作和社會改革的讀者提供蘇聯新聞。凱洛格本人加入到1936年赴蘇聯的考察隊伍中，這是大西洋兩岸不少進步人士都走過的道路。正如我們看到的，恩斯特·梅放棄了大蕭條中的法蘭克福要到蘇聯城市設計中一試身手。韋伯夫婦扔掉了對美國的最后一點興趣，熱烈關注蘇聯實驗。[[815]](#_815_6)

盡管進步人士對蘇聯的興趣增加了，大西洋傳統紐帶仍然強大。英國雖然遭遇很多經濟困難，仍然給美國政策辯論投下非同小可的影子。隨著大蕭條重新開啟針對失業風險的保險話題，大群的美國調查者再次來到英國，從實際經驗中收集數據和觀點。1933年秋天，洛克菲勒基金會邀請威廉·貝弗里奇到美國向聽眾解釋失業保險的教訓，私下里還給羅斯福本人解釋。在重新塑造住房政策辯論的努力中，總部在美國的“全國住房官員協會”組織了歐洲住房專家的自由旅行團，由英國戰爭住房和花園城市運動德高望重的雷蒙德·昂溫率領。在農業部，亨利·華萊士讓愛爾蘭農業復興運動的詩人哲學家AE（喬治·羅素）給農業部雇員聽眾做報告。[[816]](#_816_6)

大蕭條中的德國更加讓人費解和煩惱。1933年夏天在德國研究工業健康和安全方法的愛麗絲·漢密爾頓提出了一系列關于希特勒德國的早期風暴警告，如迫害猶太人、破壞勞工協會、終結進步婦女運動等。她擔心多數參觀者很少意識到表面下掩蓋著的恐懼和危險。[[817]](#_817_6)甚至在1938年，奧伯蘭德基金會還繼續輸送社會政策專家通過熟悉的德國社會進步站點參觀訪問。1934年，它派遣一個由美國城市高級官員組成的代表團來考察德國城市管理；1935年派遣一個代表團調查德國街道清潔技術；1936年派遣一個公共林業官員代表團，其中包括美國林業部部長本人。[[818]](#_818_6)

進步人士對斯堪的納維亞的興趣在1930年代中期蓬勃發展。仍然兜售丹麥合作社的社會政治經驗的弗里德里克·豪威設法搞了個委任狀在1935年再次訪問丹麥。約瑟芬·戈德馬克挖掘熟悉的丹麥社會政治故事為1936年的另外一本書做素材。農業安全署署長威爾·亞歷山大在1938年親自前往考察。對于美國內外的進步人士有更大吸引力的國家是瑞典。西奧多·蔡爾德對于合作社運動的充滿羨慕的報告《瑞典：中間道路》在1936年吸引了眾多美國讀者。因為感覺到是選舉年的政治議題，羅斯福派遣一個高級代表團到歐洲考察消費者、信用、住房合作社等，瑞典作為第一站。兩年后，他派遣了類似代表團到瑞典和英國研究工業關系，通用電器公司的老總杰拉爾德·斯沃普是其中一員。[[819]](#_819_6)

不過，盡管有這些接觸，時間和情形的變化已經削弱了大西洋紐帶從前的一些力量。新政中的核心人物中很少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驚訝地發現歐洲社會進步觀點的那批人中的成員。弗里德里克·豪威在1933年時已經66歲，新政者給他找了一個位置，作為國家工業復興總署消費者顧問委員會成員，擔任亨利·華萊士農業部的消費者顧問。被農業部其他社會激進人士“趕出去”后，他又擔任菲律賓總統關于合作社和農業租賃的特別顧問，但是年紀已經太大了無法產生多大影響。五十多歲的一代人發揮了更多核心決策者的作用。社會保險專家中的伊薩克·魯賓諾、《調查》的保羅·凱洛格和美國勞工立法協會的約翰·安德魯斯，從新政的核心圈外，仍然在施加更早時期世界性進步政治的色彩。在政府內部，羅斯福的勞工部長弗朗西絲·珀金斯做了同樣的事。珀金斯起先是受弗洛倫斯·凱利影響的紐約消費者聯盟的調查員，她把戰前世界性的社會女權主義維持到1930年代后期。當美國政府以長期延遲的國際主義象征姿態正式加入國際勞工組織，其中絕大部分的功勞應該屬于珀金斯。[[820]](#_820_6)

珀金斯的勞工部雖然在勞工紐帶方面較弱，但是其內部有很多與睦鄰中心和消費者聯盟聯系廣泛的人物，所以實際上它是世界性社會進步人士滲透特別積極的場所。紐約參議員羅伯特·瓦格納的辦公室是吸引社會進步人士的另外一個磁鐵。他們中許多人像瓦格納本人一樣有廣泛的海外關系。亨利·華萊士的農業部核心人士曾深受AE（喬治·羅素）、克拉倫斯·坡或戴維·魯賓的影響。正如我們看到的，聯邦住房機構中擠滿了心中想著歐洲經驗的人。[[821]](#_821_6)

但是另一方面，新政政策起草者的許多人很少知道樂觀主義時代的歐洲。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在1920年代后期在法國休假一年研究農業政策，但是并沒有發現能激發他興趣的地方。比特格韋爾更年輕的一批人剛剛從大學或者法學院畢業來到華盛頓，只有最少的意識形態觀念，太過年輕和沒有條件培養有意義的跨越大西洋紐帶。瓦格納參議員的助手利昂·凱澤林是起草1937年《全國勞工關系法案》和《美國住房法案》的關鍵人物，在1933年時只有25歲。《社會保險法案》的主要起草者之一托馬斯·艾略特只有26歲。從根源上說，新政者比戰前進步人士更加具有世界眼光。這些人中有更多猶太人和天主教徒，更多是第二代移民，他們的大家庭中有很多親屬在歐洲大陸。但是他們自己在工作中很少帶入世界經驗。[[822]](#_822_6)

讓這種與歐洲社會政治比較疏遠的關系變得更復雜的是富蘭克林·羅斯福本人對歐洲的態度，像他的很多其他態度一樣變幻無常。他認為沒有什么比旅行更能幫助疲憊的身體和心靈康復。當哈里·霍普金斯在救濟署辛苦工作累趴下后，羅斯福派他到歐洲療養，同時委托他了解社會保險和住房建設方面的資料，但是他回來后，羅斯福只問墨索里尼性格的問題。當羅斯福最終面臨必須解除休·約翰遜國家工業復興總署署長職務時，他建議約翰遜到歐洲考察旅行。[[823]](#_823_6)當消費者合作社的思想遭遇政治風暴后，他放棄了對合作社的調查，掩埋了關于瑞典和英國工業關系的調查報告。

新政者在思想上兼收并蓄，所以不至于相信赫伯特·胡佛關于大蕭條根本上是外部事件的觀點。胡佛認為獨特的“美國體制”暫時無辜地陷入歐洲戰爭“邪惡的”經濟和政治后果的旋渦，他們則不這么看。[[824]](#_824_6)新政者愿意從能夠發現的任何地方吸取主張和政策教訓。他們對資本主義有充分了解，能認識到其他地方的共同輪廓，尊重共同的修補和改革措施。但是在眾多事件超乎尋常的壓力下，沒有足夠的時間在1930年代建立跨越國家的強大交流紐帶，即使歐洲的反蕭條政策實驗有效到足以激發新政者這么做。

因為所有這些原因——缺乏明顯的外國成功經驗、參與者的年齡和經驗限制、危機時刻的迫切需要等，大西洋進步紐帶在1930年代的美國發揮的作用和從前不同。空間上的紐帶仍然很重要：旅行、考察、發現事實的任務等都和從前一樣繼續，但是時間上的縱向紐帶更加重要。在新政時期找到政治機會的大西洋紐帶產品中，大部分來歷都比1930年代更早。這些多年前就跨越大西洋來到美國了，儲藏在進步游說機構和專家報告中，在災難時期的思想經濟中具有特權地位。

難怪當有人問羅斯福本人新政措施的歐洲相似做法時，他的思想回到1909—1911年勞合·喬治的立法突破。當有人批評新政立法的狂熱速度，羅斯福反駁說：“勞合·喬治二十多年前在兩年時間里通過的激進改革措施，比新政試圖在五年里通過的更多。”羅斯福給他的項目拉來“自由”標簽而不是用“進步”這個更早的術語，也是標志它與戰前社會政治革新時刻的英國自由政治的契合。[[825]](#_825_6)

羅斯福的崇拜者常常指出同樣的相似性。在聽了羅斯福1934年初對社會進步人士代表團簡要敘述社會保險前景后，保羅·凱洛格寫道：“我們離開的時候感到歷史可能重演，正如勞合·喬治二十多年前在英國推行社會保險一樣，羅斯福……可能在下一屆國會里通過全面的計劃，或許在一年內做到本來可能要花費一代人時間才能完成的事情。”英國觀察家也經常指出這樣的聯系，尤其是國家工業復興總署的失敗讓新政轉入他們更熟悉的軌道后。哈羅德·拉斯基早在1934年就得出結論說，羅斯福“用突然的激情企圖要做類似于英國自由黨政府在1906年后做的事情，就好像一夜之間發生的一樣”。[[826]](#_826_6)

對于英國觀察家來說，在這樣的聲明中自利的因素是很強烈的。社會保險議題讓羅斯福—勞合·喬治的相似點太鮮明，影響了太多的判斷。關鍵的一點是：從國際角度思考時，美國和歐洲進步人士在時間上向后看，把1930年代的美國和更早時期的歐洲聯系起來。他們本能地返回到歷史落后的言論中。當珀金斯在1933年初期被任命為勞工部長，她寫出了雄心勃勃的新政議題。她回顧說曾告訴羅斯福：“其中沒有一個是激進的，它們都在某些州或者國家嘗試過。”作為新政的概括性總結，珀金斯的說法不完全準確，但也不全是錯誤的。[[827]](#_827_6)

“歐洲”因素是通過許許多多不同的渠道和過程進入新政議程的。其中有些是1917年和1918年戰爭集體主義的復興，是威爾遜政府對歐洲交戰國那種密切關注的后代。實際上，從新政的危機管理者本能地尋找幫助國家度過戰爭時期的管理工具這一點，能夠最清楚地看到過去是怎么一下子就跳入現在的。胡佛反蕭條項目的核心機構“重建金融公司”就是戰爭金融公司的直接后代，被新政者利用和擴大。1933年和1934年新政工業政策的展品“國家工業復興總署”（NRA）也是戰時措施的復興，像重建金融公司一樣不乏以前戰爭經濟的管理者，以及明顯從戰爭動員活動中學來的宣傳技術。新情況讓國家工業復興總署和前身戰爭工業委員會不同。勞工組織在1933年初期處于低潮，在國家工業復興總署的董事會中連一個象征性的席位都沒有。由于勞工的軟弱，而且國家工業復興總署除了經濟復興本身也沒有明確的公共目標，該機構比戰爭工業委員會更徹底地被商人成員們收買利用。到了1935年該機構被宣布為違反憲法的時候，它實際上成為行業協會控制物價和生產的卡特爾。但是即使從勞合·喬治的軍需部到羅斯福的國家工業復興總署的道路存在預料之外的轉折和倉促的修改，但兩者之間的密切關系是毫無疑問的。[[828]](#_828_6)

其他跨越大西洋的舶來品通過大學專家和社會政治壓力團體注入到新政中。1933年的《全國就業體系法案》是對1909年英國勞工交流市場體系的明顯修改，那是從貝弗里奇1909年的《失業》出版后大西洋兩岸專家進步人士采取的防止失業項目的主要內容。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社會保險法案》中的養老金和失業保險部分的起草者對歐洲先例都非常熟悉。

在有些情形下，從歐洲借鑒的事先試驗過的東西充當了催化劑的角色。它本身雖然得不到實施，但卻讓人們急忙創立搶先替代它的方案。聯邦最低工資法案的形成是說明問題的例子，這是珀金斯的主要工程。珀金斯在1933年最初提出的建議是與1909年英國《行業委員會法》（Trade Boards Act）很接近的修改版。自從弗洛倫斯·凱利在前一年日內瓦國際消費者聯盟大會上發現該方案以來，這就是美國社會女性主義者的核心措施。個案處理的行政裁斷是其典型特征。在一個個勞動強度大和工資低的“血汗行業”，對雇主利潤、雇工生活水平仔細調查后，由特別任命的行業委員會按相當于公共管理裁判的方式確定工人的最低工資。這個主意在1937年政府提交給國會的最低工資法案中占據關鍵位置。但是因為遭到雇主（沒有興趣對外公開自己的會計賬本）、南方經濟利益團體（唯恐失去他們低工資的區域優勢）和美國勞工聯合會（仍然對罷工和討價還價等“男子漢氣概更足的”方式充滿信心）的反對而失敗了。[[829]](#_829_6)打破僵局的辦法是由進步的工會組織協調的，把美國最低工資法案引向一個和珀金斯想象的情況完全不同的道路。1938年的《公平勞工標準法案》中進入法律書的最低工資部分，是一刀切的40小時最多周工作時間和40美分最低小時工資，用于多數工業行業。剝奪了原來方案在調查上的靈活性，重新作為直接的工資和工作時間要求提出來。這個結果是借用歐洲方案催化而成的獨特的、本質上屬于法律范疇的美國措施。

類似的過程發生在勞工關系上。早期新政的許多勞工關系建議，是渴望雇主和工會共同組成的勞工政策和糾紛協調聯合委員會來為工資協商提供更深刻的公共因素。這類的建議來自記憶中1917年和1918年的戰爭期間勞工和平，以及1919年的重建狂熱；這些建議受到外國先例的啟發，從1907年和1919年加拿大、英國的工業糾紛法案到魏瑪共和國時期的經濟委員會。1933年由勞工、資方和公共代表三方組成的全國勞工委員會就是按這個模式創立的。參議員羅伯特·瓦格納1934年的勞工關系法案初稿也是遵循這個基本結構。但是在狂熱的極端化熱情成為美國勞工關系特征的熔爐中，雇主堅決反對獨立的工會組織，工人同樣堅決要求利用他們認為在《全國工業復興法案》中得到法律保護的組織權利，1933年和1934年的勞工關系結構根本就行不通。在這個僵局中，瓦格納（拉著國會和不情愿的羅斯福）把社團主義模式換成了法律司法體系，包括明確的公平勞動行為原則和專家管理的規范，此后它一直是美國勞工關系的特征。[[830]](#_830_6)

在新政的其他角落，借鑒和創新的成分以不同形式結合在一起。新政者對于電力政策的熱衷可以追溯到19世紀后期伯明翰、格拉斯哥、倫敦的城市“社會主義者”，以及在此之前擔心天然壟斷的叛逆經濟學家。新政在電力方面的政策包括反對公用事業控股公司、使用田納西流域工程公共生產的廉價電力作為敲打私人電力公司壟斷價格的棍棒、建造公共的農村電力系統等。重新安置署是許多帶有跨越大西洋紐帶特征的措施的炮制所。郊區示范工程的淵源關系可以追溯到萊奇沃思和英國的花園城市運動，自耕自給小農場與艾爾伍德·米德的澳大利亞辦法有關，合作社和租賃購買計劃與愛爾蘭和丹麥紐帶有關。城市規劃觀點是從各處收集來的。公共住房機構的工作都可以找到歐洲紐帶的痕跡。

在更廣泛的政治層面上，戰爭和重建激發的體力和腦力勞動的政治聯盟前景在1924年因為羅伯特·拉福萊特的失敗而破滅，但是在1936年又重新插上了翅膀，因為羅斯福想把民主黨從它19世紀依靠的南方白人和天主教北方都市推廣到更接近歐洲社會民主黨的支持基礎。至于說新政的政治語言，其核心成分可以追溯到更遠，如1870年代和1880年代德國演講大廳中在積極的國家與市場的盲目力量之間，在社會良心與（正如亨利·華萊士所說的）“整個自由放任原則，曼徹斯特學派”之間出現的激烈論戰。[[831]](#_831_6)

所有這些從大西洋彼岸進口的東西都結合了受外來思想和模式影響少得多的本土措施：農業生產控制、銀行證券政策、緊急工作救濟、購買白銀、貨幣修補。1938年到1940年的取締壟斷行動是自成一格的。因為明顯的原因，羅斯福要把最高法院拉到總統更多控制之下也是如此，這個命運不濟的嘗試在1937年消耗掉了他太多的政治資本。但是，在這個列表上即使針對個別因素修修補補，帶有大西洋進步紐帶特征的措施的主導地位仍然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不管歐洲措施充當有效的法案范例，還是作為需要根據美國具體情形重新制訂的籠統形式，還是作為催化劑來促使人們搶先用其他法案取而代之，它們的積累性影響是深刻的。

當然，借鑒修改的措施和土生土長的措施這兩極對立是虛假的、編造的。沒有一個政策措施只有一個根源、一個可以貼上外國或者國產標簽的清晰明確的源頭。問題是更簡單的一點：在美國邊界上截斷新政的故事將是讓十多個普洛克路斯忒斯[[832]](#_832_6)都忙不過來的艱巨任務。新政者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兩代人已經把社會政策辯論和社會政策制訂推廣到遠遠超越國界的地方。那些來源幫助往進步人士的想象力中貯存了各種議程，遠遠超過任何一個單獨的政體所能創造出來的規模。把美國密封在自己的邊界內與外部世界隔離開來，新政是無法理解的。

首先來的是危機：打亂了公認的原則，權力和權威的遞升結構受到削弱和破壞，現行政策路線被認為沒有效果，乃至商人所謂的永久自動繁榮的“新時代”在許多美國人聽來純粹是胡說八道。那種認為美國人聰明絕頂、得到上帝保佑免受舊世界災難的觀念暫時受到了挫折；在這信任危機時，社會政策專家帶著他們的藍圖、現成的設計方案、等待已久的議程來填補這個真空了。即使他們也并不總能意識到自己的議程多么深刻地受到整個北大西洋經濟體信息和設計的國際交流影響，以及受到多年觀察海外社會政策制訂經驗的影響。但不管意識到沒有，他們把大量沒有實現的遺產推向了政治中心。

甚至落后論的說法也保存下來。羅斯福自己說“我認為我們在五年時間內趕上了二十年”，他心中想的是1938年英國的社會政策。“如果自由派政府繼續執政十年，我們在19世紀40年代末期就能和時代同步了。”[[833]](#_833_6)極端的對比和設想、漫游各處的尋找、社會學大旅行，所有這些都在1930年代匯集在一起。新政時期大西洋進步紐帶達到頂峰。

在所有新政措施中，最能清楚顯示大西洋進步紐帶的政治處于最高峰和關鍵時刻的是社會保障。半個多世紀后，1935年的《社會保障法案》可以說是新政中最長久的政治成就之一。羅斯福經濟項目的基石——國家工業復興總署在他第一任期還沒有完就消失了。1930年代的聯邦政府緊急公共工程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而結束。新政住房和農場支持措施在戰后歲月中擴展，最后淹沒在批評家的聲浪中。但是《社會保障法案》長期存在了下來。勞工對它冷漠以對，共和黨批評家把它作為反對新政的核心理由加以撻伐；但“社會保障”幸存下來，經受了1930年代后期反羅斯福的力量的沖擊，經受了1952年共和黨重新掌權，甚至1980年代社會政治的反革命變化。法案剛剛通過時遭遇的“非美國化”指控已經悄無聲息被人遺忘了。《社會保障法案》后來的成功使得人們難以想象1930年代剛開始實施時情形有多懸，也很難認識到除了大蕭條時代的美國人以外，其他事件在促使它成功的過程中發揮了多么關鍵的作用。[[834]](#_834_6)

任何想要把《社會保障法案》說成是對1930年代經濟崩潰的直接反應的企圖，都面臨陡峭的、難以攀登的道路。社會保險來到大蕭條時期的美國是在經過了二十年進口努力的失敗之后。其早期支持者中很多已經疲憊不堪、沮喪不已。首批養老保險的給付直到1942年才開始，并沒有許諾立即解救大蕭條的痛苦。在工人沒有多余錢財的時候吸收保險費，它的凈經濟影響是阻礙而不是鼓勵經濟復興。它在大蕭條時期歐洲的效果記錄也是參差不齊的。總之，除了大西洋紐帶和危機的政治和思想動態外，1930年代美國的社會保險在各方面都處于不利境地。

《社會保障法案》涵蓋的失業和老年貧困風險當然因為大蕭條而大大加劇了，這是不需要強調的。市場經濟的日常痛苦在金融崩潰時被擴大了許多倍。在1930年代到處都是失業者，路易斯·阿達米克1930年從馬薩諸塞州洛厄爾報道說：“衣衫襤褸的男人靠在墻上或者電線桿上，單個人或者三三兩兩站在街頭。”“可憐的、沉默的中年男人穿著破爛的大衣，甚至沒有大衣，腳上穿的是破爛鞋子（小鎮上生產的鞋子！）。”上年紀的窮人更加遠離公眾的視野；很少家庭沒有親身經歷這樣的風險：逐漸進入更低級和收入更微薄的工作，直到雇主徹底不讓他們工作，要靠孩子和孫子養活。如果家庭經驗還不夠，還可以看看由加利福尼亞醫生弗朗西斯·湯森德帶頭大力鼓吹普遍養老保險，打出有關老年貧困的大標題。共產黨通過它的失業者委員會努力為失業者做同樣的事。老年人和失業者不是大蕭條的唯一受害者，但確實屬于最重要和最貧困的。[[835]](#_835_6)

但如果這是明確無誤的，那大蕭條最嚴重的時候老人和失業者最需要的東西就是保險體系嗎？這一點絕不是沒有爭議的。正如我們前文所說，即使在北大西洋的歐洲一邊，社會保險體系也只是用來幫人們緩和勞動市場風險的一系列復雜社會政治措施的一部分。政策制訂者可以選擇的體系有：1880年代德國實行的交納費用的強制性社會保險；按照丹麥和英國養老金體系模式分類給予老人救濟；在1920年代仍然流行在法國、比利時和斯堪的納維亞的國家資助的自愿性互助協會；世界各地模范雇主實行的雇主管理的雇員補貼；最后還有，自從韋伯攻擊勞合·喬治1911年的《全國保險法案》以來社會民主派一直追尋的方針——為全體國民提供的、由稅收資助的最低限度健康和收入補貼。新西蘭工黨1938年按此方針起草社會保險法案時提供了醫療和母嬰照顧、失業救濟、老年救濟等，它的全面性與1935年美國充滿了例外的、管理復雜的法案形成鮮明對比，里面根本就沒有必須交納保險費的問題。[[836]](#_836_6)美國《社會保障法案》的奧秘不是為什么新政時期的國會要考慮失業者和老人的經濟困境，而是為什么會通過保險的方式來達到這個目的。

當然，在促成社會保險的諸多因素中，最強大的是社會保險在1920年代歐洲的快速蔓延。有時候為了回應大眾的要求，更多是協調和緩解公眾壓力，社會保險體系在戰后擴大。健康、養老、事故保險體系延伸到更廣泛的工人階層，甚至還包括工人的家屬和遺屬。雖然國家管理的失業保險體系比其他形式的保險更少見，但是這種保險也在1911年英國實驗后有顯著發展。在英國，為急于滿足復員軍人的要求，失業保險涵蓋的范圍從1911年規定的七類循環性行業擴展到1920年的所有工業領域，涵蓋的工人數量是從前的五倍。在本世紀頭十年就開始討論失業保險的德國，魏瑪共和國在1927年通過了全面的失業法案，兌現了早期的承諾。[[837]](#_837_6)

給人印象更深刻的是，把社會保險體系嫁接到更古老的、不同格局的社會政策上。1925年在英國，保守派政府不是屈服于工人提出的擴展1908年養老金法案范圍的要求，而是為60歲到75歲還要工作的人添加了一個需交納保險費的養老保險。在法國，1910年強制性養老保險的早期實驗遭到大眾反對而泡湯后，議會在1928年通過了全面的工薪族健康和養老保險法案，把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在阿爾薩斯和洛林實施的保險國有化。[[838]](#_838_6)

但是，如果因為社會保險在1929年比在1914年的時候更廣泛，就假定它已經讓其他方式相形見絀，那就錯了。比利時仍然延續其補貼自愿性健康保險互助組織的政策，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瑞典延續到1950年，丹麥延續到1960年代。在加拿大、澳大利亞和英國，全部依靠稅收的養老金仍然是老年社會政策的關鍵，而不是交費的保險。即使在1927年德國通過失業保險法案后，國家資助的工會失業救濟仍然是歐洲的主要模式。[[839]](#_839_6)

雖然社會保險體系1920年代在歐洲迅速發展，但是在美國，社會保險在1920年代沒有什么進展，以至于很多朋友開始退而支持政治上可能性更大的其他措施。美國勞工立法協會因為受到健康保險失敗的打擊，在1920年代初期蹲守在傳統的核心議題上：工人賠償標準的提高、煤礦和工廠安全立法、職業病的預防。

1923年美國勞工立法協會嘗試回到引起更大爭議的領域，復興為上年紀的窮人爭取國家補貼的運動。這個養老金聯盟由進步工會協會、兄弟會、受過大學教育的社會政策專家所組成，比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任何對應組織更接近于當時西歐熟悉的進步人士和勞工的聯盟。主要推動者是賓夕法尼亞州勞工聯合會主席詹姆斯·莫勒，他是“進步政治行動協會”的關鍵人物、勞工社會主義者，對于工人教育和勞工政治有廣泛的興趣。該養老金聯盟的管理機構由年輕的、俄國出生的經濟學家亞伯拉罕·艾普斯坦來負責，此人曾擔任莫勒的州養老金委員會研究中心主任，后來又轉向指導“雄鷹兄弟會”的養老金游說努力。

他的朋友回憶說，艾普斯坦是個口音非常濃重的人，和約翰·安德魯斯或者約翰·康芒斯不一樣，是個很特別的人。但是他成為政策專家的道路很常見：讀經濟學研究生，搞過一陣社會政策研究，建立與歐洲人的聯系網。在很早的時候他就和倫敦、維也納以及位于日內瓦和蒙特利爾的國際勞工組織的著名社會保險專家有書信往來。他自己安排到俄國和西歐為期一年的海外考察，研究他們的社會福利供應，把研究成果傾注在140頁的報告中，這是對世界上所有公共養老資助和保險項目的總結，是他1928年出版的《老年的挑戰》一書的高潮。但是艾普斯坦的勞工盟友和兄弟會雇主對于強制性養老保險中隱含的扣繳工資不感興趣。為了適應贊助者和時代的要求，艾普斯坦和美國勞工立法協會專家采取了簡單的、英國式的、要檢驗收入情況的老年救濟。[[840]](#_840_6)

當失業問題在1920年代末期再次成為美國勞工立法協會的議程時，協會從社會保險原則的策略性撤退就更加明顯了。在威斯康星，安德魯斯的老師約翰·康芒斯已經不再相信暫時性失業是保險可以解決的命運風險。對于約翰·康芒斯和他學生來說，失業政策的核心任務是把頻繁裁減員工的社會成本讓有關企業承擔。工人的賠償是他們的模式：對把雇員推向社會的企業征收補償費。康芒斯的建議是天才的創意，根據不同的角度，可以說它激進也可以說它反動。但是該建議通過提高大起大落雇傭方式的成本，旨在讓結構變化朝向更穩定的雇員隊伍。與此同時，為了保護企業免受無限制的懲罰，威斯康星方案為企業的失業賠償義務規定了上限。在經濟繁榮的時候，要求企業給“儲蓄”中心提供補償裁員工人的費用，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把基金用完為止。康芒斯建議的目標是規范就業而不是保險，它的核心是在雇主的激勵和錢袋而不是工人得到保證的最低水平。[[841]](#_841_6)

1920年代初期，在就業“儲蓄”基金的概念還比較新穎時，康芒斯曾為這個項目辯護，認為它是歐洲經驗的直接產物。但是十年后，隨著“新時代”語言風向的變動，他和合作者吹噓這個建議是“個人主義和資本主義特點格外鮮明的項目”——是與歐洲失業保險“大相徑庭”的。當美國勞工立法協會在1930—1931年之交的冬天開始支持康芒斯議案的全國性活動時，口徑也如出一轍。安德魯斯的組織完全背叛自己從前的國際主義歷史，現在鼓吹該計劃的“獨特美國天才”，沒有借用任何國家的經驗，完全是自己的獨創。[[842]](#_842_4)

專家對于社會保險的原則猶豫不決，或者像康芒斯一樣徹底逃走；雇主則持抵制態度。少數體驗過以公司為基礎的團體社會保險福利的雇主加入了美國勞工立法協會，在這里他們使得主要委員會不再那么以大學為主，同時比過去顯得更保守些。但對于多數雇主來說，對國家卷入保險領域保持高度警惕是更簡單、更常見的理由。全國公民聯盟和全國工業會議理事會在1930年代初期都積極反對國家社會保險倡議。同樣反對的還有大保險公司，即使在失業保險這種從商業角度來說他們也承認是無利可圖的領域。

所有這些因素：雇主和保險公司對國家企圖染指他們獨占的領域的抵制、勞工立法專家從原有立場退縮到更安全、更有美國特色的方式、大眾缺乏對需要繳費的社會保險的支持，有效阻止了美國政策像海外那樣轉向更加體系化的社會保險。在1930年美國勞工立法協會上異常沉悶的發言中，I.M.魯賓諾哀嘆需要自下而上地解釋社會保險原則，而十五年前根本不用解釋人們就能明白。他抱怨說，進步人士現在談論“工人的補償、母親的補貼、疾病補貼、醫療組織、老年安全、工資儲蓄基金，無所不包”。現在沒有人談論社會保險了。1910年代的全面社會保險體系已拆分成十多個議題，在概念和管理上相互沒有任何瓜葛。[[843]](#_843_4)

如果魯賓諾夸大了戰前社會保險運動的分解，大蕭條本身不大能恢復大眾對社會保險的好感。相反，在社會保險體系最完整的德國和英國，經濟危機像潮水一般席卷全國。在英國，對失業保險體系造成的沉重負擔在戰后不久就出現了。1920年到1921年的經濟萎縮相對短暫，但是它的后果也很嚴重，已經消耗掉1920年法案建立的失業基金，因為這時還沒來得及積蓄足夠的資金呢。在必須兌現承諾的好處的強大壓力下，英國政策制訂者逐漸退回到以稅收資助的簡單失業救濟。后來被稱為“失業救濟金”（dole），它保持了保險體系的修辭外觀，但里面拼湊了很多緊急補充條款和延伸條款，實際上根本不是保險。到了1931年，該體系的賬目顯示拖欠款項高達1.15億英鎊。[[844]](#_844_4)

簡而言之，英國失業保險是保守派的噩夢的體現：脫離了最初經濟實力限制的政治化津貼體系，對1920年代以來每年都保持衰退期高失業率的經濟來說只是一塊創可貼。另一方面，對于有組織的勞工，失業救濟是他們決不妥協的要求。倫敦銀行家1931年在政府不全面大幅度削減開支尤其是失業救濟金開支的情況下拒絕發行新的政府公債，結果造成了危機，上臺兩年的工黨政府找茬、妥協，最后解體。隨后上臺的保守黨政府在1934年把失業保險重新放回更加謹慎和穩定的基礎上。到了1930年代中期，很少英國政策制訂者仍然想象單單社會保險就可以解決市場價值的全面的、周期性危機。

在德國，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失業保險體系崩潰得比英國還迅速，政治后果也更加嚴重。從1927年失業保險體系第一個冬天的600萬領取者到1930年一下子增至三倍，1800萬人。英國是決定維持支付補貼，讓保險基金破產；而最后時期的魏瑪政府竭盡全力削減失業補貼，盡管他們對于工人的合同義務還在，而且工人工資已經按時扣繳到保險基金中。不管怎樣，保險的基本原則都被拋到腦后。到了1931年中期，德國政府恨不得趕緊把失業保險問題轉到地方濟貧基金中去。1933年后，國家社會主義者在健康保險互助協會上處理掉民主自我管理的原則后，愿意讓其余社會保險保留下來。但是納粹社會政治的核心不是保險而是政黨控制慈善基金，這些基金是通過大型群眾集會籌集和明目張膽向企業界勒索來的，由地方黨干部覺得怎么合適就怎么分配。總而言之，失業保險根本不是資本主義普遍性危機的對手，只不過被看作緩和工資和勞動力市場短期波動的手段。[[845]](#_845_4)

健康和養老保險體系比失業保險更好地經受了大蕭條的襲擊。但是你不需要特別的經濟學智慧就能看出來，創立一個新的社會保險體系在經濟蕭條時期是會產生相反經濟后果的——因為推遲很久才能見效而且還需要有準備基金。需要特別大量長期儲蓄的養老保險存在問題就特別多。工會主義者、商人、羅斯福政府的原始凱恩斯主義者都警告說，任何新的社會保險工資扣減將帶來收縮性的后果。政府估算美國如果在1920年代初期成立失業保險基金就有可能積蓄足夠多的盈余，足以對付1929年到1930年的投資收縮。但是在當時情況下這種計算實際上沒有擊中要害。[[846]](#_846_4)在經濟周期通貨緊縮的谷底為了建造將來需要的長期社會保險基金，用新的工資稅給經濟增加負擔，幾乎可以肯定會推遲經濟恢復的到來。當洪水已經漫過門口臺階時，謹慎的做法不是要儲備保障長期供應的沙袋，而是先穩住堤壩。

考慮到這些限制，新社會保險體系的建設在1930年代初期各國基本上陷入停滯就沒有什么可驚訝的了。加拿大保守派在1935年推動新政模式的失業保險法案，結果在選舉中被拋棄，眼睜睜看著繼任的自由派政府在議會取消這個措施。[[847]](#_847_4)瑞典1934年的失業救濟法案是推遲了的補貼性措施。新西蘭1938年的《社會保障法案》完全回避了保險原則。在大蕭條的十年中只有在美國出現了社會保險的大發展。總而言之，不管從對比還是功能的角度，1935年的《社會保障法案》看來只能是非常不合時宜的產物。

對于美國的異常情況，大眾壓力并不能提供合理的解釋。既沒有大眾強烈抗議也沒有基礎廣泛的利益團體聯盟強迫1930年代社會保險的突破。主要利益團體要么冷漠，要么分裂。美國勞工聯合會在1932年已經放棄了堅決反對繳費式社會保險的傳統立場，但它關注的核心問題還是提高工資、縮短勞動時間、保證對工會的承認、按工會工資標準安排工人在反周期的公共工程中就業等。雖然得到“經濟安全委員會”顧問委員會的一個席位，但是勞工代表很少參加，幾乎沒有做任何事來影響立法的后果。

少數著名的福利資本家在法案的形成中發揮了非常積極的作用，其中通用電器公司的杰拉爾德·斯沃普、伊斯曼·柯達公司的馬里恩·福爾瑟姆是最杰出的代表。隨著他們公司的福利供應在1930年代越來越難以維持下去，福利資本家們發現，在全社會實施由雇主提供的風險保障的觀點非常有吸引力，這樣他們的勞工成本就和競爭者的平等了。但是大部分企業家本能地對強制性社會保險感到厭惡。全國制造商協會表明強烈反對社會保險的立場。全國工業會議理事會把主要精力放在證明失業是無法以保險來對付的風險。當政府的議案草案從弗朗西絲·珀金斯的委員會出籠后，即使福利資本家也竭力游說以得到特別減免。對1939年到1940年新政立法的態度調查顯示，在企業領袖眼中，只有《全國勞工關系法案》、《未分配利潤稅法案》、“公共事業振興署”（WPA）比《社會保障法案》更討厭。考慮到美國社會保險政治的歷史，著名福利大資本家即使是打了折扣的贊同也絕非一個不重要的事件，但是它作為支持法案的解釋還遠遠不夠充分。[[848]](#_848_4)

最強烈的大眾需求指向簡單的、即刻的救濟。在這一點上，左右兩派都同意。關于福利議題的最大聲音是湯森主義（Townsendism），提議讓年齡超過60歲的人都享受養老金，條件是同意離開勞動者隊伍，并迅速花掉獲得的養老金為經濟做貢獻。激進左派支持能夠保證每個工人失業時工資的法案，工人不用交納費用，也沒有保險的偽飾。保守派集中主張根據經濟情況調查而核定的傳統補助，中間派則支持國家給上年紀的窮人提供補貼。[[849]](#_849_4)

社會女性主義者非常清楚以工資為基礎的保險給婦女和兒童多么少的保障，因而對保險沒有多大熱情。在1934年到1935年冬關于《社會保障法案》的形成性辯論中，伊迪絲·阿伯特和格雷絲·阿伯特的《社會服務評論》不斷發表針對社會保險的異議觀點，引用英國左派的大量言論作為佐證。阿伯特姐妹的理想不是保險而是母親補貼式的直接幫助，充分滿足需要，既沒有污名又沒有工作要求，也不減少工資。[[850]](#_850_4)正如阿伯特姐妹知道的，歐洲進步人士已經在考慮把同樣的原則普遍化：稅收支持的社會補助與掙工資割裂開來，不要被儲備基金的復雜性和保險精算師的數學搞得很復雜，也不用受（男性）工人階級互助會的調解。在所有這些混亂交雜的聲音中，甚至連羅斯福也沒有宣稱聽到了公眾要求社會保險的呼聲。

總而言之，1930年代美國社會保險的突破不能歸功于任何一個傳統的動力：經濟需要、利益團體的堅持、草根階層的政治壓力，或者緊急事件本身的緊迫性。只有在災難時期的智慧經濟框架內，《社會保障法案》的邏輯才開始現出眉目。在急切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時，社會保險前來救駕，因為它是現成的經過檢驗的、有充分完整詳細闡述的觀點。

社會保險是過去政策議程的一部分。但是如果像面向大西洋的進步人士這么長時間相信的那樣，世界上的國家沿共同的前進路線排列，那么社會保險的時代錯誤本身就變得有利了——它成為象征性的標記，一個即使落后者遲早也必須經歷的里程標。正是這樣的信念幫助新政者克服了海外社會保險解體那些讓人不安的情況，克服了在經濟周期低谷時進行社會保險實驗的經濟上的不合時宜，克服了那些認為不應該干擾緊急情況下直接救濟的反對派觀點。正是這種歷史性讓社會保險變得吸引人了。

羅斯福本人像其他任何人一樣知道這個邏輯。人們普遍把羅斯福描述為在勞工和資本議題上的天真者，他兼收并蓄的思想倉庫中很少有經濟學內容。那些聲稱是他老師之人的名單有幾十英尺長。先在奧爾巴尼后在白宮擔任他的勞工問題首席顧問的弗朗西絲·珀金斯就是其中之一。她自己喜歡回憶說，是她在羅斯福1929年到1933年擔任紐約州長期間充當了他與失業救濟及就業穩定專家的“媒人”。作為勞工部長，在促使新政勞工政策沿著美國勞工立法協會1914年就勾勒出來的路線前進方面，她功不可沒。主要內容包括英國風格的公共勞工交流市場、公共工程、就業規范化、失業保險。但是當另外一位熱情的老師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在1932年春天進入羅斯福智囊團時，發現社會保險是羅斯福了解很多，而且有宏大信念的事務之一。珀金斯專注的失業保險不是羅斯福的焦點。他心中想的是人人參加的全面保險：針對老年、失業、疾病、失去工作能力等的普遍保險，通過郵局進行簡單和有效的管理。[[851]](#_851_4)

羅斯福信念的來源不是秘密。紐約州長期以來一直是社會保險爭奪的戰場；社會保險思想的主要交流中心大部分集中于此。當年就連羅斯福這樣無憂無慮的年輕進步人士也不能完全擺脫它們的影響。除此之外還必須加上羅斯福本能的財政保守主義，這與社會保險繳費的一面從一開始就是協調的。當1930年紐約特別委員會建議稅收支持的貧窮老人補貼而不是自己繳費的養老保險時，作為州長的羅斯福就相當失望。[[852]](#_852_4)最后，國家競爭的因素也推動了社會保險項目交互跳躍式地向更全面的目標邁進。這樣來解釋特格韋爾在1932年競選運動的夏天發現已經全面形成的信念，應該是相當公正的看法。正如勞合·喬治在1911年揚言要在俾斯麥的游戲上戰敗德國一樣，人們很難否認羅斯福有超越德國和英國而名垂青史的愿望。

但是，最終讓社會保險回到1930年代初期美國議程中的因素不是羅斯福的抱負（雖然這也很重要），甚至也不是珀金斯的抱負，而是在重點大學經濟學系和政策中心，從歐洲獲得的社會保險知識進行著靜悄悄、結構性的、幕后的機構化。如果說由于失敗的打擊，約翰·安德魯斯的美國勞工立法協會沒有心思重新在原來那血腥戰壕中進行1910年代的社會保險戰爭，一個擁有北大西洋經濟體所能提供的最好社會政策專業知識的競爭性年輕團體則沒有多少感情阻力。這里有很多例子：威廉·萊塞森在1910年出道作為紐約州雇主責任和失業救濟委員會歐洲考察團的團長，現在是俄亥俄州失業保險委員會主席，該委員會的歐洲式繳費失業保險法案在1932年與康芒斯的計劃爭奪專家的認可；還有復興失業保險的兩位干將，經濟學家保羅·道格拉斯和阿爾文·漢森都是獲得古根海姆獎學金在歐洲訓練了思想；布魯金斯學會的伊薩多·魯賓是參議員羅伯特·瓦格納的手下，1934年后政府經濟問題主要顧問；伊夫琳·伯恩斯1920年代后期把她在工資保障政策方面的專業知識從倫敦經濟學院帶到哥倫比亞大學。[[853]](#_853_4)

健康保險的想法在私人慈善基金會找到避難所，這些基金會的公共健康努力讓它們熟悉了醫療經濟學的議題。在1920年代后期，米爾班克基金會已經委托曾經擔任英國地方政府委員會首席醫療官員的阿瑟·紐修姆進行徹底的調查，一個國家一個國家調查公共和私人健康努力的關系，最后的結果是紐修姆慷慨激昂地重申了醫療保健的社會責任，包括強制性公共健康保險在內。在基金會自己的工作人員中積累了大批公共健康保險的專家，其中兩人后來成為1934年和1935年政府的社會保障議案中健康保險部分的首要起草者。[[854]](#_854_4)甚至I.M.魯賓諾也返回到1920年代末期的社會保險事業中。在美國勞工立法協會曾經宣稱為己有的立場上，亞伯拉罕·艾普斯坦的美國養老保險協會在1930年代初期擴展了它的名稱和項目，包括了所有社會保險。格雷絲·阿伯特在1934年秋天非常驚訝地報道說：“【社會】保險群體已經用全部準備好的項目撲向【政府】，今天做什么，明天做什么，后天做什么，而我們剩下的人只能談籠統的原則。”[[855]](#_855_4)

和從前經常出現的情況一樣，給歐洲社會保險思想的這些渠道帶來政治機會的是一個僵局，這一次是關于聯邦緊急救濟。人人都認識到新政第一個冬天（1933—1934）年的聯邦緊急救濟款項是政策上的權宜之計，一個特別的臨時措施以便支撐住早就耗盡了的地方救濟基金。在新政的第一年為超過四百萬人提供就業崗位的聯邦緊急工程項目同樣是個權宜之計。到了1934年2月，全國人口中竟然有22%依靠三大聯邦緊急救濟機構而生活。[[856]](#_856_4)即使新政者自己沒有對危機逼迫他們采取的道路產生矛盾心理，這樣程度的措施也根本不可能長久維持。第一個冬天并不是緊急工作救濟的結束，公共事業振興署還沒有到來呢。但是多數新政者，尤其是羅斯福本人開始對緊急救濟感到不自在。哈里·霍普金斯最終提議讓公共事業振興署成為永久新政的一部分，但是羅斯福無法擺脫工作救濟不過是另一種“救濟金”而已的意識。

到了新政第一個冬天結束時，新政者對自己臨時措施越來越多的質疑突然提高了政策制訂者能夠設計出來的長期、結構性項目的價值，不管它是什么樣的。作為政府的首要工作救濟機構，“民用工程署”在1934年春就開始關門；更緊迫的是政府擔心國會在驚恐之下通過直接撥款的項目或者湯森式的“養老金”。在這樣雙重壓力下的緊要關頭，速度就十分重要。匆忙中，新政者翻箱倒柜要尋找現成的結構性方案以對付要求救濟的呼聲，結果發現可以馬上拿來使用的就是進步人士的社會保險工程。

歐洲再次成為試驗場，這次要吸收的不是新觀點而是管理經驗，首先是修辭上的優勢。英國是焦點，工黨政府與倫敦銀行家的沖突已經讓英國失業政策成為1931年的報紙頭版新聞，社會保險的支持者和反對者都獲得了新生。拉塞爾·塞奇基金會1908年社會保險調查的老將李·弗蘭克爾在1931年春天和夏天受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的委托在歐洲收集社會保險的數據。全美工業會議理事會和洛克菲勒資助的“產業關系咨詢公司”分別派出的調查團也來到歐洲，前者要證明失業是無法用保險來解決的風險，后者是要用一系列精心準備的專著證明并非如此。接替查爾斯·麥卡錫擔任威斯康星議會圖書館館長的埃德溫·威特1931年開始研究歐洲社會保險的方法和救濟措施（他不久之后成為《社會保障法案》起草小組的組長）。弗朗西絲·珀金斯本人也在羅斯福催促下于同年來到歐洲。[[857]](#_857_4)

調查者找到共同基礎的機會非常小。對于全美工業會議理事會的團隊來說，英國的關鍵事實是失業保險淪為一個永久的、昂貴的、政治推動的救濟項目，使得工資人為地提高太多，破壞了大眾工作的熱情，從而出現財政崩潰。相反，社會保險的支持者則竭力把爭論的中心轉向失業者的精神狀態問題。取代麗蓮·沃爾德成為亨利街睦鄰中心負責人的海倫·霍爾在1932年動身到英國，心中就是想的這個問題。像霍爾一樣，珀金斯認為從英國可以學到的經驗是：比起以羞辱和不確定性為特征的美國式慈善，工人階級的尊嚴和自我尊重在“救濟金”制度下得到更有效地保護。莫莉·雷·卡羅爾注意到英國人自己隨意地談到“革命保險”。這些行程的重點不是協議；關鍵的問題是即使國內危機就在眼前，美國人的辯論中有多少仍然是其他國家的經驗。[[858]](#_858_4)

1934年夏天，羅斯福授權珀金斯召集不同部門的專家群起草全面的聯邦社會保險法案。她召集的人員中，那些對歐洲經驗有專門知識的人比例特別大。“我們期待他們熟悉每個國家的每次社會保險實驗。”多年后珀金斯回憶成員任命的情景時說，“我們期待他們在不同國家的實驗模式中選擇合情合理的，切實可行的方式。我們期待他們別忘了這是1934年到1935年的美國。”[[859]](#_859_4)為努力避免專家之間就失業保險爭吵不休，她冷落了跨越大西洋的一些非常著名的進步人士——如安德魯斯、魯賓諾、艾普斯坦等。但招聘來的技術上受到訓練的年輕專家們對社會保險實踐有足夠多的了解，使政策結果受他們借用的模板影響。

珀金斯任命加拿大裔美國人、歐美失業措施研究專家布萊斯·斯圖爾特負責起草法案中失業保險部分的重要條款。他曾擔任加拿大公共就業服務處的領導，該處本身就是模仿英國1909年《勞工交流法案》而成立的。斯圖爾特在1920年代初期來到芝加哥，負責服裝工人聯合會新成立的失業問題勞資聯合委員會，在那里他加入了產業關系咨詢公司，幫助指導歐洲失業保險調查。多年前貝弗里奇的著作就已讓他信奉全面失業保險的原則。珀金斯任務小組的美國勞工部專家伊薩多·魯賓本人就剛剛對英國失業和救濟管理發表過高度贊揚的評價。[[860]](#_860_4)

起草小組中養老保險部分的領導任務交給了加州大學法學教授芭芭拉·納赫特里布·阿姆斯特朗。她兩年前剛剛出版的《確保基本需要》對維持收入的歐洲法律條款做了一個特別全面的匯編。她曾經稱美國是“西方世界社會經濟管理領域的落后國家，是所有在商業上重要的國家中最落后的一個”。珀金斯對委員會工作中養老保險部分不是特別上心。托馬斯·艾略特實際上覺得養老保險部分肯定遭到國會抵制無法過關。但是干勁十足、伶牙俐齒的阿姆斯特朗利用她遠離失業問題焦點的優勢，起草了《社會保險法案》中在進入國會時有清楚說明的、切實可行的社會保險項目的唯一一部分內容。健康保險部分的負責人是伊西多爾·S.福爾克和埃德加·賽登斯特里克，他們是從米爾班克基金會借調過來工作的。[[861]](#_861_4)

“經濟保障委員會”的領導埃德溫·威特是從威斯康星工業委員會抽調的康芒斯的學生，國際化程度沒那么高，但是他也前往歐洲做過社會學旅行。他給予威斯康星大學的年輕助手威爾伯·科恩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整理所能找到的海外社會保險體系的一切資料。有段時間，該委員會悄悄地從國際勞工組織引進了兩位社會保險專家當顧問。[[862]](#_862_4)

委員會成員中歐洲問題專家并沒有大權獨攬。在關鍵的工作小組里他們與商業保險、公司養老金和補貼計劃等方面的專家廝混在一起。后一群人的影響并非不重要，但是以歐洲為基礎的專業知識的集中程度仍然讓人印象深刻。在任何別的時代，這在政治上幾乎是不可想象的。起草者心里想的都是其他國家的經驗，要把社會保險思想改造適用于美國。

不用擔心《社會保障法案》的起草者會忘記他們是在為1934年和1935年的美國制訂政策；他們是政策制訂者，不是復寫者。更微妙、更重要的一點是：1930年代美國的社會知識和專家的定義在多大程度上和大西洋進步紐帶聯結在一起，在其中多么充分地形成了經濟保障思想。

專家制訂社會政策的時機是根本的，但它是轉瞬即逝的。即使在經濟保障委員會的成員在辯論時，在關閉的房間內起草政策時，政治的粗暴力量就以驚人的速度開始處理掉這些政策。健康保險是第一個受害者。當福爾克和賽登斯特里克起草工作陷入困境時，美國醫師協會采取主動，先發制人地投票反對任何形式的公共健康保險。珀金斯的心思還主要集中在失業保險問題上，認為健康保險拖延不決的沖突可能危及其他保險項目，羅斯福同意這個看法。雖然福爾克和賽登斯特里克還在辛苦起草他們的報告，健康保險實際上已經從議程中刪掉了。[[863]](#_863_4)

另外一種形式的政治斗爭淹沒了專家間關于失業救濟的“儲蓄”和保險兩原則之爭。斯圖爾特鼓吹全國范圍的失業保險體系，允許最大的雇主選擇不參加，用自己的等值的保險品種代替。保羅·凱洛格則試圖鼓動左翼進步人士建立嚴格的國家標準來實施各州管理的計劃。但是因為擔心糾纏于康芒斯失業“儲蓄”項目的爭吵中，更擔心最高法院的否決權，珀金斯強迫法案中失業保險部分進入憲法上說的最低限度模式，幾乎把所有管理細節交給各個州自己做主。甚至連“保險”這個詞也小心地隱藏在法案的委婉語中，雖然只有蒙住眼睛的法官才可能懷疑該法案的意圖。[[864]](#_864_4)

對于法案中的養老和失業保險部分，兒童局工作人員添加了國家的母親補貼體制；更接近他們心愿的是，添加了1920年代末期共和黨國會廢棄的某些關鍵的兒童健康補貼。為了讓整個法案在政治上受人歡迎，向很多州提供了直接的中央財政撥款，資助一些家庭福利和公共健康項目，以及更慷慨的，為上年紀窮人提供類別性的、英國式補貼。

正是最后一部分的受歡迎程度最終讓其余內容在國會通過。相反，保險部分遭遇更多的抨擊。保守派再次敲響關于腐敗的警鐘，擔心法案養老保險部分的基金將成為巨大的政治行賄金庫。南方人動用潛在的否決力量刪掉了任何可能被法院解釋為黑人白人福利同等的詞語，在羅斯福總是極度謹慎的財政部長幫助下，還把農業工人從法案的養老和失業保險條款中刪掉了（雖然他們仍然是南方經濟中的核心）。

在國會其他贊助者把家政服務員和（法案的失業保險部分）小企業雇員從涵蓋范圍中刪掉后，法案的目標人口被扭曲為與海外法案原型完全不同的形式。進入1930年代美國的社會保險不是羅斯福自己曾經想象的基于公民身份的普遍保險，也不是像俾斯麥或者勞合·喬治給予掙工資者這一有特殊經濟風險和政治忠誠度的人群的保險。1935年《社會保障法案》的覆蓋范圍迂回跨過整個社會經濟地圖，像政黨選區重新劃分一樣，根據受影響群體的政治力量決定。

總而言之，熟悉的政治斗爭發揮了作用——妥協、修改、破壞、修補。人們不大看得見但同樣有效的是，主導性的現有機構也發揮作用。大保險公司本身通過1930年代初期“重建金融公司”貸款進入公共救濟領域，已經不再像1915年和1919年那樣采取阻撓社會保險的政治立場了。這次它們滿足于戰勝歐洲風格的、通過郵局購買的補充性養老年金。但是商業保險的邏輯在1930年代的美國非常流行（如以前英國的友好協會或者再以前德國的互助會），新政者不可能不注意到。在羅斯福看來，救濟和保險的差別是絕對的。正是他堅持養老保險體系的自我籌款性質，即使這意味著要推遲該法案下的首批給付，直到建立起足夠充分的資金。在經過了相當大的困難后，才在1939年勉強讓他同意常見的歐洲過渡性給付試驗，允許那些太接近退休年齡而實在無法交夠基本保險費的人加入。同樣也是羅斯福在1934年拒絕模仿把社會保險和救濟結合起來的英國模式，即把旨在保證工人免于貧困的體系和萬一安全網不起作用時能維持他們生活的體系結合起來。“牢靠的保險籌資渠道”在羅斯福心中占據著非常牢固的地位；他相信，正是由于英國和德國違背了這個原則，所以它們的失業保險才會陷入崩潰。[[865]](#_865_4)

比《社會保障法案》技術起草者認識到的更深刻的是，他們也吸收了一些圍繞在身邊的商業保險模式。在英國，世紀之交的養老金統一收費率仍然占有相當分量。德國社會保險把受益人分為幾個大的工資類別。相反，美國的“社會保障局”就像管理良好的保險公司或者雇主管理的補貼計劃，要把每個人的補貼嚴格按照他的個人收入記錄確定，有嚴謹的個人化賬戶。倫敦《經濟學家》雜志的編輯認為個人化的終身記錄賬戶是特別昂貴的，在管理上是頭重腳輕的，因而不可能存在下去，但是他們的判斷低估了先前已有的思想和機構的力量。《社會保障法案》的養老保險部分的起草者從圍繞在周圍的商業原則中尋求庇護，因為他們依賴從保險公司和商業基金公司借來的專家進行風險計算，在公眾輿論更愿意選擇更簡單的稅收支持的救濟時要為推出社會保險辯護，而且非常擔心他們的工作能否承受住憲法嚴格的審查。[[866]](#_866_4)

新政社會保險采取的形式不是社會團體間的集體合同，而是個人和國家間多種形式的私人合同。與多數國外模式不同，沒有普遍的稅收基金來補充保險體系中的雇主和雇員保險費，雖然艾普斯坦和凱洛格在這件事上一再催促。在1930年代美國的工會、教堂、兄弟會以及其他中介性社會機構中，只有雇主得到《社會保障法案》的確認。服裝行業的勞資聯合委員會被認為是個錯誤的開頭。不存在責任向更小的、更民主的機構轉移的情況，不承認中介性社會機構，沒有個人集中起來的群體。當艾普斯坦和其他人指出社會保險和商業保險是為截然不同的目的服務的手段時，他們的反對或許被當作耳旁風。[[867]](#_867_4)

不管怎樣，盡管有這些缺陷和妥協，1935年還是把毫無疑問帶有歐洲風格的社會保險變體越過長久以來的重重障礙帶進美國政治。決不輕言妥協的艾普斯坦希望最高法院把它駁回，讓專家在時間和政治壓力不那么激烈時決定它們是否可行。但是如果說忽略社會保險在跨越大西洋時發生的深刻重組是錯誤的，忽略大西洋紐帶對其的影響和賦權將是更大的錯誤。《社會保障法案》不是大蕭條時期經濟風險的答案。它的社會保險條款實際上沒有為國家中三分之一忍饑挨餓、衣衫襤褸、身居陋室的窮人做任何事情，而羅斯福在1936年是打著為這些人謀福利的旗號進行選舉的。除了過去那些延宕和阻塞堆積起來的勢能、幕后的社會政治專門知識的機構化，以及最重要的——其他國家先例的分量外，社會保險與1930年代的任何東西都格格不入。

1930年代社會保險復興說明了什么呢？那就是：如果社會政策專家可以在政治相對隔絕的情況下做他們最初的起草工作，或者把進口的東西附著在其他更受歡迎的措施上面，危機本身就能夠便于借用社會政治措施，使之越過風俗習慣、法律和政治的國家差異。認識到法案處理的問題是其他時代和背景下的問題這一點，并不應該貶損專家的工作。新政中充滿了這類東西：它是一大堆改革建議從塞得過滿的倉庫滾到政治中心。當危機對速度的要求給了他們工作的空間時，新政時期是有世界眼光的進步人士的時代。這是他們的機會，終于可以用多年的觀察、落后于人之感、堆滿事實的國際先例摘要去迎合廣大民眾暫時產生的一種意識——即便只是危機造成的一種暗示和懷疑，那就是：美國或許并非處于進步競賽的領先地位。

## 想象中的團結

新政者并沒有常常像在《社會保障法案》的基本框架中那樣，享受與日常政治活動保持距離的好處。他們從過去進步人士那里繼承下來的更大的集體和共同體愿景，都不可能在技術委員會的專家工作中實現。他們的共同體設計是在密切關注的公眾眼皮底下完成的，處在利益團體政治的夾擊下，所以其壽命沒有一個超過《社會保障法案》。但是人們如果僅僅從通過的法案條文來看的話，就誤讀了新政。新政者有自己的社會政治視覺風格，有自己想象中的團結形式——他們自己的共同體和合作理想，并不比戰前或者1920年代的進步人士的更薄弱，這很大程度上也因為它們在很多方面是從前理想的擴展。

20世紀初期進步人士的社區理想和新政時期繼承者之間的契合并不總是得到充分承認。常見的情況是把1930年代的進步想象描述為國家的而不是地方的，經濟和政治的而不是道德和社會的。隨著資本的翅膀展開，進步政治的領域也在擴大。新政者對于從前登山一樣的任務沒有多大的耐心，即通過一個又一個示范法案努力使各個州的議會達到開明社會政治實踐的標準。把憲法中的“普遍福利”條款國家化，像羅馬焰火筒一樣發射出一個個由大寫字母代表的新聯邦機構，他們在國會和法院允許的范圍內，盡力跨越了在州政府權力和聯邦政府權力之間精心防御的壁壘——憲法規定前者擁有普遍權力，而后者只擁有列舉出來的有限權力。在1906年，H.G.威爾斯曾經認為美國的國家意識虛弱到幾乎根本不存在的地步，新政者卻創造了中央管理范圍的巨大增長。

因為政治畫布和國家一樣大，新政者與豪威和伊利他們一代不同，不再把政治想象力僅僅局限在大城市。當然，進步人士的一些都市議程仍然存在于1930年代。在有些大城市，市營化鼓吹者利用企業倒閉的機會要把大蕭條削弱的私人交通線收歸公共所有。在紐約市，市長菲奧雷洛·拉瓜迪亞把財務陷入困境的城市地鐵線變成統一的公共交通體系，實現了四十年前市營化宣傳者的夢想。在華盛頓特區，新政者給予丹尼爾·伯納姆1902年的城市規劃第二次機會，搞了大量遠景和紀念建筑。但是現在因為大蕭條導致城市財政核心遭到動搖，連弗里德里克·豪威本人都不再把城市作為自由存在的民主實驗室，更不會認為國家的政治命運可能建立在（如從前曾經認為的）公交車、市營的電廠、匯合的林蔭大道和公民中心等基礎上。都市公用服務業壟斷中最有利可圖的領域已經早就打破了城市邊界，建造區域電網或者全國性控股公司，遠遠超過市營化主張者的步伐。都市進步政治在1930年代并未完結，但遭受救濟和失業危機的城市已經不再能作為社會政治的主要實驗場。

最清晰地抓住新政者想象力的團結，是在規模上比大城市小，在面對面直接交流的關系上又比國家甚至比新政者常常呼吁的對象“人民”更強的。雖說新聯邦機構具有集中權力的性質，在爭奪權威和撥款的斗爭中勾心斗角，需要羅斯福的全部協商溝通技巧來約束和制衡；但是從新政半無意地幫助創立的官僚和管理狀態下回顧當時，人們很難不被新政政治想象力中的權力分散因素所感動。在《農業調整法案》下，地方農民協會投票決定耕地面積控制，確定普遍的小麥和棉花的生產配額。土壤保護和放牧區的管理由地方種植者和牧場主投票決定；勞工代表問題由每個工作點的掙工資者全體投票決定。地方合作社在農村電氣化項目下分配電力；重新安置署農民社區的農產品由合作社營銷；合作社充當田納西流域管理局在該地區水道上建設的新大壩工程與當地居民之間溝通的橋梁。早期新政住房計劃是合作社活動的活躍場所。

這些社區和合作社項目不僅僅是應付這十年各種風暴的緊急避難所。對于建筑師來說，這些項目是更好的社會秩序的模版，勝過價格和財產本身所能創造的形式。威廉·洛伊希滕貝格多年前就敏銳地指出“新政者雖然‘頭腦清醒’和‘反烏托邦’，但他們有自己的天堂城市”：

干凈、綠色、潔白的綠帶城鎮；孩子們在陽光下嬉戲，學校寬敞明亮，空氣清新；政府在華盛頓州朗維尤的小房屋項目，每座都有不同的設計，有彩色屋頂，有花園和菜園；M.L.威爾遜心中想象的猶他州摩門教村莊——寬闊筆直的街道上一座座完美農莊；最重要的是田納西河谷，有模范城鎮諾里斯、高聳的傳輸塔、白色大壩、锃亮的鋼絲索，那里有“善于思考的人們心中出現的村莊和干凈小工廠的畫面”。[[868]](#_868_4)

在新政者有這么多更緊急的工作要做、這么多價值要支撐、這么多私人投資要維持之時，他們花費這么多精力在社區設計項目上，不能不讓批評家們感到驚訝。但是在這里危機的動力學也扭曲了時間的正常曲線，把進步人士的議程從大西洋紐帶的歷史中拉出來進入情況緊急的現在。1919年突然中斷的戰時規劃村莊項目死而復生；社會化的鄉村夢想得到第二波的微風吹拂；霍勒斯·普倫基特和丹麥奶牛場農民曾經推動的合作社再次進入中心舞臺；住房標準上的民主革命最終被推動跨越了大西洋；魏瑪社會現代主義在新政時代的美國獲得立足之地；甚至艾爾伍德·米德的農村社區項目也像鳳凰一樣，從加利福尼亞的沙灘上飛起來了。

在政府內部及其以外，所有這些設計都充滿了爭議。右派譴責它們完全是共產主義的一套藍圖；把修補搖晃的資本主義當作大蕭條時期唯一要務的許多新政中間派，則認為它們是浪漫色彩的愚蠢行動。但即使講究實際的新政者，相信自由放任個人主義已經走到游戲終局階段，也很難不抱有憧憬，希望大蕭條之后出現的不僅是經濟復興，而且是新一套社會和社會團結形式，比過去更少無政府主義和個人主義色彩，比過去的大起大落模式更穩定，不那么被私有財產特權所驅動——總之，它更像長期縈繞在進步人士頭腦中的、與美國個人主義極端對立的“有機”歐洲村莊。

《社會保障法案》起草者在相對來說精確的社會機器中工作；新政社區建設者希望改造社會風氣。前者的工作很迅速，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密室里進行的。而后者根本無法擺脫政治或者公開性陷阱。不過，面對這些困難，他們還是試圖創造個人主義之外的場景。新政之前或者之后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如此嚴肅地對待這個任務。在都市住房計劃、模范郊區、邊遠鄉村中，新政者用他們政治想象力中的團結畫面點綴了1930年代的美國。在此過程中，他們收集了大西洋進步紐帶的另一個方面。

像從前的進步人士一樣，新政者社會藍圖早期的主要地點在鄉村。雖然新政者來自都市，但是政府上臺時頭腦中更清晰的是農村而不是經濟政策。在就職典禮當天，羅斯福的顧問還沒有準備好工業政策呢。《全國工業復興法案》在政府的第一個緊急階段末期以極快的速度被拼湊起來，主要是為了阻止新政者認為很糟糕的立法。即使在1936年后，羅斯福、珀金斯與勞工組織的關系也一直是緊張和復雜的。相反，農業在羅斯福的心中已有十多年了。[[869]](#_869_4)

認為1930年代政策前線是在農業領域，這種觀點不僅是羅斯福個人的想法，不僅僅是他作為有科學素養的農民紳士工作的認真態度，或者他與親屬西奧多·羅斯福農村生活運動的本能紐帶。智囊庫中最聰明、最有抱負的人是企業經濟學方面的專家，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但是在讓他選擇1933年的工作領域時，他卻挑選了農業部副部長。在每五個人中就有一個人仍依靠農業經濟生活的美國，羅斯福的許多早期顧問認為再沒有比鄉村經濟復興更快捷、更安全的重新走向繁榮的方法了。[[870]](#_870_4)

為了這個目標，從1933年以后，新政者運用行政和憲法所能給予的手段盡可能快地向農村經濟注入資金。二十年前的聯邦農業貸款機器在規模上連續迅速擴大。為了換取生產控制，政府買斷了數百萬美元的耕地和牲畜生產權利，以便阻擋主要農產品價格下滑的趨勢。雖然《農業調整法案》在這個十年結束前需要重新修改兩次，但新政者控制價格的工作做得相當好。在后來五十年里，平價制度和價格仍然是后新政農業秩序的堅實基礎。[[871]](#_871_4)

即使價格和生產控制的長期體制是新政者得到的東西，如果認為這是他們最渴望得到的結果，卻是回顧歷史時的嚴重錯誤。1933年時除了農業游說團體外，沒有任何人想象永久的價格支持政策讓農民在本世紀剩余時間里“接受救濟”。像緊急工作救濟一樣，價格支持和生產控制本來只是作為權宜之計而已，只待新政者找到把農業社會和市場重新回歸最初平衡的新手段。

對于有些人來說，關鍵的結構性需要是吸收農業經濟中最邊緣化的生產者，把經濟中多余農業人口轉移到都市工資經濟中，在邊緣化農業的永久貧困和過分擁擠的市場之外，或許有能讓他們擺脫貧困的新機會。農業部從1933年到1935年最坦率的結構主義者特格韋爾認為，計劃中的重新安置至少五十萬人決不是小數目。農業計劃的第一需要是把人口和經濟上可持續的土地生產能力結合起來。第二是把國家的農業土地與可靠的經濟使用更緊密結合起來，而不是靠私人土地市場所能帶來的結果——包括趕繁榮潮者的過分信心、對于土地的過量使用、容易上當受騙的購買者、災難性的價格崩潰等。這里一個關鍵的工具是城市分區，是從1920年代都市規劃者工具箱中拿出來在全國使用的。走向農業分區的起點在1929年的威斯康星州。那里出臺法案限制土地開發者把貧瘠得除了貧窮什么也長不出來的殘地作為農田進入市場買賣。野心更大的農業經濟學家談到國家土地資源儲備、保存每個地塊（都市分區規劃者著名的說法）供最好和效率最高的使用、將產量最低的地塊退還為公共擁有的草地和森林資源。

盡管小規模、艱苦謀生的農場之低效率讓新政農業結構主義者印象深刻，但是，如果可以找到手段讓淳樸的農村人堅持下去，還沒有人準備把農村變成大規模農業企業。在這種思想中，合作社作為微型效率工具派上了用場，是小農場主和佃農的地方團體通過民主化集約效果擺脫貧困的一種方式。這種重組原子化農業市場的討論中，沒有一個得到控制著主要農業游說團體的企業農場主的歡迎。但是對于以深刻思考而自豪的新政者來說，土地休整、農村重新規劃、有意識地重新平衡城市和農村人口、在農民中組織更強大的社會和經濟合作社，并不是偏離的或者附屬的活動，而是主要內容。[[872]](#_872_4)

新政長期農業項目的主要設計師最開始都沒有把心思放在歐洲或者過去的經驗上。在1927年通過托斯丹·凡勃倫的眼睛看到傳統的俄國米爾（mir，村社組織）后特格韋爾認為，從集中居住的農舍走很遠的路到分散的田地去干活效率低下，是非常荒唐的。《農業調整法案》的耕地面積減少機制的設計者米爾本·威爾遜閱讀過AE（喬治·羅素），但是他解決預料中土地過剩問題的答案是模仿猶他州鄉下認真管理的摩門城鎮：兼職工作的機會加上足以生產家庭所需大部分糧食的小農場土地。當特格韋爾考慮重新安置農業人口的經濟目的地時，指的是城市工資經濟。但是有霍勒斯·普倫基特、克拉倫斯·坡、雷蒙德·昂溫、埃比尼澤·霍華德、丹麥合作社、加州土地定居點等經驗，這么多受挫的小規模合作社設計藍圖仍然盤旋在進步政治周圍；所以在危機時刻，其中有些設計付諸實施并不讓人驚訝。[[873]](#_873_4)

實際上，自危機一開始，草根政治談論就充滿了共同體和合作思想。因為現金和工資消失，易貨貿易合作非常普遍；喬治·索爾在閱讀寫給《新共和》編輯的讀者來信時驚訝地提到，它們在1930年代初期大眾的心里占據了多么大的位置。另外一個普遍的建議是鼓勵城市邊緣的生存居住區，德國人稱為臨時棚屋區（Randsiedlungen）——在工資經濟飄搖崩潰的背景下，失業的都市工人可以通過兼職工作和自己種植點糧食蔬菜維持一家人的生計。在大蕭條初期，羅斯福曾經往這個方向考慮過。美國教友會的克拉倫斯·皮科特借鑒了戰后在維也納外圍建造的、貴格會支持的生存居住區，按此模式在阿巴拉契亞煤礦山谷的失業礦工中開發社區，這后來吸引了埃莉諾·羅斯福的注意。仍然在尋找擺脫區域農村貧困的出口，南方進步人士重新撿起了從艾爾伍德·米德那里吸收的規劃合作式農莊社區思想。其中，在農場城市項目中失敗的休·麥克雷1932年初期也提出強烈申辯。[[874]](#_874_4)

這些建議都進入早期新政機構中。在亞拉巴馬州參議員約翰·班克海德（他也是米德的一個南方支持者的兄弟）塞入《全國工業復興法》的授權下，內政部1933年夏天成立自耕自給小農場司，由M.L.威爾遜任司長，皮科特任行政助理。它的第一批撥款受益者是皮科特在西弗吉尼亞“陷入困境”的礦工定居點、在北卡羅萊納復興的麥克雷農場城市工程。聯邦緊急救濟署建立了自助合作司和為解決農村困難的“農村復興和困難人口救濟司”，后者很快組建了一批規劃的合作農場。在形式和理論基礎上，新政早期規劃的社區工作決不是井然有序的。到了特格韋爾的新部門“重新安置署”在1935年夏天吸收所有這些早期嘗試時，新政充當著地主房東的作用，讓城市工人轉移到鄉下，讓農場工人轉移到城市，其他人原地不動；為由于礦井全面關閉而失業的礦工建設小社區，讓失業的城市工人到郊區靠兼職和種莊稼重新開始，讓流動的農業生產工人有迫切渴望的體面定居點，讓佃農和小農場主嘗試在政府農場上開始新的生活。[[875]](#_875_4)

1933年沒有人預料到從早期這種兼收并蓄的混亂狀態中，艾爾伍德·米德的農莊設計竟然成為該機構重新安置工作的主要模板。特格韋爾勸說羅斯福把長期農業規劃分離出來，變成一個和農業部分開的機構，以便隔絕農業游說團日常的壓力。他是著眼于更大的結構的。重新安置署的土地使用司從中西部采伐地帶、阿巴拉契亞高地、沙漠化大草原等地購買了千萬英畝的公用土地。農業復興司開始通過貸款、記賬培訓、慷慨數量的建議來穩住數以千計暫時被市場大鉗夾住的農民。但是因為城市失業人口泛濫，必須采取措施為那些被塵暴、洪水、還不起的抵押貸款或者聯邦土地購買代理人迫使離開土地的人們提供幫助。[[876]](#_876_4)

在這樣的緊急關頭，米德的建議因為它的科學主義、共同體和合作理想、澳大利亞和歐洲紐帶而重新煥發生命力。米德的工程有南方重要人物的支持，對邊緣和弱勢群體的需要表現出一種政治上很關鍵的姿態。它的思想啟動成本在多年前就已經支付過了。在去掉了與灌溉和土地開墾的聯系后，它作為不那么原子化、不那么容易受市場變數破壞的農業經濟的萌芽重新出現。到了1937年夏天，由加利福尼亞德爾亥定居點前農業經理擔任安置工作的領導，重新安置署在管理，或者在建設58個規劃的政府農場項目，四分之三都在南方。[[877]](#_877_4)

速度成為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米德的項目多數幾乎未經任何修改就接受了：小塊的土地、預先構建的房子、長期租借購買安排而不是簡單的所有權、認真的管理、充分展開的合作方式網絡。由拿工資的農莊經理管理每個重新安置點，正如米德曾經計劃的，配備有貸款基金、效率觀念、權威和建議的強大力量。在最大的一個定居點，居住在農莊的家政學家給婦女上課，分發高壓鍋和營養知識，監督家庭收入開支狀況。在三起例子中，針對被認為是技術最少的人口，重新安置署的規劃者開始實驗公然的集體農莊，把從前的佃農和移民變成拿工資的農業工人。但是政府農莊的常見模式是集中在一起的租用者群體，由精心安排的合作社的復雜網絡而結合。合作社管理農莊的商店、倉庫、飼養場、修理鋪、軋棉廠、磨房，并推銷成員的農產品。健康合作社和當地醫生簽合同購買預先付費的群體醫療服務。總合作社管理每個社區的公民活動中心，充當地方政府的角色。[[878]](#_878_4)

政治敵人很快就發怒了，控訴重新安置的農莊是蘇聯農業的灘頭堡。實際上，到了1937年，在政府農莊干活的有4,441個農民，可見新政農村安置區只占了最狹小的一片。相反，重新安置署的復興貸款項目包含了50萬農民。但是因為密集的、歐洲風格的土地使用模式和精耕細作的農業生產技術，加上學校和社區中心、集體和民主理想，農村安置區突然清晰可見地呈現了一代人向往的理想狀態，完全不同于從前分散的私人拓荒者農村。

重新安置署的社區建設計劃的第二個中心是模范郊區，這里，大西洋紐帶同樣發揮了關鍵作用。當該署的“郊區重新安置司”在1935年成立時，特格韋爾本人心中并沒有多少規劃，不過是城市工人通勤距離內的匯集盆地，用來容納計劃中的大量涌入的農村人口。這次是1918年戰爭工人村和英國花園城市運動支持者老兵挺身而出，帶來了他們的社區計劃。該機構的九位主要顧問中有三人曾經在戰爭住房計劃或者隨后產生的重建委員會工作過，至少五人曾經到萊奇沃思朝拜過。該機構曾咨詢過凱瑟琳·鮑爾和住房研究公會的亨利·丘吉爾；同樣還有克拉倫斯·斯泰因、亨利·萊特、弗里德里克·比格。他們連同劉易斯·芒福德等人在1920年代花費大部分時間收集埃比尼澤·霍華德的花園城市工程資料。此外，還有昂溫的美國好朋友約翰·諾倫，以及在諾倫的規劃所開始事業的兩位年輕規劃師特里西·奧格爾和雅各布·克萊恩。在正需要很快就能實現的設計時，他們帶來了自己沒有實現的現成議程。特格韋爾最初設想的六十個綠化帶城鎮工程沒有實現。但是在法庭挑戰讓人失去膽量之前，重新安置署已經開始了三個工人階級衛星郊區計劃，讓新政美國看到了最好的國際花園城市運動的樣板。[[879]](#_879_4)

這些重新安置郊區沒有一個是對歐洲先例的忠實復制。萊奇沃思基本上是中產階級而非工人階級住房的實驗——是有限贏利的投資，不是政府工程；漢普斯特德是慈善事業。從建筑學上說，美國的每個工程都獨樹一幟。在視覺上最激進的馬里蘭州“綠帶”（Greenbelt）項目中，成排讓人驚訝的幾何外觀兩層樓房屋沿著山脊形成拱形，顯然借鑒了魏瑪社會現代主義的審美觀。威斯康星“綠谷”（Greendale）規劃者有意識地對外國設計表示厭惡，選擇了18世紀威廉斯堡模式的城市中心，配以簡單本地設計的自由坐落式小房屋。[[880]](#_880_4)但是在競爭性外觀下面，歐洲影響是深刻的。甚至英國市議會的住房設計者都沒有像綠地郊區計劃者那樣密切地遵守埃比尼澤·霍華德的單一稅戒律。每個綠地城鎮的土地都是集體所有的，因此沒有不勞而獲的投機性增值，沒有混亂無序的增長，也沒有私人和公共經濟利益的經常性沖突。

為了保證公共因素不消失，三個綠地郊區各自圍繞一個城鎮中心建設。“綠帶”擁有兼做城市娛樂中心的學校、城市俱樂部的會議室、社區教堂、圖書館，還有一個社區劇院，現在被稱為“烏托邦”。每個重新安置區都有寬闊的公共娛樂空間。三個郊區的醫療服務都是通過健康合作社提供的，貸款都是通過信用合作社提供的，日雜用品都是通過合作社普通商店提供的。綠地郊區以年輕的工人階級和下層中產階級家庭、小居所、慷慨的公共設施，把商業郊區的習慣性階級關系徹底翻轉過來。在馬里蘭州“綠帶”社區中心的墻壁上有男男女女一起種莊稼、勞動和思考的浮雕，還有聯邦憲法的開頭一句：“我們人民……”[[881]](#_881_4)

最后，正如霍華德曾經描述過的，每個安置區的周圍都是寬闊的綠色緩沖帶。對這些綠地，計劃者從來沒有發現切實可行的經濟用途，雖然他們談論合作農場、小工業園區，以及建立城市和農村產品更密切和平衡關系的需要。不過從象征意義上說，綠化帶的意義是毋庸置疑的：把城市圍起來保護（克拉倫斯·斯泰因認為就像用城墻保護中世紀古城那樣），把它們和傳統的商業繁榮的城鎮區別開來，后者的街道在四面八方向外伸展，投機想象力能走多遠就多遠。把新政團結的這些綠洲與外面資本主義土地市場的怪念頭和混亂隔離開來。[[882]](#_882_4)

1930年代北大西洋經濟體沒有任何別的地方比得上這些有設想、可實施的民主社區模式的投資。從1920年代大膽的郊區擴展計劃起，英國市議會的住房建設者在1930年代轉向市區貧民窟改造；直到1946年《新城法案》通過后，霍華德的衛星城思想才開始在英國得到公共的嘗試。在蓬蒂內（Pontine）沼澤的開墾區，意大利法西斯分子在1930年代開始了一些新城市項目。在德國，納粹分子通過攻擊魏瑪時代“非德國化”的社會現代主義住房積聚了忠誠者，國家社會主義者為黨員投資建設了一些反示范社區工程。他們用高聳的瓦屋頂和半木制房屋正面、用打破整排房屋模式的單家獨院方式夸張地表現守舊特征，建造了對社會現代主義的“文化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抗體。但是表達了這一立場之后，國家社會主義者轉向真正令他們感動的建筑：體現軍事化政黨忠誠性的帝國大運動場。在法國和斯堪的納維亞，大蕭條時期的國家有其他當務之急，顧不上模范村莊建筑。只有在美國，1930年代釋放的郁積政治議題中充滿了集體的、曾經想象過的共同體設計。[[883]](#_883_4)

如果說規劃構成新政者共同體理想的外殼，合作社則構成了它們的社會經濟核心。在“綠谷”城，“國際合作社”的旗幟懸掛在城市合作商店的椽木上。田納西流域管理局尤其是在第一任局長阿瑟·摩根領導下積極推動小規模合作社。該局的首批兩個合作社貸款給予了坎貝爾民俗學校的罐頭食品和乳品合作社。摩根在田納西流域管理局管理層的首要對手戴維·利連撒爾蔑視田納西流域管理局的手工藝合作社是經濟上過時的東西，但是積極推動地方公用事業合作社從事該局的電力零售分配。重新安置署農莊管理者用傳教士的熱情煽動合作社思想，夜間開課講解合作社經濟的原則。新政社區既是更深刻公民生活的實驗室，也是小規模民主經濟學的實驗室。[[884]](#_884_4)

在1936年，合作社的時刻似乎終于到來了。那一年馬奎斯·蔡爾茲的《瑞典：中間道路》成為政治暢銷書而流行。作為來自外國希望之鄉的報道，蔡爾茲的體裁和亨利·勞埃德、弗里德里克·豪威一樣悠久。蔡爾茲之所以能復興從前形式，一部分原因在于他激動人心的副標題，打動了不少感到歷史的鉗子正在夾緊的人的心弦——他們擔心陷入無法控制的資本與極權主義國家之間的兩難處境。另外一部分原因在于蔡爾茲高超的能力，把瑞典社會政治打包變成能夠跨越機構和文化差異的簡單易行的措施。

這種體裁本來就有弱化政治的性質，蔡爾茲很少觸及政治。他對瑞典的社會民主黨政府沒有多大興趣。瑞典在社會保險供應方面的長期落后狀態也沒有在他的描述中占相當分量。1930年代的瑞典是個后來的工業化國家，一個在社會經濟政策制訂方面的落后者，像新政者一樣在扮演努力追趕別人的角色。但是對于恩斯特·維格福斯的財政部“社會凱恩斯主義者”的經濟修正主義，蔡爾茲幾乎是一無所知。在蔡爾茲看來，中間道路不在斯德哥爾摩的政府辦公樓，而在瑞典的合作社團體。[[885]](#_885_4)

他承認，在英國合作社占據了比瑞典大得多的消費者市場份額。但是英國合作社的視野受到商店店主心態包圍，而正如蔡爾茲轉述的故事，瑞典合作社已經采取壟斷資本主義策略，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優化。當歐洲電力燈具卡特爾拒絕在價格問題上讓步時，瑞典合作社總社建造了自己的燈泡廠，讓價格回歸正常狀態。不接受橡膠托拉斯對于膠鞋的訂價，瑞典合作社自己建造膠鞋廠。在生產面粉、人造黃油、化肥等方面發生了同樣的故事。還有其他合作社在瑞典建設新的低成本住宅區。15%的斯德哥爾摩人已經生活在合作社中，其中有些就像著名的集體房屋（Kollektivhus）一樣擁有遠遠超過美國住房的設施。

蔡爾茲報道說，合作社人員沒有試圖消滅瑞典的資本主義，他們的成就在于通過“征服”它最原始、最具破壞性的特征，來讓資本主義“工作”。通過在最后壟斷階段之前終止資本積累，通過抑制不停息的積累過程，合作社充當了“防止資本主義走向自我毀滅”的作用。平衡是鑰匙。蔡爾茲寫道，“如果現代生活中，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兩個極端在某個地方達成平衡”，他肯定那個地方就是瑞典。在那里人們可以發現“穩定、秩序、衛生……整體性、健康，這些在現代是很少見的品質”。在這樣描述合作社的詞匯中，大西洋進步紐帶的獨特語言再次回來了。[[886]](#_886_4)

到了1936年秋天，在控制當年不斷攀升的消費品價格的熱烈討論聲中，一個正式的總統調查委員會再次從美國來到歐洲，考察合作社經濟是否能在美國實現。羅斯福告訴記者蔡爾茲的書使他“對瑞典產生濃厚興趣”。不過，他的批評家把“歐洲合作社調查團”看作選舉策略，就像從前的任何調查團一樣具有深厚的政治意圖。羅斯福在選舉季節早早派出這個調查團，又確保調查報告要推遲到選舉結束以后再公布。當農莊游說團反對政府漠視他們的利益時，羅斯福增加了兩個農民團體的席位。當女性提出她們作為消費者的需要受到忽視時，在中西部消費者合作社圈子中非常積極的愛米莉·貝茨也被吸收進來——因為來遲了，差點趕不上在歐洲的其他成員。[[887]](#_887_4)

但是羅斯福對于調查團的核心成員人選是確定無疑的。哈里·霍普金斯在公共事業振興署的主要助手雅各布·貝克，在大蕭條初期已經在紐約市管理合作社易貨貿易和勞工交流。有謠言說擬議中旨在推動消費者合作社的聯邦機構成立后，貝克會擔任領導。而曾經擔任勞工報社記者，現在是紐約州電力局工作人員的利蘭·奧爾茲，長期以來一直用半宗教半政治的語言來表達他對“個人主義疾病”的擔憂。當AE（喬治·羅素）被邀請在1930—1931年來美國演講旅行時，奧爾茲被指定作為負責人。他曾經在大蕭條初期和貝克一道組織易貨貿易組織。這個調查團工作還不到一個月，奧爾茲就給家里寫信說：“瑞典是更真正意義上的有機社會，比我們在美國想象的任何東西更好——除了在夢中。”第三個最初的成員查爾斯·斯圖爾特是煤礦工程師，在推動對蘇聯貿易方面非常積極。農業營銷合作社“全國合作社協會”的羅賓·胡德和《草原農場主》的克里福德·格列高里被認為是懷疑論者，但是貝茨是公開承認的支持者。[[888]](#_888_4)

從合作社調查委員會到農莊定居點，這些相互交織的合作社和社區政治的溪流在1936年和1937年開始達到最高潮。重新安置署有16,000名工作人員，現在是華盛頓第七大公民機構。華萊士和特格韋爾1936年11月到政府的南方農莊定居點做了廣泛宣傳的巡視。在上個月的一個星期天，有2萬密爾沃基人出來看“綠谷”城的街道設計和基礎建設。在接下來的一年里，又有60萬人參觀。其他人來到田納西流域管理局的諾里斯模范城鎮，旁邊是諾里斯公共水電大壩高聳的混凝土表面。馬修·約瑟夫森認為諾里斯是“全美國最漂亮的城鎮”，來到這里就好像“我們來到了新世界，五十年后的未來新時代”。在1936年春天，進步思想的波士頓商人愛德華·A.費林宣布成立百萬美元的“消費者分配公司”來推動組成消費者合作社。到了1936年，合作商店已經是十年前專家計算過的數量的八倍多；到了1938年，合作信用社的數量是以前的二十倍。亨利·華萊士在他1936年付印的書中總結這些相互交織的合作社努力，寫道“合作社生活方式肯定在社區流行開來”。[[889]](#_889_4)

最后，結合所有這些組成部分的是像丹麥民俗學校一樣大膽的成人教育工程。新政教育項目背后的推動力中，有一些不過來自對就業危機做出有利反應的欲望。對于政府的工作救濟計劃者來說，把失業教師安排在成人教育課堂比讓他們修路或者打掃街道在經濟上更有道理。但是新政者吸收了英國工人教育運動模式和丹麥民俗學校模式，對成人公民教育的承諾遠遠超過勞動力市場變化的考慮。

田納西流域管理局為了公共問題的討論發起組織了“人民的大學”。公共事業振興署舉辦“公共事務”課堂。在教育辦公室，約翰·W.斯圖德貝克推動了全國范圍的公共事務“論壇”項目，地方城鎮會議關于當時重要話題的公開討論。亨利·華萊士領導了農業危機的系列討論，匈牙利經濟學家卡爾·波拉尼領導了當代歐洲的系列討論，哈佛大學的托馬斯·尼克松·卡佛領導了“我們經濟體制基礎的重審”系列討論。美國住房管理局主辦了公共房屋住戶的公民事務論壇。聯邦緊急救濟署的一個部門舉辦了工人教育課堂，該單位的領導，“布林莫爾暑期工人學校”的希爾達·沃星頓·史密斯曾經在1920年代中期花費一年時間研究德國、英國、瑞典和丹麥的工人教育項目。布林莫爾學校贊助者凱里·托馬斯本人曾在1920年初期把大學的工人教育項目從牛津大學羅斯金學院帶回來。從這些線索和緊急勞工問題之中，新政者幾乎是一夜之間在美國組建了空前規模的成人公民教育項目。[[890]](#_890_4)

新政社會和公民教育的模式是城鎮會議，不是丹麥民俗學校的講課，也不是英國阿爾伯特·曼斯布里奇工人教育協會那種深刻的小組學習。但是組建合作社會團體這一目標同樣是美國計劃的核心。田納西流域管理局論壇領袖使用團體游戲和團體唱歌為聽眾活躍氣氛。聯邦緊急救濟署工人教育項目中的老師們接受勞工歌曲和民間舞蹈的培訓。在重新安置署，查爾斯·西格的音樂項目資助音樂教師在更大的農莊定居點常駐工作，尋找“人們已有”的音樂，幫助他們使用這些共同的文化基礎從“原始的個人主義”（西格的一位音樂家說的）轉化為“團體行動”。該項目發表的前兩首歌曲是從前農民協進會的歌曲“農民是養活所有人的人”和“合作是我們的目標”。[[891]](#_891_4)

當然，現在回顧起來，所有這些從農莊定居點到公民論壇的項目都缺乏它們宣稱的經濟民主。田納西流域管理局在雇傭實踐和服務方面有一條種族隔離的界線，并不比其他南方機構柔和多少。重新安置署為黑人和白人建造農場項目，但是沒有一個是讓兩種人平等混合的；綠化帶城鎮是專門為白人建造的。階級和權力的流行關系如種族關系一樣在新政社區項目上留下標記。斯圖德貝克的公民論壇在十年里變得越來越緊密控制和組織化。民間資源保護隊的教育項目從來沒有擺脫軍隊管理者的有力控制。在農莊定居點，常駐經理的權限非常大，而農場項目中居民的經濟知識卻太少。農業合作社往往野心太大而資源有限，其中的管理基本上是在農場管理者的褲兜里。綠化帶郊區更接近民主理想，但是它們也不能擺脫導致權力集中的經濟和機構壓力。由于想要在投機者提高價格前購買土地，計劃者最初的工作都是秘密進行的，甚至避開他們需要與之合作的地方當局。結果，因為除了聯邦政府以外沒有任何在憲法上可以接受的合法主人，綠化帶城鎮從來沒有真正擁有自主權。[[892]](#_892_4)

這些合在一起就成為嚴重的缺陷。雖然如此，如果按周圍流行的標準來對比衡量，新政社區計劃者有理由認為他們抵制的東西至少和默許的東西一樣多。他們想象的社區主要來自一代受挫的進步人士的抱負：經濟機會世界內一個理性計劃的島嶼，由委員會和城鎮會議組成的活潑的公民生活，像丹麥那樣密集的合作社，私人和公共事務獲得新的、更好的平衡，經濟少受大起大落的波動，社會更少極端個人色彩等。這些在其他地方已經零零碎碎地實現了的內容，在1936年的美國似乎不是無法實現的夢想。

和新政的農村項目相比，新政社區建設的都市階段進展緩慢得多。它是在組織良好的利益團體更加密集的環境中展開的。但是在這里，大西洋進步政治的動態也控制了事件的基本結構，從根據歐洲先例確定議題的專家群角色，到現成的政策建議在危機來臨時突破進入政治上可以實施的領域，再到立法過程最后階段重大商業利益間的爭奪。

這個階段新政者公民理想的核心是住房。羅斯福在1937年的時候說：“我看到國家三分之一人的住房破爛、衣衫襤褸、營養不良。”[[893]](#_893_4)實際上，在新政初期，把改變工人階級住房流行標準的努力列入國家支持根本就不是政府關心的內容。羅斯福本人也是在他人努力游說后才對這個想法感興趣。正如社會保障和農業重建一樣，公共住房是新政的社會政治歷史在危機政治動力搖撼作用下的產物。

糟糕的住房條件本身不是關鍵的動因。正如住房改革者長期以來堅持認為的，都市居住條件常常都很糟糕，這是人人皆知的常識。但是如果說大蕭條讓住房危機更加嚴重，就是比較復雜的問題了。當然，因為丟掉工作和多年的積蓄一夜之間蒸發，房屋租金也交不起了。國家的每個城市都冒出來失業者和無家可歸者的“胡佛村”（Hooverville）：在空余的地方、在鐵路調車場、在天橋下面、在當局睜一眼閉一眼不予追究的任何地方。在新房屋建設停頓的時候，工人階級家庭“過濾”進入中產階級騰出來的住宅的希望破滅了——這一開始就不是可靠的過程。達不到標準的房屋更破舊更糟糕了。與此同時，自從瑪麗·金斯伯里·西姆柯維奇的“擁塞委員會”在二十多年前開始工作后，過分擁擠問題減少了許多。在大蕭條時期新建設項目停頓下來，但從農村到城市的移民也暫停了，外國移民也幾乎停止，所以大大抵消了對現有住房存量的壓力。1930年代住房危機不是住房本身的危機而是收入危機，不是房屋和建筑危機，而是工資、房租和抵押貸款的危機。[[894]](#_894_4)

對于在新政中心的許多人來說，信用市場從一開始就是問題的焦點。政府在住房前線的第一個動作，即1933年的《房主貸款法案》，是用更寬松的重新融資條款讓破產的抵押貸款體系從困境中擺脫出來。后續措施如1934年的《全國住房法案》通過對眾多抵押貸款提供政府貸款保險，旨在開放私人對住房建設投資。兩個措施都是刺激經濟的老掉牙的傳統做法，用政府資助的肩膀去支撐私有市場暫時受挫的機器。支持中產階級房主以及為他們服務的銀行和建筑公司，這種措施顯然具有復興的潛力。

新政者要在這個項目外添加低成本住房建設，則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正如新政的其他許多方面一樣，1930年的社會政治是從前歷史的產物。四十年來，美國進步人士一直在大西洋住房政治背景下爭論為城市工人階級提供國營和準國營住房的優點。從1917年在馬薩諸塞州洛厄爾被遺棄的工人階級模范住房實驗，到1918年受英國啟發的緊急戰爭住房項目，到伊迪絲·伍德和凱瑟琳·鮑爾對于歐洲社會住房進步的報告，到三十年來國際住房大會上的辯論，沒有實現的改革議題在1930年代匯合在一起了。勞倫斯·威勒可能仍然以“與美國人的天才思想格格不入”為理由反對公共資助的住房，但是到了1930年代他的全國住房協會已經由其單一議題的項目萎縮成威勒本人的紙上規劃。[[895]](#_895_4)像新政的綠化帶城鎮和農莊一樣，公共住房是進步人士的過去在大蕭條時代政治可能性下的大爆發。

正如新政政策倡議的其他情況一樣，專家早在危機出現之前很久就已經完成了進步住房政策的基本大綱。目標是為收入達不到購買商品房要求的都市工人階級家庭等廣泛階層建設住房。對于住房改革者來說，公共資助的房屋提高住房標準、提供超出工人家庭渴望的社區設施是理所當然的。這不僅僅是建造住房而是改善鄰里關系和增強社區團結。他們想當然地認為它將結合歐洲革新的最好成果。

1930年代初期專家項目的關鍵成分是歐洲大陸那種有限贏利公司和合作性住房協會，獲得廉價的、長期的公共信用貸款幫助。這是伊迪絲·埃爾默·伍德1922年從歐洲帶回來的政策。這是背后的金融發動機，推動了在魏瑪德國曾經點燃鮑爾的想象力的社會民主住房；也推動了在瑞典激發馬奎斯·蔡爾茲的住房合作社。在紐約市住房進步人士的鼓動下，州長阿爾·史密斯成功地讓同樣措施的弱化版本在1926年州議會通過，給予建設體面的低成本住房的非贏利或有限贏利建筑商稅收減免（但不是低成本國家貸款）。在利用該法案的首批項目中有服裝工人聯合會的住房合作社。[[896]](#_896_4)

在那些游說紐約法案的人中，最著名者是格林威治館的瑪麗·西姆柯維奇，她二十年前曾經擔任紐約市擁塞委員會的主席。自從1890年代在柏林做經濟學研究生的時代開始，西姆柯維奇就在她個人身上織入了美國社會政治相互交錯的大量線索。她曾經是弗洛倫斯·凱利在全國消費者聯盟中的主要盟友，是在下曼哈頓區興建公共澡堂和公園的積極推動者，是亞伯拉罕·艾普斯坦美國養老保險協會的理事，自1931年起擔任樂觀地稱為“全國公共住房協會”的游說團體領袖。她是1912年進步黨的黨員，1917年的戰爭集體主義者，1919年的48人委員會“呼吁書”簽署人之一，1932年的羅斯福支持者。在政府的前一百天緊張情緒中，西姆柯維奇說服了參議員羅伯特·瓦格納在《全國工業復興法案》中添加住房改革者長期以來渴望的社會住房項目：給予建造體面的低成本住房的市政當局或者有限贏利住房協會提供長期的補貼性貸款。[[897]](#_897_4)

像西姆柯維奇在1933年的干預一樣，1930年代剩余時間的公共住房政策倡議主要來自政府核心圈子之外。羅斯福的立場模糊不清，不輕易表態。參議員瓦格納辦公室起草的住房法案初稿是西姆柯維奇所在的全國公共住房協會執筆完成，該協會還作為參議院聽證會上的專家證人。公共住房是政府外形成的社會政策擠進危機造成的暫時政治機會的經典例子。[[898]](#_898_4)

大西洋紐帶在公共住房努力中發揮了積極作用。1934年在《全國工業復興法案》下組織成立的最積極的城市住房協會——“紐約市住房局”就是一個說明問題的例子。在首批五位理事中，有三位海外關系眾多：與睦鄰中心有關的律師路易斯·品克，在擔任紐約州住房委員會成員的1927年就開始從歐洲公共資助的住房建設中尋找可吸收的經驗；《猶太前進日報》的查尼·弗拉德克，長期的城市社會主義者和勞工住房鼓吹者；以及西姆柯維奇本人。該機構的首席建筑師是弗里德里克·阿克曼，他從英國發回的報道讓戰時美國了解有關英國軍需部住房工作的新聞。[[899]](#_899_4)

為了保持更廣泛的公眾興趣，全國住房協會的官員在1934年夏天安排國際住房委員會三人小組到美國來。由雷蒙德·昂溫率領的代表團進行了為期7周、途經14個城市的演講和參觀旅行，高潮是在10月份召開的全國住房改革者領袖會議上發表了建造低成本公共資助住房的美國呼吁書。該會議公報主要由昂溫本人執筆，簽署者包括了美國最著名的住房改革者：阿克曼、西姆柯維奇、紐約市住房局的朗頓·波斯特、伊迪絲·埃爾默·伍德、凱瑟琳·鮑爾、奧斯卡·斯通諾羅夫、勞工住房協會的約翰·埃德爾曼、來自城鎮規劃協會的約翰·諾倫和雅各布·克萊恩、來自劉易斯·芒福德圈子的亨利·萊特和阿爾伯特·梅耶、來自田納西流域管理局的特里西·奧格爾和厄爾·德雷珀、1918年戰爭住房項目的羅伯特·科恩，甚至還包括1914年到英國旅行的全國住房協會經理約翰·伊爾德。負責協調昂溫演講旅行和最后會議的是克爾曼·伍德伯里，他1926年和1927年曾作為羅茲獎學金獲得者在英國獲得住房問題的初步訓練。[[900]](#_900_4)

西姆柯維奇的全國公共住房協會領導人全都是經驗豐富的歐洲觀察家。為了獲得選民的支持，執行秘書海倫·阿爾弗雷德從1936年到1938年每年舉辦歐洲住房考察旅行，時間正好選在國際住房和城鎮規劃聯盟開會的時候。[[901]](#_901_4)我們已經看到，勞工住房協會接受歐洲影響的程度也一點不差。

一個經過大西洋途徑從住房愛好者到住房專家的典型例子，是亞特蘭大的查爾斯·帕爾默的新政生涯。作為共和黨人和房地產開發商，帕爾默首先被公共住房主張所吸引是由于在安排公共住房土地分配時獲得的傭金。在1933年和1934年，他負責公共工程署（PWA）的早期貧民窟清理和改造工程，一個為白人，一個為黑人，都在亞特蘭大鬧市區。由此受到低成本住房思想的吸引，他沒有動身前往查爾斯頓、阿拉巴馬州的伯明翰或者紐約考察貧民窟，而是到歐洲認真研究了公共住房兩個月。從那不勒斯到維也納、莫斯科、柏林、倫敦，返回后做了巡回演說和自制的電影《反對貧民窟的世界戰爭》。他把演講和電影帶到任何能去的地方：建筑商會議上、住房改革聚會上，以及實行新政的華盛頓，在那里他把電影放給農業部的亨利·華萊士、聯邦緊急救濟署的哈里·霍普金斯看，給公共工程署的住房司工作人員看，到內政部大型聚會上給珀金斯和伊克斯看，最后通過埃莉諾·羅斯福的引見，1937年初在白宮晚宴上給羅斯福本人看。[[902]](#_902_4)帕爾默這個項目把對美國企業精神的無限信仰與公然從“紅色”維也納吸取的財政計劃拼湊在一起，他確實是住房領域的怪人。但住房運動鼓吹者中絕非只有他的項目是在跨越大西洋的公文包中帶回家的。這個說法同樣適用于路易斯·品克、1937年被羅斯福任命為美國住房局第一任局長的內森·斯特勞斯（梅西百貨商店的繼承人）、前一代的伊迪絲·伍德，當然還有凱瑟琳·鮑爾。[[903]](#_903_4)

當住房改革者把游說努力轉向華盛頓特區的時候，他們的紐帶和影響力也隨著過來了。西姆柯維奇團體在國會中的主要支持者羅伯特·瓦格納經常到歐洲考察，那里還有他親密的家族關系。隨著住房問題在1936年成為前沿問題，他把夏天在歐洲旅行的大部分時間用來進行住房研究。勞工住房協會在國會的出頭人亨利·埃倫伯根出生在維也納，了解那里的社會主義大型住房項目。在瓦格納召集的十四位專家來審查1936年初期的瓦格納—埃倫伯根法案時，至少七個人對歐洲住房項目有第一手的、詳細的了解。在1936年和1937年法案最終版本的國會斗爭中，瓦格納請了其中兩位：勞工關系背景豐富的克爾曼·伍德伯里和凱瑟琳·鮑爾。隨著時間的推移，低成本公共住房本土經驗有所積累，歐洲專業知識的價值開始下降。但是在公共住房從想法到可實行措施的運動中，起關鍵作用的是實踐經驗，實際上也意味著熟悉作為社會政治實驗室的歐洲。[[904]](#_904_4)

引用的歐洲經驗與美國經驗抗衡，兩者在復雜的對比中發生相互作用。在1934年秋天紐約市住房局在現代藝術博物館組織的住房展覽開始時，讓參觀者的視線集中在國內情況。展覽的墻壁上掛著城市貧民窟的揭露性照片，中心展品是黑暗、擁擠的“舊法律”紐約市出租屋的真實大小重建模型。但是光靠揭露消極面無法動員切實可行的社會政治。如果沒有社會能想象到的苦難解決方案，就沒可操作的政治空間。在揭露了美國住房現狀的糟糕一面后，展覽組織者帶領參觀者來到已經準備好的替代性未來前景，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鮑爾、芒福德等人從歐洲帶回來的住房照片。“海外的實現”，這部分的標題寫道，“為什么美國的工人不能住在這里？”阿爾伯特·梅耶在1934年的《國家》雜志上問：“美國的貧民窟居住者怎么知道體面的住房是什么樣子？”這個設問句強調了與大西洋政治并列的動態關系：“他們怎么能知道呢？……因為他們從來沒有到過德國、荷蘭和英國。”[[905]](#_905_4)

正是大西洋進步紐帶以所有這些方式和沿著所有這些道路，為新政早期帶來除了對出借者和抵押者的緊急援助之外的東西。公共住房是歐洲社會政治的分支，被站在歐洲同行肩膀上建立起自己專業知識的進步人士納入大蕭條時期的議程。在轉移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現了修改。

最出人預料的棘手問題是管理。問題似乎在1933年時就已經基本確定了。在奧地利和英國之外，歐洲工人階級住房建設的繁重管理工作是靠有限贏利房屋公司——有慈善機構的，有以勞工為基礎的，也有合作社的。這種做法比英國上層臃腫的管理機制更符合美國管理的傳統。它是靈活的、自愿性的，而且是經過認真測試的做法，與新政者想象中的團結正好吻合。它在一個更簡單的世界美國也應該能成功。

危機態勢能暫時撬開政治結構，把為低成本住房提供公共貸款提上議程，同樣也能給速度提出特別的要求。速度是有限利潤項目垮臺的原因。在《全國工業復興法案》影響下，公共工程署的住房司向申請者開放。針織品工人的麥克利住宅區是最早和最好的項目之一，但是在該司審查者收到的其他五百份左右的申請中，只有二十份申請值得資助，其中只有七個項目最終建成。最積極的申請者是小規模投機建筑商，他們在任何形式的利潤都和兩美元面值的鈔票一樣稀缺時，非常愿意把企業臨時變成有限贏利公司。除此之外，備選項目是稀少得讓人尷尬。某些在1920年代發現模范住房是吸引人的投資的大保險公司現在變得小心翼翼，不大情愿；大慈善團體陷入資金短缺的困境；在世紀之交的德國低成本模范住房融資方面發揮重要作用的國家社會保險基金根本不存在。至于在魏瑪德國等地處于低成本住房建設核心的合作社和工會團體，在美國還是無法在一夜之間填補的巨大缺口。美國高度稱贊的那種積極的、自愿的非贏利協會也很難找得到——至少在1930年代的困難時期，難以很快找到特別關心住房問題的這類協會。[[906]](#_906_4)

在批評家呼吁要看到人們在1933年代后期返回工作崗位時，公共工程署突然從補貼主義原則轉向集中管理的項目，按照1918年戰爭工人住房項目的路線直接建設低成本住房。哈羅德·伊克斯迫切渴望集中控制。住房司的主任羅伯特·科恩曾經擔任戰爭期間緊急船運公司房屋建設部的主任。沿著過去政策經驗的常規，緊急政策制訂再次啟動。

公共工程署的住房司在從1934年到1937年的三年時間里做了英雄般的工作。它建造了成群體、成社區的小規模住房，其空間和設施標準遠遠超過周圍工人階級住房，同時還有商業公寓建筑所沒有的社區公共設施。許多包括衛生院、洗衣房，以及十年來作為歐洲良好工人階級住房標志的公共活動中心。全部是黑人的哈萊姆河社區擁有護士學校、城市網球場和手球場、社區報紙、房客協會、公共事業振興署老師開設戲劇和舞蹈課程的社區會議室，還為學童提供下午托管的服務。劉易斯·芒福德稱哈萊姆河社區是人們能在1938年的紐約發現的最接近住房理想的項目了。這是美國式定居點建筑（Siedlungsbau），不僅是建造居住場所，而且是在建造工人階級社區。因此，都市公共住房與綠化帶城鎮和農莊村鎮，與合作社和公民論壇一起，成為一個超越價格和利潤的、可以實現的世界的代表。[[907]](#_907_4)

但是，所有這些是1936年和1937年的緊急工作。重新安置署是行政上的權宜之計，是建立在行政命令而不是國會立法基礎上的。公共工程署住房司是羅斯福政府前一百天的緊急公共工程授權的延伸，兩者都沒有嚴格的機構或者政治基礎。在從權宜之計向永久機構過渡的過程中，利益團體就有了機會。

社區活動中最脆弱的部分是重新安置項目。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繞過農業代理人—商業農場主聯盟，盡最大努力讓重新安置署和已經形成的農業游說團體絕緣。他為該局安插了不受通常政治主張影響的外來者：聘請迪拉德大學校長威爾·亞歷山大擔任副署長，兩個司長來自他自己所在的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第三個司長來自北卡羅萊納州立大學農業社會學系。但是部分因為特格韋爾本人是個大嘴巴，爭議太多，更多因為重新安置署的工作領域與現有投資者、固定的政治立場過分緊密地糾纏在一起，要擺脫政治干擾是根本不可能的。由于新政的公共設計的本質，設計者的工作不可能長期秘密進行，他們的失誤、超越限度的開支、種種缺點和效率低下勢必立即成為新聞記者、政客和受到威脅的利益團體做文章的材料。

到了1936年羅斯福的批評者們已經從重新安置署的工作中找到政治突破口，如“特格韋爾城鎮”、“共產主義”農業觀念、不切實際、“外國”觀點等。在羅斯福的批評者們看來，政府郊區是新政集體主義發瘋的標志：馬里蘭州的莫斯科，《芝加哥美國人》刊出的大幅標題稱之為“美國首批共產主義城鎮”。到了1936年5月，詹姆斯·法雷警告羅斯福說：“共和黨人攻擊最激烈的兩點是公共事業振興署和特格韋爾。”隨著1936年12月安全地度過選舉，在總統親自前往馬里蘭州視察“綠帶”市給足他面子后，讓特格韋爾從政府辭職。但是他的辭職并沒有改變多少政治情形。[[908]](#_908_4)

利益團體和意識形態都對新政的社區和合作社項目不利，不管計劃者轉向哪個方面，都有宣稱要保護自己領域的既得利益者。私人建筑商和土地開發商從一開始就對政府建造郊區大為光火。在1936年還沒有結束的時候，他們就獲得法院的裁定，宣布計劃中的第四個綠化帶城鎮（準備在新澤西建設）超越了聯邦政府“普遍福利”的范疇。政府不去挑戰這個裁定，只是努力進行其他的三個城鎮建設，放棄了建造更多的計劃。醫生認為重新安置署的健康合作社是政府管理醫藥的壞苗頭。已經在和連鎖店進行競爭的零售商認為，政府資助的零售合作社這一幽靈是已萎縮行業的另一個競爭對手。由于顧問警告他要防止中下層階級零售店主代表“百萬小商人”造反，羅斯福把合作社調查報告裝進口袋，悄悄地讓關于瑞典的討論平息下去。[[909]](#_909_4)

至于說農民，雖然他們樂意擁抱政府給予的廉價貸款、按優惠價格買斷農產品等經濟刺激政策，但其中最有組織的農民根本不想要可能把美國農村底層道軌翻到上面的社會重建實驗。在《農業調整法案》下佃農的福利已經在1935年初讓新政的左右兩派進行激烈和尖銳的斗爭，使得農業部中鼓吹佃戶利益最激烈的人丟掉了工作。對于重新安置署為南方農莊定居點居民墊款來支付人頭稅的政策，保守派激烈抗議。在市場陷入極端不景氣時，商業農民決不是政府資助的額外競爭者的朋友。[[910]](#_910_4)

對于這些反對聲音，地位穩固的農業合作社沒有提供有分量的反駁觀點。牛奶生產者大合作社在1936年已經拋棄了和新政的合作，因為牛奶生產者反對產量控制。合作社社會政治變色龍般的反復無常在政府和農業合作者的緊張關系中被玩盡了。在歐洲，即使在合作社運動和以勞工為基礎的社會民主黨形成正式或者隱含的盟友關系時，它們對政府也保持高度的警惕。合作社運動從英國的洛奇代爾集團以來就把自己包裹在不受國家干預的有機增長敘述中，而這種敘述是不符合事實的一面之詞。“合作社調查”期待找到一個歐洲權威來認可政府應該有意識地開展合作社運動，這種尋找注定是徒勞的。甚至合作社調查組的利蘭·奧爾茲也很快得出結論說“合作主要在自發情況下產生，有它自己的土壤和根源”。但是當歐洲合作社運動在又要反對大資本主義又要警惕國家干預的狹窄道路上艱難前行時，美國的農業市場合作社卻很少猶豫不決。合作社調查組的羅賓·胡德在1936年初期的農民聚會上說：“農民合作社不反對資本主義，農民是真正意義上的資本家。”有經驗的觀察家可能發現在1930年代大農業營銷合作社和美國商業農民游說利益團體之間有一個界限，但是它確實像蛋殼一樣薄而易碎。[[911]](#_911_4)

讓利益團體的反對更加復雜的是意識形態爭論。半個多世紀的農業佃戶實踐都沒有消除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把人的尊嚴等同于擁有單家獨院的房屋和自家的農場。農莊定居點的住戶中很多把政府租賃作為暫時措施，他們可以在這里積攢點錢，希望將來離開這里去買一塊屬于自己的土地。許多南方進步人士也是這樣的思想。到1935年初，阿拉巴馬州的約翰·班克海德已經在積極游說要幫助佃農爬上“農業階梯”成為個體農場主，當初是他對《全國工業復興法案》的修正案使得第一批生計社區開始運轉。特格韋爾在1937年初曾說過一段話，這是讓他陷入政治困境的命題之一：“農場所有權？是的，對某些人來說在將來某個時候是可能的——在適當條件下，在他們自愿選擇并且清楚了解成本，并表現出自己的上升潛力之后。但是現在，對于很多人來說最重要的是治療疾病，改善孩子營養狀況，得到一頭騾子、種子和肥料，進城的時候有體面的衣服穿，對未來有些盼頭，在每次農場和家庭危機時候有個好幫手。”但是特格韋爾在1937年就離開了政府。他的繼任者威爾·亞歷山大承認：“農村人想的……是個人農場；人們的心里還是希望擁有個人農場。”[[912]](#_912_4)

所有權是更具美國特色的農業方式，但又一次體現出時代標志的是：農業進步人士為了推廣它，再次從歐洲借鑒先例。這次的杠桿支點是愛爾蘭和丹麥土地改革措施。在第一個班克海德農業租賃法案的聽證會上，亨利·華萊士1912年從普倫基特之家看到它的結果后，重新講述了格萊斯頓的愛爾蘭土地購買項目的故事。作為新的“小農場所有權全國委員會”主席，克拉倫斯·坡舉出丹麥和愛爾蘭土地改革的例子。很快被任命為總統“農業租賃委員會”負責人的L.C.格雷證實：“美國是有影響的文明國家中唯一一個沒有采取矯正租賃罪惡制度的國家。”他向參議院委員會保證土地改革中沒有任何“新的”或者“沒有嘗試過”的措施。羅斯福在1936年選舉前批準這個項目，同樣引用了愛爾蘭和丹麥的先例。[[913]](#_913_4)

到了1937年9月，重新安置署已經被新的機構“農業安全署”（FSA）所替代，目的是吸收老機構的工作，同時受命給予自耕農理想第二次機會。像重新安置署一樣，農業安全署的主要工作是管理陷入困境的農業家庭的復興貸款。但每年撥出5000萬美元來推動更多農村人進入小農場主行列。因為有這筆錢，農業安全署被授權購買農場，重整土地防止水土流失，翻修房屋和糧倉，把農莊以長期貸款的方式賣給當地縣委員會認為有能力擁有農場的佃戶。激進的“南方佃農聯盟”代表反對，他們認為這個項目轉移了合作農場定居點的信仰，鼓勵了“經濟無政府主義，注定要失敗”。1935年農業部清洗的受害者之一加德納·杰克遜告訴國會，時代需要“新的農業組織形式”，那“必須是公社或者村莊農場經濟”。進步人士的“南方政策協會”也提出了同樣的觀點。[[914]](#_914_4)

實際上這兩個理想并非完全對立的。如果丹麥先例說明了什么的話，那就是：在大規模資本控制的世界里小農場主如果沒有合作、互助、教育性協會的支持網絡，單獨行動是無法成功的。需要有普倫基特和丹麥其他農業生活改革者花費巨大心血組織推動的合作乳品廠、民俗學校、信用合作社等等。農業安全署的計劃者試圖悄悄地把需要的零碎措施結合起來。在處境艱難的佃農和小農場主之間，農業安全署的工作人員推動組織小合作社、討論小組、合作醫療協議等。通過反對那些依靠政府資助購買土地的佃農隨意出售新買的土地，避免公共投資再回流到投機性土地市場，農業進步人士贏得了重要的象征性勝利。農場定居點也繼續保持了下來，雖然班克海德法案的附加條款規定不再建設新居住區。[[915]](#_915_4)

但是農業安全署的努力規模太小，無法建立能夠維持新政社區和合作社項目的政治選民群體。甚至農業安全署的佃戶購買土地計劃，在每年增加40,000新佃農的增長速度下也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到了1947年國會徹底關閉農業安全署的時候，它已成功地讓47,000個佃戶家庭成為農場所有者，其中大部分為白人而且剛開始基礎就比較好。愛德華·班菲爾德計算說，按照這個速度消除農業租賃需要未來400年時間。[[916]](#_916_4)南方數百萬佃農的出路問題被留到戰后市場推動的把人員和貧困向北方城市轉移的過程。新政社區項目作為私有財產體制中的怪種被一個又一個拋棄。艾爾伍德·米德的農場定居點的最后一個殘余在1948年也停辦了。同一年，一家商業開發公司購買了田納西的諾里斯。綠化帶郊區在1950年到1954年間被全部出售。

新政社區計劃者把各種借鑒拼湊起來，本來打算看看能否創造出另一種選擇來取代土地和農業的私有市場、孤立的農場、投機商建造的郊區、不限制繼承的不動產所有者。災難時期的智慧經濟學給予他們正常時代所沒有的優勢。在1930年代初期的不確定性中，長期以來吸引了在歐洲的美國進步人士想象力的現成計劃、合作社項目、對于“有機”村莊和小城市的設想等，都找到了實施的機會。在當今更加沾沾自喜的孤立的美國，現在仍然能發現他們被埋沒的工作的遺跡。不過，這些在特定環境和動態影響下的建設注定是不能長久的。面對充滿敵意的公開宣傳和頭重腳輕的擔憂，它們沒有能在起初那種例外條件之后維持下去的資源。

住房領域的最后激烈爭奪更加復雜。受歐洲啟發的進步人士最先提出來長期建造聯邦資助的低成本住房。西姆柯維奇的全國公共住房協會和鮑爾的勞工住房協會都在1935年的國會上提出法案，后者在當年秋天的轉變中獲得美國勞工聯合會的支持。當不同法案在參議員羅伯特·瓦格納的辦公室并成一個后，統一的公共住房措施在1936年獲得參議院的通過。第二年，認識到法案通過迫在眉睫，政府最終參與進來，雖然支持的理由與西姆柯維奇和鮑爾的不一樣。當英國經濟復興的消息在1935年和1936年滲入華盛頓后，一些新政者開始認識到英國經濟復興與持續對工人住房的公共投資之間的關系。工黨的倫敦市政議會議長赫伯特·莫里森在1936年初期把消息帶給華盛頓，羅伯特·瓦格納等人接受了。在政府機構內部，一批最初的凱恩斯主義者開始聯合起來，相信復興最終取決于簡單的增加國家開支。因為這個推理的邏輯，大型公共住房建設項目有許多吸引力。1936年瓦格納—埃倫伯根法案的聽證會上充斥著這樣的言論，既來自非常熟悉英國的專家也來自工會發言人。[[917]](#_917_4)

所有這些觀點圍繞著永久性低成本公共住房項目聯合起來了。為大眾提供公共資助的住房是健康和衛生措施，也是民主派工人和消費者的住房運動可能據以生長的中心點，也是讓失業者重新獲得工作的方法，還是刺激整體經濟復興的政府投資措施。社會資助住房觀點背后多種不完全吻合的理由是社會政治的典型特征。問題不在于連貫性，而在于專家會議起草的措施進入利益團體的日常政治斗爭后會出現什么樣的后果。

住房法案的反對者中有些希望公開拒絕。布朗克斯納稅人聯盟的主席在1936年參議院聽證會上說瓦格納措施是“不動產私人所有權終結的開始”。在這個議題上，主要的反對團體如美國商會、美國建筑和貸款聯盟、全國不動產協會、全國木材零售商協會等都已經動員他們的支持者幾個月了。但是在1937年隨著聯邦住房法案的通過看來不可避免，他們采取了把守對他們來說唯一真正重要防線的立場。國家為最窮的人提供政府住房是可以接受的，但前提是住房市場的其余部分必須清楚地擺脫被侵占的命運。這就意味著為最貧困者建造的住房——為現有貧民窟住戶實施的貧民窟改造。[[918]](#_918_4)

西姆柯維奇和全國公共住房協會并不是完全不同情貧民窟住房項目。對于公共住房運動的社會工作和睦鄰中心派別來說，似乎非常明顯的是公共住房應該扎根于房屋標準最差、離需要重新安置的人口最近的地方。[[919]](#_919_4)相反，鮑爾一派認為內城重建是個經濟陷阱。貧民窟土地購買是貧民窟地主的天賜良機，貧民窟改造意味著支持現有的價值結構，即從聽任房屋毀壞的主人那里購買達不到標準的房產。這意味著給社會住房加上高得驚人的土地成本和非常有害的環境限制。這意味著確定工人階級住房設計新標準的終結，也意味著住房的社會民主思想的失敗。[[920]](#_920_4)

在1934年演講旅行的每一站，雷蒙德·昂溫都表達了同樣的觀點：成功的公共住房項目不能從貧民窟開始。他警告說，公共住房需要建立工人階級牢靠的政治支持，然后才能處理貧民窟改造產生的棘手的補償價格和土地價值問題。昂溫認為在歐洲任何地方，成功的公共資助住房項目都不是從窮人而是從工人階級開始的，包括工作穩定的、中等收入水平的技術工人在內。1937年被美國請來傳播英國公共住房工作經驗的理查德·萊斯提出了類似觀點，從貧民窟改造開始是“完全錯誤”的。[[921]](#_921_4)

但是大西洋潮流已經轉向其他的結果。只有英國和丹麥在低成本住房建設上一直到1930年代中期還維持著高昂的公共投資。瑞典低成本住房政策的獨特工具，即城市大量購買土地和由合作住房協會進行建設，在1930年代的美國從政治上說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維也納和德國實驗成為廢墟，美國人的注意力越來越多地轉向英國。查爾斯·帕爾默1934年曾穿越整個歐洲尋找低成本住房的觀點，但是在1936年第二次旅行時，他已經肯定他需要的東西都可以在英國找到。1935年內森·斯特勞斯懶得把其他國家納入自己的日程安排中。在合作社和有限贏利建筑商缺乏的情況下，顯然是英國式公共住房管理機制應該來完成美國的任務。[[922]](#_922_4)

在這個背景下，英國住房政策1930年代中期重新返回貧民窟改造，對于大西洋彼岸的美國就具有了特別的影響力。從政治上說，貧民窟是保守派項目。感覺到英國的郊區建設任務大部分已經完成，大蕭條初期短命的工黨政府為內城改造增加了新補貼。但是在1933年，保守派控制的繼任政府終止了所有其他住房補貼，把英國項目的重點全部放在貧民窟清理和改造上。在相當程度的吹噓下，政府承諾五年時間內消滅貧民窟，提出了拆毀和重建五十萬套住房的計劃。在1919年法案的遺留規定中，地方政府有權按土地價格征用和購買破爛的貧民窟財產，即不需要額外賠償建筑物費用或者支付房主的租金損失。英國貧民窟戰役的成功可能與政府苛刻對待貧民窟所有者的投資密切相關，這一點在向國會介紹英國政策轉變的報告中幾乎沒有提到，雖然昂溫等人努力要指出這點。貧民窟清理和改造有不動產利益團體的支持；到了1930年代中期，它已經出人意料地獲得了跨越大西洋范例的標記。[[800]](#_923_3)

隨著貧民窟改造的暗中布局，法院手中的牌（對美國進步人士來說，這始終是個不利因素）擁有了更大的價值。法院沒有阻礙新政者住房方面的最初行動。公共資金注入私人抵押貸款或者抵押擔保沒有遇到多大困難就獲得法院的許可。在經濟刺激政策中，社會和經濟重新分配的因素相對來說總是容易掩蓋的；但是在縮小商品化物品的規模時，社會政治不可避免地激化了所有權問題。在司法系統的某些部分，那種認為政府住房建設不屬于“公共用途”的主張在1937年仍然是普遍規則。最有效的反駁觀點（在1936年紐約上訴法院的裁決里得到最清晰地闡明）是：公共住房帶來公共安全利益，因為它是整頓滋生犯罪和疾病的貧民窟整體社會環境的一部分。但是，整個工人階級的公共住房項目很難由此而得到明確認可。[[924]](#_924_4)

住房改革運動的兩派都抵制參眾兩院修正案的殘局。但是因歐洲先例不利于廣泛的住房項目，而且憲法問題又懸而未定，不動產游說團體、建筑和貸款協會、商會等很快把瓦格納法案削減到最不受反對的內容：為窮人建造便宜的公共住房。新的美國住房局建造樣板工程的權力被剝奪，對于鮑爾來說非常寶貴的有限贏利公司和住房合作社從法案中被刪除了。只有當地住房管理局可以獲得新聯邦住房貸款，只能為“最低收入群體”建造住房——“低收入群體中的最低者”，參議員大衛·沃爾什在辯論中這樣堅持，且每單元的成本不得超過5,000美元。而公共工程署在東北都市區的平均成本都超過7,500美元。[[925]](#_925_4)

即使在1920年代住房建設的高潮時期，私有建筑商也沒有有效地為收入最高的三分之一人口以外的人建房子。[[926]](#_926_4)房產商利益團體的目標不是保持現有市場免受國家競爭，而是搶先占有現在還沒抓住的市場、在當前經濟條件下無法填補的空間。因為擔心大量增加新房子會減少老房子的價值，公共住房當局每建設一幢新房子，必須在貧民窟購買和拆除相應的房子。因為拒絕了英國的拆遷補償經驗，貧民窟房屋的價格交給法院來裁決，結果可想而知。

美國住房局的首任局長內森·斯特勞斯兩年后寫道，1937年的《住房法案》“是根據世界上最成功的公共住房經驗——英國經驗而制訂的”。在重要意義上，他是對的。住房法案比多數新政措施更多地不僅吸取了歐洲過去的經驗而且吸取歐洲當前實踐的經驗。1930年代住房改革者在大西洋兩岸來回穿梭，演出了在兩代人里一直是跨越大西洋進步紐帶特征的角色和關系。共同的社會政策競賽語言是他們的第二天性。查爾斯·帕爾默在1937年參議院委員會聽證會上說：“我們國家的唯一問題應該是：怎樣快速地趕上世界其他地方？”[[927]](#_927_4)

因為大蕭條中的美國人排著隊渴望獲得新住房計劃中的房子，從表面看，解決這個問題很容易。在1937年法案下建造的第一批住房項目被申請者包圍，紐約市的皇后橋住宅區工程有16,000個家庭申請，在布魯克林的紅鉤社區工程有62,000個家庭申請2500套房屋。鮑爾在1937年進入美國住房局擔任研究和信息部主任時，非常自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其工作任務會越來越多，而不是越來越少。在社會供給方面擴張是太常見的現象，1939年和1950年的《社會保障法》修正案就是說明問題的重要例子。鮑爾輕描淡寫法案在國會斗爭中的失敗，認為國會通過的住房法案“雖然受到重創但仍然可以使用”。在1940年代后期，住房改革者相信國家將通過有限贏利公司和住房合作社，為中等收入的三分之一人口建設第二撥的公共資助住房。[[928]](#_928_4)

但是針對窮人的公共政策和針對工人階級的公共政策之間的差距不管從統計學上看多么狹小，在政治上是巨大的：要跨越這個差距就要克服意識形態的雷區，在政治上也是危險的。從非窮人開始，社會保障的支持者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增多；從窮人開始，美國的公共住房從來沒有能成功脫離最初的起源。夾在貧民窟的土地價格和國會規定的成本和收入限制之間，鮑爾想在商業市場之外建立工人階級住房和社區設計新標準，這個希望就成為難以實現的空想。在美國沒有閃亮的羅默斯塔特，沒有工會支持的陶特住房那種大手筆馬蹄形社區，沒有更多麥克利房屋，沒有瑞典的住房合作社，甚至沒有英國體面的、低成本郊區工人階級住房散亂擴展的海洋。當美國“住房和貸款聯盟”在1937年提醒其成員在美國《住房法案》下不可能有“廣泛的、不受限制的”住房項目時，其判斷顯然沒有錯。[[929]](#_929_4)

到了1940年代初期，鮑爾本人已經擔心伴隨美國式公共住房的“致命的慈善味道”。高度和規模被推得太高，建筑成本的削減已經造成結構猙獰，內部空間減少到最低生存保障（Existenzminimum）的限度。合格條件被弄得太死板，家長式管理作風太明顯，住房項目和需要住房的團體之間接觸太少而且效果太差。她寫道：“不利于公眾支持公共住房項目的最大障礙是‘社會工作—對付犯罪和疾病’的印象，這是我們在30年代起步時不可避免而留下的印象。”從最低收入住房到工人階級住房的突破需要更多政治資源，這是美國進步人士無法實現的任務。正如后來結果證明的，國會建造的不過是另一種濟貧院。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最初的房屋大部分籠罩在魏瑪現代主義勇敢的、新鮮的審美觀點中，雖然現在看它悲慘地遭到挫敗。[[930]](#_930_4)

新政公共住房是大西洋社會政治的勝利，同時也表明這種關系中的障礙和局限性。歐洲例子給美國一小片住房市場的去商品化提供了政治推動力。社會政治的領域再次跨越了北大西洋世界。但是美國的公共住房在借鑒過程的政治中改造了歐洲經驗。它努力要趕上歐洲標準，使美國人再次脫離了例外主義的軌道。誕生于當時仍然把北大西洋社會政治結合在一起的影響和競爭、借鑒和修改的體系中，它是具有鮮明美國特征的產物。實際上，把這些話用在新政本身，也是完全適當的。

通過所有這些渠道，越過所有這些障礙和改變，大西洋進步紐帶中一直被攔蓄的內容傾倒給新政。20世紀的美國政治議程再也沒有像1930年代吸收歐洲那么多政治思想。但是在1930年代，行動和語言之間的差距擴大了。即使在新政者把大量外國經驗納入法案時，即使在推動黨內自由派接受歐洲風格的社會民主政治時，他們的世界主義也遠沒有從前的進步人士那么強烈。他們更傾向于把對外國經驗的參照隱藏在懷疑和偽裝后面。

1930年代的有些回避和扭曲是羅斯福的行為——他是在分歧中間建立同盟的藝術大師。還有更多扭曲是對新政反對者語言的一種策略上的反應。自從醫生和保險公司顯示尖頂頭盔和“德國造”指控能夠輕易破壞醫療保健的經濟學后，一旦面臨反對者指控該項目不愛國、與美國政治獨特的天才格格不入，世界主義進步政治的脆弱性就暴露無遺了。“我們用對比的術語討論了這么多發生在挪威、瑞典、英國等地的情況，”國會議員埃弗里特·德克森在1937年的公共住房聽證會上抱怨說，“我覺得我們應該忘掉他們的經驗……如果要開展住房建設項目，我們應該忘掉在舊世界發生的事，試著用現代的、美國的方式解決問題。”[[931]](#_931_4)

在飛向進步人士的炮火中（如批評其項目缺乏效率、徒勞無益、削弱道德和經濟行為的彈性、刺激利維坦式國家的胃口等），非美國特色這一指控并不總是最突出的。但是到了1930年代，這樣的批評無所不在。羅亞爾·米克在1934年抱怨說“美國人的獨特天才”到底是什么，“我從來沒有找到……但它總是被人提到”。[[932]](#_932_4)

特格韋爾是特別容易引來“非美國特色”這種指控的靶子，他的頭腦中充滿了全面改革，又有當教授時期到蘇聯夏日旅行的經歷。農業安全署因為其“集體主義”幻想、“社會實驗”、“外國”假設而遭到批評家連續的攻擊；國會的主要批評家在1944年抱怨說農業安全署從一開始就是“非美國特色想法的實驗站”。綠化帶城鎮是“非美國特色”，“救濟金”是“非美國特色”，公共住房是“非美國特色”，新政本身是“非美國特色”。赫伯特·胡佛在1936年抱怨說：“如果在歐洲集體主義大舉進攻中有什么東西新政沒有去模仿的話，那準是忽略了。”伊薩克·魯賓諾在1934年不耐煩地抱怨說：“我們美國人，至少多數美國人，認為如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我們是最偉大、最富有的國家，我們的人民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我們被賦予特殊的歷史使命來指導陳舊和落后的世界，而不是從它那里學習什么。”[[933]](#_933_4)

盡管受到攻擊，美國許多進步人士仍然保持世界主義信仰。魯賓諾認為“對于引用歐洲經驗、歐洲解決問題的方法作為榜樣那么極度謹慎”是個錯誤。亞伯拉罕·艾普斯坦在失業保險聽證會上作證時忍不住違背別人的忠告，還是詳細講述了英國救濟窮人的故事。海外朝圣之旅繼續進行。伊迪絲·伍德1939年夏天出席了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國際住房大會。得到古根海姆獎學金在瑞典和蘇聯研究住房問題的凱瑟琳·鮑爾當年夏天也在歐洲，不過在倫敦的一場車禍讓她錯過了斯德哥爾摩的會議。去蘇聯不到一星期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她被迫回國。吸收“文明世界”的經驗，結合美國的具體情況進行修改和完善，這仍然是1930年代許多進步人士的明確目標。[[934]](#_934_4)

在一連串的“非美國特色”指控下，其他人開始了策略性撤退。第一個是威斯康星大學的約翰·康芒斯，該校是世界性社會政治主要實驗室之一。康芒斯本人從來沒有深刻的歐洲聯系，錯過了到德國攻讀研究生的機會，這在他那個時代著名社會經濟學家中屬于少數。1906年受全國公民聯盟委托到英國考察市營公共服務業的公費旅游，但這在他看來純粹是浪費時間。不過，他是理查德·伊利的最好的學生之一，像老師一樣在1890年代是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他已經進行了市營公共服務業的戰爭；他曾宣稱自己是“社會連帶主義者”。成員中有許多在德國留學的社會經濟學家的美國勞工立法協會也選定他作為執行秘書。在威斯康星大學，康芒斯經常性地派學生搜尋外國法律書，從中尋找管理模式和途徑。他曾經讓五十名本科生繪制世界所有國家的勞工法律的圖表，把研究結果掛在教室四面墻上。[[935]](#_935_4)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康芒斯的興趣重點開始轉變。因為和拉福萊特進步派就對德國立場“軟弱”問題發生分裂，他開始更多地談論約束企業本能的激勵措施而不是直接控制。到了1920年代后期，他不僅按照這個思路重新制訂了失業賠償原則，而且開始大聲嚷嚷他的計劃是“美國特色”的計劃，“徹底改變”了歐洲政策原則。在尋找政治效率的時候，本土主義者的對立觀點殺了回來。[[936]](#_936_4)

美國勞工立法協會是進步壓力團體改弦易轍的一個更深刻的例子。作為戰前世界性進步政治的最重要的組織機構，美國勞工立法協會總是公開表現出一副跨越大西洋的面孔。美國落后和美歐對比的語言是其首要特征。它用這些術語開展宣傳健康保險的運動。1918年它廣泛散發的漫畫上是一個英國工人和一個美國工人，前者有眾多保護性社會保險構成的大雨傘，而后者的雨傘幾乎是空的，除了微薄的工業事故保險之外全是窟窿。即使在健康保險運動失敗后，美國勞工立法協會仍然堅持世界主義風格。當國際勞工組織的阿爾伯特·托馬斯1920年代初到美國進行演講旅行時，《美國勞工立法評論》在每期上都刊登他的照片。當批評家指責英國失業救濟時，《評論》邀請工黨的瑪格麗特·邦德菲爾德寫文章反駁。1930年9月的失業問題特刊發表了邦德菲爾德和瑪麗·吉爾森關于英國失業保險體系的文章、莫莉·雷·卡羅爾關于德國失業保險法律的文章，以及阿爾伯特·托馬斯本人的贊同意見。[[937]](#_937_4)

但是，因為受到健康保險引發的“極端反應潮流”的深刻打擊，約翰·安德魯斯開始重新思考美國勞工立法協會幾年來的策略。在1930年12月那一期上，該協會的《美國勞工立法評論》突然放棄了精心培養的歐洲紐帶，轉而在失業問題上鼓吹具有獨特風格的“美國計劃”，以威斯康星法案作為核心內容。在接下來的五年里，安德魯斯提出的社會改革路線和岡珀斯時代的美國主義色彩一樣刺眼。他寫到，浪費時間與外國進行比較或者“深入研究與美國經驗不同的外國體制的運行”是沒有意義的。直到《社會保障法案》通過后，《評論》才最終放棄壁壘，重新刊登有關歐洲的文章。[[938]](#_938_4)

美國勞工立法協會向美國本土的退卻不能全部用策略來解釋；但是在1930年秋天，德國失業保險體系因為失業索賠負擔而步履維艱，報刊充斥著英國失業保險陷入困難的新聞，無疑讓國際對比的言論比從前任何時候都充滿著更多的危險。全國制造商協會主席在1930—1931年之交的冬天宣稱，失業保險“不是誕生于美國，也不是美國人頭腦里想出來的”。在1934年眾議院失業救濟聽證會上，最渴望討論歐洲的人是失業保險的批評家們。歐洲先例在1930年被貶值，反進步的力量再次發動“非美國特色”這一機器，在此情況下，最方便的做法是把運動的世界主義翅膀收起來，放棄歐洲經驗，努力探討美國方式的優越性。[[939]](#_939_4)

但是對于1930年代的許多進步人士來說，策略性的放棄比較少見，更多的是態度突然倒轉或者模棱兩可。社會保障辯論就是很好的例子。經濟安全委員會最初的傳單對于社會保障的歐洲根源直言不諱，社會保險“不是新觀點”，“連很小和所謂‘落后’”的歐洲國家都有。經濟安全委員會的另一份傳單上說：“我們自詡為進步人士，但在社會保障立法方面，我們至少落后于時代25年”。哈里·霍普金斯1935年3月在電臺廣播中重申，在《社會保障法案》中不存在“沒有嘗試過的原則”。他受總統委派尋找經受過實踐檢驗的措施，他說：“我們做了。我們研究了歐洲過去50年的經驗。現在我想指出我們不推薦美國復制歐洲的計劃。”最后一句話指什么，只有專家去琢磨具體內容才能充分明白，但是這句話的存在意義深遠。吸取世界經驗和表現出不受外來經驗干擾，在政治上都是必須的姿態。[[940]](#_940_4)

同樣的動態關系也影響了綠化帶工程的宣傳。在郊區重建司的早期傳單上一邊是伯恩維爾和韋林花園城、梅的羅默斯塔特、陶特的策倫多夫的照片；一邊是美國的貧民窟、佃戶的棚屋、侵蝕的土地、美國工人領救濟面包的長隊、投機商建造的大片大片的單調美國住房的照片。為了讓所有人都明白，他們繪制了一個圖表顯示美國和德國、英國、法國、荷蘭國家資助的住房建設數量的對比，顯示美國遠遠落后別人。當1936年特格韋爾把綠化帶城市的議案提到俄亥俄州公民會議上時，他開頭就談論埃比尼澤·霍華德。但很快就出現了否定的聲音。他接著解釋說綠化帶城鎮規劃者并沒有真正做規劃，更少吸取其他國家的經驗。他們不過是“采取了已經為我們做好的規劃”——新英格蘭和俄亥俄河谷的城鎮和村莊。新政不過是要趕上國際標準，與歐洲沒有任何關系。它是對世界經驗的繼承，它就像土地本身一樣是本土的、自然的。即使官方的宣傳也有兩副面孔。[[941]](#_941_4)

在這方面1936年比1939年好。因為歐洲的前景再一次因陷入戰爭而破碎，許多美國進步人士發現越來越有必要把本土傳統放在海外學習經驗的后面做支撐。即使像劉易斯·芒福德這樣的世界主義知識分子都感受到這種誘惑。在1930年代的最后一年，芒福德與人合作制作他《城市文化》一書的電影背景。《城市文化》得到阿倫·科普蘭的配樂，用電影形象表現了芒福德在這個十年之初描述出來的U形歷史軌跡。電影讓觀眾看到的是前科技時代的水、樹林和村莊的和諧，然后陷入煤炭和鋼鐵形成的舊科技時代的地獄。沿著歷史再往后來進入特大城市本身的狂熱，隨著汽車瘋狂地沖向懸崖，金融資本主義最終要崩潰，新技術平衡慢慢開始返回。《城市》重新展現了芒福德的《城市文化》的所有方面，只有一點例外：這次芒福德砍掉了歐洲內容。從中世紀早期，前科技時代被往后推移幾個世紀，轉到18世紀末期馬薩諸塞的雪利中心（Shirley Center）。從那里開始的歷史演化不是像從前通過英國的“黑鄉”，而是通過匹茲堡和紐約來表現的。至于對新技術將來的展望，芒福德讓電影觀眾看到胡佛大壩、田納西流域管理局、康涅狄格州的邁瑞特觀光道的漂亮遠景（當時還是新的，還不擁擠），最后是新政時代馬里蘭州“綠帶”市。羅默斯塔特成為被拋棄的記憶。[[942]](#_942_4)

到了1939年的時候，人們有充分的理由否認魏瑪社會民主的虛假源泉，取而代之的是更強烈的本土內容。多年后，芒福德堅持新英格蘭村莊一直是他1930年代烏托邦主義的源泉。其他人也讓他們的記憶轉向同樣的方向，把1930年代社會政治的國際主義推向更遙遠、更渺小的地方，重新把1930年代的政治描繪為獨特的美國運動。作為記憶，它是錯誤的，但是作為預測，它并非完全脫離目標。受到海外事件和國內敵人的雙重打擊，跨越大西洋的進步紐帶處于感受得到的緊張狀態。新政是這個紐帶的高潮，它暗示過一個完全不同的未來。

# 第十一章 1942年的倫敦

## 消除貧困的計劃

在北大西洋經濟體的歷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戰是中斷，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分水嶺。在任何層次上它都改變了大西洋世界的社會和思想版圖。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熔爐里誕生了完全不同的區域經濟力量平衡、大幅度擴張的國家責任期望值、新的社會政治抱負、充分展開的大西洋紐帶的新裝飾線條。在美國，第二次世界大戰標志著世界主義政治意識的勝利。沒有人料到它也標志著美國大西洋社會政治時代的終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分水嶺的前后對比中，現代福利國家的建設是特別具有戲劇性色彩的。在這個故事展開的地方，在分界線的這一邊是六十年社會政治修修補補的工作：對這一處社會經濟不公平的糾正、對那一處社會利益的去商品化、對某些特別風險的保險、一點一點對市場的修改——在最緊迫的地方，在能成功想象到或者從他處借鑒到切實可行的矯正措施的地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另一邊，則是發展更嚴密的、我們時代的“福利國家”：長期的社會專家工作人員、持續經濟管理的承諾、更加系統化的規定、包括中產階級在內的更加廣泛的目標人口。

當然，零碎的和系統的社會政治之對比并不是絕對的。二戰后福利國家的安全網仍然讓闖入該領域的許多人感到失望：福利國家管理結構有效和公平分配社會物品的能力可能下降；市場的公共管理者可能睜一眼閉一眼，或者在他們應該管理的對象的懷抱中徹底打盹兒；國家經濟管理者帶領國家經濟度過危機的能力可能垮塌；體系的連貫性可能（往往實際也是）被夸大了。正如在之前社會經濟的修修補補中一樣，現代福利國家混合性經濟中的公共機構也并沒有做國家的所有社會政治工作。雇主、工會、教堂、慈善組織和合作社仍然承擔了主要的負擔。

福利國家政治的眾多方面仍然充滿爭議。某個社會福利的接受者或許被妖魔化或者被作為替罪羊，他們的救濟被大幅度削減或者徹底停止——尤其是當他們貧窮或帶有種族標記時，這種可能性就更大。納稅人的反抗或者私有化的運動可能爆發，加上有一位撒切爾或里根提倡和促成。不過，盡管福利國家政治受到激烈對抗，盡管選民之間就誰應該得到救濟和保護、誰應該為這些救濟買單而爭來爭去，但國家繼續控制和管理市場經濟的做法還是在更深層次上得到廣泛接受。國家作為穩定者、管理者、社會產品提供者、少量社會正義的維護者被當作是理所當然的。[[943]](#_943_4)

從零碎到系統的轉變發生在眾多不同的政治體制下，政策制訂者像往常一樣超越差異去相互借鑒和競爭。20世紀的第一個福利國家是英國工黨政府在1945年到1950年匆匆忙忙成立的。因為有一批現成的進步思想、戰爭的集體主義經驗、激進的重建主義的勝利情緒，工黨政府把社會政治三代人的零碎積累變成接近意識形態和實際操作連貫性的內容。1948年后在瑞典，同樣的工作也在社會民主黨支持下展開，不過比較緩慢，因為沒有受到戰爭時期重大犧牲的刺激。在西德，戰后“社會市場”國家是中間派政府的杰作，它受到那些認為真正問題在于銀行和主要工業所有權的左派的侵擾。在其他地方，差別更大的政治環境下出現了其他變體。小阿瑟·施萊辛格認為“福利國家”這個術語在1949年秋天的時候不過才幾個月大，十年后它竟然成為北大西洋經濟體的基本模式。[[944]](#_944_4)

在這個普遍朝向更廣泛、更系統的社會供給的運動中，美國是積極的參與者。新政時代在1953年的結束沒有導致社會政治的全面扭轉，雖然共和黨中的許多人迫切渴望看到這樣的結果。慢慢地，大蕭條時代緊急政策的殘余因素被轉變成長期性措施，涵蓋的范圍擴大了，承諾增多了，管理變得更加系統化了。《社會保障法案》中最明顯地被排除在外者得到糾正。因為擔心全國健康保險體系獲得突破，大企業和工聯主義者趕緊合作推動成立了以就業為基礎的健康保險體系。該保險由私人管理，但是受到集體談判和調解的制約。農民和郊區住房所有者繼續得到大蕭條時代的補貼。在城市，都市“復興”工程大量展開。在戰前時代啟動的結構和期待里，即使美國也呈現出了福利國家的形式。

更加戲劇性的是，戰爭讓美國政治國際化。它把美國人拉到世界舞臺上，而且留在那里不下來了，因為1939—1945年的熱戰變成了1947—1989年的冷戰。讓美國突然加大對世界管理的投入，其程度是美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的。1945年后到處都是美國政策制訂者——在進行調查、管理、籌措資金、實施安撫等。和歷史上任何時期相比，這時有更多的美國活動家、更多的國際會議和機構、更多的外國報告和外國數據交流，超過以前的任何時期。美國位于世界權力中心彼端的地理政治邊緣化地位到1940年代末期已經成為歷史。雷·斯坦納德·貝克的“地球中心論”一去不復返了。

表面上看，所有這些因素似乎對北大西洋進步紐帶是個好兆頭。在戰前進步政治的許多資深人士看來，美國與其他國家的聯系似乎比從前更密切了，已經成熟了，可以持久地、規范性地參與美國本土之外那一半被理想化、一半又受到懷疑的社會政治世界。當然，美國從來沒有比現在這樣更像舊世界國家：和平時期的常備軍隊、地緣政治野心、不斷擴張的國家機器、政治性動員的工會運動，以及從破碎的歐洲搜羅來的世界各國背景的知識分子。[[945]](#_945_4)

但是期待中的高潮并沒有出現。戰后美國人突然發現他們處于世界之中，但在政治上他們并不屬于這個世界。他們的大西洋紐帶更豐富了，但是這些紐帶不像從前那樣起作用了。更多的外國新聞來到美國，但是它們對國內政治的意義越來越小。其他國家社會政策的報告堆積在美國研究型圖書館，但它們不再能夠推動政治的車輪。在歐洲和美國的福利國家制度之間，關系變得越來越稀薄。美國進入國際政治舞臺的入口同時也是出口，“美國世紀”的到來也就是其關閉之時。在被預告即將成功的同時，北大西洋進步紐帶卻散開了。

結束從來都不比開始更簡單。美國社會政治的跨越大西洋時代的關閉是個復雜的事件，充滿了虛假的開始、放棄的機會和諷刺性的轉變。本來應該是戰后高潮，結果卻根本沒有高潮而是從前例外主義的回歸；要了解這個情況，再沒有比1942年的倫敦更有利的窗口地位了，因為倫敦是戰后福利國家建設的起點。

這是比我們故事開始時的1900年凄慘得多的一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第三年。1942年沒有人舉辦博覽會，即便有人舉辦，也不會有打著陽傘的女士在會上閑逛，也不會有威廉·托爾曼們把展品巧妙地安排在帶鉸鏈的擱板和格子上，也不會有帕特里克·格迪斯們按龐大的進步標題把所有趨勢組合起來，也不會有熱烈討論“社會問題”的國際聚會。倫敦本身也成為比四十二年前凄慘得多的城市，1940年和1941年德國轟炸機在此狂轟濫炸，人們都被迫撤離，陷入物資短缺和最低限度食物定量配給的困境。英國剛剛在北非的軍事勝利對于幾乎連續三十個月的災難和撤退中的人來說很難有多大安慰。這個城市與約翰·伯恩斯、錫德尼·韋伯那個充滿市營公共服務業抱負的世紀之交的展覽勝地簡直是天壤之別。

但是就在這個破壞性大環境下，在1942年的最后一個月突然出現了立刻具有國際意義的社會政治藍圖。它的正式題目是“社會保險和相關服務跨部門調查委員會的報告”，但為了紀念起草人通常被稱為“貝弗里奇計劃”。在后來所有福利國家項目和政綱中，沒有一個能比得上它的影響力或受歡迎程度。該報告回顧了進步人士從前的做法，繪制了戰后進步承諾的藍圖，一下子取得了作為福利國家政治奠基性文件的地位。

“貝弗里奇計劃”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北大西洋經濟體內引起充分的討論。幾乎所有人都試圖從它撈到政治上的好處。雖然北大西洋進步紐帶中的美國人非常關注它，但是不再像從前那樣認真傾聽了。在長期以來報道英國進步政治的雜志上，在曾經對《勞工和新社會秩序》充滿希望的雜志上，人們不可能不注意到一種隱含著批評性優越感的新口吻。就像過去的進步人士一樣，1940年代的美國進步人士熱衷于未來。但貝弗里奇并沒有為他們提供未來遠景，歐洲也沒有。在歐洲歷史上，1942年代表了社會政治新舊時代的交接點。在美國歷史上，它標志著封閉的時刻，美國歷史再一次回到自己珍視的上帝賜予的潮流中。

貝弗里奇1942年關于社會保險的報告是起草了兩次的文件，第一次是由威廉·貝弗里奇起草，后來被參與進來的公眾重新修訂，在戰爭艱難的、讓人泄氣的第三年，人們在其中傾注了如此明顯的政治希望。貝弗里奇本人并不想寫。他曾在湯因比館工作，倫敦失業者示威游行讓他投身于1904年的失業政治，并成為人力資源問題專家。貝弗里奇拒絕了讓他參加關于養老和健康保險的政府委員會的邀請，理由是這不是他的專業范疇。他在1941年和1942年迫切渴望得到的職務是負責戰爭期間的勞工分配政策。在社會政策問題上，貝弗里奇甚至不是特別具有進步思想的人。羅斯福的新政在1933年并沒有給他留下深刻印象，他認為，那是在第一年混亂的矛盾沖突中“嘗試所有錯誤藥品”的舉動。他認為新政的工作救濟是個錯誤，國家工業復興總署是特別怪異的東西。他更愿意少干預商業周期的“自然”力量，更多關心企業對低利率和更穩定貨幣的需要。在他的英國背景下，貝弗里奇是社會自由派，不是工黨人士；是中間派，不是激進派。倫敦報刊在1943年初期指出“貝弗里奇計劃”的謎團之一是：“一個謹慎的改革者怎么能夠把武器打造得這么鋒利，一個怯懦的政府怎么能提出如此有影響力的改革措施？”[[946]](#_946_4)

實際上，勞工部讓貝弗里奇擔任社會保險和相關服務跨部門調查委員會的主席職務，主要是為了擺脫貝弗里奇的糾纏，安全地讓他遠離日常政策制訂，削弱他的影響力。貝弗里奇接受他的政治命運，把精力集中在唯一敞開的出口。對于任何一個像他那樣具有系統性思想的人來說，社會保險呈現出亂糟糟的一團亂麻。即使在德國，社會保險也是一個接一個雜亂地發展起來，管理上混亂，邏輯上不完整。在英國這樣借鑒外國經驗，在現有機構框架下進行修改的國家，社會保險方面的混亂就更多了。在1940年代的英國，每種社會保險都和其他保險的資金渠道不一樣，覆蓋的人口也不同。有些保險旨在補償工人損失的工資的一部分；有些則根據需要確定給付標準；還有些從設計上就是按貧困線以下的水平給付。1911年法案中的健康保險只限于掙工資的人，沒有給家屬法定的補貼，而且通過友好協會管理，支持水平差異很大。養老金是給窮人的，由中央政府管理。在1934年拼湊到一起的失業保險是利益團體妥協的產物。

貝弗里奇把他的委員會變成一個人的樂隊，要用單一思想的決心把這個眾多管理機構、交付工具和補貼水平的混合體標準化和簡單化。他的目標像前人提出的一樣，是為所有人提供單一的“包括一切”的保險體系，涵蓋工人家庭工作生涯的主要經濟風險，如疾病、老年、失業、傷殘、生育等。把這些原則變成切實可行的具體措施是非常瑣碎的任務。1942年11月發表的內容顯示，《貝弗里奇報告》是個耗費心血的綱要，有461個非常詳細的、標號的段落，還有一對附錄，全部填滿了最詳細的成本核算和政策建議。但它是在異常簡單化的要求下進行的細節工作。從他周圍現存的資料中，從長期以來對現有社會保險的缺陷的批評中，加上韋伯關于全民生存最低限度保障的傳統要求，貝弗里奇簡要列出了具有異常清晰的道德支撐的社會保險結構。每個工作的人（或者說幾乎每個，已婚婦女在貝弗里奇的項目中沒有得到平等對待）應該按同樣的比例交付保險費；遭遇生活中任何一種重大風險的每個人應該得到同樣的生存水平救助。同樣的保險費，同樣的給付水平，全國同樣一個社會經濟等級。“貝弗里奇計劃”是從俾斯麥的勞工控制和政治壓制環境下拉出來的俾斯麥項目，它是社會保險的普遍化、民主化和平等化。[[947]](#_947_4)

對于社會保險的這種重新組織，貝弗里奇添加了三個基本的“假設”，每個假設都像報告本身一樣范圍廣泛。第一個是普遍的、國家資助的兒童補貼，旨在幫助即將從溫飽生活陷入貧困的家庭渡過難關。第二個是把醫療服務從社會保險中脫離出來，建立公費醫療保健服務體系。第三個是中央政府系統地承擔充分就業的經濟責任。就像報告正文中的保險觀點一樣，這些假設背后的思想沒有一個是新觀點。英國女權主義者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就開展爭取普遍的兒童補貼的運動了，貝弗里奇本人是從1925年開始擔任埃莉諾·拉斯伯恩的“家庭捐贈協會”的名譽主席。批評1911年法案下健康保險效率低下和不平等的呼聲已經廣泛存在很多年了。至于就業，那可是貝弗里奇自從在湯因比館時代就一直關注的焦點問題。1943年從政府部門被排擠出去后，他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這上面，組織了私人的研究和政策推薦委員會，最后發表了關于充分和穩定就業的凱恩斯經濟管理的可能性報告，這是1940年代在這方面最重要的聲明之一。[[948]](#_948_4)

所有這些都大大超過了丘吉爾戰時政府的預料和愿意接受的程度。既沒有得到政府認可，也沒有得到貝弗里奇委員會代表的各部門的認可，他的社會保險報告印出來時只有貝弗里奇一個人的簽名。雖然有這個不吉利的開頭，但公眾對“貝弗里奇計劃”的反應是爆發性的、非同尋常的。不到一個月就銷售了10萬份，最后的總銷售量遠遠超過50萬份。貝弗里奇充分利用他能抓住的每個宣傳機會投身于向大眾宣傳報告的過程中。他用表現戰爭緊迫性的語言鼓動說：“世界歷史上的革命時刻是用來革命的，不是用于修修補補的。”他把成本核算從日常生活中提升出來，運用了約翰·班揚《天路歷程》中的大量比喻。很早以前班揚朝圣之旅中遇到宰善巨人、肆虐巨人、怯懦巨人、絕望巨人，貝弗里奇現在看到戰時英國面前的道路上橫亙著“五個新巨人”：貧困、疾病、無知、懶散（貝弗里奇指的是失業）和骯臟（他指的是擴張中資本主義城市“丑陋的”無計劃的混亂）。他堅持說如果國家運用政治意志來對付這個任務，所有這些都能被消滅，甚至貧困這個巨人本身。[[949]](#_949_4)

貝弗里奇的包裝幫助吸引了人們的注意力，但是單單依靠這些并不能推銷《貝弗里奇報告》。在人們把報告從技術性文件轉變成戰后承諾的過程中，“貝弗里奇計劃”的核心特點是：它簡單明了的倫理學抓住、反映和放大了戰爭時期大眾的政治心態。貝弗里奇的建議并沒有提供比困難時期生存水平救濟更多的承諾，但是它們承諾把這些平等提供給所有人，不需要檢驗貧困程度，沒有擾人的威懾因素。在重視統一的時代，“貝弗里奇計劃”吸引人的地方不在于給付金額的多少，而在于背后隱含的民主思想。它調動了空襲警報和定量配給形成的共同風險意識——戰爭讓人們認識到國家是公民在危機四伏的海上的共同救生船。貝弗里奇本人沒有大量利用戰爭風險，他甚至沒有過度宣揚對男女公民的社會保障是民主權利這種思想。但是在人們從貝弗里奇的成本核算、比喻和效率中提煉的文件里，這些主題被推到了最前面。[[950]](#_950_4)

因為描述了戰后更美好、更公平世界的希望，“貝弗里奇計劃”一下子引起廣泛的轟動。錯誤地認為該報告得到政府的支持，信息情報部印刷了特別便宜的版本告訴士兵他們在為什么而戰。報告簡本在納粹占領下的歐洲國家秘密流傳。對該報告的討論出現在教堂的聚會上、勞工集會上、社區服務組織的會議上、大學的學術會議上；從克萊塞德工人的激進工會聚會到穩重的教會人員會議，不同政治傾向團體的支持匯集到政府。在報告發表后兩個星期內，90%的英國人已經在告訴民意調查者支持該計劃。《紐約先驅論壇報》駐倫敦的記者在1945年報道說：“貝弗里奇幾乎已經成為英語中的普通名詞，它的意思是希望。”[[951]](#_951_4)

面對這樣的大眾潮流，政府的謹慎根本不是對手。汲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先例，政府已經組建了一套重建委員會，試圖繪制戰后和平的社會藍圖。現在有了“貝弗里奇計劃”，它們的工作就緊鑼密鼓開展起來了。甚至在戰爭還沒有結束的時候，保守派控制的戰時政府就已經開始讓貝弗里奇的不少議程行動起來。一個影響深遠的教育民主化項目和一個家庭補貼項目（雖然比貝弗里奇期望的水平低）在1944年和1945年初獲得通過。政府白皮書支持新的全民健康保健服務、和平時期反周期開支，以及貝弗里奇社會保險建議中的大部分內容。城市規劃者再次行動起來提出更廣泛的種種建議，如更有效地征收因公共設施改善而產生的非勞動所得增值稅，如給膨脹的倫敦以新的、寬廣的綠化帶。由于這些成就的支撐，保守派在1945年夏天作為“貝弗里奇計劃”的新倡導者迎接選舉。自由黨也這么說，聲稱貝弗里奇是他們的黨員（不是沒有道理）。工黨也這么說，最終不再反對需要交保險費的社會保險思想，接納了貝弗里奇主義。[[952]](#_952_4)

選舉結束后，是工黨抓住了貝弗里奇幫助釋放的激情。選民拋棄了丘吉爾想在和平時代執政的訴求，大量支持工黨政府，這是工黨成立以來首次在英國政治上留下重大標記。政府以非常快的速度連續通過了貝弗里奇路線的《國家保險法案》、將基本健康服務非商品化的《國民保健服務法》（正如新的衛生大臣安奈林·比萬所說的，終止了購買和出售醫療服務的習慣）、擁有強大補償能力的《城鄉規劃法案》，以及大量住房投資計劃。1946年的《新城法案》開始由國家建設十四個新綠化帶城市——埃比尼澤·霍華德思想的公共實踐，比美國重新安置署試圖嘗試的規模更大。貝弗里奇本人作為其開發公司的主席之一很快搬進其中一個新城鎮。利用戰前城市“社會主義”的先例，工黨現在把英國的交通體系和電力系統大部分國有化。工黨內的社會主義者仍然占上風，煤炭、鋼鐵也都收歸國有。[[953]](#_953_4)

保守主義者指控這些政策都是“通向奴役之路”：英國變成“紅色”和激進國家了。實際上，工黨政府在1945年到1950年的項目中大部分內容并不是從馬克思那里繼承，而是進步人士的遺產。積累了改革工程的備選方案，1945年的政府革命是英國新政，是危機政治動力關系以工黨模式的再現。基礎產業的國有化接通了社會主義的核心傳統，但在實際上工黨政府對于中央國家計劃表現出很少的興趣，從資本那里攫取根本經濟控制權的興趣就更小了。它最受歡迎的措施是建立在從前社會政治基礎上的部分，不是要取消資本主義而是緩和其極端情形，從中提取出一些主要社會產品并在最嚴重的風險下搭建共同平臺。

如果認為《貝弗里奇報告》是整體結果的藍圖，那就錯了。但是貝弗里奇本人在1910年代的社會政治和1945年后的福利國家之間建立的個人紐帶，不管象征意義還是政治意義都十分重要。工黨政府沒有向他尋求建議，戰時政府試圖排擠他，但是他的報告表達了戰后社會秩序核心的許多道德和政治假設。最后，從大西洋角度看，它還做到了更關鍵的一點，給予戰時和戰后英國的重建情緒一個計劃。在把理想結晶為政策、原則和比喻后，它把這些變成潛在的出口物資。

美國進步人士曾經感受過這么多英國宣言的力量，不可能擺脫“貝弗里奇計劃”旋風的影響。每個專家都承認，本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和英國相比有更多漏洞和不協調的地方，完全是權宜之計。在1942年時，沒有一個項目是具有普遍性的。只有養老保險是全國管理的，即便如此，它還是被地區性扭曲了，排除了農業工人和家庭用工，很少涉及農村或者南部非洲裔美國人。剩下的是國家制訂的標準的大雜燴。社會保險中最古老者“健康保險”還沒有美國的例子，雖然在1939年國會進行了另外一次嘗試。就在戰爭物資消費最終實現了新政者長久以來感到頭疼的經濟復興后，“貧困”巨人在194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偷偷溜走了，不過還沒有系統的保險防止它再回來。基于所有這些，“貝弗里奇計劃”對當代美國的相關意義太密切了，絕對不可能錯過。

對《貝弗里奇報告》同樣有利的是，美國在戰爭最初幾年的戰后計劃范圍很有限。羅斯福從1919年威爾遜的潰敗中吸取的教訓之一是不再把戰爭當作意識形態的圣戰。這次沒有全力以赴的宣傳活動，沒有模式化、中央集權的戰爭經濟，沒有對緊急“戰爭社會主義”的稱頌。像往常一樣，戰爭讓私有企業變成公共的了，但是羅斯福不愿意支持1917年和1918年戰爭工業委員會那樣規模的競爭性控制中心，他把戰爭期間的生產和價格管理轉移到分散和重疊的部門。他把服裝工人聯合會的西德尼·希爾曼放在身邊處理緊急事務，和他的關系遠比岡珀斯和威爾遜的關系更親密，但是沒有象征性席位安排來給予勞工機構性權力。[[954]](#_954_4)

從前的戰爭經濟問題重新出現，這次用更謹慎的答案來對待。再次遭遇戰爭生產工廠的巨大住房需求，規劃者在房地產利益團體的巨大壓力下沒有選擇模范城鎮建設，而是建設便宜的臨時住房。招募杰出建筑師的短命嘗試把沃爾特·格羅皮烏斯臨時拉入戰時住房項目——他曾是魏瑪社會現代主義者中最熱烈支持最低生存保障（Existenzminimum）的，但是他在賓夕法尼亞西部搞的簡單、難看的“鋁城市”項目是個公共關系災難。就在工人們開始進入位于底特律的飛機制造廠時，沃爾特·魯瑟和奧斯卡·斯通諾羅夫一起提出就在蔓延的威洛倫（Willow Run）廠區外面建造雄心勃勃的戰時模范城市，但是福特汽車公司拒絕出售周圍的土地，擔心它發展成社會工團主義的堡壘。[[955]](#_955_4)

至于在英國重新出現的戰后重建委員會，羅斯福一個也不想要。他告誡左派批評家：“我們必須先贏得戰爭……然后才能制訂更多未來計劃。”他在1941年初期對國會說，將來必須把“簡單”的東西放在民主基礎的位置上：廣泛的社會保障覆蓋范圍、醫療保健的更好機會、“給窮人提供保障”、“給能工作的人提供工作”。但是他不愿意討論重建的具體內容。[[956]](#_956_4)

羅斯福有足夠的政治理由采取謹慎策略。對于丘吉爾的保守派控制的政府來說，通向國家統一的道路在于戰后復興的承諾。在英國，正如戰爭的官方歷史學家在1940年代末期所說的：“可以這樣說，政府和人民之間存在著隱含的契約：為了贏得戰爭，人們不拒絕政府要求做出的任何犧牲；作為回報，他們期待政府表現出想象力和嚴肅性，準備好戰爭勝利后國家幸福生活的恢復和改善。因此，重建計劃實際上是戰爭努力的一部分。”對于羅斯福來說，因為反對新政的國會多數派隨時準備從每個戰時政策措施中找到（如羅伯特·塔夫脫在1942年所說）“在戰爭幌子下讓國家改頭換面”的秘密項目，通向國家統一的道路反而在于擱置新政過去的社會重建主義言論，給予復員的士兵慷慨的戰后福利，如此而已解決問題。工會的目標在于日常福利，沒有舉起吸引人的重建主義大旗；產業工會聯合會中短暫討論過類似1919年和1920年德國社會民主黨路線的勞資共同決策制度，但很快就煙消云散了。只是到了1944年初期，通過一個人人享有的新“經濟權利法案”的前景，羅斯福才采取從前威爾遜的立場為沖突留出了進步人士議程。[[957]](#_957_4)

在美國戰爭初期表達戰后理想方面的真空階段，帶有高度承諾和密切相關性的《貝弗里奇報告》肯定得到更加熱烈的關注。進步刊物迅速指出了它的重要意義。特別的美國版本很快銷售了5萬本。由戰時進步雇主、記者和工會主義者組成的同盟“全國政策委員會”把1943年初期的年度聚餐會議獻給了《貝弗里奇報告》。在3月份，貝弗里奇本人應洛克菲勒基金會邀請乘船前來美國作演講旅行。在三個月時間里，他發表了一百多場演說，并和羅斯福、弗朗西絲·珀金斯以及幾十位公共和私立機構的高官私人會談，受到公眾廣泛關注。[[958]](#_958_4)

在1943年羅斯福戰時內閣里存在著深刻的擔憂，覺得政府可能被冷落了。在《貝弗里奇報告》發表后的幾個星期里，羅斯福對親信說要向國會提交“類似‘貝弗里奇計劃’的東西”。甚至他的一直謹慎的財政部長也敦促出臺美國版計劃。亨利·摩根索在1942年末的日記中寫道：“英國的每個人都將得到保險，他們將得到失業保險，他們將得到醫療保險，要什么有什么。”在1943年初，羅斯福公布了關于社會保障和公共工程項目的廣譜性“全國資源計劃委員會”（NRPB）報告，它自1941年末以后已經落滿灰塵，當年羅斯福認為這個內容不合時宜而將其擱置。現在他很高興地讓報刊稱它為“美國的‘貝弗里奇計劃’”。進步人士和保守派評論家都開始進行兩者的對比。為了抓住要點，《新聞周刊》給讀者畫了一個圖表，一類一類地比較委員會報告和英國計劃。到了1943年春，參議員羅伯特·瓦格納介紹了另外一個“美國的‘貝弗里奇計劃’”，這是個把健康保險和社會保險結合起來的法案。在所有這些方面，北大西洋進步紐帶再一次發揮了作用，把外來的名詞“貝弗里奇主義”引入美國詞匯，重新激發起落后于人、競爭和不足等從前的恐懼，把民族國家政治卷入競賽和交流的國際體制中。[[959]](#_959_4)

但是，這次出現了不同的情況。早期的跡象出現在英美進步政治的堡壘《新共和》。自從1914年創立開始，該雜志就公布了英國投稿者和英國聯系的長長的名單。在1945年戰爭結束時，四位編輯中的兩位立即動身前往倫敦，像他們之前《新共和》的許多人一樣要到那里獲得方向，為未來打基礎。《新共和》更標新立異的左派對手《國家》把熱情留給了工黨選舉的勝利，在1942—1943年之交的冬天對于貝弗里奇的工作沒有多作評論。相反，《新共和》給予“貝弗里奇計劃”即刻的強大支持。但是到了初春，編輯已經把熱情全部轉向“全國資源計劃委員會”報告，稱贊它是“美國憲章”，在1943年春天開辟一個專版討論其中的建議。編輯們說該委員會的建議“遠遠超過了《貝弗里奇報告》”。馬克斯·倫納爾寫到它是“更好、更可靠”的計劃，更有美國特色、更有“革命性”的計劃。進行同樣對比的《國家》雜志也得出同樣的結論。[[960]](#_960_4)

“全國資源計劃委員會”報告中究竟有什么東西讓編輯得出這樣的結論，實際上一下子還不容易看出來。在來自英國的移民進步人士伊夫琳·伯恩斯主持下把許多提案拼湊而成，“全國資源計劃委員會”報告實際上是新政主要項目的回顧和合理性辯護，特別強調了公共事業振興署的工作救濟和公共工程就業政策。它根本就沒有“貝弗里奇計劃”中的道德和管理清晰度，也沒有提供成本核算；在社會保險前沿，它的建議十分謹慎。羅斯福把它放在國會門口，根本沒有簽署意見。國會把它晾在那里，無人支持，也無人辯論，保守派專欄作家認為這是政治智慧的標志。[[961]](#_961_4)

但是對于進步思想的編輯來說，把“貝弗里奇計劃”和“全國資源計劃委員會”報告提供的社會保險進行對比根本就沒抓住要點。貝弗里奇主義在他們心里根本就沒有革命性。因為其對最低生存保障的緊縮的吝嗇的討論，它不過是安慰劑和精神支柱。相反，在“全國資源計劃委員會”報告的眾多建議中，他們提取了完全不同的希望種子：足以消除從前經濟危機循環過程的充足工作和就業崗位的希望。讓該委員會建議具有“純粹美國特色”的是，（正如《國家》編輯指出的）它不僅強調保障還強調永遠處于滿負荷運轉的經濟：“它代表了完全擺脫在30年代一直讓我們陷入經濟奴役的那種失敗主義思想的牢籠。”它意味著拋棄大蕭條時代對貧困問題的關注，拋棄生存家園工程中隱含的那種長期經濟停滯的思想，拋棄所有這些，通過公共緊急工程和永久性公共工程計劃而實現充分就業、充分生產的經濟承諾。[[962]](#_962_4)

在編輯部會議之外也能聽見同樣截然對立的支配性觀點。G.哈特里·格拉頓在《哈珀斯雜志》上對“貝弗里奇計劃”提出疑問：如果汽車本身不能前進了，出售降價的全國公交車票給傷殘的病人又有什么意義呢？據說，英國項目的前提正是釘在稀缺性上，真正的美國替代方案必須是建立在經濟增長的基礎上的。亨利·華萊士認為貝弗里奇的建議從根本上說和美國這樣“充滿活力”的經濟不相干。推動永久性公共事業振興署的哈里·霍普金斯并不認為貝弗里奇項目能夠“成為任何美國項目的基石”。華萊士在1945年回到這個內容時說：“社會保險項目雖然讓人期待，但在維持生產和就業的高水平所需的整體購買力中，還是只占了很小一部分。”隨著這些極端觀點的加深，貝弗里奇主義佩帶上越來越暗淡的貧窮裝飾品。貝弗里奇的平等費率、基本生活補貼、韋伯式的保證最低生活水平論、風險的民主化等——所有內容都與充分就業的經濟前景背道而馳，與新的欣欣向榮的經濟前景背道而馳。[[963]](#_963_4)

人們從這些評論中聽到的部分內容是宏觀經濟學概念上的革命，即將形成所謂“凱恩斯主義”。這個觀點認為不加管理的市場經濟的膨脹—崩潰循環過程可以通過連續的、精心調整的公共投資來克服。它在1930年代的許多地方發酵，從斯德哥爾摩到新政的華盛頓，雖然是英國的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做出了最深刻的理論闡述，并在國際上大力推銷這個觀點。[[964]](#_964_4)保持國家總體開支和需求可能是政府管理最重要的任務，這一觀點進入1930年代后期的經濟辯論中，成為對社會政治的一種讓人目眩的簡單化表述。人們不需要像新政初期瘋狂的兼收并蓄一樣同時做各種事情。人們不需要過分擔心哪些商品在市場上或者市場外，甚至不需要操心在這個深刻混合性的體制哪里可以劃出這樣一條線來。需要關注的是一個關鍵問題：把注意力集中在總體性的投資和需求上。

在1938年，當他們說服羅斯福嘗試擴大開支來擺脫當年經濟急劇的頹勢時，羅斯福政府中只有一小撮親凱恩斯主義分子。凱恩斯和羅斯福四年前的著名會面讓兩人都感到困惑和失望。但是隨著戰爭經濟因為政府采購而活躍起來，比任何專家能想象到的更多的商品紛紛涌現，凱恩斯式經濟管理的信條很快吸引了眾多支持者。在哈佛經濟學家阿爾文·漢森的影響下，“全國資源計劃委員會”很快沉浸在新范式中。既然正確地理解了它的作用，已經空蕩蕩這么長時間的市場經濟聚寶瓶又準備釋放財富了。到了1945年，亨利·華萊士承諾提供六千萬就業崗位，不是通過計劃或者控制而是持久和充分需求的神秘力量產生的。在把新進步信條思想線索結合起來的戰后自由主義研討會上，塞莫爾·哈里斯提出了這樣的教訓：“現代經濟政策的核心是保持需求穩定。”[[965]](#_965_4)

在左派“社會凱恩斯主義者”（關注自動的公共工程和公共開支調整）和右派“商業凱恩斯主義者”（更狹隘地把中央政府看作有利率意識的中央銀行）之間，經濟辯論到1940年代初期還遠沒有結束。許多商人對于總體經濟管理的整個模式表示深刻懷疑。《新聞周刊》商業專欄作家反對說，充分就業的承諾意味著“經濟法西斯主義，沒有別的”。《紐約時報》編輯認為只有“極權主義”經濟管理才能實現充分就業。作為對它辛苦擬出一個凱恩斯公共投資項目的回報，國會在羅斯福發表報告六個月后關閉了全國資源計劃委員會。但是，塞莫爾·哈里斯的進步合作者仍然有眾多公共目標和工程：更多的田納西流域管理局；改善健康、住房和教育；大眾工作項目。根據國家的總體公共和私人開支賬本的要求，這些工程中的每一個都準備好吸收所需要的額外投資。但是現在社會需要處于第二位。貝弗里奇道路上的巨人只是附帶事件，首要命令是開支本身。[[966]](#_966_4)

所有這些新吸收的觀念加入到美國人對《貝弗里奇報告》的理解中來。他們的眼光集中在增長的前沿，總體需求管理的鼓吹者很少掩蓋他們對貝弗里奇專注于貧困問題的惱怒。在他們看來，“全國的最低生存保障”言論本身就表達了錯誤的信息。實際上，貝弗里奇自己的《自由社會的充分就業》中完全凱恩斯主義的分析就很快顯示，經濟增長與經濟安全之間的內在矛盾這種概念從一開始就是非常錯誤的。貝弗里奇和凱恩斯是朋友，也是相互從對方吸取觀點的合作者。在最低生存保障和工作之間、風險保險和經濟增長之間，并沒有內在的矛盾。美國人拿來和貝弗里奇諾言作對比的管理下持續增長的“美國式”諾言，顯然并不是美國人的專利。斯德哥爾摩經濟學家作為“凱恩斯主義者”的時間和凱恩斯本人一樣長，比凱恩斯的美國新信徒時間更長。凱恩斯主義在1940年代就像貝弗里奇主義一樣是擁有國際影響力的觀點；在戰后北大西洋經濟體中很難找到不以某種方式同時吸收這二者的社會政治藍圖或者福利國家設計。

美國人貶低“貝弗里奇計劃”顯然還有別的因素在起作用，在影響力上，它們更簡單、更原始、更持久。歐洲人可能談論凱恩斯主義倍數效應和持久經濟增長，但是讓歐洲人窮困潦倒的戰爭卻讓美國人大發橫財。1939年的時候沒有人預料到戰爭能夠帶來如此大的財富差異。但是到了1945年，曾經是北大西洋進步紐帶存在基礎的經濟可比性已經遭到破壞。1940年代美國人對英國的報道集中在這一點。《國家》的倫敦記者在1945年初報道說，英國是個“陷入極端貧困”的國家，“口號仍然是‘緊縮’，這個詞是典型的委婉語，概括了把民用經濟盡可能減小到最低的整個過程”。一年后，英國“仍然破敗，路面坑洼不平，人民營養不良”。英國雖然不是“奄奄一息”，如許多報告所說的那樣，但它在定量配給的食物和燃料中蹣跚前行（面包配給持續到1949年，肉類配給持續到1954年），各種消費品都處于緊缺狀態。英國非常貧窮，德國就更貧窮，它在戰后能夠活下來全靠勝利者的慈善救濟。[[967]](#_967_4)

美國本土也存在犧牲：汽油定量配給、自己種莊稼的“勝利花園”、廢金屬回收運動、（比從前多得多的美國人需要交的）聯邦收入所得稅。但是在總體上，國內經濟犧牲不大。國家的希望擁擠在脆弱的、同一個救生艇上的敦刻爾克經驗不是美國人的戰爭教訓。部分因為政策制訂者的設計，但是更多因為特殊的地理環境，讓美國擺脫了戰爭的巨大破壞。歐洲人的大災難讓美國人發了大財。戰爭在美國本土的教訓是充裕的工作崗位和豐盛的食品柜——即資本主義經濟的能力如果由足夠大的力量來推動，得到足夠好的管理，就能夠大量生產出槍炮和黃油。1945年世界總體物質生產中的一半出自美國工廠，五年后，世界貨幣儲備中的一半仍然位于美國。從前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能這樣主宰世界，而歐洲的災難給予美國這個經濟機會。在戰爭結束時，世界暫時只有一個經濟大國，那就是美國。[[968]](#_968_4)

在這樣程度的不平衡狀況下，從柏林到舊金山貫穿北大西洋經濟體的共同經濟、共同社會問題、共同社會風景這種舊觀念無法持續下去了。歐洲受到重創，陷于貧困。它的社會政治需要不再是美國的需要。美國進步人士在貝弗里奇主張中看到的失敗主義氛圍、他們自己心中產生的增長與“保障”間的新鴻溝、對市場經濟前景的重新擁抱，都與這個起點有關。英國人因為厭倦了戰爭犧牲，可能把貝弗里奇主義當作希望的代名詞，但是對美國人來說——甚至對美國進步人士來說，它滲透出太多的局限性和貧困。生存經濟是舊大陸的問題，20世紀最著名的這個社會政治文件從根本上說不是美國的事情。在戰爭造成的巨大變化中，美國進步人士重新獲得了自己神賜天命一樣的希望。

## 例外主義的重生

“貝弗里奇計劃”并非在大西洋跨越中沉沒的第一個未來藍圖。大西洋進步紐帶一直存在失敗、挫折、錯過的時機、中斷的交流等所有問題，但是進步刊物的敏銳的讀者不會看不出起作用的更大模式。不僅僅是《貝弗里奇報告》對美國人來說無關緊要了。作為社會政治試驗，英國本身已經變得無關緊要，在這點上，西歐的民主也是如此。1930年代被用濫的海外模式在1940年代分崩離析。這次再也沒有按原來模式恢復的可能性了。

紐帶解體的諷刺色彩在于，它結束時美國人恰恰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深地卷入歐洲事務。1945年美國軍隊進入元氣大傷的歐洲，緊隨其后的又是大批的平民專家來維持、管理和美國化。在西德，美國占領軍政府就像在白板上一樣寫出了18世紀權力監督和制衡的結構：聯邦政府架構、獨立的司法系統、權力受到嚴格限制的兩院制中央政府、一部成文憲法。在社會立法方面，美國當局除了設置路障防止經濟國有化，幫助恢復和合理化德國社會保險結構外，沒有多大興趣。與英國、法國在德國軍事占領區的同行不同，美國人讓德國人自己重新規劃德國城市。但是即便美國管理者行動克制，戰前關系的顛倒還是不可忽略的。[[969]](#_969_4)

戰后美國對歐洲的經濟和文化的入侵更加讓人印象深刻，這是很早就在外國預告過的。“馬歇爾計劃”不僅給歐洲帶來了數十億美元的財富，而且帶來大量的經濟學家、文化專員、美國情報機構管理者、中央情報局官員來監督他們的投資。“馬歇爾計劃”官員支持成千上萬的法國企業界和勞工界人士到美國訪問，通過訪問日程安排影響他們，旨在推廣美國處理勞工關系、消費市場和生產的方法。美國消費品的巡回展覽到了法國偏遠鄉鎮，美國資助的電臺把美國汽車生產的細節帶給奧地利家庭。口香糖、電影、廣告、可口可樂，美國商品滲透到歐洲人的日常生活。哈羅德·拉斯基總結戰后秩序時說：“美國像個巨人一樣控制了整個世界。”不管從大的方面還是從小的方面，歐洲突然變成美國人的了。[[970]](#_970_4)

或者說幾乎成為美國人的了。隨著熱戰被冷戰替代，把世界重新塑造為美國蘇聯激烈對抗的戰場，美國在經濟上、軍事上和外交上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深入、更親密地和歐洲歷史交織在一起。歐洲政治的每個變化突然之間都具備了地緣政治意義。西歐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被這么多美國人仔細研究。不過他們不再是尋求教訓，如保羅·凱洛格曾經說過的從舊大陸的經驗中尋求“前進的號令”。美國人在1940年代后期把歐洲的民主社會置于美國經濟和軍事保護之下，從而重新塑造了歐洲的重要性。在冷戰兩極對立狀態下，巴黎、倫敦和柏林不再是美國人想象力的核心。歐洲成為被爭奪的場所，是客戶的大洲，是美國與蘇聯的中間地帶。即使美國進步人士在海外也很難看到他們自己和二元對立面蘇聯人之外的其他內容。

簡而言之，戰爭和戰后危機的持久影響不僅是力量的移位，而且是思想的移位。美國進步人士不再是眼睛緊盯著西歐競爭者向未來前進，他們不再想象自己是在與世界其他“文明國家”進行競賽——更少擔心落在別人后面。現在這些比喻本身已經成為無比遙遠的天真時代的一部分。20世紀后半葉的用詞更加不客氣，美國在其勢力范圍內的特殊地位是非常清晰的。

幾乎相隔五十年的兩次政治大旅行說明了這樣的對比。像1905年的威廉·詹寧斯·布萊恩一樣，1953年艾德萊·史蒂文森是被打敗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望通過海外旅行休息一下以便在政治上東山再起。布萊恩和史蒂文森都進行了從東京到倫敦的環球旅行。兩人的活動都是公開報道的，布萊恩和赫斯特報業簽訂了合同，史蒂文森被來自《瞭望》雜志的隨行攝影家和記者包圍。兩人都知道使命的語言：在布萊恩是西方基督教，在史蒂文森是西方自由。兩者中間，史蒂文森的背景有更多國際化色彩。他在12歲時就開始了第一次大旅行，此后跨越大西洋很多次。但是在冷戰時代進步政治的目光向內的全球主義影響下，史蒂文森報告的視野就狹隘得多了。

布萊恩的世界是兼收并蓄的大櫥柜，它的架子上堆滿了有用的和有趣的東西。而史蒂文森的世界充滿了危險和“折磨”、責任和“負擔”，它的每一個側面都把想象力壓回美國的特殊命運上。史蒂文森的世界不是可以使用的社會政治經驗的倉庫，不是環繞世界的一連串“外國試驗站”。從那里沒有亨利·勞埃德曾經說過的進步思想“沙拉”等待制作。它是美國人不能回避的“領袖考驗”，要準備肩負“偉大的最艱巨重擔”的領域。在英國的布萊恩為1906年自由黨的勝利而歡欣鼓舞，非常熱切地渴望看到英國經驗能夠對“自然壟斷”問題提供什么答案。而史蒂文森的英國沒有讓美國命運的特別重擔得到暫時減輕。溫斯頓·丘吉爾告訴史蒂文森，美國人“拯救了世界”，這個勝利讓他們像阿特拉斯巨神一樣肩負起世界的重擔。在“這個世紀中葉的考驗中”，所有的問題都匯集成一個：“我們[美國人]如何承擔起上帝賦予的神圣使命？”[[971]](#_971_4)

在新發現的雄辯力和緊迫性面前，沿著進步跑道一同比賽的說法讓位給了例外主義的天賦、例外主義的責任、例外主義的“美國生活方式”，以及例外主義的美國獨特歷史等言論。1950年代初期的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深深卷入弄清這些問題的研究中。[[972]](#_972_4)從前的政策對比問題似乎不值得再提出來，因為答案如此明顯，上帝為世界成員提供的牌的差別是如此分明。對于美國多數進步人士來說不存在從海外學習社會政治經驗的問題了，也沒有需要克服的落后狀態了。自我參照的百葉窗再次關閉，因為美國人重新把自己當作世界歷史的例外。讓美國人深深卷入歐洲事務的戰爭出乎意料地把美國完全孤立了起來。

北大西洋經濟體進步紐帶的解體并沒有讓進步政治停下來。在1940年代美國已經啟動的政治力量非常強大，足以按照自己的軌道運行很長一段時間。羅斯福的反對者迫切渴望關閉新政殘余，而勞工團體和進步思想的民主黨人試圖擴大其規模，在這種斗爭中美國社會政治保持著足夠的能量，人們不會馬上注意到更廣泛的、跨越國界的參照物正在消退。哈里·杜魯門在1948年競選時，不僅誓言在歐洲采取對蘇聯的強硬政策，而且提出了對新政承諾的新延續：社會保障的擴展、新政啟發的全國健康保險項目、大規模住房建設項目、新的公共電力工程、更高的最低工資標準、對農業的長期性價格支持、農村電氣化推廣、勞工談判權利的增加等。這些議題還進入林登·約翰遜的“偉大社會”項目，并且在后來的很長時間里繼續影響社會政治的辯論。[[973]](#_973_4)

但是在多數情況下，美國進步人士不再公開談論歐洲比喻和歐洲紐帶。在1940年代后期國會關于住房立法的聽證會上，指代歐洲的內容就縮減到幾乎沒有的程度。在1949年關于醫療保險的國會聽證會上，進步人士支持者拒絕對國際間的對比表態。相反，在1939年《社會保障法案》修正案的聽證會上，仍然充滿了對歐洲經驗的引述。政府的“社會保障顧問委員會”主席道格拉斯·布朗當時在眾議院聽證會上提供了世界社會保障條款的圖表，還有一份英國保險印花簿，他希望很快將在美國實施。在1950年代的社會保障聽證會上，唯一一個較多依賴大西洋背景的證人是抱怨連連的前社會保障管理局雇員馬喬里·希倫，他聲稱有證據證明羅斯福—珀金斯在美國實施社會保障的陰謀最初起源于日內瓦國際勞工組織的“社會主義者”小集團。[[974]](#_974_4)

希倫只不過是擁有逼真想象力的新聞通訊作家。但是隨著冷戰進入美國國內政治，主張維護上帝賜予的、未受污染的美國方式的人獲得了強大優勢。當社會保障管理局1947年選擇持同情態度的調查者匯報新西蘭健康保險的經驗時，國會保守派人士提出警告說，這是對醫藥社會化的“莫斯科政黨路線”的認可。勞工進步人士的健康保險游說活動被攻擊為共產主義者前線。本人也有相當社會政治野心的共和黨人參議員羅伯特·塔夫脫指控說，1946年的《充分就業法案》是起草者直接從蘇聯憲法中挪用而來的。對那些擔心國家的社會力量的人來說，冷戰添加了特別迅猛有力的策略優勢，讓談論落后和不足的言論承受更高昂的政治風險代價。[[975]](#_975_4)

當然，不是所有的戰后美國進步人士都變成例外主義者。從歷史上看，勞工世界比中產階級的改革世界更加國際化，在戰后與國際社會政治紐帶仍然保持著交錯的關系。冷戰地緣政治讓美國工會人員和他們在政府的資助者深深卷入歐洲的勞工事務，不僅重新扮演1918年和1919年塞繆爾·岡珀斯的耀武揚威，而且產生了出人意料的國內后果。魯瑟兄弟是歐洲場面上的主要人物，他們抓住每個機會宣揚美國生產方式的福音。英國《每日先驅報》在沃爾特·魯瑟的一次年度旅行時，稱他是“希望的吹笛手”，是“美國夢和……空前富足時代到來的”福音傳道者。1951年，作為“馬歇爾計劃”政治的比較有趣的轉變之一，維克多·魯瑟幫助為試驗工廠輸送工會基金，向滿心狐疑的法國人展示美國的生產技術和勞工關系技能。但是魯瑟兄弟也是歐洲風格的社會工團主義的主要宣傳渠道，工團主義憑借與海外社會民主政治有意識的密切關系、國內消費者和信用合作社的堅實基礎、體育和娛樂中心、教育項目、政治野心等，至少在一段時間內在產業工會聯合會找到了家。[[976]](#_976_4)

專家們在戰后也重新建立起國際紐帶。在新成立的聯合國機構體系中，在學術交流活動中，在專家和政策專家的國際聚會中，各種觀點仍然在超越民族國家界限而傳播交流，明顯的例子就是國際貨幣政策。1945年后的世界在思想上比伊利和布萊恩時代更小了，更親密地結合在一起了。信息的獲得更加快捷，相互往來更加方便。在對中歐社團主義工業計劃、瑞典經濟政策、歐洲大陸土地規劃技術等不斷變化的興趣中，大西洋進步紐帶的傳統動力構成美國社會政治場景曇花一現的復興。即使在例外主義政治的高潮時期，所維持的國際社會政治紐帶也比政治舞臺公開表現出來的更多。

但是隨著美國控制世界而歐洲社會民主的財富大幅度減少，隨著冷戰政治中使用外國經驗的危險增大，隨著在歷史和政治科學領域新的例外主義文獻的迅速增多，隨著市場產生物質極大豐富的奇跡（當時看來似乎是美國獨有的），跨越大西洋的進步紐帶確定政治議題的能力已經不如從前了。北大西洋進步紐帶的主要機構也隨著時代的前進被取代。約翰·安德魯斯的美國勞工立法協會、亞伯拉罕·艾普斯坦的美國社會保障協會到了戰爭結束時隨著創始人的去世而關閉。凱洛格的《調查》在1952年停止出版。芒福德和鮑爾繼續為他們的事業奔走呼號到1950年代初期。但是戰后都市政治的主要語言是紐約市規劃沙皇羅伯特·莫斯的，他把芒福德貶為“坦率的革命者”，蔑視“根本不屬于這里”的外國觀點。[[977]](#_977_4)

下一代進步人士開始工作時根本就沒有了前輩對歐洲那些強烈和反觀性的感情。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的歐洲社會政治復興產生了五六個可以輸出的福利國家模式，對于美國政治的影響卻比早期的社會政治試驗小多了。當美國的戰后社會政治開始沿著自己的道路向福利國家條款和妥協邁進時，已經不再有積極的、相互聯系的游說人士提出那些來公開辯論，或者詢問美國做法哪些與其他國家先例不同之處是聰明的，哪些是不聰明的等問題。有的只是例外主義者的、擴張的美國和“奄奄一息”（雖然從來沒有死亡）的歐洲兩極對立的言論。

當然，北大西洋進步紐帶本身也有不少過分擴張的極端言論——也有不少虛假幻覺。從1870年代開始，美國人在這個紐帶中表達他們的信念和對外國的熱情從來不是容易的事，除非使用近乎夸張的語言。他們的簡單化常常是天真的，有時候（如1914年的德國崇拜者豪威和道森）簡直讓人尷尬。他們把他國的公式化形象走私進來，把這當作他們所了解的唯一修辭工具插入同胞的意識中間，讓國人明白美國在市場和政治間的平衡方式不是不可避免的：在其他地方，人家采用了不同的辦法，而且做得更好。他們在巴黎等地方的社會政治市場上撿到的物品并非完美無缺。他們的格拉斯哥公交車、愛爾蘭乳品廠合作社、奧斯曼化的巴黎、萊奇沃思以及德國倫理經濟學，決不是面向大西洋的進步人士一廂情愿看到的樣子。所有這些也存在于他們的工作中，更存在于其遭遇到的更深刻的地方性抵制中。

美國進步政治跨越大西洋階段的歷史重要性不在于它夸張的極端言論，而在于經驗的紐帶。它標志著資本世界越過民族國家的對抗力量而讓許多人看到共性的時刻。盡管大西洋進步旅行者的工作遭遇“非美國”或者“普魯士產”之類憤怒抗議，但他們讓其他國家的社會政策成為報紙的頭版新聞。他們不僅維持了引起高度關注的國際交流結構，而且維持了讓美國社會政治選擇與別國選擇結合起來的公開辯論。從大西洋的一側到另一側，人們都能感受到交織在一起的社會政治動力關系。在民族國家的政治結構努力要分開的地方，他們試圖建立紐帶（總是伴隨著競爭和沖突，但是畢竟相互聯系在一起）。即使在美國，這樣的現象也能夠清晰感受到，或許美國尤其如此。

1900年的巴黎，在北大西洋進步人士紐帶中的美國人還是歐洲中心辯論的遲到者——既渴望加入進來又為自己的差異感到自豪。半個世紀后，他們的努力極大地改變了美國進步政治的議程。他們試圖跨越大西洋的橋梁雖然布滿失敗和意料之外的轉變，但還是有很多東西成功跨越了。他們拓寬了的社會政治經驗和解決方案領域讓政治擺脫純粹經濟命運的束縛，也為進步改革提供了動力和確定了詞匯。這貫穿了1930年代危機政治的全過程。但到了1940年代末期，這個進步時代結束了。在挽救了世界之后，很難再想象從它那里還能學到更多的東西。

# 致謝

本書是多年辛勞和多人幫助的結果。最慷慨的資助者是那些機構，它們的支持為我提供了免于課堂教學任務的研究和寫作時間。在初期階段，這個項目得到“美國學術團體理事會”和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獎學金和研究基金。研究的后斯階段得到全國人文科學基金會和普林斯頓大學的資助。在法蘭克福大學擔任富布賴特高級講師，使研究的歐洲階段得以實現。本書的大部分手稿是在行為科學高級研究中心完成的，它不僅提供了研究員資助還提供了工作所需要的理想環境。

同樣關鍵的是在研究過程中為該項目的順利開展而提供的個人幫助。兩位特別聰慧的本科生研究助手凱西·拉格爾（Cathy Lager）和喬舒亞·馬歇爾（Joshua Marshall）在我之前開拓了研究嘗試的許多內容，費迪南德·克雷默（Ferdinand Kramer）跟我分享了恩斯特·梅項目的許多記憶：厄內斯特·科爾納（Ernst Konhner）帶領我參觀羅默斯塔特。弗萊德·福克斯（Fred Fox）接待我這個不速之客，在加州德爾亥慷慨地回答我的問題。兩個大洲、太多的大學圖書館和檔案館回答了我的詢問，為我提供非常有效的指導，幫助我發現研究所需的材料，我實在無法一一列舉他們的名字。

其他的人從頭到尾傾聽了這些想法，仔細閱讀了原稿，或者提出爭論，這種相互交流是學術研究中不可缺少的因素。普林斯頓、哈佛、斯坦福和耶魯的教授論壇，倫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位于法蘭克福的約翰·沃爾夫岡·歌德大學和位于科隆的英美歷史研究中心，都在很多方面幫助提升了該項目的敏銳性。朋友和同事艾倫·布林科列（Alan Brinkley）、丹·齊特羅姆（Dan Czitrom）、艾倫·道利（Alan Dawley）、詹姆斯·克羅潘伯格（James Kloppenberg）、阿諾·邁爾（Arno Mayer）、安迪·拉賓巴赫（Andy Rabinbach）、多羅西·羅斯（Dorothy Ross）、約翰·湯普森（John A. Thompson）都慷慨地給予時間閱讀全部或者部分手稿并提出寶貴的意見。不用說其中的每個意見都可能用不同的方式寫這個歷史，但是最終的結果因為他們的幫助而大大改善。

在手稿的最后階段，梅麗莎·錢（Melissa Chan）解決了很多麻煩的腳注。約翰·布拉茲耶夫斯基（John Blazejewski）幫助提供了很多圖片。朱麗·埃里克森·哈根（Julie Ericksen Hagen）精心編輯了書稿。哈佛大學出版社的艾達·唐納德（Aida Donald）為本書擬訂了標題，非常認真地閱讀，關注了全部內容。

家中的親人，我的妻子艾琳（Irene）用她永恒的智慧、耐心和眼光閱讀了手稿，占用她的時間給我修改意見。我的兒子彼得（Peter）和德懷特（Dwight）隨著這個項目長大，從麥迪遜到普林斯頓，從法蘭克福再到帕羅奧多（Palo Alto）顛簸遷徙——一直留心確保過去的主張從來不會缺少他們那個精彩頑強的“現在”的對抗。他們是生活和電腦屏幕的讀者而不是歷史的讀者。但他們是這里記述的努力的繼承者，那些實現的和尚待實現的遺產的守護者，我把本書獻給他們。

# 索引

Abbott, Edith，伊迪絲·阿伯特，85,436—437

Abbott, Grace，格雷絲·阿伯特，283,300,436—437,439

Abercrombie, Patrick，帕特里克·阿伯克隆比，174

Accidents, industrial，工業事故，245—247

Ackerman, Frederick，弗里德里克·阿克曼，287—289,464—465

Adamic, Louis，路易斯·阿達米克，429

Adams, Henry，亨利·亞當斯，10,41

Adams, Henry C.，亨利·亞當斯，88,96—110,132,135,140,237

Adams, Thomas，托馬斯·亞當斯，180,183,192—193,196,201

Addams, Jane，簡·亞當斯，11,40,55,64—65,74,115—116,148,152,170,200,216,219,300,315,363,379—380

Adickes, Franz，弗蘭茨·阿迪克斯，94,123,125,176—178,183,387

Adult education，成人教育。See also Folk schools，參見民俗學校，311,459—461

Advertisement Regulation Act（1907），廣告管理法（1907），204

Advisory Council on Social Security，社會保障咨詢委員會，505

AE. See Russell, George W.，參見喬治·羅素

African Americans，非洲裔美國人，15,38,42,321—323,344,450—451,470

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1933），《農業調整法》（1933年）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農業合作社，14,321,324—325,327—330,338—339,342—343; in Denmark，在丹麥，327—328,358; in Ireland，在愛爾蘭，322,328,332—333,335,341; in the U.S，在美國，322—323,325,330—331,334—335,337—343,349—350,358—359,360—361,363—364,451—454,456—459,461,470—472

Agricultural Credits Act（1923），《農業信用法》（1923年），340

Agricultural education，農業教育。See Folk schools，參見民俗學校

Agricultural Organization Society（United States），農業組織協會，334—335

Agricultural resettlement，農業重新安置，324,343—353,450—454,471—473

Agricultural Department，農業部，320,333,358,421—422,450—451,453,465,470,472

Agriculture and Technical Instruction Department（Ireland），農業和技術指導部（愛爾蘭），333

Aktienbaugesellschaft für kleine Wohnungen，小房屋股份公司，191,200

Alden, Percy，帕西·奧爾登，65,67,231

Alexander, Will，威爾·亞歷山大，421,469,471

Alfred, Helen，海倫·阿爾弗雷德，465,606n106

Amalgamated Clothing Workers Unions，美國服裝工人聯合會，378,402—403,441,463,495

America, European images of，歐洲人眼中的美國，36,41—43,70—72,371—376,410—411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108,183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Labor Legis-lation（AALL），美國勞工立法協會，27,110,236—237,244,251—254,261—264,300,306,310,408,422,431—433,437—439,481—482,507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Old Age Security（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ocial Security），美國養老保障協會（美國社會保障協會），439,464,507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美國經濟協會，86,101—103,105—107,132,155,236,254,263,318

American Fabian League，美國費邊社，66

American Federation of Hosiery Workers，美國針織品工人聯盟，402—403,467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AFL），美國勞工聯合會，19,39,68,257—258,281,299,302—304,312,315—316,392,403,425,435,435,473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美國社會學雜志》，64,275

American Labor Legislation Review，《美國勞工立法評論》，481,482

American Legion，美國軍團（退伍軍人協會），349—350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美國醫學會，243,253,443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美國政治科學協會，409

American Public Health Association，美國公共衛生協會，263

American Red Cross，美國紅十字會，308,368—370

American Russian Institute，美國俄羅斯研究會，381

American-Scandinavian Foundation，美國—斯堪的納維亞基金會，355,358,360,380

American Society of Equity，美國權益平等協會，330—331

American Union against Militarism，美國反戰聯盟，308

Americanization of Europe，歐洲的美國化，47,368—372,502—503

Andover House，安多福館，64—65

Andrews, E. Benjamin，本杰明·安德魯斯，95

Andrews, John B.，約翰·安德魯斯，252,300,306,422,431—433,438,441,481—482,507

Angell, James B.，詹姆斯·安吉爾，104—105

Angell, Norman，諾曼·安吉爾，276

Appleton, William，威廉·阿普爾頓，312

Arena 《競技場》，67,73

Armstrong, Barbara Nachtrieb，芭芭拉·納赫特里布·阿姆斯特朗，441—442;（Insuring the Essentials），《確保基本需要》，442

Aronovici, Carol，卡羅爾·阿羅諾維奇，195

Askov, Denmark，阿斯科夫（丹麥），357

Asquith, Herbert，赫伯特·阿斯奎斯，231—232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pour la protection légale des travailleurs，保護勞工權益國際協會，253

Associa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Property Owners，財產所有者保護協會，128

Atlanta, Ga.，亞特蘭大（佐治亞州），465

Atterbury, Grosvenor，格羅夫納·阿特伯里，183—184

Augur, Tracy，特里西·奧格爾，455,465

Australia，澳大利亞，55—56,58,70,157,255,431; minimum wage legislation in，最低工資立法，56,226,238—239; planned rural settlement in，有計劃的農村移民，325,346—349,351,427

Austria，奧地利，226,502; housing in，住房問題，384—387,390,392,394,398,467,475

Austro-Hungarian Empire，奧匈帝國，49

Aveling, Edward，愛德華·艾威林，70

Baker, Jacob，雅各布·貝克，458—459

Baker, Newton，牛頓·貝克，138—139

Baker, Ray Stannard，雷·斯坦納德·貝克，1,3，38,67,273,276—277,308,311—312,352,487

Balch, Emily Greene，愛米莉·格林·巴爾奇，86,88,95

Baldwin, Stanley，斯坦利·鮑德溫，296

Baltimore, Md.，巴爾的摩（馬里蘭州），131,146

Banfield, Edward，愛德華·班菲爾德，473

Bankhead, John，約翰·班克海德，452,471—472

Barnett, Henrietta，亨麗埃塔·巴內特，64,179,267

Barnett, Samuel，薩繆爾·巴內特，42—43,46,65—65,100,230—231,268

Barton, John，約翰·巴頓，359—360,363

Barton, Rebecca，麗貝卡·巴頓，363

Bassett, Edward，愛德華·巴塞特，185,193

Bates, Emily，愛米莉·貝茨，458—459

Baths, public，公共澡堂，16,119,130,136—137

Bauer, Catherine，凱瑟琳·鮑爾，389,392—396,401—404,406,408,454,463,465—467,473—474,476—478,480,507,606n106; Modern Housing，《現代住房》，394—395,399,401

Bauhaus，鮑豪斯，388,403

Baxter, Sylvester，西爾維斯特·巴克斯特，142

Beard, Charles，查爾斯·比爾德，85,152,371—372

Becontree, England，貝肯特里（英國），383

Behrendt, Walter Curt，沃爾特·庫爾特·貝倫特，373,393

Belgium，比利時，13,35,57,190,237,274,290,323; cooperatives in，合作社，18,329—330; industrialization of，工業化，45—47; socialism in，社會主義，18,58,342,420; subsidarist social policies in，補貼性社會政策，227,255,430—431

Belmont, August，奧古斯特·貝爾蒙，147

Bemis, Edward，愛德華·貝米斯，149

Benson, Alan，阿倫·本森，276

Berlepsch, Freiherr von，弗瑞赫·馮·貝爾普施，94,253

Berlin, Germany，德國柏林，16,38,41,47,49,88—90,99,105,122—123,132—133,183,144,197,277,370—371; city planning in，城市規劃，164,168,177—178,183; housing in，住房，161—162,174—175,182,191,198—199,388—391,393,397,402; politics in，政治，124—125,142; poverty in，貧困，114,212

Bernstein, Eduard，愛德華·伯恩斯坦，61,142,329

Beveridge, William，威廉·貝弗里奇，25,52,214,231—233,256,410,415,420,411,500; Full Employment in a Free Society，《自由社會的充分就業》，500; Report，《貝弗里奇報告》，26,488—494,496—498,502; Unemployment，《失業》，425

Beveridgism，貝弗里奇主義，497—498,500—501

Bigger, Frederick，弗里德里克·比格，454—455

Birmingham, Ala，伯明翰（阿拉巴馬州），151

Birmingham, England，英國伯明翰，45,115,161,168,172,180,188,192; municipal ownership in，城市所有權，120—123,127,136—138,145,156

Bismarck, Otto von，奧托·馮·俾斯麥，13,22,24—25,54—55,83,92—95,222—224,226,232—233,235,242—243,245,256,259—260,266,438,444,491

Blair, Henry，亨利·布萊爾，110

Blake, William，威廉·布萊克，44

Bliss, W.D.P.，布利斯，63,66

Blum, Léon，萊昂·布魯姆，411

Board of Trade（Britain），英國貿易委員會，232—233

Böhm-Bawerk, Eugen，歐根·龐巴維克，108

Bolshevism，布爾什維克主義，292,295,300—301,305—306,351,394,456

Bondfield, Margaret，瑪格麗特·邦德菲爾德，64,411,481

Booth, Charles，查爾斯·布思，13,26,42,65,161,210,216,229—231,235,255,268—269; Life and Labor of the People in London，《倫敦居民的生活和勞動》，213—214

Boston, Mass，馬薩諸塞州波士頓，42,69,142,146,161,206; municipal ownership in，城市所有權，135—136,143,153

Bourgeois, Léon，萊昂·布爾熱瓦，14,55,57,227

Bourne, Randolph，蘭道夫·伯恩，269—273,275,279,316,400

Bournville, England，伯恩維爾（英國），163,178,180,182,187,197,230,483

Bradford, Cornelia Foster，科尼莉亞·福斯特·布拉德福，64

Brandeis, Louis D.，路易斯·布蘭代斯，144,150,237,242,251,256,354,379

Brandford, Victor，維克多·布蘭德福，397

Branson, E. C.，布蘭森，344,352,355—357

Brecht, Bertolt，貝托爾特·布萊希特，374

Brentano, Lujo，路約·布倫坦諾，52,89,222,236,274,374

Briand, Artistide，阿提斯蒂德·白里安，57

Bright, John，約翰·布萊特，36—37

Britain，英國: agriculture in，農業，49; Americans on，美國人論及，36,39—41,65,133—135,140—144,192—193,269—271,276—277,304—313,500—501; British interest in Germany，對德國的興趣，60—61,231—233,284; British interest in the U.S.，對美國的興趣，36,41—43,70,374—375,410—411; city governance in，城市管理，123—124,154—155,207; city planning in，城市規劃，168,178—180,456; cooperatives in，合作社，326—330; economic doctrines in，經濟學派，77—80,83—84; great cities in，大城市，47; higher education in，高等教育，85,109; housing in，住房，187—190,198,286—287,295,383—384,475—476; industrialization of，工業化，44—45,47,49; labor in，勞工，58—59,219,281—283,290—296; land monopolization in，土地壟斷，35; municipal ownership in，城市所有權，115,119—122,125—130; mutual assistance associations（friendly societies） in，互助會（友好團體），216—219; during 1930s，1930年代，411—414,417—421; old-age pensions in，養老補貼，229—230; at Paris expositions，巴黎世界博覽會，9,13; poverty and poor relief in，貧困和窮人救濟，211—215; progressive politics in，進步政治，52—54,56—58,229—235; reconstruction in, postwar，戰后重建，290—296; social insurance in，社會保險，230—235,259—261,430—431,433—434,488—494; suffrage in，普選權，35—36,124,283; welfare state in, postwar，戰后福利國家，22,24—25,28,488—494; workmen's compensation legislation in，工人賠償立法，247; workplace regulation in，工作場所管理，54,235,238; during World War I，第一次世界大戰，280—287

British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英國制造商協會，260

Brockway, Fenner，芬納·布羅威，410

Bronx Taxpayers' League，布朗克斯納稅人聯盟，474

Brooklyn. 布魯克林。See New York City，參見紐約市

Brooks, John Graham，約翰·格雷厄姆·布魯克斯，63,65,72,78—79,215,235—237,241,244,248

Brooks, Robert C.，羅伯特·布魯克斯，108,142

Brooks, Van Wyck，范懷克·布魯克斯，270

Brown, J. Douglas，道格拉斯·布朗，505

Bryan, William Jennings，威廉·詹寧斯·布萊恩，66,148,299,503—504,506

Bryce, James，詹姆斯·布萊斯，36

Bryn Mawr Summer School for Workers，莫爾·布林工人暑期學校，460

Buffalo, N.Y.，布法羅（紐約州），212,376

Bund der Landwirte，德國農民協會，319

Bunting v. Oregon（1915），邦廷訴俄勒岡案，238

Bunyan, John，約翰·班揚，492

Bureau of Industrial Research，工業研究局，313

Bureau of Social Hygiene，社會衛生局，68

Burial insurance，喪葬保險，218,220,253,263

Burnham, Daniel，丹尼爾·伯納姆，169—174,181,185,204,208,269,405,447

Burns, Eveline，伊夫琳·伯恩斯，439,497

Burns, John，約翰·伯恩斯，16,38,43,57,65,72,127—128,140,192,267—268

Butterfield, Kenyon，凱尼恩·巴特菲爾德，352

Byington, Margaret，瑪格麗特·拜因頓，219

Cadbury, George，喬治·吉百利，178,230

Cairnes, J. E.，凱爾恩斯，83

California，加利福尼亞，186,205,219,243,250,253—254,259,331,336,340—341,379; agricultural resettlement in，農業重新安置點，325,346—351,353,452—453

California Commission on Colonization and Rural Credits，加利福尼亞殖民和農業信用委員會，348

California Fruit Growers' Exchange，加利福尼亞水果種植者交易所，340

California Land Settlement Board，加利福尼亞土地管理委員會，348,350

California Social Insurance Commission，加利福尼亞社會保險委員會，243,254

“Call to Americans”，致美國人的呼吁書，314,364

Calvert, George，喬治·卡爾弗特，38

Calvin, John，約翰·加爾文，373

Cambridge University，劍橋大學，85,109,113

Campbell, John，約翰·坎貝爾，360

Campbell, Olive，奧利弗·坎貝爾，355,360—365

Canada，加拿大，4,49,86,152,255,426,431,435,441

Capper-Volstead Act（1922），1922年卡珀—沃爾斯特德法，340

Carey, Henry C.，亨利·凱里，81

Carl Mackley Houses，卡爾·麥克利房屋，403,467,478

Carnegie, Andrew，安德魯·卡耐基，334—335

Carroll, Molly Ray，莫莉·雷·卡羅爾，441—481

Carver, Thomas Nixon，托馬斯·尼克松·卡佛，460

Catholic church，天主教教會，210,212,227,513n5,524n24

Central Park（N.Y.C），中央公園（紐約市），131,165

Century，《世紀》，134

Century of Progress Exposition，進步世紀博覽會，405—407

Chadwick, Edwin，埃德溫·查德威克，115,118—119,122

Chamberlain, Joseph（American labor writer），約瑟夫·張伯倫（美國勞工作家），252

Chamberlain, Joseph（British politician），約瑟夫·張伯倫（英國政治家），30,54,100,120—121,123,133,138,145,229,245,247—248

Charities and the Commons，《慈善與平民》，183

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ies，慈善組織協會，65,139,182,200,212

Chautauquan，《肖托夸會刊》，67

Cheape, Charles，查爾斯·奇普，146

Chenery, W. L.，錢納里，380

Chester, Pa.，切斯特（賓夕法尼亞州），286

Chicago, Ill.，芝加哥，21,42,46,67,71,115—116,164,219,243,342; city planning in，城市規劃，169—172,181,185,208; expositions in，博覽會，11,169—170,405—407; housing in，住房，162,174,199—200,382; municipal ownership in，城市所有權，145—148,151,153—155

Chicago American，《芝加哥美國人》，469

Chicago Commons，芝加哥普善堂，65

Chicago Mayor's Commission on Unemployment，芝加哥市長的失業問題委員會，243

Chicago Plan Commission，芝加哥規劃委員會，171

Child, Theodore，西奧多·蔡爾德，269

Child labor，童工，237—239

Children's allowances，兒童補貼，228,491

Children's Bureau，兒童福利局，284,300,443

Childs, Marquis，馬奎斯·蔡爾茲，385—386,457—458,463; Sweden，《瑞典》，421,457

Childs, Richard S.，理查德·蔡爾茲，288

Chinese Americans，華裔美國人，186,205,259

Christensen, Chris，克里斯·克里斯汀森，355,358

Christian-Social Workers Party（Germany），基督教社會工人黨（德國），92

Chubb, Percival，珀西瓦爾·查布，65,136

Churchill, Henry，亨利·丘吉爾，454

Churchill, Winston，溫斯頓·丘吉爾，56—57,232,235,256,491,493,495,504

Cincinnati, Ohio，辛辛那提（俄亥俄州），131

Cities，城市:governance of，管理，123—126,133—135,153—158,207; growth of，發展，47—48; social politics and，社會政治，112—114。See also Municipal ownership, specific cities and services，參見城市所有權; 具體城市和行業

Citizens' Union Party（N.Y.C.），公民聯盟黨（紐約市），137

City, The，《城市》，483

City-beautiful movement，城市美化運動，169—173

City Club（N.Y.C.），城市俱樂部（紐約市），185—186

City College，城市學院，69

City Planning，城市規劃，160—161; in Britain，在英國，168,172,178—181,201,204; in France，在法國，166—168,172,203,369—370; in Germany，在德國，168,174—178,179,20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n，國際會議; 163,372; in the U.S. 在美國，161—165,168—173,181—187,195—196,198—199,201—208,349,352,447

Civic centers，市政中心，170—171,289,349,369—370,455

Civic populism，公民民粹主義，149,152

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民間資源保護隊，415,418,461

Civil service，公務員，109—110,125,134—135,154,157

Civil War pensions，內戰津貼，202,240,284,560n61

Civil Works Administration，民用工程署，440

Clarke, William，威廉·克拉克，42,65—66

Classical economies，古典經濟學。See Laisses-faire，參見自由放任

Claxton, Philander P.，費蘭德·克拉克斯頓，354,358,360

Clemenceau, Georges，喬治·克里蒙梭，56—57,59

Cleveland, Grover，格羅弗·克利夫蘭，307

Cleveland, Ohio，克利夫蘭（俄亥俄州），68,138—141,149,152,169—172,198,382

Clinton, Bill，比爾·克林頓，3

Clynes, J. R.，克萊尼斯，72

Coal regions，煤礦區，44—47

Cohen, Wilbur，威爾伯·科恩，442

Cohn, Gustav，古斯塔夫·科恩，108

Coit, Stanton，斯坦頓·科伊特，64

Cole, G. D. H.，柯爾，293,311

Collectivism，集體主義。See Urban collectivism, War collectivism，參見城市集體主義、戰爭集體主義

College Settlement（N.Y.C），學院睦鄰中心（紐約市），64

Cologne, Germany，德國科隆，176,182

Columbia University，哥倫比亞大學，81,85,98,269—270

Coman, Katharine，凱瑟琳·科曼，69

Comey, Arthur C.，阿瑟·柯米，197,289

Commerce Department，商務部，187,205—206,340,378,382

Commercial Club（Chicago），商業俱樂部（芝加哥），171

Commission on Agricultural Cooperation and Rural Credit in Europe，歐洲農業合作和農村信用委員會，69,337—338,354,363

Commission on the Church in Social Service，教會社會服務委員會，27

Commission on Industrial Relations，工業關系委員會，110,335—336

Commissions, regulatory，調節委員會，109,150—151,155—156

Committee on Congestion of Population in New York，紐約擁塞問題委員會，181—186,196,313,462,464

Committee on Economic Security，經濟安全委員會，436,442—443,482

Committee of 48,48人委員會，314—315,464

Commoner，《平民》，299

Commons, John R.，約翰·康芒斯，31,71,110,149—151,236,252,264,315,431—433,439,443,480—481

Commonwealth Club（Calif.），聯邦俱樂部（加利福尼亞），348

Communism，共產主義，298,449,454,469

Communist Party（United States），共產黨（美國），429

Condemnation, excess，超額征用，167,172—173,201—203

Confédération Générale du Travail，法國總工會，282

Conference for Progressive Political Action，進步政治行動大會，315—316,431

Conferences, international，國際會議，19,60,66,163,181—182,192,194,210,238,248,253,268,372,380,463,465,480

Conference of Southern Mountain Workers，南方山區工人會議，361

Congress, U.S.，美國國會，150,299,305,313,379,402,415,424—426,430,440,442—443,447,466,472—473,476—478,480,482,494—497,499,505。See also specific acts，參見具體法案

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CIO），產業工會聯合會，22,364—365,496,506

Conrad, Johannes，約翰內斯·康拉德，62,84—85,88,101,274

Conrads Jahrbücher für Nationalökonomie，《康拉德國民經濟年鑒》，98

Conservative Party（Britain），保守黨（英國），57,129,189,295—296,383,394,411,417,431,434,475,493,495

Conservative Party（Germany），保守黨（德國），92

Consumer Distribution Corporation，消費者分配公司，459

Consumer's leagues，消費者聯盟，27,63,110,163,181,236—239,268,379,422,464

Cook, Joseph，約瑟夫·庫克，99

Coolidge, Calvin，卡爾文·柯立芝，316

Cooperative housing associations，住房合作社，191,467,475—477

Cooperative Marketing Act（1926），《合作營銷法》（1926年），340

Cooperatives，合作社，14,17—18,28,326—327,329—330; in Britain，在英國，13,17,294,311,326—327,329—330; in Sweden，在瑞典，457—458; in the U.S.，在美國，330—331,403,452,454—459,461,469—470,506。See also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Cooperative housing associations; Credit cooperatives，參見農業合作社、住房合作社、信用合作社

Cooperative Wholesale Society，批發合作社，327

Copland, Aaron，阿倫·科普蘭，483

Cornell University，康奈爾大學，85,104—105,142

Corporatism，社團主義，411,420

Corruption, municipal，市政腐敗，134—135,137—138,141,153—157; at the periphery，在邊緣，156; in the ranks，在內部，156—157

Cotton marketing associations，棉花營銷合作社，341—342

Council of National Defense，國防委員會，281,283

Country Life Commission，鄉村生活委員會，332,334,352

Crane, Jacob，雅各布·克萊恩，455,465

Creameries, cooperative，合作乳品廠，328,331,341—342

Credit cooperatives，信用合作社，321,324—325,327—328,331,336—337,339—341,366,402,455,459,506

Crèvecoeur, J. Hector St. John de，赫克托·圣約翰·克雷夫科爾，35

Croly, Herbert，赫伯特·克羅利，298,314,401

Crystal Palace Exposition，水晶宮博覽會，8

Culpin, E. G.，庫爾品，183

Cummings, John，約翰·卡明斯，66

Curry, John Steuart，約翰·斯圖爾特·柯里，358

Dairy cooperatives，乳品合作社，328,331,341—342,470

Darrow, Clarence，克拉倫斯·達羅，148,379

Daunton, M. J.，唐頓，162

Dawes Plan，道威斯計劃，371,376

Dawson, Miles M.，邁爾斯·道森，248,251,264

Dawson, William，威廉·道森，61—62,291,295—296,507

Deardoff, Neva，內瓦·德爾道夫，279—280

Debs, Eugene，尤金·德布斯，242,315

De-commodification，去商品化，30,116

De Forest, Robert W.，羅伯特·德·福雷斯特，552n69

Delhi, Calif.，德爾亥（加利福尼亞州），348—352,453

Democracy，民主，35—36,41—42,70,75,95,126,143,155,157—159,207,272—273

Democratic Party（United States），民主黨（美國），4,135,148,316,335,410,427,503—504

Denby, Elizabeth，伊麗莎白·登比，386

Denmark，丹麥，247,265,427; agriculture in，農業，60,319,321—323,328—329;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in，農業合作社，327—328,332,340; Americans on，美國人論及，354—357,360,362—363,421; folk schools in，民俗學校，325,354—355,357—366,459—460; land reform in，土地改革，356,471—472; old-age pensions in，養老金，60,228,230; politics in，政治，58,356; subsidarist social policies in，補貼性社會政策，227,255,431

Departmental Committee on Vagrancy（Britain） ，英國流浪問題委員會，215

Detroit, Mich，底特律（密歇根州），135,138,146—147,152,399,495

Deutscher Werkbund，德意志工業聯盟，393,405

Devine, Edward T.，愛德華·迪瓦恩，182,254,268

Dewey, John，約翰·杜威，279,299,315,362,381

De Witt, Benjamin，本杰明·德·威特，74

Dial，《日晷》，298—299,314,396

Dickens, Charles，查爾斯·狄更斯，45

Dinwiddie, Emily，愛米莉·丁威迪，193

Dirksen, Everett，埃弗里特·德克森，479

District of Columbia，哥倫比亞特區。See Washington, D. C.，參見華盛頓

Dixon, Franklin H.，富蘭克林·狄克森，86

Donald, Robert，羅伯特·唐納德，67

Doty, Madeleine，瑪德琳·多蒂，277

Douglas, Paul，保羅·道格拉斯，315,381,439

Draper, Earle，厄爾·德雷珀，465,603n81

Dreier, Margaret，瑪格麗特·德雷爾，64

Dreiser, Theodore，西奧多·德萊塞，147

Dresden, Germany，德累斯頓（德國），30—31

Droppers, Garrett，加瑞特·德羅普斯，88,91

Dryden, John F.，約翰·德萊頓，263

Dublin, Ireland，都柏林（愛爾蘭），193

Du Bois, W. E. B.，杜波依斯，15,38,71,87—88,95,219,315,380—381

Duhamel, Georges，喬治·杜亞美，374

Duluth, Minn，德盧斯（明尼蘇達州），152

Dunne, Edward，愛德華·鄧恩，148,152—156

Durant, Will，威爾·杜蘭，298

Durham, Calif.，達勒姆（加利福尼亞州），348—352

Düsseldorf, Germany，杜塞爾多夫（德國），46,123,125,185,191—192,197

Eastman, Crystal，克里斯托爾·伊斯特曼，248,250—251

Eberstadt, Rudolf，魯道夫·埃伯施塔特，175

École libr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自由政治學院，85

Economic Congress（Germany），經濟學大會（德國），93

Economic doctrines，經濟學學派，76—80,419,498—500; in Britain，在英國，77,80,83—84; in France，在法國，82—83; in Germany，在德國，82—83,90—97; in Sweden，在瑞典，457,500; in the U.S.，在美國，80—81,83,97—111,415,499—500。See also Keynesianism; Laissez-faire, Promotionalism; Single tax; Social economics，參見凱恩斯主義、自由放任、促進主義、單一稅、社會經濟學

Economist，《經濟學家》，98,409,445

Economy Act（1933），《經濟法案》（1993年），417

Eddystone, Pa.，埃迪斯通（賓夕法尼亞州），289

Edelman, John，約翰·埃德爾曼，402—403,465

Edinburgh, Scotland，愛丁堡（蘇格蘭），30

Education，教育。See Adult education; Folk schools; Higher education; Workers' education，參見成人教育、民俗學校、高等教育、工人教育

Education, Bureau of，教育局，358

Education, Office of，教育辦公室，460

Eiffel, Gustave，古斯塔夫·埃菲爾，8

Eiffel Tower，埃菲爾鐵塔，8—11,31

Elberfeld, Germany，埃爾伯費爾德（德國），46,212

Electricity supply，電力供應，117,122—123,127,129—130,137—138,144—145,152,158

Eliot, Thomas，托馬斯·艾略特，422,442

Ellenbogen, Henry，亨利·埃倫伯根，466,474

Ely, Richard，理查德·伊利，64,95,109,132,142,149,236—237,275,321,332,447,480,506; and laissez-faire，與自由放任，77,81,97—102,106—107; on municipal ownership，論城市所有權，107,135,137,155—156; as student in Germany，在德國留學，84—85,87,90; French and German Socialism in Modern Times，《現代法國和德國社會主義》，100

Emergency Fleet Corporation，緊急船運公司，289,468

Emerson, Ralph Waldo，拉爾夫·瓦爾多·愛默生，400

Employee representation plans，雇工代表計劃，282,306,377—378

Employer federations，雇主協會，260

Employers' Parliamentary Association 雇主議會聯盟，260

Engel, Ernst，恩斯特·恩格爾，94

Engels, Friedrich，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13—114

England，英格蘭。See Britain，參見英國

Epstein, Abraham，亞伯拉罕·艾普斯坦，380,431—432,439,441,445,464,480,507; The Challenge of the Aged，《老年的挑戰》，432

Esping-Andersen, Gøsta，格斯塔·艾斯平·安德森，30

Essen, Germany，埃森（德國），17,46,124—125,163,179

Europe, American images of，美國人對歐洲的印象，1,33—44,72—75,267—273,500—501,503—504

Evangelical Social Congress（Germany），福音派社會聯盟（德國），63,92

Evans, Richard，理查德·埃文斯，118

Evening Journal，《晚報雜志》，136—137

Everybody's Magazine，《人人雜志》，67

Exceptionalism, American，美國例外主義，2—4,34—35,39,255—257,379,478—484,488,502—508

Excess condemnation，超額征用，167,172—173,201—203

Existenzminimum，最低保障，390,478,495

Exposition internationale des arts décoratifs et industriels modernes（1925），現代工業和裝飾藝術國際展覽（1925年），405

Exposition universelle（1889） ，世界博覽會（1889年），8—9,11,60,163,209

Exposition universelle（1900），世界博覽會（1990年），9—17,19—20,25,29—31,60,72,210,226,263,268,318

Fabian Society，費邊社，42,52,56,61,63,65—66,70,72,85,106,124,127—128,136,140,179,270,311

Factory legislation，工廠立法。See Workplace, regulation of，參見工作場所管理

Fair Labor Standards Act（1938），《公平勞動標準法》（1938年），108,415,426

Fairmount Parkway，菲爾芒特公園道，164,172

Falk, Isidore，伊西多爾·福爾克，442—443

Falkner, Roland P.，羅蘭德·福克納，85,109

Family Endowment Society，家庭捐贈協會，491

Farley, James，詹姆斯·法雷，469

Farm City project，農場城市項目，352,355,452

Farm colonies，農場安置區，325,345—353,451—454,459—461,471—473

Farmers' Alliance，農民聯盟，330—331

Farmers' Union，農民協會，330—331

Farm loan associations，農場貸款協會，336—337,339—340

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FSA），農業安全署，421,472,479—480

Farnam, Henry，亨利·法納姆，83,86,90,236,242,275

Fawcett, Millicent，米利森特·福西特:Political Economy for Beginners，《政治經濟學入門》，81

Federal Council of Churches，聯邦宗教協會，299

Federal Emergency Relief Administration，聯邦緊急救濟署，364,452,460,466

Federal Farm Loan Act（1916），《聯邦農業貸款法》（1916年），325,339—340

Federation of British Industries 英國工業聯盟，260

Feiler, Charles，查爾斯·費勒，373

Filene, Edward A.，愛德華·費林，459

Flower, Benjamin O.，本杰明·弗勞爾，67

Folk schools，民俗學校，353—354; in Denmark，在丹麥，357—358; in the U.S.，在美國，358—366,459—460

Folsom, Marion，馬里恩·福爾瑟姆，436

Food Administration，食品管理局，285,302,335

Food Ministry（Britain），食品部（英國），284

Forcey, Charles，查爾斯·福塞，276

Ford, George B.，喬治·福特，182,185,196,369—370

Ford, Henry，亨利·福特，367,371,373,377,390,403,410

Fordism，福特主義，368,371—372,375—376,386,389—390,407

Ford Motor Company，福特汽車公司，495

Forest Hills Gardens，森林山花園，27,163,184,200

Forest Service，林業服務，421

Form, Die，《形式》，393

Fortune，《財富》，393

Fosdick, Raymond，雷蒙德·福斯迪克，68

Foulke, William D.，威廉·福爾克，142

France，法國: agriculture in，農業，49,319; Americans on，美國人論及，37,41; Americans in the recon- struction of，法國重建時期的美國人，368—370; city planning in，城市規劃，166—168; cooperatives in，合作社，326,329—330; eco- nomic doctrines in，經濟學派，82—83; great cities in，大城市，47; higher education in，高等教育，85; housing in，住房，190,198; in- dustrialization of，工業化，45,49; labor in，勞工，59,281—282; municipal governance in，城市管理，121,126; mutual assistance associations in，互助會，14—15,217,219; during 1930s，1930年代，411—413,417—420; during 1940s，1940年代，506; and Paris expositions，與巴黎世界博覽會，8—12,14—15,17; poverty and poor relief in，貧困和窮人救濟，210—211,228; progressive poli- tics in，進步政治，55—58; social insurance in，社會保險，227,255,431; socialism in，社會主義，18,58,126; social maternalism in，社會家長制，228,241; subsidarist social policies in，補貼性社會政策，217,225,227; suffrage in，普選權，35; workplace regulation in，工作場所管理，235; during World War I，第一次世界大戰，280—284

Franchises, public utility 公用事業專營權，137,139—140,145—148

Franco-Prussian War，普法戰爭，280

Frankel, Lee K. 李·弗蘭克爾，248,262—264,268,284,440

Frankfurt, Germany，法蘭克福（德國），30,68,93—94,142—144,163,180,372; city planning in，城市規劃，176—178,182; housing in，住房，174,191,198,200,386—390,392—394,397,399,406; municipal ownership in，城市所有權，123; politics in，政治，124—125

Frankfurter, Felix，費利克斯·法蘭克福特，308,315

Fraser, Hamish，哈米希·福拉瑟，25—126

Fraternal Order of the Eagles，雄鷹兄弟會，220,431

Fraternal societies，兄弟會。See Mutual assistance associations:in the U.S.，參見互助會:在美國

Frazier, E. Franklin，富蘭克林·弗雷澤，355—356,358

Frederick, Christine，克里斯汀·弗雷德里克: The New Housekeeping，《新家政》，390,399

Freeman，《自由人》，313—314

Free trade，自由貿易，79,81—83,417

Frey, John，約翰·弗雷，40—41

Friendly societies，友好協會。See Mutual assistance associations:in Britain，參見互助會:在英國

Fuel Administration，燃料管理局，285,302

Full-Employment Bill（1946），充分就業法案（1946年），491,498—499

Functionalist explanations of social policy，社會政策的功能主義解釋，6,116,198—199,412—413

Furner, Mary，瑪麗·福納，105

Gaines, Ruth，露絲·蓋恩斯，369—370

Garden cities，花園城市，163,178—181,183—184,192,195,197—198,289,291,387,397,400,454—456,493

Garden City Association of America，美國花園城市協會，200

Garden Homes Corporation，花園房屋公司，197—198

Garfield, Harry，哈里·加菲爾德，290,302

Gary, Ind.，加里市（印第安那州），71

Gas supply，煤氣供應，117—118,120—122,127,129—130,132,135,137—138,144—145,152—153

Geddes, Patrick，帕特里克·格迪斯，10—11,30,64,193,291,396—397,488

Gener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全國總工會，312

General Strike（1926），大罷工（1926年），296

George, Henry，亨利·喬治，36,70,99,101,113,140,167,334; Progress and Poverty，《進步與貧困》，70,138

Georgia，佐治亞州，130

Germany，德國: agriculture in，農業，49,319,336—337,347,349; Americans on，美國人論及，37—39,87—89,95—98,141—144,271—279,370—371,397—399,421; city governance in，城市管理，124—125,207; city planning in，城市規劃，168,174—178; cooperatives in，合作社，327,329,341; economic doctrines in，經濟學派，82—83,89—95; great cities in，大城市，47; higher education in，高等教育，85,103—104,109; housing in，住房，174—175,190—191,198—199,381—183,386—391; industrialization of，工業化，45—47,49—50; interest in, England，英國對德國的興趣，60—61; interest in the U.S.，對美國的興趣，36,371—376; labor in，勞工，59,281—283,377; labor relations in，勞工關系，281—283; municipal ownership in，城市所有權，122—123,129—130; mutual assistance associations in，互助會，217,222; during 1930s，1930年代，411—413,417—419; during 1940s，1940年代，506; at Paris expositions，巴黎世界博覽會，9,13—14,17; poverty and poor relief in，貧困和窮人救濟，212,214; progressive politics in，進步政治，52,55,57,253—254; social insurance in，社會保險，17,54,221—226,259—261,283,430,433—434; socialism in，社會主義，18,36,57—58,125,126,225,296; suffrage in，普選權，18,35—36,53,124—125; during World War I，第一次世界大戰，280—284

Gesellschaft für Sozialreform，社會改革協會，253,283

Gide, Charles，查爾斯·紀德，12,16,29,51,82—83,329—330

Gilbert, Bentley，本特利·吉爾伯特，218

Gillette, George M.，喬治·吉列，249

Gilman, Charlotte Perkins，夏洛特·珀金斯·吉爾曼，66,314

Gilson, Mary，瑪麗·吉爾森，481

Gladstone, William，威廉·格萊斯頓，53—54,100,229,471

Glasgow, Scotland，格拉斯哥（蘇格蘭），45,121—123,125—126,133—140,142—144,148—149,151,153—154,156,158,165,189

Gleason, Arthur，阿瑟·格里森，299—300,308—313,397; British Labor and the War，《英國勞工與戰爭》，309; Inside the British Isles，《英倫三島》，309—310

Gneist, Rudolf von，魯道夫·馮·格奈斯特，77

Gohre, Paul，保羅·格勒，46

Goldmark, Josephine，約瑟芬·戈德馬克，237,283,354,379,421

Goldmark, Pauline，鮑林娜·戈德馬克，237,268,283

Gompers, Samuel，塞繆爾·岡珀斯，39,257—259,281,285,303,310—312,482,495,506

Goodnow, Frank J.，弗蘭克·古德諾，240,268

Gottingen, Germany，哥廷根（德國），138

Gould, E. R. L.，古爾德，63,65

Grangers，農民協進會，330—331,460

Grant Park（Chicago），格蘭特公園（芝加哥），170,172,208

Grattan, G. Hartley，哈特里·格拉頓，498

Gray, John H.，約翰·格雷，95,108

Gray, L. C.，格雷，471

Great cities，大城市，47—48

Great Eastern Casualty Company，大東方保險公司，262

Green, William，威廉·格林，250

Greenbelt, Md.，綠帶城（馬里蘭州），399,455—456,469,484

Greenbelt suburbs，綠帶郊區，399,455—456,459,461,468—469,473,483—484,493

Greendale, Wis.，綠谷城（威斯康星州），455—456,459

Greenwich House，格林威治館，64,182,464

Greenwood, Arthur，阿瑟·格林伍德，295

Gregory, Clifford，克里福德·格列高里，459

Gretna, Scotland，格雷特納（蘇格蘭），287—288,290

Gropius, Walter，沃爾特·格羅皮烏斯，375—376,388—389,393,403,495

Grundtvig, Nikolai Frederik Severin，尼古拉·弗里德里克·瑟弗林·格倫特維，357,365

Guild socialism，基爾特社會主義，293—294,299—300,386

H. J. Heinz Company，亨利·約翰·海因茲公司，16

Hadley, Arthur T.，阿瑟·哈德利，103,532n44

Hall, Helen，海倫·霍爾，441

Hamburg, Germany，漢堡（德國），39,118,122,124,174

Hamilton, Alice，愛麗絲·漢密爾頓，86,277,380,421

Hampstead Garden Suburb，漢普斯特德花園郊區，163,179—180,184,192,197,271,289,455

Hampton Institute，漢普頓學院，358

Hansen, Alvin，阿爾文·漢森，439,499

Hardie, Keir，基爾·哈迪，64,88,267

Harding, Warren，沃倫·哈定，379

Harlem River Houses（N.Y.C.），哈萊姆河社區（紐約市），468

Harper's，《哈珀斯雜志》，169,498

Harris, Seymour，塞莫爾·哈里斯，499—500

Harvard University，哈佛大學，30,66,81,85

Haskell, Thomas，托馬斯·哈斯克爾，51

Haussmann, Georges-Eugene，喬治·尤金·奧斯曼，139,164,166—168,170—174,178,181,187,201,203,370

Haven, Gilbert，吉爾伯特·哈文，36—37,41

Health cooperatives，健康合作社，454—455

Health insurance，健康保險，216—221,227,269,430—431; in Britain，在英國，56,218,232—235,260—261,300,490—491; in France，在法國，14,217,227,431; in Germany，在德國，13,217,223—225,261; in the U.S.，在美國，3—4,251—253,257,262—264,306,377—379,439,442—443,481,487,496—497,505,587n25

Hearst, William Randolph，威廉·魯道夫·赫斯特，136—137,148—150

Heclo, Hugh，休·赫克洛，25

Hegemann, Werner，沃納·赫格曼，183,197,199

Hellerau, Germany，海勒洛（德國），163

Henderson, Arthur，阿瑟·亨德森，281

Henderson, Charles R.，查爾斯·亨德森，64,73,237,243—244,251—252,256

Henry, Alice，愛麗絲·亨利，238

Henry Street Settlement，亨利街睦鄰中心，64,181,262,441

Higher education，高等教育，26; in Britain，在英國，85,109; in France，在法國，85; in Germany，在德國，85—86,88—89,110; in the U.S.，在美國，81,97—98,103—105,108—110

Highlander Folk School，高地人民俗學校，362—365

Hilfskassen，救濟會。See Mutual assistance associations: in Germany，參見互助會:在德國

Hillman, Sidney，西德尼·希爾曼，381,495

Hirsch, Max，麥克斯·希爾施，61

Hitchcock, Henry-Russell, Jr.，小亨利·拉塞爾·希契科克，406—407

Hitler, Adolf，阿道夫·希特勒，389,421

Hobrecht, James，詹姆斯·霍布瑞希特，168

Hobsbawn, Eric，埃里克·霍布斯邦，58

Hobson, J. A.，霍布森，267—269,276

Hodges, George，喬治·霍奇斯，64

Hoffman, Frederick，弗里德里克·霍夫曼，263—265

Holland. See Netherlands，參見荷蘭

Holmes, John Haynes，約翰·海恩斯·霍姆斯，274,283,314

Holmes, Oliver Wendell, Sr.，老奧利佛·溫德爾·霍姆斯，41

Home Colonization Commission（Germany），家園聚居委員會（德國），347

Home Owners's Loan Act（1933），《房主貸款法》（1933年），462

Homestead, Pa.，霍姆斯特德（賓夕法尼亞州），219

Hood, Robin，羅賓·胡德，459,470—471

Hoover, Herbert，赫伯特·胡佛，290,306,340—341,372,378—379,382,413—414,417,423—424,480

Hoover Dam，胡佛大壩，345,483

Hopkins, Harry，哈里·霍普金斯，423,440,458,466,482

Hopkins, J.A.H.，霍普金斯，314

Hopkins, Mark，馬克·霍普金斯，34

Horsfall, Thomas，托馬斯·霍斯福，182; The Improvement of the Dwellings and Surroundings of the People，《人們住房和環境的改善》，180

Horton, Myles，邁爾斯·霍頓，362—365

Hours-of-labor legislation，勞動時間立法，56,226,237—239,426

Housing，住房，161,187,190; in Australia，在澳大利亞，383—386; in Britain，在英國17,178—179,187—190,199,286—287,295—296,382—385,456,475—477; in France，在法國，11,190,200; in Germany，在德國，17,190—191,199—200,381—382,386—391,394; in the U.S.，在美國，164,191—201,204—205,286—289,302,382,391—395,400,401—404,406,448,461—468,473—479,552n6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國際會議，66,163,182,190,192,194,463,480。See also Slums，參見貧民窟

Housing Act（N.Y.，1926） ，《住房法案》（1926年，紐約），464

Housing Act（U.S.，1937） ，《住房法案》（1937年，美國），404,422,476—478

Housing associations, cooperative，住房合作社，191,467,475—477

Housing Authority（N.Y.C.），紐約市住房局，465—466

Housing Authority（U.S.） ，美國住房局，460,466,476—477

Housing Study Guild，住房研究公會，400,454

Housing and Town Planning Act（1909），《住房和城鎮規劃法》（1909年），180

Housing of the Working Classes Act（1890），《工人階級住房法》（1890年），188—189

Howard, Ebenezer，埃比尼澤·霍華德，179,183,192,195,396—397,400,404,452,455—456,483,493

Howe, Frederic C.，弗里德里克·豪威，52,67—69,73,123,129,139—144,152,155—159,160,162—164,170—171,182,203,206,270,272,274,277,279,313—315,344,350,354,356,376,379,400—401,421—422,447,457,507; The British City，《英國城市》，140; Socialized Germany，《社會化的德國》，275

Hughes, Charles Evans，查爾斯·埃文斯·休斯，144,150,184,248

Hull House，赫爾館，64,116,170,283,300,362

Humanite, L'，《人道報》，270

Hyndman, H. M.，海因德曼，36

Ickes, Harold，哈羅德·伊克斯，152,466,468

Ihlder, John，約翰·伊爾德，192—193,195,199,465

Illinois，伊利諾斯州，148,151,237,246

Immigrants，移民，49—50,219—220,245,258—259,305,310,331,347—350,359,422

Imperial Insurance Office（Germany），帝國保險局（德國），232,244,249

Independent，《獨立報》，256

Independent Labor Party（United States） ，獨立工黨（美國），314—315

Industrial accident insurance，工業事故保險:in Germany，在德國，223—225; in the U.S.，在美國，247—252,255,264,378,587n25。See also Workmen's compensation legislation，參見工人賠償立法

Industrial accidents，工業事故，254—247

Industrial Commission，工業委員會，110,242

Industrial Conference（Britain），工業會議（英國），294—295

Industrial Conference（United States） 工業會議（美國），304—305

Industrial Courts Act（1919），《勞資法庭法》（1919年），304

Industrial insurance companies，工業保險公司，218—220,253,261—265

Industrial Relations Counselors，產業關系咨詢公司，440—441

Industrialization，工業化，33,44—52,396—397

Infancy and Maternity Protection Act（1921），《母嬰保護法》（1921年），379

Information Ministry（Britain），信息部（英國），492

Inquiry on Cooperative Enterprise，合作企業調查，421,423,458,470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Travel，教育旅游協會，69,269—270,354

Institute of Social Service（League for Social Service），社會服務協會（社會服務同盟），16,27,63

Insull, Samuel，薩繆爾·英薩爾，151

Insurance，保險。See Burial insurance, Health insurance, Life insurance, Old-age insurance, Social insurance, Unemployment insurance，參見喪葬保險、健康保險、人壽保險、養老保險、社會保險、失業保險

Insurance companies，保險公司，218—220,223—234,242,246,248—250,253,255,259—265

Insurance Economics Society of America，美國保險經濟學協會，261

Interest group politics，利益集團政治，6,24,26,259—266

Interior Department，內政部，302,350,452,466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Labor Legislation，國際勞工立法協會，74,236,253,372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n Unemployment，國際失業問題協會，372

International Civic Bureau，國際公民局，69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n Social Insurance，國際社會保險委員會，372

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Labor Legislation，國際勞工立法大會，66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Public Assistance and Private Charity，公共資助和私人慈善國際大會，66,210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Social Insurance，社會保險國際大會，66,248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Unemployment，失業問題國際大會，66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國際合作社聯盟，331,456

International Garden City and Town Planning Federation（International Housing and Town Planning Federation），國際花園城市和城鎮規劃聯盟（國際住房和城鎮規劃聯盟），372,391,465

International Housing Commission，國際住房委員會，465

International Housing Congress，國際住房大會，66,552n69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Agriculture，國際農業協會，336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國際勞工組織，379,422,432,442,481,505

International Ladies' Garment Workers' Union，國際女裝工人聯合會，378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Trade UnionCongress，國際社會主義工會大會，88

International Tuberculosis Association，國際結核病協會，263

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美國州際商務委員會，109,150

Ireland，愛爾蘭，47,49,60,70,218,325,354,427; agricultural cooperatives in，農業合作社，321—323,328,332—335,338,341,343,366,472; Americans on，美國人論及，332; land reform in，土地改革，54,339,471

Irish Homestead，《愛爾蘭住宅》，333

Italy，意大利，85,247,380; agricultural in，農業，319,323,347; cooperatives in，合作社，13,327,329; during 1930s，1930年代，411,418,420,456; subsidarist social policy in，補貼性社會政策，227,248,255

Jackson, Gardner，加德納·杰克遜，472

James, Edmund J.，埃德蒙德·詹姆斯，81,84—85,95,99—103,105,107—108,132,135

James, Henry，亨利·詹姆斯，41

Jameson, J. Franklin，富蘭克林·詹姆森，98

Japanese Americans，日裔美國人，259,349—350

Jaurès, Jean，讓·饒勒斯，18,57,88,270

Jeanes, William，威廉·金斯，403

Jenison, Madge，麥吉·詹尼森，175

Jevons, Stanley，斯坦利·杰文斯，83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約翰·霍普金斯大學，85

Johnson, Emory R.，艾默里·約翰遜，85,108—109

Johnson, Hiram，希拉姆·約翰遜，301

Johnson, Hugh，休·約翰遜，423

Johnson, Joseph F.，約瑟夫·約翰遜，85

Johnson, Lilian，麗蓮·約翰遜，363

Johnson, Lyndon，林登·約翰遜，505

Johnson, Philip，菲利浦·約翰遜，406—407

Johnson, Tom L.，湯姆·約翰遜，68,138—141,146,148—149,156,169,171

Joint Board of Sanitary Control，衛生控制聯合委員會，68

Jones, Gareth Stedman，加瑞斯·斯特德曼·瓊斯，168

Jones, Samuel M.，薩繆爾·瓊斯，138—139,143

Josephson, Mathew，馬修·約瑟夫森，370,396,459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美國建筑師協會雜志》，287—289,299

Journal des économistes，《經濟學家學報》，98

Judson, Harry Pratt，哈里·普拉特·加德森，134—135

Kansas Court of Industrial Relations，堪薩斯勞資關系法庭，304

Kansas City, Mo.，堪薩斯市（密蘇里州），173

Kant, Immanuel，伊曼紐爾·康德，88

Kassen，救濟會。See Mutual assistance associations: in Germany，參見互助會:在德國

Kastner, Alfred，阿爾弗雷德·卡斯特納，403

Kathedersozialisten，講壇社會主義者，83—84,91—92,100,102,104,175,244,529n13

Kelley, Florence，弗洛倫斯·凱利，24,27,86,163,204,244,253,283,422; and Congestion Committee，與擁塞問題委員會，181,183—184; and minimum wage legislation，與最低工資立法，236—239,425

Kelley, Robert，羅伯特·凱利，5,88

Kellogg, Paul，保羅·凱洛格，182,267—268,298,308—312,380,420,422,424,443,445,507; British Labor and the War，《英國勞工與戰爭》，309—310

Kelly, Edmond，埃德蒙德·凱利，215

Kenny, May，梅·肯尼，41

Kerr, Philip，菲利浦·柯爾，375

Keynes, John Maynard，約翰·梅納德·凱恩斯，410—411,499—500

Keynesianism，凱恩斯主義，30,412,415,417,435,457,473,491,498—500

Keyserling, Leon，利昂·凱澤林，422

King, Martin Luther, Jr.，小馬丁·路德·金，362

Kingdon, John，約翰·金頓，6

Kingsbury, Mary，瑪麗·金斯伯里。See Simkhovitch, Mary Kingsbury，參見瑪麗·金斯伯里·西姆柯維奇

Kingsley, Charles，查爾斯·金斯利，100

Kingsley House，金斯利館，64

Knappschaften，礦工互助會，217,222

Knies, Karl，卡爾·克尼斯，98,102

Knights of Labor，勞工騎士團，10,58,99,101,105,330

Kohn, Robert，羅伯特·科恩，465,468

Krupp Industrial Works，克虜伯工業企業，17,46,163,179

Krutch, Joseph Wood，約瑟夫·伍德·克魯徹，371

Labor，勞工; and housing，與住房，384—391,401—404; and industrialization，與工業化，10,45,49—51,58—59; internationalism of，國際主義58,506; and social insurance，社會保險，234,257—258,435—436; and social politics，與社會政治，18—19,22—24; during World War I，第一次世界大戰，281—283,285,303—313; and postwar reconstruction，與戰后重建，291—296,303—305,313—316; during 1930s，1930年代，418—419,426; during World War II，第二次世界大戰，495—496。See also Labor Relations，Unions，參見勞工關系、工會

Labor Bureau，勞工局，30,62—63,65—66,136,140,238,243

Labor colonies，勞工殖民地，213—216,231,234,291,350—351,418—419

Labor Department，勞工部，284—285,300,311,350,422,441

Labor exchanges，勞工交流市場，123,225,231—232,252,301,425,441

Labor Housing Conference，勞工住房協會，403—404,465—466,473—474

Labor relations，勞工關系，51,55—56,59,68—69,210,281—283,296,377,418—419; 595n14; in Britain，在英國，59—60,281—283,285,291—296,300,308—310; In the U.S.，在美國，59,100,281—283,285,297,301—305,315,377,418,426,496,506。See also Unions，參見工會

Labour College，勞工學院，311

Labour Exchanges Act（1909），《勞工交換法》（1909年），441

Labour Ministry（Britain），勞工部（英國），490

Labour and the New Social Order，《勞工和新社會秩序》，293,297—299,306—308,311,314,489

Labour Party（Britain），工黨（英國），22,28,58,64,195,234,281,291—293,296—297,307—309,311,313—316,330,356,380,383,397,410—411,413,417,434,440,473,475,481,486,493—494,497

Labour Party（New Zealand），工黨（新西蘭），430

La Follette, Robert，羅伯特·拉福萊特，150,315—316,381,403,427,481

Lag, politics of，落后論政治，71—75,235,247,254,265—266,278—279,285—286,368—369,379—380,428,437,503—504

La Guardia, Fiorello，菲奧雷洛·拉瓜迪亞，138,447

Laidler, Harry，哈里·萊德勒，302,316

Laissez-faire，自由放任，76—84,90—93,97—108,111,291,411,427,449

Landmann, Ludwig，路德維希·蘭德曼，387,389

Land monopolization，土地壟斷，35—36

Land purchase, municipal，城市購買土地，175—177,180,191

Land Reclamation, Bureau of，農墾局，345,352

Land reform，土地改革:in Australasia，在澳大拉西亞，55,346—347,349—350; in Ireland，在愛爾蘭，54,332,339; in the U.S.，在美國，349—350,471—473

Landschaften，土地抵押信用合作社，336—339,365—366

Lane, Franklin K.，富蘭克林·萊恩，302,350,352

Lansbury, George，喬治·蘭斯伯里，214—215,308,311

Lasch, Christopher，克里斯托弗·拉希，279

Laski, Harold，哈羅德·拉斯基，276,424,503

Lathrop, Julia，朱莉亞·拉斯羅普，284,300

Laveleye，Émile de，埃米爾·德·拉維勒耶，83,97,102

Law and social politics，法律和社會政治，153,172—173,201—208,219,379,443,455,476

League for Land Reform（Bund für Boden-besitzreform），土地改革聯盟，175

League of Nations，國際聯盟，379

League for Political Education，政治教育聯盟，136

League for Social Service（Institute of Social Service），社會服務同盟（社會服務協會），16,63

Le Corbusier（Charles-Édouard Jean-neret），勒·柯布西耶（查爾斯—愛德華·讓納雷），388,392—393,402—403; Vers une architecture，《走向新建筑》，375

Leiserson, William M.，威廉·萊塞森，252,438

L'Enfant, Pierre Charles，皮埃爾·查爾斯·朗方，165,169

Lenin（Vladimir Ilich Ulyanov），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374,380

Leo XIII，列奧十三世（教皇），524n24

Lerner, Max，馬克斯·倫納爾，497

Letchworth, England，萊奇沃思（英格蘭），163,179—180,187,192—193,195,197,289,397,454—455

Leuchtenburg, William，威廉·洛伊希滕貝格，448

Lever, William，威廉·萊弗，17,178

Lewis, John L.，約翰·劉易斯，316

Liberal Party（Britain），自由黨（英國），56—57,127,222,229—230,232,245,247,270,302,307,411,420,424,489,493,504

Liberal Party（Sweden），自由黨（瑞典），413

Liberty and Property Defence League，保護自由和財產同盟，128

Liebknecht, Wilhelm，威廉·李卜克內西，36,88

Life insurance，人壽保險，218,242,262,377—378

Lilienthal, David，戴維·利連撒爾，457

Limited dividend housing associations，有限贏利住房協會，187—188,190—192,196,200,387—388,463—464,467,475—477

Lindeman, E. C.，林德曼，381

Lindeman, Hugo，胡戈·林德曼，61,175

Lindsay, Samuel McCune，薩繆爾·麥格文·林塞，85,87—88,95,108,237,268

Lippman, Walter，沃爾特·李普曼，269,278—279,305,332

Lissner, Meyer，麥耶·李斯納，297—298

List, Friedrich，弗里德里希·李斯特，82

Livepool, England，利物浦（英國），17,49—50,178,189,192

Lloyd, Henry Demarest，亨利·德馬雷斯特·勞埃德，55—56,66—68,73,228,332,457,504

Lloyd George, David，戴維·勞合·喬治，53,56—57,59—61,230—234,240,251,254—257,259—260,265—266,284,290—291,294—295,297,301—303,305,411,423—425,430,438,444

Local Government Board（Britain），地方管理局（英國），154,178,180,439

Loch, Charles，查爾斯·洛赫，65

Lohmann, Theodor 西奧多·洛曼 25

London, England，倫敦（英國），8,37,41,47—48,113,118,135—138,140,142,147,150,152,164,192,265,488; housing in，住房，133,138,192,383; labor in，勞工，10,231,286—288; municipal ownership in，城市所有權，16,38,115,119,127—129,143—144,158,166; politics in，政治，56,114,124,126—129,149,154; poverty in，貧困，13,26,114,192,212—214

London, Jack，杰克·倫敦，114

London, Meyer，麥耶·倫敦，242,257

London County Council（LCC），倫敦市政議會，127—129,131,138,154,189,192,203,287,383,473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倫敦經濟學院，85,136

Loria, Achille，阿基爾·洛里亞，108

Low, Seth，塞思·洛，137—138

Lowell, Mass.，洛厄爾（馬薩諸塞州），164,197—198,200,289,429,463

Lubeck, Germany，盧貝克（德國），398

Lubin, David，戴維·魯賓，336—339,341,422

Lubin, Isador，伊薩多·魯賓，439,441

Lynd, Robert，羅伯特·林德，370—371

Macarthur, Mary，瑪麗·麥克阿瑟，64

MacDonald, Ramsay，拉姆齊·麥克唐納，42—43,64—65,298,306—307,311

MacRae, Hugh，休·麥克雷，352,355,452

Macy, Jesse，杰斯·梅西，132

Madison, Wis.，麥迪遜（威斯康星州），31,321

Magdeburg, Germany，馬格德堡（德國），386

Maltbie, Milo，米羅·莫爾特比，137,144,151,155,162

Manchester, England，曼徹斯特（英國），45,192—193,383

Manchester economics（Manchestertum），曼徹斯特經濟學，82—83,97,102,110,222,427。See also Laissez-faire，參見自由放任

Mann, Tom，湯姆·曼，65

Mansbridge, Albert，阿爾伯特·曼斯布里奇，311,460

Manufactured goods, shares in world output of，制成品，世界產量的份額，44,46,373,501

Margarethenhöhe, Germany，瑪格麗特花園城（德國），163,179

Markets, public，公共市場，128,130,152

Marot, Helen，海倫·馬洛特，299

Marsh, Benjamin，本杰明·馬什，182—185,195,208,268,313,315; An Introduction to City Planning，《城市規劃概論》，182

Marshall, Alfred ，阿爾弗雷德·馬歇爾，79

Marshall Plan，馬歇爾計劃，502,506

Martin, John W.，約翰·馬丁，65,136,182—183

Marx, Karl，卡爾·馬克思，58,70,90—92,140,276,375

Marx, Wilhelm，威廉·馬克斯，125

Marxism，馬克思主義，70—71,100,126,329,374,411,493

Massachusetts，馬薩諸塞州，196,200—201,203,205—206,219—220,239—240,250,253,260—261,289

Massachusetts Commission on Old Age Pensions, Annuities and Insurance，馬薩諸塞養老金、年金和保險委員會，240

Massachusetts Homestead Commission，馬薩諸塞宅地委員會，196—197,289

Massingham, H. W.，馬辛厄姆，373

Masterman, Charles F. G.，查爾斯·馬斯特曼，188,230—231

Maternalism, social，社會母性，19—20,228,239—241

Matignon Agreement，《馬蒂尼翁協議》，418

Maurer, James，詹姆斯·莫勒，431

Maurice, Frederick Denison，弗里德里克·丹尼森·莫里斯，100

May, Ernst，恩斯特·梅，387—390,393—394,399—400,406,420,483

Mayer, Albert，阿爾伯特·梅耶，465,467

Mayo-Smith, Richmond，里士滿·梅奧—史密斯，102

McAdoo, William，威廉·麥卡杜，301—302

McCarthy, Charles，查爾斯·麥卡錫，71,73,321—324,328,332,334—335,354,440

McClure's，《麥克盧爾》雜志，38,67,149

McCormick, Medill，米迪爾·麥考密克，57

McDowell, Mary，瑪麗·麥克道爾，64,300

McKim, Mead, and White，麥基姆、米德與懷特建筑公司，169

McNeill, George E.，喬治·麥克尼爾: The Labor Movement，《勞工運動》，99

Mead, Edwin，埃德溫·米德，66

Mead, Elwood，艾爾伍德·米德，345—353,362,366,367,408,427,449,452—453,473

Mearns, Andrew，安德魯·默恩斯:The Bitter Cry of Outcast London，《被拋棄倫敦的哀號》，47,65

Meeker, Royal，羅亞爾·米克，479

Mendelsohn, Erich，恩里希·門德爾松，373,376,389

Merritt Parkway，邁瑞特觀光道，484

Merxplas, Belgium，梅爾克斯普拉斯（比利時），215

Merz, Charles，查爾斯·梅爾茲，314

Metropolitan Board of Works（London），倫敦市政工程委員會，127,154

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248,262—265,440

Metropolitan Water Board（London），倫敦大都會供水局，115

Meyer, B. Henry，亨利·梅耶，109,155

Michigan City, Ind.，密歇根市（印第安納州），219

Middle Class Defence Association，保護中產階級協會，128

Milbank Memorial Fund，米爾班克基金會，439,442,600n56

Mill, John Stuart，約翰·斯圖爾特·穆勒，79,100,102,375;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經濟學原理》，84

Millerand, Alexandre，亞歷山大·米勒蘭，18,253,281

Milton, John，約翰·彌爾頓，306

Milwaukee, Wis.，密爾沃基（威斯康星州），146,152,197—198,459

Miner's Federation（Britain），礦工聯合會（英國），293—294,397

Minimum wage legislation，最低工資立法，226,228,238—239,301,379,425—426

Minnesota Employee's Compensation Commission，明尼蘇達雇工賠償委員會，242,249

Miquel, Johannes，約翰內斯·米凱爾，94,190

Modernism，現代主義，388,392—393; commercial，商業的，405—407; social，社會的，386—391,394—395,398,400—401,403—404,408,455—456

Moeschen, Katie，卡狄·莫西欽，205

Moholy-Nagy, Sibyl，西比爾·莫霍利·納吉，406

Monopolies，壟斷，107—108,117—118,132,136,140,146—148,340—342

Morgan, Arthur，阿瑟·摩根，457

Morgan, Kenneth，肯尼思·摩根，71

Morgan, Lewis Henry，劉易斯·亨利·摩根，41,166

Morris, William，威廉·莫里斯，287

Morrison, Herbert，赫伯特·莫里森，473

Moses, Robert，羅伯特·莫斯，507

Mothers' pensions，母親補貼，240—241,252,255,437

Muckrakers，扒糞者，136,140,149,151,157,245

Muller v. Oregon（1908），穆勒訴俄勒岡案，238

Mumford, Lewis，劉易斯·芒福德，167,299,383,395—402,406,408,409,455,465,467—468,483—484,507; The City in History，《城市發展史》，399; The Culture of Cities，《城市文化》，395,399,483;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技術與文明》，395

Municipal Affairs，《城市事務》，137

Municipal land purchases，城市土地購買，175—177,180,191

Municipal ownership（municipalization），城市所有權（市營化），115—117,119—120,125—126; in Britain，在英國，115,119—122,126—130; in France，在法國，121; in Germany，在德國，122—123,129—130; in the U.S.，在美國，107—108,130—158,447

Municipal Ownership League（N.Y.C.），城市所有權聯盟（紐約市），149

Municipal Research, Bureau of，城市研究局，68

Municipal socialism，城市社會主義，16,123—124,126,128—129,137,384—385。See also Municipal ownership，參見城市所有權

Munitions Ministry（Britain），軍需部（英國），283—284,286—291,425,464

Musée Social，社會博物館，11—12,14,16—17,26,30,61,63,108,190,370

Museum of Modern Art，現代藝術博物館，393,406—407,466—467

Mussolini, Benito，貝尼托·墨索里尼，380,420,423

Mutual assistance associations，互助會，216—217,220—221,227; in Britain，在英國，17,216—219,233—234,259,261,265,444,490; in France，在法國，14—15,17,54,217,219,227,241,265; in Germany，在德國，54,217,222—224,259,261,444; in the U.S.，在美國，219—220,259—260,265

Myrdal, Gunnar，綱納·繆達爾，410

Napoleon Bonaparte，拿破侖·波拿巴，41

Napoleon III（Louis Napoléon），拿破侖三世（路易·拿破侖），37,41,53—54,119,166—167,217,229

Nathan, Maud，莫德·內森，237,253

Nation（Britain），《國家》（英國），67,375

Nation（United States），《國家》（美國），69,84,300,305,307,314—315,467,497—498,500

National Anti-Sweating League，全國反血汗工廠聯盟，238

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全國有色人種促進協會，66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using Officials，全國住房官員協會，420—421,464—465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全國制造商協會，68,260,436,482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 Estate Boards，全國不動產協會，391,474

National Cash Register Company，國家收銀機公司，16

National Catholic War Council，全國天主教戰爭委員會，299

National Child Labor Committee，國家童工問題委員會，27,110

National Civic Federation，全國公民聯盟，28,68,149,192,247—249,256,258,260,263,269,300,311,433,480

National Committee on Small Farm Ownership，小農場所有權全國委員會，471

National Conference of Charities and Corrections，美國慈善和矯治會議，243—244,251,254,263

National Conference on City Planning，全國城市規劃會議，196

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cial Insurance，全國社會保險會議，252

National Consumers' League，全國消費者聯盟，27,63,110,163,181,236—239,268,379,464

National Cooperative Council，全國合作社協會，459

National Country Life Conference，全國鄉村生活會議，326

National Electric Light Association，全國電力照明協會，151

National Employment System Act（1933），《全國就業體系法》（1933年），425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Act，國民保健服務法，493

National Housing Act，全國住房法，462

National Housing Association，全國住房協會，27,192—194,269,286,463,465

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全美工業會議理事會，300,433,436,440

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1933） ，《全國工業復興法》（1933年），409,426,449,452,464,467,471

National Insurance Act（1911），《國家保險法》（1911 年），60,63,233—235,251,255—256,260—261,430

National Insurance Act（1945），《國家保險法》（1945年），493

Nationalization，國有化，278,281,284,292—293,295,297,300—310,303,305,308,493—494

National Labor Board，全國勞工委員會，426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全國勞工關系法》，415,418,422,436

National Labor Union，全國勞工聯合會，330

National Municipal League，全國市政聯盟，142,203,301

National Policy Committee，國家政策委員會，496

National Publc Housing Conference，全國公共住房協會，464—465,473—474

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NRA），國家工業復興總署，410,415,418,421,423—425,428,489

National Resources Planning Board（NRPB），全國資源計劃委員會，496—500

National Retail Lumber Dealers' Association，全國木材零售商協會，474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Germany），國家社會主義黨（德國）。See Nazism，參見納粹主義

Natural monopolies，天然壟斷，107—108,118,132,140

Naumann, Friedrich，弗里德里希·瑙曼，11,52,274

Nazism，納粹主義，389,394,410—411,418,421,434,456

Neighborhood Guild，鄰里公會，64

Netherlands，荷蘭，60,214—215,389,392—393,483

Nettlefold, John，約翰·奈特福德，180,182,188

Neue Frankfurt, Das，《新法蘭克福》，389,405

New Deal，新政，2,7，22,25—26,28,108,158,222,306—307,317,319—320,325—326,346,366,384,399—400,403,409—484,487,489,494,496—497,499,504—505

New England Magazine，《新英格蘭雜志》，66

New Orleans, La.，新奧爾良（路易斯安那州），131

Newport News, Va.，紐波特紐斯（弗吉尼亞州），289

New Republic，《新共和》，63,66—67,86,269,273,276,278—279,297—299,307,310,312,314—315,400—401,452,497

Newsholme, Arthur，阿瑟·紐修姆，439

New Statesman，《新政治家》，297,374—475

Newsweek，《新聞周刊》，497,499

New Towns Act（1946），《新城法》（1946年），195,456,493

New York（State），紐約州，150,152,184,186,193—194,204—205,215,247—248,250—251,262,305,379,438,463—464,476

New York Association for Improving the Condition of the Poor，紐約改善窮人條件協會，16,136

New York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紐約勞工統計局，109

New York City，紐約市，21,42,65,71,164—219,252,265,373,507; city planning in，城市規劃，131,161—162,165,168—169,172,181—186,203,372—373; housing in，住房，15,24,48,174—175,192—193,199—200,205,397,402,463—464,468,477; municipal ownership in，城市所有權，16,135—139,149,146—147,149,151—152,447; politics in，政治，134—135,154,156; poverty in，貧困，114,213; progressives in，進步人士，16,27,136—138,181—182,464

New York City Mayor's Committee on Unemployment，紐約市長的失業問題委員會，252

New York City Rapid Transit Commission，紐約市快速交通委員會，147

New York Consumers' League，紐約消費者聯盟，237,422

New York Herald Tribune，《紐約先驅論壇報》，492

New York State Commission on Employers' Liability，紐約州雇主責任委員會，248,438

New York State Federation of Labor，紐約州勞工聯合會，251

New York Times，《紐約時報》，137,305,499

New Zealand，新西蘭，61,70,164,197,410; land reform in，土地改革，55; old-age pensions in，養老金，59,228,230; progressive politics in，進步政治，55—56,58; social insurance in，社會保險，250,255,430,435,505

Niebuhr, Reinhold，萊因霍爾德·尼布爾，362

Nock, Albert Jay，阿爾伯特·杰伊·諾克，314

Nolen, John，約翰·諾倫，289,352,380,391—392,455,465

Norris, Tenn.，諾里斯（田納西），410,459,473

North Carolina，北卡羅萊納州，322—323,331,352,355—357,452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ettlement（Chicago），西北大學睦鄰中心（芝加哥），64

Norway，挪威，227,250,271,479

Novak, William，威廉·諾瓦克，80

Nuremberg, Germany，紐倫堡（德國），271

Oberlaender Trust，奧伯蘭德基金會，380,421

Ohio，俄亥俄州，250,261,438

Ohio Commission on Unemployment Insurance，俄亥俄失業保險委員會，438

Old-age insurance，養老保險，255,258,430; in Britain，在英國，430—431; in France，在法國，227,229—231,255,431; in Germany，在德國，223—224,230,241,283; in the U.S.，在美國，242,251—252,429,435,438,441—445

Old-age pensions，養老金，258,419,430—431; in Britain，在英國，229—232,430,490; in Denmark，在丹麥，228,230,430; in New Zealand，新西蘭，228,230; in the U.S.，在美國，239—240,244,251—252,255,378,429,431—432,436,438,443

Old Age Pensions Act（1908），《養老金法》（1908年），230,232,235

Olds, Leland，利蘭·奧爾茲，458—459,470

Olmsted Frederick Law，弗雷德里克·勞·奧姆斯特德，40,165,168

Omaha, Neb.，奧馬哈（內布拉斯加州），152

Ontario, Canada，安大略省（加拿大），152

Orwell, George，喬治·奧威爾，384

Oud, J. J. P. 奧德，388—389,393,399

Our Day，《我們的時代》，99

Outlook，《瞭望》，67

Owenities，歐文主義者，329,366

Oxford University，牛津大學，85,100,109,113

Ozone project，奧佐恩項目，362,364

Palmer, Charles，查爾斯·帕爾默，465—466,475,477

Paris, France，巴黎（法國），37,41,47,114,119,132—133,138,147,192,270—271,371,391; city planning in，城市規劃，139,161—162,164,166—168,170—174,178,181,201,203,370; expositions in，博覽會，8—17,19—20,25,29—31,60,72,163,209—210,226,263,268,318,405; housing in，住房，198,392—393

Park, Robert E.，羅伯特·帕克，38—39,362

Parkhurst, Charles，查爾斯·帕克赫斯特，16

Parks，公園，127,131—132,136—137

Parsons, Frank，弗蘭克·帕森，73

Parti Ouvrier（Belgium），社會工人黨（比利時），58,330

Parti Ouvrier（France），社會工人黨（法國），58

Patten, Simon，西蒙·帕滕，84—85,97,101,182,275

Peabody, Francis G.，弗朗西斯·皮博迪，215

Peabody Trust，皮博迪信托公司，188,192—193

Pearson's Magazine，《皮爾遜雜志》，276

Pease, E. R.，皮斯，72

Pells, Richard，理查德·佩爾斯，413

Pennsylvania，賓夕法尼亞州，130,240

People's Reconstruction League，人民重建聯盟，313

Perkins, Frances，弗朗西絲·珀金斯，409,422,424—426,436—438,440—443,450,466,505

Phelan, James D.，詹姆斯·費倫，135

Philadelphia, Pa.，費城（賓夕法尼亞州），107—108,131—132,145,154,164—165,172,174,213,219,382,403

Philippines，菲律賓，421

Pickett, Clarence，克拉倫斯·皮科特，452

Pinchot, Amos，阿莫斯·平肖，314

Pinchot, Gifford，吉福德·平肖，57,64,332,334—335,352

Pine Mountain Settlement，松山定居點，361

Pingree, Hazen，黑曾·平格里，135,138,147,152

Pink, Louis，路易斯·品克，389,391—392,394,464,466

Piscator, Maria，瑪利亞·皮斯卡托，375

Pitt, William，威廉·皮特，78

Pittsburgh, Pa.，匹茲堡（賓夕法尼亞州），78

Planned rural settlements，規劃的農業定居點。See Farm colonies，參見農場安置區

Playgrounds，運動場，132,136,369

Plumb, Glenn，格林·普拉姆，303

Plumb Plan，普拉姆計劃，303,305,313

Plunkett, Horace，霍勒斯·普倫基特，16,267,321—323,328,331—335,337—338,354,365—366,367,449,452,472

Poe, Clarence，克拉倫斯·坡，322—324,351—352,354,376,408,322,452,471; How Farmers Co-operate，《農民如何合作》，332; A Southerner in Europe，《南方人在歐洲》，323

Polanyi, Karl，卡爾·波拉尼，460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政治學季刊》，98

Poor relief，窮人救濟，29,209—213,216,227—230,239—241

Popular Front，人民陣線，411,413,417—418

Populist Party（United States），人民黨（美國），51,67,112,315,319,322—323,334

Port Sunlight, England，日光港（英國），163,178,180,182,195,197

Post, Langdon，朗頓·波斯特，465

Post, Louis，路易斯·波斯特，350

Post Office Department，郵政部，438,444

Poverty，貧困，13,26,114,175,209—216,227—230,239—241,321,324,370—371,429,500—501

Prague, Czechoslovakia，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399

Prairie Farmer，《草原農場主》，459

Praunheim, Germany，普勞恩海姆（德國），387,393

President's Committee on Farm Tenancy，總統農場租賃委員會，471

President's Homes Commission，總統住房委員會，196,198

Preussische Jahrbücher，《普魯士年鑒》，98

Price, George，喬治·普萊斯，68

Procter and Gamble Company，寶潔公司，378

Progressistes，《進步主義者》，521n34

Progressive Farmer，《進步農場主》，322,351

Progressive Party（London），進步黨（倫敦），127—129,135—136,154,189

Progressive Party（United States） 進步黨（美國），57,69,74,152,242,251,314—315,464

Progressive People's Party（Fortschrittliche Volkspartei），進步人民黨，52

Promotionalism，促銷主義，30,324,560—561n61

Property, political powers of，財產的政治力量，103—104,118,206—208

Property Owners Association（Hamburg），財產所有者協會（漢堡），118

Prospect Park（Brooklyn），展望公園（布魯克林），168—169

Prudential Insurance Company，保德信保險公司，262—265

Prussia，普魯士。See Germany，參見德國

Public Health Act（1848），《公共衛生法》（1848年），118

Public Health Ministry（Britain），公共健康部（英國），291

Public Ownership League，公共所有權聯盟，152

Public utilities commissions，公共服務委員會，109,150—151,155—156

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PWA），公共工程署，465—468,476

Public Works Board（Britain），公共工程委員會（英國），188

Pullman, Ill.，普爾曼（伊利諾斯州），179

Quakers，貴格派，178,369,384,452

Queensbridge（N.Y.C.），皇后橋（紐約市），477

Quincy, Josiah，喬賽亞·昆西，135—136,143

Radford, Gail，蓋爾·拉德福，382

Radical Party（France），激進黨（法國），14,55—56

Raffeisen, Friedrich Wilhelm，弗里德里希·威廉·賴夫艾森，321,325,327—329,336—337,340,342,353,366

Railroad Administration，鐵路管理局，283,285,301

Railroad Labor Board，鐵路勞工委員會，304,315

Randsiedlungen，臨時棚屋區，418,452

Rathbone, Eleanor，埃莉諾·拉斯伯恩，491

Reading, Pa.，雷丁（賓夕法尼亞州），173

Reagan, Ronald，羅納德·里根，486

Reconstruction: A Herald of the New Time，《重建: 新時代的來臨》，299

Reconstruction Committee（Britain），重建委員會（英國），290,295,309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重建金融公司，424—425,444

Reconstruction Ministry（Britain） ，重建部（英國），291,294,297

Reconstruction planning，重建計劃，290—317,493,495—496

Record, George L.，喬治·萊考德，314

Red Hook（N.Y.C.），紅鉤社區（紐約市），477

Reeves, William Pember，威廉·彭伯·里夫斯，61

Reform Club（N.Y.C），改革俱樂部（紐約市），137,151,155

Reims, France，蘭斯（法國），369—370

Reiss, Richard，理查德·萊斯，475

Republican Party（United States），共和黨（美國），4,28,138,154,202,301,306,340,413,428,443,469,487,505,561n61

Resettlement, agricultural. See Agricultural resettlement，參見農業重新安置

Resettlement Administration，重新安置署，410,427,448,452—455,457,459—461,468—470,472,493

Reuther, Victor，維克多·魯瑟，506

Reuther, Walter，沃爾特·魯瑟，495,506

Review of Reviews，《評論之評論》，66—67,123,132

Ricardo, David，戴維·李嘉圖，91,375

Richmond, Va.，里士滿（弗吉尼亞州），152

Riis, Jacob，雅各布·里斯，24,210; How the Other Half Lives，《另外一半如何生活》，47

Rivers and Water Supply Commission（Victoria, Australia），河流和供水委員會（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346

Robinson, Charles Mulford，查爾斯·馬爾福德·羅賓遜，169,183,195

Rochdale, England，洛奇代爾（英國），326—327,329,365,470

Rockefeller, John D.，約翰·洛克菲勒，243,333

Rockfeller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會，290,420,440,496

Roebling, John，約翰·羅布林，397

Romerstadt, Germany，羅默斯塔特（德國），387,390,393,399,478,483—484

Roosevelt, Eleanor，埃莉諾·羅斯福，452,466

Roosevelt, Franklin D.，富蘭克林·羅斯福，25,27,152,400,409—410,413,417,420,422,424—428,435,440—441,446,448—450,452—453,458,462,464,466,468—470,479,489,494—496,499; on Europe，論歐洲，56,422—424,458,495—496,505; on social insurance，論社會保險，437—438,443—444,496

Roosevelt, Theodore，西奧多·羅斯福，30,56—57,59,65,71,74,112,229,247,251,254,256—257,265,269,276,297—298,302,303,331—332,334,450

Roscher, Wilhelm，威廉·羅塞爾，98,102

Roskilde, Denmark，洛斯基爾德（丹麥），357

Ross, E. A.，羅斯，39

Rotterdam, Netherlands，鹿特丹（荷蘭），389,393

Rousiers, Paul de，保羅·德·魯西耶，108

Rowe, Leo S.，列奧·羅韋，85,108,143,163

Rowntree, Seebohm，西伯姆·朗特里，219,283,291,309—310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Aged Poor（Britain），皇家老齡窮人委員會（英國），229

Rubinow, Isaac M.，伊薩克·魯賓諾，242—244,251—252,255,257,264,306,373,422,433,439,441,480

Rühl, Alfred，阿爾弗雷德·魯爾，373

Ruskin, John，約翰·羅斯金，91,106,396

Russell, Charles Edward，查爾斯·愛德華·拉塞爾，67,156

Russell, George W.（AE），喬治·羅素（筆名AE），333,338,343,354,360,365—366,396,400,421—422,451,459

Russell Sage Foundation，拉塞爾·塞奇基金會，27,163,183,194,200,247—248,262,283—284,360,440

Russia，俄國，13,49,292。See also Soviet Union，參見蘇聯

Ryan, John A.，約翰·瑞恩，238

Salvation Army，救世軍，214

San Francisco, Calif.，舊金山（加利福尼亞州），135,152,170

Sapiro, Aaron，阿倫·薩皮羅，341,367

Schlesinger, Arthur, Jr.，小阿瑟·施萊辛格，487

Schmidt, Robert，羅伯特·施米特，373

Schmoller, Gustav，古斯塔夫·施穆勒，62,77,82,90,92—95,98,102,106,108—109,175,222,236,274

Schonberg, Gustav，古斯塔夫·勛伯格，102;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經濟學手冊》，98

Schulze-Delitzsch, Hermann，赫爾曼·舒爾采—德里奇，61,327,329,336,366

Science，《科學》，102—103

Scotland，蘇格蘭。See Britain，參見英國

Scudder, Vida，維達·斯庫德，64

Seager, Henry Rogers，亨利·羅杰斯·西格，85,244,248,251—252,284

Seatle, Wash.，西雅圖（華盛頓州），152

Seeger, Charles，查爾斯·西格，460

Seligman, E. R. A.，塞利格曼，95,99—103,106—107,109,203,237,242,268

Settlement house movement，睦鄰中心運動，64—65

Shadwell, Arthur，阿瑟·莎德威爾，42—43,46,154,235

Shaw, Albert，阿爾伯特·蕭，65—66,81,132—136,139—142,155,158—159,160,168,352;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Continental Europe，《歐洲大陸的城市管理》，133; Municipal Government in Great Britain，《大不列顛的城市管理》，133—134

Shaw, George Bernard，蕭伯納，396

Shearon, Marjorie，馬喬里·希倫，505

Sheehan, James，詹姆斯·施翰，82

Shepard, Walter，沃爾特·謝潑德，409

Sherman, P. T.，謝爾曼，258—259

Shipbuilding Labor Adjustment Board，造船勞工調節委員會，284

Shipping Board，航運委員會，285

Sickness insurance，疾病保險。 See Health insurance，參見健康保險

Siedlungsbau，住宅區，393,397—398,400,406,468

Siegfried, André，安德烈·西格弗里德，372—374

Siegfried, Jules，朱爾·西格弗里德，16,190

Simkhovitch, Mary Kingsbury，瑪麗·金斯伯里·西姆柯維奇，237,314,464; and housing reform，與住房改革，182—183,462,464—466,473—474,606n106; as student in Germany，德國留學，85—86,88,96

Single tax，單一稅，139—140,176,182,184,287,314,347; See also George, Henry，參見亨利·喬治

Skocpol, Theda，塞達·斯科波爾，240,560—561n61

Slaughterhouses，屠宰場: public，公共的，128,130; cooperative，合作的，328

Slums/slum clearance，貧民窟/貧民窟清理，119—120,122,127,161,168,188—190,192—193,198,200,205,295,394,465,474—478

Small, Albion，阿爾比恩·斯莫爾，98,275

Smillie, Robert，羅伯特·斯邁利，397

Smith, Adam，亞當·斯密，78—79,82,92,375

Smith, Alfred E.，阿爾弗雷德·史密斯，152,215,391,463

Smith, Hilda Worthington，希爾達·沃星頓·史密斯，460

Smith College Relief Unit，史密斯學院救援隊，369

Smith-Lever Act（1914），《史密斯—利弗法案》（1914年，又稱“農業推廣法”），333

Social Catholicism，社會天主教，524n24

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社會民主聯盟，36,58

Social Democratic Party（Britain），社會民主黨（英國），57

Social Democratic Party（Germany），社會民主黨（德國），36,58,88,90,103,125—126,225,296,372,496

Social Democratic Party（Sweden），社會民主黨（瑞典），58,319,411,419,457,486

Social economics，社會經濟學，11—20,25,27,29—30,65,78—79,82,93,209—210,513n5

Social gospel movement，社會福音運動，55,63—65,86—87,92,106,524n24

Social insurance，社會保險，17,28—29,60,63,216,430—431; characteristics of，特征，221—222; in Britain，在英國，230—235,259—261,430—431,433—434,489—494; in Germany，在德國，13,17,54,95,221—226,259—261,434; in the U.S.，在美國，241—266,284,301,377—379,428—446,481—482,496—49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n，國際會議，60,66,248,372。See also Healthinsurance; Industrial accident insurance; Old-age insurance; Unemployment insurance，參見健康保險、工業事故保險、養老保險、失業保險

Socialism，社會主義，11,13—14,24,99,126,326,329—330,374,411,418—420; growing power of，增強的力量，17—19,58; as a rhetorical term，作為修辭用語，83,106—107,215,298,505; in Britain，在英國，65,100,127,213—214,281,292—294,297,308,493—494; in France，在法國，126,213,277,281,296,420; in Germany，在德國，57,88—90,125—126,281,296,386—387,411; in the U.S.，在美國，143,197—198,242—244,277—278,299,311,315。See also Guild socialism; Municipal socialism, State socialism，參見基爾特社會主義、城市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

Socialist Labor Party（United States），社會主義工人黨（美國），58,70

Socialist Party of America，美國社會黨，242,315

Social maternalism，社會母性主義，19—20,228,239—241

Social modernism，社會現代主義。See Modernism，參見現代主義

Social Museum（Frankfurt），社會博物館（法蘭克福），372

Social Museum（Paris）. See Musée Social，參見社會博物館（巴黎），16

Social Progress，《社會進步》，16

“Social question”，“社會問題”，12,20,27,73,210,226,318,321,524n24

Social Reform Club（N.Y.C.），社會改革俱樂部（紐約市），248

Social Security Act（N.Z.1938），《社會保障法》（1938年，新西蘭），435

Social Security Act（U.S. 1935），《社會保障法》（1935年，美國），26,422,425,428—430,435—446,449,462,477—478,482,487,494—495,505

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社會保障管理局，505

Social Security Board，社會保障局，445

Social Service Review，《社會服務評論》，436

Société d'économie sociale，社會經濟協會，108

Société française des habitations à bon marché，法國廉價住房協會，190,200

Société de secours mutuels，互助協會。See Mutual assistance associations:in France，參見互助會:在法國

Solidarism，社會連帶主義，14—15,18,28,106,195,227,244,256,324,449

Sorbonne，索邦（巴黎大學），85

Soule, George，喬治·索爾，452

Southern Commercial Congress，南方商業大會，337,363

Southern Policy Association，南方政策協會，472

Southern Tenant Farmers' Union，南方佃農聯盟，472

Southern Workman，《南方工人》，358

Soviet Union，蘇聯，374,380—381,390,398,411,420,451,454,459,479—480,503,505。See also Russia，參見俄國

Soziale Bauwirtschaft，《社會建筑業》，389

Stacy, Enid，伊尼德·斯泰西，65

Standards of living，生活水平，50,62,370—374,392,500—501

State socialism，國家社會主義，13,29,61,88—89,91—92,277—279,310

Stead, William T.，威廉·斯特德，63,65—66,132—133

Steffens, Lincoln，林肯·斯蒂芬斯，39,69,87,140,144,149,157,162—163,380—381

Stein, Clarence，克拉倫斯·斯泰因，454,456

Sterling, Henry，亨利·斯特林，196—197

Stevenson, Adlai，艾德萊·史蒂文森，503—504

Stewart, Bryce，布萊斯·斯圖爾特，441,443

Stockholm, Sweden，斯德哥爾摩（瑞典），25,458,480

Stoecker, Adolf，阿道夫·施托克，92

Stolper, Gustav，古斯塔夫·施托爾佩爾，372

Stonorov, Oskar，奧斯卡·斯通諾羅夫，402—403,465,495

Straus, Nathan，內森·斯特勞斯，466,475,477

Streetcars，街車（公交車），117,122—123,127—130,132,135,138—140,144—148,152—154,156,158—159,165

Strikes，罷工，10,51,58—59,101,285,292,295—296,303—304,419

Strong, William，威廉·斯特朗，16,137

Stuart, Charles，查爾斯·斯圖爾特，459

Stubbs, Walter，沃爾特·斯塔布斯，57

Studebaker, John W.，約翰·斯圖德貝克，460—461

Study tours，考察旅行，69,269,380

Stuttgart, Germany，斯圖加特（德國），393

Subsidarist social policies，補貼性社會政策，28,190,195,227,248,430—431,467—468

Subsistence homesteads，自耕自給小農場，384,418,452—453

Subways，地鐵，135,147,152,447

Sudekum, Albert，阿爾伯特·蘇德庫姆，175,183,277

Suffrage restrictions，選舉權限制，35—36,41—42,53,123—125,134,283

Sullivan, Louis，路易斯·沙利文，397

Sumner, William Graham，威廉·格雷厄姆·薩姆納，532n44

Sunnyside Gardens，日照園，397—400

Supreme Court, U.S.，美國最高法院，206,238,379,427,443,445

Survey，《調查》，27,67,163,182,249,254,267—268,274,296—299,305,307—310,312,314,380,420,422,507

Sweden，瑞典，35,49,53,58,319,506; Americans on，美國人論及，457—459; during 1930s，1930年代，319,411—413,417—419,421,423,430—431,435,456—459,463,470,475,478—480; subsidarist social policies in，補貼性社會政策，227,430—431,435,457; welfare state, postwar，戰后福利國家，24—25,486

Switzerland，瑞士，35,86,88,215,227,237,399

Swope, Gerald，杰拉爾德·斯沃普，24,421,436

Sydenstricker, Edgar，埃德加·賽登斯特里克，442—443

Taft, Robert，羅伯特·塔夫脫，496,505

Taft, William Howard，威廉·霍華德·塔夫脫，332,337

Tammany Hall，坦慕尼協會，135,137

Tariffs，關稅，30,80,417

Taut, Bruno，布魯諾·陶特，386,388—390,393—394,478,483; Modern Architecture，《現代建筑》，375—376

Tawney, R. H.，托尼，121,284,294,311

Taylor, Graham，格雷厄姆·泰勒，65

Tenancy, agricultural，農業租賃，37,54,321,356,471—472

Tenement House Committee（N.Y.C.），廉價公寓委員會（紐約市），15

Tenement House Law（1901），《廉價公寓法》（1901年），193—194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TVA），田納西流域管理局，108,399,410,415,426,448,456—457,459—460,465,483—484

Thane, Pat，帕特·塞恩，230

Thatcher, Margaret，瑪格麗特·撒切爾，486

Thomas, Albert，阿爾伯特·托馬斯，281,481

Thomas, M. Carey，凱里·托馬斯，40,86—87,460

Thompson, Carl D.，卡爾·湯普森，314

Thurston, R. H.，瑟斯頓，105

Tildden, Samuel J.，薩繆爾·蒂爾登，137

Toledo, Ohio，托萊多（俄亥俄州），138—139,401

Tolman, William，威廉·托爾曼，16,27,63,136—137,488

Tourist, American，美國游客，36—44,134,161,269—272,380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Act（1947），《城鄉規劃法》（1947），493

Townsend, Francis，弗朗西斯·湯森德，429,436,440

Toynbee, Arnold，阿諾德·湯因比，83;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工業革命》，105

Toynbee Hall，湯因比館，64—65,86,179,230—231,270

Trade Boards Act，《行業委員會法》，425

Trades Union Congress，工會大會，234,312—314

Treitschke, Heinrich von，海因里希·馮·特萊希克，77,83

Truman, Harry，哈里·杜魯門，505

Tucker, William J.，威廉·塔克，65

Tugwell, Rexford，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315,381,409—410,420,422,438,450—455,459,469,471,479,483

Tumulty, Joseph，約瑟夫·塔馬爾蒂，297,301

Tuskegee Institute，塔斯基吉學院，15,358

Tweed, William Marcy，威廉·瑪西·特威德，154—155

Ulm, Germany，烏爾姆（德國），163,176,191,271

Unemployment（cumulative misery） index，失業（累積痛苦）指數，412

Unemployment insurance，失業保險，221,258,435; in Britain，在英國，231—234,295,430,433—434,490; in Germany，在德國，225,430—431,434; in the U.S.，在美國，252,255,378—379,429—435,438—444,481—482,496,587n25

Unemployment policies，失業政策，225,227,231—232,252,255,418—420,433—437,491

Union Coopérative，合作社，329

Unions，工會，99,105,330; and housing，與住房，386—388,402—404,463; and industrial accidents，與工業事故，247,250—251; membership in，成員，14,219,282,295,305,377; during 1930s，在1930年代，364—365,418—419,425—426,435—436; during 1940s and 1950s，1940年代和1950年代，495—496,506; in politics，政治，19,302,314—316; and reconstruction, postwar，與戰后重建，292—297,299,303—305,311—316,377; and social insurance，與社會保險，230,234,251,257—258,435—436; strikes by，組織的罷工，10,51,58—59,65,101,285,292,295—296,303—304,419; unemployment policies of，失業政策，221,227,234,244,378,441,445; during World War I，第一次世界大戰，281—282,285,292,312

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協和神學院，362—363

United Charities Building，聯合慈善大樓，27

United Hebrew Charities，希伯來慈善總會，248

United Mine Workers，礦工聯合會，297,303,316

United Nations，聯合國，506

United States Building and Loan League，美國住房和貸款聯盟，474,478

United States Chamber of Commerce，美國商會，299,474

United States Housing Cooperation，美國住房公司，289

Universities，大學。See Higher education，參見高等教育

University of Berlin，柏林大學，85,91—92,95,109,139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加利福尼亞大學，348

University of Chicago，芝加哥大學，243,362

University of Halle，哈雷大學，84—85

University of Michigan，密歇根大學，104—105

University of Munich，慕尼黑大學，86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賓夕法尼亞大學，85

University Settlement（Chicago），大學睦鄰中心（芝加哥），64

University of Vienna，維也納大學，85,92

University of Wisconsin，威斯康星大學，71,109—110,135,155,480—481

University of Zurich，蘇黎世大學，86,88

Unwin, Raymond，雷蒙德·昂溫，165,179,183,192,195—196,208,287—289,291,352,383,387,400,421,452,455,465,475—476; Town Planning in Practice，《城市規劃實務》，289

Urban, Joseph，約瑟夫·厄本，405

Urban collectivism，都市集體主義，116—117,143,159,164,184

Utah，猶他州，451

Utopian socialism，烏托邦社會主義，326,329

Vandergrift, Pa.，范德格里夫特（賓夕法尼亞州），179

Vandervelde，Émile，埃米爾·王德威爾得，18

Van Kleeck, Mary，瑪麗·范·克利克，284

Velben, Thorstein，托斯丹·凡勃倫，299,451

Veiller, Lawrence，勞倫斯·威勒，194—195,198,205—206,208,463

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社會政策協會，29,61—62,82—83,88—89,91,93—94,101—102,105,108,190—191,222,318,321

Victoria, Australia，維多利亞州（澳大利亞），157

Vienna, Austria，維也納（奧地利），47,133,161,163,192,371—372,539n26; housing in，住房，384—387,390—392,394,398,475

Villard, Henry，亨利·維拉德，146

Villard, Oswald Garrison，奧斯瓦爾德·加里森·維拉德，300,307—308,310,314—315

Vincent, George，喬治·文森特，290

Vivien, Henry，亨利·維維安，183

Vladeck, Charney，查尼·弗拉德克，403,464

Vorse, Mary Heaton，瑪麗·希頓·沃爾斯，294

Wage, minimum，最低工資。See Minimum wage legislation，參見最低工資立法

Wagner, Adolph，阿道夫·瓦格納，61—62,77,90—92,94—100,102—103,106,109,113,174—176,222,236

Wagner, Martin，馬丁·瓦格納，386,388—390,394

Wagner, Robert，羅伯特·瓦格納，404,422,426,439,464,466,473—474,497

Wald, Lillian，麗蓮·沃爾德，64,181,262,381,441

Wales，威爾士。See Britain，參見英國

Walker, Francis A.，弗朗西斯·沃克，81,84,96—97

Wallace, Henry A.，亨利·華萊士，332—333,421—422,247,459—460,465,471,498—499

Wallas, Graham，格雷厄姆·沃拉斯，64—66,124,276

Walling, William English，威廉·英格利希·沃林，66,277—278,311—312

Wall Street Journal，《華爾街雜志》，246

Walsh, David，大衛·沃爾什，476

Walsh, Frank，弗蘭克·沃爾什，299

War collectivism，戰爭集體主義，275—290,415,424—425,495

War Department，國防部，283

War Finance Corporation，戰爭金融公司，424

War Industries Board，戰時工業委員會，285,301,425,495

War Labor Board，戰時勞工委員會，285,301—302

War Labor Policies Board，戰時勞工政策委員會，283

Warner, Sam Bass，薩姆·巴斯·沃納，114

War Risk Insurance Bureau，戰爭風險保險局，290

Washington（state），華盛頓州，151,246,250

Washington, Booker T.，布克·華盛頓，38—39,354,358

Washington D. C.，華盛頓，162,165,169,196,200,207,447

Waterburry, Conn.，沃特伯里（康涅狄格州），289

Water supply，供水，115,117—120,123,127—131,137—138,152,166

Webb, Beatrice，貝特麗絲·韋伯，26,46,57,64,85,88,213—215,234—235,291,293,312,330,420,430,490; on the U.S.，論美國，65—66,71,136,207

Webb, Sidney，錫德尼·韋伯，16,26,55,57,85,88,140,192,213—215,234,240,267,270—271,288,420,430,488,490,498; and municipal socialism，與城市社會主義，127—129; and reconstruction, postwar，與戰后重建，293,294,298,306,310—312,314; on the U.S.，論美國，65—66,70—71,136,207

Weber, Adna F.，阿德納·韋伯，109,111,236,247

Weber, Max，馬克斯·韋伯，2,89,110

Weinstock，Harris，哈里斯·韋恩斯托克，336,341,348

Welfare capitalism，福利資本主義，16—17,21—23,263,377—379,436

Welfare state，福利國家，22—24,26,28—30,130,209,485—489,507

Wells, H. G.，威爾斯，42,54,161,207,272,276,316,396,410,447

Welwyn Garden City, England，韋林花園城（英國），399,483

Werkbund，工業聯盟，393,405

West, Don，唐·韋斯特，363

Westinghouse Corporation，威斯汀豪斯電器公司，16

West Virginia，西弗吉尼亞州，452

Weyl, Walter，沃爾特·韋爾，63,86,163,179,300,314; The New Democracy，《新民主》，75

Wharton School of Finance and Economy，沃頓經濟金融學院，85,105,109

What to Read? tracts，《讀什么?》（小冊子），70

Whitaker, Charles H.，查爾斯·惠特克，287—288,299—300,397

Whitley, J. H.，惠特利，291

Whitley Councils，惠特利會議，282,291,297,301,304—305,310

Whitlock, Brand，布蘭德·維特洛克，73—74,139—140,142,168,401

Whittier House，惠蒂爾館，64

Wigforss, Ernst，恩斯特·維格福斯，457

Wilcox, Delos，迪羅斯·威爾柯克斯，203

Wilhelm II，威廉二世，38,55,57

Willard, Frances，弗朗西絲·威拉德，66

Williams, Frank B.，弗蘭克·威廉姆斯，185—186

Willoughby, William F.，威廉·威洛比，30,39,63,66,108,241—242,248

Wilson, Milburn L.，米爾本·威爾遜，451—452

Wilson, Woodrow，伍德羅·威爾遜，56,59,65,70,144,229,258,265,283,332,337—339,410,424,494—496; during World War I，第一次世界大戰，279,285,297—299,301—305,308,311—312,368

Wisconsin，威斯康星州，109,150—151,242,321—322,325,331,348,359,432,440,442,451,482

Wisconsin Industrial Commission，威斯康星工業委員會，442

Wisconsin Railroad Commission，威斯康星鐵路委員會，109,150

Witte, Edwin，埃德溫·威特，440,442

Wittenberg, Germany，維滕堡（德國），37,41

Women，婦女。See Social materialism，參見社會母性主義

Women's Christian Temperance Union，婦女基督教禁酒聯合會，66

Women's Trade Union League，婦女工會聯盟，64,66,238,299

Wood, Edith Elmer，伊迪絲·埃爾默·伍德，198,208,288,391—392,394,463,465—466,480,606n106; Housing Progress in Western Europe，《西歐住房進步》，391

Woodbury, Coleman，克爾曼·伍德伯里，465—466,606n106

Woods, Robert A.，羅伯特·伍德，64—65,86; English Social Movements，《英國社會運動》，65,136

Woolwich（London），伍爾里奇（倫敦），286—288

Workers' education，工人教育，311,313,364,460

Workers' Educational Association，工人教育協會，311,313,460

Workingmen's insurance，工人保險。See Social insurance，參見社會保險

Workmen's Compensation, state insurance funds for，州保險基金提供的工人賠償，250,255,261

Workmen's Compensation Act（1897），《工人賠償法》（1897年），247—248

Workmen's compensation legislation，工人賠償立法:in Europe，在歐洲，247; in the U.S.，在美國，247—252,254—255,258—261,264,266,431

Workmen's Compensation Publicity Bureau，工人賠償宣傳局，261

Workplace, regulation of，工作場所管理，54,55,94,107,226,235—239,283,426

Works councils，勞資聯合委員會，282,291—293,305,377

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WPA），公共事業振興署，364,436,440,458,460,469,497—498

World's Columbian Exposition（1893），世界哥倫布博覽會（1893年），11,169—170,405

World's Work，《世界工作》，67

World War against Slums, The，《反對貧民窟的世界戰爭》，465

World War I，第一次世界大戰，208,226,257,260,267—317,368—369,485,495

World War II，第二次世界大戰，428,431,485,487—488,492,501—502

Wright, Carroll D.，卡羅爾·萊特，65,241

Wright, Frank Lloyd，弗蘭克·勞埃德·賴特，388,395

Wright, Henry，亨利·萊特，454,465

Wyoming，懷俄明州，345,347

Yerkes, Charles，查爾斯·耶基斯，146—148,157

York, England，約克郡（英國），219

Zacher, Georg，格奧爾格·察赫爾，16

Zehlendorf, Germany，策倫多夫（德國），388—389,483，

Zeilenbau，排房，390—391,393—394

Zimmern, Alfred，阿爾弗雷德·齊默恩，71,276,291,309,311

Zoning，城市分區:in Germany，在德國，177; in the U.S.，在美國，123,165,184—187,193—196,205—206,382,451

Zueblin, Charles，查爾斯·朱布林，64,66,314

# 譯后記

2006年冬天譯者曾給《中國學術》雜志投稿，主編劉東先生在退稿信中說該雜志不接受翻譯文章，不過提出如果譯者愿意，可以參加他主編的叢書的翻譯工作。譯者非常榮幸地接受了這個任務。

《大西洋的跨越》的作者丹尼爾·羅杰斯（Daniel T. Rogers）是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教授，講授美國文化和思想史。他的獲獎著作除了本書《大西洋的跨越：進步時代的社會政治》（1998）外，包括《1850—1920年美國工業時代的職業道德》（1978）、《受到挑戰的真理：獨立以來的美國政治關鍵詞》（1987），以及關于1980年代美國社會思想史的新作：《碎片的時代》（2011）等。

本書“重新塑造了美國歷史上的一個獨特時代，其中美國社會政治通過競爭和交流的網絡與歐洲社會政治辯論和嘗試結合在一起”。（原書第5頁）在總共十一章長達六百多頁的篇幅內，作者描述了作為社會政治產物的進步時代和新政，探討了傳統社會保險項目如工人賠償法、失業保險、退休金和健康保險，還有城市規劃、市政服務設施（自來水、煤氣、街道、鐵路）、農村合作社、衛生改善（公共澡堂和牛奶站）和住房改革（從貧民窟拆除到花園城市建設）等社會政治的方方面面：從時間跨度上看，從1900年的巴黎世界博覽會開始到1942年倫敦《貝弗里奇報告》為止：從空間上看，從歐洲到美國，從繁華都市到偏遠山區，不僅橫跨大西洋，還涉及到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從事件上看，涉及到兩次世界大戰、羅斯福新政等重大歷史。

正如馮·哈里·馬克斯在書評中說的，作者的重點是“解釋政策議題和項目觀點而不是描述結果”，通過大量證據說明“政治領域內國際交流的本質所在。即使北大西洋國家面臨類似的社會問題，即使國家改革者調查、借用了外國的模式，移植的過程也不是消極的，而是積極的，是被現有地方（政治）背景不斷影響修改的過程。在共同行動領域也總有地方性變化”。劍橋大學的約翰·湯姆森也特別稱贊“羅杰斯在全書中巧妙地指出了美國環境的特殊性如何影響了從大西洋對岸引進來的各種觀點和機構的命運。從探討范圍和獨創性角度來看，該書完美展示了最近美國歷史丟失的一個維度，進一步證明了羅杰斯作為當今最有威望的歷史學家的名聲和地位”。

本書內容豐富，不同的讀者能從中看到不同的東西，這或許正是經典著作的特征。《華盛頓時報》的羅杰斯·塔爾（Roger Starr）指出本書“記述了工業革命給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帶來的殘酷野蠻的變化，以及社會企圖把生產力人性化的嘗試和努力”。大衛·哈麥克（von David C. Hammack）在書評中說本書一個突出的優點在于：羅杰斯觀察到19世紀最后二十年和20世紀前三十年的進步社會政治不僅是“國家”的擴張，而且更多與限制市場的社會和政治努力有關。

沒有任何一本著作是十全十美的。大衛·哈麥克曾提出值得讀者關注的一些地方。他認為作者在討論中忽略和漏掉了一些內容，比如作為非贏利機構而成立的合作社的活動、美國的思想傳播者和政策制訂者在中小學教育和醫療保健政策方面受到歐洲的影響、美國的宗教多樣性，尤其是天主教對于美國社會政策辯論的影響等。他對作者的某些觀點持有不同意見，比如在確定政策辯論的思想和“問題”之間的關系方面，雖然同意作者認為問題本身不能產生解決辦法的說法，但他指出實際上進步人士面臨的問題并非多得數不清，主要還是東北部快速工業化造成的具體問題，家庭中的掙工資者因工傷造成的貧困和工作事故與法律之間的關系完全可以進一步展開論述。他還指出羅杰斯關于經濟利益和對私有財產權的堅持是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因素的觀點并不令人信服等。（請參閱http://hsozkult.geschichte.hu-berlin.de/REZENSIO/symposiu/hamack.htm。）譯者無意卷入這些爭論，只是提出來讓有興趣的讀者思考，但是譯者相信這些爭議不僅不會削弱本書的價值，而且有助于更多的人對這些領域進行深入和廣泛的探索，推動本學科的發展。

在翻譯本書的過程中，譯者遇到的一個突出問題是相關背景知識的欠缺。譯者雖然對社會學、哲學和歷史感興趣，但畢竟沒有經過專業訓練，遇到專業術語和人名、地名、書名等內容時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盡力求助于專家、辭典和網絡，仔細研究和查證，但不敢保證沒有差錯，完全符合約定俗成的原則。因而譯者在專有名詞第一次出現時，往往把原文附在翻譯的后面，既可以方便讀者，也可以讓讀者監督譯者的處理是否符合規范。此外，本書注釋里涉及到不少德語和法語方面的著作，限于譯者的中外文功底，可能在理解和表達方面存在許多有待商榷和改進的地方，譯者真誠希望讀者不吝指教，以便將來有機會修訂。

為了讀者查證的方便，譯本對書中注釋里的作者姓名一概保留，同時將原文索引中的英文保留，加上中文翻譯，形成了一個譯名對照表。

值得一提的是本書的翻譯也是對譯者毅力和耐心的一場考驗。原書總共六百多頁，單單尾注就長達一百頁。在翻譯過程中不時感慨作者學術功力的深厚和敬業態度，每當有些懈怠、厭煩的情緒時，就想象作者寫書時付出的辛勞，馬上就精神振作起來。磨煉意志，激發進取精神或許是譯者翻譯此書的意外收獲。

譯本出版之際，譯者首先要感謝劉東教授和譯林出版社的厚愛和信任，感謝黃穎編輯在翻譯過程中耐心解答種種疑問，不斷給予譯者鼓勵、幫助和指導。

譯者  
 2011年元月于武漢青山

# 注釋

#### 前言

[[1]](#_1_174)Ray Stannard Baker，《美國紀事》（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45），83頁。

[[2]](#_2_169)Raymond Grew，“美國歷史的相對虛弱性”，《跨學科歷史雜志》16（1985）：87—101頁。關于這些問題的更深入討論，可參閱Laurence Veysey，“美國歷史自主性的重新思考”，《美國季刊》31（1979）：455—477頁：Ian Tyrell，“國際歷史時代的美國例外主義”，《美國歷史評論》96（1991）：1031—1072頁：David Thelen，“聽眾、邊緣和比較：美國歷史的國際化”，《美國歷史雜志》79（1992）：432—462頁：Michael Kammen，“美國例外主義的問題：再思考”，《美國季刊》45（1993）：1—43頁：Michael Geyer和Charles Bright，“全球時代的世界歷史”，《美國歷史評論》100（1995）：1034—1060頁：Daniel T.Rodgers，“例外主義”，《想象的歷史》，Anthony Molho和Gordon Wood編（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中。對于美國社會政治的例外主義解讀的例外，可參閱Benjamin R.Beede，“美國進步主義的外來影響”，《歷史學家》45（1983）：529—549頁：Peter J.Coleman，《進步主義和改革世界：新西蘭與美國福利國家的起源》（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87），James T.Kloppenberg，《不確定的勝利：1870—1920年歐美社會民主和進步主義思潮》（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Arthur Mann，“英國社會思想和進步時代的美國改革者”，《密西西比河谷歷史評論》42（1956）：672—692頁：Kenneth O.Morgan，“未來在行動：1890—1917年英美的進步主義”，《對比和聯系：英美歷史200周年論文集》，H.C.Allen和Roger Thompson編（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6）：Gertrude A.Slichter，伊利諾斯大學1960年博士論文，“1880—1915年美國改革的歐洲背景”：Melvyn Stokes，“美國進步人士和歐洲左派”，《美國研究雜志》17（1983）：5—28頁。

[[3]](#_3_164)Raymond Grew，“對比歷史的理由”，《美國歷史評論》85（1980）：763—778頁：最好的例子請參閱，Gosta Esping-Anderson，《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Colleen A.Dunlavy，《政治和工業化：美國和蘇聯的早期鐵路》（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Peter Flora和Arnold J.Heidenheimer編，《歐洲和美國福利國家的發展》（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 Books, 1981）：Tony Freyer，《管理大企業：1880—1990年英國和美國的反托拉斯》（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Peter Gourevitch，《艱難時代的政治：國際經濟危機的對策比較》（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Arthur J.Heidenheimer，Hugh Heclo和Carolyn T.Adams編，《公共政策對比：美國、歐洲和日本社會選擇的政治》（第三版，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90）：Christopher Leman，《福利改革的崩潰：加拿大和美國的政治體制、政策和窮人》（Cambridge: MIT Press, 1980）：Gary Marks，《工會政治：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英國、德國和美國》（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Stefan Berger，《1900—1931年的英國工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John Myles，《福利國家的晚年生活：公共補貼的政治經濟學》（Boston: Little，Brown, 1984）：Margaret Weir和 Theda Skocpol，“國家結構和大蕭條時代瑞典、英國和美國做出‘凱恩斯式’反應的可能性”，在《把國家帶回來》（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Peter B.Evans，Dietrich Rueschemeyer和Theda Skocpol編（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4]](#_4_162)Robert Kelley，《跨越大西洋的規勸：格萊斯頓時代的自由民主思想》（New York: Knopf, 1969），xiv頁。

[[5]](#_5_154)關于思想、語言和政治的關系的其他方面，請參閱：Daniel T.Rogers的《受到挑戰的真理：自獨立以來的美國政治關鍵詞》（1987：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和《1850—1920年工業時代美國的職業道德》（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of Chicago, 1978）。

[[6]](#_6_148)John W.Kingdon，《議程、選擇和公共政策》（Boston: Little，Brown, 1984）。同樣話題但更有歷史深度的書是Hugh Heclo的《英國和瑞典的現代社會政治：從救濟到收入保障》（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

#### 第一章 1900年的巴黎

[[7]](#_7_146)John E.Findling和Kimberly D.Pelle編，《1851—1988年世界博覽會歷史辭典》（Westport，Conn.：Greenwood, 1990），111頁：Henri Loyrette，《古斯塔夫·埃菲爾》（New York: Rizzoli, 1985），111,112,115頁。

[[8]](#_8_146)Richard D.Mandell，《1900年的巴黎：偉大的世界博覽會》（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7）。

[[9]](#_9_140)Worthington C. Ford編，《亨利·亞當斯書信：1892—1918》（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38），301頁：Patrick Geddes，“博覽會的終結：1900年的巴黎”，《當代評論》78（1900） 653—668：Friedrich Naumann，“巴黎書信”，Naumann《著作》（Cologne: Westdeutscher Verlag, 1964），第六卷，378—387頁：Jane Addams，《我的朋友：朱莉亞·拉斯羅普》（1935年重印本，New York: Arno Press, 1974），145—146頁。

[[10]](#_10_138)Geddes，“博覽會的終結”，665頁：E.Cummings，“巴黎博覽會上的社會經濟學”，《經濟學季刊》4（1890）：212—221頁：Jules Helbronner，《1889年巴黎世界博覽會社會經濟部報告》（Ottawa：按議會要求出版，1890）。

[[11]](#_11_134)William F.Willoughby，“法國現實勞工問題研究”，《經濟學季刊》13（1899）：270—291頁：Leopold Katscher，“社會科學法國博物館”，《岡頓雜志》（Gunton's Magazine）23（1902）：488—495頁：Sanford Elwitt，“19世紀末期法國的社會改革和社會秩序：社會博物館和它的朋友們”，《法國歷史研究》11（1980）：431—451頁：Judith F.Stone，《尋求社會和平：1890—1914年法國改革立法》（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5），52—54頁。“社會經濟”（économie sociale）這個術語最早出現在19世紀中期，是擔心工業革命對道德、機構、家庭權威產生分離性影響的天主教改革者的口號，但是到了1880年代，不管是使用還是意義上，它開始快速泛濫。Charles Gide，“經濟學派和法國政治經濟學教學”，《政治學季刊》5（1890）：625—626頁。

[[12]](#_12_132)《1900年世界博覽會官方目錄》，第18冊，第16組：“社會經濟學、衛生、公共救濟”（Paris: Lemercier,n.d.）。

[[13]](#_13_128)《1900年世界博覽會：國際委員會報告》，“第六部分：社會經濟學”（Paris: Imprimerie Nationale, 1902），2—3頁：Stone，《尋求社會和平》，37頁。

[[14]](#_14_124)社會經濟展覽最好的描述見于上文提到的《國際委員會報告》中Charles Gide的序言：《巴黎博覽會（1900）》（L'Exposition de Paris（1900），Paris: Librairie Illustrée,n.d.），第三卷，303—304頁：Nicholas P.Gilman，“巴黎博覽會上的社會經濟學”，美國勞工部《公報》（Bulletin）6（1901）：440—489頁：W.F.Willoughby，“關于社會經濟學、衛生、公共救濟的特別報告”，《1900年巴黎世界博覽會美國總干事報告》，第55屆國會第二次會議，參議院文件232（1901）。

[[15]](#_15_124)《紐約時報》1900年9月2日，18頁，《1900年巴黎世界博覽會官方目錄，德意志帝國的展覽》（Berlin: Imperial Commission, 1900）。

[[16]](#_16_124)J.E.S.Hayward，“第三共和國的官方哲學：萊昂·布爾熱瓦和社會連帶主義”，《國際社會史評論》6（1961）：19—48頁：Charles Gide，“作為經濟項目的團結思想”（L'Idée de solidarité en tant que programme economique），《國際社會學雜志》1（1893）：385—400頁：Leon Bourgeois，《團結》（Solidarité，Paris: Armand Colin, 1896）。

[[17]](#_17_118)“1900年世界博覽會”，《北美評論》170（1900）：475頁。

[[18]](#_18_116)W.H.Tolman，“巴黎博覽會上的社會經濟學”，《瞭望》〈Outlook〉66（1900）：311—318頁。Willoughby，“社會經濟學特別報告”：W.E.B.Du Bois，“巴黎的美國黑人”，《美國評論之評論月刊》22（1900）：575—577頁。

[[19]](#_19_117)William H.Tolman，“社會服務同盟”，《競技場》（Arena）21（1899）：474頁：William H.Tolman，《美國的城市改革運動》（New York: Fleming H.Revell, 1895）：Josiah Strong，William H.Tolman和 William D.P.Bliss編，《社會進步：經濟、工業、社會、宗教統計數據年鑒》（New York: Baker and Taylor, 1904—1906）：美國社會服務研究所編，《社會服務：展示社會和工業改善運動的幻燈片描述清單》（New York: American Institute of Social Service, 1905）。

[[20]](#_20_115)《巴黎博覽會》，第3頁：《國際委員會報告》，19—20頁。

[[21]](#_21_116)Gilman，“巴黎博覽會上的社會經濟學”，465頁：Gerhard A.Ritter，《德國英國的社會福利：起源和發展》，Kim Traynor譯（Leamington Spa: Berg, 1986）。

[[22]](#_22_116)Robert Hunter，《社會主義者在行動》（New York: Macmillan, 1908），第5章：Gary P.Steenson，《“不是一個人!不是一分錢!”：1863—1914年的德國社會民主》（“Not One Man! Not One Penny!”，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1）：Émile Vandervelde，《社會主義與國家》，Charles H.Kerr譯（Chicago: Charles H.Kerr, 1919），124,20頁。

[[23]](#_23_116)Albert S.Lindemann，《歐洲社會主義史》（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第4章：Peter Gay，《民主社會主義的困境：愛德華·伯恩斯坦對馬克思的挑戰》（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2）。Jaurès的話引自Hunter的《社會主義者在行動》，47頁。

[[24]](#_24_114)William E.Forbaugh，“美國勞工運動的形成”，《哈佛法學評論》102（1989）：1109—1257頁：Gerald Friedman，“勞工好斗性及其后果：1877—1914年美國勞工動蕩的政治反應”，《國際勞工和工人階級史》40（1991）：5—17頁：James E.Cronin和 Peter Weiler，“1900—1940年工人階級利益和英國社會民主改革政治”，同上，40（1991）：47—66頁。

[[25]](#_25_112)1900年巴黎世界博覽會，婦女工作和機構國際大會工作報告（Paris: Charles Blot, 1902）。

[[26]](#_26_112)Seth Koven和Sonya Michel，“女性義務：1880—1920年法國、德國、英國、美國的母性政策和福利國家的根源”，《美國歷史評論》95（1990）：1076—1108頁：Linda Gordon編，《婦女、國家和福利》（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0）：Kathleen D.McCarthy編，《重訪女慈善家：婦女、慈善和權力》（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0）：Gisela Bock和Pat Thane編，《母性和性別政策：1880年代—1950年代婦女與歐洲福利國家的興起》（London: Routledge, 1991）：Miriam Cohen和Michael Hanagan編，“1900—1940年性別政治和福利國家的形成”，《社會史雜志》24（1991）：469—484頁：Robyn Muncy，《1890—1935年在美國改革中創造女性統治地位》（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Ian Tyrrell，《女性的世界/女性的帝國：1880—1930年國際視野中的女性基督徒節制會》（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Theda Skocpol，《保護士兵和母親：美國社會政策的政治根源》（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Seth Koven和Sonya Michel編，《新世界的母親：母性政治與福利國家的起源》（New York: Routledge, 1993）：Alisa Klaus，《每個孩子都是獅子：1890—1920年美國和法國婦女兒童健康政策的根源》（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Susan Pedersen，《1914—1945年英國法國的家庭、依賴與福利國家的起源》（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Linda Gordon，《得到同情但沒有資格：單身母親與福利歷史，1850—1935年》（New York: Free Press, 1994）：Gwendolyn Mink，《母親的工資：1917—1942年福利國家的不平等》（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5）：Molly Ladd-Taylor，《母親工作：1890—1930年婦女、兒童福利和國家》（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4）：Ulla Wikander，Alice Kessler-Harris和Jane Lewis編，《保護婦女：1880—1920年歐洲、美國和澳大利亞勞工立法》（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5）。

[[27]](#_27_108)關于這些辯論的總體回顧，可參閱Asa Briggs，“歷史視野中的福利國家”，《歐洲社會學檔案》2（1961）：221—258頁：Jill Quadagno，“福利國家的理論”，《社會學年度評論》13（1987）：109—128頁：Gerhard A.Ritter，“比較視野下社會國家的產生和發展”（Entstehung und Entwichlung des Socialstaates in Vergleichender Perspektive），《歷史雜志》 243（1986）：1—90頁：Skocpol，《保護士兵和母親》，“緒論”：Francis G.Castles編，《公共政策對比歷史》（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9）中的文章。

[[28]](#_28_108)這方面最好的著作有：Robert Bremner，《來自深處：美國貧困的發現》（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56）：Roy Lubove，《1900—1935年爭取社會保障的斗爭》（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James T.Patterson，《1900—1980年美國反對貧困的斗爭》（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29]](#_29_106)Harold L.Wilensky，《福利國家和平等：公共開支的結構和意識形態根源》（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Peter Flora和Arnold J.Heidenheimer編，《歐美福利國家的發展》（New Brunswick，N.J.： Transaction Books, 1981）。關于批評，參閱Douglas E.Ashford，“福利國家的輝格黨解釋”，《政策歷史雜志》1（1989）：24—43頁。Francis G.Castles和R.D.McKinlay，“公共福利救濟、斯堪的納維亞、政治的社會學途徑的徒勞”，《英國政治學雜志》9（1979）：157—172。John H.Goldthorpe的“合并的終結：現代西方社會中社團主義和二元論傾向”，《經濟生活的新途徑》，Bryan Roberts等編（Manchester，Englan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5）：Jens Alber，《從濟貧院到福利國家：西歐社會政治的發展分析》（Frankfurt: Campus, 1982）。

[[30]](#_30_104)Gosta Esping-Andersen，《反對市場的政治：社會民主通向權力之路》（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J.Rogers Hollingsworth和Robert A.Hanneman，“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工人階級力量和政治經濟學”，《對比社會研究》5（1982）：61—80頁。Ira Katznelson，“美國社會民主的思考”，《比較政治學》11（1978）：77—99頁。John Myles，《福利國家的晚年生活：公共補貼的政治經濟學》（Boston: Little，Brown, 1985）：Frances Fox Piven和Richard A.Cloward，《新階級戰爭：里根對福利國家的攻擊及其后果》修訂版（New York: Pantheon, 1985）。關于社會政策的“社會民主”解釋的局限性，請參閱：Henry Pelling，“工人階級與福利國家的根源”，《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后期的大眾政治和社會》（London: Macmillan, 1968）：Pat Thane，“1880—1914年英國的工人階級和國家‘福利’”，《歷史雜志》27（1984）：877—900頁。

[[31]](#_31_100)Hans-Ulrich Wehler，《1871—1918年的德意志帝國》，Kim Traynor譯（Leamington Spa: Berg, 1985）：J.Craig Jenkins和Barbara G.Brents，“社會抗議、霸權競爭、社會改革：美國福利國家的起源之政治斗爭解釋”，《美國社會學評論》54（1989）：891—909頁：Jill S.Quadagno，“福利資本主義和1935年的《社會保障法案》”，《美國社會學評論》49（1984）：632—647頁：Colin Gordon，《新政：1920—1935年美國的企業、勞工和政治》（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關于批評和修改，請參閱：Thomas Niperdey，“威廉帝國：批評與辯論”，《歷史與社會》1（1975）：539—560頁：Allan Mitchell，“波拿巴主義作為俾斯麥政治的模范”，《現代史雜志》49（1977）：181—209頁：Joseph Melling，“福利資本主義與福利國家的起源：1870—1914年的英國工業、工場福利和社會改革”，《社會歷史》17（1992）：453—478頁：Edward Berkowitz和 Kim McQuaid，《創造福利國家：20世紀改革的政治經濟學》第2版（New York: Praeger, 1988）：Edwin Amenta和Sunita Parikh，“資本家不想要《社會保障法案》：‘資本家控制論’批判”，《美國社會學評論》56（1991）：124—129頁：更籠統的著作請參閱Fred Block，《國家理論修正：政治和后工業主義文集》（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7）：Claus Offe，《福利國家的矛盾》（Cambridge: MIT Press, 1984）：Theda Skocpol，“資本主義危機的政治反應：新馬克思主義國家理論和新政”，《政治與社會》10（1980）：155—201頁。

[[32]](#_32_98)Peter B.Evans，Dietrich Rueschemeyer和Theda Skocpol編，《把國家帶回來》（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Skocpol，《保護士兵和母親》：Theda Skocpol和John Ikenberry，“從歷史和比較視角看美國福利國家的政治形成”，《比較社會研究》6（1983）：87—148頁：Weir和Skocpol，“國家結構和‘凱恩斯式’反應的可能性”：Christopher Leman，《福利改革的崩潰：加拿大和美國政治機構、政策和窮人》（Cambridge: MIT Press, 1980）：Roger Davidson和Rodney Lowe，“1870—1945年英國福利政策的官僚體制和革新”，《1850—1950年德國和英國福利國家的出現》，W.J.Mommsen編（London: Croom Helm, 1981）。

[[33]](#_33_98)Heide Gerstenberger，“窮人和值得尊重的工人：德國社會保險介紹”，《勞工歷史》48（1985）：69—85頁。Eric Gorham，“民間資源保護隊模糊的行為”，《社會歷史》17（1992）：231—249頁：Linda Gordon，“福利管理了什么？”《社會研究》55（1988）：609—630頁：Barbara J.Nelson，“雙渠道福利國家的來源：工人賠償和母親補助”，《婦女、國家和福利》，Gordonz編。關于批評，請參閱Robert van Krieken，“社會控制的貧窮：福利國家歷史社會學的解釋力”（The Poverty of Social Control），《社會評論》39（1991）：1—25頁。

[[34]](#_34_96)Hugh Heclo，《英國和瑞典的現代社會政治：從救濟到收入維持》（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305頁。

[[35]](#_35_94)-1 1884年，牧師巴涅特（Samuel A.Barnett）在倫敦東區建立了一個社區睦鄰服務中心，取名為“湯因比館”（Toynbee Hall）。——編注

[[36]](#_36_94)William W.Bremer，《大蕭條的冬天：紐約社會工作者和新政》（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4），8—10頁。John M.Glenn等，《1907—1946年拉塞爾·塞奇基金會》（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47）。

[[37]](#_37_94)，Kathryn Kish Sklar，“1830—1930年美國福利國家形成中女性力量的歷史基礎”，《新世界的母親》，Koven和Michel編，49頁：Henry Pelling，《1945—1951年的工黨政府》（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84），117—118頁。

[[38]](#_38_91)《社會政策協會文集：1—187卷，1873—1932》（Munich: Buncker und Humblot, 1933）。

[[39]](#_39_87)Gøsta Esping-Andersen，《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第2章。

[[40]](#_40_85)-1 格迪斯（Patrick Geddes, 1854—1932），英國生物學家，社會學家。現代城市研究和區域規劃的理論先驅之一。——編注

[[41]](#_41_85)-2 康芒斯（John Rogers Commons, 1862—1945），美國經濟學家，制度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編注

[[42]](#_42_79)William F.Willoughby文件集，威廉和瑪麗學院，第3盒，第18號，22號文件夾：Francis G.Peabody，《社會博物館作為大學教學的工具》（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08）：Philip Boardman，《帕特里克·格迪斯的世界》（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Rüdiger vom Bruch，“帝國后期的公民社會改革和工會：1901—1914年的社會改革協會（GSR）”，《德國工人運動史國際學術通訊》15（1979）：593頁。Howard Woodhead，“首屆德國城市展覽會”，《美國社會學雜志》9（1904）：433—458,612—630,812—830頁，10（1904）：47—63：John R.Commons，《我自己：約翰·康芒斯的自傳》（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3），129—130頁。

[[43]](#_43_79)Jack L.Walker，“美洲國家革新的蔓延”，《美國政治學評論》63（1969）：880—899頁。David Collier和Richard E.Messick，“前提與傳播：檢驗關于社會保障實施過程的不同解釋”，《美國政治學評論》69（1975）：1299—1315頁：Stein Kuhnle，“北歐福利國家的開始：相似與相異”，《社會學》（Acta Sociologica）21號增刊（1978）：9—35頁：Stein Kuhnle，“國際模式、國家、統計學：1890年代斯堪的納維亞社會保障解決辦法”，《國家、社會知識、現代社會政策起源》，Dietrich Rueschemeyer和Theda Skocpol編（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 第二章 大西洋世界

[[44]](#_44_77)引自Birdsey G.Northrop，《海外教育和其他文章》（New York: A.S.Barnes, 1873），15頁。

[[45]](#_45_77)J.Hector ST.John de Crèvecoeur，《美國農民的來信》（1782：重印本，Garden City: Dolphin Books,n.d.），44頁，48頁。更籠統的作品請參閱：C. Vann Woodward，《舊世界的新世界》（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Jack P.Greene，《美國的思想構成：例外主義和從1492年到1800年的身份認同》（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3）。

[[46]](#_46_75)Francois Bédarida，《1851—1975年的英國社會歷史》（London: Methuen, 1979），30頁。

[[47]](#_47_73)E.H.Kossmann，《1780—1940年的低地國家》（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373頁。Klaus Misgeld等編，《創造社會民主：瑞典社會民主勞動黨的世紀》（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xviii頁。更籠統的著作請參閱：Theodore S.Hamerow，《新歐洲的誕生：19世紀的國家和社會》（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3），第12章：Arno J.Mayer，《舊政權的頑固：走向大戰的歐洲》（New York: Pantheon, 1981）。

[[48]](#_48_71)William H.Dawson，《現代德國的演變》（倫敦：Unwin, 1908），435—436頁。Neal Blewett，“1885—1918年聯合王國的專營權”，《過去與現在》32（1965）：27—56頁。Bédarida，《英國社會歷史》，130頁。

[[49]](#_49_71)Henry Pelling，《美國和英國左派：從布萊特到貝文》（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57），18頁。H.M.Hyndman，“美國政治的光亮和陰影”，《雙周評論》35（1881）：340—357頁：James Bryce，《美利堅聯邦》（London: Macmillan, 1889），475頁。還可參閱David P.Crook，《1815—1850年英國政治中的美國民主》（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5）：John L.Snell，“1789—1914年德國民主的世界”，《歷史學家》31（1969）：521—538頁：R.Laurence Moore，《歐洲社會主義者與美國希望之鄉》（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50]](#_50_71)Gilbert Haven，《朝圣者的錢包：英國、法國、德國旅行摘錄》（New York: Hurd and Houghton, 1866），13,15,261頁。

[[51]](#_51_71)同上，283,431,477頁。

[[52]](#_52_71)Theodore Child，《暑假：歐洲游記》（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889），190頁：George H.Calvert，《歐洲風景和思想，第二輯》新版（Boston: Little，Brown, 1863），15頁：W.E.B.Du Bois，“1894—1916年的德國”，杜波依斯文件集（縮微膠片），馬薩諸塞大學安默斯特圖書館。

[[53]](#_53_69)Northrop，《海外教育》，第8,7，12頁。

[[54]](#_54_69)Ray Stannard Baker，《德國見聞》（紐約：McClure，Phillips, 1901），第7頁。Booker T.Washington，《最底層者：歐洲觀察和學習記錄》（Garden City，N.Y.：Doubleday，Page, 1912）：Fred H.Matthews，《尋找美國社會學：羅伯特·E.帕克和芝加哥學派》（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77），66頁。

[[55]](#_55_69)Samuel Gompers，《歐洲和美國的勞工》（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10），286—287頁。

[[56]](#_56_69)William F.Willoughby在1891年6月4日寫給Alice Willoughby的信，威廉·威洛比文件集，威廉和瑪麗大學斯韋姆圖書館。Ella Winter和Granville Hicks編，《林肯·斯蒂芬斯書信集》（New York: Harcourt，Brace, 1938），第一卷，第7頁：E.A.Ross，“轉向涅槃”，《競技場》4（1891）：736頁。Christopher Mulvey在《英美風景：19世紀英美游記文學研究》（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中精彩描述了審美情緒。

[[57]](#_57_67)Frederick L.Olmsted，《一個美國農夫在英國的游歷與評論》（1859年：重印本，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7），58,60,69—70頁。

[[58]](#_58_67)Peter J.Hamilton，《歷史土地上的漫步》（New York: G.P.Putnam's Sons, 1893），293頁。Allen F.Davis，《美國女英雄：簡·亞當斯的生平和傳奇》（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33頁。Marjorie H.Dobkin編，《一位女權主義者的形成：凱里·托馬斯的早期日記和書信》（Kent，Ohio: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9），249頁。

[[59]](#_59_67)John Frey，《一個美國鑄模工在歐洲》（Cincinnati： n.p.，1910），63,55—57頁。Mulvey，《英美風景》，111頁。Oliver Wendell Holmes，《我們在歐洲的100天》（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888），29頁。May Kenny，《常走的路：日記》（Atlanta: Autocrat, 1896），198,202,205,210頁。

[[60]](#_60_67)Mulvey，《英美風景》，130頁。Lewis Henry Morgan，《劉易斯·摩根游記片斷》，Leslie A.White編（Rochester，N.Y.：羅徹斯特歷史學會，1937），350頁。Frey，《美國鑄模工》，143—144,148頁。

[[61]](#_58_68)引自Pelling，《美國和英國左派》，65頁。

[[62]](#_62_65)Charles Booth 在1904年9月1日給Antonia Mary Booth的信：查爾斯·布思文件集，倫敦大學圖書館：Samuel Barnett, 1890—1891年環球旅行日記，1890年7月3日，薩繆爾·巴內特文件集，大倫敦檔案館和歷史圖書館：Ramsay MacDonald，關于美國的未發表的書的初稿（PRO 30/69/116），第5章，5—6頁，拉姆齊·麥克唐納文件集，倫敦公共檔案館，獲得Malcolm MacDonald遺囑執行者的授權發表：H.G.Wells，《美國的未來：尋找現實》（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06），61頁。

[[63]](#_63_65)Arthur Shadwell，《工業效率：英國、德國、美國工業生活對比研究》（Longmans，Green, 1906），第一卷，293,299頁：第2期，344,451頁。

[[64]](#_64_65)Barnett, 1890年7月7日的日記：MacDonald，關于美國的未發表的書，第21章，第8頁：John Burns，“美國風險”，《獨立》57（1904）：1475頁。

[[65]](#_65_65)David Landes，《解放了的普羅米修斯：1750年到現在的西歐技術進步和工業發展》（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9）：E.J.Hobsbawn，《資本時代：1848—1875年》（New York: Scribner's, 1975）：Michael Ferber，《威廉·布萊克的社會觀》（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第6章。本段的數據引自Hamerow的《新歐洲的誕生》，12頁：Chris Cook和John Paxton，《1848—1918年歐洲政治數據》（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78），238—246頁。B.R.Mitchell，《1750—1975年歐洲歷史統計》第2版修訂本（New York: Facts on File, 1980），455—456頁。Derek H.Aldcroft，《1875—1914年英國工業發展和外來競爭》（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68），121頁：（美國數據）美國調查統計局，《從殖民時代到1970年的美國歷史統計》（WashingtoN.D.C., 1975）。

[[66]](#_66_65)Sidney Pollard，《和平征服：1760—1970年的歐洲工業化》（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關于格拉斯哥，請參閱W.T.Ellis，《歐洲一百天夏日旅行》（Owensboro，Ky.：Inquirer Publishing Co., 1885），34頁。關于英國“大城市”，請參閱Chris Cook和Brendan Keith，《1830—1900年英國歷史事實》（London: Macmillan, 1975），234—236頁。

[[67]](#_67_63)E.A.Wrigley，《工業增長和人口變化：19世紀末期北歐和西歐煤礦區域研究》（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1）。

[[68]](#_68_63)Shawell，《工業效率》，第一卷，第2章：Paul Göhre，《車間里的三個月：實踐研究》（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1895）。

[[69]](#_69_61)Shawell，《工業效率》第一卷，256,327頁：Samuel Barnett, 1890年6月16日的日記：Norman MacKenzie編，《韋伯夫婦書信集》（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第二卷，67頁。

[[70]](#_70_61)美國調查統計局，《歷史統計》，693—694頁。Cook和Paxton，《歐洲政治事實》，245—246頁：Hamerow，《新歐洲的誕生》，12頁。關于“美國化”的恐懼，請參閱David E.Novack和Matthew Simon，“1871—1914年對美國出口侵略的商業反應：態度歷史研究”，《企業歷史探索》3（1966）：121—147頁：William T.Stead，《世界的美國化：或20世紀的趨勢》（London: Horace Markley, 1902），尤其是342—380頁。

[[71]](#_71_59)Andrew Lees，《感知的城市：1820—1940年歐洲和美國思想中的都市社會》（Manchester，Englan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5）：Paul S.Boyer，《1820—1920年美國的都市大眾和道德秩序》（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H.J.Dyos和 Michael Wolff編，《維多利亞時代的城市：形象和現實》（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3）。

[[72]](#_72_59)Brian Ladd，《1860—1914年德國城市規劃和公民秩序》（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14頁：R.D.Anderson，《1870—1914年的法國：政治和社會》（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7），31頁：Peter Flora編，《1815—1975年西歐國家、經濟和社會：數據手冊》（Frankfurt: Campus, 1987），第二卷，279,281,266頁。美國調查統計局，《美國歷史數據》，11頁：Adna F.Weber，《19世紀城市的發展》（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899），39,182頁。1890年的百萬人口大城市是倫敦、巴黎、柏林、維也納、紐約、芝加哥、費城。

[[73]](#_73_59)Mitchell，《歐洲歷史統計》，455—456頁。

[[74]](#_74_59)Hamerow，《新歐洲的誕生》，第2章：Gosta Esping-Anderson，《反對市場的政治：社會民主通向權力之路》（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49頁。

[[75]](#_75_59)Edward R.Tannenbaum，《1900年：大戰前的一代》（Garden City，N.Y.：Doubleday, 1976），21頁：Richard Dennis，《19世紀英國工業城市：社會地理》（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34頁：Elaine G.Spencer，《德意志帝國勞資關系：1896—1914年魯爾工業家作為雇主》（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4），44頁。Pollard，《和平征服》，153頁：S.H.F.Hickey，《德意志帝國的工人：魯爾區的礦工》（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5），第1章。更籠統的內容請參閱：Dirk Hoerder編，《大西洋經濟體內的勞工遷移：工業化時代歐洲和北美的工人階級》（Westport，Conn.：Greenwood, 1985）：Dirk Hoerder和Horst Rössler編，《遠方的吸引：1840—1930年移民經驗的期待和現實》（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93）。Leslie Page Moch，《流動的歐洲人：1650年來的西歐移民》（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

[[76]](#_76_59)邊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對快樂和痛苦進行了詳細分類，希望可以實現立法的科學化與數學化。——編注

[[77]](#_77_59)Thomas L.Haskell，《專業社會學的出現：美國社會科學協會和19世紀權威危機》（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7）。

[[78]](#_78_57)José Harris，《威廉·貝弗里奇傳記》（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86—88頁。Frederic C. Howe，《一位改革者的自白》（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5）：Sanford Elwitt，《捍衛第三共和國：1880—1914年法國資產階級改革》（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6）：Willard Wolfe，《從激進主義到社會主義：1881—1889年費邊社會主義者主張形成期間的成員和思想》（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Rüdiger vom Bruch編，《既非共產主義又非資本主義：從三月革命前到阿登納時期德國的公民社會改革》（Munich: Beck, 1985）中Rüdiger vom Bruch，“德意志帝國的公民社會改革”。

[[79]](#_79_57)James T.Kloppenberg，《不確定的勝利：1870—1920年歐美社會民主和進步主義思潮》（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300頁。Daniel T.Rodgers，“尋找進步主義”，《美國歷史評論》10（1982）：127頁注1。例外是法國，progressiste這個詞1890年代是意識形態爭奪的對象，最后落在黨派光譜的右邊。

[[80]](#_80_55)關于19世紀中期政治信仰的跨越大西洋的維度，請參閱Robert Kelley，《跨越大西洋的勸說：格萊斯頓時代的自由民主思想》（New York: Knopf, 1969）：David D.Hall，“維多利亞時代的紐帶”，《美國季刊》27（1975）：561—574頁。

[[81]](#_81_55)Wells，《美國的未來》，248頁。Laurence Goldman，“1857—1886年社會科學協會：維多利亞時代中期自由主義的背景”，《英國歷史評論》101（1986）：131頁。

[[82]](#_82_55)Gerhard A.Ritter，《英國、德國的社會福利：起源和發展》（Leamington Spa: Berg, 1986）： Judith F.Stone，《尋求社會和平：1890—1914年法國的改革立法》（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5）。

[[83]](#_83_55)W.B.Sutch，《新西蘭的社會保障探索》（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Francis G.Castles，《工人階級和福利：反思1890—1980年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福利國家的政治發展》（Wellington，New Zealand: Allen and Unwin, 1985）。

[[84]](#_84_55)Peter J.Coleman，《進步主義和改革世界：新西蘭與美國福利國家的起源》（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87），57頁：Henry D.Lloyd，《最新的英國：新西蘭民主游客札記以及與澳大利亞的對比》（New York: Doubleday，Page, 1900），第1頁：《韋伯夫婦書信集》，第二卷，89頁。

[[85]](#_85_55)Bentley B.Gilbert，《英國國民保險的演化：福利國家的起源》（London: Michael Joseph, 1966）：J.R.Hay，《1906—1914年自由黨福利改革的起源》（London: Macmillan, 1975）：Pat Thane編，《英國社會政策的起源》（London: Croom Helm, 1978）：Stone，《尋求社會和平》。

[[86]](#_86_55)Elting E.Morison編，《西奧多·羅斯福書信集》（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1—1954），第七卷，398,406頁：Walter Weyl, 1912年12月15日的日記，沃爾特·韋爾文件集，羅格斯大學：William Allen White，《威廉·艾倫·懷特自傳》（New York: Macmillan, 1946），410頁。

[[87]](#_87_54)Henry Pelling，“1880—1901年英國勞工騎士團”，《經濟史評論》，第2輯，9（1956）：313—331頁。Stefan Berger，《1900—1931年的英國工黨和德國社會民主黨》（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4）：Cook和 Paxton，《歐洲政治事實》，115—137頁：E.J.Hobsbawm，《1875—1914年的帝國時代》（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9），98頁。

[[88]](#_88_56)Wolfgang J.Mommsen和Hans-Gerhard Husung編，《1880—1914年英國和德國工團主義的發展》（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5）中Friedhelm Boll的“國際罷工潮流：批評性評價”：Leopold Haimson和Charles Tilly編，《國際視野中的罷工、戰爭、革命：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罷工潮流》（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89]](#_89_55)Boll，“國際罷工潮流”，84頁：George Sayers Bain和Robert Price，《工會發展概況：八個國家統計數據對比》（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0），88頁。

[[90]](#_90_55)《1681年到1899年國際大會全集》（布魯塞爾：國際協會聯盟，1960）：《1900年到1919年國際大會全集》（布魯塞爾：國際協會聯盟，1964）。

[[91]](#_91_55)W.J.Mommensen編，《1850—1950年英國、德國福利國家的出現》（London: Croom Helm, 1981）中Jürgen Reulecke的“德國社會改革者眼中的19世紀中期英國的社會政策”：Lujo Brentano，《現代工會》（Leipzig: Duncker and Humblot, 1872）：J.M.Baernreither，《工人階級英國協會》（London: Swann Sonnenschein, 1893）：Hans Eduard von Berlepsch-Valendas，《英國花園城市運動：現狀和未來發展》（Munich: Oldenbourg, 1911）：Werner Picht，《湯因比館和英國睦鄰中心運動》（London: G.Bell and Sons, 1914）。關于法國的情況，請參閱Leon Bourgeois，《社會保障政策·第二卷：行動》（La politique de la prévoyance sociale,voL.2： L'Action，Paris: Bibliotheque Charpentier, 1919）中的“社會保障的國際組織”。

[[92]](#_92_55)Günter Hollenberg，《英國對于德意志帝國的興趣：普魯士德國對于1860—1914年大不列顛保守派和自由派的魅力》（Wiesbaden: Franz Steiner, 1974）：J.R.Hay，“英國企業界、社會保險和德意志帝國”，《福利國家的出現》，Mommsen編：Roy Hay，“英國的雇主和社會政策：1905—1914年福利立法的演變”，《社會歷史》4（1977）：435—455頁：Henry S.Lunn，《德國南部的市政教訓》（London: T.Fisher Unwin, 1908）：Gainsborough Commission，《德國的生活和勞動》（London: Simpkin，Marshall，Hamilton，Kent, 1906）：W.J.Ashley，《世紀末德國工人階級的進步》（London: Longmans，Green, 1904）。對比Paul M.Kennedy，《1860—1914年英德對立的形成》（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0）。

[[93]](#_93_55)B.Seebohm Rowntree，《土地和勞動：比利時的經驗》（London: Macmillan, 1910）：《社會政策協會文集，1873—1932年》：社會博物館叢書，《社會博物館》（Paris, 1908）：《社會博物館年鑒》，1902—1914。

[[94]](#_94_55)Keith Sinclair，《新西蘭的費邊社干將：威廉·彭伯·里夫斯》（London: Clarendon Press, 1965）：James Sheehan，《路約·布倫坦諾的生涯：德意志帝國自由主義和社會改革研究》（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6）：Peter Gay，《民主社會主義的困境：伯恩斯坦對馬克思的挑戰》（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2）：Hugo Lindemann，《英國城市管理和城市社會主義》（Stuttgart: Dick, 1897）。

[[95]](#_95_54)Hollenberg，《英國對于德意志帝國的興趣》，230—242頁。William H.Dawson關于德國的書：《德國社會主義和費迪南德·拉薩爾》（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1888）：《俾斯麥和國家社會主義：1870年來德國社會經濟立法說明》（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1890）：《德國和德國人》（London: Chapman and Hall, 1894）：《德國城市和鄉村的生活》（New York: G.P.Putnam's Sons, 1901）：《德國的保護》（London: P.S.King and Sons, 1904）：《德國工人：國民效率研究》（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6）：《現代德國的演變》（London: Unwin, 1908）：《流浪問題：限制流浪漢、懶漢、無就業能力者的措施》（London: P.S.King and Sons, 1910）：《1883—1911年德國社會保險》（London: Unwin, 1913）：《工業化德國》（London: Collins, 1913）：《德國城市生活和管理》（London: Longmans，Green, 1914）。

[[96]](#_96_54)James Leiby，《卡羅爾·萊特和勞工改革：勞工統計學的起源》（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美國勞工局《公報》（1895—1912）和美國勞工統計局《公報》（1912—）。早期生活水平調查的例子：Lee Meriwether，《流浪旅行：如何每天只花五毛錢游覽歐洲》（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886）。

[[97]](#_97_54)威洛比文件集，18,21,22號文件夾：William F.Willoughby，《工人保險》（New York: Thomas Y.Crowell, 1898）：《約翰·格雷厄姆·布魯克斯回憶錄》（Boston： N.p.，1940）：《E.R.L.古爾德》（私人印刷，1916）：《沃爾特·韋爾禮贊》（私人印刷，1922）。

[[98]](#_98_54)Joseph O.Baylen，“一個維多利亞時代人在芝加哥的‘圣戰’，1893—1894年”，《美國歷史雜志》51（1964）：418—434頁：William Dwight Porter Bliss，《美國傳記辭典》，Allen Johnson和Dumas Malone編（New York: Scribner's, 1928—1958），第二卷，377—378頁：Charles R.Henderson，“德國人內在的使命”，《美國社會學雜志》1（1896）：581—595,674—684頁：2（1896）：58—73頁。更籠統的著作，請參閱Peter D'A.Jones，《1877—1914年基督教社會主義復興：英國維多利亞時代后期的宗教、階級和社會良心》（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受到《新事物》（Rerum Novarum，即教皇列奧十三世在1891年關于“社會問題”的通諭）出版的鼓勵，國際社會天主教也迅速發展。但是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反天主教情緒根深蒂固的美國，它的影響根本沒有辦法和新教的復興相比。

[[99]](#_99_54)Robert C. Reinders，“湯因比館和美國睦鄰中心運動”，《社會服務評論》56（1982）：39—54頁：Standish Meacham，《1880—1914年湯因比館和社會改革：尋找共同體》（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參觀者留言簿，湯因比館文件集，大倫敦檔案館。

[[100]](#_100_54)Lillian Wald，《亨利大街的窗戶》（Boston: Little，Brown, 1934）：Edith Abbott，“格雷絲·阿伯特和赫爾館 1908—1921”，《社會服務評論》24（1950）：380頁：Howard E.Wilson，《鄰居瑪麗·麥克道爾》（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28），211頁：Graham Taylor，《社會拓荒者》（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0），第14章。

[[101]](#_101_54)Eleanor H.Woods，《民主戰士：羅伯特·伍德》（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29），36頁：Robert A.Woods，《英國社會運動》（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891），24,265頁。

[[102]](#_102_54)David A.Shannon編，《貝特麗絲·韋伯的美國日記：1898年》（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3）。費邊社在美國講座的工作可以參閱《費邊新聞》。

[[103]](#_103_54)《韋伯夫婦書信集》，第二卷，21頁：Herbert Burrows和John A.Hobson編，《威廉·克拉克文集》（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1908）：格雷厄姆·沃拉斯文件集，倫敦經濟學院，英國政治經濟學圖書館：Thomas P.Jenkin，“美國的費邊社運動”，《西方政治季刊》1（1948）：113—123頁：Mary Earhart，《弗朗西絲·威拉德：從祈禱到政治》（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241頁：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保存的費邊社文件中有美國成員和通訊員名單。

[[104]](#_104_54)《1900年公共資助和私人慈善國際大會論文集》（巴黎：1900），第一卷，lxxxvii頁：1900年工人權益保護國際大會，《會議分析報告》（巴黎：1901）：美國勞工立法協會，《失業：工業問題》（紐約，1914），第5頁：國際住房大會，《1910年維也納第九屆國際住房大會報告》（維也納：1911），61頁。

[[105]](#_105_54)William Jennings Bryan，《舊世界和它的方式》（ST.Louis: Thompson, 1907）。

[[106]](#_106_54)Ray S.Baker，《德國見聞》（New York: McClure，Phillips, 1901），首次部分發表在1900年9月—1901年1月的《麥克盧爾雜志》：Charles Edward Russell，《多數人的反抗》（New York: Doubleday，Page, 1907），首次發表在1905年11月—1907年1月的《人人雜志》：Benjamin O.Flower，《進步的男人、女人和過去25年的運動》（Boston: New Arena, 1914），第14章：引語來自Charles Edward Russell，“倫敦社會主義政府”，《大都會》（Cosmopolitan）40（1906）：368頁：Charles Edward Russell，“公益戰士”，《人人雜志》16（1907）：16頁。

[[107]](#_107_54)Henry D.Lloyd，《勞動合作：參觀英國和愛爾蘭的合作車間、工廠和農莊》（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898）：《沒有罷工的國家：參觀新西蘭的強制性仲裁法庭》（New York: Doubleday，Page, 1900）：《最新的英國：新西蘭民主游客札記以及與澳大利亞的對比》（New York: Doubleday，Page, 1900）：《人民主權：瑞士民主研究》（A Sovereign People，New York: Doubleday，Page, 1907）：其中最后一本在勞埃德去世的時候還沒有完成，由他的朋友、“新自由派”英國經濟學家J.A.Hobson續寫。引用的段落來自Caro Lloyd，《亨利·勞埃德，1847—1903》（New York: G.P.Putnam's Sons, 1912），第一卷，306—307頁：第二卷，181,96頁。

[[108]](#_108_54)Frederic C. Howe，《改革者的自白》（1925：重印本，Kent，Ohio: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8），236頁。

[[109]](#_109_54)全國公民聯盟，公有和公營委員會，《公共服務的市營和私營》（New York: National Civic Federation, 1907）：美國國會，眾議院司法委員會，《雇主責任和工人賠償》（眾議院20487號議案聽證會，62屆國會第二次會議，1913年），61,64頁：Ferdinand C. Schwedtman和James A.Emery，《事故預防和救濟：歐洲調查，特別關注英國和德國，同時提出美國行動的建議》（New York：全國制造商協會，1911）：Henry Bruere，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文獻：George M.Price，“維也納政府卷煙廠”，《調查》31（1914）：439—440頁：Geroge M.Price，“揭露歐洲各國首都的地下面包作坊”，同上，615頁：Geroge M.Price，“歐洲如何保護漂白工人——紐約是怎么做的”，《調查》32（1914）：58頁：Geroge M.Price，“海外女性工作印象”，同上，413頁：Raymond B.Bosdick，《歐洲警察體制》（New York: Century, 1915）：Katharine Coman，《失業保險：歐洲體系總結》（New York: Progressive National Service, 1915）：《歐洲農業合作社和農村信用：信息和證據》，63屆國會第一次會議，參議院文件214（1912）：《林肯·斯蒂芬斯自傳》（New York: Literary Guild, 1931），648—653頁。

[[110]](#_110_50)《調查》25（1911）：880頁：《美國城市》6（1912）：611,687頁：教育旅游協會，“歐洲公民和社會旅行”手冊（John Nolen文件集第4盒，康乃爾大學）。關于歐洲“社會學”旅行的早期的、半開玩笑的敘述，可參閱William H.Allen，“英國的窮人”，《肖托夸會刊》41（1905）：264—270頁。

[[111]](#_111_50)“不再瞧不起‘外國’”，《國家》99（1914年7月23）：94頁。

[[112]](#_112_50)Elwood P.Lawrence，《亨利·喬治在英倫諸島》（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7）：馬克思和恩格斯，《1848—1895年致美國人的信：選集》（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3），164頁：Chuschichi Tsuzuki，《艾琳娜·馬克思生平，1855—1898：社會主義者的悲劇》（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7），第6章：Sidney Webb，“亨利·喬治和社會主義”，《教堂改革者》（1889年1月），復印本在Passfield文件集中，倫敦經濟學院，英國政治經濟學圖書館。

[[113]](#_113_50)費邊社，《讀什么：社會改革者的書目》（London: Fabian Society, 1896）：費邊社，《社會經濟話題的更多書目》，費邊社宣傳冊，第129號（London: Fabian Society, 1906）：費邊社，《社會經濟話題書目》（London: Fabian Society, 1920）。

[[114]](#_114_50)Kenneth Morgan，“未來在行動：1890—1917年英美的進步主義”，《對比和聯系：英美歷史200周年論文集》，H.C. Allen和Roger Thompson編（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1976），251頁。

[[115]](#_115_50)Alfred Zimmern，《希臘共同體：公元五世紀雅典的政治和經濟》（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1）：Alfred Zimmern在1911年10月20日、24日、12月5日給母親的信：1912年1月10日給Elsie Zimmern的信。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阿爾弗雷德·齊默恩文件集。

[[116]](#_116_50)Alfred Zimmern在1912年2月11日給父親的信，1912年3月20日給母親的信，阿爾弗雷德·齊默恩文件集。

[[117]](#_117_50)E.R.Pease在《費邊新聞》13（1903年7月）：27頁。Clynes的話轉引自Pelling，《美國和英國左派》，91頁。

[[118]](#_118_50)Lloyd，《亨利·勞埃德》，第二卷，185頁。

[[119]](#_119_50)Charles McCarthy，《威斯康星思想》（New York: Macmillan, 1912），297—298頁：“作為地主的政府”，《競技場》33（1905）：325頁。

[[120]](#_120_48)Charles R.Henderson，“幫助孤單無助的孩子：歐洲國家為遺棄者、孤兒、窮人和反社會者做了什么”，《世界工作》24（1912）：627頁：Brand Whitlock，“城市和文明”，《斯克里布納雜志》52（1912）：625頁：《調查》29（1912）：50頁。

[[121]](#_121_48)Benjamin P.De Witt，《進步運動：美國政治的現行趨勢的全面、非黨派討論》（1915年：重印本，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24頁：Paul U.Kellogg，“新黨的工業政綱”，《調查》28（1912）：670頁。

[[122]](#_122_48)Walter Weyl，《新民主：關于美國某些政治、經濟趨勢的論文》（New York: Macmillan, 1912），第2頁，20頁。

#### 第三章 自由放任經濟的黃昏

[[123]](#_123_48)Richard T.Ely，“1885—1909年美國經濟學協會”，《美國經濟學協會出版物》第3輯，11（1910）：77頁：Richard T.Ely，《我們腳下的土地：自傳》（New York: Macmillan, 1938），145—146頁。

[[124]](#_124_48)即使是描述19世紀末期美國社會思想的最好的歷史學家，因意圖展示他們故事中獨特的“美國”特征，也只是承認德國大學紐帶，但是很大程度上沒有探討。Dorothy Ross，《美國社會科學的根源》（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Dorothy Ross，“社會主義和美國自由主義：1880年代學術界社會思想”，《美國歷史視野》11（1977—1978）：5—79頁：Mary O.Furner，《宣傳和客觀性：1865—1905年美國社會科學專業化的危機》（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75）：Benjamin G.Rader，《學術思想和改革：理查德·伊利在美國生活中的影響》（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66）：Sidney Fine，《自由放任與普遍福利的國家：1865—1901年美國思想沖突研究》（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6）：這些各具特色的模范研究都存在同樣的缺陷。例外的情況請參閱：Jurgen Herbst，《美國學術中的德國歷史學派：文化轉移研究》（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5）：Joseph Dorfman（雖然在這方面有點夸張），“德國歷史學派在美國經濟思想中的角色”，《美國經濟評論》45，第2期（1955）：17—28頁。

[[125]](#_125_48)辯論的總結可參閱Arthur J.Taylor，《英國19世紀的自由放任和國家干預》（London: Macmillan, 1972）：Gordon H.Scott，“自由放任的意識形態”，《古典經濟學家和經濟政策》，A.W.Coats編（London: Methuen, 1971）：John Roach，《1780—1880年英國的社會改革》（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78）：P.W.J.Bartrip，“英國19世紀中期的國家干預：事實還是虛幻？”《英國研究雜志》23（1983）：63—83頁。

[[126]](#_126_46)Adam Smith，《國富論》，Edward Cannan編（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第二卷，208頁：Harold Perkin，《1780—1880年現代英國社會的起源》（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9），186頁：John Graham Brooks, 1884—1885年的剪貼簿，約翰·格雷厄姆·布魯克斯文件集，哈佛大學拉德克利夫學院施萊辛格圖書館。

[[127]](#_127_46)Pekin，《起源》，324頁：Alfred Marshall，“老一代和新一代經濟學家”，《阿爾弗雷德·馬歇爾紀念文集》，A.C. Pigou編（London: Macmillan, 1925），296頁：John Stuart Mill，《政治經濟學原理：穆勒全集》，F.E.L.Priestley編（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3—1991），第三卷，945頁。

[[128]](#_128_46)Colleen A.Dunlavy，《政治和工業化：美國和普魯士的早期鐵路》（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Louis Hartz，《經濟政策和民主思想：1776—1860年的賓夕法尼亞》（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Oscar和Mary F.Handlin，《共和國：政府在美國經濟中的角色，1774—1861年的馬薩諸塞》（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47）：Richard L.McCormick，“政黨階段和公共政策：解釋性假說”，《美國歷史雜志》66（1979）：279—298頁。

[[129]](#_129_46)William J.Novak，《人民的福利：19世紀美國的法律和規定》（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描述隨之而來的立法平衡的嘗試，請參閱William R.Brock，《調查和責任：1865—1900年美國的公共責任》（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Morton Keller，《國家事務：19世紀末期美國的公共生活》（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James Bryce，《美利堅共和國》（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1888：重印本，New York: G.P.Putnam's Sons, 1959），尤其是第五部分第2章：“自由放任”。

[[130]](#_130_46)Ely，《我們腳下的土地》，35頁：Richard A.Swanson，“1855—1925年的埃德蒙德·詹姆斯：美國高等教育中的‘保守派進步人士’”，伊利諾斯大學1966年博士論文：Millicent Garrett Fawcett，《政治經濟學入門》第4版（London: Macmillan, 1876），第v頁。關于19世紀中期學院派經濟學概況，請參閱Ross，《美國社會科學的起源》，第2章：Furner，《宣傳和客觀性》，第2章：Robert L.Church，“經濟學家作為專家：1879—1920年美國一個新興專業的出現”，《社會中的大學》第二卷，Lawrence Stone編（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131]](#_131_46)Albert Shaw，“美利堅國家和美國人”，《當代評論》51（1887）：696頁：Francis A.Walker，“美國政治經濟最近的進步”，《美國經濟學協會出版物》4（1889）：254頁。

[[132]](#_132_46)Charles Gide，“經濟學派和法國政治經濟學教學”，《政治學季刊》5（1890）：603—635頁。

[[133]](#_133_46)James J.Sheehan，《1770—1866年德國歷史》（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9），734頁：Keith Tribe，《管理經濟：1750—1840年德國經濟學話語的改變》（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Donald G.Rohr，《德國社會自由主義的起源》（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3）：Gustav Schmoller，“勞工問題”，《普魯士年鑒》（Preussische Jahrbücher）14（1864）：421頁。

[[134]](#_134_44)Gustav Schmoller，“1872年10月6日埃森納赫社會問題研討會開幕式講話”，《當代社會和工會政治：言論和文章》（Leipzig: Duncker and Humblot, 1890），第1頁：Franz Boese，《1872—1932年社會政策協會歷史》（Berlin: Duncker and Humblot, 1939），248頁。

[[135]](#_135_44)Heinrich von Treitschke，“社會主義及其支持者”，《普魯士年鑒》34（1874）：248—301頁：Gustav Schmoller，“權利和國民經濟基本問題”，《國民經濟和統計年鑒》23（1874）：225—349頁：24（1875）：81—119頁：Henry W.Farnam，“就職演說”（Antritts Vorlesung），法納姆家族文件集，耶魯大學圖書館手稿和檔案處。Kathedersozialisten通常被翻譯成為“座椅社會主義者”（或者更準確的）“講壇社會主義者”，但是“專業社會主義者”更接近原文的意思。

[[136]](#_136_44)Gide，“經濟學派”，628—634頁：Charles Gide，“法國經濟學派，與英國經濟學派和德國經濟學派的聯系”，《德國十九世紀國民經濟發展：古斯塔夫七十周年紀念文集》（Leipzig: Duncker and Humblot, 1890）：Judith Stone，《尋求社會和平：1890—1914年法國立法改革》（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5），第2章。

[[137]](#_137_44)Gerald M.Koot，《英國歷史經濟學，1870—1926年：經濟史的興起和新商業主義》（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Ellen Frankel Paul，《道德革命和經濟科學：19世紀英國政治經濟學中自由放任的死亡》（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 1979）：A.W.Coats，“英國經濟思想中的社會學內容（c. 1880—1930）”，《政治經濟學雜志》75（1967）：709—729頁：H.S.Foxwell，“英國經濟運動”，《經濟學季刊》2（1887）：84—103頁：W.Cunningham，“為什么羅塞爾在英國的影響力這么小？”《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5（1894）：317—334頁。

[[138]](#_138_44)比如，E.L.Godkin，“德國政治經濟”，《國家》19（1872）：293—294頁：E.L.Godkin，“新德國政治經濟”，同上，21（1875）：161—162頁：J.M.Hart，“德國政治經濟”，同上，295—296頁。

[[139]](#_139_44)這個術語來自Albert Shaw的“美利堅國家”，697頁。

[[140]](#_140_44)Ely，《我們腳下的土地》，36—63頁：Richard T.Ely等，“紀念前主席西蒙·帕滕”，美國經濟學協會《第35屆年會論文集》（1923），259,276—277頁。

[[141]](#_141_44)Ellen Nore，《查爾斯·比爾德：思想傳記》（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3），第2章：John Braeman，“查爾斯·比爾德：英國經驗”，《美國研究雜志》15（1989）：165—189頁：Charles A.Beard，“羅斯金和混亂語言”（Ruskin and the Babble of Tongues），《新共和》87（1936）：370—372頁：Lela B.Costin，《社會正義兩姐妹：格雷絲和伊迪絲·阿伯特傳記》（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3）：Leo S.Rowe，“法國大學中的教學”，《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2（1892）：62—85頁。那些在巴黎度過一個學期的人中還有E.R.A.Seligman，Frank J.Goodnow，Roland P.Falkner，John H.Gray，Emily Balch，Henry R.Seager，Leo S.Rowe，Walter Weyl和Frank A.Fetter。但是所有這些短期逗留與德國主導的課程學習相比是小巫見大巫了。

[[142]](#_142_44)James Morgan Hart，《德國大學：個人經驗》（New York: G.P.Putnam's Sons, 1874）：Laurence R.Veysey，《美國大學的出現》（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5），130—131頁：Carl Diehl，《1770—1870年美國和德國學術》（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關于招收的美國學生的情況，可參閱Johannes Conrad，《過去50年的德國大學》（Glasgow: David Bryce and Son, 1885），41頁：George Weisz，《法國現代大學的出現，1863—1914年》（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3），262頁。

[[143]](#_143_44)Jack C. Myles，“德國歷史主義和美國經濟學：德國歷史學派對經濟思想的影響研究”，普林斯頓大學1956年博士論文，98—118頁：Henry W.Farnam，“國民經濟學上的德國美國聯系”，《德國國民經濟學的發展》。

[[144]](#_144_44)Samuel McCune Lindsay文件集，哥倫比亞大學：Mary Kingsbury Simkhovitch，《鄰居：我的格林威治館故事》（紐約：W.W.Norton, 1938），第3章：Mercedes M.Randall，《不合時宜的波士頓人：愛米莉·格林·巴爾奇》（Improper Bostonian，New York: Twayne, 1964），88—101頁。

[[145]](#_145_42)Florence Kelley，《60年筆記：弗洛倫斯·凱利自傳》，Kathryn Kish Sklar編（Chicago: Charles H.Kerr, 1986），61—74頁：M.Carey Thomas，《一位女權主義者的形成：瑪麗·托馬斯的早期日記和書信》，Marjorie H.Dobkin編（Kent，Ohio: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9），第2章：Alice Hamilton，《探索危險的行業：愛麗絲·漢密爾頓自傳》（Boston: Little，Brown, 1943），44—45,47頁。

[[146]](#_146_42)美國經濟學協會的最初官員是：會長Francis A.Walker、第一副會長Henry C. Adams（柏林、海德堡，1878—1880）、第二副會長Edmund J.James（哈雷、柏林、萊比錫，1875—1877）、第三副會長John B.Clark（海德堡、萊比錫，1873—1875）、秘書Richard T.Ely（哈雷、海德堡、柏林，1877—1880）、財務主管E.R.A.Seligman（柏林、海德堡、巴黎，1879—1881）。法納姆調查的反饋收集在法納姆家庭資料，第248盒，第3239號文件夾（以下簡稱“法納姆調查”）。

[[147]](#_147_42)Richard T.Ely，“美國經濟學協會”，68頁：Thomas，《女權主義者的形成》，第2章。

[[148]](#_148_42)W.E.B.Du Bois 在1894年2月23日給[看不清是誰]的信，杜波依斯文件集（縮微膠片）馬薩諸塞大學安默斯特圖書館：W.E.B.Du Bois，《杜波依斯自傳：第一個世紀的最后十年看待我的生活的獨白》（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68），第10章：Samuel M.Lindsay在1889年到1894年給父母的信，林塞文件集。

[[149]](#_149_42)《林肯·斯蒂芬斯書信集》，Ella Winter和 Granville Hicks編（New York: Harcourt，Brace, 1938），第一卷，第9頁。

[[150]](#_150_42)Neil Coughlan，《年輕的約翰·杜威：美國思想史論文》（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5），124—130頁：Garrett Droppers在法納姆調查中。

[[151]](#_151_42)Henry C. Adams在1878年12月1日給母親的信，Henry Carter Adams文件集，密歇根歷史文獻，密歇根大學本特利歷史圖書館：Mary Kingsbury Simkhovitch，《鄰居》，第3章：Samuel M.Lindsay, 1892年11月1日給父母的信，林塞文件集：《杜波依斯書信》，Herbert Aptheker編（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73），第一卷，23頁：Kelley，《自傳》，61—77頁。

[[152]](#_152_40)W.E.B.Du Bois，“德國當前的狀況”[c. 1893]，杜波依斯文件集中未發表的手稿，第8頁，17頁。

[[153]](#_153_40)Fritz Ringer，《德國知識界名流的衰落：1890—1933年德國學術共同體》（The Decline of the German Mandarin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154]](#_154_40)Myles，“德國歷史主義和美國經濟學”，112—118頁：Henry W.Farnam，法納姆問卷調查結果的“總結”。約翰內斯·康拉德在哈雷教了幾乎同樣多的美國學生，但Vladimir Simkhovitch回憶說：“如果必須說實話，我認為康拉德沒有影響任何人的思想。” Simkhovitch在法納姆調查中。

[[155]](#_155_40)Richard T.Ely，《艱難時代：進來和出去之路》（New York: Macmillan, 1931），111頁：Adolph Wagner，“英國和德國國民經濟”，《普魯士年鑒》73（1893）：414頁。關于瓦格納，請參閱Kenneth D.Barkin，“威廉時代社會思想的沖突和一致”，《中歐歷史》5（1972）：55—71頁：Kenneth D.Barkin，《1890—1902年德國工業化的爭議》（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第4章：最主要的是Heinrich Rubner編，《阿道夫·瓦格納：1851—1917年書信、文獻和親眼目睹的報告》（Berlin: Duncker and Humblot, 1978）。

[[156]](#_156_40)Rubner編，《阿道夫·瓦格納》，91,118—119頁：Adolph Wagner，《社會問題言論集》（Berlin: Wiegaandt and Grieben, 1872），第4頁。關于社會主義者對于瓦格納的思想的興趣，請參閱Vernon L.Lidtke，“德國社會民主和德國國家社會主義。1876—1884年”，《社會歷史國際評論》9（1964）：202—225頁。

[[157]](#_157_38)Rubner編，《阿道夫·瓦格納》，120頁：Wagner，《社會問題言論集》：《經濟雜志》26（1916）：131頁：Garrett Droppers在法納姆調查中。

[[158]](#_158_38)Adolph Wagner，“財政學和國家社會主義”，《一般政治學雜志》（Zeitschrift fu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43（1887）：37—122頁：Adolph Wagner，“社會主義的是與非”，《雙周評論》81（1907）：682—694頁：Willaim H.Dawson，《俾斯麥和國家社會主義：德國自1870年以來社會經濟立法說明》（1890年：重印本，New York: Fertig, 1973），第1章：Wagner，《社會問題言論集》，4—5頁。

[[159]](#_159_38)Rubner編，《阿道夫·瓦格納》，172頁：Adolph Wagner，《大工業卡特爾及其對工人的影響》（埃森：Christlichen Gerwerkschaftskartells Essen, 1906）。

[[160]](#_160_38)Asher，“教授作為宣傳家”：M.Epstein，“古斯塔夫·施穆勒”，《經濟雜志》27（1917）：435—438頁。《德意志帝國立法、行政和國民經濟學年鑒》，施穆勒在1881年擔任該雜志的編輯，它到了1913年被重新命名為《施穆勒年鑒》。

[[161]](#_161_38)Henry Rogers Seager，“柏林和維也納的經濟學”，《政治經濟雜志》1（1893）：236—262頁：還可參閱Simkhovitch在法納姆調查中：F.W.Taussig，“施穆勒論保護和自由貿易”，《經濟學季刊》19（1905）：501—511頁。

[[162]](#_162_38)Rüdiger vom Bruch，“德意志帝國時期的公民社會改革”，《既非共產主義又非資本主義：從三月革命前到阿登納時期的德國公民改革》，Rüdiger vom Bruch編（Munich: Beck, 1985），85頁：Rüdiger vom Bruch，“德意志帝國后期公民社會改革：1901—1914年的社會改革協會（GSR）”，IWK（《德國工人運動史國際學術通訊》）15（1979）：588—589頁。

[[163]](#_163_38)Vom Bruch，“公民社會改革”，72—82,122—130頁：Dieter Lindenlaub，《社會政策協會的路線斗爭》（Richtungskämpfe im Verein für Sozialpolitik），《社會和經濟史季刊》52—53號增刊（Wiesbaden, 1967）。關于當時人對“社會政策協會”的描寫，請參閱Gustav Cohn，“德國政治經濟的歷史與現狀”，《雙周評論》20（1873）：337—350頁：Eugen von Philippovich，“社會政策協會”，《經濟學季刊》5（1891）：220—237頁：Lujo Brentano，《我在德國爭取社會發展的斗爭生活》（Jena: Eugen Diederich, 1931）。

[[164]](#_164_38)Boese，《社會政策協會的發展》，241頁：“社會政策協會的假期課程”，《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7（1896）：69—73頁：《社會政策協會文集》（1873—1932）。

[[165]](#_165_38)Gustav Schmoller，“社會問題和普魯士國家”，《當代社會和行業政治》，62頁：Schmoller，“社會問題討論會上的開幕詞”，同上，第9頁：Gustav Schmoller，“論卡特爾和國家的關系”，《德意志帝國立法、行政和國民經濟學年鑒》29（1905）：1550—1597頁。比較Jane Caplan，“特殊利益想象中的普遍性：德國歷史上的公務員‘傳統’”，《社會歷史》4（1979）：299—317頁。

[[166]](#_166_37)E.Benjamin Andrews和Emily Balch在法納姆調查中。Edmund J.James，“作為經濟因素的國家”，《科學》7（1886）：488頁：Edmund J.James，“國家干預”，《肖托夸會刊》8（1888）：534—536頁：甚至德國留學一代最正統的人Arthur Hadley也被打動而給家里寫信說：“這些問題有更多的方面，而不只是Billy[William Graham] Summner讓我們相信的那些。”Morris Hadley，《阿瑟·哈德利》（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8），32頁。

[[167]](#_167_37)Franklin H.Dixon在法納姆調查中。施穆勒本人覺得只有通過重新恢復君主制才能讓美國擊退階級統治——首先是有產者，隨后是無產者的統治。Lindenlaub，《社會政策協會的路線斗爭》，243頁注。

[[168]](#_168_37)W.E.B.Du Bois，“歐洲的一些印象”[c. 1894]，第9頁，杜波依斯文件集：Samuel M.Lindsay在1891年7月12日給父母的信，林塞文集：Richard T.Ely，“柏林城市管理”，《國家》34（1882年3月23日）：246頁。

[[169]](#_169_37)“Feisei”[Edmund J.James]，“俾斯麥公爵”，《美國人》（Philadelphia）1884年8月16日，295—296頁：E.R.A.Seligman在1879年10月3日給父母的信：塞利格曼文件集，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和手稿圖書館：Richard T.Ely，“俾斯麥讓德國勞動者參加保險的計劃”，《國際評論》12（1882）：504—520頁：John H.Gray，“反對社會主義的德國法案”，《經濟學季刊》4（1890）：324頁：詹姆斯為“俾斯麥公爵”的作者，這是在《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7（1896）：84頁確定的。

[[170]](#_170_37)Mary Kingsbury Simkhovitch，《鄰居》，52頁：Henry C. Adams，“我們應該迫使無政府主義者閉嘴嗎？”《論壇》1（1886）：453頁。

[[171]](#_171_37)Joseph Dorfman，亨利·亞當斯《工業行動，經濟學和法學與國家關系：兩篇論文》的“序言”，（重印本，New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4）：Ross，“社會主義和美國自由主義”：A.W.Coats，“亨利·亞當斯：1850—1900年美國社會科學興起的個案分析”，《美國研究雜志》2（1968）：177—197頁。

[[172]](#_172_37)Henry C. Adams，“柏林日記：1878—1879年”，第9,15,25—26頁，亞當斯文件集。

[[173]](#_173_37)Simon Pattern，“經濟理論的重建”，《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44號增刊（1912）：第1頁：Henry C. Adams，“柏林日記：1878—1879年”，11—12頁。

[[174]](#_174_37)Rader，《學術思想和改革》，30頁：Richard T.Ely，“論政治經濟學教學法”，《歷史教學法》第2版，G.Stanley Hall編（Boston: Ginn，Heath, 1885）：Richard T.Ely，“德國1882年的政治經濟”，《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通訊》3（1882）：28頁：Henry C. Adams，《政治經濟演說綱要》（Baltimore： N.p.，1881）。

[[175]](#_175_37)Rader，《學術思想和改革》，29頁：Marvin Gettleman編，《1877—1912年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和政治討論》（New York: Garland, 1987—），第一卷。

[[176]](#_176_37)Albion Small，“對社會學歷史的一些貢獻”，《美國社會學雜志》30（1924）：303頁：Richard T.Ely，“政治經濟的過去與現在”，《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和政治討論》2（1884）：202頁。

[[177]](#_177_37)Herbet B.Adams，“美國大學的擴張”，《論壇》11（1891）：510—523頁：Richard T.Ely，《現代法國和德國社會主義》（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883）：Richard T.Ely，《美國最近的社會主義》（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885）：Richard T.Ely，《美國勞工運動》（New York: Thomas Y.Crowell, 1886）：Richard T.Ely，“社會主義”，《安道華評論》5（1886）：156頁：Richard T.Ely，“美國勞工聯合會年度大會上的發言”，《基督教聯盟》（Christian Union）37（1888年2月9日）：170—171頁：Edmund J.James，“美國的社會主義者和無政府主義者”，《我們的時代》（Our Day）1（1888）：81—94頁：George E.McNeil編，《勞工運動：今天的問題》（1887：重印本，New York: A.M.Kelley, 1971），第1—3章：亨利·亞當斯，“勞工問題”，《科學美國人》22（1886）：62頁。

[[178]](#_178_37)E.R.A.Seligman，“歐文和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政治學季刊》1（1886）：206—249頁：Richard T.Ely，“英國基督教社會主義”，《基督教聯盟》31（1885年5月28日）：7—8頁：（1885年6月4日）：7—8頁：（1885年6月11日）：7—8頁：Ely，“法國和德國社會主義”，第16章。關于E.R.A.Seligman，請參閱他的自傳札記：“埃德溫·塞利格曼”，《自我表述的當代政治經濟學》，Felix Meiner編（Die Volkswirtschaftlehre der Gegenwart im Selbsdarstellungen），（Leipzig: F.Meiner, 1929），第二卷，117—160頁。

[[179]](#_179_35)Ross，“社會主義和美國自由主義”，40—41頁。

[[180]](#_180_35)Samuel A.Barnett，“切實可行的社會主義”，《19世紀》13（1883）：554—560頁：Donald Reed，《1868—1914年的英國：都市民主時代》（London: Longman, 1979），302—303頁。

[[181]](#_181_35)Ely，“政治經濟的過去和現在”，201頁注：Seligman，“歐文和基督教社會主義者”，207頁：對比Ross，“社會主義和美國自由主義”。

[[182]](#_182_35)Ely，“政治經濟的過去和現在”，191頁注：Ely，《新近的美國社會主義》，73頁：Edmund James，“國家作為經濟因素”，《科學》7（1886）：485頁：Henry C. Adams，“經濟學和法學”，《科學》8（1886年7月2日）：16頁：Richard T.Ely，《今天的問題：討論保護性關稅、稅收和壟斷》，新版（New York: Thomas Y.Crowell, 1890），233頁。

[[183]](#_183_35)比如，Richard T.Ely，“土地、勞動和稅收”，《獨立》39（1887年12月1日—1888年1月5日）。

[[184]](#_184_35)“美國經濟學協會，1885—1909年”，《美國經濟學協會出版物》第3輯，11（1910）：50—51頁，107—111頁：“紀念西蒙·帕滕”，《美國經濟學評論》13號增刊（1923）：260—261頁。

[[185]](#_185_33)Richard T.Ely，“美國經濟學協會組織報告”，《美國經濟學協會出版物》1（1886）：1—32頁。

[[186]](#_186_31)Joseph Dorfman，“塞利格曼通訊”，《政治學季刊》56（1941）：281頁：Richard T.Ely，“美國經濟學協會，1885—1909年”，《美國經濟學協會出版物》第3輯，11（1910）：71—73頁：同上，3（1888）：222—223頁。關于美國經濟學協會渴望吸收熱心的外行會員，請參閱Richard T.Ely，“美國經濟學協會”，《獨立》39（1887）：681頁：Church，“作為專家的經濟學家”，591頁。

[[187]](#_187_31)E.R.A.Seligman，“政治經濟信條隨時間的變化”，《科學》7（1886）：375—381頁：E.J.James，“國家作為經濟因素”，同上，485—488頁（著重號為后加）：Richard T.Ely，“倫理學和經濟學”，同上，529—533頁（著重號為后加）：Henry C. Adams，“經濟學和法學”，同上，8（1886）：15—19頁：Richard Mayo Smith，“政治經濟學調查方法”，同上，80—87頁。

[[188]](#_188_31)Arthur T.Hadley，“經濟學規律和方法”，同上，46—48頁。

[[189]](#_189_31)William E.Barns編，《勞工問題：簡單的問題和現實的答案》（New York: Harpers and Brothers, 1886），62頁：Adams，“勞工問題”，8861頁：E.J.James，“英國最近的土地立法”，《科學》6（1885）：455—456頁：Seligman，“政治經濟學信條的變化”，382頁。

[[190]](#_190_31)James B.Angell在1887年3月26日給亨利·亞當斯的信，亞當斯文件集。

[[191]](#_191_31)Dorfman，亞當斯《國家與工業行動的關系》的“序言”，16頁：James B.Angell在1886年3月19日給亨利·亞當斯的信，亨利·亞當斯在1886年3月25日給James B.Angell的信，亞當斯文件集。

[[192]](#_192_31)該事件在Furner的《宣傳和客觀性》127—142頁中有詳細描述，強調了1886年5月無政府主義恐慌的影響：Dorfman的“需要”中也有描述。亞當斯的演說和Thurston的反應發表在《科學美國人》22號增刊（1886）：8861—8863頁，8877—8880頁。

[[193]](#_193_31)關于康奈爾大學的校董，請參閱C. H.Hull在1886年9月19日給亨利·亞當斯的信，亞當斯文件集。亞當斯給Angell的表示撤回的信轉載在Dorfman的“序言”，37—42頁。

[[194]](#_194_29)Forner，《宣傳和客觀性》：Steven A.Sass，《實用的想象：1881—1981年沃頓學院歷史》（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2），85頁：《美國經濟學協會出版物》2（1887）：228—295,495—581頁：3（1888）：44—46,54—56頁。

[[195]](#_195_29)Henry C. Adams，《控制國家工業干預的原則》，紐約市憲法俱樂部上宣讀的論文（紐約1886）。修訂稿以“國家與工業行動的關系”為題發表，《美國經濟學協會出版物》1（1887）：465—469頁。

[[196]](#_196_29)“現代工業組織及其危險”，《獨立》38（1886）：1109頁：Adams，“國家與工業行動的關系”，540—549頁。該段沒有出現在亞當斯的原論文中。

[[197]](#_197_29)E.R.A.Seligman，評亞當斯“國家與工業行動的關系”，《政治學季刊》2（1887）：353頁： Richard T.Ely，“社會研究，第二輯”，《哈珀斯新月刊》74（1887）：970—977頁，75（1887）：71—79,259—266頁：Richard T.Ely，《政治經濟學入門》（紐約：Chautauqua Press, 1889）243頁：Edmund J.James，“現代都市與煤氣供應的關系”，《美國經濟學協會出版物》1（1886），第2—3號：關于伊利思想的變化，請參閱Richard T.Ely，“社會研究”《哈珀斯新月刊》73（1886）：250—257,450—457,571—578頁。

[[198]](#_198_29)Sass，《實用主義想象》，75—77頁：《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1890—）。在1890年，當德國根源最顯著的時候，《紀事》的開頭兩期列舉了德國、奧地利和意大利大學前一年提供的所有政治經濟學和公共法律課程。

[[199]](#_199_29)Emory R.Johnson，《一位大學教授的生活：自傳》（Philadelphia： n.p.，1943）：Sass，《實用主義想象》，72頁：Adna F.Weber和B.H.Meyer在法納姆調查中：B.H.Meyer，“普魯士鐵路的管理”，《競技場》10（1897）：389—343頁：B.H.Meyer，“鐵路價格的政府管理”，《政治經濟學雜志》14（1906）：86—106頁：Friederic C. Howe，《威斯康星：民主實驗》（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2），尤其是第3章。更籠統的內容請參閱Church，“作為專家的經濟學家”。

[[200]](#_200_29)E.R.A.Seligman，“累進征稅的理論”，《美國經濟學協會出版物》8（1893）：52—54頁：Frank L.Tolman，“美國學術機構中的社會學研究”，《美國社會學雜志》8（1902—1903）：85—121,251—272頁，531—558頁：Rader，《學術思想和改革》。

[[201]](#_201_29)Roger Davidson和Rodney Lowe，“1870—1945年英國福利政策的官僚制和革新”，《1850—1950年英國、德國福利國家的出現》，W.J.Mommsen編（London: Croom，Helm, 1981）：Mary O.Furner和Barry Supple編，《國家與經濟學知識：美國和英國經驗》（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02]](#_202_29)Lindenlaub，《社會政策協會的路線斗爭》，142頁：Wolfgang J.Mommsen，《馬克斯·韋伯和1900—1902年的德國政治》（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76頁：更籠統的內容請參閱Dietrich Rueschemeyer和Theda Skocpol編，《國家、社會知識和現代社會政策的根源》（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203]](#_203_29)美國國會參議院教育和勞動委員會，《勞資關系報告》（Washington，D.C.，1885）：美國工業委員會，《報告》（Washington D.C.，1900—1902）：美國工業關系委員會，《最終報告》（Washington，D.C.，1915）：William J.Barber編，《打破學術界模式：經濟學家和19世紀美國高等教育》（Middletown，Conn.：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8），335—336頁：Rader，《學術思想和改革》。

[[204]](#_204_29)A.E.Weber，“當今美國經濟學家”，《新英格蘭雜志》新刊號21（1899）：261頁。

#### 第四章 自我支配的城市

[[205]](#_205_29)Friedrich Engels，《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1892：Chicago: Academy Chicago, 1984），58頁。關于進步人士想象中的城市，請參閱Gareth Stedman Jones，《被拋棄的倫敦：維多利亞社會階級關系研究》（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Paul Boyer，《1820—1920年美國的都市群眾和道德秩序》（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Andrew Lees，《感知的城市：1820—1940年歐洲和美國思想中的都市社會》（Manchester，Englan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5）：H.J.Dyos和Michael Wolff編，《維多利亞時代的城市：形象和現實》（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3）。

[[206]](#_206_29)Jack London，《深淵中的人們》（New York: Macmillan, 1903），第1章。

[[207]](#_207_29)Sam Bass Warner，Jr.，《私人城市：費城成長中的三個階段》（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68）。

[[208]](#_208_29)Anthony S.Wohl，《處于危險的生活：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公共健康》（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Anthony Sutcliffe，“19世紀英國都市環境中公共干預的增長：結構途徑”，《19世紀城市的結構》，James H.Johnson和Colin G.Pooley編（London: Croom Helm, 1982）。

[[209]](#_209_29)Malcolm Falkus，“19世紀城市貿易的發展”，《商業歷史》19（1977）：136—137頁。

[[210]](#_210_29)John C. Teaford，《未宣告的勝利：1870—1900年的美國城市政府》（The Unheralded Triumph，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273頁。

[[211]](#_211_27)Wolfgang Schivelbusch，《去魅的夜晚：19世紀光線的工業化》（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Thomas P.Hughes，《電力的網絡：1880—1930年西方社會的電氣化》（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3）：John P.McKay，《有軌電車和無軌電車：歐洲都市公共交通的興起》（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212]](#_212_27)Milo R.Maltbie，“雙城記：倫敦和費城的自來水供應”，《城市事務》3（1899）：191—224頁。

[[213]](#_213_27)Christopher Armstrong和H.V.Nelles，《壟斷時刻：1830—1930年加拿大公共服務的組織和管理》（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6），第5章。

[[214]](#_214_27)Richard J.Evans，《死神在漢堡：1830—1910年霍亂年代的社會和政治》（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7），151—161頁。

[[215]](#_215_27)Harold J.Laski，W.Ivor Jennings和William A.Robson，《城市進步的世紀，1835—1935年》（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35），316頁：Frederic C. Howe，《英國城市：民主的開端》（New York: Scribner's, 1907），71頁。

[[216]](#_216_27)David Glassberg，“改革的設計：美國公共澡堂運動”，《美國研究》20（1979）：第7頁：Marilyn Thornton Williams，《清洗“偉大的未洗者”：1840—1920年美國都市的公共澡堂》（Washing “The Great Unwashed”，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第8頁：關于和德國的類比，請參閱Brian K.Ladd，“19世紀德國城市公共澡堂和市政改良”，《城市歷史雜志》14（1988）：372—393頁。

[[217]](#_217_27)John Peterson，“1840—1890年衛生改革對美國都市規劃者的影響”，《社會史雜志》13（1979）：83—103頁。

[[218]](#_218_25)Alan Mayne，《想象中的貧民窟：1870—1914年三個城市的報紙上表現》（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3）。

[[219]](#_219_25)同上，第4章：Derek Fraser，《維多利亞時代城市的力量和權威》（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79），第4章：E.P.Hennock，《合適人選：19世紀都市政府的理想和現實》（Fit and Proper Persons，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73）：Asa Briggs，《維多利亞時代的城市》（1963：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第5章。

[[220]](#_220_25)Julian Ralph，“世界上管理得最好的城市”，《哈珀斯新月刊》81（1890）：99—111頁：George F.Parker，“市政管理的直觀課”，《世紀》53（1896）：71—89頁。關于公司街道項目，請參閱Mayne，《想象中的貧民窟》，第4章。

[[221]](#_221_25)Hennock，《合適人選》，56頁：全國公民聯盟，公有和公營委員會，《公共服務的市營和私營》（New York: National Civic Federation, 1907），第一卷，52頁：Mayne，《想象中的貧民窟》，61頁：Tawney的話轉引自P.J.Waller，《城鎮、城市、國家：1850—1914年的英國》（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312頁。

[[222]](#_222_25)Joseph Chamberlain，“國家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北大西洋評論》152（1891）：547頁。

[[223]](#_223_25)J.R.Kellett，“維多利亞時代城市的市政社會主義、企業和貿易”，《城市歷史年鑒，1978年》（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8）：Falkus，“19世紀都市貿易的發展”。

[[224]](#_224_25)Hamish Fraser，“維多利亞時代城市的市政社會主義和社會政策”，《維多利亞時代的城市：1820—1914年英國城市歷史讀本》，R.J.Morris和Richard Rodger編（London: Longman, 1993）：S.G.Checkland，《有毒的樹：1875—1975年的格拉斯哥》（Upas Tree，Glasgow: University of Glasgow Press, 1976）：Bernard Aspinwall，《可攜帶的烏托邦：1820—1920年的格拉斯哥和美國》（Aberdeen: Aberdeen University Press, 1984）。

[[225]](#_225_25)Wolfgang R.Krabbe，“城市社會主義和干預式國家：帝國時代城市福利管理研究”，《科學與教學中的歷史》30（1979）：265—284頁：Wolfgang R.Krabbe，“19世紀后期德國城市福利管理的發展”，《19世紀和20世紀的城市化：歷史和地理方面》，Hans Jurgen Teuteberg編（Cologne: Böhlau, 1983）：Hans-Dieter Brunckhorst，《19世紀的商業化：以德國煤氣工業為例》（Munich: Tuduv, 1978）：William H.Dawson，《德國都市生活和管理》（London: Longmans，Green, 1914），第9章。

[[226]](#_226_25)L.S.Rowe，“德國街道鐵路的市有和市營”，《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27（1906）：47—65頁：Edward W.Bemis編，《城市壟斷：美國經濟學家和專家論文集》（New York: Thomas Y.Crowell, 1899）：562—565頁。

[[227]](#_227_25)“世界的進步”，《美國評論之評論月刊》22（1902）：259頁。

[[228]](#_228_25)關于法蘭克福，請參閱Franz Adickes和G.O.Beutler，《德國城市的社會功能》（Leipzig: Duncker und Humblot, 1903）：《弗蘭茨·阿迪克斯：生平和工作》（Frankfurt: Englert und Schlosser, 1929）：關于杜塞爾多夫，請參閱Frederic C. Howe，《歐洲城市在行動》（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3），第3章。更籠統的內容請參閱Howard Woodhead，“第一屆德國城市博覽會”，《美國社會學雜志》9（1904）：413—458,612—630,812—831頁：10（1904）：47—63頁。

[[229]](#_229_25)Chamberlain，“國家社會主義的優越性”，538頁：Hamish Fraser，“勞工和變化的城市”，《蘇格蘭城市的視角》，George Gordon編（Aberdeen: Aberdeen University Press, 1985）。

[[230]](#_230_25)Albert Shaw，《大不列顛城市政府》（New York: Century, 1895）：45頁：Martin J.Wiener，《兩個世界之間：格雷厄姆·沃拉斯的政治思想》（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40頁。大企業家并不總是在城市貿易中發號施令。關于都市所有權政治的一個文化上保守的、反猶主義的小資產階級（Kleinbürger）變體，請參閱John W.Boyer，《維也納的文化和政治危機：1897—1918年基督教社會主義上臺》（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第1章。

[[231]](#_231_25)Dawson，《德國城市生活和管理》，第2章：Evans，《死神在漢堡》，546頁：John D.Rolling，“德意志帝國的自由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城市管理：1900—1918年法蘭克福案例”，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1979年博士論文，第50頁：Edmund J.James，“柏林市議會”，《美國社會學雜志》6（1900）：412頁：Albert Shaw，《歐洲大陸的城市管理》（New York: Century, 1895），308頁。

[[232]](#_232_25)James J.Sheehan，《19世紀德國自由主義》（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230頁：James J.Sheehan，“19世紀德國自由主義和城市”，《過去與現在》51（1971）：116—137頁。

[[233]](#_233_25)Fraser，“勞工和變化的城市”，160頁。

[[234]](#_234_25)Rudolf G.Huber，《黑森南部工業城市的社會變革和政治沖突：1898—1914年奧芬巴赫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地方政治》（Darmstadt: Hessische Historische Komission, 1985），緒論，George Steinmetz，《社會管理：德意志帝國的福利國家和地方政治》（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194—195頁。Adickes，《德國城市的社會功能》，78—81頁。

[[235]](#_235_25)Joan W.Scott，“市長和警察局長：社會主義城市對抗法國國家”，《19世紀的法國城市》，John M.Merriman編（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81）：Samuel P.Orth，《歐洲社會主義和民主》（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13），113—114頁：Roger Magraw，《1814—1915年的法國：資產階級世紀》（London: Fontana, 1983），300頁。

[[236]](#_236_25)C. K.Yearley，“1850—1910年‘外省黨’和特大城市：倫敦、巴黎、紐約”，《社會和歷史對比研究》15（1975）：51—88頁。

[[237]](#_237_25)Andrew Saint編，《倫敦的政治和人民：1889—1965年倫敦市議會》（London: Hambledon Press, 1989）：Susan D.Pennybacker，《1889—1914年倫敦景象：勞工、日常生活和倫敦市議會實驗》（London: Routledge, 1995）：Paul Thompson，《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和勞工：1885—1914年的倫敦斗爭》（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7）。關于倫敦進步政治給局外人的印象，可參閱Charles Edward Russell，“倫敦的社會主義政府”，《大都會雜志》40（1906）：367—376頁：Hugo Lindemann，《英國的城市管理和城市社會主義》（Stuttgart: Siek, 1897）。

[[238]](#_238_25)Susan Pennybacker，“‘下班郵遞帶來的千年’：重新考慮倫敦進步主義，1889—1907年”（The Millennium by Return of Post），《大都市——倫敦：1800年以來的歷史學家和代表》，David Feldman和Gareth Stedman Jones編（London: Routledge, 1989）：John Burns，“走向公社”，《19世紀》40（1906）：367—376頁。Burns的話轉引自John Davis，“1889—1907年的進步議會”，《倫敦的政治和人民》，Saint編，35頁。

[[239]](#_239_25)A.M.McBriar，《費邊社會主義和英國政治，1884—1918年》（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2），第9章：Sidney Webb，《倫敦項目》（London: Swan Sonnenschein, 1891）：《費邊城市項目：第二輯》（London: Fabian Society, 1899—1900）。

[[240]](#_240_25)Avner Offer，《1870—1914年的財產和政治：土地所有權、法律、意識形態和英國的都市開發》（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第15章。

[[241]](#_241_25)Offer，《財產和政治》，305頁：Sidney Webb，“英國的社會主義”，《美國經濟學協會出版物》4（1889）：65頁。

[[242]](#_242_25)Falkus，“城市貿易的發展”，305頁：Trevor I.Williams，《英國煤氣工業歷史》（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27頁：Howe，《歐洲城市在行動》，113頁。

[[243]](#_243_25)Milton S.Heath，《建設性的社會主義：1860年前佐治亞州經濟發展中政府的角色》（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289頁：Louis Hartz，《1776—1860年賓夕法尼亞的經濟政策和民主思想》（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8），88頁：Morton Keller，《國家事務：19世紀末期美國的公共生活》（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167頁。Colleen A.Dunlavy，《政治和工業化：美國和普魯士的早期鐵路》（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244]](#_244_25)Stanley K.Schultz和Clay McShane，“大城市工程：19世紀末期美國的下水道、公共衛生和城市規劃”，《美國歷史雜志》65（1978）：389—411頁：Letty Anderson，“艱難的選擇：為新英格蘭城市供水”，《跨學科歷史雜志》15（1984）：211—234頁：全國公民聯盟，《公共服務的市營和私營》，第一卷，127頁：Bemis，《城市壟斷》，59頁。

[[245]](#_245_25)關于美國和歐洲城市公共服務的詳細對比分析，請參閱Teaford，《未宣告的勝利》，第8—9章：Martin V.Melosi，《城市中的垃圾：1880—1980年的垃圾、改革和環境》（College Station: Texas A & M University Press, 1981）：Milo R.Maltbie，《城市功能：城市社會主義的發展、規模和趨勢研究》（New York: Reform Club Committee on 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1898）：Harvey N.Shepard，“歐洲和美國的城市房屋管理”，《美國城市》6（1912）：709—713頁。

[[246]](#_246_25)Richard T.Ely，“德國社會觀察”，《公理會》（Congregationalist）77（1892）：206,214頁：Richard T.Ely，“城市的需要”，《今天的問題：保護性關稅、稅收和壟斷的討論》，新版（New York: Thomas Y.Crowell, 1890）：229—247頁。

[[247]](#_247_25)Edmund J.James，“現代城市和煤氣供應的關系”，《美國經濟學協會出版物》1（1886）：2—3號：[Edmund J.James]，“英國的煤氣問題”，《國家》42（1886），71—72頁：《美國社會學雜志》5（1900）：826—828頁：Edmund J.James，“柏林街道鐵路政策”，《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15（1900）：437—440頁：《政治經濟學雜志》9（1901）：260—271頁：芝加哥街道鐵路委員會，《芝加哥市城市委員會報告》（Chicago, 1900）。

[[248]](#_248_25)Lloyd J.Graybar，《〈評論之評論〉的阿爾伯特·蕭：思想傳記》（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74）。

[[249]](#_249_25)1894年11月29日，Albert Shaw 給William T.Stead的信，阿爾伯特·蕭文集，紐約公共圖書館手稿和檔案部，Astor，Lenox和Tilden基金會。

[[250]](#_250_25)Albert Shaw，“城市問題和大紐約”，《大西洋月刊》79（1897）：748頁：Shaw，《歐洲大陸的城市管理》，305頁。

[[251]](#_251_25)Albert Shaw，“倫敦理工學院和人民的宮殿”，《世紀》40（1890）：164頁：Shaw，《歐洲大陸的城市管理》，323,237頁：Shaw，《英國的城市管理》，第7頁。

[[252]](#_252_25)Shaw，《大不列顛的城市政府》，第2頁：Albert Shaw，“紐約和倫敦的都市問題”，《評論之評論：美國版》5（1892）：282頁。

[[253]](#_253_25)-1 坦慕尼協會（Tammany Hall），1789年建立，后成為民主黨的政治機器，19世紀曾卷入過操控選舉的丑聞，備受爭議。——編注

[[254]](#_254_25)“城市管理的目標教訓”，《世紀》39（1890）：792頁：“城市改革的關鍵”，同上，42（1891）：953—954頁：Harry Pratt Judson，《大不列顛的城市政府》的書評，在《日晷》18（1895年3月1日）：147—149頁。

[[255]](#_255_25)David C. Hammack，《力量與社會：世紀之交的大紐約》（Power and Society，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82）：243—251頁。

[[256]](#_256_25)Melvin G.Holli，《底特律的改革：黑曾·平格里和都市政治》（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159頁。George E.Mowry，《加利福尼亞進步人士》（Chicago: Quadrangle Books, 1963）：23—24頁：《盾牌》（The Aegis）[威斯康星大學]，聯合辯論7（1893年3月3日）：Ely，“城市的需要”：245頁。

[[257]](#_257_25)Geoffrey Blodgett，《溫和的改革者：克利夫蘭時代馬薩諸塞州民主黨人》（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第二部分：Josiah Quincy，“美國城市的發展”，《競技場》17（1897）：529—537頁。

[[258]](#_258_25)Blodgett，《溫和的改革者》，255頁：J.W.Martin，“美國城市的趨勢”，《當代評論》76（1899）：858頁：《韋伯夫婦書信集》，Norman MacKenzie編（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第二卷，64,74頁：Norman和Jeanne Mackenzie，《費邊社》（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77），257頁。

[[259]](#_259_25)Richard T.Ely，《即將到來的城市》（The Coming City，New York: Thomas Y.Crowell, 1902），94頁：《城市事務》2（1898）：533—534頁：J.W.Martin，“城市腐敗治理”，《哈珀斯新月刊》99（1899）：641—646頁：John W.Martin，“倫敦是如何被挽救的”，《論壇》31（1901）：318—327頁：William Tolman，“公共澡堂，或清潔福音”，《耶魯評論》6（1897）：50—62頁。

[[260]](#_260_25)Roy E.Littlefield III，《威廉·魯道夫·赫斯特：在美國進步主義中的角色》（Lanham，M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0），尤其是第3章：Martin，“美國城市趨勢”，856—867頁。

[[261]](#_261_25)Hammack，《力量與社會》：Augustus Cerillo，Jr.，《紐約市的改革：都市進步主義研究》（New York: Garland, 1991）：Williams，《清洗“偉大的未洗者”》，第3章。

[[262]](#_262_25)Maltbie，《城市功能》，首先發表在《城市事務》第二卷，第4期（1898）。

[[263]](#_263_25)Gerald Kurland，《塞思·洛：都市和工業時代的改革者》（New York: Twayne, 1971）：《民享的城市!公民聯盟宣傳冊》，1897年9月—10月（New York, 1897）：同上，第2版（New York：1901）：J.W.Martin，“建設性的項目：低級政府應該做什么”，《城市事務》5（1901）：641—633頁：John DeWitt Warner，“紐約市選舉中的城市改善”，同上，633—634頁。《紐約時報》（The Times）被Hammack在《力量與社會》中引用，152頁。

[[264]](#_264_25)Holli，《底特律的改革》：Hoyt Landon Warner，《1897—1917年俄亥俄的進步主義》（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4）：Tom L.Johnson，《我的故事》，Elizabath J.Hauser編（1911年，Kent，Ohio: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C. H.Cramer，《紐頓·貝克傳記》（Cleveland: World, 1961），第3章。

[[265]](#_265_25)Brand Whitelock 在1913年2月26日寫給John D.Barrie的信，布蘭德·維特洛克文件集，國會圖書館：Brand Whitelock，“城市與文明”，《斯克里布納雜志》52（1912）：625頁：Allan Nevins編，《布蘭德·維特洛克的書信和日記》（New York: Appleton-Century, 1936），第一卷，165頁。

[[266]](#_266_25)Frederic C. Howe，《城市：民主的希望》（New York: Scribner's, 1905），第5頁：Roy Lubove，“弗里德里克·豪威和美國對社區的追求”，《歷史學家》39（1977）：270—291頁。

[[267]](#_267_25)Howe的書包括《城市：民主的希望》（紐約：Scribner's, 1905）：《英國城市：民主的開始》（New York: Scribner's, 1907）：《歐洲城市在行動》（New York: Scribner's, 1913）：《現代城市及其問題》（New York： Scribner's, 1915）。《社會化的德國》（New York: Scribner's, 1915）。

[[268]](#_268_25)Frederic C. Howe，“和平的革命”，《瞭望》94（1910）：116頁：Howe，《歐洲城市在行動》，318,326頁。

[[269]](#_269_25)Frederic C. Howe，“德國和美國城市”，《斯克里布納雜志》49（1911）：492頁：Howe，《歐洲城市在行動》，267，x, 352頁。

[[270]](#_270_25)Howe，《歐洲城市在行動》，248頁。

[[271]](#_271_25)Sylvester Baxter，“柏林：德國城市管理研究”，《埃塞克斯學院簡報》（Bulletin of the Essex Institute）21（1889）：74頁：[Richard T.Ely]，“柏林市的管理”，《國家》34（1882）：246頁：Robert C. Brooks，“稅收報告中的城市政府：普魯士城市的三階級選舉體制”，《城市事務》3（1899）：396—433頁：Robert C. Brooks，“普魯士城市中的政治俱樂部”，同上，4（1900）：375—384頁：Robert C. Brooks，“沒有市長的柏林市”，《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14（1889）：94—98頁：Brand Whitelock，“盡管有偉大的公共服務，格拉斯哥仍然存在罪惡和貧困”，《托萊多蜜蜂報》（Toledo Bee），1912年12月9日。

[[272]](#_272_25)William D.Foulke，“值得仿效的德國城市”，《美國城市》6（1912）：412頁。

[[273]](#_273_25)Howe，《歐洲城市在行動》：243頁。

[[274]](#_274_24)Samuel M.Jones，“新愛國主義：城市管理黃金律”，《城市事務》3（1899）：455—461頁：Leo S.Rowe，《城市管理問題》（New York: D.Appleton, 1908），40—42頁：對比Roy Lubove，“20世紀城市：作為城市改革者的進步人士”，《美國中部》（Mid-America）41（1959）：199頁。

[[275]](#_275_24)比如，Maureen A.Flanagan，“性別與都市政治改革：城市俱樂部和進步時代的芝加哥婦女城市俱樂部”，《美國歷史評論》95（1990）：1032—1050頁。

[[276]](#_276_24)Milo Maltbie，“格拉斯哥的市營有軌電車”，《城市事務》4（1900）：41頁：Howe，《歐洲城市在行動》，viii頁。

[[277]](#_277_24)《伍德羅·威爾遜文集》，Arthur S.Link編（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1994），第25卷，259頁：《林肯·斯蒂芬斯書信集》，Ella Winter和Granville Hicks編（New York: Harcourt，Brace, 1938），第一卷，252頁。

[[278]](#_278_24)Rowe，《城市管理問題》，第11章。

[[279]](#_279_24)Robert D.Weber，“理性思考者和改革者：19世紀芝加哥地方交通”，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1971年博士論文：Charles W.Cheape，《群眾出行：1880—1912年紐約、波士頓和費城的城市公共交通》（Moving the Masses，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280]](#_280_24)David P.Thelen，《新公民：1885—1900年威斯康星進步主義的起源》（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72），尤其是第11章：Cheape，《群眾出行》，212頁。

[[281]](#_281_24)“電報、電車、煤氣廠的公共所有權”，《獨立》49（1897），578頁。

[[282]](#_282_24)Hammack，《力量與社會》，第8章。

[[283]](#_283_24)Clifton Hood，《722英里：地鐵建設及其對紐約的改造》（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3），引語來自第123頁。

[[284]](#_284_24)Forrest McDonald，“塞繆爾·英薩爾和國家公共服務管理委員會運動”，《商業史評論》32（1958）：245—246頁。

[[285]](#_285_24)Weber，“理性思考者和改革者”，41—42頁。

[[286]](#_286_24)Richard E.Becker，“1905—1907年推行改革的芝加哥市長愛德華·鄧恩”，芝加哥大學1971年博士論文：John D.Buenker，“愛德華·鄧恩：城市改革的局限性”，《市長們：芝加哥政治傳統》，Paul M.Green和Melvin G.Holli編（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7）：Delos F.Wilcox，《美國大城市：問題和管理》（New York: Macmillan, 1910），228—235頁。Paul Barrett，《汽車和都市交通：1900—1930年芝加哥的公共政策形成》（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87]](#_287_24)William Jennings Bryan，《舊世界和它的方式》（ST.Louis: Thompson, 1907），第40章：Irwin Yellowitz，《1897—1916年紐約勞工和進步運動》（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5），第9章：Everett W.Burdett，“大不列顛的城市所有權”，《政治經濟學雜志》14（1906）：257頁。

[[288]](#_288_24)Lincoln Steffens，《城市的恥辱》（New York: McClure，Phillips, 1904）。

[[289]](#_289_24)John R.Commons，《我自己：約翰·康芒斯自傳》（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4）：111—120頁。

[[290]](#_290_24)全國公民聯盟，《市營和私營》：John R.Commons，“公共所有權和公民聯盟”，《獨立》63（1907）：264—266頁。

[[291]](#_291_24)Louis D.Brandeis，“波士頓如何解決煤氣問題”，《美國評論之評論》36（1907）：594—598頁。

[[292]](#_292_24)John R.Commons，“威斯康星公用事業法”，《美國評論之評論月刊》36（1907）：22—24頁：Bruce W.Dearstyne，“進步時代的管理：紐約公共服務委員會”，《紐約歷史》58（1977）：331—347頁：Milo R.Maltbie，“紐約公共管理的成果”，《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37（1911）：170—190頁：Morton Keller，《管理新經濟：美國的公共政策和經濟變化》（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59—60頁。

[[293]](#_293_24)McDonald，“薩繆爾·英薩爾”，248頁：Carl V.Harris，《1871—1921年伯明翰的政治力量》（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77），第11章：Mansel G.Blackford，“進步時代加利福尼亞企業家與鐵路和公用事業的管理”，《商業歷史評論》44（1970）：307—319頁。

[[294]](#_294_24)Delos Wilcox，“國家管理對城市所有權運動的影響”，《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53（1914）：73頁。

[[295]](#_295_24)David Nord，“專家對專家：進步時代城市公用事業管理的觀念沖突”，《威斯康星歷史雜志》58（1975）：219—236頁：Clyde L.King，“城市所有權與管理”，《新共和》，1（1914年11月28日）：12—14頁：Delos Wilcox，“紐約公共服務管理的危機”，《全國城市評論》4（1915）：547—563頁：Delos Wilcox，“公用事業中的專家、倫理、公共政策”，《全國城市評論》6（1917）：472—485頁：“美國市長關于城市公用事業的公共政策研討會記錄”，第四部分：“城市所有權與管理”，《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57（1915年1月）：Joy E.Morgan和Edna D.Bullock編，《城市所有權文選：辯論者手冊系列》，第2版（New York: H.W.Wilson, 1914）：全國公民聯盟，《政府應該擁有和管理鐵路、電報和電話體系嗎？城市應該擁有公共服務設施嗎？》（New York: National Civic Federation, 1915）：Eugene M.Tobin，《組織起來或者消亡：1913—1933年美國的獨立進步人士》（New York: Greenwood, 1986），第2章。

[[296]](#_296_24)Charles A.Beard，《美國城市管理：新趨勢調查》（New York: Century, 1912）：229—230頁：Sally M.Miller，“撒個大網：密爾沃基運動到1920年”，《中心地帶的社會主義：1900—1925年中西部的經驗》，Donald T.Critchlow編（Notre Dame，Ind.：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6）：Douglas E.Booth，“城市社會主義和城市管理改革：1910—1940年密爾沃基的經驗”，《城市歷史雜志》12（1985）：51—74頁：Frederic C. Howe，“社會主義城市密爾沃基”，《瞭望》95（1910）：411—421頁。

[[297]](#_297_24)Carl D.Thompson，《公共所有權：美國和國外城市、州和聯邦層次上的公共企業調查》（New York: Thomas Y.Crowell, 1925）：Martin G.Glaeser，《公用事業經濟學大綱》（New York: Macmillan, 1927）。關于運輸所有權的趨勢，請參閱Stanley Mallach，“1890—1930年美國都市公共交通的起源和衰落”，《都市主義的歷史和現在》8（1979）：1—17頁：James A.Dunn，Jr.，《漫漫長路：歐洲和美國的交通政策》（Miles to Go，Cambridge: MIT Press, 1981）。

[[298]](#_298_24)馬薩諸塞，調查城市與街軌公司關系的特別委員會，《報告》（Boston, 1898），16頁：“街軌：波士頓和格拉斯哥”，《瞭望》82（1906）：765—766：Douglas Ward，“波士頓與英國利茲有軌電車郊區的歷史地理比較”，《美國地理學家協會紀事》54（1964）：477—489頁。

[[299]](#_299_24)Oscar L.Pound，《論城市和城鎮公用事業管理法律》（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13）：Dexter Merraim Keezer和Stacy May，《企業的公共控制》（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30）。

[[300]](#_300_24)“采訪達林普爾（James Dalrymple）”，《街軌雜志》（Street Railway Journal）26（1905）：222—224頁：“達林普爾報告”，同上，27（1906）：422—427頁。

[[301]](#_301_24)Martin J.Schiesl，《效率政治：1880—1920年美國的市政管理和改革》（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Clifton K.Yearley，《金錢機器：1860—1920年北方政府和黨的財政崩潰和改革》（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70）。對于未改革的政府一個特別敏銳的解讀，請參閱Daniel Czitrom，“下層社會和下層人士：大提姆·沙利文和1889—1913年紐約的都市政治”，《美國歷史雜志》78（1991）：536—558頁。

[[302]](#_302_24)Arthur Shadwell，《工業效率：英國、德國、美國工業生活對比研究》（London: Longmans，Green, 1906），第一卷，12頁：Hennock，《合適人選》，297頁。

[[303]](#_303_24)Balthasar H.Meyer，“中央公共服務設施委員會和地方自治”，《美國政治學評論》5（1911）：378頁。

[[304]](#_304_24)-1William M.Tweed（1823—1874），美國政客，坦慕尼協會的“老板”，在控制紐約期間貪污了2500萬—2億美元的政府公共基金。——編注

[[305]](#_305_24)Frederic C. Howe，“城市所有權的理由”，以及隨后的討論，《美國經濟學協會出版物》第3輯，7（1906）：113—132頁：Richard T.Ely，《我們腳下的土地：自傳》（New York: Macmillan, 1938）：251—265頁。

[[306]](#_306_24)Charles Edward Russell，《赤手空拳和石頭墻：一位邊緣改革者的回憶》（New York: Scribner's, 1933），97—103頁。

[[307]](#_307_24)Victor S.Clark，《澳大利亞勞工運動：社會民主研究》（New York: Henry Holt, 1906），45頁。

#### 第五章 公民的抱負

[[308]](#_308_24)Frederic C. Howe，《改革者的自白》（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5）：113—114頁。

[[309]](#_309_23)H.G.Wells，《美國的未來：尋找現實》（紐約：Harper and Brothers, 1906），39頁：Charles Booth在1904年8月27日給Mary Booth的信，查爾斯·布思文件集，倫敦大學圖書館。

[[310]](#_310_24)M.J.Daunton，“美國城市”，《1850—1914年工人的住房：對比視角》（Housing the Workers），M.J.Daunton編（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0），275頁。

[[311]](#_311_24)Milo R.Maltbie，《北歐城市藝術：向紐約市藝術委員會提交的報告》（Civic Art in Northern Europe，New York, 1903）：《林肯·斯蒂芬斯書信集》，Ella Winter和Granville Hicks編（New York: Harcourt，Brace, 1938），第一卷，218頁。關于拉塞爾·塞奇基金會，請參閱John F.McClymer，《戰爭和福利：1890—1925年美國的社會工程》（Westport，Conn: Greenwood Press, 1980），第3章。

[[312]](#_312_24)Anthony Sutcliffe，《朝向規劃的城市：1780—1914年的德國、英國、美國和法國》（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1），第6章。

[[313]](#_313_24)Frederic C. Howe，“德國和美國城市”，《斯克里布納雜志》49（1911）：492頁：Frederic C. Howe，《歐洲城市在行動》（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3），346頁：Walter Weyl，“從混亂到城市”，第2,7頁，沃爾特·韋爾文件集，羅格斯大學：L.S.Rowe，《城市管理問題》（紐約：D.Appleton, 1908），60頁。

[[314]](#_314_24)Howe，《歐洲城市》，361頁：Frederic C. Howe，“美國城市的重建”，《哈珀斯雜志》127（1913）：186頁。

[[315]](#_315_24)Raymond Unwin，“美國城市規劃”，《花園城市和城鎮規劃》新刊號1（1911年8月）：162—165頁。關于美國城市規劃，請參閱John W.Reps，《都市美國的塑造：美國城市規劃的歷史》（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5）：Mel Scott，《1890年以來的美國城市規劃》（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Richard E.Foglesong，《資本主義城市規劃：從殖民時期到1920年代》（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316]](#_316_24)David H.Pinkney，《拿破侖三世和巴黎的重建》（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David P.Jordan，《改造巴黎：奧斯曼男爵的生平和工作》（New York: Free Press, 1995）：Anthony Sutchliffe，《中央巴黎的秋天：1850—1970年城市規劃的失敗》（London: Edward Arnold, 1970）：Anthony Sutchliffe，“19世紀巴黎的建筑和城市設計”，《現代城市的發展和轉變》，Ingrid Hammarström和Thomas Hall編（Stockholm： Swedish Council for Building Research, 1979）：Thomas Hall，《歐洲首都的規劃：19世紀城市的發展》（Stockholm: Almquist and Wiksell, 1986），47—68頁：Ann Louise Shapiro，《1850—1902年巴黎的窮人住房》（Housing the Poor of Paris，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關于Lewis H.Morgan對巴黎的印象，請參閱《劉易斯·摩根歐洲旅行札記選》（Rochester，N.Y.：Rochester Historical Society, 1937），360頁。

[[317]](#_317_24)Lewis Mumford，《城市文化》（New York: Harcourt，Brace, 1938），98頁。

[[318]](#_318_24)Albert Shaw，《歐洲大陸的城市管理》（New York: Century, 1895），第7頁：Brand Whitlock，“巴黎為城市建設者提供啟示”，《托萊多報》，1912年12月12日。

[[319]](#_319_24)Anthony Sutcliffe，“1850—1914年歐洲首都的環境控制和規劃：倫敦、巴黎、柏林”，《現代城市的發展和轉變》，Hammarstrom and Hall編：Hall，《歐洲都市規劃》，116—129頁：Gareth Stedman Jones，《被拋棄的倫敦：維多利亞社會階級關系研究》（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169頁。

[[320]](#_320_24)Jon A.Peterson，“城市美化運動：忘記的根源和丟失的意義”，《城市歷史雜志》2（1976）：415—434頁：David Schuyler，《新城市風景：19世紀美國城市形式的重新定義》（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第10章：Michaellle H.Bogart，《1890—1930年紐約市的公共雕塑和公民理想》（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Charles Mulford Robinson，《城市的改善，或城市美學的現實基礎》（New York: G.P.Putnam's Sons, 1901）：Charles Mulford Robinson，《現代城市藝術，或美化的城市》（New York: G.P.Putnam's Sons, 1903）。

[[321]](#_321_24)Thomas S.Hines，《芝加哥的伯納姆：建筑師和規劃者》（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第4章。

[[322]](#_322_24)Hines，《伯納姆》，第7章：Charles Moore編，《哥倫比亞特區公園體系的改善》，第57屆國會第一次會議，參議院報告166（1902）。

[[323]](#_323_24)Thomas S.Hines，“‘進步’建筑的悖論：托馬斯·約翰遜的克利夫蘭的城市規劃和建筑”，《美國季刊》25（1973）：426—448頁：Howe，《改革者的自白》，80—82頁：Frederic C. Howe，“克利夫蘭群體規劃”（The Cleveland Group Plan），《慈善與平民》（Charities and the Commons）19（1908）：1548頁：Daniel H.Burnham，《關于舊金山計劃的報告》（San Francisco, 1905）。

[[324]](#_324_24)芝加哥商業俱樂部，《丹尼爾·伯納姆和愛德華·本涅特的芝加哥規劃》，Charles Moore編（Chicago: Commercial Club, 1909）。

[[325]](#_325_24)Walter D.Moody，《瓦克芝加哥規劃手冊：城市經濟：尤其用于對芝加哥學派的研究》（Wacker's Manual of the Plan of Chicago，Chicago, 1913），緒論：Thomas J.Schlereth，“規劃和進步主義：《瓦克芝加哥規劃手冊》”，《美國文化的主張：從共和國到大眾社會》（Ideas in America's Cultures），Hamilton Cravens編（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2），147頁注4：Foglesong，《資本主義城市規劃》，210—211頁。

[[326]](#_326_24)商業俱樂部，《芝加哥規劃》，4,14,117頁，圖cxxx。

[[327]](#_327_24)John L.Hancock，“約翰·諾倫和美國城市規劃運動”，賓夕法尼亞大學1964年博士論文，294頁：美國建筑師協會，城鎮規劃委員會，《1917年美國的城市規劃進步》，George B.Ford編（華盛頓特區：美國建筑師協會雜志，沒有日期）。

[[328]](#_328_24)紐約市改善委員會，《報告》（New York, 1907）：Harvey A.Kantor，“城市美化在紐約”，《紐約歷史學會季刊》57（1973）：149—171頁。

[[329]](#_329_24)Flavel Shurtleff，《實施城市規劃：美國法律在城市規劃實施中的應用》（New York: Survey Associates, 1914），第3章：William H.Wilson，《堪薩斯城的城市美化運動》（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64）。關于閱讀材料，請參閱Hancock，“約翰·諾倫”，第6章。關于財產權與伯納姆在舊金山的野心的沖突，請參閱Judd Kahn，《擴張性的舊金山：1897—1906年美國城市的政治和規劃》（Imperial San Francisco，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79）。

[[330]](#_330_24)Lutz Niethammer和Franz Brüggemeier，“帝國時代的工人在哪里住？”《社會歷史檔案》16（1976）：61—134頁。Eugen Jaeger，《住房問題和住房政治綱要》（Munich: Volksverein-Verlag, 1911）：Rudolf Eberstadt，《住房本質和住房問題手冊》，第3版（Jena: Gustav Fischer, 1917）。

[[331]](#_331_23)Eberstadt，《手冊》，第6頁：Niethammer，“帝國時代的工人在哪里住？”91,90頁：Emil Klar，“1870/1914年住房的發展”，《法蘭克福市住房問題》，W.Nobisch編（Frankfurt: Stadt Frankfurt/Main, 1930），58頁。

[[332]](#_332_23)轉引自Anthony Sutcliffe編，《1890—1940年的大都市》（London: Mansell, 1984），58頁。

[[333]](#_333_23)Edward T.Hartman，“柏林和花園城市”，《慈善與平民》19（1908）：1470—1471頁。Madge C. Jenison，“柏林的廉價公寓”，《哈珀斯月刊》118（1909）：359—369頁。

[[334]](#_334_23)Eberstadt，《手冊》，第6頁： Hsi-Huey Liang，“威廉時代柏林的下層移民”，《中歐歷史》3（1970）：107,105頁：關于廉價公寓的詳細描述，請參閱Johann F.Geist和Klaus Kürvers，《1862—1945年柏林的公寓》（Munich: Prestel, 1984）：《柏林及其建筑：第四部分，住房：第二篇，多家合住房屋》（Berlin: Wilhelm Ernst, 1974）。

[[335]](#_335_23)Nicholas Bullock和James Read，《1840—1914年德國和法國住房改革運動》（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第一部分：Dorothea Berger-Thimme，《住房問題和社會福利國家：德國國家住房政治初始（1873—1918年）》（Frankfurt: Peter Lang, 1976）：德國住房改革協會，《三十年住房改革，1898—1928年》（Berlin, 1928）。

[[336]](#_336_23)Jaeger，《住房問題綱要》，143—145頁：Hugo Lindemann，“勞工和花園城”，德國花園城市協會編，《德國花園城市運動》（Berlin, 1911）。

[[337]](#_337_23)關于這些技巧的概覽，請參閱Sutcliffe，《朝向規劃的城市》，第2章：Bullock和Read，《住房改革運動》，第7章：Brian Ladd，《1860—1914年德國都市規劃和公民秩序》（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338]](#_338_23)Jaeger，《住房問題綱要》，77頁：Bullock和Read，《住房改革運動》，183頁：Richard T.Ely，“多瑙河上的烏爾姆”，《調查》31（1913），253—258頁：Thomas C. Horsfall，《人民的住房和環境的改善：德國的例子》，第2版（Manchester，England: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Press, 1905），36—42頁。

[[339]](#_339_22)Franz Adickes，“城市地產合并和分區”，《政治學手冊》（Handwö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J.Conrad等編（Jena: Gustav Fischer, 1890—1894），第六卷，918—923頁。

[[340]](#_340_23)Robert C. Brooks，“德意志帝國對非勞動增值的征稅”，《經濟學季刊》24（1911）：682—709頁。

[[341]](#_341_23)Franz Adickes，“城市擴張”，《政治學手冊》，第五卷，847—851頁：Ladd，《都市規劃》，第6章：Thomas H.Logan，“德國19世紀末期新興的規劃行業的發明：城市分區”，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1972年博士論文。

[[342]](#_342_23)Frank B.Williams，“歐洲城市規劃管理的一些方面”，《美國規劃師學會雜志》3（1915）：260—264頁：Bullock和Read，《住房改革運動》，178頁：Ladd，《都市規劃》，165—170頁。

[[343]](#_343_21)John Burnett，《1815—1985年住房的社會歷史》，第2版（倫敦：Methuen, 1986）：M.J.Daunton，《維多利亞時代城市的房屋和家庭：1850—1914年的工人階級住房》（London: Edward Arnold, 1983）。

[[344]](#_344_21)Walter L.Creese，《環境追求：花園城市前后》（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6），第5章。

[[345]](#_345_21)Stanley Buder，“霍華德：城市規劃運動的創世紀”，《美國規劃師學會雜志》35（1969）：390—398頁：Michael Simpson，《托馬斯·亞當斯和現代規劃運動：1900—1940年的英國、加拿大、美國》（London: Mansell, 1985），第2章：Creese，《環境追求》第9章：Weyl，“從混亂到城市”，2—3頁。

[[346]](#_346_21)Creese，《環境追求》，第10章。

[[347]](#_347_21)Horsfall，《人民的住房和環境的改善》：Gordon Cherry，《城市規劃的政治》（New York: Longman, 1982）：Sutcliffe，《朝向規劃的城市》，第3章。

[[348]](#_348_21)全國城市規劃會議，《會議記錄》（1915）：157—160頁。

[[349]](#_349_21)Harvey A.Kantor，“本杰明·馬什和關于人口擁擠問題的斗爭”，《美國規劃師學會雜志》40（1974）：422—429頁：Mary Kingsbury Simkhovitch，《鄰居：我的格林威治館故事》（New York: W.W.Norton, 1938），160—161頁。

[[350]](#_350_21)Benjamin C. Marsh，“第八屆國際住房大會”，《慈善與平民》18（1907）：555—570頁： Benjamin C. Marsh，“布魯克林擁塞狀況展覽”，同上，209—211頁：John Martin，“擁塞狀況展覽的解釋”，同上，27—39頁。

[[351]](#_351_21)Benjamin C. Marsh，《城市規劃概論：美國城市的民主挑戰》（New York：作者出版，1909）：美國國會，參議院哥倫比亞特區委員會，《城市規劃》，第61屆國會第二次會議，參議院文件422（1910）。

[[352]](#_352_21)“城市規劃”，Charles M.Robinson編，特刊，《慈善與平民》19（1908年2月）：“住房和城市規劃”，特刊，《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51（1914年1月）。

[[353]](#_353_21)紐約擁塞問題委員會，《真實故事：文明城市中最糟糕的擁塞狀況》（New York： n.d.）：Florence Kelley，“擁擠和血汗勞工”，《慈善與平民》20（1908）：48—50頁：第11屆紐約州慈善和矯治會議，《會議記錄》，1910年（Albany, 1911），114—151頁。

[[354]](#_354_21)Edward E.Pratt，《紐約市人口擁擠的工業原因》，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經濟、法律研究，第43卷，第1期（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11年）：紐約市擁塞問題委員會，《報告》（New York, 1911）：Grosvenor Atterbury，“美國的模范城鎮”，《斯克里布納雜志》52（1912）：21頁。

[[355]](#_355_21)Marsh，“對于勞動人口公平的城市規劃”：Benjamin C. Marsh，“稅收與美國城市生活條件的改善”，《調查》24（1910）：605—609頁：Benjamin C. Marsh，《美國城市的土地價值稅收：消除貧困的下一步》（New York： n.P.1911）。

[[356]](#_356_21)Seymour I.Toll，《分區的美國》（Zoned America，New York: Grossman, 1969），第5—6章。

[[357]](#_357_21)紐約市建筑高度委員會，《報告》（New York：1913）：城市和區域規劃國際會議，《城鎮、都市和區域的規劃問題》（Baltimore, 1925）：499—500頁：Frank Williams，《城市規劃和分區的法則》（New York: Macmillan, 1922）：《美國建筑師協會雜志》1（1913）：449—451頁。

[[358]](#_358_21)“他說，摩天大樓的時代即將過去”，《紐約時報》，（1913年3月30日）。關于摩天大樓的歷史，請參閱Thomas Bender和William R.Taylor，“文化和建筑：現代紐約市形成中的審美沖突”，《現代城市想象》，William Sharpe和Leonard Wallock編，新版（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Mona Domosh，《發明的城市：19世紀紐約和波士頓風景的創造》（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6），第3章。

[[359]](#_359_21)Frank B.Williams，“德國城市的限制區域和工業區域”，《美國的住房問題：第三屆全國住房大會記錄，1913》（New York: National Housing Association, 1913），54—62頁：紐約市，預測和評估協會，城市規劃委員會，《建筑區域委員會最終報告》（New York, 1916）。

[[360]](#_360_21)Frank B.Williams，“私有房產的公共控制”，《城市規劃：闡述城市規劃基本元素的系列論文》，John Nolen編（New York: D.Appleton, 1916），81頁。

[[361]](#_361_21)《調查》45（1920）：167頁。

[[362]](#_362_21)Anthony S.Wohl，《永遠的貧民窟：維多利亞時代倫敦的住房和社會政策》（London: Edward Arnold, 1977），第10—11章：John N.Tarm，《百分之五的慈善：1840—1914年市區住房的描述》（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C. F.G.Masterman編，《帝國的核心：英國現代城市生活問題的討論》（1910：Brighton: Harvester, 1973），16頁。

[[363]](#_363_21)Ian H.Adams，《都市蘇格蘭的形成》（Montreal: 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 1978），167頁：Burnett，《住房的社會歷史》，184—185頁：Cherry，《城市規劃的政治》，15—17頁。

[[364]](#_364_21)Wohl，《永遠的貧民窟》，第10—11章：Mark Swenarton，《適合英雄的家：英國早期國家住房的政治和建筑》（London: Heinemann, 1981），第2章：Susan Beattie，《倫敦住房革命：1893—1914年倫敦市議會住房建筑師及其工作》（London: Greater London Council, 1980）：倫敦市議會，《倫敦工人階級的住房》（London, 1913）。

[[365]](#_365_21)Wohl，《永遠的貧民窟》，362—367頁。

[[366]](#_366_21)Burnett，《住房的社會歷史》，181頁：Adams，《都市蘇格蘭的形成》，167頁。

[[367]](#_367_21)Patricia van den Eeckhout的“比利時”和Michel Lescure的“法國”，《1880—1930年歐洲的住房策略》，Colin G.Pooley編（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378頁：Bullock和Read，《住房改革運動》，第24—26章：引語同上，479頁。

[[368]](#_368_21)Bullock和Read，《住房改革運動》，230—248頁，133—137頁。

[[369]](#_369_21)Walter Steitz和Wolfgang R.Krabbe，“1871—1914年德國大城市的住房政治”，Hans Jurgen Teuteberg編，《居住的人：近代城鄉居住社會發展史》（Homo Habitans，Münster: F.Coppenrath, 1985）：《法蘭克福小房屋股份公司的二十五年：1890—1915年》（Frankfurt, 1915）：Bullock和Read，《住房改革運動》，244頁。

[[370]](#_370_21)Bullock和Read，《住房改革運動》，239頁。

[[371]](#_300_25)同上，241頁：Jaeger，《住房問題綱要》，80—82頁。

[[372]](#_372_21)美國勞工委員會，《第八個特別報告：工人階級的住房》（Washington，D.C.，1895）：William H.Tolman，“美國過去五年里住房方面的進步”，國際住房大會，《1910年維也納第九屆國際住房大會報告》（Vienna, 1911），1062—1073頁：Richard Plunz，《紐約市的住房歷史：美國都市的居住類型和社會變化》（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第5章：“針對房屋所有權的政府資助和外國工人階級的住房”，美國勞工統計局，《公報》158（1914）。關于法國1894年的《西格弗里德法》，請參閱William F.Willoughby，“法國為工人階級提供住房的現代運動”，《耶魯評論》8（1899）：233—255頁：Carol Aronovici，“法國的住房改革”，《美國建筑師協會雜志》3（1915年1月）：32—36頁。

[[373]](#_373_21)John Ihlder, 1914年歐洲旅行日記，“英國工人的家”（約翰·伊爾德文件集，紐約海德公園富蘭克林·羅斯福圖書館：John Ihlder，“英國住房融資”，《美國城市》13（1915年10月）：291頁：John Ihlder，“美國人看英國住房”，《調查》33（1914）：108—109頁。

[[374]](#_374_21)Emily Dinwiddie，“英國掙工資者的住房管理”，《美國城市》13（1915年8月）：93—99頁：Edward M.Bassett，“城市中的人口分布”，同上，13（1915年7月）：7—8頁：Thomas Adams，“從美國人的視角看英國住房”，同上，13（1915年8月）：99—100頁。

[[375]](#_375_21)Roy Lubobe，《進步人士與貧民窟：1890—1917年紐約市廉價公寓改革》（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62）：Lawrence Veiller，《住房改革：美國城市實用手冊》（New York: Charities Publication Committee, 1910），193—195頁。

[[376]](#_376_21)Lawrence Veiller，“美國城市中的住房問題”，《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25（1905）：248—272頁：Lawrence Veiller，“住房改革項目”，紐約政治科學院會議，《會議記錄》2（1912）：241—248頁：Lawrence Veiller，“保護住宅區”，城市規劃全國會議，《會議記錄》：1914年多倫多，92—111頁：Lawrence Veiller，“通過立法進行的住房改革”，《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51（1914）：68—77頁。引用的句子來自后者，76頁。紐約市廉價公寓委員會的羅伯特·德·福雷斯特在1910年維也納國際住房大會上把這個團體的觀點簡要表達如下：“在美國沒有市營住房，在美國不應該有市營住房。”Robert de Forest，“美國的市營住房”，國際住房大會，《1910年維也納第九屆國際住房大會報告》（1910），257頁。

[[377]](#_377_20)Carol Aronovici，“住房和住房問題”，《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51（1914）：1—7頁：Carol Aronovici，“花園城市的建筑”，《美國建筑師協會雜志》2（1914年3月）：151頁。

[[378]](#_378_20)Robinson，《現代城市藝術》，第13章：George B.Ford，“住房和城鎮規劃中‘社會’與‘建筑’的關系”，1910年第二屆城市規劃全國會議，《會議記錄》（波士頓，1910），81頁：Unwin，“美國城鎮規劃”：Thomas Adams，“美國的花園城市和城鎮規劃”，《花園城市和城鎮規劃》新刊號1（1911年8月）：165—173頁：（1911年9月）：196—198頁：Peter Marcuse，“早期城市規劃中的住房”，《城市歷史雜志》6（1980）：153—176頁。

[[379]](#_379_20)美國總統住房委員會，《報告》，第60屆國會第二次會議，參議院文件644（1909）。

[[380]](#_380_20)馬薩諸塞州宅地委員會，《1913年第一次年度報告》（波士頓1914），20頁：馬薩諸塞州宅地委員會，“工人的家園”，《馬薩諸塞勞工雜志》88（1912年1月），44頁。

[[381]](#_381_20)馬薩諸塞州宅地委員會，“工人的家園”，第3頁：Arthur C. Comey，“美國住房的合伙關系”，《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51（1914）：140—147頁：Arthur C. Comey，“美國花園郊區的計劃”，《美國城市》11（1914年7月）：35—36頁：Roy Lubove，《1920年代的社區規劃：美國區域規劃協會的貢獻》（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63），第1章。

[[382]](#_382_20)Wayne Attoe和Mark Latus，“第一批公共住房：‘下水道社會主義’為密爾沃基設計的花園城市”，《大眾文化雜志》10（1976）：142—149頁。

[[383]](#_383_20)Edith Elmer Wood，“我時代的住房”，第3頁：伊迪絲·埃爾默·伍德文件集，哥倫比亞大學艾弗里建筑與藝術圖書館。數字來自Stephen Merritt，《英國國家提供的住房》（State Housing in Britain，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9），331—332頁注：Bullock和 Read，《住房改革運動》，247,244頁：Michel Lescure，“法國”，Pooley編，《歐洲的住房策略》，232頁。

[[384]](#_384_20)轉引自Toll，《分區的美國》，149,181頁。

[[385]](#_385_20)Bullock和Read，《住房改革運動》第3章：Robert G.Barrows，“廉價公寓之外：1870—1930年美國都市房屋的模式”，《城市歷史雜志》9（1983）：395—420頁。

[[386]](#_386_20)“摩天大樓的時代即將過去”，11頁：Ihlder，“英國工人的房屋”，第2頁。

[[387]](#_387_20)Barrows，“廉價公寓之外”，409,414頁：Martin J.Daunton，“家庭的城市和廉價公寓的城市：1870—1914年英國和美國對比”，《城市歷史雜志》14（1988）：283—319頁：Michael Doucet和John Weaver，《北美城市的住房》（Montreal: McGill-Queen University Press, 1991）。

[[388]](#_388_20)Robert W.de Forest和Lawrence Veiller編，《廉價公寓問題》（New York: Macmillan, 1903）。1917年，三十多個城市的公民團體紛紛效仿進行了地方住房狀況調查。Allen Eaton和Shelby M.Harrison，《社會調查參考書目》（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30），161—173頁。

[[389]](#_389_20)W.D.P.Bliss，“美國花園城市協會”，《花園城市》新刊號2（1907）：268—269頁，Joseph L.Arnold，《郊區的新政：1935—1954年綠帶城鎮項目的歷史》（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1），6—7頁。

[[390]](#_390_20)馬薩諸塞州宅地委員會，《第四屆年度報告，1916年》（Boston, 1917）。

[[391]](#_391_20)Adams，“美國的花園城市和城鎮規劃”，168頁。

[[392]](#_392_20)Thomas M.Cooley，《關于美國各州立法權的憲法局限性探討》，第8版，由Walter Carrington補充（Boston: Little，Brown, 1927），第14—15章：Breck P.McAllister，“稅收的公共目的”，《加利福尼亞法學評論》18（1930）：137—148頁，241—245頁：Philip Nichols，Jr.，“征用權法律中公共用途的意義”，《波士頓大學法學評論》20（1940）：615—641頁。

[[393]](#_393_20)Ernst Freund，《警察權力、公共政策和憲法權利》（Chicago: Callaghan, 1904）。

[[394]](#_394_20)馬薩諸塞州普通法院，征用權委員會，《1903年報告：歐洲為了公共目的進行的土地征用》（Boston, 1903）：紐約市稅收委員會，《超額征用土地：報告》（New York, 1915）：Robert E.Cushman，《超額征用土地》（New York，D.Appleton, 1917）：Edward M.Bassett，“超額征用土地中的一些問題”，《城市規劃》9（1933年7月）：114—120頁。

[[395]](#_395_20)溫伯格廣告公司訴默菲案，88 N.Y.126（1909）：Wilbur Larremore，“公共美學”，《哈佛法學評論》20（1906）：35—45頁：Edward M.Bassett，“城市規劃權力的憲法限制”，城市規劃全國會議，《會議記錄》（1917），205頁。

[[396]](#_396_20)Shurtleff，《城市規劃的實施》，3—4頁。

[[397]](#_397_20)同上，92—93頁：Williams，《城市規劃法則》，30—39頁：Theodora K.Hubbard和Henry V.Hubbard，《我們的城市，現在和未來：美國規劃和分區進展調查》（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9），第10章。

[[398]](#_398_20)廉價公寓局訴莫西欽案（Tenement House DepT.V.Moeschen），179 N.Y.325（1904）：J.A.Yelling，《維多利亞時代倫敦的貧民窟和貧民窟清理》（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86），80—82頁。

[[399]](#_399_20)法官意見，211 MasS.624（1912）：Myres S.McDougal和Addison A.Muller，“公共住房的公共目的：時代錯誤重新埋葬”，《耶魯法律雜志》52（1942）：42—73頁：Charles Abrams，《住房的未來》（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6），第15章。

[[400]](#_400_20)Donald A.Kruekeberg編，《美國規劃者：生平和回憶》（New York: Methuen, 1983），16頁：歐幾里德村訴安布勒房地產公司案（Euclid V.Ambler Reality Co.），272 U.S.（1926），尤其是371—373頁：Veiller在城市規劃全國會議上的發言，《會議記錄》（1918），33頁。

[[401]](#_401_20)安布勒房地產公司訴歐幾里德村案，279 Fed.（1924），307頁：歐幾里德村訴安布勒房地產公司案，272 U.S.（1926），365頁。“歐幾里德村”案的概要轉載于Alfred Bettman的《城市和區域規劃論文集》（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46），157—193頁。

[[402]](#_402_20)Edward T.Hartmann，“馬薩諸塞州公民會議”，《美國城市》2（1910年1月）：30頁。

[[403]](#_403_20)Norman MacKenzie編，《韋伯夫婦書信集》（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第二卷，64頁：Wells，《美國的未來》，244—245,248,74頁。

#### 第六章 工薪族的風險

[[404]](#_404_20)《1889年巴黎世界博覽會美國總干事報告》（Washington，D.C.，1890），第一卷，260頁：《1900年世界博覽會官方目錄》，第18冊：“社會經濟學、衛生、公共救濟”（Paris: Lemercier,n.d.）：《公共資助和私人慈善國際大會論文集》（Paris, 1900），第一卷，lxxxvii頁。

[[405]](#_405_20)Peter Mandler編，《慈善的用途：19世紀都市的窮人救濟》（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0）。

[[406]](#_406_20)John H.Weiss，“法國福利國家的起源：1871—1914年第三共和國的貧窮救濟”，《法國歷史研究》13（1983）：47—78頁。

[[407]](#_407_20)Gertrude Himmelfarb，《貧窮的觀點：工業時代初期的英國》（New York: Knopf, 1984）：Gertrude Himmelfarb，《貧窮和同情：維多利亞時代后期的道德想象》（New York: Knopf, 1991）：David Thompson，“福利和歷史學家”，《我們獲得的世界：人口和社會結構的歷史》，Lloyd Bonfield，Richard M.Smith和Keith Wrightson編（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6）：Karel Williams，《從赤貧到貧窮》（From Pauperism to Poverty，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1）：M.A.Crowther，《1834—1929年的濟貧院制度：一個英國社會機構的歷史》（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81）：Felix Driver，《權力和赤貧：1834—1884年的濟貧院制度》（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數字來自Michael E.Rose編，《1834—1914年貧窮救濟》，第2版（London: Macmillan, 1982），50頁。

[[408]](#_408_20)Michael B.Katz，《在濟貧院的陰影中：美國福利的社會史》（New York: Basic Books 1986）：Edith Abbott，《公共救濟：美國的原則和政策》（1940：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1966）：Glen C. Altschuler和Jon M.Saltzgaber，“責任的限制：1860—1875年紐約塞內卡縣的地方政府和社會福利”，《社會史雜志》21（1988）：515—537頁。

[[409]](#_409_20)E.Munsterberg，“德國公共慈善和私人慈善的原則”，《美國社會學雜志》2（1897）：589—605,680—698頁：Francis G.Peabody，“城市該如何照顧窮人？”《論壇》14（1892）：474—491頁：Christoph Sachsse和Florian Tennstedt，《德國濟貧史：從中世紀后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戰》（Stuttgart: W.Kohlhammer, 1980），第2章：Heide Gerstenberger，“窮人和可敬的工人：德國社會保險簡介”，《勞工歷史》48（1985）：69—85頁。

[[410]](#_410_20)Michael E.Rose，“1860—1890年英國貧窮救濟的危機”，W.J.Mommsen編，《1850—1950年英國、德國福利國家的出現》（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1），56,55頁：Katz，《濟貧院的陰影》，第2章：Raymond A.Mohl，“1870—1900年公共院外救濟的廢除：皮文和克勞沃德理論批判”，《社會福利還是社會控制？關于“管理窮人”的一些歷史反思》，Walter I.Trattner編（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3）。

[[411]](#_411_18)Leah H.Feder，《蕭條時期的失業救濟：1857—1922年某些美國城市的救濟方法研究》（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36）：Alexander Keyssar，《失業：馬薩諸塞失業問題第一個世紀》（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Carlos C. Closson，Jr.，“美國城市的失業者”，《經濟學季刊》8（1894）：168—217頁。

[[412]](#_412_18)Sidney和Beatrice Webb，《預防貧困》（London: Longmans，Green, 1912），293頁：Sidney和Beatrice Webb，《濟貧法的崩潰：濟貧法委員會少數派報告第一部分》（London: Longmans，Green, 1909），516頁。

[[413]](#_413_18)Charles Booth，《倫敦人的生活和勞動》（London: Macmillan, 1892—1897），第一卷，162—171頁。

[[414]](#_414_18)Francis G.Peabody，“德國流浪漢的勞動營”，《論壇》12（1892）：751—761頁：J.H.Gore，“荷蘭窮人勞動營”，《肖托夸會刊》22（1896）：581—586頁。

[[415]](#_415_18)José Harris，《威廉·貝弗里奇傳記》（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123頁：Sidney Webb，“英國的失業問題，組織加培訓的對策”，《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33（1909）：420—439頁： Sidney Webb和Beatrice Webb編，《勞工市場的公共組織：濟貧法委員會少數派報告第二部分》（London: Longmans，Green, 1909）。還可以參閱José Harris，《失業和政治：1886—1914年英國社會政策研究》（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Kenneth D.Brown，《勞工和失業：1900—1914年》（Newton Abbot，England: David and Charles 1971）：Percy Alden和 Edward E.Hayward，《無就業能力者和失業者》（The Unemployable and Unemployed，London: Headley Brooks, 1908）：F.Herbert Stead，“英國失業者待遇的進步”，《慈善與平民》15（1906）：579—582頁。

[[416]](#_416_18)A.F.Van Schelle，“流浪漢的城市”，《美國社會學雜志》16（1910）：1—20頁：William H.Dawson，《流浪問題：限制流浪漢、懶漢、無就業能力者的措施》（London: P.S.King, 1910）。

[[417]](#_417_18)Francis G.Peabody，“殖民化作為城市貧困的解決辦法”，《論壇》17（1894）：57,61頁：John Graham Brooks，“慈善和失業的未來問題”，《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5（1894）：266頁。

[[418]](#_418_18)Edmond Kelly，《消除流浪漢》（New York： G.P.Putnam's Sons, 1908）：Edmond Kelly，“英國的失業現象”，《獨立》65（1908）：1108—1110頁：Paul T.Ringenbach，《1873—1916年的流浪漢和改革者：紐約失業現象的發現》（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 1973）：125—128頁：Jane Addams，“解決失業問題”，《女士家庭雜志》30（1913年9月）：23頁。

[[419]](#_419_18)Gerhard Ritter，《德國和英國的社會福利：起源和發展》（Leamington Spa，England: Berg, 1986），Deltev Zöllner，“德國”，《1881—1981年社會保險的演化：德國、法國、英國、奧地利和瑞士的研究》，Peter A.Kohler和Hans F.Zacher編（London: ST.Martin's Press, 1982）。

[[420]](#_420_18)Yves Saint-Jours，“法國”，《社會保險的演化》，Kohler和Zacher編，104—105頁：William F.Willoughby，《工人保險》（New York: Thomas Y.Crowell, 1898），第4章。

[[421]](#_421_18)Bentley B.Gilbert，《英國國民保險的演化：福利國家的起源》（London: Michael Joseph, 1966），165—180頁：Paul Johnson，《儲蓄和消費：1870—1939年英國工人階級經濟》（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5），第3章：P.H.J.H.Gosden，《自助：十九世紀的自發協會》（London: B.T.Batsford, 1973），第2—4章。

[[422]](#_422_18)Gilbert，《國民保險的演化》，320頁：Johnson，《儲蓄和消費》，表2.1。

[[423]](#_423_18)I.M.Rubinow，《社會保險》（New York: Henry Holt, 1913），225頁。

[[424]](#_424_18)B.H.Meyer，“美國的互助保險”，《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17（1901）：260—286頁：Margaret F.Byington，《家園：磨坊小鎮的住戶》（Homestead, 1910： Pittsburgh： Pitts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74），113頁：W.E.B.Du Dois，《費城黑人：社會研究》（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1899），221—225頁：Charles R.Henderson，《美國的工業保險》（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9）：Hace S.Tishler，《自助與社會保障，1870—1917》（Port Washington，N.Y.：Kennikat Press, 1971），96頁。簡·亞當斯的話轉引自Henderson，《工業保險》，82頁。

[[425]](#_425_18)Edward Cummings，“康涅狄格州勞工局報告”，《經濟學季刊》7（1893）：480—487頁：B.Seebohm Rowntree，《貧困：城市生活的研究》新版（London: Longmans，Green, 1922），415—424頁：加利福尼亞社會保險委員會，《報告》（Sacramento, 1917），89頁：馬薩諸塞州社會保險特別委員會，《報告》（Boston, 1917），184—191頁。

[[426]](#_426_17)Rubinow，《社會保險》，418,294,420頁。更籠統的內容請參閱Viviana A.R.Zelizer，《道德與市場：美國人壽保險的發展》（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427]](#_427_17)關于女性的非正式替代選擇，可參閱Laura Balbo，“東拼西湊：從女性角度重新思考福利國家的辯論”（Crazy Quilt），《婦女與國家：公共和私人界限的轉移》，Anne Showstack Sassoon編（London: Hutchinson, 1987）。

[[428]](#_428_17)“老年和傷殘工人救濟問題”，《社會政策協會文集》5（1874）：Gustav Schmoller，“俾斯麥社會政策和國民經濟地位和意義簡介”：Gustuv Schmoller，《性格素描》（Charakterbilder）（Munich: Duncker and Humblot, 1913）：Lujo Brentano，《與當前經濟管理適應的工人保險》（Leipzig: Duncker and Humblot, 1879）。

[[429]](#_429_17)Ritter，《德國和英國的社會福利》：Daniel Levine，《貧窮與社會：國際對比中美國福利國家的成長》（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8），第3—5章：Gaston V.Rimlinger，《歐洲、美國和俄國的福利政策和工業化》（New York: Wiley, 1971），第4章。

[[430]](#_430_17)Hans Rothfels，《西奧多·洛曼和國家社會政治斗爭史（1871—1905）》（C. S.Mittler and Sohn, 1927），第3章：Walter Vogel，《俾斯麥工人保險：在當時權力斗爭中的起源》（Braunschweig: George Westermann, 1951），尤其是第151頁。

[[431]](#_431_17)德國帝國保險公司，《作為社會機構的德國工人保險》（Berlin, 1904），第一卷，26頁。

[[432]](#_432_17)Jürgen Tampke，“俾斯麥的社會立法：真正的突破？”《福利國家的出現》，Mommsen編：Volker Hentschel，《1880—1980年德國社會政治史：社會保障和集體就業》（Suhrkamp, 1983），第2章。過渡性的福利延伸到已經年滿70歲的掙工資者。

[[433]](#_433_17)Gerhard A.Ritter，《德國的國家、工人階級、工人運動：從三月革命前到魏瑪共和國末期》（Bonn: J.H.W.Dietz, 1980）：Daniel Levine，“社會民主黨、社會主義和社會保險：1918—1935年的德國和丹麥”，《對比社會學研究》6（1983）：67—86頁。

[[434]](#_434_17)Elmer Roberts，“德國失業保險試驗”，《斯克里布納雜志》49（1911）：116—120頁：William H.Dawson，《德國工人：國民效率研究》（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06），第1,3章：更籠統的內容請參閱John A.Garraty，《歷史上的失業問題：經濟思想和公共政策》（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8）。

[[435]](#_435_17)Paul Louis，《國家工人：兩個世界勞動法歷史比較》（L'Ouvrier devant l'état，Paris: Felix Alcan, 1904）。

[[436]](#_436_17)Paul Pic，《法國和外國的社會保險》（Paris: Felix Alcan, 1913）：Léon Bourgeois，《社會保障政策：行動》（Paris: Charpentier, 1919）：Allan Mitchell，《分開的道路：德國影響與1870年后法國社會改革》（The Divided Path，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Judith F.Stone，《尋求社會和平：1890—1914年法國的改革立法》（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5），102—122頁。

[[437]](#_437_17)Susan Pedersen，《家庭、依賴與福利國家的起源：1914—1945年的英國和法國》（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第1章：Rachel G.Fuchs，“道德與貧困：1870—1900年巴黎母親的公共福利”，《法國歷史》2（1988）：288—311頁：Rachel G.Fuchs，“對比視角下的法國”，《性別和1870—1914年法國社會改革的政治》，Elinor A.Accampo和Rachel G.Fuchs編（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Philip Nord，“法國福利國家”，《法國歷史研究》18（1994）：821—838頁。

[[438]](#_438_17)Katharine Coman，“丹麥養老金補助二十年”，《調查》31（1914）：463—465頁：Levine，《貧窮與社會》，第6—7章：Peter Baldwin，《社會團結的政治：1875—1975年歐洲福利國家的階級基礎》（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第1章：Henry Demarest Lloyd，《最新的英國：新西蘭民主游客札記以及與澳大利亞的對比》（New York: Doubleday，Page, 1900），第14章。

[[439]](#_439_17)對于這些事件的簡要、流暢的總結，可參閱Derek Fraser，《英國福利國家的演變：自工業革命以來的社會政策歷史》（London: Macmillan, 1973）：J.R.Hay，《1906—1914年自由黨福利改革的起源》（London: Macmillan, 1975）。

[[440]](#_440_17)Williams，《從赤貧到貧窮》，206頁。

[[441]](#_441_17)Charles Booth，《赤貧的寫照和有關養老金的論據》（Pauperism,a Picture,and the Endowment of Old Age,an Argument，London: Macmillan, 1892）。

[[442]](#_442_17)Pat Thane，“1879—1908年非繳扣年金和保險年金”，《英國社會政策起源》，Pat Thane編（London: Croom Helm, 1978），尤其是103—104頁：Gilbert，《國民保險的演化》，第4章：Hugh Heclo，《英國和瑞典的現代社會政治：從救濟到維持收入》（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4），第4章。勞合·喬治的話也引自該書，176頁。

[[443]](#_443_17)Edith Abbott，《英國的民主和社會進步》（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8），9—13頁。

[[444]](#_444_17)E.P.Hennock，《英國社會改革和德國先例：1880—1914年社會保險案例》（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171,141頁：關于政策“死胡同”（impass）的概念，我感謝這個細微的跨國研究。

[[445]](#_445_17)J.R.Hay，“英國企業社區：社會保險和德國例子”，《福利國家的興起》，Mommsen編。

[[446]](#_446_17)Harris，《威廉·貝弗里奇》，50頁：Hennock，《英國社會改革》，136頁：William H.Beveridge，《失業：工業問題》（London: Longmans，Green, 1909）。

[[447]](#_447_17)Hennock，《英國社會改革》，149—150頁：Gilbert，《全國保險的演化》，251,253頁。

[[448]](#_448_17)Hennock，《英國社會改革》，177頁。關于和德國保險條款的對比，勞合·喬治依靠威廉·道森（William Dawson）的計算。

[[449]](#_449_17)Gilbert，《國民保險的演化》，第6—7章。

[[450]](#_450_17)全國公民聯盟社會保險部，《初步外國調查委員會報告》（New York: National Civic Federation, 1914），22,28頁。

[[451]](#_451_17)Heclo，《現代社會政治》，85—90頁：Beatrice Webb，《我們的伙伴關系》（Our Partnership, 1948：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475—476頁：Sidney Webb和Beatrice Webb，《貧困預防》（London: Longmans，Green, 1912）：Ritter，《社會福利》，91頁。

[[452]](#_452_17)Gilbert，《國民保險的演化》，273頁。

[[453]](#_453_17)John Graham Brooks，《社會動蕩：勞工和社會主義運動研究》（New York: Macmillan, 1903），46頁：Arthur Shadwell，《工業效率：英國、德國、美國工業生活對比研究》（London: Longmans，Green, 1906），第二卷，第5章。

[[454]](#_454_17)美國勞工立法協會執行委員會的通函，1906年5月：法納姆家族文件集，手稿和檔案，耶魯大學圖書館：1908年3月27日給John P.Frey的通函，美國勞工立法協會文件集，康奈爾大學紐約州工業關系學院。關于美國勞工立法協會工作的概況，請參閱Theda Skocpol，《保護士兵和母親：美國社會政策的政治根源》（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第3章：David Moss，《保障的社會化：進步時代的經濟學家和美國社會政策的根源》（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455]](#_455_17)Maud Nathan，《劃時代運動的故事》（Garden City，N.Y.：Doubleday，Page, 1926）。

[[456]](#_456_17)Florence Kelly，《從立法而來的一些倫理收獲》（New York: Macmillan, 1905）：Walter I.Trattner，《保護兒童的圣戰：全國童工委員會和美國童工改革的歷史》（Crusade for Children，Chicago: Qudrangle, 1970）。

[[457]](#_457_17)全國消費者聯盟，《第六次年度報告》（New York, 1905）。

[[458]](#_458_17)Felix Frankfurter和Josephine Goldmark，《工業中的婦女》（New York: National Consumers' League, 1907）：Josephine Goldmark，《疲勞和效率：工業研究》（New York: Charities Publication Committee, 1912）：Felix Frankfurter和Josephine Goldmark，《縮短工作日的理由》（A Case for the Shorter Work Day，New York: National Consumers' League, 1916）。

[[459]](#_459_17)John A.Ryan，《生計工資》（A Living Wage，New York: Macmillan, 1906）：Diane Kirkby，《愛麗絲·亨利，筆和聲音的力量：一位澳裔美國勞工改革者的生平》（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460]](#_460_17)Florence Kelley，“消費者聯盟30年”，《調查》63（1929）：210—212頁：Elizabeth Glendower Evans，“支持最低工資委員會”（A Case for Minimum Wage Boards），同上，31（1914）：497—498頁： Irene Osgood Andrews，《最低工資立法：紐約州工廠調查委員會第三份報告的附錄三》（Albany, 1914）：更籠統的材料請參閱Vivien Hart，《受憲法約束：婦女、工人和最低工資》（Bound by Our Constitution，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Peter J.Coleman，《進步主義和改革世界：新西蘭與美國福利國家的起源》（Lawrence: 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1987），第5章。

[[461]](#_461_17)Elizabeth Brandeis，“勞工立法”，《1896—1932年美國勞工歷史》，John R.Commons 等編（New York: Macmillan, 1918—1935），第三卷，458—460,409頁：Felix Frankfurter和Josephine Goldmark，《俄勒岡最低工資案例：錯案被告在再辯論中的辯護狀》（New York: National Consumers' League, 1916）。

[[462]](#_462_17)Florence Kelly，“最低工資法律”，《政治經濟學雜志》20（1912）：999—1010頁：Florence Kelley，“最低工資立法”，《調查》30（1913）：9—10頁。

[[463]](#_463_17)Brian Gratton，“社會工作者和養老金”，《社會服務評論》57（1983）：402—415頁：《調查》35（1915）：197頁。

[[464]](#_464_17)Skocpol，《保護士兵和母親》，第二部分。在這部本來緊湊和說服力強的書中，斯科波爾提出聯邦老兵福利制度包括一個“超前的社會開支體制”，這是錯誤看待了國家開支推動和社會政治之間的關系。在一個嚴重不向工人或者窮人（南方，黑人，1865年后的移民）傾斜，而是向北方鄉村和小城鎮傾斜的體制里，老兵津貼法案的有效親屬不是社會經濟學——不管超前不超前，而是共和黨關稅和西部土地政治。類似的：Ann Shola Orloff和Theda Skocpol，“為什么不是平等保護？解釋英國1890—1911年和美國1880—1920年的公共開支政策”，《美國社會學評論》49（1984）：726—750：Ann Shola Orloff，“美國遲到的福利國家的政治起源”，《美國社會政策的政治學》，Margaret Weir，Ann Shola Orloff和Theda Skocpol編（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Ann Shola Orloff，《養老金的政治：對比分析英國、加拿大和美國，1880—1940年》（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3）。關于老兵津貼制度的規模：Maris A.Winovskis，“社會歷史學家輸掉了內戰嗎？一些初步的人口統計猜測”（Have Social Historians Lost the Civil War？），《美國歷史雜志》76（1989）：34—58：Henderson，《工業保險》，274頁。

[[465]](#_465_17)馬薩諸塞社會保險特別委員會，《報告》：馬薩諸塞養老金、年金和保險委員會，《報告》（Boston, 1910），314,308頁：Frank J.Goodnow，《社會改革與憲法》（New York: Macmillan, 1911），330—317頁：Susan Sterrett，“憲政和社會開支：1920年代賓夕法尼亞養老金”，《美國政治發展研究》4（1990）：231—247頁。

[[466]](#_466_17)Skocpol，《保護士兵和母親》，第三部分：Linda Gordon，《得到同情但沒有資格：單身母親和福利歷史》（New York: Free Press, 1994），第1,2章：Mark H.Leff，“改革的共識：進步時代的母親補貼運動”，《社會服務評論》47（1973）：397—417頁：Barbara J.Nelson，“雙渠道福利國家的起源：工人補償和母親補貼”，《婦女、國家和福利》，Linda Gordon編（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0）。

[[467]](#_467_17)Jane Jenson，“性別的表現：1914年前法國和美國‘保護’女工和兒童的政策”，出處同上。關于美國母親津貼運動對英國產生的影響，請參閱Pedersen，《家庭、依賴與福利國家的起源》，第3章。

[[468]](#_468_17)美國勞工局長，《第四份特別報告：德國強制性保險》（Washington，D.C.，1893）：William F.Willoughby，《工人保險》（New York: Thomas Y.Crowell, 1898）：美國勞工局長，《第二十三個年度報告：美國的工人保險和補貼資金》（Washington，D.C.，1909）：美國勞工局長，《第二十四個年度報告：歐洲的工人保險和賠償制度》（Washington，D.C.，1911）。

[[469]](#_469_17)Willoughby，《工人保險》，“結論”：Louis D.Brandeis，“為什么不為掙工資者設立儲蓄銀行式人壽保險？”《美國評論之評論月刊》35（1907）：337—339頁：威斯康星參議院的政府和國家保險可行性委員會，《報告》（Madison, 1907）：加利福尼亞社會保險委員會，《報告》，253—254頁。

[[470]](#_470_17)Willoughby，《工人保險》，112頁：Henry W.Farnam，“勞工立法的一些根本區別”，《美國經濟學家協會出版物》第三輯，10（1900）：104—118頁：Henry W.Farnam，“德國工人保險的心理學”，《耶魯評論》13（1904）：98—113頁：美國工業委員會，《最終報告》（Washington，D.C.，1902）。

[[471]](#_471_17)明尼蘇達雇工賠償委員會，《報告》（ST.Paul：1911），124—128頁：Donald B.Johnson編，《全國政黨政綱》（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3），127—128,140—142,163—166頁：美國國會眾議院勞工委員會，《社會保險和失業研究委員會：關于眾議院第159號聯合決議的聽證會》，第64屆國會第一次會議，1916年，眾議院報告第914號：Morris Hillquit，“社會主義和社會保險”，社會工作全國會議，《會議記錄》（1917），525—528頁。

[[472]](#_472_17)J.Lee Kreader，“伊薩克·魯賓諾：社會保險專家先驅者”，《社會服務評論》50（1976）：402—425頁：I.M.Rubinow，“強制性國家工人保險”，《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24（1904）：331—358頁：I.M.Rubinow，“來自歐洲的公民教育：強制性保險”（Civic Lessons from Europe），《肖托夸會刊》41（1905）：48—59頁：Rubinow，《社會保險》。

[[473]](#_473_17)I.M.Rubinow，《馬克思錯了嗎？》（New York: Marx Institute of America, 1914）。引語來自I.M.Rubinow，“疾病保險”，《美國勞工立法評論》3（1913）：162頁：I.M.Rubinow，“勞動保險”，《政治經濟學雜志》12（1904）：362頁。

[[474]](#_474_17)Walter I.Trattner編，《美國社會福利人物傳略辭典》（Westport，Conn: Greenwood, 1986），371—374頁：《調查》34（1915）：55—56頁：Steven J.Diner，《一個城市和它的大學：芝加哥的公共政策，1892—1919年》（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0），31—33頁。

[[475]](#_475_17)Charles R.Henderson，“德國窮人救濟和慈善聯盟年會”，《慈善》7（1901）：292頁：Charles R.Henderson，“工人保險”，《今日世界》10（1906）：145—148頁：Charles R.Henderson，《美國工業保險》（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9），274頁：Charles R.Henderson，“社會保險的邏輯”，《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33（1909）：269頁：Charles R.Henderson，“德國社會政策”，《肖托夸會刊》52（1908）：397頁。

[[476]](#_476_17)“工人保險和養老金”，慈善和矯治全國會議，《會議記錄》（1906），452—457頁：John Graham Brooks，“德國工人保險的報告”，同上，（1905），452—457頁，以及Florence Kelley的評論，577—578頁：Henry R.Seager，“特別針對掙工資者的社會立法項目提綱”，美國勞工立法協會，《會議記錄》（1907），85—103頁：Henry Rogers Seager，《社會保險：社會改革項目》（New York: Macmillan, 1910）。

[[477]](#_477_17)Gordon，《得到同情但沒有資格》，第6章。

[[478]](#_478_17)Katz，《濟貧院的陰影》，191—192頁。

[[479]](#_479_17)Seager，《社會保險》，25頁。

[[480]](#_480_17)轉引自Robert Asher，“1880—1935年美國的工人賠償”，明尼蘇達大學1971年博士論文，70頁。

[[481]](#_481_17)Lawrence M.Friedman和Jack Ladinsky，“社會變化和工業事故法律”，《哥倫比亞法學評論》67（1967）：50—82頁。數據來自Crystal Eastman，《工作事故與法律》（New York: Charities Publication Committee, 1910），121—122頁：Edward D.Berkowitz和Kim McQuaid，《創造福利國家：20世紀改革的政治經濟學》，第2版（New York: Praeger, 1980），33—41頁。

[[482]](#_482_17)Emory R.Johnson，“鐵路系統的雇工救濟和保險部門”，《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7（1895）：424—468頁：Robert Asher，“大企業家長制的局限性：工人賠償法之前受傷工人的救濟”，《為工作而亡：20世紀美國工人的安全和健康》（Dying for Work，David Rosner和Gerald Markowitz編，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7）。

[[483]](#_483_17)Adna F.Weber，“雇主的責任和事故保險”，《政治學季刊》17（1902）：256—283頁。關于歐洲法律的歷史，請參閱Hennock，《英國社會改革》第一部分：Anson Rabinbach，“社會知識、社會風險和工業事故的政治，德國和法國”，《國家、社會知識和現代社會政治的起源》，Dietrich Rueschemeyer和Theda Skocpol編（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484]](#_484_17)《西奧多·羅斯福著作》，紀念版（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23—1926），第17卷，591頁。

[[485]](#_485_17)James Weinstein，《1900—1918年自由政府的企業理想》（Boston: Beacon Press, 1968），第2章：Roy Lubove，《1900—1935年爭取社會安全的斗爭》（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第3章：Robert Asher，“進步時代的企業和工人福利：1880—1911年馬薩諸塞州工人賠償改革”，《商業史評論》43（1969）：452—475頁：Robert Asher，“1911年威斯康星工人賠償法：保守派勞工改革研究”，《威斯康星歷史雜志》57（1973—1974）：123—140頁：Robert Asher，“激進主義和改革：1910—1933年明尼蘇達州工人賠償保險”，《勞工歷史》14（1973）：19—14頁：Joseph F.Tripp，“勞資合作的例子：華盛頓州工人賠償法”，同上，17（1976）：530—550頁：Joseph Castrovinci，“福利資本主義的前奏：1905—1912年伊利諾斯州工人賠償法制定過程中企業的作用”，《社會服務評論》50（1976）：80—102頁。

[[486]](#_486_17)紐約雇主責任委員會，《第一份報告》（Albany, 1910），20—25頁：“工業事故賠償和預防”，《全國公民聯盟評論》3（1991年7月1日），第2頁：全國公民聯盟第11屆年會，《會議記錄》（1911），169—184頁：Marguerite Green，《全國公民聯盟和美國勞工運動，1900—1925年》（Washington，D.C.：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Press, 1956），250—251頁。

[[487]](#_487_17)關于Dawson和Frankel的結論，請參閱：1909年7月29—31日在大西洋城召開的工人賠償法會議《報告》（n.p.，1909），231—261頁：Lee K.Frankel，“普及德國保險知識”，《慈善與平民》21（1908）：368—369頁：Frankel和Dawson，《歐洲的工人保險》（New York: Charities Publication Committee, 1910）：Miles M.Dawson，“最適應美國的體制”，《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3（1911）：175—183頁：美國國會眾議院司法委員會，《雇主的責任和工人的賠償：眾議院20487號議案聽證會》，第62屆國會第二次會議，1913年，第二卷，57—121,270—287,590—609頁。引語來自Tishler，《自力更生和社會保障》，182頁。

[[488]](#_488_17)工業事故委員會會議，《1910年會議記錄》（Boston, 1910），163—164頁：明尼蘇達州雇工賠償委員會，《報告》：Ferd C. Schwedtman和James A.Emery，《事故預防和救濟：歐洲調查，特別關注英國和德國，同時提出美國行動的建議》（New York: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 1911）：“普通法之后，怎么辦？”（After the Common Law—What？），《調查》2（1912）：249頁。

[[489]](#_489_17)E.H.Downey，《工人的賠償》（New York: Macmillan, 1924）。

[[490]](#_490_17)Patrick D.Reagan，“社會和諧與效率的意識形態：1904—1919年俄亥俄州工人賠償”，《俄亥俄歷史》90（1981）：317—331頁：H.R.Mengert，“俄亥俄工人賠償法”，《俄亥俄考古和歷史出版物》29（1920）：1—48頁：James H.Boyd，“工人的保險賠償，或工人及其家屬防備因工業事故而造成的工資損失”，《美國社會學雜志》17（1912）：540—545頁。

[[491]](#_491_15)Coleman，《進步主義和改革世界》，85頁：Robert F.Wesser，“沖突和妥協：1890—1913年紐約工人賠償運動”，《勞工歷史》12（1971）：345—372頁：Asher，“工人賠償”，第14章：Irwin Yellowitz，《紐約州的勞工和進步運動》（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5），113—118頁。

[[492]](#_492_15)Brandeis，“勞工立法”，564—609頁：Lubove，《爭取社會保障》，215頁。

[[493]](#_493_15)工業事故工人賠償全國會議，《第三屆全國會議記錄》，1910年6月10日—11日，芝加哥（Princeton, 1910），15頁：1909年大西洋城工人賠償法會議，《報告》。

[[494]](#_494_15)《路易斯·布蘭代斯書信集》，Melvin I.Urofsky和David W.Levy編（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72），第二卷，176,212頁：Louis D.Brandeis，“社會效率之路”，《瞭望》98（1911）：292—294頁：Theodore Roosevelt，《1912年8月芝加哥全國進步黨大會上的講演》（n.P.1912）：Johnson，《全國政黨政綱》，177頁：Allen F.Davis，《改革的先驅：1890—1914年睦鄰組織和進步運動》（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195—197頁。

[[495]](#_495_15)Yellowitz，《勞工和進步運動》，107—118頁：Tishler，《自力更生和社會保障》，160頁。要了解美國勞工聯合會的策略，可以參閱美國勞工立法協會的《年度會議記錄》（1907—1909）和《美國勞工立法評論》（1911—1942）。

[[496]](#_496_15)I.M.Rubinow，“第一屆美國社會保險大會”，《調查》30（1913）：478—480頁。

[[497]](#_497_15)John B.Andrews，“美國失業預防的實用項目”，《美國勞工立法評論》5（1914）：171—192頁：紐約市長失業問題委員會，《報告》（New York, 1916）：William M.Leiserson，“當今的失業問題”，《政治學季刊》31（1916）：第1頁。還可以參閱Irwin Yellowitz，“美國失業改革的起源”，《勞工歷史》9（1968）：338—360頁：Daniel Nelson，《失業保險：1915—1935年的美國經驗》（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9），第1章。

[[498]](#_498_15)Ronald L.Numbers，《幾乎被說服：1912—1920年美國醫生和強制性健康保險》（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25頁：“健康保險：暫定草案”，《美國勞工立法評論》6（1916）：239—268頁：Henry R.Seager，“健康保險法案計劃”，同上，7（1916）：20—25頁。

[[499]](#_499_14)Numbers，《幾乎被說服》：Lubove，《爭取社會保障》，第4章：Athur J.Viseltear，“1915—1918年加利福尼亞強制性健康保險”，《醫學史雜志》24（1969）：151—182頁：Paul Starr，“失敗中的轉型：1915—1980年全民健康保險目標的改變”，《強制性健康保險：持續的美國辯論》，Ronald L.Numbers編（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 1982）：加利福尼亞社會保險委員會《報告》：馬薩諸塞社會保險特別委員會《報告》。

[[500]](#_500_14)美國勞工立法協會，“年度會員和收入對比表，1914年1月9日”，法納姆文件集。關于國際協會的法國部分，請參閱Stone，《尋求社會和平》，51—52頁。關于德國部分，請參閱Rüdiger vom Bruch，“德意志帝國后期公民社會改革和工會：1901—1914年的社會改革協會（GSR）”，《德國工人運動史國際科學通訊》15（1979）：581—610頁。

[[501]](#_501_14)加利福尼亞社會保險委員會《報告》，280—283頁：Edward T.Devine，《苦難及其根源》（1909：New York: Macmillan, 1913），247—248頁：Edward T.Devine，“母親的津貼”，《調查》30（1913）：457頁。

[[502]](#_502_14)比如：Rimlinger，《福利政策》：Tishler，《自力更生和社會保障》：Lubove，《爭取社會保障》。

[[503]](#_503_14)馬薩諸塞養老金、年金和保險委員會《報告》，337頁：Lubove，《爭取社會保障》，84頁：美國保險經濟學協會，《第二號公報：社會保險》（底特律，1916？），第4頁：Rimlinger，《福利政策》，75頁：全國公民聯盟，《初步外國調查委員會報告》，64頁：還可參閱Gary Land，“英國強制性健康保險的美國形象”，《強制性健康保險》，Numbers編。

[[504]](#_504_14)“勞合·喬治的保險方案”，《獨立日報》70（1911）：1282頁：Roosevelt，《全國進步黨大會上的講話》，10頁：Rubinow，“疾病保險”，166頁。

[[505]](#_505_14)Viseltear，“強制性健康保險”，162頁：Numbers，《幾乎被說服》，第7章。

[[506]](#_506_14)Samuel Gompers，“德國和其他地方的工業保險與賠償”，《美國聯邦主義者》17（1910）：595—596頁：Samuel Gompers，“‘知識分子’，請注意”，同上，23（1916）：198—199頁：Samuel Gompers，“工會健康保險”，同上，1072—1074頁：美國國會眾議院勞工委員會，《社會保險研究報告》。

[[507]](#_507_14)全國公民聯盟，《初步外國調查委員會報告》，95頁：Asher，“工人賠償”，80頁，注41。

[[508]](#_508_14)Tishler，《自力更生和社會保障》，179頁：全國公民聯盟，《初步外國調查委員會報告》：Green，《全國公民聯盟》，第6,9章。

[[509]](#_509_14)關于雇主提供的健康和養老金保險范圍，請參閱：加利福尼亞社會保險委員會《報告》，102—115頁：Rubinow，《社會保險》，393—396頁：全國工業會議理事會，《互助會的現狀》（New York: 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 1931）。

[[510]](#_510_14)Claudia Heuerkamp，“德國的醫師和專業化：思考19世紀醫師行業的變化”，《歷史與社會》67（1980）：366—381頁：George Rosen，“特約醫療（Contract or Lodge Practice），它如何影響醫藥行業對健康保險的態度”，《美國公共健康雜志》67（1977）：374—378頁。

[[511]](#_511_14)Burton J.Hendrick，《人壽保險的故事》（New York: McClure，Philips, 1907）。引語來自Lubove，《爭取社會保障的斗爭》，86頁。

[[512]](#_512_14)John F.Dryden，《工業保險的過去和現在》（Newark，N.J.：Prudential Insurance CO.of America, 1912），10頁。

[[513]](#_513_14)Marquis James，《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企業發展研究》（New York: Viking, 1947），特別是第10章。Frederick L.Hoffman在1916年12月14日給Forrest F.Dryden的信，霍夫曼文件集，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和手稿圖書館。還可參閱Edward T.Devine，“工業保險的革命”，《慈善》21（1909）：959—960頁：Lee K.Frankel，“工業保險”，慈善和矯治全國會議，《會議記錄》（1909），369—380頁：Charles R.Henderson，“工業保險的改善”，《美國社會學雜志》15（1910）：478—450頁：Louis I.Dublin，《三千萬人的家庭：大都會人壽保險公司的故事》（New York: Metropolitan Life Insurance Co.，1943）。

[[514]](#_514_14)Ella Hoffman Rigney，“弗里德里克·霍夫曼”，霍夫曼文件集：Frederick L.Hoffman在1913年2月11日給Forrest F.Dryden的信，霍夫曼文件集。

[[515]](#_515_14)Frederick L.Hoffman 在1912年8月4日到12月3日給Forrest F.Dryden的信，霍夫曼文件集。

[[516]](#_516_14)Frederick L.Hoffman 在1913年2月19日、1914年1月15日給Forrest F.Dryden的信，霍夫曼文件集。

[[517]](#_517_14)比如Frederick L.Hoffman，《強制性健康保險的事實和謬誤》（Newark，N.J.：Prudential Press, 1917）：Frederick L.Hoffman，《獨裁和家長制對民主和自由》（New York： n.p.，1918）：Frederick L.Hoffman，《強制性健康保險的更多事實和謬誤》（Newark，N.J.：Prudential Press, 1920）。引語來自Numbers，《幾乎被說服》，61—62,78頁。

#### 第七章 戰爭集體主義

[[518]](#_518_14)Paul U.Kellogg在1913年7月23日給Keir Hardie等人的信，保羅·凱洛格文件集，明尼蘇達大學社會福利史檔案館。

[[519]](#_519_14)Clarke A.Chambers，《保羅·凱洛格和〈調查〉：社會福利和社會正義的聲音》（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1）：Paul U.Kellogg在1926年1月9日給Frederic C. Howe的信，調查協會（Survey Associates）文件集，明尼蘇達州大學社會福利史檔案館。

[[520]](#_520_14)Paul U.Kellogg在1908年7月6日至8月19日給母親的信，保羅·凱洛格文件集。

[[521]](#_521_14)J.A.Hobson，《新世界的問題》（New York: Macmillan, 1922），第3頁。

[[522]](#_522_14)《1900—1919年國際會議大全》（Brussels: Union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s, 1964）。

[[523]](#_523_14)“不再瞧不起‘外國’”，《國家》99（1914）：94—95頁：Ronald Steel，《沃爾特·李普曼和美國世紀》（Boston: Little，Brown, 1980），66—73頁：全國公民聯盟社會保險部，《初步外國調查委員會報告》（New York: National Civic Federation, 1914）：教育旅游協會，《1914年歐洲的公民和社會旅行（1）城市問題和公民進步（2）社會問題和社會解決辦法（3）勞工問題和工業改善》（New York： n.d.），約翰·諾倫文件集，康奈爾大學：Charles Booth在1914年7月9日給George Booth的信，查爾斯·布思文件集，倫敦大學。

[[524]](#_524_14)Bruce Clayton，《被遺忘的先知：蘭道夫·伯恩生平》（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4）：Randolph Bourne，“1913—1914年歐洲印象”，《一位激進文人的歷史及其他》，Van Wyck Brooks編（New York: S.A.Russell, 1956），98頁。

[[525]](#_525_14)Randolph Bourne，“美國城鎮的社會秩序”，《大西洋月刊》111（1913）：227—236頁：Van Wyck Brooks，《自傳》（New York: E.P.Dutton, 1965），138頁。

[[526]](#_526_14)《蘭道夫·伯恩書信全集》，Eric J.Sandeen編（Troy，N.Y.：Whitson, 1981），152,173,160,200頁：Clayton，《被遺忘的先知》100,99頁。

[[527]](#_527_14)《蘭道夫·伯恩書信全集》，200頁。

[[528]](#_528_14)Randolph Bourne，“合作生活實驗”，《大西洋月刊》113（1914）：831,823頁。還可參閱Randolph S.Bourne，“在夏特伊的一個小時”，《大西洋月刊》114（1914）：214—217頁。

[[529]](#_529_14)《蘭道夫·伯恩書信全集》，241頁：Randolph S.Bourne，“戰爭時代的柏林”，《旅游》24（1914年11月）：第9頁以下。

[[530]](#_530_14)《蘭道夫·伯恩書信全集》，263,262頁：Randolph S.Bourne，“德國理想的美國用途”，《新共和》4（1915）：117—119頁：Bourne，“歐洲印象”，98—99頁：Randolph S.Bourne，“我們缺乏規劃的城市”，《新共和》3（1915）：202—203頁：Randolph S.Bourne，“德國文化（Kultur）一瞥”，《利平柯特雜志》（Lippincott's Magazine）95（1915年2月）：27頁。

[[531]](#_531_14)Bourne，“德國文化一瞥”，25頁。

[[532]](#_532_14)Bourne，“歐洲印象”，77頁。

[[533]](#_533_14)“心理無準備”，《新共和》4（1915）：143頁：關于這些主題，John A.Thompson，《改革者與戰爭：美國進步宣傳家和第一次世界大戰》（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是非常細致入微、資料豐富的指導書。

[[534]](#_534_14)Clayton，《被遺忘的先知》，116頁。貝克的話轉引自John A.Thompson，《改革者與戰爭》，89頁。

[[535]](#_535_14)John Haynes Holmes，“戰爭與社會運動”，《調查》32（1914）：629—630頁。類似的，請參閱Katharine Coman，“戰爭對于歐洲的社會保險意味著什么？”《調查》33（1914）：74—75頁。

[[536]](#_536_14)Oswald Garrison Villard，“兩個德國”，《美國評論之評論》，50（1914）：334—336頁：Oswald Garrison Villard，《戰斗的德國：美國解釋》（Embattled Germany，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5）：“德國主義：好與壞”，《獨立》79（1914）：396—397頁：William H.Dawson，《德國怎么了？》（What Is Wrong with Germany？ London: Longmans，Green, 1915）。

[[537]](#_537_14)A.Evelyn Newman，“柏林三日”，《調查》34（1915）：226—227頁：John Jay Chapman編，《德意志高于一切：或德國發話了》（Deuschland Über Alle，New York: G.P.Putnam's Sons, 1914），37—44頁。

[[538]](#_538_14)Carol S.Gruber，《戰神與藝術之神：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美國的高等教育用途》（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5），特別是第72頁：Simon N.Patten，《文化與戰爭》（New York: B.W.Huebsch, 1916），第4頁，25頁：Simon N.Patten，“德國思維方式”，《論壇》54（1915）：18—26頁：Henry W.Farnam，《德國悲劇》（New York: National Security League, 1917）：Albion W.Small，“世界危機中的美國人”，《美國社會學雜志》23（1917）：145—173頁：Walter E.Weyl，《美國人的世界政策》（New York: Macmillan, 1917），第6頁。

[[539]](#_539_14)“德國人的社會頌歌”，《新共和》4（1915）：343—344頁：Frederic C. Howe，《為什么打仗？》（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6）。還可參閱Weyl，《美國的世界政策》：Charles E.Russell，“誰制造了這場戰爭？”《皮爾遜雜志》32（1914）：513—525頁。

[[540]](#_540_14)Thompson，《改革者與戰爭》，91頁：Theodore Roosevelt，《敬畏上帝，履行職責》（New York: George H.Doran, 1916），41頁：Allan L.Benson，“德國是怎么做到的？”《皮爾遜雜志》34（1915）：329,331頁：“美國應該研究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紐約時報雜志》，1915年9月12日，16—17頁。

[[541]](#_541_14)Charles Forcey，《自由主義的十字路口：克羅利、韋爾、李普曼和1900—1925年的進步時代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229—231頁：《調查》34（1915）：第1—2頁：Thompson，《改革者與戰爭》，108頁：還可參閱“報應”，《新共和》3（1915）：215—218頁：Charles E.Russell，“為什么英國衰落？”《皮爾遜雜志》34（1915年8月）：210—219頁：Edith Abbott，《英國的民主和社會進步》（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18）。

[[542]](#_542_14)Alice Lewisohn，“戰爭屋檐下的英國”，《調查》36（1916）：161—162頁：Madeleine Doty《配給不足：一位美國婦女在德國，1915,1916年》（New York: Century, 1917），55頁。

[[543]](#_543_14)William English Walling，“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國際社會主義者評論》12（1911）：303—308頁：William English Walling，“政府所有權”，同上，12（1912）：652—654頁：William English Walling，《社會主義的現狀：世界范圍的革命運動調查》（Socialism As It Is，New York: Macmillan, 1912）：William English Walling，“德國的國家社會主義”，《院際社會主義者》4（1915年12月—1916年1月）：10—13頁。

[[544]](#_544_14)William English Walling，《進步主義——及其后》（New York: Macmillan, 1914），viii頁：William English Walling，《社會主義者與戰爭》（New York: Henry Holt, 1915），第31章：William English Walling，“戰爭—社會主義？”《院際社會主義者》4（1916年4—5月）：36—37頁：“社會主義者和戰爭問題”，同上，5（1917年4—5月）：7—28頁：William English Walling，“國際主義和政府所有權”，《共和》21（1918年1月11日）：49頁。戰爭集體主義辯論中社會主義者的不那么夸張的文章，請參閱Harry W.Laidler，“會議演講者”，《院際社會主義者》5（1916年10—11月）：22—23頁：Harry W.Laidler，“戰爭集體主義和財富征用”，同上，5（1917年4—5月）：第4—7頁。

[[545]](#_545_14)“大規模滑向集體主義”（The Landslide into Collectivism），《新共和》2（1915）：249—250頁：“戰備——特洛伊木馬”，同上，5（1915）：第6頁。

[[546]](#_546_14)“共和主義的復活”，同上，9（1916）：173頁：Walter Lippmann，《早期文選》，Arthur Schlesinger，JR.編（New York: Liveright, 1970），148—149頁。

[[547]](#_547_14)Christopher Lasch，《美國新激進主義（1889—1963）：知識分子作為一種社會類型》（New York: Knopf, 1965），第6章。

[[548]](#_548_14)Thompson，《改革者與戰爭》，212,213頁：Gruber，《戰神和藝術之神》，92—93頁：Frederic C. Howe，“戰后移民”，《斯克里布納雜志》58（1915）：636頁。

[[549]](#_549_14)Randolph Bourne，“戰爭日記”，《七種藝術》2（1917）：537頁。

[[550]](#_550_14)轉引自John F.McClymer，《戰爭與福利：1880—1925年美國的社會工程》（Westport，Conn: Greenwood Press, 1980），170頁。

[[551]](#_551_14)Richard M.Titmuss，“戰爭與社會政策”，見他的《福利國家文集》，Brian Abel-Smith編，第3版（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76）。

[[552]](#_552_14)關于戰爭經濟，請參閱Gerd Hardach，《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London: Allen Lane, 1977）：Arthur Marwick，《戰爭與社會變革：英、法、德、俄、美對比研究》（London: Macmillan, 1974）：Susan H.Armitage，《解除工業控制的政治：英國和美國》（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69）：Kathleen Burk編，《戰爭與國家：1914—1919年英國政府的轉變》（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2）：Arthur Marwick，《大洪水：英國社會和第一次世界大戰》（Boston: Little，Brown, 1965）：Bernard Waiters，《戰爭中的階級社會：1914—1918年的英國》（Leamington Spa: Berg, 1987）：Chris Wrightley，“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工業關系中的國家干預”，《英國工業關系歷史》，第二卷：1914—1939，Chris Wrigley編（Brighton，England: Harvester, 1987）：John F.Godfrey，《戰爭中的資本主義：1914—1918年法國的工業政策和官僚制》（Leamington Spa: Berg, 1987）：Gerald D.Feldman，《1914—1918年德國的軍隊、工業和勞工》（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Robert D.Cuff，《戰爭工業委員會：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企業—政府關系》（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David M.Kennedy，《這邊：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美國社會》（Over Her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武器生產額度引自Gerd Hardach，“1914—1918年工業動員： 生產、計劃和意識形態”，《1914—1918年法國大后方》，Patrick Frienson編（Providence，R.I.：Berg, 1992），60,63頁。

[[553]](#_553_14)John N.Horne，《戰爭期間的勞工：1914—1918年的法國和英國》（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James E.Cronin，“勞工反叛和階級形成：歐洲1917—1920年危機的對比視角”，和David Montgomery，“1916—1922年歐洲和美國工會斗爭和策略的新趨勢”，兩文都發表在《工作、社區和力量：1900—1925年歐洲和美國的勞工經驗》（Work，Community and Power），James E.Cronin和Carmen Sirianni編（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3）。工會數據來自Gary Marks，《政治中的工會：19世紀和20世紀初的英國、德國和美國》（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114頁：Horne，《戰爭期間的勞工》，附錄三。

[[554]](#_554_14)關于戰爭中的性別問題，請參閱Susan Pedersen，“大戰中英國的性別、福利和公民”，《美國歷史評論》95（1990）：983—1006頁：Margaret Randolph Higonnet等編，《界限背后：性別和兩次世界大戰》（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555]](#_555_14)Holmes，“戰爭與社會運動”，630頁。

[[556]](#_556_14)Julia Lathrop，“軍事和航海保險法案”，《國家》106（1918）：157—158頁。更籠統的內容請參閱Allen F.Davis，“福利、改革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季刊》19（1967）：516—533頁。

[[557]](#_557_14)R.H.Tawney，“1918—1921年經濟控制的廢除”，《歷史與社會：托尼文集》，J.M.Winter編（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136頁。

[[558]](#_558_14)《戰爭中的英國工業經驗》，第65屆國會第一次會議，參議院文件114（1918）：Howard L.Gray，《戰爭時代的工業控制：英國經驗》（New York: Macmillan, 1918）：Ordway Tead，“戰爭時期的美國勞工情況”，《世紀》95（1918）：354—359頁：Mary E.McDowell，“在牲畜圍場區”（In the Stockyards District），《美國社會學雜志》23（1917）：59—61頁。還可參閱Sidney Webb，“給美國人的英國經驗”，《大西洋月刊》120（1917）：14—21頁，1162—1166頁。

[[559]](#_559_14)關于戰爭期間住房項目，請參閱Roy Lubove，“家和‘幾棵恰到好處的果樹’：聯邦住房的直觀課”（Homes and ‘Few Well Placed Fruit Trees'），《社會研究》27（1960）：469—486頁：William J.O'Toole，“公共住房政策的原型：USHC”，《美國規劃師學會雜志》34（1968）：140—152頁。

[[560]](#_560_14)John Ihlder，“戰爭是如何來到切斯特的？”《調查》40（1918）：243—251頁。

[[561]](#_561_14)Mark Swenarton，《適合英雄的家：英國早期國家住房的政治和建筑》（London: Heinemann, 1981），第3章：Simon Peppers和 Mark Swenarton，“家園前線：1915—1918年軍需工人的花園郊區”（Home Front），《建筑評論》163（1978）：366—375頁：大不列顛軍需部，《軍需部的歷史》，第五卷，第五部分：《為軍需工人提供住房》（London, 1921）。

[[562]](#_562_14)Charles H.Whitaker，“被拒絕的石頭”，未出版的自傳性記錄，哥倫比亞大學艾弗里建筑和藝術圖書館：Ewart G.Culpin，“城市規劃原則在英國戰時緊急時期的顯著應用”，《美國建筑師協會雜志》5（1917）：157—159頁：“戰爭——機器——人!”同上，421—422頁。

[[563]](#_563_14)Frederick L.Ackerman，“英國為工人建造住房的項目的意義”，同上，540,539,563頁。

[[564]](#_564_14)Frederick L.Ackerman，“房屋是什么？第四”，《美國建筑師協會雜志》5（1917）：591—639頁：Frederick L.Ackerman, 1918年在紐瓦克的演講記錄，轉引自Randy Garber的未發表論文，“設計的政治”，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建筑學院。

[[565]](#_565_14)Charles H.Whitaker等，“房屋是什么？”《美國建筑師協會雜志》5（1917）：481—485,541—546,591—639頁：6（1918）：14—18,58—67頁。這些系列重印為Charles H.Whitaker，Frederick L.Ackerman，Richard S.Childs和Edith Elmer Wood，《戰爭與和平中的住房問題》（Washington，D.C.：American Institure of Architects, 1918）。還可參閱Sidney Webb，“醒來吧!美國建筑師!”《美國建筑師協會雜志》6（1918）：8—12頁。

[[566]](#_566_14)Whitaker等，《住房問題》，21頁。還可參閱Frederick L.Ackerman，“戰時住房：英國給美國人提供的最急需的公民課”，《美國城市》18（1918）：97—100頁：Richard S.Childs，“英國的新花園城市”，《瞭望》118（1918）：364—366頁。

[[567]](#_567_14)Edith Elmer Wood，“我的時代的住房”，第5頁，伊迪絲·伍德文件集，哥倫比亞大學艾弗里建筑和藝術圖書館。

[[568]](#_568_14)Richards S.Childs，“政府的模范村莊”，《調查》41（1919）：584—592頁：Frederick Law Olmsted，“美國住房公司的住房開發的教訓”，《勞工評論月刊》8（1919年5月）：27—38頁：美國勞工部，工業住房和交通局，《美國住房公司報告：戰時緊急建設（戰時工人住房）》，James Ford和Henry V.Hubbard編（Washington，D.C.，1919—1920）：美國航運委員會，緊急船運公司，客運和住房處，《為造船工人造房》（Philadelphia, 1920）。感謝Randy Garber首先提出設計的差別。

[[569]](#_569_14)George Edgar Vincent，“住房和重建”，全國住房協會，《美國住房問題：第七屆全國住房大會會議記錄》（Boston, 1918），43,47,49頁。

[[570]](#_570_14)轉引自Bentley B.Gilbert，《1914—1939年英國社會政策》（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第5頁。

[[571]](#_571_12)Paul Barton Johnson，《適合英雄的土地：1916—1919英國重建計劃》（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Philip Abrams，“1918—1920年社會改革的失敗”，《過去與現在》24（1963）：43—64頁。引用的段落來自Marwick，《大洪水》，240頁：Meyer Bloomfield，《管理和人：工業關系新進步的記錄》（New York: Century, 1919），303頁：William H.Dawson編，《戰后問題》（New York: Macmillan, 1917），第10頁。

[[572]](#_572_12)Arthur Gleason，《工人想要什么：英國勞工研究》（New York: Harcourt，Brace and Howe, 1920）：Horne，《戰爭中的勞工》，第7—8章：J.M.Winter，《社會主義與戰爭挑戰：1912—1918年英國的思想和政治》（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4），尤其是第134頁：G.D.H.Cole，《基爾特社會主義再論述》（London: Leonard Parsons, 1920）。

[[573]](#_573_12)《邁向新世界：英國工黨的重建綱領》（Towards a New World，Wyoming，N.Y.：W.R.Browne, 1918），尤其是第9章。

[[574]](#_574_12)同上，第9,11,27,31頁。

[[575]](#_575_12)“英國工黨重建的決議”，《調查》40（1918）：500—504頁。

[[576]](#_576_12)Tony Adams，“反思合作政黨的形成”，《國際社會史評論》32（1987）：48—68頁。

[[577]](#_577_12)Mary Heaton Vorse，《愚蠢的腳注：瑪麗·希頓·沃爾斯回憶》（New York: Farrar and Rinehart, 1935），170頁。

[[578]](#_578_12)Walter Weyl，“在國王的更衣室”，《新共和》19（1919）：389—393頁：“大不列顛全國工業會議”，美國勞工局《勞工評論月刊》8（1919）：1330—1334頁：Rodney Lowe，“英國共識的失敗：1919—1921年全國工業會議”，《歷史雜志》21（1978）：649—675頁。

[[579]](#_579_12)Swenarton，《適合英雄的家》，78頁。

[[580]](#_580_12)Arthur Greenwood，“英國的國有化運動”，《大西洋月刊》125（1920）：406—411頁。

[[581]](#_581_12)Armitage，《解除控制的政治》：Tawney，“經濟控制的廢除”：Rodney Lowe，“1914—1939年政府與工業關系”，《英國工業關系史》，Wrigley編。

[[582]](#_582_12)Dawson，《戰后問題》，第7頁：Lowe，“政府與工業關系”，193頁。

[[583]](#_583_12)J.A.Hobson，“英國工業中的代議管理”（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in British Industry），《新共和》12（1917）：130—132頁：“朝向工業民主”，同上，122頁：Ordway Tead，“工業的全國性組織：（一）英國”，同上，18（1919）：48—51頁：Bloomfield，《管理與人》：全國工業會議理事會，《美國工作委員會的經驗》，研究報告第50號（紐約，1922）：Montgomery，“工會斗爭中的新趨勢”，103—109頁。Whitley委員會報告被作為Bloomfield《管理與人》的附錄而重印。

[[584]](#_584_12)“勞工和新社會秩序”，《新共和》14（1918），第二部分，第2頁：“英國工黨重建的決議”，《調查》40（1918）：500—504頁：《調查》41（1918）：225頁：John M.Blum，《塔馬爾蒂和威爾遜時代》（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51），150頁：《伍德羅·威爾遜文件集》，Arthur S.Link編（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1994），第47卷，84,253—254頁：George E.Mowry，《加利福尼亞進步人士》（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1），297頁：更籠統的內容請參閱Stanley Shapiro，“大戰與改革：1917—1919年的自由主義者和勞工”，《勞工歷史》12（1971）：323—344頁。最后引用了《新政治家》，329頁注。

[[585]](#_585_12)Clayton，《被遺忘的進步人士》，118頁：Mowry，《加利福尼亞進步人士》，297頁。

[[586]](#_586_12)《新共和》17（1918）：60頁：《調查》41（1918）：183頁：Shapiro在“大戰與改革”中引用Durant的話，342頁。

[[587]](#_587_12)《伍德羅·威爾遜文件集》，第53卷，278,282,279頁。

[[588]](#_588_12)Stanley Shapiro，“改革的黃昏：停戰后的高級進步人士”，《歷史學家》33（1971）：349—364頁，尤其是351頁：Stanley Shapiro，“手和腦： 1920年的農工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1967年博士論文，42頁：美國國防委員會，重建研究司，《調整和重建信息，第二卷：美國的調整和重建活動》（Washington，D.C.，1920）：Lewis Mumford，《發現和收藏：自傳文集》（Findings and Keepings，紐約：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5），124頁：《新共和》，17（1918）：61頁。

[[589]](#_589_12)Arthur Gleason在1919年7月8日給 Paul U.Kellogg的信，調查協會文件集。該文件集是研究1919年進步人士行程的最好來源。還可參閱Mary McDowell，“‘莫因鳥而怕播種’：英國印象”（Fear Not to Sow Because of the Birds），《調查》41（1919）：779—780頁：全國公民聯盟，外國調查委員會第二份報告（New York: National Civic Federation, 1920）。

[[590]](#_590_12)“雇主研究歐洲勞工情況的政府委員會報告”，美國勞工統計局，《勞工評論月刊》8（1919）：1327—1328頁：全國公民聯盟，外國調查委員會，《英國和法國勞工情況》（New York: E.P.Dutton, 1919）：全國工業會議理事會，歐洲調查團，《英國、法國、意大利的勞工和工業問題》，特別報告第6號（Boston, 1919），395,18頁。

[[591]](#_591_12)“美國勞工政治”，《新共和》15（1918）：250頁。

[[592]](#_592_12)Arthur P.Kellogg，“社會機構應該為了重建團結起來嗎？”《調查》41（1918）：316頁：“全國天主教戰爭委員會社會重建項目”，美國勞工統計局，《勞工評論月刊》8（1919）：1594—1602頁：美國基督教會聯邦協會（Federal Council of the Churches of Christ），教會和社會服務委員會，《教會和社會重建》（New York, 1919）：Harry F.Ward，《新社會秩序：原則和項目》（New York: Macmillan, 1919）：“我們必須站穩立場”，《調查》41（1918）：266頁：Hiram Johnson，“新國會應該做什么？”《人人雜志》40（1919年3月）：28頁：更籠統的內容請參閱Estella T.Weeks，《重建項目》（New York: Woman's Press, 1919）。

[[593]](#_593_12)Blum，《塔馬爾蒂》，150,306—309頁：Robert Cuff，“哈里·加菲爾德，燃料管理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尋找合作的秩序”，《美國季刊》30（1978）：39—53頁：Albert S.Burleson，“為什么我們應該保持電報電話服務？”（Why W.Should Keep the Wires？），《論壇》61（1919）：152—161頁。

[[594]](#_594_12)Melvyn Dubofsky，“夭折的改革：1913—1920年威爾遜政府和組織起來的勞工”，《工作、社區和力量》，Cronin和Sirianni編。

[[595]](#_595_12)Harry W.Laidler，“華盛頓和即將到來的重建”，《院際社會主義者》7（1918年12月—1919年1月）：第9頁：類似的：“新國會應該做什么？”《人人雜志》40（1919年3月）：27頁以下：“和平之后——？”同上，（1919年5月），58頁以下：（1919年3月），56頁以下。

[[596]](#_596_12)Burl Noggle，《進入20年代：從停戰到常態的美國》（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4）。

[[597]](#_597_12)美國勞工統計局，《勞工評論月刊》9（1919）：1368—1372頁：John Brophy，《礦工的生活》（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4），第12—13章：Glenn E.Plumb和William G.Roylance，《工業民主：成效計劃》（New York: B.W.Huebsch, 1923）。

[[598]](#_598_12)美國勞工統計局，《勞工評論月刊》9（1919）：1342—1351頁：全國工業會議理事會，《工業會議的核心議題》，特別報告第5號（Boston, 1919）：工業會議，《初步聲明》（Washington D.C.，1919）：Haggai Hurvitz，“意識形態和工業沖突：1919年10月威爾遜總統的第一次工業會議”，《勞工歷史》18（1977）：509—524頁。

[[599]](#_599_12)工業會議，《報告》（Washington，D.C.，1920）。

[[600]](#_600_12)William L.Huggins，《勞工和民主》（New York: Macmillan, 1922），43頁。

[[601]](#_601_12)Allen M.Wakstein，“1919—1920年自由雇傭（Open-Shop）運動的起源”，《美國歷史雜志》51（1964）：460—475頁。

[[602]](#_602_12)勞合·喬治的話轉引自Lowe，“政府與工業關系”，79頁。

[[603]](#_603_12)紐約議會，調查煽動性活動的議會聯合委員會，《革命激進主義：其歷史、目的、策略，并討論為遏制它而正在采取的必要步驟》（Albany, 1920）： Shapiro，“手和腦”，135頁注：Thompson，《改革者與戰爭》，260頁。

[[604]](#_604_12)Ronald L.Numbers，《幾乎被說服：1912—1920年美國醫生和強制性健康保險》（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第7—8章：《參考資料》（For Your Information），美國勞工立法協會通函，1919年12月，美國勞工立法協會文件集，康奈爾大學：John B.Andrews，“序言”，《美國勞工立法評論》10（1920）：113頁。

[[605]](#_605_12)“英國和美國勞工”，《新共和》14（1918）：71頁。

[[606]](#_606_12)Marvin Swartz，《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政治中的民主控制聯盟（UDC）》（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1）：Alfred F.Havighurst，《激進的記者：H.W.馬辛厄姆》（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607]](#_607_12)Michael Wreszin，《O.G.維拉德：戰爭中的和平主義者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5）：Oswald Garrison Villard，《戰斗的歲月：一位自由派編輯的回憶》（New York: Harcourt, 1939），391頁。

[[608]](#_608_12)Paul U.Kellogg，“雙面刃：劍還是鏵頭”，《調查圖片》（Survey Graphic）29（1940）：242 頁以下：Paul U.Kellogg，“英國勞工的主動出擊”，《調查》39（1918）：585—588頁：Paul U.Kellogg，“美國勞工脫節”（American Labor Out of It），同上，617—626頁：Paul U.Kellogg在1918年3月11日給Felix Frankfurter的信，調查協會文件集：Ray Stannard Baker在1918年9月12日給Polk的信，雷·斯坦納德·貝克文件集，國會圖書館。

[[609]](#_609_12)Paul U.Kellogg，Samuel Gompers和William English Walling，《關于戰后英國工黨重建項目和斯德格爾摩會議的演講，在1918年3月16日紐約市全國公民聯盟會議上發表》（New York, 1918），第9頁：Paul U.Kellogg 1918年4月13日給Charles W.Eliot的信，調查協會文件集。

[[610]](#_610_12)Helen Hayes Gleason，“阿瑟·格里森禮贊”，《阿瑟·格里森的書》（The Book of Arthur Gleason，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29）： Arthur Gleason和Helen Hayes Gleason，《金色少年》（New York: Century, 1916）：Arthur Gleason，《大戰中我們的角色》（New York: Frederick A.Stokes, 1917）：Arthur Gleason，《英倫三島》（Inside the British Isles，New York: Century, 1917）。

[[611]](#_611_12)Gleason，《英倫三島》，17—18頁。

[[612]](#_612_12)Arthur Gleason和Paul U.Kellogg，“他們為之奮斗的英國”，《調查》41（1918）：243—249頁：Paul U.Kellogg和Arthur Gleason《英國勞工與戰爭：新世界的重建者》（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1919）。

[[613]](#_613_12)Arthur Gleason在1919年7月4日給Paul U.Kellogg的信，調查協會文件集。

[[614]](#_614_12)Gleason，《工人想要什么？》：Arthur Gleason在1919年7月7日給Paul U.Kellogg的信，調查協會文件集：Arthur Gleason在1919年5月17日給Bruno Lasker的信，同上。

[[615]](#_615_12)Ray Stannard Baker，“我在歐洲的使命，1918—1919年”，98,94頁，貝克文件集：Margaret T.Hodgen，《英國和美國的工人教育》（London: Kegan Paul，Trench，Trubner, 1925）。關于英國工黨的四大支柱，請參閱Paul Blanshard，《英國勞工運動概要》（New York: George H.Doran, 1923）：Sherwood Eddy《勞工新世界》（New York: George H.Doran, 1923）。

[[616]](#_616_12)Kellogg等，《英國工黨重建項目的演講》：《調查》39（1918）：688頁：Samuel Gompers，《七十年的生活和勞動：自傳》（New York: E.P.Doran, 1925），第二卷，406頁。

[[617]](#_617_12)W.A.Appleton，《我們想要什么，我們在哪里：事實而非詞匯》（New York: George H.Doran）：Kenneth E.Hendrickson，Jr.，“傾向戰爭的社會主義者、社會民主同盟和1917—1920年命運不濟的美國工業民主運動”，《勞工歷史》11（1970）：304—322頁：Kent Kreuter和 Gretchen Kreuter，《美國異議者：A.M.西蒙斯的生平》（Lexington: University of Kentucky Press, 1969）：Henry Pelling，《美國和英國左派：從布萊特到比萬》（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57），第7章，尤其是125—126頁。

[[618]](#_618_12)Frederic C. Howe，《改革者的自白》（New York: Scribner, 1925），第32章：Eugene M.Tobin，《組織起來或者消亡：1913—1933年美國的獨立進步人士》（Westport，Conn.：Greenwood, 1986），132頁。

[[619]](#_619_12)《阿瑟·格里森的書》：Arthur Gleason，“直接行動的隱含意義”，《自由人》1（1920年4月17日）：85—87頁：Arthur Gleason，《工人的教育：美國和外國的實驗》（New York: Bureau of Industrial Research, 1921）：Arthur Gleason，“工人的教育”，《新共和》26（1921）：236頁：Richard J.Altenbaugh，《斗爭教育：1920年代和1930年代美國勞工大學》（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0）。Gleason到1923年去世前還在為解決童工問題努力，在寫一本小說。

[[620]](#_620_12)Shapiro，“手和腦”，33頁。

[[621]](#_621_12)“革命還是重建？對美國人的召喚”，《調查》41（1919）：882頁：Shapiro，“改革的黃昏”，359頁。

[[622]](#_622_12)Charles Merz，“進來：工黨”（Enter： The Labor Party），《新共和》（1919）：54頁。

[[623]](#_623_12)Shapiro，“手和腦”：Tobin，《組織起來或者消亡》，第5章：Dudley Field Malone，“第三黨的誕生”，《自由人》1（1920）：467—468頁：Amos Pinchot，“靠回避來管理”（Government by Evasion），同上，1（1920）：538—541頁。

[[624]](#_642_12)Kenneth Campbell MacKay，《1924年的進步運動》（1947：重印本，New York: Octagon Books, 1972）。

[[625]](#_625_12)Harry W.Laidler，“戰時集體主義的崩潰”，《美國勞工年鑒，1919—1920年》（New York: Rand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 1920），26頁。

#### 第八章 農村的重建

[[626]](#_626_12)Gerold Ambrosius和William H.Hubbard，《20世紀歐洲社會和經濟史》（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表2.1：美國調查統計局，《美國歷史統計學：從殖民時期到1970年》（Washington，D.C.，1975），139頁。

[[627]](#_627_12)Kenneth Barkin，“歷史對比個案研究：德國和美國的民粹主義”，《美國歷史的狀態》，Herbert J.Bass編（Chicago，Quadrangle, 1970）：Peter Gourevitch，《艱難時代的政治：國際經濟危機之下的反應對比》（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

[[628]](#_628_12)B.R.Mitchell，《歐洲歷史統計學：1750—1975年》，第2版（New York: Facts and File, 1980），849,852頁：美國調查統計局，《美國歷史統計學》，232頁。

[[629]](#_629_12)日期不詳的自傳材料（c.1918），查爾斯·麥卡錫文件集，位于麥迪遜的威斯康星州歷史學會：Edward A.Fitzpatrick，《威斯康星的麥卡錫》（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4），Charles McCarthy在1909年2月24日給Walter Hines Page的信，麥卡錫文集。

[[630]](#_630_12)“麥卡錫博士是有思想的人、人類百科全書”，《星期天國家雜志》（Sunday State Journal），1912年12月8日，麥卡錫文件集中的剪報。

[[631]](#_631_12)Clarence Poe，《我的前八十年》（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3）：Joseph A.Coté，“克拉倫斯·坡：農民的聲音，1899—1964年”，《農業歷史》53（1979）：30—41頁。引語來自Clarence Poe，《一個南方人在歐洲：主要是一些適合新世界需要的舊世界教訓，在海外旅行的十四封信中闡述》（Raleigh，N.C.：Mutual Publishing Co.，1908），74頁。

[[632]](#_632_12)Clarence H.Poe，“南方的選舉權限制：起因和后果”：《北美評論》175（1902）：534—543頁：Poe，《南方人在歐洲》，78頁。

[[633]](#_633_12)Clarence Poe，《半個世界醒來的地方：日本、中國、菲律賓、印度的新與舊》（Garden City，N.Y.：Doubleday，Page, 1911）：Clarence Poe，《農民如何合作和獲得雙倍效益：美國和歐洲農業合作所有主要形式的第一手報告——通過已有和正在發生的實例來顯示農民如何合作的故事》（New York: Orange Judd, 1915）：Clarence Poe，“勞合·喬治的英國”，《世界工作》23（1912）：100—111頁。

[[634]](#_634_12)Kent Fedorowich，《不適合英雄：兩次世界大戰期間帝國的重建和士兵安置》（Manchester，Englan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635]](#_635_12)美國鄉村生活協會，《第一屆全國鄉村生活會議記錄》，1919年（Ithaca: American Country Life Association, 1919），20—21頁。

[[636]](#_636_12)Ellen Furlough，《法國消費者合作：1834—1930年消費的政治》（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尤其是24頁：Sidney Pollard，“十九世紀的合作：從社區建設到經營商店”，《勞工歷史文集》，Asa Briggs和John Saville編（London: Macmillan, 1960）。

[[637]](#_637_12)G.D.H.Cole，《合作的世紀》（Manchester，England: Cooperative Union, 1944），371—372,385頁：Marquis Childs，《瑞典：中間道路》（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6），16頁：Clark Kerr，“合作社評估”，《調查圖片》26（1937年3月）：140頁：George Sayers Bain和Robert Price，《工會發展概況：八國統計數據的對比》（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0），37頁。還可參閱P.H.J.H.Gosden，《自助：十九世紀的自發協會》（London: B.T.Batsford 1973）：Paul Johnson，《儲蓄與花費：1870—1939年英國工人階級經濟》（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5），第5章。

[[638]](#_638_12)《1900年巴黎世界博覽會美國總干事報告》，第55屆國會第二次會議，參議院文件232（1901），第五卷，651—652頁：Kerr，“合作社評估”：Henry W.Wolff，《人民銀行：社會和經濟成功的紀錄》（London: Longmans，Green, 1893），第3章：Brett Fairbairn，“生態學角度的歷史：蓋亞理論和世紀之交德國合作社問題”，《美國歷史評論》99（1994）：1203—1239頁，尤其是1234頁。

[[639]](#_639_12)Wolff，《人民銀行》：Harald Faber，《丹麥農業合作》（London: Longmans，Green, 1918），65,42頁。

[[640]](#_640_12)M.L.Darling，《德國、意大利、愛爾蘭合作社的一些方面》（Lahore，India, 1922），第6頁：Faber，《丹麥農業合作》：David Peal，“自助與國家：德意志帝國的農業合作社”，《中歐歷史》21（1988）：244—266頁：Charles McCarthy，“生活成本和對策”，1916年11月28日芝加哥城市俱樂部的演講，麥卡錫文件集。

[[641]](#_641_12)Cyril Ehrlich，“霍勒斯·普倫基特爵士與農業改革”，《愛爾蘭人口、經濟和社會》，J.M.Goldstrom L.A.Clarkson編（Oxford: Longmans，Green, 1981），272頁。

[[642]](#_642_13)Fairbairn，“生態學角度的歷史”：Furlough，《法國的消費者合作》。

[[643]](#_643_12)Eduard Bernstein，《進化社會主義：批評與肯定》（London: Independent Labor Party, 1909），187頁。

[[644]](#_644_12)Fairbairn，“生態學角度的歷史”，1219頁。

[[645]](#_645_12)Furlough，《法國的消費合作》，96,88頁：Johnson，《儲蓄與花費》，129頁。

[[646]](#_646_12)Dana Frank，《購買力：消費者組織、性別和1919—1929年西雅圖勞工運動》（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Joseph G.Knapp，《1620—1920年美國合作企業的興起》（Danville，Ill.：Interstate Printers and Publishers, 1969）。

[[647]](#_647_12)國際合作聯盟，《國際合作年鑒》，第二年，（Londo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 1913），133—134頁：Edson L.Whitney，“美國和外國的信用合作社（信用聯盟）”，美國勞工統計局《公報》314期（1922）：Myron T.Herrick和 R.Ingalls，《如何給農民融資：私人企業——而非國家資助》（Cleveland: Ohio State Committee on Rural Credits and Cooperation, 1915）：Shelly Tenenbaum，《社區信用：1880—1945年美國的猶太人借貸協會》（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另一方面，城市建筑和借貸協會在美國興起，1914年有280萬會員。

[[648]](#_648_12)R.H.Elsworth，“農業合作社，營銷和采購，1925年”，美國農業部，《技術公報》（Technical Bulletin）第40期（1928）：Lewis C. Gray，《農業經濟介紹》（New York: Macmillan, 1924），第26章：Henry C. Taylor，《農業經濟概要》（New York: Macmillan, 1925），第34章：E.C. Branson，“北卡羅萊納的合作信用社”，《南方工人》49（1920）：461—473頁。對于德國的估計來自Peter Stearns，《動蕩的歐洲社會：1800年來的社會歷史》（New York: Macmillan, 1967），232頁。

[[649]](#_649_12)普倫基特與美國人的接觸可以從他的日記和通信中追溯，見于普倫基特文件集，英國牛津普倫基特合作研究基金會。關于華萊士的聯系，可參閱Russell Lord，《衣阿華的華萊士》（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47）。對于19世紀末期愛爾蘭農村貧困問題，請參閱W.T.Ellis，《歐洲一百天夏日旅行》（Owensboro，Ky.：Inquirer Publishing Co.，1885），第9頁：關于Lippmann，請參閱John Morton Blum編，《公共哲學家：沃爾特·李普曼書信選》（New York: Ticknor and Fields, 1985），15—16頁。

[[650]](#_650_12)Trevor West，《霍勒斯·普倫基特，合作和政治：愛爾蘭傳記》（Washington，D.C.：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 1986）：Ehrlich，“霍勒斯·普倫基特爵士和農業改革”。

[[651]](#_651_12)Cormac 􀆕 Grada，“1880—1914年愛爾蘭乳品廠體系的開始”，《經濟史評論》30（1977），284—305頁：Patrick Bolger，《愛爾蘭合作社運動：歷史和發展》（Dublin: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1977）。關于愛爾蘭的信用合作社，請參閱Timothy W.Guinnane，“文化與合作：19世紀末期德國信用合作社”，未發表的論文，在1994年9月30日普林斯頓大學歷史學Davis討論會上提交。

[[652]](#_652_12)Horace Plunkett，《新世紀的愛爾蘭》（1904，Dublin: Irish Academic Press, 1982）：George W.Russell（AE），《國民存在：愛爾蘭政治的一些思考》（The National Being），普及版（Dublin: Maunsel, 1918）：George W.Russell（AE），《合作和國民性：從這一代到下一代的農村改革者指南》（Dublin: Maunsel, 1912）。引語來自Horace Plunkett，“農村條件的改善”，《南方工人》 37（1908）：80頁：Plunkett，《新世紀的愛爾蘭》，62頁。

[[653]](#_653_12)Horace Plunkett 在1909年12月21日的日記，普倫基特文件集。

[[654]](#_654_12)美國鄉村生活委員會，《報告》，第60屆國會第二次會議，參議院文件705（1909），尤其是第17,50頁：Liberty Hyde Bailey，《美國鄉村生活運動》（1911：New York: Macmillan, 1920），97頁。

[[655]](#_655_12)Kenyon L.Butterfield，《農村進步的章節》（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08）：John M.Gillette，《建設性的農村社會學》（New York: Sturgis and Walton, 1913）：Carl C. Taylor，《農村社會學：農村問題研究》（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26）：Edmund de S.Brunner等，《美國農業村莊》（New York: George H.Doran, 1927）：Charles J.Galpin，《徜徉到農業社會學中》（My Drift into Rural Social Problems，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38）。關于鄉村生活運動的批評性描述，請參閱David B.Danbom，《遭到抗拒的革命：1900—1930年都市美國和農業的工業化》（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9）：Mary Neth，《保存家庭農場：1900—1940年女性、社區和中西部的農業基礎》（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656]](#_656_12)Horace Plunkett，《美國的農村生活問題：一位愛爾蘭觀察家的札記》（New York: Macmillan, 1910）：《營銷和農業信用：1916年全國營銷和農業信用會議第三屆年會宣讀論文集》（Madison，Wis.：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rketing and Farm Credits, 1916），17頁：Horace Plunkett在1913年3月2日的日記，普倫基特文件集：Charles McCarthy在1913年4月11日給Gifford Pinchot的信，普倫基特文件集：關于美國農業組織協會，請參閱Charles A.Lyman，“一個美國人對于愛爾蘭農業合作的預測”，《更好的生意：農業和工業合作季刊》（Better Business, 1916年1月）：121—131頁。

[[657]](#_657_12)Olivia Rossetti Agresti，《戴維·魯賓：現實理想主義的研究》（Boston: Little，Brown, 1922）：Harris Weinstock，《關于勞工法律和與罷工和停工有關的外國勞工狀況的報告》（Sacramento, 1910）：Grace Larsen，“農業中的進步人士：哈里斯·韋恩斯托克”，《農業歷史》32（1958）：187—193頁。

[[658]](#_658_12)David Lubin，《修改歐洲信用合作體制以滿足美國農民的需要》，第62屆國會第二次會議，參議院文件855（1919），尤其是第4,6頁。David Lubin，《“走出陳規”：歐洲農村合作信用體制》，第62屆國會第三次會議，參議院文件966（1912）：David Lubin，《農村“土地抵押信用合作”體制》，第63屆國會第一次會議，參議院文件123（1913）。

[[659]](#_659_12)南方商業大會，《研究合作體制在歐洲國家農業生產、分配和金融中之應用的美國委員會》，第62屆國會第三次會議，參議院文件1071（1913）：《歐洲的農業合作和農村信用：信息和證據》，第63屆國會第一次會議，參議院文件214（1913）：David Lubin，演講：《F.W.賴夫艾森》，第63屆國會第一次會議，參議院文件114（1913）。引語來自Ralph Metcalf和Clark G.Black，《歐洲的農村信用合作和農業組織》（Olympia，Wash.，1915），第8章。

[[660]](#_660_12)Myron T.Herrick，《歐洲土地和農業信用的初步報告》，第62屆國會第三次會議，參議院文件967（1912）：Thomas Nixon Carver，《無計劃生活的回憶》（Los Angeles，Ritchie, 1949），第16章。

[[661]](#_661_12)George W.Russell（AE），《對美國農業調查委員會的演講：農村社區》（Dublin, 1913）：Horace Plunkett在1913年2月26日給 Gifford Pinchot的信，和Horace Plunkett 在1913年12月7日的日記，普倫基特文件集：Horace Plunkett在1913年7月16日給Gifford Pinchot的信，麥卡錫文件集。

[[662]](#_662_12)《歐洲的農業合作和農村信用》，第一部分，第9,18,10頁。

[[663]](#_663_12)同上，第二部分，第8—9頁。對于那些有此思想的人來說，答案是直接的：授權商業銀行為農村土地長期貸款的機制。例如，請參閱Duncan U.Fletcher，“全國農業銀行體系”（A National Rural Banking System），第63屆國會第一次會議，參議院文件158（1913）。

[[664]](#_664_12)美國國會，《農村信用：參議院和眾議院銀行和貨幣委員會負責調查農村信用的下屬委員會聯合聽證會》，第63屆國會第二次會議（1914）：Knapp，《美國合作企業的興起》，第7章。

[[665]](#_665_12)美國國會，參議院銀行貨幣委員會，《農村信用：參議院2986號議案附帶報告》，第64屆國會第一次會議，參議院報告144（1916）：Herbert Quick，“農村信用射擊隊”（The Rural Credit Firing Squad），《周六晚郵報》，188（1916年4月25日），29頁以下。法案的文本重印在A.C. Wiprud，《運行中的聯邦農業貸款體系》（New York: Harpers and Brothers, 1921），111—182頁。

[[666]](#_666_12)Grant S.Youman，“農村信用”，第64屆國會第一次會議，參議院文件349（1916）：Wiprud，《聯邦農業貸款體系》：Earl S.Sparks，《美國農業信用的歷史和理論》（New York: Thomas Y.Crowell, 1932）。

[[667]](#_667_12)Faber，《丹麥農業合作》，84頁。

[[668]](#_668_12)Morton Keller，《管理新經濟：1900—1933年美國的公共政策和經濟變化》（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154頁：John Hanna，“合作社和公眾”，《密歇根法學評論》29（1930）：148—190頁：David E.Hamilton，《從新時代到新政：1928—1933年從胡佛到羅斯福的美國農業政策》（From New Day to New Deal，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1）。

[[669]](#_669_12)Aaron Sapiro，“加利福尼亞合作社原則”（1921），《20世紀農業思想》，George McGovern編（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67），94—103頁：E.C. Lindeman，“引人注目的薩皮羅”，《新共和》50（1927）：216—219頁：R.H.Elsworth，“農業合作社，營銷和采購，1925年”，美國農業部《技術公報》第4期（1928）：R.H.Elsworth，“合作營銷和采購，1920—1930年”，美國農業部《通告》（Circular）第121期（1930）。

[[670]](#_670_12)G.Harold Powell，《農業中的合作》（New York: Macmillan, 1913）：《歐洲農業合作和農村信用》第一部分：《市場和農業信用》（1915），25—39頁。

[[671]](#_671_12)Elsworth，“農業合作社”：Elsworth，“合作營銷和采購”。

[[672]](#_672_12)Walter A.Terpenning，《村莊和鄉間地區》（Village and Open-Country Neighborhoods，New York: Century, 1931）。

[[673]](#_673_12)Neth，《保存家庭農場》，尤其是第2章。

[[674]](#_674_12)Lee Meriwether，《流浪旅行：如何每天只花五毛錢游覽歐洲》（1893，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03），138頁。

[[675]](#_675_12)Frederic C. Howe，《土地與士兵》（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19），17頁：E.C. Branson，《海外農場生活：德國、丹麥、法國的實地來信》（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24），44—45,10—11頁。

[[676]](#_676_12)Robert Kluger，“艾爾伍德·米德：灌溉工程師和社會規劃者”，亞利桑那大學1970年博士論文：Paul K.Conkin，“艾爾伍德·米德的視野”，《農業歷史》34（1960）：88—97頁：Elwood Mead，《灌溉機制：西部灌溉農業發展產生的經濟和法律問題討論》（New York: Macmillan, 1903）。關于更籠統的水政治問題，請參閱Donald J.Pisani，“進步時代的開墾和社會工程”，《農業歷史》57（1983）：47—63頁：Donald Worster，《帝國的河流：水、干旱和美國西部的發展》（New York: Pantheon, 1985）。

[[677]](#_677_12)Bruce R.Davidson，《澳大利亞的歐洲人農業：澳大利亞農業的經濟史》（Amsterdam: Elsevier, 1981）：Gordon Taylor，“在維多利亞更密集定居”，《經濟紀錄》12（1936）：57—70頁：Francis G.Castles，《工人階級與福利：1890—1980年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福利國家政治發展的反思》（Wellington: Allen and Unwin, 1985）。

[[678]](#_678_12)Elwood Mead，《幫助人們擁有農場：土地墾殖方面政府資助的現實討論》（New York: Macmillan, 1920），第3—6章：美國國會，參議院灌溉和開墾委員會，《創建有組織的農業社區，以展示開墾方法和有計劃農業發展的好處：參議院2015號議案聽證會》，第70屆國會第一次會議，1928年，3—23頁：Elwood Mead，“土地墾殖的政府指導”，《美國經濟評論》第8號增刊（1918），89—94頁。

[[679]](#_679_12)Elwood Mead，“征服干旱的澳大利亞”，無出版日期，艾爾伍德·米德文件集，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班克羅夫特圖書館：Elwood Mead，“灌溉的澳大利亞”，無出版日期，艾爾伍德·米德文件集：Elwood Mead，“意大利北部的灌溉，第一部分”，美國農業部試點辦公室（Office of Experiment Stations），《公報》144期（1904）：加利福尼亞土地殖民和農村信用委員會，《報告》（Sacramento, 1916），63,71—72頁：Rudolf Lerch，“德國的國內殖民：農村土地利用的問題”，《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150（1930）：273—287頁。

[[680]](#_680_12)Elwood Mead，“澳大利亞的灌溉”，《獨立》96（1910）：762頁：Elwood Mead，“我們的政府應該是什么，應該怎么做”，《大都會雜志》（1917），米德文件集中的影印本。

[[681]](#_681_12)Richard T.Ely，“土地的私人殖民”，《美國經濟評論》8（1918）：522—548頁：“加利福尼亞的土地墾殖”，加利福尼亞聯邦俱樂部（Commonwealth Club），《會刊》11，（1916年第8期）：“1917年土地定居法案”，同上，12，（1917年第1期）：1—66頁：加利福尼亞土地殖民委員會《報告》。

[[682]](#_682_12)米德，《幫助人們擁有土地》，加利福尼亞州土地墾殖委員會（Land Settlement Board）《報告》，1920年9月30日：加利福尼亞公共土地局，土地墾殖處，《德爾亥墾殖區的未來定居者必讀》（無出版地和日期）：Vernon M.Cady，“土地墾殖的西部實驗”，《調查》40（1918）：684—687頁。也有為米德希望吸引來的農場雇傭工人安排的更小地塊，一到兩英畝的房屋和花園配額。

[[683]](#_683_12)Elwood Mead，“社區農業”，《新共和》41（1925）：327—332頁：Valerie J.Matsumoto，《在家門口種地：1919—1982年加利福尼亞的日裔美國社區》（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684]](#_684_12)Elwood Mead，“農場生活的社會需要”，1920年在舊金山發表的演講，米德文件集：“加州的日本人土地問題”，《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93（1921年1月）：51—55頁。土地墾殖處秘書1922年6月24日給L.W.Manson的信，米德文件集：Mead在1922年2月8日給Winfred Stein的信，米德文件集：Elwood Mead，“新計劃的農場定居”，《美國評論之評論》59（1919）：271—272頁：Mead，《幫助人們擁有農場》，141,197頁。

[[685]](#_685_12)Bill G.Reid，“富蘭克林·萊恩關于老兵殖民的想法，1918—1921年”，《太平洋歷史評論》33（1964）：447—461頁：Keith W.Olson，《進步人士的傳記：富蘭克林·萊恩（1864—1921）》（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 1979）：Alvin Johnson，“為復原士兵提供土地”，《新共和》16（1918）：218—220頁：Howe，《土地與士兵》。

[[686]](#_686_12)Bill G.Reid，“農民反對萊恩1918—1921年士兵定居建議”，《農業歷史》41（1967）：167—179頁。

[[687]](#_687_12)加利福尼亞農業局，土地墾殖處，《最終報告》，1931年6月30日。

[[688]](#_688_12)Charles S.Bird 在1920年4月14日給Lawrence Veiller的信：《美國農場城市公司：第1期——1921年4月》，兩資料都在康奈爾大學約翰·諾倫文件集“農場城市”檔案里：Alvin Johnson，《開拓者的歷程：自傳》（Pioneer's Progress，紐約：維京出版社1952），289—304頁：Paul K.Conkin，《明天是個新世界：新政社區項目》（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9），第12章。

[[689]](#_689_12)美國國會，參議院灌溉和開墾委員會，《創建有組織的農業社區，以展示開墾方法和有計劃農業發展的好處：參議院2015號議案聽證會》，第70屆國會第一次會議，1928年：美國國會，參議院灌溉和開墾委員會，《創建有組織的農業社區，以展示有計劃墾殖的好處：參議院412號議案聽證會》，第71屆國會第一次會議，1929年，尤其是第3章：南方開墾大會，《會議記錄》，第70屆國會第一次會議，參議院文件45（1928）。

[[690]](#_690_12)引用的詞語來自Bailey，《鄉村生活運動》，97頁。

[[691]](#_691_12)Russell，《合作和國民性》，第6頁。

[[692]](#_692_12)Charles L.Lewis，《克拉克斯頓：公共教育的斗士》（Philander Priestley Claxton，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48）：Booker T.Washington，《最底層者：歐洲觀察和學習記錄》（Garden City，N.Y.：Doubleday，Page, 1912），第17章：教育旅游協會，《1914年歐洲公民和社會旅行》（New York, 1914），諾倫文件集中的影印本。

[[693]](#_693_12)Frederic C. Howe，《丹麥：合作的社會》（Denmark： A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紐約：Harcourt，Brace, 1921），尤其是第viiii,iii頁：Josephine Goldmark，《丹麥的民主》（Washington，D.C.：National Home Library Foundation, 1936）：William E.Leuchtenburg，《富蘭克林·羅斯福和1932—1940年的新政》（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3），345頁：Thomas H.Eliot，《新政回憶：當人民重要時》（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2），27頁：Edgar W.Knight，《在丹麥人中間》（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27），viii頁。

[[694]](#_694_12)Branson，《海外農場生活》，154頁。

[[695]](#_695_12)Henry Goddard Leach，“現在可以講了”，《美國—斯堪的那維亞評論》12（1924）：99—107頁：Anthony M.Platt，《反思富蘭克林·弗雷澤》（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1），56頁。

[[696]](#_696_12)Branson，《海外農場生活》，113頁：Hugh MacRae在1924年1月9日 給John Nolen的信，諾倫文件集：Platt，《反思富蘭克林·弗雷澤》，56—59頁。

[[697]](#_697_12)Howe，《丹麥》，第13章：W.Glyn Jones，《丹麥》（New York: Praeger, 1970），134—135頁：K.J.Kristensen，“丹麥農村土地使用中的公共指導”，《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150（1930）：230—237頁：美國調查統計局，《美國歷史統計數據》，465頁。

[[698]](#_698_12)Branson，《海外農場生活》，108頁。

[[699]](#_699_12)Harold W.Foght，《丹麥農村及其學校》（New York: Macmillan, 1915）：Olive Dame Campbell，《丹麥民俗學校：它對丹麥和北方生活的影響》（New York: Macmillan, 1928）。

[[700]](#_700_12)L.L.Friend，“丹麥民俗中學”，美國教育局《公報》第5期（1914）：Harold W.Foght，“丹麥民俗中學”，同上，第22期（1914）：Matin Hegland，“丹麥人的中學”，同上，第45期（1915）：Booker T.Washington，《我的更大教育》（My Larger Education，Garden City，N.Y.：Doubleday，Page, 1911），第11章：Gertrude Austin，“丹麥成人學校”，《南方工人》51（1911）：624—635頁：E.Franklin Frazier，“洛斯基爾德的民俗中學”和“美國的丹麥人民中學”（Danish People's High Schools in America），同上，51（1922）：325—328,425—430頁。

[[701]](#_701_12)Joseph K.Hart，《來自北方之光：丹麥民俗中學和它對美國的意義》（New York: Henry Holt, 1927）。

[[702]](#_702_12)Frederic C. Howe，“威斯康星民俗中學”，《學校生活》23（1937年9月）：26—27頁：約翰·R.巴頓文件集，位于麥迪遜的威斯康星歷史學會。

[[703]](#_703_12)Henry D.Sharpiro，《我們心中的阿巴拉契亞：1870—1920年美國人意識中的南方山區和山里人》（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8）：David E.Whisnant，《一切土著淳樸與善良：美國一個地區的文化政治》（All That Is Native and Fine，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3）。

[[704]](#_704_12)John C. Campbell，《南方山民及其家園》（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21）。引語來自Sharpiro，《我們心中的阿巴拉契亞》，239頁。

[[705]](#_705_10)Whisnant，《一切土著淳樸與善良》，第2章：Olive D.Campbell，“成人教育作為讓美國農村生活充滿活力和豐富多彩的手段”和“對于農村工業化轉變的適應，特別考察山區”，全國教育協會《會議記錄》67（1929）：301—304,484—488頁：Olive Dame Campbell，“我在犁后唱歌”，《成人教育雜志》2（1930）：248—259，尤其是253頁。關于松山定居點，請參閱Whisnant，《一切土著淳樸與善良》，123頁。

[[706]](#_706_8)John M.Glen，《高地人：1932—1962年不尋常的學校》（Lexington: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88）：Myles Horton，Judith Kohl和Herbert Kohl《長途：自傳》（The Long Haul，New York: Doubleday, 1990）：1959年對于邁爾斯·霍頓非正式的采訪，高地研究和教育中心文件集，位于麥迪遜的威斯康星歷史學會，特別是第6—8頁。

[[707]](#_707_8)Myles Horton，“丹麥筆記”，高地人（Highlander）文件集。

[[708]](#_708_8)“高地人民俗學校現在的活動和計劃”（1933）：“暑期學校報告和其他教育活動報告總結”，1933年9月—1934年：“社區和學校活動報告，1933年 3月/4月—1934年”：Lilian W.Johnson，“美國合作運動的開端”，打印稿，沒有日期，所有這些都是在高地人文件集中。

[[709]](#_709_8)“1936年度報告”，高地人文件集：Myles Horton，“洛斯基爾德工人學校，加默爾高（Gammelgaard）校長，11/23/31”，高地人文件集：Myles Horton，“高地人民俗學校”，《社會邊疆》（The Social Frontier）2（1936年1月）：117—118頁：Myles Horton，“山里人”，高地人文件集。

[[710]](#_710_8)Olive Campbell 在1933年4月6日給Myles Horton的信，高地人文件集。

[[711]](#_711_8)Myles Horton，未注明日期的片段，高地人文件集。

[[712]](#_712_8)Russell，《國民存在》，24頁。

#### 第九章 機器時代

[[713]](#_713_8)Arthur S.Link編，《伍德羅·威爾遜文件集》（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1994），第63卷，469頁。

[[714]](#_714_8)Walter Trattner，《霍默·福克斯：社會福利的先行者》（Homer Folk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8），第10章。

[[715]](#_715_8)Ruth Gaines，《庇卡底的村莊》（New York: E.P.Dutton, 1918）：Ruth Gaines，《援助法國：紅十字在遭受破壞的地區》（New York: E.P.Duton, 1919）：Ruth Gaines，《格勒孔的女士：索姆區的史密斯學院救護隊》（New York: E.P.Dutton, 1920）：Beulah E.Kennard，“在法國的美國游戲”，《調查》44（1920）：482—484頁。

[[716]](#_716_8)George B.Ford，《走出廢墟》（New York： Century, 1919）：George B.Ford，“戰爭瘡痍中法國的市政進步”，《調查》46（1921）：173—180頁：William L.Chenery，“殉難的蘭斯的美國重建者”，《紐約時報書評和雜志》，1920年7月11日，第5頁以下：“蘭斯的美國工程”，《都市規劃》（Der Städtebau） 28（1921）：21頁和圖表9—10。

[[717]](#_717_8)William C. Dreher，“德國來信”，《大西洋月刊》 89（1902）：401頁：Frank Costigliola，《尷尬的統治：1919—1933年美國與歐洲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關系》（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第5—6章。

[[718]](#_718_8)Bruno Lasker，“柏林快照”，《調查》46（1921）：647—648頁：Lothrop Stoddard，“柏林和維也納：相似與不同”，《斯克里布納雜志》74（1923）：651—655頁：Matthew Josephson，《在超現實主義者中的生活：回憶錄》（New York: Holt，Rinehart,and Winston, 1962），194頁：Robert S.Lynd，“Papier Geld”，《調查》51（1923）：138—141頁。

[[719]](#_719_8)Joseph Wood Krutch，“柏林美國化”，《國家》126（1928）：565頁。

[[720]](#_720_8)Charles A.Beard，“美國對歐洲的侵略”，《哈珀斯雜志》158（1929）：471頁：Ellen Furlough，“在兩次戰爭之間的法國銷售美國方式：一價商店和家用工藝展覽會”（Prix Uniques and the Salons des Arts Ménagers），《社會史雜志》26（1993）：491—519頁：Costigliola，《尷尬的統治》，176頁。

[[721]](#_721_8)Beard，“美國對歐洲的侵略”，472,478頁：Mary Nolan，《現代化視野：美國企業和德國的現代化》（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第3章：Victoria de Grazia，“例外證明了規則：兩次戰爭之間歐洲社會策略重鑄中的美國范例”，《為什么美國沒有社會主義？》，Jean Heffer和Jeanine Rovet編（Paris：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89）：Otto T.Mallery，“維也納社會進步會議筆記”，《美國勞工立法評論》17（1927）：278—283頁。

[[722]](#_722_8)Earl R.Beck，《德國重新發現美國》（Tallahasse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8），17頁：Gustav Stolper，Karl Hauser和Knut Borchardt，《德國經濟：1870年到現在》（New York: Harcourt，Brace,and World, 1967），97頁：André Siegfried，《成年的美國：法國分析》（America Coming of Age，New York: Harcourt，Brace, 1927）：《城鎮、都市和區域的規劃問題：城市和區域規劃國際會議文件和討論，1925年紐約市》（Baltimore, 1925）：Nolan，《現代化視野》，第2章。

[[723]](#_723_8)Peter R.Shergold，《工人階級生活：1899—1913年對比視角下的“美國標準”》（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82）：Arthur Feiler，《德國人眼中的美國》（New York: New Republic, 1928），88—89頁。胡佛的話引自William E.Leuchtenburg，《羅斯福時代：論羅斯福及其遺產》（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284頁，著重號為后加。德國工會代表團提出的工資差別更高，為4：1。Nolan，《現代化視野》，66—67頁。

[[724]](#_724_8)Detlev J.Peukert，《魏瑪共和國：經典現代性的危機》（London: Allen Lane, 1991），174頁：Gerold Ambrosius和William H.Hubbard，《20世紀歐洲社會和經濟史》（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表3.10： I.M.Rubinow，《尋求保障》（New York: Henry Holt, 1934），318頁。

[[725]](#_725_8)H.W.Massingham，“美國印象”（1919），《馬辛厄姆文選》，H.J.Massingham編（London: Jonathan Cape, 1925），298頁：Feiler，《德國人眼中的美國》，23,32頁：Alfred Agache，“美國的城市規劃”，《城市規劃》6（1930）：266頁：Erich Mendelsohn，《美國：建筑師的圖畫書》（Bilderbuch eines Architekten，Berlin: Mosse, 1926），第vi頁：C. B.Purdom，“紐約國際會議”，《花園城市和城鎮規劃》15（1925年8月）：197—198頁：Walter Curt Behrendt，《美國的城市規劃和房屋建筑：考察報告》（Berlin: Guido Hackebeil, 1927），16頁。

[[726]](#_726_8)Nolan，《現代化視野》，110頁。

[[727]](#_727_8)Siegfried，《成年的美國》：Georges Duhamel，《美國威脅：未來生活的場景》（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31）：Lujo Brentano，“美國—歐洲”，《社會》3（1926）：193—121頁。

[[728]](#_728_8)Patty Lee Parmalee，《布萊希特的美國》（Columbus，Ohio: Miami University Press, 1981）。

[[729]](#_729_8)Sisley Huddleston，“美國的新工業原則”，《新政治家》34（1929）：385—386頁。

[[730]](#_730_8)Philip Kerr，“我們能向美國學習嗎？”《國家和雅典娜神殿》（Nation and Athenaeum，London）40（1926）：76—77頁。

[[731]](#_731_8)Nolan，《現代化視野》第一部分：Costigliola，《尷尬的統治》，179—180頁。

[[732]](#_732_8)Reyner Banham，《具體的亞特蘭蒂斯：美國工業建筑和歐洲現代建筑，1900—1925年》（Cambridge: MIT Press, 1986）：Le Corbusier，《走向新建筑》（London: John Rodker, 1931），21—31頁：Bruno Taut，《現代建筑》（London: Studio, 1930）：Mendelsohn，《美國》，36—43頁：Erich Mendelsohn，《建筑師的書信》（Briefe eines Architekten，Munich: Prestel, 1961），67頁。

[[733]](#_733_8)Taut，《現代建筑》，211頁。

[[734]](#_734_8)Joseph A.McCartin，“‘美國人的感受’：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工人、管理者和關于工業民主的斗爭”，《美國的工業民主：模糊的諾言》，Nelson Lichtenstein和Howell John Harris編（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全國工業會議理事會，《美國工人協會的成長》，特別報告第32號（紐約：1925），第5頁。

[[735]](#_735_8)Irving Bernstein，《不景氣的時代：1920—1933年美國工人歷史》（1960，Baltimore: Penguin, 1966），156—174頁：John R.Commons，《工業政府》（New York: Macmillan, 1921），第2章。

[[736]](#_736_8)Daniel Nelson，《失業保險：1915—1935年的美國經驗》（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9），57—58,79—103頁：Paul H.Douglas，“美國的失業保險計劃”，《調查》65（1931）：484—486頁。

[[737]](#_737_8)當時估計1928年公司群體人壽保險計劃覆蓋的人數達580萬人，1929年的公司退休金計劃覆蓋375萬人，1933年公司事故和健康保險計劃覆蓋120萬人，1928年公司提供的失業補償計劃覆蓋人數不超過1.1萬人。1929年國家的非農業非政府在冊雇工人數達到2820萬人。Berstein，《不景氣的時代》，181,184頁：全國工業會議理事會，《群體保險最近的發展》（New York：1934），25頁：美國調查統計局，《美國歷史統計數據：從殖民時期到1970年》（Washington，D.C.，1975），137頁。

[[738]](#_738_8)William J.Barber，《從新時代到新政：胡佛和1921—1933年美國的經濟政策》（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Ellis Hawley編，《商務部長胡佛：新時代思想和行為研究》（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81）。

[[739]](#_739_8)Clarence Darrow，“戰前激進分子在哪里？”《調查》55（1926）：566頁：William L.Chenery，“華盛頓的失業問題”，同上，47（1921）：42頁。

[[740]](#_740_8)W.L.Chenery，“會議劇場”（The Cinema of Conferences），《調查》43（1919）：242頁：Abraham Epstein，“海外發現簡要報告”（1925），艾普斯坦文件集，康奈爾大學紐約州工業和勞工關系學院：Lincoln Steffens，“歐洲如何能幫助美國”，《世紀》106（1923）：535頁：1929年1月7日Paul Kellogg給 Charles Renold的信，明尼蘇達大學社會福利歷史檔案調查協會文件集。

[[741]](#_741_8)這些最容易從廣告中和1929年創辦的《調查》固定欄目“旅行札記”中查到。關于《調查》自己的旅行部的創立，請參閱《調查圖片》22（1933）：241頁。

[[742]](#_742_8)Hanns Gramm，《1931—1953年的奧伯蘭德基金會》（The Oberlaender Trust，Philadelphia： Carl Schurz Memorial Foundation, 1956）：奧伯蘭德基金會檔案，康奈爾大學約翰·諾倫文件集。

[[743]](#_743_8)Lewis Feuer，“1917—1932年前往蘇聯的美國旅游者：新政意識形態一種成分的形成”，《美國季刊》14（1962）：119—149頁，尤其是128頁：Christopher Lasch，《美國自由派和俄國革命》（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Peter G.Filene，《美國人和1917—1933年的蘇聯實驗》（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美國俄羅斯研究會（American Russian Institute），《你對俄羅斯感興趣嗎？》（New York： n.d.），諾倫文件集中的影印本。

[[744]](#_744_8)Colin G.Pooley編，《1880—1930年歐洲的住房策略》（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2），248,245,82頁：美國調查統計局，《歷史統計數據》，640頁。

[[745]](#_745_8)Robert G.Barrows，“超越廉價公寓：1870—1930年美國都市住房模式”，《城市歷史雜志》9（1983）：409,416頁。

[[746]](#_746_8)Kenneth T.Jackson，《草坪邊疆：美國的郊區化》（The Crabgrass Frontier，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173頁：Gail Radford，《美國現代住房：新政時期的政策斗爭》（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51—53,20—26頁：《財富，美國住房》（Fortune，Housing America，New York: Harcourt，Brace, 1932）的編輯，23頁：《關于家庭建筑和房屋所有權的總統會議》，第四卷：《住房所有權、收入和住所類別》（Washington，D.C.，1932），70—73頁。

[[747]](#_747_8)Pooley，《歐洲住房策略》，82頁：Dan P.Silverman，“無法兌現的諾言：魏瑪德國的住房危機”，《中歐歷史》3（1970）：112—139頁：Catherine Bauer，《現代住房》（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34），127—128頁。

[[748]](#_748_8)John Burnett，《1815—1970年住房社會史》（Newton Abbot，England: David and Charles, 1978），第8章：倫敦市議會住房和公共衛生委員會，《倫敦住房》（London, 1937），154—167頁：E.D.Simon和 J.Inman，《曼徹斯特重建》（London: Longmans，Green, 1935）：Lewis Mumford，“英國的兩百萬新房屋”，《財富》6（1932年11月）：32,33頁。

[[749]](#_749_8)Elizabeth Denby，《歐洲房屋改造》（Europe Re-Housed，New York: Norton, 1938）：George Orwell，《上來透口氣》（1939，New York: Harbrace,n.d.），236頁。

[[750]](#_750_8)Robert Danneberg，《社會主義者統治下的維也納》（London: Labor Party, 1928）：Helmut Gruber，《紅色維也納：1919—1934年工人階級文化的實驗》（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Peter Marcuse，“社會民主黨的住房政策：決定因素和后果”，《奧地利社會主義實驗：1918—1934年社會民主黨和奧地利馬克思主義》，Anson Rabinbach編（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 1985）。

[[751]](#_751_8)Charles O.Hardy，《維也納的住房工程》（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1934）。

[[752]](#_752_8)“維也納”，凱瑟琳·鮑爾文件集中日期不詳的手稿，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班克羅夫特圖書館：Hardy，《維也納住房工程》，第1章：Richard Seider，“1919—1934年紅色維也納的住房政策、社會福利和家庭生活”，《口述歷史》13（1985年秋）：35—48頁。

[[753]](#_753_8)“卡爾馬克思大院”（日期不詳），凱瑟琳·鮑爾文件集中的宣傳冊：Manfredo Tafuri，《紅色維也納：1919—1933年社會主義維也納的住房政策》（Milan: Electa, 1980）。

[[754]](#_754_8)Marquis Childs，《瑞典：中間道路》（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6），164頁：Denby，《歐洲房屋改造》，253頁。

[[755]](#_755_8)Barbara M.Lane，《德國的建筑和政治，1918—1945年》（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第4章：Norbert Huse，《1918—1933年的“新建筑”：魏瑪共和國的現代建筑》（Heinz Moos, 1975）。

[[756]](#_756_8)Kurt Junghanns，《布魯諾·陶特：1880—1938年》（Berlin： Henschel-verlag, 1970）：《布魯諾·陶特，1880—1938：藝術學院展覽》（Berlin: Akademie der Kunste, 1980）：《馬丁·瓦格納》（Berlin: Akademie der Kunste, 1985）。

[[757]](#_757_8)Nicolas Bullock，“1925—1931年法蘭克福的住房建設和新家居裝飾”，《法蘭克福歷史和藝術檔案》57（1980）：187—207頁：Justus Buekschmitt，《恩斯特·梅》（Stuttgart: Alexander Koch, 1963）：John R.Mullin，“1925—1932年德國法蘭克福的城市規劃：現實的烏托邦研究”，《城市歷史雜志》4（1977）：3—28頁：Ernst May，《法蘭克福住房政治》（Frankfurt: International Housing Association, 1929）：W.Nobisch，《法蘭克福市的住房》（Frankfurt, 1930）：Emil Klar，《四十年住宅建筑：1890—1930年法蘭克福的小房屋股份公司研究報告》（Frankfurt: Aktienbaugesellschaft für kleine Wohnungen, 1930）：Douglas Haskell，“新馬里蘭”，《國家》134（1932）：292—293頁。

[[758]](#_758_8)Klaus-Peter Kloss，《二十年的住宅區》（Siedlungen der 20er Jahren，Berlin: Haude and Spener, 1982）：《柏林及其建筑，第四部分，住房：第一篇，住宅區的發展》（Berlin: Wilhelm Ernst, 1970）。除了法蘭克福和柏林外，新風格在工人階級住房中并不常見。德累斯頓、紐倫堡、漢諾威都堅決反對新風格。但是到了1932年在多數德國大城市出現了公共資助的、現代主義的工人階級住房。Lane，《建筑和政治》，103—104,124頁。

[[759]](#_759_8)Ludwig Landmann，“序言”，《新法蘭克福》1（1926）：第1—2頁：Taut，《現代建筑》，第3頁。還可參閱Fritz Weichert，“時代—藝術轉折點”（Zeitwende—Kunstwende），《新法蘭克福》1（1926）：15—24頁：Martin Wagner在1929年創辦了類似的雜志《新柏林》。

[[760]](#_760_8)Catherine Bauer Wurster，“1930年代現代建筑的社會前線”，《建筑史學家協會雜志》24（1965年3月）：51頁：Louis Pink，《住房新時代》（New York: John Day, 1928），49頁：Catherine Bauer，“歐洲的美國化”，《新共和》67（1931）：153—154頁。

[[761]](#_761_8)J.J.P.Oud，“213英鎊的房屋”（The 213 House），《創造性藝術》8（1931）：174—175頁：Susan Henderson，“女性領域的革命：格蕾特·利霍茨基與法蘭克福廚房”，《建筑與女性主義》，Debra Coleman等編（Princeton: Architectural Press, 1996）。梅1925年在擔任法蘭克福的職務前訪問美國，參加紐約市“城市和區域規劃國際會議”。瓦格納1924年和1929年兩次訪美，研究美國的建筑方法。在1984年，梅的主要設計師Ferdinand Kramer仍然保留著Christine Frederick的《新家政》。

[[762]](#_762_8)在羅默斯塔特，大部分的住宅有75平方米使用面積，最小的公寓也有48平方米。在威斯特豪森，套房面積為41平方米或47平方米。維也納的標準是40到48平方米。Ernst May，“法蘭克福住房政治基礎”，《新法蘭克福》2（1928）：126頁：Ernst May，“法蘭克福住房行動五周年”，同上，4（1930）：57頁。還可參閱新建筑國際大會，《最低生存保障住房》（Frankfurt: Englert and Schlosser, 1930）。

[[763]](#_763_8)Edith Elmer Wood，《西歐住房進步》（New York: E.P.Dutton, 1923）：Pink，《住房新時代》：Herbert Undeen Nelson和Marion Lawrence Nelson，《老國家中的新房屋》（Chicago: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 Estate Boards, 1937）：John L.Hancock，“約翰·諾倫和美國城市規劃運動”，賓夕法尼亞大學1964年博士論文，433頁。

[[764]](#_764_8)Wood，《西歐住房進步》，186—187頁：Edith Elmer Wood，《美國住房的最新趨勢》（New York: Macmillan, 1931），283—284頁。還可參閱Arthur Comey，“歐洲印象”，《城市規劃》3（1927年1月）：50—60頁。

[[765]](#_765_8)Mary S.Cole，“凱瑟琳·鮑爾和1926—1937年的公共住房運動”，喬治·華盛頓大學1975年博士論文：Radford，《美國的現代住房》，第3章：“住房的白騎士”，《建筑論壇》84（1946年3月）：116頁以下：1926—1927年筆記，凱瑟琳·鮑爾文件集：Catherine Bauer，“極端現代派的機器時代大廈”，《紐約時報雜志》，1928年4月15日，第10頁以下。

[[766]](#_766_8)《建筑紀錄》79（1936年5月）：341頁：Catherine Bauer Wurster，“現代建筑的社會前沿”，48頁。

[[767]](#_767_8)Cathernine Bauer，“工業中的藝術”，《財富》3（1931年5月）：94—110頁：現代藝術博物館，《現代建筑：國際展》（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 1932），179—199頁。《財富》文章發表為Lewis Mumford，“英國的兩百萬新房屋”，《財富雜志》6（1932年11月）：32頁以下：Lewis Mumford，“生活機器”，同上，7（1933年2月）：78—88頁：Lewis Mumford，“稅收變房屋”（Taxes into Houses），同上，7（1933年5月）：48頁以下。

[[768]](#_768_8)Bauer，《現代住房》，尤其是第四部分：Catherine Bauer，“好房屋不是美國特征嗎？”《新共和》70（1932）：74頁。

[[769]](#_769_8)Bauer，“好房屋不是美國特征嗎？”74頁。

[[770]](#_770_8)Bauer，《現代住房》，136,247頁。

[[771]](#_771_8)Lewis Mumford，《技術與文明》（New York: Harcourt，Brace, 1934）：Lewis Mumford，《城市文化》（New York: Harcourt，Brace, 1938）：Catherine Bauer在1939年8月7日給Lewis Mumford的信，凱瑟琳·鮑爾文件集。

[[772]](#_772_8)Lewis Mumford最好的傳記作家（盡管很少不固執己見）是他本人：《發現和收藏：自傳文集》（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5）：《我的工作和日子：個人記錄》（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9）：《生命的素描：劉易斯·芒福德早年生活自傳》（New York: Dial Press, 1982）：“紐約青少年”，《紐約客》13（1937年12月4日）：86—94頁：Lewis Mumford，“劉易斯·芒福德”，《畫像和自畫像》，Georges Schreiber編（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36）。還可參閱Donald L.Miller，《劉易斯·芒福德生平》（New York: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9）：Thomas P.Hughes和Agatha C. Hughes編，《劉易斯·芒福德：公共知識分子》（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Elmer S.Newman，《劉易斯·芒福德：1914—1970年參考書目》（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1）。

[[773]](#_773_8)Lewis Mumford，《木棍和石頭：美國建筑和文明研究》（Sticks and Stones，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1924）：Lewis Mumford，《黃金歲月：美國經驗和文化研究》（The Golden Day，New York: Horace Liveright, 1926），尤其是第80,73頁：Lewis Mumford，《赫爾曼·梅爾維爾》（New York: Harcourt，Brace, 1929）：Lewis Mumford，《棕色年代：1865—1895年美國藝術研究》（New York: Harcourt，Brace, 1931）：Lewis Mumford，“美國傲慢和歐洲優越”（American Condescension and European Superiority），《斯克里布納雜志》87（1930）：526—527頁：Matthew Josephson，《廟堂中的異教徒：1930年代回憶》（New York: Knopf, 1967），8—10頁。

[[774]](#_774_8)Mumford，《我的工作和日子》，第5章：Lewis Mumford，“歐洲美國化”，《自由人》6（1922）：254頁。

[[775]](#_775_8)Patrick Geddes，《演變中的城市：城市規劃運動和市政學介紹》（London: Williams and Norgate, 1915）：Patrick Geddes，“城市展覽”，《演變中的城市》（新的修訂版，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關于格迪斯對于紐約市的反應，請參閱Philip Boardman，《帕特里克·格迪斯的世界：生物學家、城市規劃者、再教育者、和平戰士》（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8），169頁。

[[776]](#_776_8)Lewis Mumford，“房屋——陽光面朝上”，《國家》120（1925）：115—116頁：Roy Lubove，《1920年代的社區規劃：美國區域規劃協會的貢獻》（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63）：Lewis Mumford，“機器的戲劇”，《斯克里布納雜志》88（1930）：150—161頁：Lewis Mumford手稿，“形式與性格”（c.1930），劉易斯·芒福德文件集，賓夕法尼亞大學圖書館特藏部。

[[777]](#_777_8)Lewis Mumford 在1934年1月7日給James Henderson的信，芒福德文件集。

[[778]](#_778_8)Lewis Mumford，“北海建筑”，《耶魯評論》22（1933）：515,521頁：Mumford，“生活機器”，84頁。

[[779]](#_779_8)Lewis Mumford，《生存價值》（New York: Harcourt，Brace, 1946），243頁：Lewis Mumford，“德國筆記”，《新共和》72（1932）：281頁：Lewis Mumford，“北海建筑”，521,524頁。

[[780]](#_780_8)Lewis Mumford，“我的信念”，《論壇》84（1930）：263—268頁：Lewis Mumford，“在我們的星象中：50年后的世界”（In Our Stars），同上，88（1932）：338—342頁：Mumford，《技術與文明》，400—406頁。

[[781]](#_781_8)Lewis Mumford手稿，“形式與文明”（1933），第1頁，芒福德文件集。

[[782]](#_782_8)芒福德把1934年出現的歷史新時代稱為“新技術時代”，他在1938年用“生物技術秩序”來代替，修改了概念，但沒有從根本上改變。為了方便起見，我一直使用了1934年的說法。

[[783]](#_783_8)Lewis Mumford，《城市發展史》（New York: Harcourt，Brace and World, 1961）：Lewis Mumford，“評劉易斯·芒福德《技術與文明》（1934）”，《代達羅斯》（Daedalus）88（1959）：532,534頁。還可以參閱他對于《技術與文明》的悲觀重寫：Lewis Mumford，《機器的神話》（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67,1970），以及他對于現代主義的反思：Lewis Mumford，“碑銘主義、象征主義和風格”（1949），重印在他的《人類前景》中，Harry T.Moore和Karl W.Deutsch編（Boston: Beacon Press, 1955）。

[[784]](#_784_8)Lewis Mumford，《城市文化》，圖32，著重號為原文。

[[785]](#_785_8)Lewis Mumford，“打破住房封鎖!”《新共和》75（1933年5月17日）：8—11頁：“規劃的社區”，《建筑論壇》58（1933）：253—274頁：Albert Mayer，Lewis Mumford和Henry Wright，《新政新家園》（New Homes for a New Deal，New York: New Republic, 1934）：Lewis Mumford，“住房的社會命令”，《美國不能有住房》，Carol Aronovici編（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s, 1934）：Lewis Mumford 1932年6月5日旅行札記，芒福德文件集。住房研究公會的精神領袖亨利·萊特本人在1932年和1933年到德國進行四個月的朝圣，回來后成為現代主義的皈依者。Henry S.Churchill，“亨利·萊特”，《美國規劃師學會雜志》26（1960）：293—301頁。

[[786]](#_786_8)Mumford，“住房的社會命令”，16頁。

[[787]](#_787_8)John W.Edelman，《勞工游說者：約翰·埃德爾曼自傳》，Joseph Carter編（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74），109—110頁。

[[788]](#_788_8)Steven Fraser，《勞工將統治：西德尼·希爾曼和美國勞工的興起》（New York: Free Press, 1991），第8章：Richard Plunz，《紐約市住房歷史：美國都市居住方式和社會變化》（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151—163頁。

[[789]](#_789_6)Edelman，《勞工游說者》，第8章。

[[790]](#_790_6)Frederick Gutheim，“奧斯卡·斯通諾羅夫的社會建筑”，《建筑》（L'Architettura）18（1972年6月）：76頁以下：Eric J.Sandeen，“新政中的公共住房設計：奧斯卡·斯通諾羅夫和卡爾·麥克利住房”，《美國季刊》27（1985）：645—667頁：Albert Mayer，“費城針織品工人住房開發批評”，《建筑》71（1935）：189—194頁：Radford，《美國現代住房》，第5章。

[[791]](#_791_6)Catherine Bauer，“住房：紙上規劃還是工人運動？”《美國不能有住房》，Aronovici編：Catherine Bauer，“現在終于有了：住房”（Now At Last: Housing），《新共和》92（1937）：119—121頁。

[[792]](#_792_5)Joan Campbell，《德國工業聯盟：應用藝術改革的政治》（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793]](#_793_5)Richard Guy Wilson，Dianne H.Pilgrim和Dickran Tashjian，《美國的機器時代，1918—1941年》（New York: Brooklyn Museum, 1986）：Jeffrey L.Meikle，《受限制的二十世紀：1925—1939年美國的工業設計》（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794]](#_794_5)John E.Findling，《芝加哥大型世界博覽會》（Manchester，Englan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4）：Forrest Crissey，“為什么有進步建筑的世紀？采訪艾倫D.阿爾伯特”，《星期六晚郵報》205（1933年6月10日）：16頁以下：《官方圖冊：進步展覽的世紀》（Official View Book，Chicago: Reuben H.Donnelly, 1933）。

[[795]](#_795_5)Findling，《芝加哥大型世界博覽會》，108—111頁：《進步世紀：1933年博覽會官方指南》（Chicago: Century of Progress, 1933），67—72頁：Dorothy Raley編，《進步世紀：家居和裝飾》（Chicago: M.A.Ring, 1934）。

[[796]](#_796_5)現代藝術博物館，《現代建筑》：Henry-Russell Hitchcock，Jr.和Philip Johnson，《國際風格：1922年以來的建筑》（New York: W.W.Norton, 1932）。

[[797]](#_797_5)Sibyl Moholy-Nagy，“移民社區”（The Diaspora），《建筑史學家協會雜志》24（1965年3月）：24—26頁。

#### 第十章 新政

[[798]](#_798_5)Lewis Mumford，評Horace M.Kallen的《自由社會》，發表在《新共和》80（1934）：223頁：《經濟學家》編輯，《新政：分析和評價》（New York: Knopf, 1937），46頁：Walter J.Shepard，“轉型中的民主”，《美國政治學評論》29（1935）：11頁。

[[799]](#_799_5)Rexford G.Tugwell，《民主黨人羅斯福》（Garden City，N.Y.：Doubleday, 1957）：Albert U.Romasco，《經濟復蘇的政治：羅斯福的新政》（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第5頁。

[[800]](#_800_5)關于不同解釋的辯論，下列書籍提供了有益的、最近的評價：Steve Fraser和Gary Gerstle編，《1930—1980年新政秩序的興衰》（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Kenneth Finegold和Theda Skocpol，《美國新政時期的國家和政黨》（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5）。

[[801]](#_801_5)John Dizikes，《英國、羅斯福和新政：1932—1938年的英國觀點》（New York: Garland, 1979），166,95頁：Henry Pelling，《美國和英國左派：從布萊特到貝文》（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57），136頁：Joel Colton，《萊昂·布魯姆：政治中的人道主義者》（New York: Knopf, 1966）。更籠統的內容請參閱：William E.Leuchtenburg，“大蕭條”，《美國歷史的比較研究途徑》，C. Vann Woodward編（New York: Basic Books, 1968）：William E.Leuchtenburg，“1929—1950年美國的歐洲化”，《羅斯福時代：論羅斯福及其遺產》（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802]](#_802_5)Edwin Amenta和Theda Skocpol，“抓住例外：解釋上個世紀美國公共政策的獨特性”（Taking Exception），《公共政策歷史比較》，Francis G.Castles編（Oxford: Polity Press, 1989），292頁：Christopher Leman，“政策發展模式：美國和加拿大的社會保障”，《公共政策》25（1977）：261—291頁：Theda Skocpol和John Ikenberry，“從歷史和比較視角看美國福利國家的政治形成”，《比較社會研究》6（1983）：90頁。

[[803]](#_803_5)Margaret Weir和Theda Skocpol，“國家結構和大蕭條時代瑞典、英國和美國做出‘凱恩斯式’反應的可能性”，《把國家帶回來》，Peter B.Evans等編（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Peter Gourevitch，《艱難時代的政治：國際經濟危機之下的反應對比》（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6），第4章。

[[804]](#_804_5)基本數據來自Peter D.Stachura編，《魏瑪德國的大蕭條和失業》（Basingstoke，England: Macmillan, 1986）。因為它們是建立在不同的衡量標準上，這個時期的失業率不具有準確的可比性，但是相對數量級是毋庸懷疑的。

[[805]](#_805_5)Gøsta Esping-Andersen，“社會民主黨福利國家的形成”，《創造社會民主：瑞典社會民主勞動黨的世紀》，Klaus Misgeld等編（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2）：Robert Skidelsky，《政客和經濟衰退：1929—1931年工黨政府》（London: Macmillan, 1967）：Ross McKibbin，“1929—1931年第二任工黨政府的經濟政策”，《過去與現在》68（1975）：95—123頁：Julian Jackson，《法國人民陣線：1934—1938年捍衛民主》（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806]](#_806_5)Richard H.Pells，《激進愿景和美國夢：大蕭條時代的文化和社會思想》（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3），97頁：比較Nelson Polsby，《美國的政治革新：政策主動性的政治》（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尤其是第167—172頁。

[[807]](#_807_5)Alan Brinkley，《改革的終結：蕭條和戰爭期間的新政自由主義》（New York: Knopf, 1995）。

[[808]](#_808_5)不是所有進步人士都加入到新政行列，正如奧蒂斯·格雷厄姆早就展示的那樣：有些人因為年齡感到疲勞，有些人對于道德政治風格的對比感到惱火。提案的持續性和人員的持續性不可避免地是兩碼事。參閱Otis Graham，Jr.，《改革的重演：老進步人士和新政》（An Encore for Refor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809]](#_809_5)William H.Beveridge，“美國復興計劃的某些方面”，《美國經濟學期刊》新刊號1（1934年2月）：1—12頁：William H.Beveridge，“美國觀察”，1933年12月1日和4日的廣播講話，威廉·貝弗里奇文件集，倫敦經濟學院，英國政治學和經濟學圖書館。

[[810]](#_810_5)本段和后續段落中使用的對比數據來自如下的研究：Gerold Ambrosius和William H.Hubbard，《二十世紀歐洲社會和經濟史》（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John A.Garraty，“新政、國家社會主義和大蕭條”，《美國歷史評論》78（1973）：907—944頁：John A.Garraty，《大蕭條》（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6）：John A.Garraty，《歷史上的失業：經濟思想和公共政策》（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78），第10章：Charles S.Maier，“法西斯主義和納粹主義經濟學”，《尋求穩定：歷史政治經濟學探索》（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Gourevitch，《艱難時代的政治》：Daniel Levine，《貧窮與社會：國際對比中美國福利國家的增長》（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8）：James T.Patterson，“對比福利歷史：1930—1945年的英國和美國”，《羅斯福新政：50年后的項目評估》，Wilbur J.Cohen編（Austin: Lyndon Baines Johnson School of Public Affairs, 1986）：Herman van der Wee編，《重訪大蕭條：關于三十年代經濟學的論文集》（Hague: Nijhoff, 1972）：Weir和Skocpol，“國家結構”。關于當時的比較評價，請參閱Karl Brandt，“德國、英國、美國最近的農業政策”，《社會調查》3（1936）：167—201頁：Emil Lengyuel，《歐洲的新政》（New York: Funk and Wagnalls, 1934），292—302頁。關于大蕭條時期的英國，請參閱Sean Glynn和John Oxborrow，《兩次戰爭之間的英國：社會和經濟史》（New York: Barnes and Noble, 1976）：Sidney Pollard，《1914—1990年英國經濟的發展》第4版（London: Edward Arnold, 1992）。關于大蕭條時期的德國，請參閱R.J.Overy，《1932—1938年納粹經濟復蘇》（London: Macmillan, 1982）：Richard Overy，“第三帝國的失業情況”，《商業歷史》29（1987）：253—281頁：Harold James，“經濟復蘇的革新和保守主義：1930年代所謂的‘納粹復興’”《重新評價第三帝國》，Thomas Childers和Jane Caplan編（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93）。

[[811]](#_811_5)在這方面，德國不同于大蕭條模式就是根本性的。壓制獨立工會，處理掉在1920年憲法下建立的勞資聯合委員會，國家社會主義者改組雇主為工程管理者（Betriebsführer），除了來自上面的黨和國家之外不受任何挑戰的權威。

[[812]](#_812_5)William W.Bremer，“沿著‘美國道路’前進：新政中為失業者提供的工作救濟項目”，《美國歷史雜志》66（1975）：636—652頁。

[[813]](#_813_5)Julian Jackson，《1932—1936年法國大蕭條的政治》（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第7章：John Stevenson，《1914—1945年英國社會》（London: Allen Lane, 1984），326—329頁：Otis L.Graham，Jr.，《走向有計劃的社會：從羅斯福到尼克松》（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第1章。

[[814]](#_814_5)John P.Diggins，《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義：美國觀點》（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Rexford G.Tugwell，《特格韋爾日記：1932—1935年的新政》，Michael Vincent Namorato編（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92），139頁。

[[815]](#_815_5)Sidney和Beatrice Webb，《蘇維埃共產主義：新文明？》（London: Longmans，Green, 1935）。

[[816]](#_816_5)William H.Beveridge，“1933年訪問美國”，貝弗里奇文件集：全國住房官員協會，《美國住房計劃》（Chicago: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using Officials, 1934）：Russell Lord，《衣阿華州的華萊士》（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47），383頁。

[[817]](#_817_5)Alice Hamilton，“表面之下”，《調查圖片》22（1933）：449頁以下：“德國的喧嘩與騷動”，同上，549頁以下：“德國婦女的地位”，同上，23（1934）：26頁以下。

[[818]](#_818_5)Hanns Gramm，《奧伯蘭德基金會，1931—1953年》（Philadelphia: Carl Schurz Memorial Foundation, 1956），《美國—德國評論》（1934—1938）。

[[819]](#_819_5)Frederic C. Howe，“歷史上最完全的農業復興”，《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172（1934年3月）：122—129頁：Frederic C. Howe，《丹麥：合作方式》（New York: Coward-McCann, 1936）：Josephine Goldmark和A.H.Hollman，《丹麥的民主》（Washington，D.C.：National Home Library Foundation, 1936）：美國國會眾議院農業委員會，《參議院1836號議案聽證會：班克黑德—瓊斯租賃法修正案》，第76屆國會第三次會議，1940年，32—38頁：Marquis Childs，《瑞典：中間道路》（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6）：Merle Curti，“1930年代美國社會思想中的瑞典”，《觀念的移入：北大西洋社會研究》（The Immigration of Ideas），J.Iverne Dowie和J.Thomas Tredway編（Rock Island，Ill.：Augustana Historical Society, 1968）：研究英國和瑞典工業關系的美國委員會《報告》（Washington，D.C.，1938）。

[[820]](#_820_5)Roy Lubove，“弗里德里克·豪威和美國社區探索”，《歷史學家》39（1977）：270—291頁：Frances Perkins，《我所認識的羅斯福》（New York: Viking, 1946），尤其是第26章。

[[821]](#_821_5)Susan Ware，《普選權之外：新政中的女性》（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J.Joseph Huthmacher，《羅伯特·瓦格納參議員和城市自由主義的興起》（New York: Atheneum 1968）：Richard S.Kirkendall，《羅斯福時代的社會科學家與農業政治》（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66）。

[[822]](#_822_5)Rexford G.Tugwell，“法國農業政策”，《政治學季刊》 45（1930）：214—230,405—428,527—547頁：Rexford G.Tugwell，《走向晨邊高地的低處：回憶錄》（To the Lesser Heights of Morningside，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82）：Thomas H.Eliot，《新政回憶：當人民重要時》（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2）：Katie Louchheim編，《新政的形成：圈內人講述》（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關于1930年代社會福利專家更多樣化背景的情況，請參閱Linda Gordon，“社會保險和公共救濟：1890—1935年美國福利思想中的性別影響”，《美國歷史評論》 97（1992）：19—54頁。

[[823]](#_823_5)Diggins，《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義》，280頁： Ellis W.Hawley，《新政與壟斷問題》（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106頁。

[[824]](#_824_5)Albert U.Romasco，《富裕的貧困：胡佛、國家、大蕭條》（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5），183,185頁。

[[825]](#_825_5)Anne O'Hare McCormick，“他的自我認識”（As He Sees Himself），《紐約時報雜志》，1938年9月16日，第2頁：Ronald D.Rotunda，《語言的政治：自由主義作為詞匯和象征》（Iowa City: University of Iowa Press, 1986）。

[[826]](#_826_5)Clarke A.Chambers，《保羅·凱洛格和〈調查〉：主張社會福利和社會正義的聲音》（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1），156頁：Harold J.Laski，“羅斯福實驗”，《大西洋月刊》153（1934年2月）：151頁：William E.Leuchtenburg，《富蘭克林·羅斯福和1932—1940年新政》（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3），166頁。

[[827]](#_827_5)Perkins，《羅斯福》，151頁。

[[828]](#_828_5)William E.Leuchtenburg，“新政和戰爭類比”，《二十世紀美國的變化和連續性》，John Braeman，Robert H.Bremner和Everett Walters編（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4）：James S.Olson，《挽救資本主義：1933—1940年的重建金融公司與新政》（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Hawley，《新政與壟斷問題》。

[[829]](#_829_5)Perkins，《羅斯福》，第21章：John S.Forsythe，“《公平勞動標準法案》的立法歷史”，《法律和當代問題》 6（1939）：464—490頁：Vivien Hart，《受憲法約束：婦女、工人和最低工資》（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第8章。

[[830]](#_830_5)David Brody，“工作場所的契約主義：歷史比較分析”，《勞工的事業：美國工人歷史上的主要議題》（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Melvyn Dubofsky，《現代美國的國家和勞工》（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4），第5章：Christopher L.Tomlins，《國家與工會：1880—1960年勞動關系、法律和美國有組織的勞工運動》。

[[831]](#_831_5)Maurizio Vaudagna，“對比視角下的新政和歐洲社會民主”，《美國為什么沒有社會主義？》，Jean Heffer和Jeanine Rovet編（Paris：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88）：Henry A.Wallace，《民主重生》（New York: Reynal and Hitchcock, 1944），100頁。

[[832]](#_832_5)-1 Procrustes，希臘神話中的強盜，他開黑店攔劫過往旅客，根據床的長度把身材高大的截短，把身材矮小的拉長。——譯者注

[[833]](#_833_5)McCormick，“他的自我認識”，第2頁。

[[834]](#_834_5)關于《社會保障法案》的形成有許多很好的歷史描述，雖然沒有一個充分描述了跨越大西洋的維度。請參閱Edward D.Berkowitz，《美國福利國家：從羅斯福到里根》（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1）：Clark A.Chambers，“社會改革、社會工作、社會保障：話題重訪”，《尋求保障：關于美國社會保險體系來源和未來的論文集》，John N.Schacht編（Iowa City：近期美國歷史研究中心，1982）：Mark H.Leff，“從歷史視角看養老保險：技術水平和國家藝術”（The State of the Art and the Art of the State），Edward D.Berkowitz編，《五十年后的社會保障：成功和失敗》（Social Security after Fifty，Westport，Conn.：Greenwood Press, 1987）：Mark H.Leff，“向‘被遺忘的人’征稅：新政中的社會保障資金政治”，《美國歷史雜志》70（1983）：359—381頁：Jill Quadagno，《養老保障的轉型：美國福利國家的階級和政治》（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還有“經濟保障委員會”的技術參謀長當時的描述：Edwin E.Witte，《社會保障法案的發展》（1936：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2）。

[[835]](#_835_5)Louis Adamic，《我的美國：1928—1938年》（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38），268頁。

[[836]](#_836_5)Raymond Richards，《關閉通向貧困之門：美國和新西蘭社會保障法案的形成》（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4）。

[[837]](#_837_5)I.M.Rubinow，《尋求保障》（New York: Henry Holt, 1934），599—602頁：Ambrosius和 Hubbard，《二十世紀歐洲的社會和經濟史》，121—123頁：Glynn和Oxborrow，《兩次戰爭之間的英國》，249頁。

[[838]](#_838_5)Paul H.Douglas，“法國社會保障法案”，《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164（1932）：210—248頁。

[[839]](#_839_5)E.C. Buehler編，《強制性失業保險》（New York: H.W.Wilson, 1931），12頁。

[[840]](#_840_5)Louis Leotta，“亞伯拉罕·艾普斯坦與老年保障運動”，《勞工歷史》16（1975）：359—377頁：Paul H.Douglas，《充實的時代：保羅·道格拉斯回憶錄》（In the fullness of Time，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2），69頁：Abraham Epstein，《老年的挑戰》（New York: Vanguard, 1928）：John B.Andrews，“養老金：社會需要的基礎”，《美國勞工立法評論》19（1929）：356—358頁。艾普斯坦與歐洲人的交往可以參閱亞伯拉罕·艾普斯坦文件集，康奈爾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

[[841]](#_841_5)John R.Commons，“失業和預防”，《美國勞工立法評論》12（1922）：15—30頁：“美國勞工立法協會失業預防項目”，同上，13（1923）：69—71頁。更籠統的內容請參閱：Udo Sautter，《為失業者三呼：新政前的政府和失業》（Three Cheers for the Unemployed，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Daniel Nelson，《失業保險：1915—1935年的美國經驗》（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9）。

[[842]](#_842_3)John R.Commons，“失業：補償與預防”，《調查》47（1921）：第5—9頁：Elizabeth Brandeis，“威斯康星對付工作保障問題”，同上，67（1931）：296頁：John R.Commons，“威斯康星閑散勞動力的補償”，《美國勞工立法評論》22（1932）：第9頁：John B.Andrews，“現在行動解決失業問題!”（Act Now on Unemployment!），同上，20（1930）：339—340頁。

[[843]](#_843_3)I.M.Rubinow，“社會保險中的公共和私人利益”，《美國勞工立法評論》21（1931）：181—191頁（著重號為后加）。

[[844]](#_844_3)Bentley B.Gilbert，《英國社會政策》（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0），第2章： Alan Deacon，“讓步和威壓：二十世紀失業保險的政治”，《1918—1939年勞工歷史文集》，Asa Briggs和John Saville編（London: Croom Helm, 1977）：John Stevenson，“1931—1935年失業政策的形成”，《現代英國的高端和低端政治》，Michael Bentley和John Stevenson編（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3）：Sidney Checkland，《1776—1939年的英國公共政策：經濟、社會和政治視角》（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379頁。

[[845]](#_845_3)Richard J.Evans和Dick Geary編，《德國的失業情況：從魏瑪共和國到第三帝國大量失業的經驗和后果》（London: Croom Helm, 1987）：Thomas E.J.Dewitt，“第三帝國福利的經濟學和政治學”，《中歐歷史》11（1978）：256—278頁：Aryeh L.Unger，“納粹德國的宣傳和福利”，《社會史雜志》4（1970）：125—140頁：Christoph Sachsse和Florian Tenstedt編，《國家社會主義的慈善機構：德國貧窮救濟的歷史》，第三卷（Stuttgart: Kohlhammer, 1992）。

[[846]](#_846_3)美國國會參議院金融委員會，《經濟保障法案：參議院1130號議案聽證會》，第74屆國會第一次會議，1935年，1322,2頁。

[[847]](#_847_3)James Struthers，《自身沒有錯：1914—1941年加拿大失業和福利國家》（No Fault of Their Own，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3）：Richards，《關閉通向貧困之門》。

[[848]](#_848_3)福利資本主義者在1935年《社會保障法案》形成過程中的作用是歷史學界激烈爭論的內容，請參閱：Jill S.Quadagno，“福利資本主義和1935年的《社會保障法案》”，《美國社會學評論》49（1984）：632—647頁：Theda Skocpol和Edwin Amenta進行反駁，“資本家塑造了《社會保障法》嗎？”同上，50（1985）：572—575頁：J.Craig Jenkins和Barbara G.Brents，“社會抗議、霸權競爭、社會改革：美國福利國家的政治斗爭解釋”，《美國社會學評論》54（1989）：891—909頁：Edwin Amenta和Sunita Parikh，“資本家不想要《社會保障法案》：‘資本家控制論’批判”，《美國社會學評論》56（1991）：124—129頁：Colin Gordon，“新政、老牌：企業界與1920—1935年《社會保障法》的起源”（New Deal，Old Deck），《政治與社會》19（1991）：165—207頁：Colin Gordon，《新政：1920—1935年美國的企業、勞工和政治》（New Deal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還有爭辯味不那么濃的：Edward D.Berkowitz，《創造福利國家：二十世紀改革的政治經濟》（New York: Praeger, 1980），第6章：Sanford M.Jacoby，“雇主與福利國家：馬里恩·弗爾瑟姆的作用”，《美國歷史雜志》80（1993）：525—556頁。關于《財富》1939年和1940年的調查，請參閱Herman A.Kroos，《1920年代—1960年代經濟議題的行政思想》（Garden City，N.Y.：Doubleday, 1970），193頁。

[[849]](#_849_3)Kenneth Casebeer，“工人失業保險法案：美國社會工資、勞工組織和法律意識形態”，《美國勞工法律：歷史和評論文集》，Christopher J.Tomlins和Andrew J.King編（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William W.Bremer，《大蕭條的冬天：紐約社會工作者和新政》（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4）：Judith Ann Trolander，《睦鄰中心與大蕭條》（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5）。

[[850]](#_850_3)Edith Abbott，“社會保險和/或社會保障”，《社會服務評論》8（1934）：537—540頁：“多少保障？”同上，9（1935）：103—104頁：“瓦格納—劉易斯失業補償計劃和所謂的‘補貼體系’”，同上，104—106頁：“用于家庭救濟的聯邦補助”，同上，9（1935）：757—760頁：“告別聯邦緊急救濟署”，同上，10（1936）：133—135頁：關于社會保障的性別差異問題，請參閱Linda Gordon，《得到同情但沒有資格：單身母親和福利歷史，1890—1935年》（New York: Free Press, 1994），第9章：當這個草案完成后，格雷絲·阿伯特吞下自己的懷疑，竭力為它游說。

[[851]](#_851_3)Tugwell，《民主黨人羅斯福》，251頁：Perkins，《羅斯福》，282—283頁。

[[852]](#_852_3)Samuel I.Rosenman編，《富蘭克林·羅斯福公共文件和演講》（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8—1950），第一卷，247頁。

[[853]](#_853_3)J.Michael Eisner，《威廉·萊塞森傳記》（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7）：Paul H.Douglas，《失業保險標準》（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3）：Paul H.Douglas，《充實的時代》（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2）：Alvin Hansen，《不平衡世界中的經濟穩定性》（New York: Harcourt，Brace, 1932）：Alvin Hansen，Merrill G.Murray，Russell A.Stevenson和Bryce Stewart，《美國失業保險和救濟計劃》（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34）：Shirley Jenkins編，《國際視野中的社會保障：伊夫琳·伯恩斯紀念文集》（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9）。

[[854]](#_854_3)Arthur Newsholme，《私人和公共醫療關系的國際研究，特別關注疾病預防》（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31）：Arthur Newsholme，《醫藥與國家：私人和公共醫療實踐的關系，特別關注公共衛生》（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32）。1935年，因為理事會的部分成員批評它過分靠近新政一邊，以及醫生批評它鼓吹“國家醫療”，米爾班克基金會在巨大壓力下失去膽量，辭退了主管，終止了醫藥經濟學的進一步研究。此前這方面的活動可以參閱Clyde V.Kiser，《米爾班克基金會：1905—1974年的領袖和工作》（New York: Milbank Memorial Fund, 1975）：也可以參閱秘書約翰·A.金斯伯里的文件集，國會圖書館。

[[855]](#_855_3)美國社會保障協會，《1933年美國的社會保障：養老和社會保障第六次全國會議記錄》（New York: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Social Security, 1933），第三、第四部分：Grace Abbott在1934年10月3日給 Homer Folks的信，伊迪絲和格雷絲·阿伯特文件集，芝加哥大學約瑟夫·瑞根斯坦圖書館。

[[856]](#_856_3)James T.Patterson，《1900—1985年美國反對貧困的斗爭》（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第57頁：關于新政的第一個冬天，請參閱William R.Brock，《福利、民主和新政》（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Bonnie Fox Schwartz，《1933—1934年民用工程署：新政中的緊急就業項目》（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857]](#_857_3)Vaughn Davis Bornet，“1921—1933年胡佛的失業和養老保險計劃”，《尋求保障》，Schacht編，第42頁：全國工業會議理事會，《失業補貼和保險》（New York: 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 1931）：全國工業會議理事會，《德國失業保險和救濟》（New York: National Industrial Conference Board, 1932）：Witte，《社會保障法案的發展》，xv頁：George W.Martin，《女部長：弗朗西絲·珀金斯》（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6），226頁。最系統性的調查系列，是產業關系咨詢公司對美國和歐洲強制型和補貼型失業保險體系所做的對比：Bryce M.Stewart，《美國的失業補貼》（New York: Industrial Relations Counselors, 1930）：Mary Barnett Gilson，《英國的失業保險》（New York: Industrial Relations Counselors, 1931）：T.G.Spates和G.S.Rabinovitch，《瑞士的失業保險：根特體系的全國化，帶強制性特征》（New York: Industrial Relations Counselors, 1931）：Constance A.Kiehel，《比利時的失業保險：根特和列日體系的全國發展》（New York: Industrial Relations Counselors, 1932）。還可參閱Mary Barnett Gilson，《過去的成為序幕：我的工業經驗的反思》（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40）。

[[858]](#_858_3)Charles Morris Mills，“救濟癖”，《調查》65（1931）：487頁以下：Helen Hall，《街區和國家未完成的事業》（Unfinished Business in Neighborhood and Nation，New York: Macmillan, 1971），第6章：Helen Hall，“英國救濟和美國慈善”，《大西洋月刊》151（1933）：538—549頁：Helen Hall，“礦工必須吃飯：英國救濟和美國慈善的運作”，同上，152（1933）：153—162頁：Frances Perkins，“就業保險”，《美國勞工立法評論》23（1933）：117—120頁：Frances Perkins，“走向保障”，《調查圖片》23（1934）：144頁：Mollie Ray Carroll，“社會保險”，社會工作全國會議，《會議記錄》（1934），260頁。

[[859]](#_859_3)Perkins，《羅斯福》，286頁。

[[860]](#_860_3)Struthers，《自身沒有錯》，第1章：Bryce Stewart，“公共就業服務和公共工程的作用”，《美國勞工立法評論》13（1923）：54—63頁：Bryce M.Stewart，“歐洲失業保險經驗的部分階段”，《美國政治科學院會議記錄》14（1932）：493—514頁：Alvin Hansen等編，《失業保險和救濟項目》：A.C. C. Hill，Jr.和Isador Lubin，《英國與失業做的斗爭》（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1934）。

[[861]](#_861_3)Barbara Nachtrieb Armstrong，《確保基本需要：最低工資加社會保險，生計工資項目》（New York: Macmillan, 1932），xiv, 13頁： J.Douglas Brown《美國的社會保障哲學：演化和議題》（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2），第1章：Eliot，《新政回憶》，第5章。

[[862]](#_862_3)Theron F.Schlabach，《埃德溫·威特：謹慎的改革者》（Madison: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 1969）：Louchheim，《新政的形成》，151—152頁：Perkins，《羅斯福》，282頁。

[[863]](#_863_3)Daniel S.Hirshfield，《失去的改革：1932—1943年美國強制性健康保險運動》（The Lost Refor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第2章。

[[864]](#_864_3)Witte，《社會保障法案的發展》：Jerry R.Cates，《為不平等保險：1935—1954年社會保障中的行政領導》（Insuring Inequality，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83），32—33頁。最高法院批準了《社會保障法案》后幾個月內，社會保障局的養老補貼局（Bureau of Old-Age Benefits）被重新命名為聯邦養老保險局。

[[865]](#_865_3)《富蘭克林·羅斯福公共文章和演講》，第一卷，792頁。

[[866]](#_866_3)《經濟學家》編輯，《新政》，第2章：Eveline M.Burns，“演變中的社會保障”，《美國經濟學評論》34號增刊，第二部分（1944年3月）：199—211頁：J.Douglas Brown，“英國先例和美國養老保險”，《美國勞工立法評論》27（1937）：18—33頁：J.Douglas Brown，“當前的社會保險問題”，同上，28（1938）：第6—8頁。關于和歐洲社會保險體系的對比，請參閱Karl Pibram，“美國的社會保險和社會保障”，《勞工立法評論》36（1937）：732—771頁：C. A.Kulp，“歐洲和美國社會保障類比”，《美國勞工立法評論》28（1938）：13—20頁。

[[867]](#_867_3)Abraham Epstein，“我們的社會保障法案”，《哈珀斯月刊》172（1935）：55—68頁：Abraham Epstein，“為社會保障融資”，《美國政治與社會科學院紀事》183（1936）：212—226頁。

[[868]](#_868_3)Leuchtenburg，《富蘭克林·羅斯福和新政》，345頁。內部的引語來自Rexford Tugwell。

[[869]](#_869_3)富蘭克林·羅斯福，“新農業計劃”，《農業政府：1931年第14屆美國鄉村生活會議記錄》（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1），10—17頁：Rexford Tugwell，“總統的準備”，《西方政治季刊》1（1948）：131—153頁。

[[870]](#_870_3)Tugwell，《日記》，40—41頁：Tugwell，《晨邊高地的低處》，241—242頁。

[[871]](#_871_3)Richard S.Kirkendall，“新政與農業”，《新政：國家層面》，John Braeman，Robert H.Bremner和David Brody編（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5）： Theodore Saloutos，《美國農民與新政》（Ames： Iow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2）：Finegold和Skocpol，《國家和政黨》，第一部分。

[[872]](#_872_3)M.L.Wilson，“聯邦政府的土地使用項目”，《農業經濟學雜志》15（1933）：217—235頁：Rexford G.Tugwell，“政府在國家土地項目中的地位”，同上，16（1934）：55—69頁：Lewis C. Gray，《土地規劃》（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6）。

[[873]](#_873_3)Rexford Guy Tugwell，“俄羅斯農業”，《第二個十年的蘇維埃俄國：第一屆美國工會代表團技術人員聯合調查》，Stuart Chase，Robert Dunn和Rexford Guy Tugwell編（New York: John Day, 1928），59頁：M.L.Wilson，《農場救濟和國內分配計劃》（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33）：Milburn L.Wilson，“自耕自給小農場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農業經濟學雜志》16（1934）：73—84頁：M.L.Wilson，“新政中工業的分散化”，《社會力量》13（1934—1935）：588—598頁：Rexford Guy Tugwell，“重新安置的觀點”（The Resettlement Idea），《農業歷史》33（1959）：159—164頁。

[[874]](#_874_3)Matthew Josephson，《廟堂中的異教徒：1930年代回憶》（New York: Knopf, 1967），61頁：Clarence E.Pickett，“歐洲的自耕自給小農場”，沒有日期，諾倫文件集中的影印本：美國國會眾議院勞工委員會，《失業困難救濟》，第72屆國會第一次會議，1932年，27—32,43—44頁。

[[875]](#_875_3)Paul K.Conkin，《明天是個新世界：新政社區項目》（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59）。

[[876]](#_876_3)Sidney Baldwin，《貧困與政治：農業安全署的興衰》（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8）。

[[877]](#_877_3)Conkin，《明天是個新世界》，附錄。關于南方進步人士中對于農場村莊觀點的持續支持，請參閱W.T.Couch，“南方的農業項目”（An Agrarian Programme for the South），《美國評論》3（1934）：313—326頁：Herman C. Nixon，《四十英畝和鋼鐵騾子》（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8）。

[[878]](#_878_3)David Holley，《山姆大叔的農民：密西西比河谷下游的新政社區》（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5），第8—9章。

[[879]](#_879_3)Joseph L.Arnold，《郊區的新政：1935—1954年綠帶城鎮項目的歷史》（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1）：Arnold R.Alanen和Joseph A.Eden，《現成的大街：威斯康星格林代爾城的新政社區》（Madison: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Wisconsin, 1987）：Conkin，《明天是個新世界》第14章。Earler Draper本來設計南方磨房村莊現在卻到諾里斯搞田納西流域管理局城鎮，他是唯一對于郊區項目產生重大影響卻沒有和歐洲有重要關系的人。關于其他人相互關系密切的內容，請參閱Roy Lubove，《1920年代的社區規劃：美國區域規劃協會的貢獻》（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1963）。

[[880]](#_880_3)Elbert Peets，“華盛頓、威廉斯堡、進步世紀、綠谷城”：Werner Hegemann，《城市規劃——住房》（New York: Architectural Book Publishing, 1936），第二卷，第27章。

[[881]](#_881_3)Hugh A.Bone，“綠帶面貌，1939年”（Greenbelt Faces 1939），《美國城市》54（1939年2月）：59—61頁：Arnold，《郊區的新政》，138—139頁。

[[882]](#_882_3)Clarence S.Stein，“綠谷城和未來”，《美國城市》63（1948年6月）：106—109頁：Rexford G.Tugwell, 1936年2月3日對俄亥俄漢密爾頓縣區域規劃委員會的講話，賈斯廷·哈特索格文件集中的影印本，康奈爾大學。

[[883]](#_883_3)Diane Ghirardo，《建設新社區：新政的美國和法西斯的意大利》（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Barbara Miller Lane，《1918—1945年德國的建筑和政治》（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第6—8章。

[[884]](#_884_3)Alanen和Eden，《大街》（Main Street），61頁：Arthur E.Morgan，“田納西河谷的基準（四）：田納西流域管理局的繁榮之路”，《調查圖片》23（1934）：548頁：Roy Talbert，Jr.，《羅斯福的烏托邦：田納西流域管理局的阿瑟·摩根》（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 1987），127,146頁。

[[885]](#_885_3)Childs，《瑞典：中間道路》：Marquis Childs，“美國的合作社”，《北美評論》243（1937）： 217—230頁。在《這是民主：斯堪的納維亞的集體協商》（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8）中，Childs把重點轉向1938年“基本協議”前后的勞資關系。但是他的第二份瑞典報告的影響遠遠不及第一份。

[[886]](#_886_3)Childs，《瑞典：中間道路》，xii, 50，xiv頁。

[[887]](#_887_3)《富蘭克林·羅斯福記者招待會全集》（New York: DaCapo, 1972），第七卷，295頁：O.S.Granducci，“合作社——新妖怪”（The Co-op—A New Bogeyman），《今日雜志》7（1936年10月31）：第6頁以下。

[[888]](#_888_3)Leland Olds，未注明日期的筆記（c. 1931）和Leland Olds在1936年8月18日寫給 Marion Olds的信，兩者都在利蘭·奧爾茲文件集，紐約海德公園羅斯福圖書館。

[[889]](#_889_3)Baldwin，《貧困與政治》，103頁：Alanen和Eden，《大街》，49頁：Earle S.Draper，“田納西流域管理局新城鎮諾里斯”，《美國城市》48（1933年12月）：67—68頁：Walter L.Creese，《田納西流域管理局的公共規劃：愿景和現實》（Knoxvill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90），第5章：Josephson，《廟堂中的異教徒》，440—441頁：Henry A.Wallace，《誰的憲法？公共福利調查》（1936，Westport，Conn.：Greenwood, 1971），309頁。關于合作社的增長，請參閱：“1925年美國的合作社運動（農業之外）”，美國勞工統計局《公報》437（1927）：美國合作社聯盟《第四期年鑒：1939年美國消費合作社調查》（Minneapolis: Northern States Cooperative League, 1939），23—25頁：Joseph G.Knapp，《1920—1945年美國合作企業的發展》（Danville，Ill.：Interstate Printers, 1973），第二部分。

[[890]](#_890_3)Max Bond，“田納西流域管理局對黑人的培訓項目”，《黑人教育雜志》7（1938）：388頁：Doak S.Campbell等，《公共事業振興署的教育活動》，公共事業振興署教育顧問委員會，成員研究14（Washington，D.C.，1939），45—47,74—79頁：John W.Studebaker，《美國方式：得梅因論壇的民主運作》（New York: McGraw-Hill, 1935）：William Graebner，《制造共識：20世紀美國的民主和權威》（The Engineering of Consent，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7），第4章：Hilda Worthington Smith，“工人教育的開放視野：自傳”，布林莫爾學院圖書館未發表的打字稿，1978年：更籠統的內容請參閱：Joseph F.Kett，《困境中追求知識：1750—1990年美國從自我提高到成人教育》（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Under Difficulties，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第11章。

[[891]](#_891_3)Maurice Seay，“成人教育：田納西流域管理局教育和培訓項目描述”，《學校服務局公報》（Bulletin of the Bureau of School Service，肯塔基大學教育學院）10，第4期（1938），184頁：Joyce L.Kornbluh，《工人教育新政：工人服務項目》（Urbana: University of Illnois Press, 1987），73頁：Charles Seeger和Margaret Vailant，“野外代表日記（1937）”，《民族音樂學》（Ethnomusicology）24（1980）：168頁，Janelle Warren-Findley，“音樂家和山里人：1935—1937年重新安置署在阿巴拉契亞的音樂項目”，《阿巴拉契亞雜志》7（1979—1980）：113頁：Archie Green，“重新安置署歌曲單”，《約翰·愛德華基金會季刊》（JEMF Quarterly）11（1975）：80—87頁。

[[892]](#_892_3)Nancy L.Grant，《田納西流域管理局和美國黑人：現狀規劃》（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0）：Harvard Sitkoff，《黑人新政：民權作為全國性議題的出現》（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Marion Clawson，“九個挑選的重新安置項目的經驗”[1943]：《農業歷史》52（1978）：1—92頁。

[[893]](#_893_3)《富蘭克林·羅斯福公共文件》，第六卷，第5頁。

[[894]](#_894_3)Robert G.Barrows，“廉價公寓之外：1870—1930年美國城市住房模式”，《城市歷史雜志》9（1983）：395—420頁。

[[895]](#_895_3)Lawrence Veiller，“為美國人重新建房”，1935年倫敦國際住房和城鎮規劃會議，《論文和綜合報告集》（London: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for Housing and Town Planning, 1935），358頁。

[[896]](#_896_3)Richard Plunz，《紐約市住房歷史：美國都市的居住方式和社會變化》（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897]](#_897_3)Walter J.Trattner編，《美國社會福利人物傳略辭典》（Westport，Conn.：Greenwood 1986），673—676頁。

[[898]](#_898_3)《哈羅德·伊克斯秘密日記》（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3—1954），第二卷，218頁：美國國會，參議院教育和勞工委員會，《貧民窟和廉租公共住房：參議院2392號議案聽證會》，74屆國會第一次會議，1935年。

[[899]](#_899_3)Louis H.Pink，《住房新時代》（New York: John Day, 1928）：John Herling，“弗拉德克”，《調查圖片》29（1940）：29頁以下。

[[900]](#_900_3)Raymond Unwin，“英國、美國的低成本住房”，《住房官員年鑒，1935年》（Chicago: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Housing Officials, 1935），51—54頁：全國住房官員協會，《美國住房計劃》：美國國會參議院教育和勞工委員會，《貧民窟和廉租公共住房》：Coleman Woodbury，“建房者和規劃者之間：克爾曼·伍德伯里回憶”，《美國規劃者：生平和回憶》，Donald A.Krueckeberg編（New York: Methuen, 1983）。在國際住房委員會中，昂溫與法蘭克福的恩斯特·康恩和英國房地產女經理協會的艾麗絲·塞繆爾斯合作，但他是委員會的領袖人物。

[[901]](#_901_3)《美國城市》52（1937）：109頁：《調查圖片》27（1938）：244頁。

[[902]](#_902_3)Charles F.Palmer，《貧民窟戰士歷險記》（Atlanta: Tupper and Love, 1955）。

[[903]](#_903_3)Pink，《住房新時代》：Nathan Straus，《國內外低成本住房：提交拉瓜迪亞市長的報告》（New York： n.p.，1935）。

[[904]](#_904_3)參議員瓦格納在1936年成立的小組內，七名具有相當重要海外聯系的住房專家是查爾斯·艾布拉姆斯、海倫·阿爾弗雷德、凱瑟琳·鮑爾、布里克·瑪奎特、瑪麗·西姆柯維奇、伊迪絲·伍德、克爾曼·伍德伯里。Timothy L.McDonnell，《瓦格納住房法案：立法過程案例研究》（Chicago: Loyola University Press, 1957），158頁。關于埃倫伯根請參閱Mary S.Cole，“凱瑟琳·鮑爾和1926—1937年公共住房運動”，喬治華盛頓大學1975年博士論文460頁。關于瓦格納請參閱 Joseph J.Huthmacher，《參議員瓦格納和都市自由主義的興起》（New York: Atheneum, 1968）。

[[905]](#_905_3)Carol Aronovici編，《美國不能有住房》（New York: Museum of Modern Arts, 1934）：Albert Mayer，“為什么住房項目失敗了？”《國家》138（1934）：408頁。

[[906]](#_906_3)Michael W.Straus和Talbot Wegg，《住房步入成年》（Housing Comes of Ag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907]](#_907_3)Radford，《美國現代住房》，第6章：Lewis Mumford，《城市文化》（New York: Harcourt，Brace, 1938），圖28。

[[908]](#_908_3)Arnold，《郊區新政》，第11章：Bernard Sternsher，《雷克斯福德·特格韋爾與新政》（New Brunswick，N.J.：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64），尤其是第25章。法雷的話轉引自 Kirkendall，《社會科學家與農業政治》，120頁。

[[909]](#_909_3)J.V.Fitzgerald 在1936年7月31日給Stephen Early的信，合作企業調查文件集，羅斯福圖書館。

[[910]](#_910_3)David Eugene Conrad，《被遺忘的農民：新政中佃農的故事》（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5）。

[[911]](#_911_3)James L.Guth，“1929—1942年全國合作社協會與農業救濟”，《農業歷史》5（1977）：441—458頁：Leland Olds在1937年2月28日給 Marion Olds的信，利蘭·奧爾茲文件集。Granducci，“合作社：新妖怪”，29頁。到了報告最終出來的時候，貝克尋求共同立場的努力已經剔除了幾乎任何有爭議的建議。合作社美國調查，《歐洲合作社調查報告》（Washington，D.C.，1937）。

[[912]](#_912_3)Baldwin，《貧困與政治》，163頁：美國國會眾議院農業委員會，《農場租賃：眾議院8號議案聽證會》，75屆國會第一次會議，1937年，77頁。

[[913]](#_913_3)美國國會參議院農業林業委員會，《創辦聯邦農場租賃家庭公司：參議院1800號議案聽證會》，74屆國會第一次會議，1935年，8—9,74,20頁：《富蘭克林·羅斯福公共文件》，第五卷，373頁。

[[914]](#_914_3)美國總統農場租賃委員會《報告》（Washington，D.C.，1937），22頁：Saloutos，《美國農民與新政》，169,171—173頁。

[[915]](#_915_3)Baldwin，《貧困與政治》，第7章。

[[916]](#_916_3)美國國會眾議院農業委員會，《農場租賃》，46—47頁：Edward C. Banfield，“農場租賃購買項目十年”，《農業經濟學雜志》31（1949）：469頁。

[[917]](#_917_3)McDonnell，《瓦格納住房法案》，美國國會參議院教育和勞工委員會，《1936年美國住房法案：參議院4424號議案聽證會》，74屆國會第二次會議，1936年。

[[918]](#_918_3)美國國會參議院教育和勞工委員會，《貧民窟與低成本公共住房》，130頁。這個議題上木材商人的利益在于他們擔心政府建房將不用木材而用鋼筋混凝土。

[[919]](#_919_3)Edith Elmer Wood，“國家鏟除貧民窟”，《調查》67（1932）：668—669頁：全國公共住房會議，《1934年華盛頓第一屆公共住房會議演說集》（New York: National Public Housing Conference, 1934）：全國公共住房會議，《華盛頓第三屆貧民窟清理和廉租住房會議演說集》（Washington，D.C.，National Public Housing Conference, 1936）。

[[920]](#_920_3)Catherine Bauer，“‘貧民窟清理’或‘住房建設’”，《新共和》137（1933）：730—731頁：Catherine Bauer，《現代住房》（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34），尤其是243—247頁：Lewi Mumford，“打破住房封鎖!”《新共和》75（1933）：6—11頁：Albert Mayer，Lewis Mumford和Henry Wright，《新政新家園》（New York: New Republic, 1934）：Carol Aronovici，“美國低成本住房展望”，《美國不能有住房》，Aronovici編。

[[921]](#_921_3)Raymond Unwin，“英國、美國的低成本住房”，51—54頁：Richard L.Reiss，《英國、美國的住房》（New York: National Public Housing Conference, 1937），102頁：法蘭克福1934年委員會的恩斯特·康恩同意：Ernst Kahn，“千萬房屋”，《調查圖片》24（1935）：221頁以下。

[[922]](#_922_3)Palmer，《貧民窟戰士歷險記》：Straus，《國內外低成本住房》。同類的內容，請參閱Ernest M.Fisher和Richard U.Ratcliffe，《歐洲住房政策和實踐》（Washington，D.C.：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1936）。

[[923]](#_800_6)Marian Bowley，《住房與國家，1919—1944年》（London: Allen and Unwin, 1945）。

[[924]](#_924_3)《紐約市住房局訴穆勒的事由》，270 N.Y.333（1936）：Myres S.McDougal和Addison A.Mueller，“公共住房的公共目的：時代錯誤重新埋葬”，《耶魯法律雜志》52（1942）：48頁。

[[925]](#_925_3)McDonnell，《瓦格納住房法案》，336,49頁。

[[926]](#_926_3)Edith Elmer Wood，《美國住房的新趨勢》（New York: Macmillan, 1931），43—59頁。

[[927]](#_927_3)Nathan Straus，“住房：全國的成就”，《大西洋月刊》163（1939）：204頁：美國國會眾議院銀行貨幣委員會，《創建美國住房局：眾議院5033號議案聽證會》，第75屆國會第一次會議，1937年，193頁。

[[928]](#_928_3)Joel Schwartz，《紐約辦法：羅伯特·莫斯，都市自由主義者，內城重新開發》（Columbus: 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3），46頁：Catherine Bauer，“現在終于有了：住房”，《新共和》 92（1937）：119頁：“為美國人建房：十年計劃”，《國家》166（1948年5月15日）：第二部分。

[[929]](#_929_3)M.B.Schnapper編，《美國公共住房》（New York: H.W.Wilson, 1939），196頁。

[[930]](#_930_3)Cole，“凱瑟琳·鮑爾”，648頁，658頁注：Plunz，《紐約市住房歷史》，第7章。

[[931]](#_931_3)美國國會眾議院銀行貨幣委員會，《創建美國住房管理局》，79頁。

[[932]](#_932_3)美國國會眾議院方法和手段委員會，《失業保險：眾議院7659號議案聽證會》，第73屆國會第二次會議，1934年，201頁。

[[933]](#_933_3)Holley，《山姆大叔的農民》，270,272頁：Leuchtenburg，“美國的歐洲化”，295頁：Rubinow，《尋求保障》，254頁。

[[934]](#_934_3)Rubinow，《尋求保障》，254頁：美國國會眾議院方法和手段委員會，《失業保險》，34—47頁。

[[935]](#_935_3)John R.Commons，《我自己：約翰·康芒斯自傳》，重印本（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4）：John R.Commons和John B.Andrews，《勞工立法原則》，修訂本（New York: Harper and Brothers, 1927），546—547頁。

[[936]](#_936_3)Commons，“失業：補償和預防”，第7頁：Commons，“閑散勞工的補償”，第8頁。

[[937]](#_937_3)《調查》 41（1918）：第2頁：《美國勞工立法評論》12（1922）：186頁，同上，20（1930年9月）。

[[938]](#_938_3)John B.Andrews，“序言”，《美國勞工立法評論》10（1920）：113頁：John B.Andrews，“現在行動解決失業問題!”同上，20（1930），340頁。

[[939]](#_939_3)John E.Edgerton，“公共失業保險”，《強制性失業保險》，Buehler編，286頁。

[[940]](#_940_3)美國經濟安全委員會，《社會保險是什么？》（Washington，D.C.，1935）：美國經濟安全委員會，《國內外的社會保障》（Washington，D.C.，1935），第2頁：Harry L.Hopkins等，《走向經濟安全：羅斯福總統經濟安全項目評論》（Washington，D.C.，President's Committee on Economic Security），第2頁。

[[941]](#_941_3)美國重新安置署，《綠帶城鎮》（Washington，D.C.，1936）：Rexford G.Tugwell，“對漢密爾頓縣區域規劃委員會的講話”，第6頁。

[[942]](#_942_3)《城市》，Ralph Steiner和Willard Van Dyke導演，1939年。

#### 第十一章 1942年的倫敦

[[943]](#_943_3)對這些主題的眾多發展，尤其請參閱Gosta Esping-Andersen，《福利資本主義的三個世界》（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Neil Gilbert和Barbara Gilbert《賦能型國家：美國現代福利資本主義》（The Enabling State，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944]](#_944_3)Arthur Schlesinger，Jr.，“福利國家”，《通訊員》（Reporter）1（1949年10月11日）：28頁。

[[945]](#_945_3)比較 William E.Leuchtenburg，《羅斯福時代：論羅斯福及其遺產》（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第9章：“1929—1950年美國的‘歐洲化’”。

[[946]](#_946_3)Jose Harris，《威廉·貝弗里奇：自傳》（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7）：William Beveridge，“復興項目后的思考”（1934年10月10日）和“美國復興項目的某些方面”，見于洛克菲勒基金會[1934年]備忘錄，威廉·貝弗里奇文件集，倫敦經濟學院，英國政治經濟學圖書館：《國家》156（1943）：95頁。

[[947]](#_947_3)William Beveridge，《社會保險和救濟服務》美國版（New York: Macmillan, 1942）。

[[948]](#_948_3)Jane Lewis，“婦女平等的典范：二十世紀英國國家對于兒童的支持研究”，Gisela Bock and Pat Thane編，《母性和性別政策：婦女和1880—1950年代歐洲福利國家的興起》（London: Routledge, 1991）：Susan Pedersen，《家庭、依賴與福利國家的起源：1914—1945年的英國和法國》（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第3章：William Beveridge，《自由社會中的充分就業》（New York: W.W.Norton, 1945）：Jose Harris，“戰爭時期的社會規劃：《貝弗里奇報告》的某些方面”，見《戰爭與經濟發展》，J.N.Winter編（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949]](#_949_3)Beveridge，《社會保險》，第6頁：William H.Beveridge，《保障的支柱以及戰時其他文章和演說》（New York: Macmillan, 1943）。

[[950]](#_950_3)比較John Dryzek和Robert E.Goodlin，“風險分擔和社會正義：戰后福利國家的動機基礎”，《英國政治學雜志》16（1986）：1—34頁：Harold L.Smith編，《戰爭與社會變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英國社會》（Manchester，Englan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6）。

[[951]](#_951_3)Harris，《威廉·貝弗里奇》，第17章：Steven Fielding，Peter Thompson和Nick Tiratsoo，《“英國起來!”工黨和1940年代英國大眾政治》（Manchester，England: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34頁：Joseph Barnes，“當聯盟終結時”，《調查圖片》34（1945）：224頁。

[[952]](#_952_3)F.W.S.Craig，《1918—1966年英國大選宣言》（Chichester，England: Political Reference Publications, 1970）。

[[953]](#_953_3)Henry Pelling，《1945—1951年工黨政府》（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84）：Kenneth O.Morgan，“社會主義和英國工黨中的社會民主思想，1945—1989年”，《社會史文獻》（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29（1989）：297—325頁。

[[954]](#_954_3)Richard Polenberg，《戰爭與社會：1941—1945年的美國》（Philadelphia: Lippincott, 1972）：Alan Brinkley，《改革的終結：蕭條和戰爭中的新政自由主義》（New York: Knopf, 1995），第8—9章：Nelson Lichtenstein，《本土的勞工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產業工會聯合會》（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2）：Steven Fraser，《勞工將統治：西德尼·希爾曼和美國勞工的興起》（New York: Free Press, 1991）。

[[955]](#_955_3)“鋁城聯排住房”（Aluminum City Terrace Housing），《建筑論壇》81（1944年7月）：65—76頁：Nelson Lichtenstein，《底特律最危險的人：沃爾特·魯瑟和美國勞工的命運》（New York: Basic Books, 1995），172頁。

[[956]](#_956_3)David Brody，“新政、勞工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為了勞工的事業：美國工人歷史上的主要議題》，Brody編（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178頁：Samuel I.Rosenman編，《富蘭克林·羅斯福公共文件和演說》（New York: Random House, 1938—1950），第九卷，671頁。

[[957]](#_957_3)Brody，《為了勞工的事業》，176,181頁。

[[958]](#_958_3)全國政策委員會，《1943年2月華盛頓〈貝弗里奇報告〉座談會備忘錄》（Washington，D.C.：National Policy Committee, 1943）：Harris，《威廉·貝弗里奇》，427—428頁。

[[959]](#_959_3)Monte M.Poen，《哈里·杜魯門與醫藥游說團》（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79），35—36頁：John W.Jeffries，“富蘭克林·羅斯福和‘美國的明天’”，《權力與責任：美國領袖個案研究》，David M.Kennedy和Michael E.Parrish編（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6），39頁：Keith W.Olsen，“美國的‘貝弗里奇計劃’”，《美國中部》65（1983）：87—99頁：“社會保障：我們有什么和提議了什么”《新聞周刊》（1943年3月22日）：28頁。關于貝弗里奇和全國資源計劃委員會計劃的政治命運，請參閱： Edwin Amenta和Theda Skocpol，“重新界定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戰和美國社會保障的發展”，《美國社會政策的政治》，Margaret Weir，Ann Schola Orloff和Theda Skocpol編（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

[[960]](#_960_3)“美國的《貝弗里奇報告》”，《新共和》107（1942）：810—811頁：Max Lerner，“新美國憲章：總統的就業和保障計劃”，同上，108（1943）：369頁：Bruce Bliven，Max Lerner和 George Soule，“美國憲章”，同上，108（1943）：523—542頁：“新人權法案”，《國家》156（1943）：401—402頁。比較Theodore Rosenof，“美國民主黨左派看1945—1951年英國工黨政府”，《歷史學家》38（1976）：98—119頁。

[[961]](#_961_3)美國全國資源計劃委員會，長期工作和救濟政策委員會，《保障、工作和救濟政策》（1942：重印本，New York: Da Capo Press, 1973）：Edwin E.Witte，“美國戰后社會保障建議”，《美國經濟學評論》33（1943）：825—838頁。關于保守派反應的例子，請參閱“從搖籃到墳墓到鴿子籠”（Cradle to Grave to Pigeonhole），《時代周刊》，1943年3月22日，13頁：“計劃者為什么不看報？”《星期六晚郵報》，1943年4月10日，112頁：“美國走哪條道路？”（Which Path America？）《紐約時報》，1943年3月14日，10E頁。還可參閱Eveline M.Burns，“全國資源計劃委員會的安全報告”，社會工作全國會議，《會議記錄》（1943），370—381頁。

[[962]](#_962_3)“新人權法案”，《國家》156（1943）：401—402頁。

[[963]](#_963_3)G.Hartley Grattan，“‘貝弗里奇計劃’還不夠”，《哈珀斯雜志》186（1943）：376頁：Jeffries，“富蘭克林·羅斯福和‘美國的明天’”，44頁：Henry A.Wallace，“人人都有工作”，《新共和》112（1945）：139頁。

[[964]](#_964_3)Peter A.Wallace，《經濟學觀點的政治力量：不同國家的凱恩斯主義》（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965]](#_965_3)Brinkley，《改革的終結》：John W.Jeffries，“‘新’新政：羅斯福和1937—1945年的美國自由主義”，《政治學季刊》105（1990）：397—418頁：Henry A.Wallace，《六千萬工作崗位》（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45）：Seymour E.Harris編，《挽救美國資本主義：自由經濟項目》（New York: Knopf, 1948），尤其是第11頁。

[[966]](#_966_3)Ira Katznelson，“重建美國：1940年代的跡象”，《美國政治發展研究》 5（1991）：301—309頁：Ralph Robey，“戰后官僚主義烏托邦：第二部分”，《新聞周刊》，1943年5月10日，62頁：“美國走哪條道路？”《紐約時報》，1943年3月14日，10E頁。

[[967]](#_967_3)Keith Hutchison，“英國——第六個冬天”，《國家》160（1945年1月6日）：第9頁：Andrew Roth，“英國最大的賭博”，同上，163（1946年7月16日）：第10頁。

[[968]](#_968_3)John Morton Blum，《V曾經代表勝利：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政治與美國文化》（V Was for Victory，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6），第3章：Geir Lundestad，《美國“帝國”和比較視野中的美國外交政策研究》（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40頁。

[[969]](#_969_3)Lucius D.Clay，《在德國的決策》（Decision in Germany，New York: Doubleday, 1950），第21—22章：Hans Günter Hockerts，《戰后德國社會政策決定：1945—1957年同盟國和德國社會保險政治》（Stuttgart: Klett-Cotta, 1980）：Jeffry M.Diefendorf，《戰爭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德國城市的重建》（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970]](#_970_3)Richard F.Kuisel，《誘惑法國人：美國化的兩難》（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第4章：Reinhold Wagnleitner，《可樂殖民化和冷戰：二戰后美國在奧地利的文化使命》（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4），125—127頁：更籠統的，Rob Kroes，Robert W.Rydell和Doeko F.J.Bosscher編，《文化傳播和接受：美國大眾文化在歐洲》（Amsterdam: VU University Press, 1993）。Laski的話轉引自Lundestad，《美國“帝國”》，39頁。

[[971]](#_971_3)《艾德萊·E.史蒂文森文件》，第五卷：《1953年3月—8月訪問亞洲、中東和歐洲》，Walter Johnson編（Boston: Little，Brown, 1947），488—489頁：Michael H.Prosser編，《生存法則：1936—1965年艾德萊·史蒂文森談國際事務》（New York: William Morrow, 1969），182頁：William Jennings Bryan，《舊世界和它的方式》（ST.Louis: Thompson, 1907）。

[[972]](#_972_3)Daniel T.Rodgers，“例外主義”，《想象的歷史：美國歷史學家與歷史》，Anthony Molho和Gordon S.Wood編（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973]](#_973_3)Alonzo L.Hamby，《超越新政：杜魯門和美國自由主義》（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3）：William E.Leuchtenburg，《在羅斯福的陰影下：從杜魯門到里根》（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974]](#_974_3)美國國會參議院銀行貨幣委員會《住房：參議院287號議案聽證會》，第91屆國會第一次會議，1947年：同上，《中等收入者住房：參議院2246號議案修正案聽證會》，第81屆國會第二次會議，1950年：美國國會參議院勞工和公共福利委員會，保健立法下屬委員會《全國保健計劃，參議院1106號議案聽證會》（National Health Program），第81屆國會第一次會議，1949年，尤其是塞莫爾·哈里斯的證詞，170—172頁。美國國會眾議院方式和手段委員會，《社會保障：關于1939年社會保障修正案的聽證會》，第76屆國會第一次會議，1939年，1258—1261,1245頁。美國國會參議院金融委員會，《社會保障修改：眾議院6000號議案聽證會》，第81屆國會第二次會議，1950年，529—530頁。

[[975]](#_975_3)Poen，《哈里·杜魯門與醫療游說團》，105,107,88頁：Forest Hackett，“最危險的游說（二）”，《讀者文摘》51（1947年12月）：63—66頁。

[[976]](#_976_3)Lichtenstein，《底特律最危險的人》，第15章：Nelson Lichtenstein，“杜魯門時代的勞工：‘私人福利國家’的起源”，《杜魯門總統時期》，Michael J.Lacey編（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Alan Derickson，“所有人的健康保障？1935—1958年社會工團主義和普遍健康保險”，《美國歷史雜志》80（1994）：1333—1356頁：Beth Stevens，“工會、雇工補貼和美國福利國家的私人化”，《政策歷史雜志》2（1990）：233—260頁：Elizabeth A.FonesWolf，《出賣自由企業：1945—1960年企業對勞工和自由主義的攻擊》（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4），第4章。引語來自Lichtenstein，《底特律最危險的人》，336—337頁。

[[977]](#_977_3)Robert Moses，“莫斯先生解剖‘長頭發規劃者’”，《紐約時報雜志》，1944年6月25日，38頁。